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1 卷 4 期
2025年5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青年编委

舒波 田蕾娅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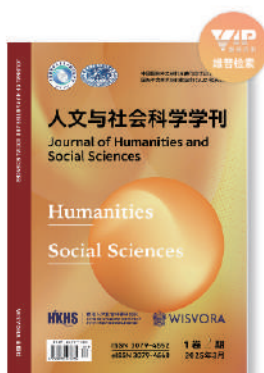
Q 维思沃尔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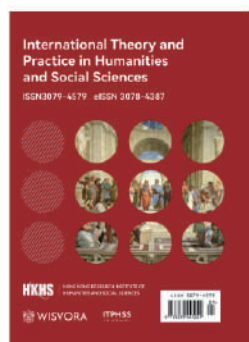
WISVORA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快速审稿 开放获取 普惠包容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PHSS)



经济与管理学报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中国医学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与技术学报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Insights



Journal of Emerging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Research

www.wisvora.com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 文化外交视域下美国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中的角色研究(1961-1968) - 安子涵 1-7
- 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探索实践 - 冷强 于晟伟 何永明 8-11
- 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 - 梁锋 12-18
- 政治、历史与法律：对英美法理学“非历史性”的批判 - 胡泽民 19-23
- 中国时尚饮品品牌进入泰国市场的行为与策略分析 - 宋林，张一平 24-28
- 高职大学生“慢就业”原因分析及对策探索 - 明伟 29-33
- 移动支付特性对企业信任及使用意愿产生的影响——以支付宝与云闪付之间的比较为中心 - 陈宇，张惠媛 34-44
- 青年“躺平”现象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再定位 - 陈楠 45-50
- 地域非遗视觉符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黑龙江赫哲族图腾纹样为例 - 曹宇欣，夏振宇，李奇 51-56
- 1929 年昆明北门街火药爆炸案的灾情分析 - 樊雨晨 57-61
- 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视域下共同体思想的建构解析 - 赵静文 62-66
- “双减”背景下高中生家长的教育焦虑调查研究 - 步国星，董晓瑜，李烨 67-71
- “人工智能+”背景下转媒体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中的应用研究 - 贾雨晴 72-77
- 儒家君子人格对新时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 - 张雯丽 78-81
- 混合研究法视角下高职院校“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构建与优化 - 乐冰洁 82-92
- 在高等数学课堂上融入思政元素的几点思考 - 何永明，于晟伟，付亚坤，赵赫 93-95
- 本科生与高职生英语学习愉悦、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探究 - 张静 96-100
- 《好东西》：女性意识的迷失与重塑 - 曾雪枝，王竣 101-105
- “美丽的新世界”萌芽：《我城》的乌托邦书写研究 - 初瑛竺 106-112
- 论涉外法治人才的国际化培养 - 孙宁宁 113-115
- 高校师德师风法治化路径探索 - 孙宁宁 116-121
- 无约束境遇下的群体极化：《蝇王》中的暴力本能与文明脆弱性 - 陈立立 曹一君 122-125
- 观察深浅与铸就经典：当代学者钱念孙的文艺观念与科技伦理探析 - 王浩楠 126-131
- 探讨度假村的服务场景对品牌形象、消费者感知价值和满意度的影响——以中国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为例 - 梅琼奥，张惠媛 132-139
-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高校“红绿思政”的生态哲学范式及实现路径 - 石婷婷 140-145
- 心理治疗在阈下抑郁中的疗效：文献综述 - 于文丽，潘璐彤，李奇遇，葛蒲，杨绿 146-152
- 列宁《怎么办？》中党的理论建设的现实意义 - 吴佩瑶 153-156

DeepSeek 大语言模型在高校落地的伦理风险治理与多维应用价值评估研究 - 尹立君 宋海军 史雪魁 陈婧 157-162

协同视角下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研究及启示 - 唐家杰 163-169

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的范围综述 - 刘佳欣, 刘德宇, 韩沁, 潘璐彤, 赵丽萍 170-182

不甘平凡的"浪荡"--阿尔蒂尔-兰波及其诗歌当中的"反叛"元素 - 许昌 183-186

节外生枝, 归于原线: 漫威电影宇宙的叙事逻辑与现实映照研究 - 陈立立, 曹一君 187-189

"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践策略——以贵州“村超”足球赛为例” - 杨雅馨, 于晖, 周欣芸, 姜岩 190-193

从虚拟现实(VR)看技术对审美经验的重构 - 邹孟作 194-198

技术进步与薪酬不平等: 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企业分配格局? - 王筱淳 199-206

商业性与批判性博弈: 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转向与现实困境 - 李柯慧, 李昂, 王竣 207-211

双重视角下人工智能驱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 卜谊榕 212-215

透视教师专业眼光: 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中的挑战与策略 - 吕朔冰 216-220

潮州市非遗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现状、挑战与赋能模式 - 陈奕敏, 吴姍燕, 张芷莹 221-225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与实践路径-以《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为例 - 傅丽君 226-231

基于 SATI 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 姚镇城 232-235

桌面角色扮演游戏 (TRPG) 的思辨体验作为伦理困境推演与价值观澄清的场域研究 - 杨亨冉, 蔺艺喆 236-240

论《熊谷阵屋》中替身悲剧的构造——以替身悲剧的动因与替身悲剧的本质为焦点 - 霍云立 241-245

中国古代诚信思想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及路径研究 - 王琦、吴佩瑶 246-249

数字赋能服务型制造双元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 甘秀梅, 李立超 250-256

外语学习愉悦情绪研究综述——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 白淳, 胡家英 257-267

乡村振兴战略下自然教育模式的创新探索——以“百草园”家庭共育社群的构建与实施为例 - 林秋玫, 方燕屏, 苏灿铎, 邓璇辉, 郭瞳杰, 郑少涌 268-271

数字经济驱动下四维协同机制构建与乡村振兴路径创新——基于“校政企村”融合发展的多案例实证研究 - 赵雪姿, 刘亦纯, 张烁, 陈煜, 刘世杰, 郑少涌 272-275

关于居家、社区和机构协同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究 - 洪文博, 郑梓恒, 冯云禧, 梁祖耀, 杨奕宸, 茹沛欣 276-279

试析紧急事态下日本的粮食安全体制——基于《粮食农业农村政策制定新方向》的分析 - 张珍霓, 王耀振 280-283

"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设计研究——以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进行系统化设计整合为例" - 岳子辉, 吴楚君 284-288

"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的数字化视觉语言转化研究 ——以剪纸为例" - 何海海, 吴楚君 289-292

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困难的现状及其促进策略 - 孙思洁, 刘丽, 万洁 293-297

多元融合与创新驱动: 新时代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路径研究 - 单海坤, 岳振宇, 逢浩 298-303

浅析大学辅导员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 岳振宇, 杨馨宇, 单海坤 304-306

马克思早期幸福观初探 - 刘阳 307-31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41

文化外交视域下美国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中的角色研究（1961-1968）

安子涵¹

(1.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和平队是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文化外交政策的典型代表。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时期, 秘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平队特遣队之一, 并且进入发展的全盛时代。但受冷战以及秘鲁民族主义运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和平队志愿者在秘鲁开展教育服务的历程十分曲折,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外交博弈的牺牲品。因此, 美国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的开展, 是美国外交政策与秘鲁国家需求之间关系的重要缩影, 也可窥见其背后隐藏的既具有一定牺牲色彩, 又能够超脱双方利益, 破生出新志愿意义的角色担当。

关键词: 文化外交; 美国; 秘鲁; 和平队; 角色研究

二战结束以来, 拉美地区长期扮演着美国稳固势力的后方角色,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至 20 世纪 50 年代, 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崛起已成燎原之势, 美国亟需对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开始对其僵硬的冷战战略与外交政策做出调整, 使外交能够为冷战的推行提供正面服务。20 世纪 60 年代, 伴随约翰·肯尼迪 (John Kennedy) 上台执政, 文化外交^①受到美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平队^②便是美国政府战后发起的一次大规模文化外交活动, 以改变美国外交队伍的人员结构, 将能够体现美国优良特性的人纳入其中, 重新树立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形象为目标。1961 年 3 月 1 日, 肯尼迪正式启动和平队, 将该组织视为对抗“丑陋的美国人”和“美帝国主义”刻板印象的一种手段, 由萨金特·施莱弗 (Sargent Shriver) 担任和平队的首任长官。肯尼迪十分看重和平队的作用, 他表示: “在我看来, 和平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来强调美国特性中十分重要和真诚的部分, 这些特性引导了我们的很多国际政策。”^[1]1963-1968 年执政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Lyndon Baines Johnson) 同样对和平队的战略价值给予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一时期, 和平队无论在财政预算方面亦或志愿者数量方面, 都达到发展的顶峰。作为冷战高潮时期美国文化外交的产物, 它体现了 60 年代以肯尼迪、约翰逊为代表的“冷战一代”总统的勃勃雄心, 即以美国的自由体制征服世界。

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 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已取得较为深入的成果, 主要可分为三个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为和平队研究的起步阶段, 即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 多为关于和平队的整体性研究, 侧重对和平队这一机构及其职能的介绍, 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就和平队产生的背景、开展的活动等进行查

基金项目: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红色文化研究专项基金项目“文化外交视域下美国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中的角色研究 (1961-1968)” (2024214)

作者简介: 安子涵 (2000—), 女,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① 文化外交的主要手段包括咨询交流和人员交流。文化外交的核心内容是增强本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即争取人心; 而传播文化即价值观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也是文化外交的目的之一。参见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② 和平队: 美国政府创建的从事国际性志愿工作的机构, 主要派遣已经完成了正规大学教育、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美国青年为主力的志愿人员, 到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和城市, 直接与发展中国家的中下层人民打交道, 从事教学、农业和社区开发、医疗保健等工作, 向当地老百姓进行面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援助服务, 帮助他们提高教育水平、促进农业、医疗保健及社区的发展, 提高草根阶层的生活条件。参加刘国柱. 和平队与美国文化外交 [J]. 学海 2009, 3: 159-164.

考,其中许多作者为和平队亲历者,以和平队官员或者志愿者的视角进行介绍;①另一类则为采访手记②。但此时真正的历史性研究较少。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美国学术界关于和平队的研究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美国学者不仅将和平队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还将其作为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具体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政治家或者和平队参与者撰写的回忆录③,二是历史学家对其进行的历史阐释④,其中后者撰写的著作与论文,相较于前者更具有推陈出新的价值。而在其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肯尼迪政府档案材料的逐渐解密,美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学术著作⑤与撰写的论文⑥均呈现出多维度、全方位发展的良好态势。我国对和平队研究的起步较晚,大多散见于研究战后美国外交史的著作中,仅有少量研究和和平队的专门性著作。⑦尽管国内外学界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较为遗憾的是,拉丁美洲作为美国派遣和平队志愿者的主要地区,学界对该地区的和平队研究并不深入,大多只是作为美国援助拉美政策的一环有所提及,而对拥有世界上最大和平队特遣队之一的秘鲁,学者们更是鲜有关注。因此,基于一定数量的外文档案,以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对和平队与美国外交政策以及秘鲁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予以分析,可以较为深刻地窥见其隐藏的具有一定牺牲色彩的角色担当,为深化学界对美国和平队在秘鲁活动的研究提供基础。

一、理想与困境的交织:和平队在秘鲁的曲折诞生

拉丁美洲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战结束以来,这一地区成为美国全球争霸的战略后方,只有“后院”稳固,美国在“前院”履行“警察”职责时才能无后顾之忧。因此,美国在战后从未松懈对拉美地区的文化渗透。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成为美国和平队力图派出志愿者的主要地区,秘鲁作为拉美地区的重要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平队特遣队之一,美国派遣至秘鲁的和平队在诸多领域,特别是在处理教育同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成为整个拉美地区的典型,对于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中的角色研究,是探寻和平队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一个代表性案例。

美国派遣至秘鲁的和平队于1962年在国家主任弗兰克·曼凯维奇(Frank Mankiewicz)和拉丁美洲主任杰克·胡德·沃恩(Jack Hood Vaughn)的指导下建立,至1964年,曼凯维奇成为该区域主任,沃恩则于1965年和1966年分别出任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与和平队队长,二人共同负责和平队在拉美地区的大规模社区发展项目。不同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和平队保持的怀疑与观望态度,秘鲁对于和平队是十分欢迎的。1961年11月18日,第一任和平队主任萨金特·施莱弗结束了其在拉丁美洲的宣传和平队之旅,次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秘鲁的政府甚至反对派报纸都在呼吁和平队志愿者。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特切(Manuel Prado Ugarteche)总统和他的内阁要求志愿者帮助秘鲁发展内陆高地的农村和沿海城市的贫民窟,并指出‘我们的计划正能满足这一要求’。”^[2]至1962年1月25日,美国驻秘鲁大使洛布(Loeb)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Albertson, Maurice L. *New Frontiers For American Youth: Perspective on the Peace corps*[M].Public Affairs Press, 1961; Sargent Shriver. *Point of the Lance*[M].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1964; Textor, Robert B. *Cultural Frontiers of the Peace Corps*[M].MIT Press, 1966; Cowan, Paul. *The Making of an Un-American*[M].The Viking Press and Delta Books, 1970; Ashabranner, Brent. *A Moment in History: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M].Doubleday Company, 1971; Cowan, Rachel. *Groeing up Yanqui*[M].The Viking Press, 1975.

② 相关研究可参见: Velma, Adams. *The Peace Corps in Action*[M].Foll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③ 相关研究可参见: Lucas, Payne and Lowther, Kevin. *Keeping Kennedy's Promise, The Peace Corps: Unmet Hope of the New Frontier*[M].West view Press, 1978; Wofford, Harris. *Kennedy and Kings: Making Sense of the Sixties*[M].Farrar Straus Giroux, 1980; Redmon, Coates. *Come as You Are: The Peace Corps Story*[M].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④ 相关研究可参见: Reeves, Zane. *The Politics of the Peace Corps and Vista*[M].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8; Rice, Gerard T. *Twenty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M].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Rice, Gerald T. *The Bold Experiment: JFK's Peace Corps*[M].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5.

⑤ 相关研究可参见: Schwarz, Karen.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the Peace Corps*[M].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1; Searles, David. *The Peace Corps Experience, Challenge and Change 1969-1976*[M].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7; Hoffman, Elizabeth Cobbs. *All You Need is Love: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Spirit of 1960s*[M].Harw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ritz Fischer. *Making Them Like Us: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the 1960s*[M].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8;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M].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Thomas J. Nisley. *The Peace Corps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Last Mile of U.S. Foreign Policy*[M].Lexington Books, 2018; Fernando Purcell. *The Peace Corps in South America: Volunteers and the Global War on Poverty in the 1960s*[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P. David Searles. *The Peace Corps Experience: Challenge and Change, 1969-1976*[M].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21.

⑥ 相关研究可参见: Jonathan Zimmerman. *Beyond Double Consciousness: Black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Africa, 1961-1971*[J].*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95, 20(1):999-1028; Elizabeth A. Cobbs. *Decolonization,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ace Corps*[J].*Diplomatic History*, 1996, 20(1):79-105; James F. Siekmeier. *A Sacrificial Llama? The Expulsion of the Peace Corps from Bolivia in 1971*[J].*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000, 69(1):65-87; Nathaniel S. Watts, Monica Pajuelo, Taryn Clark, Maria-Cristina I. Loader, Manuela R. Verastegui, Charles Sterling, Jon S. Friedland, Hector H. Garcia, Robert H. Gilman, et al. *Taenia solium Infection in Peru: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Peace Corps Volunteers and Researchers in a Community Based Study*[J].*Plos One*, 2014, 1-13; Michael E Flynn, Carla Martinez Machain, Alistandra T Stoyan. *Building Trust: The Effect of US Troop Deployments on Public Opinion in Peru*[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9, 63(3):742-755.

⑦ 相关研究可参见: (美)莱德勒·伯迪克著,朱安,武国强译. *丑陋的美国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杨生茂主编. *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资中筠. *战后美国外交史: 从杜鲁门到里根*[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刘国柱. *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和秘鲁代理外交部长里卡多·埃利亚斯·阿帕里西奥 (Cardo Elias Aparicio) 正式签署了一项美国和秘鲁之间的双边协议, 为和平队在秘鲁的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该协议规定: “美国政府将根据秘鲁政府的要求提供和平队志愿者, 但须经美国批准。志愿者将在两国政府指定的秘鲁组织的‘直接监督’下工作。此外, 美国还将承担向秘鲁派遣志愿者的所有费用。”^[3]尽管如此, 秘鲁和平队项目的开展并不顺利。1962 年秘鲁爆发了军事政变, 致使美国面临着棘手的外交问题与特殊的机遇, 向秘鲁派遣和平队的项目遭遇推迟。

1962 年 7 月 18 日, 秘鲁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原有政府, 这加剧了美国外交形势的严峻性, 也使肯尼迪在拉丁美洲公开支持民主的决心遭受考验。实际上, 美国对这场政变早有预见。在此之前, 美国大使小詹姆斯·勒布 (James Loeb, Jr.) 在华盛顿就秘鲁可能发生的军事政变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磋商后曾访问和平队, 与时任和平队总主任萨金特·施莱弗进行了交谈。勒布曾明确表示, 如果发生政变, 美国将暂停对秘鲁的援助计划, 拒绝承认新政府。^{[4](P9)}同时, 勒布还询问了施莱弗和平队将准备如何应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政变, 施莱弗则表示这将由秘鲁和平队计划的负责人曼凯维奇决定。为此, 曼凯维奇还曾向他的采访者吹嘘, 他不知道政府中还有其他地方的战地指挥官享有这样的权力。然而, 在政变发生后, 曼凯维奇发现自身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不具有任何权威性。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 和平队总部曾召开工作人员会议, 曼凯维奇当时明确表态: “尽管发生了政变, 秘鲁项目仍将按计划启动。”^[5]但由于肯尼迪总统拒绝承认新政权, 并下令暂停对秘鲁的双边援助, 他的声明并没得到任何采纳。在施莱弗就秘鲁局势向和平队拉美地区主任杰克·胡德·沃恩征求 (Jack Hood Vaughan) 意见时, 沃恩表示, 国会对军政府的强硬态度可能会迫使和平队推迟秘鲁项目的启动。而另一位与会者则直接提到, 和平队的秘鲁培训项目已经被暂停。^[6]直至美国政府考虑到与秘鲁前一届普罗多政府签署了授权和平队在秘鲁活动的协议, 加之普罗多总统是第一位在华盛顿拜访肯尼迪的拉美领导人, 且他在会见中强调了自身对引入外国资本至秘鲁的兴趣, 以及他对打击“外国和破坏性意识形态渗透”的关注。肯尼迪为尽快在秘鲁赢得民心, 防止共产主义在当地的扩张, 最终转变了态度, 秘鲁和平队计划在推迟一月之后得以重新启动。

由于秘鲁计划是美国在拉美最大的和平队项目之一, 美国十分重视这支和平队的人员选择。在某种程度上, 其人员规模寄托了美国的一个重要目标, 即重塑美国在拉美的国家形象。但志愿者的实际组成与预期存在较大落差。施莱弗曾要求对志愿者进行系统筛选, 选择具备必要技能的人。但事实上, 大多数志愿者都是和平队所称的“普通学士”, 他们通常没有工作经验, 也没有明确的工作技能。尽管和平队多次进行专门的招募活动, 但始终未能纳入大量技术工人或具有高等学位的人员。加之和平队急于扩张, 希望以一种低廉的运营成本给立法者留下深刻印象, 也疏于对志愿者进行职业技能与语言培训。实际在美国国内, 曾有官员提议延长和平队的培训计划, 但遭到了施莱弗的拒绝。他认为延长培训会大大缩短志愿者两年的海外服务时长, 这最终导致秘鲁和平队的培训情况比以往还要糟糕。最终, 由 68 名缺乏培训却被美国寄予厚望的和平队志愿者, 于 1962 年 9 月 8 日抵达秘鲁, 开启了美国和平队在秘鲁开展活动的时代。

实际上, 彼时美国一直宣称秘鲁和平队的非政治形象, 但我们从其组建过程中, 不难窥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 其行动听从于国会决议, 并不具备自主权, 始终为美国的外交目标服务, 这在本质上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硬的外交手段无异。若用历史学家、肯尼迪时期的前白宫助理阿瑟·M·施莱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的话来讲: “和平队是新边疆试图超越冷战时期‘艾奇逊-杜勒斯理论’的最亲切表达。”^{[7](P473-476)}

二、被动大于主动: 和平队在教育活动中的角色担当

教学工作是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规模最大且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 同时也被受援国认为是该组织理所当然实施的项目, 它使和平队的规模可以按照决策者的要求迅速扩大。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援国的需要。在 20 世纪 60 年代, 许多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都缺乏从事初等与中等教育的老师, 且国家政府也难以为本国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精力, 分配至教育领域的和平队志愿者就被这些新兴国家寄予众望,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填补国家教育真空的重要力量。二是从事教学的门槛与成本较低。由上述可知, 前往秘鲁的和平队志愿者并未具备合格的专业素养, 且和平队也不相信自身有能力培训他们的其他技能。因此, 尽管和平队担心这会引发公众和国会的不良反应, 但为节约成本, 教育仍然成为和平队最大的活动领域。据统计, 1961-1963 年间, 在北非、近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队志愿者中, 有 61% 被分配到教育项目中, 而在非洲, 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80%。直至 1966 年, 虽然伴随和平队其他项目的增多, 从事教学工作的志愿者比例有所下降, 但也维持在 50% 以上。不过拉丁美洲却不同于其他地区, 最初只有 22% 的志愿者被分配到教育项目,^[8]而在秘鲁这一占比则更低, 对和平队在该国的教育活动研究也更具特殊性, 笔者旨在通过和平队在秘鲁大学与中学的教学活动分析其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担当。

(一) 和平队在秘鲁大学教育中的角色

20 世纪 60 年代, 大多数教育志愿者被分配到中学。前和平队工作人员凯文·洛瑟 (Kevin Lowther) 和 C·佩恩·卢卡斯 (C. Payne Lucas) 也曾提出, 应把重点放在中学而不是小学, 因为志愿者在那里的教育影响可能更大。^[9]但是拉美地区志愿人员的分布情况与世界其他地区并不相同, 尤其是在秘鲁, 和平队志愿者在从事教学工作的最初四年, 大多被分配至大学教学项目中。施莱弗在向国会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 提到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教育一个可能只会说印第安方言的孩子时, 涉及到更严格的语言要求。^{[10](P134)}此后不久, 曼凯维奇解释说: “秘鲁‘嫉妒’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制度, 不想承认自身在这些级别需要帮助。这就是秘鲁和平队把重点放在大学的原因。”^{[11](P134)}但二人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实际上, 和平队之所以重视在大学的大学项目, 根源并不在于语言技能的不足与拉丁人的妒忌, 而是受以施莱弗为主的和平队领导者希望宣传冷战观念的影响。根据和平队工作人员的说法, 施莱弗曾被一个想法所吸引, 即通过和平队的大学项目, 使拉美大学生成为抵制卡斯特罗革命号召力的一个重要群体。并且在 1962 年 5 月, 他曾在和平队高级工作人员与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乔治·C·麦吉 (George C. McGhee) 参与的一次会议上指出: “和平队的大学项目很好地服务于国会利益。”^[12]此外, 在 1963 年初, 时任和平队拉丁美洲地区主任杰克·沃恩 (Jack Warn) 与进步联盟协调员特奥多罗·莫斯科索 (Teodoro Moscoso) 的谈话也体现出其希望对秘鲁大学生灌输亲美思维的意图。沃恩表示, 大学教育项目与莫斯科索希望和平方队计划更加重视拉丁美洲青年思想的愿望相一致。^[13]并且当施莱弗和莫斯科索在国会露面时, 也经常提到大学教学项目对反共产主义斗争的重要性。莫斯科索更是毫不避讳地指出: “秘鲁的大学是‘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14](P135)}施莱弗则以“共产主义的温床”和“马克思主义的粪坑”此类更具色彩性的形容附和了莫斯科索。但后来他又否定了这种言论, 称和平队的教学项目并无反共亲美的意图, 而是致力于改善秘鲁落后地区的教育情况, 并表示志愿者们甚至驻扎在 1958 年曾发生过学生向副总统尼克松投掷石块事件的大学里。

但是这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宣传却很难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找到例证。据统计, 在 1963 年底, 拉美地区共有 156 名志愿老师, 其中有 44 人被分配至秘鲁, 但是施莱弗指出这其中很少有人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语言与学术资格。^[15]赫伯特·韦格纳 (Herbert Wegner) 在对秘鲁和平队的教学活动进行评估后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但他与施莱弗在行动建议上产生了分歧。他指出必须要克服人力资源问题, 即便志愿者的海外服务时间不得不缩短, 也应延长培训计划, 培养出具备必要科目和语言能力的志愿者。同时他严肃表示: “除非我们有所行动, 否则现在的大学一代对政治权力的支配将意味着另一个古巴。”^{[16](P7)}但培训计划并没有按照韦纳格的建议进行修改。相反, 和平队向秘鲁大学输送的不合格志愿者越来越多。而在这一过程中, 大多数志愿者都不清楚其教学活动的目的, 致使和平队一度陷入被秘鲁当局驱逐的尴尬境地。实际从和平队到达秘鲁之日起, 就曾发生过多起抗议和平队的示威和游行, 参与者多为秘鲁的大学生。1963 年 9 月, 更是发生了和平队志愿者被驱逐出大学校园的事件。当时, 利马大学 (University of Lima) 负责新生的老师邀请和平队志愿者为新入学的大学生做三场与美拉关系相关的主题演讲。这极大引起了当地大学生的不满, 他们认为志愿者在利用秘鲁的大学教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辩护, 并向校方提出了抗议。几天后, 一部分秘鲁大学教师也向校方递交抗议声明, 认为和平队将“政治宣传”带入了秘鲁大学的教室里。在大部分师生的巨大压力下, 利马大学委员会最终于 11 月初宣布, 将所有在该校任教的和平队志愿者逐出校园。

尽管如此, 也有一些志愿者受到了秘鲁大学生的欢迎。应秘鲁瓦曼加大学 (University of Huamanga) 罗梅罗 (Romero) 校长的要求, 三名曾在康奈尔接受培训的志愿者被分配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 为 80 多名学生教授初级和高级英语。和平队精心挑选了志愿者加入到这一教学活动中, 他们都精通西班牙语, 其中一人还拥有拉丁美洲的研究生学位^[17]。曼凯维奇也对这一教学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 并通过美国的慈善基金会, 为瓦曼加大学争取到 5000 美元的捐款。这些志愿者在瓦曼加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而后新上任的瓦曼加大学校长埃弗拉因·莫罗特·贝斯特 (Efrain Morote Best) 也对这些志愿者表示了个人的喜爱。此外, 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的化学工程博士, 其教学活动也凸显了和平队志愿者在当地的價值。这位化学博士最初抵达秘鲁时, 被和平队的工作人员告知秘鲁没有化学工程学院, 并指派他前往普诺大学 (University of Puno) 教授一些他知之甚少的东西。后来, 由于自身的积极主动, 这位化学博士在特鲁希略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rujillo) 的化学工程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 并赢得了所在大学的好感。他的这种成功, 正是由于他满足了秘鲁教育真正的需求, 而这正是大部分和平队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尚未学会的东西。^{[18](P40-43)}

但是, 由于和平队在这四年间的大学教育中遗留了很多问题, 秘鲁和平队的最终报告宣称, 和平队真正的教育项目直到 1965 年才开始, 因此, 从 1961 年到 1965 年间, 几十名志愿者在秘鲁的大学里进行的有争议的服务, 在历史上就变得默默无闻, 但作为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服务的开端, 这一阶段和平队在秘鲁的

角色扮演仍具有重要意义，为美国和平队服务计划的改进提供了参考。

（二）和平队在秘鲁中学教育中的角色

自 1965-1966 年开始，和平队在秘鲁教学计划的重点发生了从大学向中学的转移，这其中包括师范学校或教师培训学校。虽然当时的大学教学计划并未停止，但伴随教学活动存在的问题与争议变得愈发尖锐，和平队在师范学校继续其教育计划的机会变得更具吸引力。实际在秘鲁，无论和平队的志愿者在哪里授课，其高级工作人员和项目策划者都一贯以冷战理论为他们的活动辩护。例如，1963 年，美国进步联盟主任特奥多罗·莫斯科索敦促和平队高级工作人员扩大在秘鲁等拉美国家的志愿教学项目。他警告说：“现在共产党开始在学校里出现了，中学不应该被忽视，那里的青年问题甚至比大学里还要严重。”^{[19](P133)}这种政治关切难免对志愿人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延伸到初等教育中。曾有一名和平队志愿者便固执地要求教育部接管位于圣马丁·波拉斯利马区 (Lima barrio San Martin de Porras) 的一所私立幼儿园，以便“把它从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共产党校长和左翼主席的掌控中解救出来”。

伴随局势的变化以及反共氛围的烘托，自 1964 年起，秘鲁就有部分志愿者在师范学校工作，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为大学教学项目的流放者。1965 年，评估人员科布 (Cobb) 和克鲁格 (Brugger) 首次提出在师范学校开展和平队项目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拟议的新方案有许多吸引之处。师范学校虽同大学一样，提供了一个“影响未来一代的战略支点”。但其在管理权上不与学生共享，而且本身也不拥有政府赋予大学的自治权。因此他们希望，在政治波动性较小的师范学校里，不太可能发生学生投票将和平队驱逐出秘鲁国家工程大学这样的尴尬事件。^{[20](P43,47)}此外，他们认为，该项目将适合接受过一些西班牙语和教师教育培训的年轻文科毕业生。这一项目的策划者也对以上想法持赞同态度。大约一年后，便有 24 名志愿者在秘鲁第一个正式的师范学校项目中接受了培训，在到达利马后，他们中间有 7 人被分配到秘鲁的中学进行教学，加上已经在中学工作的 7 名志愿者，最终秘鲁和平队的志愿者被分配在 17 所不同的学校开展教学工作。^{[21](P162)}1968 年，和平队秘鲁主任尤金·贝尔德 (Eugene Baird) 向国会声称，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果鼓励了和平队继续开展中学教学项目，并且秘鲁政府最高层已经认识到教师培训的必要性。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国际石油公司 (IPC) 争端，美国的公共资金来源有限，但仍资助秘鲁建造了数千间新教室和几所完整的学校。因为贝尔德认为，和平队志愿者可以为新兴的师范学校提供所需的人力，并对秘鲁同事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有迹象表明，一些旧有问题在和平队的这一新项目中再次出现。如人员规划不周、和平队志愿者与秘鲁同事之间关系冷淡等。评估人菲利普斯 (Phillips) 是第一个对该项目进行考察的人，尽管他对教育项目的整体方向转变表示赞同，但还是对中学教学项目感到不安。例如，菲利普斯写道，志愿者与秘鲁工作人员之间的不良关系困扰着该项目的发展。一些志愿者对自己“缺乏影响力”感到沮丧。其中一名志愿者曾向菲利普斯抱怨说，“一个秘鲁人就毁了整件事。”^{[22](P147,157)}而这些工作上的问题与人际关系的失败，也导致许多和平队志愿者纷纷退出该项目。据统计，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一所含有 32 名志愿者的师范学校减员率高达 43.8%。^{[23](P163)}评估人员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和平队的工作人员将目标致力于促进志愿人员与秘鲁教师之间的密切合作，从而传输美国的价值观；二是这一项目并不符合秘鲁教育部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秘鲁当局势必会阻碍和平队中学项目的发展。

因此，在志愿者与秘鲁民众的文化冲突以及以及秘鲁政府的阻碍下，和平队的中学教学项目也逐渐走向衰落。至 1968 年 10 月 3 日，秘鲁军队在胡安·贝拉科·阿尔瓦拉多 (Juan Bellarco Alvarado) 将军领导的一场不流血政变中，迫使贝朗德总统流亡，而后他们建立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政权，新政权认为美国对秘鲁教育的参与，刺痛了本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此，和平队能够安排的志愿教师锐减，并且还要经过军政府的批准。最终和平队在秘鲁教育项目，被一种极强的民族主义怨恨情绪笼罩，于 1968 年结束了它的全盛时代。

从上述和平队在大学与中学进行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在秘鲁的教学活动，似乎更适合用政府人员的“隐性外交战线”来形容，因为它的目标不是改善当地教育环境，而是打击共产主义的蔓延，只不过这项任务交由未经训练的年轻人开展。而和平队的志愿者在这一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自主权，也并不清楚自己进行教育援助的目的，反倒被迫成为美国国会在秘鲁潜在的“政治代理人”。当秘鲁以反美为主的民族主义爆发时，他们甚至会被冠以“间谍”等罪名，成为两国之间关系的牺牲品。但是当志愿者们所提供的教育援助真正符合秘鲁当局的需要时，这种政治角色又会被弱化，转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当地的教育资源，这其中也不乏有志愿者主动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虽然在当时少之又少，但为和平队真正志愿意义上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牺牲与发展共存：秘鲁和平队的角色评析

若仅从和平队从事的工作来看,该机构足以称得上是国际间最大的义工组织,并给受援国的基层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和平队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角色具有很强的传递性,它作为一个中间机构,是美国势力渗透与秘鲁“反美情绪”间接表达的有效工具。

其一,不管美国政治家承认与否,和平队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它不会像美国国务院那样公开为美国对外政策进行辩护,不会同国际开发署般利用手中的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也不会像美国之音等传媒那样公开宣传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念,更不会像美国军队那样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随时出手。但它的终极目标依旧是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国家利益。它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支隐性力量,通过公开的、从表面看似是“利他性”的活动中,加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这就是后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称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软实力”^①(Soft Power)。因此,秘鲁对和平队本身就有着天然的怀疑态度,而和平队工作人员也非常明显地体现着该组织反对共产主义,重塑美国形象,拉拢秘鲁的意图,即便志愿者本身没有这种意识,但久而久之也受到了一些潜在影响,难免起到意识形态渗透、隐性干预秘鲁内政的作用。

其二,对于秘鲁而言,和平队也是其与美国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工具。当它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时,会通过邀请和平队向美国示好,力图开展合作,依托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获取更多利益。而当秘鲁需要向美国表达某种不满情绪,同时又保证两国外交关系的根基不被动摇时,作为美国政府中地位相对不太重要的和平队,往往会成为其发泄不满的对象。基于此,秘鲁既可以通过驱逐和平队的方式来警告美国,又不至于因此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再者,这一时期派遣至秘鲁的和平队志愿者似乎并未做好在当地偏远农村或者拥挤城镇进行教育工作的准备,也为秘鲁打击和平队提供了契机。一位评价者朱利安·菲利普斯(Julian Phillips)曾写道:“秘鲁对许多志愿者的打击就像德克萨斯州对东方礼仪的影响一样。”^{[24](P10-12)}他审慎地指出了和平队的许多志愿人员所面临的文化冲击。同时,这些志愿者对拉丁人也充满厌恶,他们很难适应当地的文化,并且对秘鲁文化的诋毁是一种公认的行为模式。许多志愿者都因这种文化冲突产生了身心不适,而后被遣返回国。曾有评估者将秘鲁称为“巡回志愿者之地”(The land of the peripatetic volunteer),而秘鲁人也经常把和平队称为“流浪团”(Cuerpo de Vagos),或者更慈善地称为“旅行团”(Cuerpo de Paseo)。^{[25](P8)}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逐渐浮现,和平队的许多教学项目都被视为以美国模式重建拉丁美洲教育系统的行为,参与教育工作的志愿者也被认为是直接罪人。

管见所及,和平队在秘鲁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悲情色彩,这一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志愿者组织更像是两国博弈与妥协的牺牲品,极具被动型与脆弱性,秘鲁认为其最大的错误是与美国国会保持了密切联系,而美国政府又否认其是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许多志愿者本身无意宣传美国的冷战思维,特别是越南战争期间,诸多志愿者都抗议美国发起战争。但在大国外交战略中,志愿者自身的声音太过渺小,加之和平队组织机构不够完善以及一些志愿者的极端思想遭到秘鲁的反感与怀疑,使得和平队在秘鲁的发展极为曲折。换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的秘鲁,和平队就像一个政治足球,在两国间的政治游戏中被踢来踢去。但作为美国冷战时代文化外交的产物,和平队又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并未随冷战的终结而解散,而是延续至今,在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开展国际志愿服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语

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时期,和平队开展的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隐性渗透美国意识形态的意图。但它作为美国援助政策的一环,也向秘鲁提供了中等水平的人力援助,秘鲁也借助和平队传达其发展需求,增进了美秘两国的相互了解。但由于其本质隶属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所以从开始就遭遇秘鲁民族主义的抵制。加之和平队对其项目的管理极其糟糕,志愿者与秘鲁民众之间缺乏真正的了解,导致双方的文化冲突无法调和,和平队在秘鲁的教育活动最终走向黯淡。透过这一时期和平队在秘鲁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美秘两国外交政策互动的分析,和平队这一中间角色的被动性、脆弱性也逐渐彰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波云诡谲外交关系中的牺牲品。

但就和平队的整体发展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赢得了受援国的欢迎,并让当地民众相对接受了部分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作为文化外交的附属品,和平队也让美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更为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并为美国涉外部门培养了大量的“外国通”,这对美国外交决策同样大有

^① 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政治来达到目的的能力,当其他国家想得到与本国同样想取得的结果时,本国就不必付出与高压政治同样大的代价来到其目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影响力。可参见 Joseph S. Nye. 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N]. New York Times, 2000-3-11; Joseph S. Nye.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J]. Foreign Affairs, 1999, 78(3):25.

裨益。它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却并未随冷战的终结而销声匿迹，而是一直持续至今，活动范围也扩展至许多前苏联及中东欧地区，不仅服务美国国家利益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角色，发展为真正具有一定志愿意义的、规模最为庞大的现代国际义工组织。

参考文献:

- [1] Sargent Shriver, "The Best Job in Washington," 1961, Box86, John F. Kennedy Library (hereafter cited as JFKL).
- [2] "On Colombia," November 18, 1961, Box2, Papers of the Peace Corps (hereafter cited as PC Papers), JFKL.
-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Volume 12, Part 1," United States, 1961.
- [4] [10][11][14][19][21][23] Glenn Francis Sheffield. Peru and the Peace Corps, 1962-1968[D].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91.
- [5] "Director's Staff Record" (hereafter cited as DSR), 19 July 1962, Box 1, PC Papers, JFKL.
- [6] "DSR," 20 July 1962, Box 2, PC Papers, JFKL.
- [7]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M].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8.
- [8] Hoopes, Roy.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M]. The Dial Press, INC., 1968.
- [9] Kevin Lowther and C. Payne Lucas. Keeping Kennedy's Promise: The Peace Corps, Unmet Hope of the New Frontier[M]. Taylor and Francis, 2019.
- [12] "On senior staff meeting with McGhee, Minutes of Meeting," 15 May 1962, Box 1, PC Papers, JFKL.
- [13] "Minutes of Small Staff Conference," 20 February 1963, Box 2, PC Papers, JFKL.
- [15] "Peace Corps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Minutes of Third General Meeting," 18 March 1963, PC Papers, JFKL.
- [16] Wegner, Herbert, "Peru Overseas Evaluation," 1963, Peace Corps Library (hereafter cited as PCL).
- [17] "Measurement of Peace Corps Program Impact in the Peruvian Andes: Progress Report 2," March 1 to May 31, 1963, Cornell University.
- [18][20] John Cobb and Robert Krug, "Peru Overseas Evaluation," 1965, PCL.
- [22] [24] Julien Phillips, "Peru Overseas Evaluation," 1967, PCL.
- [25] John Cobb and Robert Krug, "Overseas Evaluation, Peru," 1965.

Study on the Role of the U.S. Peace Corps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Per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plomacy (1961-1968)

An Zihan

China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Abstract: The Peace Corp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1960s. During the Kennedy and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the Peace Corps gradually entered its golden age of development. As a significant nation in Latin America, Peru boasts one of the largest contingents of the Peace Corps worldwide.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Cold War mentality and Peruv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Peace Corps Volunteers' journey of educational service in Peru has been very tortuous, and has even become a victim of the diplomatic gam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the Peace Corp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Peru under the Cold War context are an important microco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foreign policy and Peruvian state needs. They reveal a certain sacrificial element behind them, yet they transcend the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and break new ground in volunteer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Cultural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Peru; The Peace Corps; Role stud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12

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探索实践

冷强¹ 于晟伟^{1*} 何永明^{1*}

(¹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北京 102202)

摘要: 本文聚焦抢险救援指挥课程, 系统探讨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路径。通过分析课程与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 提出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以及考核评价体系等多个维度融入思政元素的具体策略, 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职业道德水平与社会责任感, 为培养高素质抢险救援指挥人才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抢险救援指挥; 课程思政; 人才培养

一、引言

随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抢险救援工作在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作为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专业的核心课程, 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承担着培养具备专业指挥能力与应急处置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在新时代背景下,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更是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高尚道德品质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抢险救援指挥人才的现实需要。通过课程思政建设, 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将个人职业追求与国家应急救援事业紧密结合, 为我国应急救援事业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近年来, 随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抢险救援工作在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然而, 当前抢险救灾财务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王星宇等学者指出, 需求测算不准确、军地协同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督体系薄弱是当前财务保障体系的主要短板^[1]。此外, 宋丙剑发现, 消防救援队伍在跨区域协作中常因信息共享壁垒和资金调配权限不清而导致效率低下^[3]。针对这些问题, 王志明等学者从课程体系角度提出, 需加强财务保障的“全灾种”适应性设计, 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救援场景^[4]。在教学模式创新方面, 肖川等学者提出了“PBL 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模式,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地震、洪涝等场景, 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应急决策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2]。辛晶等学者较早构建了以实战为导向的抢险救援指挥实践教学体系, 强调案例分析与角色扮演的结合^[11,12]。冷强等学者进一步提出, 课程体系需融入“全灾种”理念^[7], 增设化工泄漏、建筑坍塌等模块化训练, 与李斌关于抗洪抢险能力建设的建议相呼应^[6]。尽管这些模式在提升学员临场应变能力方面效果显著^[2,11], 但其实施仍面临硬件投入高、跨学科师资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陈宏伟建议通过校企合作优化实训资源^[9], 例如引入消防部队实战案例和智能仿真设备。贺嘉含和于志军等学者指出, 消防部队在装备、指挥体系和安全防护意识方面存在不足, 亟需改进^[8,10]。周庆等学者针对抗洪抢险提出, 前置备勤力量分散和物资调配效率低是主要短板^[5]。

抢险救援指挥作为应急管理领域的重要学科, 其教学目标不仅是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更在于塑造其思想政治素养、职业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课程思政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改革方向, 旨在通过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然而, 如何在专业课程中有效融入思政元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体系, 仍是当前教学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当前抢险救援指挥课程的教学改革需要在财务保障、跨区域协作、课程设计以及实战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性分析, 提出切实可行的课程思政与教学改革路径, 为培养高素质抢险救援指挥人才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通过对课程与思政教育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 本文提出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以及考核评价体系等多个维度融入思政元素的具体策略。研究旨在通

作者简介: 冷强 (1981—), 男, 四川乐山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于晟伟 (1995—), 男, 吉林长春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

何永明 (1978—), 男, 江西南昌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高素质抢险救援指挥人才提供参考。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推动课程思政在应急管理领域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

二、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一) 课程内容富含思政素材

《抢险救援指挥》课程围绕各类灾害事故的救援指挥展开,涵盖地震、火灾、洪水、化学泄漏等多种场景。在这些真实案例中,救援人员展现出的舍生忘死、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等精神,以及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科学决策的工作态度,都是宝贵的思政教学素材。此外,课程中的指挥原则、流程以及技术规范,也能与思政教育中的集体主义、科学精神、法治观念等有机结合。

(二) 目标导向高度契合

抢险救援工作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要求指挥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课程思政的目标正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其思想政治素养。二者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高度契合,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一) 适应行业发展新要求

当前,抢险救援工作面临形势日益复杂,各类灾害事故呈现出多样性、突发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不仅要求指挥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其拥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课程思政建设,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下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的新要求。

(二) 弥补学生思想认识短板

部分学生对抢险救援工作的重要性 and 严肃性认识不足,存在职业价值观偏差、团队协作意识淡薄等问题。单纯的专业知识传授难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而课程思政的融入,人民消防为人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始终贯彻课程始终。抢险救援案例情节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能够通过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道德观,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一) 明确课程思政目标

在修订《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教学大纲时,将思政教育目标与专业教学目标有机融合,构建知识、能力与思政三维目标体系。学生需掌握抢险救援指挥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和技术,熟悉各类灾害事故的特点和处置流程,了解国内外抢险救援工作的发展动态。培养学生的灾害现场指挥决策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沟通协调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抢险救援环境中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其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意识;强化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深刻认识抢险救援工作的重大意义;培育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和法治意识。

(二) 挖掘与整合课程思政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大量真实的抢险救援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案例背后的思政价值。例如,在讲解汶川、泸定、尼泊尔、积石山地震救援案例时,介绍救援人员面对余震不断的情况,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英勇事迹;在“三断”条件下,水陆空立体现代化救援理念,让学生深刻体会到生命至上的理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分析火灾救援案例中,因个别人员违规操作导致事故扩大的教训,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巧妙融入思政教育内容。在讲解抢险救援指挥的基本原则时,将集体主义原则与指挥决策过程相结合,强调在救援工作中要以大局为重,服从统一指挥;在介绍救援方案制定方法时,融入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引导学生树立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工作态度。

(三) 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精心选取具有代表性、启发性和时代性的抢险救援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在案例讨论过程中,设置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从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等多个角度进行思考。例如,针对某化

工厂爆炸事故救援案例,让学生讨论在救援过程中如何平衡救援效率与人员安全,以及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应如何做出正确决策,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价值判断能力。创设高度仿真的抢险救援模拟情景,让学生扮演救援指挥人员、救援队员、受灾群众等角色,模拟完成救援任务。在模拟过程中,设置各种突发情况和道德冲突,如资源分配不均、救援风险评估等问题,考验学生的应急处置能力和道德抉择能力。通过情景模拟,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抢险救援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增强其职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利用在线教学平台,推送与抢险救援相关的思政教育资源,如先进事迹报道、专家讲座视频、政策法规解读等,供学生自主学习。同时,通过线上讨论区、作业互评等功能,组织学生围绕思政话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线下课堂则结合线上学习内容,进行针对性的讲解、案例分析和实践演练,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机融合。

(四) 加强课程思政师资队伍建设

定期组织《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教师参加思想政治理论培训,邀请思政教育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帮助教师深入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升其政治理论水平。鼓励教师参加思政教学研讨会和教学竞赛,学习先进的思政教学理念和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政教学能力。将思政教学能力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体系,从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融入、教学方法运用、教学效果评价等多个方面对教师的思政教学工作进行考核。对在课程思政教学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励教师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五) 完善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

构建多元化的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将思政教育纳入课程考核内容。除了传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考核外,增加对学生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的考核。例如,通过课堂讨论、小组作业、社会实践等环节,考察学生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撰写心得体会、案例分析报告等方式,了解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过程性评价主要关注学生在课堂学习、小组讨论、实践演练等环节中的表现,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引导学生不断改进。终结性评价则通过期末考试、课程论文等方式,对学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提升进行综合考核。

(六) 基于 BOPPPS 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创新

通过展示震撼的灾害现场视频、讲述感人的救援故事等方式,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发他们对课程内容的兴趣。同时,提出与思政相关的问题,如“在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的行为体现了哪些价值观?”引导学生思考,自然地导入课程思政主题。明确告知学生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不仅包括专业知识与技能目标,还详细阐述思政目标。例如,“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将掌握抢险救援指挥的流程,同时深刻理解团队协作和责任担当在抢险救援工作中的重要性。”让学生清楚学习方向。通过课堂提问、小测验等方式,了解学生对之前所学知识和相关思政观念的掌握程度。例如,提问“在以往的抢险救援案例中,有哪些行为违反了职业道德?”根据学生的回答,调整教学策略,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采用小组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多种参与式教学方法,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在小组讨论环节,给出具有争议性的思政话题,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分配救援资源才符合道德原则?”组织学生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在情景模拟中,创设复杂的救援场景,让学生扮演救援指挥人员,在模拟决策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践行正确的价值观。通过课堂练习、案例分析报告等方式,检验学生对本节课知识和思政内容的掌握程度。例如,给出一个新的抢险救援案例,要求学生分析案例中救援指挥人员的决策是否合理,并从思政角度进行评价。根据后测结果,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在课程结束时,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回顾专业知识和思政要点。强调抢险救援工作中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将所学的思政理念运用到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

五、课程思政实践成效与反思

(一) 实践成效

通过课程思政的实施,学生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政治属性和社会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爱国主义情怀、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在日常学习和实践活动中,学生展现出更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素养,更加自觉地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应急救援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课程思政的融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学生在课堂上更加积极参与讨论和实践活动,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深入。同时,通过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培养高素质抢险救援指挥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反思与展望

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思政元素融入生硬、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课程思政内容的挖掘还不够全面,部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结合不够紧密;考核评价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对学生思政表现的评价标准还不够细化。未来,需进一步加强教师培训,通过专题培训、教学研讨、教学观摩等方式,帮助教师深入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和要求,提升其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持续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加强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细化的评价标准,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思政学习成果。此外,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将行业的最新需求和思政要求融入课程教学,不断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为国家应急救援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六、结论

将思政教育融入《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是适应新时代应急救援事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德才兼备、校队一体、教战融合的抢险救援指挥人才的重要举措。通过明确课程思政目标、挖掘与整合课程思政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等一系列探索与实践,能够实现思政教育与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在未来的教学中,需不断总结经验,持续改进和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为国家应急救援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王星宇,李娇阳. 优化抢险救灾行动财务保障机制的思考与探索[J]. 中国应急救援, 2025, 1: 29-32.
- [2] 肖川,宁占金,宋丙剑,吴继承,王健.“情景模拟”教学模式在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华东科技, 2023, 1: 146-148.
- [3] 宋丙剑. 我国消防救援队伍抢险救援行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A]. 2022 年度灭火与应急救援技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2022: 359-361.
- [4] 王志明,韩玉婷,李己华,侯亚欣.“全灾种”下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调整优化[J]. 消防界(电子版), 2021, 7(07): 73-75.
- [5] 周庆,方建钢,陈建. 消防救援队伍抗洪抢险力量前置备勤的思考[J]. 中国应急救援, 2021, 1: 37-41.
- [6] 李斌. 加强抗洪抢险救援能力建设的思考[J]. 消防科学与技术, 2020, 39(11): 1587-1588.
- [7] 冷强,汪雁,李瑞宝,胡中建,訾栓紧. 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建设课程体系研究[J]. 消防界(电子版), 2020, 6(20): 29+31.
- [8] 贺嘉含. 浅析消防部队抢险救援中的问题及措施[J]. 消防界(电子版), 2016, 12: 30.
- [9] 陈宏伟. 加强优势专业建设以内涵发展提高消防学校办学竞争力[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6, 3: 4-7.
- [10] 于志军. 抢险救援专业部队加快作战指挥系统建设探析[J]. 消防界(电子版), 2016, 2: 48-49.
- [11] 辛晶,刘立文,王振雄,于力. 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J]. 武警学院学报, 2015, 31(05): 57-61.
- [12] 辛晶,刘立文,陈华,李向欣,高成耀. 抢险救援指挥实践教学研究[J]. 武警学院学报, 2011, 27(10): 73-74.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Course

Leng Qiang¹, Yu Chengwei^{*}, He Yongming^{1*}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course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By analyzing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curriculum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pecific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curriculum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aim i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talents.

Keywords: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alent training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42

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

梁锋¹

(¹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 明斯克 白俄罗斯共和国明斯克)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 通过对书法和美术的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揭示了跨文化教育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研究发现, 书法与美术教育的有机融合不仅能够促进文化认同感的提升, 还能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CC)。在比较国内外书法与美术教育的实施现状时,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体系展现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研究提出了多种融合模式, 并通过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分析, 为教育实践提供了借鉴, 包括文化交流项目的成功经验和过渡融合的失败教训, 深入探讨了文化认同和教师跨文化素养对教育融合的深远影响。针对当前教育政策, 研究建议制定更为细致的支持政策, 以引导融合教育的健康发展。未来, 课程设置必须强调跨文化整合, 拓展跨学科教学, 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创新教学方法, 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互动。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跨文化融合不仅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超越, 更是推动教育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跨文化教育; 书法; 美术教育; 文化认同; 艺术融合; 教育策略

一、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一) 书法与美术的文化背景

在探索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重要性时,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书法与美术各自所承载的文化背景及其内在的哲学思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中国书法 (Calligraphy) 不仅仅是一种书写技巧, 更是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 如道家哲学 (Daoism) 所强调的“无为而治”, 在书法创作过程中体现了书写者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美术 (Fine Arts) 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则更加强调个体表现与情感传达, 往往基于对于人类理性和科学探索的推崇, 艺术家们通过油画技法展现了人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种美学理念与书法的内敛与精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文化分析框架 (Cultural Analysis Framework) 下, 书法与美术不仅是艺术表现的方式, 更是反映社会文化、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重要媒介。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 其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不仅是艺术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同时也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现出其普遍价值。例如, 近年来许多西方国家的艺术教育课程中开始纳入书法的学习, 通过对汉字的书写与理解, 使学生在过程中体会到中文的深邃与美感。

(二) 跨文化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 跨文化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理念, 已经渗透到了书法与美术教育的各个层面。然而, 尽管跨文化教育的潜力巨大, 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跨文化教育的现状可以通过 SWOT 分析框架进行具体探讨,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当前的书法与美术教育中, 优势 (Strengths) 体现在多元文化意识的推广和对全球艺术形式的包容性理解。书法这一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形式, 在与其他文化艺术相结合的过程中, 能够促使学生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与此同时, 美术教育注重创意和表现力的培养, 能够为学生提供多样的表达方式。然而, 劣势 (Weaknesses) 同样显而易见, 尤其是在文化认同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教师在教授书法与美术时, 往往面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的难度^[1]。例如, 在西方国家, 学生对书法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形式, 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文化精髓, 这样可能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二、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现状

(一)国内外书法与美术教育的比较

在探讨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现状时,我们不可忽视国内外在书法与美术教育之间的显著差异^[2]。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教育目标与课程设置上,也涵盖了教学策略、评价体系和学生参与度等方面。通过比较分析法,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各国在各自教育体系中对书法与美术的重视程度及其教育效果。

从教育目标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书法教育往往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美学的培养,旨在通过临摹与创作过程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而非单纯的技艺训练。这种模式具备文化深度,体现了对教育内容的重视。与此相较,西方国家的美术教育,尤其是在瓦尔特·巴特和赫伯特·里德等理论家的影响下,呈现出更为综合与个人化的特点,强调通过艺术表现自我和探索社会问题。西方的美术教育往往采取项目导向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强化学生的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二)书法与美术教育的实施现状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教育环境中,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现状尤为重要^[3]。书法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在形式美和文化内涵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而美术教育则更倾向于培养学生的视觉表达和创意思维。两者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还能够激发他们对文化的认同感。然而,在实际的课堂教育中,二者的实施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在设计课程时往往缺乏有效的教学整合策略。这一现状部分源于教育者对书法与美术教学内容的消化不足,导致在课堂上难以找到适宜的结合点。例如,中学美术课程可能仅仅侧重于西方艺术史的讲授,而忽视了书法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重要性。此类课程设计的片面性,既限制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又未能有效发挥书法与美术在艺术创作中的互动关系。

教师的专业素养成为制约书法与美术教育有效融合的另一重要因素^[4]。虽然部分教师具备扎实的美术技能,但对书法的认知与实践技巧却较为薄弱,从而影响到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根据《教育研究》期刊中的一项研究表明,教师在融合教学中的自我效能感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职业发展的持续性培训与跨学科的交流显得尤为迫切。

三、跨文化视野中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模式

(一)融合模式的理论基础

在探讨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模式时,理论基础显然是构建这一融合重要性的前提^[5]。应当着重分析"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多元智能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以及"文化响应理论(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这三者为跨文化教育的融合模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建构主义强调知识的主动构建,倡导学习者通过自身的经验进行学习,即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学习的促进者。这一理论在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两者都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个人表达^[6]。例如,在实施融合课程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定期的创作实践,将中国书法艺术与西方绘画技巧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学生既能提升动手能力,也能加深对两种文化艺术的理解。

多元智能理论主张个体在多种智能领域如语言、空间和身体运动等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潜力。在书法与美术的融合教学中,此理论提示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设计差异化的教学活动。比如,通过让学生参与书法与绘画的跨界项目,促进逻辑思维与创造力的联动,教师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从而实现更为深刻的文化理解与艺术表达。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教育中的应用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教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在书法与美术教育领域,如何有效地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亟待探索的主题。在这一过程中,能力评估框架的引入,可以为系统化地测量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语言交流的提升,更涵盖了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与尊重。在书法与美术教育中,可以通过引入各国的书法艺术及美术风格,鼓励学生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深化他们对异文化特征的认知。例如,通过探讨中国书法与日本书法的美学差异,学生能够理解不同文化背后的历史脉络与哲学思想,这种比较不仅促进了艺术技能的发展,也增强了学生的文化敏感性。

教育课程的设计亦需要充分考虑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可通过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来构建更为真实的交际场景。例如,组织跨文化艺术交流项目,让学生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共同合作创作书法与美术作品^[7]。这种互动不仅助力学生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更是在真实的文化交流中提升了他们的社交技巧与协作能力。

在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的教育课程设计需要充分考虑交际理论的指导,以实现文化的交融与理解^[8]。交际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强调信息的传递与接收过程,强调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沟通机制,从而为课程设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课程设计应围绕以下几个核心要素进行构建。

课程结构的设计需兼顾文化的多样性与共性。在课程设置上,书法与美术教育可以通过模块化的方式开展,将跨文化元素融入每个模块中。例如,在书法教学模块中,既可教授汉字的书写技艺,也可引入拉丁字母的书写艺术,构建中西书写的对比分析,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与共同点。这种

课程结构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书写技巧，更能增进他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反映文化交流的双向性。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美术作品与书法作品，能够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文化探索^[9]。例如，在美术课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分析中国山水画与西方印象派的异同，探讨两种文化在美学上的差异与融合^[10]。教师亦可利用数字化技术 (Digital Technology) 创作新的跨文化艺术作品，借助多媒体平台，促进学生对艺术创作的全新体验与理解。

在跨文化视野下，案例分析法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工具，对于揭示书法与美术教育融合过程中的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11]。通过具体的跨文化交际案例，教育工作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在艺术教育中的独特价值与表现形式，从而促进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以一所国际学校的书法课程为例，该校通过引入不同国家的书法艺术形式，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华书法的过程中，接触到如日本的假名书法与阿拉伯的书法艺术。课堂上，教师首先通过理论框架（如“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引导学生理解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书法作为一种非语言交际的艺术形式，在传递情感与文化内涵上的重要性。接着，教师展示了各国书法的精华，邀请学生进行比较与讨论，以充分挖掘不同文化的共通点与差异性。

在互动环节，学生分组进行文化展示，利用所学的书法技巧创作结合各国书法风格的作品。例如，有学生在其作品中融合了汉字与日本假名的元素，展现出不同文化碰撞所迸发的艺术魅力。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学生不仅提高了自己的书法技艺，更在反思中增进了对自身文化认同的理解。

四、融合与发展的实际案例分析

(一)成功与失败案例分析

在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某文化交流项目的成功案例值得深入探讨，以此分析其在书法 (Calligraphy) 与美术教育 (Art Education) 融合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及其对文化理解与交流的促进作用。该项目特别强调了双向文化互动的必要性，通过设置各类主题工作坊，鼓励参与者之间的积极互动，从而实现知识与技能的双向传递。

该项目有效整合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美术创作的诸多元素，采用了跨学科教学法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进行综合性教学设计。例如，在校际联盟工作坊中，参与者不仅学习了中国书法的基本技法和美学理念，还结合现代美术创作中的表现手法，激发了他们对书法与美术交融的深刻思考。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技能的传授上，更体现在对文化内涵的共同探讨，促进了中西美学的碰撞与交融。

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数据分析方法 (Mixed-methods Analysis)，项目评估了参与者在技能提高、文化理解及交流能力等方面的成效。参与者在项目前后的问卷调查中显示，书法与美术的融合课程不仅提升了他们的艺术技能，还增进了对于两种文化的理解。数据分析显示，参与者的满意度达到了 92%，并且大多数参与者表示愿意在未来继续参与类似的文化交流项目。

在探索书法与美术融合的教育项目中，过渡融合的案例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其失败因素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中国某高校的“书法与当代艺术实验”课程为例，该项目旨在通过将传统书法与现代艺术形式相结合，鼓励学生创造富有个性化的艺术作品。然而，该项目的实践却因多重因素导致了失败。

该项目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存在明显的失衡。尽管课程初衷是融合书法与美术，但实际实施中，传统书法的元素过于稀薄，学生对于书法基本功及其文化内涵的理解不足。根据教育评估数据，参与学生在书法技能的实际掌握程度仅为预期的 40%，而美术表现的提升并未如预想的显著，因此学生创作的作品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个性的表现。这样的结果不仅损害了课程的学习效果，同时也造成了学习者对传统书法的疏离，此回路的形成使得项目目标偏离。

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亦是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项目中负责授课的教师多为美术行业背景，其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却显得相对浅薄。实证显示，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倾向于强调现代艺术表现形式，而毫不提及书法的历史与技法，使得课程内容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有效建立起书法文化与美术创作之间的联系，导致其艺术表达单一且缺乏广度。

在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为教育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研究，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对比分析能够揭示出关键因素，以指导未来的教育策略实施^[12]。成功案例往往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灵活的教学策略，如某些教育机构有效利用“跨文化教育 (CCE)”理论，实现了书法与美术的有机结合。这些机构通过策划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项目，促进了书法艺术不仅作为技艺的传承，更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扮演了知识传递者的角色，更逐渐转型为文化桥梁的建设者。例如，在一个由中西艺术教育专家合作开发的课程中，通过共同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师生们能够对书法作品进行“跨文化诠释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从而增强了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然而，失败案例的剖析同样不可忽视。某些实验性的项目由于忽略了“文化认同 (cultural identity)”的重要性，导致了学生对课程的排斥。例如，在某次书法与现代艺术授课中，教师未能充分调研学生的文化背景与兴趣点，采用了一种单一的教学模式，使得课程未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影响了学习效果和兴趣。这一失败案例强调了文化敏感性的必要性，即在课堂实施过程中，应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学生对书法与美术的不同接受度，从而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

(二)案例对教育实践的启示

在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借鉴成功经验以指导实际教育实践尤为重要^[13]。通过分析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我们可以提炼出一系列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为书法与美术教育的未来实践提供重要的启示。

教育体系在书法与美术教育的结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日本的书道(Shodō)与绘画教育为例,该国的教学方法强调书法的创造力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学生不仅学习基本笔画和结构,还鼓励他们在书法创作中融入个人的情感与文化背景。通过定期的书法比赛和艺术展览,学生在相互交流中提升了对书法和美术的理解,从而实现了两者的有效融合。这一经验显示了跨文化教育中情感与审美的共鸣,并且为其他地区的教育实践提供了示范。

中国某些高校的“书法与设计”课程,旨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视觉传达相结合^[14]。课程中通过项目导向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学生们需要根据特定的设计主题创作书法作品,探讨字体在不同视觉语境中的表达。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还提升了他们对书法美学的理解,使学生能够在中西文化背景下有效运用书法元素进行设计创新。

在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过程中,实践案例的分析尤为关键^[15]。本节主要探讨在实际教育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常见的误区,以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识别问题是教育参与者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许多教育项目在实施初期往往未能准确评估参与者的文化背景及其对书法和美术的认知差异。这导致了教育内容的设计无法贴合学生的需求,从而影响学习效果。举例而言,广东地区书法教育项目在引入西方美术理念时,没有充分考虑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兴趣和参与感。因而,在项目设计阶段,应采用“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的方法,从根本上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学习动机。

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人员培训亦是关键环节。许多项目因缺乏系统的教师培训而未能有效传播跨文化艺术理念。例如,在一项结合书法与美术的国际交流项目中,教师对不同文化背景中艺术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足,致使教学内容的传递存在歧义,从而造成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佳。为避免这样的误区,建议采用“全面培训(Comprehensive Training)”的模型,设置多元化的培训课程,不仅包括教学方法的培训,还应涵盖文化敏感性的提升。

五、影响因素及其对策

(一)文化认同和教师跨文化素养对融合教育的影响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在教育领域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尤其是在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中^[16]。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不仅反映了个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和理解,也影响着其学习动机和学习方式。研究显示,个体的文化认同感能够显著提升其对学习内容的内在兴趣和积极参与度(Wang, 2018)。例如,在书法教育课堂上,当学生能够意识到书法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时,学生的学习动机相应提高,从而促进对课程内容的深入理解。

教师的跨文化素养(Cross-Cultural Competence)对学生文化认同的塑造具有重大影响。具备跨文化素养的教师,能够有效地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传播,实现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这样的教师不仅能够调动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兴趣,还能够帮助学生在书法与美术的学习中,相互借鉴和欣赏不同文化的艺术表达方式。例如,在一个融合了书法和西方美术的课程中,教师通过比较两者在表现情感和意象上的异同,能够加深学生对作品的审美理解及文化内涵的认知,这种方法在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中得到了充分论证(Bandura, 1977)。

在探讨文化认同和教师跨文化素养对书法与美术教育融合的重要性时,必须认识到,教师的经验和知识构成了教育有效性的基石。教师的跨文化素养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理解能力,更是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时,能够有效整合和运用文化知识的能力。具体而言,教师的跨文化素养对于促进学生的跨文化理解、提升文化包容性以及实现教育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提升教师的跨文化素养显得尤为迫切。

教师跨文化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系统的专业发展培训来实现。以“教师专业发展框架(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ramework)”为蓝本,设计出多层次、多维度的跨文化培训课程至关重要。这些课程应覆盖文化理论、教育哲学、跨文化交流技巧等方面,帮助教师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其在教学中的影响。举例而言,某些教育机构已实施了针对教师的跨文化工作坊,通过互动式学习和实践演练,使教师在真实的跨文化情境中锻炼自己的应对能力。

(二)教育政策的作用及其建议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体而言,教育政策的支持能够为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提供必要的框架与资源补给。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的具体落实情况与教育环境的实际需求往往存在一定的脱节,这使得现行政策在推动融合教育的进程中表现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征。

从积极的方面而言,国家层面出台的多项教育政策如《美术教育改革与发展实施方案》及相关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旨在通过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理念来加强学生的艺术素养与文化认同。这些政策为书法与美术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促进了两者在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及评价标准上的相互渗透。例如,在某些地区的实验性学校中,书法课程纳入美术教育的教学大纲,通过学科间互动,推动了学生在艺术创作时的创新思维与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探讨跨文化视野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时,教育政策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17]。通过基于“政策推荐模型 (Policy Recommendation Model)”的分析框架,本文旨在提出具体的政策改进建议,以便更有效地促进书法与美术教育的有机整合,同时增强教育体制对这一融合过程的支持力度。

在政策层面,应当加强对跨文化艺术教育的认知与重视。现行的教育政策往往较为关注传统的学科分界,对于书法与美术的教育融合缺乏明确的政策支持。鉴于此,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和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明确跨文化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并为该领域提供具体的指导原则。例如,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跨文化书法与美术教育项目的实施,促使学校在课程设计和师资培训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探索。

政策制定应鼓励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促进国内外院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可以更好地整合书法与美术教育资源。例如,建立国际艺术教育交流平台,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教育从业者共享教学经验与资源,从而激发师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应当引导高校与艺术机构共同开发跨文化交流课程,使学生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学习对书法与美术的综合理解和应用。

六、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跨文化视野下课程设置的创新

在跨文化教育的背景下,课程内容的跨文化整合成为推动书法与美术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策略^[18]。特别是通过“课程整合模型”(Curriculum Integration Model),我们可以系统性地探讨不同文化动态交融所带来的新机遇。课程整合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过程,而是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深度融合。例如,结合“书法教育”(Calligraphy Education)与“西方美术”(Western Art)中的技术与理念,可以创新性地开发出兼具东方韵律与西方形式美的艺术课程。

跨文化整合不仅丰富了课程内容的多样性,还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如在某些高校的书法与美术课程中,教师可能会引入“比较艺术”(Comparative Art)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文化艺术作品的比较与分析,使学生对各文化背后的历史、理念及社会背景有更深刻的理解。实例显示,海南师范大学的“中西艺术对话”系列课程设计,通过引入中国书法与印象派绘画的对比,让学生探讨文字与图像在文化表达中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从而开阔其艺术视野。

跨学科课程开发在当前教育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跨文化视野的背景下,书法与美术的融合不仅促进了这两门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也为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提供了新的契机^[19]。跨学科课程的建立能够有效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实现知识的迁移与创新。以书法与美术教育为例,将它们与语言学、心理学及历史学等学科相结合,能够使学生在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文化背景、艺术表现及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在实际课程开发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将书法作为语言表达的载体,引导学生在美术创作中运用书法元素,借此强化学生在文化表达上的敏感性与创造性。例如,学生可以在一堂课中学习如何将汉字的书写形式与现代美术作品结合,激发他们对传统与现代艺术的深层理解。在这种方式上,课程不仅限于技能的教授,更加注重思维方式与文化认同的培养。

跨学科课程的开发还有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当书法的技术要求与美术的视觉表现结合时,学生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反思他们的作品如何传达不同的文化信息。例如,在讨论日本书道与中国书法的不同,学生不仅探索了技术上的差异,更深刻理解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进而提升他们的跨文化理解能力。

(二)教学方法的创新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现代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对书法与美术教育的教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数字媒体、在线平台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者越来越能够探索创新的教学方式,从而提升学生的互动性和学习效果^[20]。数字媒介的应用促使传统书法与美术教育的形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多媒体教材为例,通过文本、图像与音频的结合,教师可以创造出更加生动与立体的学习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可作为主动参与者,通过参与虚拟课堂、高阶展示及互动式学习平台,增强学习的沉浸感和趣味性。

在线教育平台的出现,使得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资源信息得以快速传播,打破了地域与时间的限制。以“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典型代表,此类平台允许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共同交流与学习,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力(Cross-Cultural Competence)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设计,教师能够运用数据分析工具(Data Analysis Tools)评估学生的学习进度及效果,进而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策略。例如,利用“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技术,教师可以获取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偏好,从而为其量身定制更具针对性的学习内容。

在当前跨文化教育的背景下,互动式教学作为一种革新的教学方法,日益显现出其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显著影响。研究显示,互动式教学模型(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l)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在书法与美术教

育中的参与度,从而促进其艺术素养的综合发展。具体而言,该模型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倡导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这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截然不同。

互动式教学通过创造生动的教学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以书法教育为例,教师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例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创建沉浸式的书法练习环境。研究表明,这样的现代技术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专注力,还能使学习内容变得更加形象生动,进而增强学生的参与感。这种情境化的学习方式,能够让学生在理解书法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同时,加深其对书法技巧的掌握。

七、结论与展望

在分析书法与美术教育融合的多重维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跨文化教育不仅是当今时代背景下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也是推动教育创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化素养的人才的重要途径。通过结合书法和美术的教学方法,我们能够在各国教育体系中实现一种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艺术表达。书法与美术各自承载的文化背景和哲学思想,为教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而在教育实践中,利用建构主义、多元智能理论和文化响应理论等教育理论,教育者能够更有效地设计和实施课程,提升学生的艺术技能和文化理解。通过SWOT分析框架,我们认清了跨文化教育的优势与劣势、机会与威胁,从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应对在实施过程中的挑战。同时,成功案例的分析为未来艺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例如,将传统书法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激励学生在创造性的艺术表达中寻找自我认同与文化归属。

在教师的跨文化素养方面,我们明确了教师如何通过理解、尊重和融汇不同文化,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参与感。教师的角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促进文化理解与艺术表达的桥梁。因此,通过不断培训和专业发展,教师能够提升自己的跨文化素养,以便更好地应对多样化的教学需求。反之,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增强,使他们在找到与自身文化背景的连接点,进而引导学习成效的提升。

然而,除了成功的实践经验,我们也不能忽视失败案例所带来的宝贵教训。在实际的教育项目中,缺乏有效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教师素养不足以及不科学的评价机制都会对教育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教育者需要在设计课程时深思熟虑,确保传统与现代艺术形式的适当平衡,及其文化适配性,从而做到灵活应对学生的需求与兴趣。

综合来看,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融合不仅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传承,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文化交流的有效方式。通过跨文化教育,学生不仅能提高艺术创作能力,也能在不同文化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促进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未来的教育工作者需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思路与方法,积极创造促进文化交流的多样平台,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的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感。最终,在这条融合与创新的道路上,书法与美术教育必定能够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贡献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周雪彦.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在高等美术教育中的融合发展[J].美与时代(中),2023,(01):78-80.
- [2]张宗建.美育视野下的高校民间美术教育的问题与传承路径[J].山东艺术,2022,(05):41-49.
- [3]沈甜,袁晶,赖继祥.传统纸艺与美术教育的融合创新发展[J].中国造纸,2023,42(10):171.
- [4]程颖.沧州美术教育与产业融合研究[J].山西青年,2021,(01):39-40.
- [5]董媛春.跨文化传播学视野下中国形象研究的探讨与趋势[J].传媒论坛,2021,4(07):16-17.
- [6]冉明,王馨怡.乡土文化与美术教育的融合[J].中国稻米,2022,28(01):121-122.
- [7]白天娇.浅谈书法与陶瓷的艺术融合[J].陶瓷科学与艺术,2022,56(07):72-73.
- [8]刘琴,陈畅.跨界融合视野下舞蹈创新发展的现实挑战与发展路径[J].参花(下),2023,(03):53-55.
- [9]丛文俊.书法史研究的课题选择与学术视野[J].美术观察,2021,(08):16-18.
- [10]宁泽坤.纸艺与美术教育的融合探析[J].中国造纸,2022,41(12):152.
- [11]王羽桐.跨文化交际视野下中法相似类修辞手段对比与翻译策略[J].青春岁月,2022,(18):33-35.
- [12]付丽春.高校美术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评《创新视野下高校美术教育的探索》[J].中国教育学刊,2022,(12):155.
- [13]谢智雯.论南方特色剪纸艺术与小学美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J].小学生(下旬刊),2022,(08):115-117.
- [14]赵作龙.“大书法观”视野下的篆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J].书法,2023,(01):180-182.
- [15]张玥.立德树人视野下中职美术教育与德育融合研究[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1,1(23):45-47.
- [16]朱曼.文旅融合视野下“唐诗之路”开发的现状与思考[J].中国文化馆,2021,(01):143-146.
- [17]韩玉壶.美育视野下中国画与书法的基础教学[J].艺术教育,2023,(11):199-202.
- [18]王雨.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书法课程隶书风格取法的拓展与探索[J].美术教育研究,2023,(20):75-77.
- [19]危家漩,黄耀辉,陈思宏.艺术与科技融合视野下艺术设计创新研究[J].上海包装,2023,(07):175-177.
- [20]黄睿姝.数字媒体时代下高校美术教育的创新与发展[J].美与时代(中),2022,(06):108-110.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and Fine Art Education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Liang Feng¹

1 Belarusian State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Minsk, Republic of Belarus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and art education from a cross - cultural perspective. Through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calligraphy and fine art, it reveal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cross - cultural education in today's globalized world.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art education can not only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but also strengthen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CC). When compa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art education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education systems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show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ased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study proposes various integration models. By analyzing successful and failed cases, it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includ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ultural exchange projects and the failed lessons of transitional integration. It also delves into the far - reaching impact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eachers' cross - cultural literacy on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current educational policies, the study suggests formulating more detailed support policies to gui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curriculum design must emphasize cross - cultural integration, expand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use modern technological means to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thereby promoting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cross -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art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s but also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promoting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Cross - cultural Education; Calligraphy; Art Edu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rt Integration; Educational Strategie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43

政治、历史与法律：对英美法理学“非历史性”的批判

胡泽民¹

(悉尼大学, 坎珀当 新南威尔士 澳大利亚 2050)

摘要：本文批判了莫顿·霍维茨关于英美法理学“非历史性”的论断，通过系统分析从边沁到哈特的分析法学理论，并对比自然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的观点，揭示了英美法理学的复杂本质。边沁的分析法学通过强调实证法，减少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但其法典化尝试的失败表明英美法系对历史传统的依赖。哈特的“软实证主义”则在坚持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同时，承认法律内容需包含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原则，体现了历史因素的影响。霍维茨的“非历史性”观点过于片面，英美法理学实际上兼具历史与非历史的双重特征。最后，“综合法理学”作为更全面的理论框架，能整合分析法学、自然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的优势，更准确地描述英美法理学的本质。

关键词：英美法理学；非历史性；分析法学；自然法；历史法学派

一、引言

莫顿·霍维茨 (Morton Horwitz) 在其 1997 年发表的《为何英美法理学是非历史的？》一文中提出了英美法理学具有“非历史性”的观点。他指出，英美分析法学成功抵御了经验主义、诠释学特别是历史主义等现代思潮对单一静态法律含义的挑战，从而体现了这种“非历史性”特征。霍维茨认为，即便在英美这样公认具有普通法或经验主义传统的国家，其法理学仍表现出对分析法学的执着追求，并刻意排除了历史语境的影响。此处的历史主义概念源于“认知相对主义”，强调法律概念的含义会随历史情境而变化。因此，否认英美法理学的历史性，本质上就是拒绝承认法律概念的多重含义。

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何在？分析法学与其他法学流派的关键差异或许能提供答案。虽然边沁、奥斯丁和哈特等分析法学家具体观点各有侧重，但他们都强调法律应与习俗、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相分离。这种区分的目的是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聚焦于政治权威制定的实证法，而忽略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个仅包含一套稳定、单一含义的体系，这与霍维茨提出的“非历史性”特征吻合。

然而，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不同法学家的观点仍有分歧。例如罗纳德·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主张法官应当依据道德和整体性原则来解释法律。他的理论实际上承认了在实证法之外还存在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而这些诸如道德等额外因素的内涵会随历史语境而变化。这种动态的历史情境及其引发的观念变迁，正是霍维茨所认定的“历史性”特征并力图否定的内容。

由此，霍维茨“非历史性”论断的深层含义就更加明晰了。他试图通过展示分析法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政治、经济的贡献，并质疑其他学派的合法性，来巩固分析法学在西方法理学中的主导地位。

但是，霍维茨的这种论证并不充分。一方面，分析法学与实证主义确实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因此英美法理学确实具有非历史性的一面。但若断言英美法理学的本质完全是非历史的、只关注实证法而忽略其他变量，则值得商榷。从更理性的角度看，同时承认英美法理学兼具非历史性与历史性的双重特征，才是更为可取的研究路径。本文将通过对比从边沁到哈特的分析法学理论与其他学派的优劣，来论证这一观点。

二、杰里米·边沁：揭开神秘主义的面纱

作为分析法学的先驱，杰里米·边沁将法律定义为“国家主权者构想或采纳的意志宣告符号之集合”。尽管这一定义未能完全涵盖分析法学的全部特征与内容，但它揭示了法律的渊源——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

作者简介：胡泽民(1993—)，男，法律博士 (Juris Doctor)，研究方向为国际法、比较法、法理学。

是实证法而非其他，这一观点为其后继者普遍认同。他对英国法律本质的阐述具有划时代意义，因其通过指出不同于当时盛行的习惯法与自然法的新路径，为现代法律的形成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采用边沁的方法一方面显著降低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促进了法律遵守以及政治、思想和社会改革。尽管存在不足之处，但该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有力彰显了英美法理学所蕴含的“非历史性”特征。

（一）消除自然法的不确定性

边沁最具深远影响的贡献之一，就是消除了当时主流法理理论因过度强调神秘主义与习惯而导致的法律混乱与不确定性。如前所述，边沁的实证主义理论仅关注主权者意志的表达，即实证法。在边沁之前，许多哲学家和法学家都曾沿着自然法的路径对“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不同解答。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将法律定义为“为共同体利益而颁布的合理法令或规定，且须出自共同体管理者之手”。尽管阿奎那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人定法或人类法律，但从其定义可以明显看出，他认为法律必须具备合理性并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体现了其核心观点：法律被赋予了道德属性。这一理论看似完善，直到被追问如何具体判定何为“合理”及“公共利益”时便显露出问题。尽管存在细微争议，但学界普遍认为阿奎那始终将上帝视为合理性终极而超自然的源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知上帝的存在及其意志？阿奎那的简要回答是：上帝的存在本身是不证自明的，这种认知天赋于人类。显然，并非所有人（尤其是无神论者）都认同这一解释。这也揭示了阿奎那时代自然法理论的主要缺陷——过度依赖一个模糊而神秘的至高存在。理解这一存在（即上帝）具有极大挑战性，因此普通人对法律的理解不得不依赖神职人员的阐释，因其被视为最通晓神意者。然而，这种做法使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准承受巨大压力：若阐释者品德高尚，其诠释的法律可能合乎道德与理性；反之，法律则易沦为道德败坏者的工具。倘若不依靠神职人员与教会进行解释，而是依据个人理解适用法律，法律的确定性将几乎荡然无存，因为人们对神的认知千差万别。伯特兰·罗素曾批评阿奎那的学说，指出其在开始哲学思考前就已将天主教信仰宣示的真理视为既定结论，这种为预设结果寻找论据的做法实属诡辩。此例充分说明，在边沁之前，由于过度依赖实证法之外的语境，法理学长期处于极度模糊的状态。

或许有人会质疑，阿奎那生活的时代距离边沁太过遥远，其理论不足以作为典型例证。那么，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学说或许更具说服力。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中将法律定义为“某种至高存在制定的行为准则”，并宣称人类即便作为“凡尘中最崇高的存在”，也必须始终服从造物主（即上帝）的法律与意志。这些论述清晰表明，布莱克斯通的自然法观在阿奎那去世数百年后仍保留着其思想印记。神意仍被奉为至高，但其具体内涵却模糊不清。这种理论难以提供明确的立法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布莱克斯通对英国普通法本质的阐释更进一步，他认为普通法是司法判决所确认的习惯集合体，其法律效力源于人们通过“自发的、远古的、持续的服从与沿袭”所体现的普遍认同。这种对习惯法的依赖同样导致确定性问题，因为布莱克斯通对历史语境的使用完全不加批判，对历史上自然法教义也全盘接受。其结果是，人们几乎无法准确理解这些习惯的具体内容。正如边沁所讽刺的，这种方法造就的法律体系“臃肿难解、不可认知”。这不仅损害了法律的明确性与清晰度，更无助于立法的发展。因此，即便是布莱克斯通的忠实追随者也不得不承认，他过度沉迷于盎格鲁-撒克逊或中世纪的历史语境，而对当时政治社会现实缺乏关注。

法律不确定性问题直到边沁提出分析法学才得以解决。如前所述，边沁将法律定义为“主权国家中主权者构想或采纳的意志符号集合”。具体而言，“符号”包括行为、状态或容忍；“构想”指法律内容由主权者自行创设（如君主制定确立新行为准则的立法）；“采纳”则指主权者对其他主体制定的规范赋予法律效力（如将普遍遵循的习惯传统立法化）。边沁理论中的“主权者”被定义为政治共同体成员自愿服从其意志的个体或群体（如君主、议会或国会）。这一定义已蕴含分析法学的雏形：特定政治社会中只存在一个通过立法形式制定行为准则的权威机构。采用这种方法，无论立法主体是谁、政体成员构成如何或法律具体内容为何，研究者得到的都是静态答案——共同体成员与法学家只需关注现行有效的实证法（lex lata）。这种观点显然不同于阿奎那与布莱克斯通基于历史的学说。与其纠结于复杂难解的神意与习惯，不如专注于实证法的具体实践。不过有人可能反驳：这种方法似乎会导致主权者权力扩张。这种质疑确有道理，因为立法权被垄断于立法机关。但边沁同时反对霍布斯基于简单命令与服从的单一主权论，主张主权分权与法律限权。这自然引出一个关键问题：限制性规范从何而来？边沁认为其源于“超验法”（transcendent laws），即宪法性规则。该观点值得深入探讨：一方面，边沁通过限权机制使其理论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由于宪法原则往往不成文，这给原本严密的体系带来了模糊性。表面看，这与自然法中神意或历史习惯的功能相似，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首先，宪法规则的属性是实证的。有学者指出，这是完全由政治家（而非历史）塑造的“实证道德”。虽然其不成文且具有一定流动性，但通过重复立法实践，其内容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可追溯且相对稳定，在特定时期的确定性远胜神意与习惯。因此总体而言，宪法规则的引入对法律确定性的影

响有限。相较于自然法学家采用的历史方法，分析法学揭开了法律神秘的面纱，在当时显著降低了法律的不确定性。

（二）挫折：法典化运动的失败

尽管分析法学显著降低了英美法律体系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英美法理学完全建立在形式、分析与逻辑之上——边沁推动法典化的失败便是明证。边沁的理论抱负远不止于学术论争，他“最迫切的愿望与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在英美建立完全法典化的法律体系，而这一目标显然未能实现。倘若真如霍维茨所言，英美法理学具有彻底的非历史性特质，且只追求单一的思想体系，那么通过立法法典化来消解普通法效力，本应成为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首选路径。但为何英美两国始终未能就其可行性乃至必要性达成共识？

这一现象首先源于政治体制与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传统的双重制约。以英国为例，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采用两院制结构。虽然上议院否决立法的权力仅限于延迟生效，但辩论程序的存在仍可能导致两院分歧。此外，下议院议员虽经民主选举产生，但多数隶属于主要政党，这使其难免将党派政治诉求带入立法过程，导致法律往往体现执政党意志。随着政党轮替，不同党派诉求的矛盾便会反映在法律变迁中。因此，即便存在最高立法机关，英美也从未形成如查士丁尼或拿破仑时期那样持续、统一的权威立法。

其次，尽管普通法的缺陷显而易见，但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根植于对法官造法的偏爱以及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更关键的是，有学者指出：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中，法律永远无法以静态确定的形式存在，即便法典再完备也不例外。换言之，虽然成文法在规范特定领域时具备足够的研究深度与精细度，但与历经数百年司法实践与学术锤炼的普通法相比，其仍缺乏后者特有的复杂性。另一个现实困境在于：成文法的表述具有“开放结构”，边缘案件的解释与适用仍依赖司法裁决。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英美法域司法机关已逐渐摒弃纯粹字面、客观的分析解释方法，不再坚持法律术语必须存在单一客观的科学含义，而是明确承认价值判断与政策考量对裁判的影响。例如澳大利亚法院采用的“文本-语境-目的”三位一体解释方法便是典型。

由此可见，虽然分析方法仍在英美法律实践中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但已不能完全代表其全部特征——除了非历史性要素外，还存在其他需要考量的维度。对彻底法典化的抵制及其衍生影响，恰恰体现了历史因素对英美法理学研究与实践的深远影响。尽管立法者与法学家清醒认识到普通法模糊性等缺陷，但基于分权制衡的政治传统、对自由价值的尊重，以及普通法灵活性相较于成文法刚性的优势认知，英美国家始终拒绝采用纯粹分析法学的的方法来对待现行法，更不会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存在。

三、H.L.A.哈特：温和实证主义的变奏

虽然约翰·奥斯丁与边沁同为英美法理学的里程碑人物，其主张的“法律即主权者命令”的分析实证主义理论与边沁学说具有相似性，但为了更辩证地讨论霍维茨的观点，哈特提出的“温和”实证主义理论更值得关注。

哈特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同时，其理论不同于奥斯丁的主权命令论，而是巧妙融入了自然法思想。他在《法律的概念》中明确表示，其实质上认同奥斯丁命令说的基本立场，但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就本文主旨而言，最重要的分歧在于法律与其他社会规则（如道德）的关系。与边沁和奥斯丁坚持法律与道德彻底分离的立场不同，哈特虽然认为二者不存在必然联系，却同时指出：任何法律体系都必须展现对道德或正义的特定遵从，或者建立在人们普遍认同遵守法律具有道德必要性的基础上。这种表述看似矛盾——如果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为何法律体系必须包含道德属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解答。实践层面，这种折衷源于现代语境的变化，特别是国际法与人权法的兴起。哈特曾比喻，绝对主权命令理论如同持枪歹徒的胁迫，在边沁和奥斯丁的时代之后，这种以强制性命令为核心的实证主义已难以为继。面对现实挑战，分析法学亟需更深入全面的发展，以形成对法律概念的新理解。理论层面，哈特由此提出“最低限度自然法”理论。他指出，奥斯丁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未经威胁仍自愿守法的现象，这种自愿服从源于人们认为自己负有守法的义务。那么这种义务感从何而来？哈特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内容包含维系社会存续的最低目的，并将这种最低要求分解为五个方面：人类脆弱性（要求限制暴力使用）、大体平等（需要建立相互克制与妥协的体系）、有限利他主义（要求建立互惠体系）、有限资源（需要确立财产制度）以及有限理解力与意志力（要求设置特定制裁）。在哈特看来，这些是任何法律体系都必须面对的“自然事实”，它们虽不同于法律的形式特征，但法律的有效性与道德价值仍是两个独立问题。

哈特对此问题的论述远不止于此，但已足够支撑本文论点。其理论创新在于将法律概念划分为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在外部表达上坚持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分离；在实质内容上则吸纳自然法要素。人们自

愿守法正是因为法律符合最低限度的自然道德要求。这一理论实际上极大拓展了分析实证主义的疆域，再次证明英美法理学的本质绝非纯粹的实证主义，也非完全“非历史性”的存在——至少在法律内容层面，还存在诸多无法用逻辑分析囊括的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以道德为代表的这些因素会随历史情境渐变。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英美法理学同时包含着历史性与非历史性的双重特质。

四、走向“综合法理学”

通过前文分析可见，无论是分析实证主义、自然法学派还是历史法学派，都既有不可否认的理论优势，也存在明显局限。它们各自体现了英美法理学的某些维度，但都无法涵盖其全部特征。这充分说明霍维茨的论断何其片面。然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英美法理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何种理论能更准确地描述其本质？鉴于各学派的独特价值，或许更可取的做法是将三者整合为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

要将这些相互分歧甚至对立的学派融合为连贯体系，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能整合各家特征的法律定义。实证主义者如边沁、奥斯丁与哈特始终认为只有人定法才是正式法律或规则；自然法学者则通过道德原则检验实证法的有效性，坚信道德或类道德的社会规范属于法律组成部分；而历史法学家更关注习惯法而非现行实证法，聚焦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的具体道德准则而非普世道德标准。杰罗姆·霍尔教授试图弥合这些分歧，将法律定义为“规则、价值与事实三者融合并得以实现的社会行动过程”。这一定义在理论上统一了法律的政治性、道德性与历史性特征。但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却引发实践难题：综合法理学若要实现其理论目标，就必须承认通过非正式或非立法行为实现的规则具象化——否则将与哈特的“温和”实证主义难以区分。然而，非正式行为必然带来确定性问题。虽然并非完美方案，但通过立法明确哪些非正式活动可产生约束性规则，不失为合理的折衷。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发挥三大理论流派的优势，又能规避其缺陷。该方法或许无助于解决“法律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永恒命题——因其相较于其他理论仍显模糊，但对现代立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当立法重心从维护主权至上转向保障人权时，这种综合视角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 [1] HORWITZ M, Why is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 Unhistorical[J]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97) 17(4):551.
- [2] GORDON R, Taming the Past: Essays on Law in History and History in Law[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144-145.
- [3] AUSTIN J,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M] London:John Murray, 1832:198-199.
- [4] DWORKIN R, Law's Empire Cambridge:Belknap Press, 1986: ch 6.
- [5] RATNAPALA S, Jurisprudence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36.
- [6] AQUINAS T, Summa Theologiae [M] New York:Benziger Brothers, 1911: pt I-II q 90 art 4.
- [7] LISSKA A, Aquinas's Theory of Natural Law: An Analytic Reconstructi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90-91.
- [8] BENTHAM J, HART H, Of Laws in General[M] 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0: 1.
- [9] OSBORNE T, HAUSE J, Aquinas's Summa Theologiae: A Critical Guide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188.
- [10] RUSSELL B,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67: 463.
- [11] BLACKSTONE W, 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England [M] Philadelphia:Robert Bell, 1771:39.
- [12] ZHAI X, Bentham's Exposition of Common Law[J] Law and Philosophy (2017) 36(5):525, 551-552.
- [13] DOOLITTLE I, Sir William Blackstone and His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765-9): A Biographical Approach[J]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3) 3(1): 99-100.
- [14] ROSEN F, Jeremy Bentham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de [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3:41-44.
- [15] DIFILIPPO T, Jeremy Bentham's Codification Proposals and Some Remarks on Their Place in History[J] Buffalo Law Review (1972) 22(1):239.
- [16] JUDSON F, A Modern View of the Law Reforms of Jeremy Bentham[J] Columbia Law Review (1910) 10(1):41-50.
- [17] LEEMING M, Theory and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 the Statutory Elephant in the Room[J] UNSW Law Journal (2013) 36(3): 1002-1006.

- [18] KIRBY M,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the Meaning of Meaning[J]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1) 35(1): 113-116.
- [19] HART H, The Concept of Law[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18.
- [20] DRURY S, H.L.A. Hart's Minimum Content Theory of Natural Law[J] Political Theory (1981) 9(4):533-534.
- [21] CULVER K, Leaving the Hart-Dworkin Debate[J]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2001) 51(4):367-373.
- [22] BERMAN H, Towards an 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 Politics, Morality, History[J]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88) 76(4):779-780.

POLITICS, HISTORY AND LAW: CRITIQUES ON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S "UNHISTORICAL" NATURE

HU Zemin¹

¹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Camperdown, NSW, Australia

Abstract: This paper critiques Morton Horwitz's assertion regarding the "unhistorical" nature of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from Bentham to Hart, and by compari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natural law school and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it reveals the complex essence of Anglo-American legal theory. Bentham's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reduced legal uncertainty by emphasizing positive law, yet the failure of his codification efforts demonstrates the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s reliance on historical traditions. Hart's "soft positivism," while maintaining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ity, acknowledges that legal content must incorporate minim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law, reflecting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factors. Horwitz's "un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overly simplistic, as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 in fact embodies both historical and non-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Ultimately, "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 serves as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apable of synthesizing the strengths of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the natural law school, and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to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essence of Anglo-American legal thought.

Keywords: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 ahistorical nature;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natural law;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44

中国时尚饮品品牌进入泰国市场的行为与策略分析

宋林¹ 张一平¹

(¹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云南 昆明 651700)

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 中国时尚饮品品牌 (如喜茶、奈雪的茶、霸王茶姬等) 纷纷进入东南亚市场, 其中泰国市场因其独特的消费环境和市场潜力成为重要目标。本文系统分析了中国时尚饮品品牌在泰国市场的进入行为与策略, 重点探讨了市场现状、消费者偏好、竞争环境及营销模式。研究发现, 中国品牌在泰国市场的成功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精准的市场定位、社交媒体营销、本土化产品创新及供应链优化。本文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品牌在泰国市场面临的挑战, 如品牌认知度不足、文化适应难度大及供应链管理问题,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策略, 如加强本土化研发、拓展渠道布局、提升品牌影响力及优化运营成本。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时尚饮品品牌的国际化提供参考, 并为其他行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时尚饮品; 泰国市场; 行为策略分析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 中古本土市场相对饱和且竞争激烈, 中国时尚饮品 (如奶茶、果茶等) 逐渐走向国门、走向世界, 其中东南亚市场就具有巨大的市场机会。东南亚地区多个国家与中国不仅水陆相连, 在文化上也有着历史渊源。这其中泰国就是几个东南亚国家中的典型, 泰国一直是中国人出境游的重要目的地, 2019 年高峰时期达 1100 万人次。泰国本身又属于热带气候对饮品本身就会有强烈的需求, 必然会成为中国品牌扩展的重要目标市场。

一、泰国市场现状与竞争环境分析

(一) 泰国饮品市场概述

1、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

泰国饮料市场是东南亚地区增长较快的市场, 主要受到年轻消费者、茶叶发展和健康饮食趋势的推动之一。根据 Statista 等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 泰国饮品市场 (包括茶饮料、咖啡、果汁和软饮料) 近年来保持稳定增长, 2023 年市场规模约为 150 亿美元, 预计未来五年仍将 4 %-6% 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持续增长。茶饮市场 (包括奶茶和鲜果茶) 近年来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关注泰国饮品市场的重要贡献。其中, 以泰式奶茶 (茶宴) 为代表的本土饮品仍然是市场主流, 而中国品牌的进入正在推动市场信心。健康饮料 (如无糖茶、植物奶、功能性饮料) 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 符合消费者关注健康活动的趋势。

2、消费者结构与需求变化

泰国饮品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包括: 年轻人 (18-35 岁): 该群体是精品消费的主要推动力, 偏好时尚的品牌和产品, 对社交媒体营销高度敏感, 愿意为高端、特色化精品买单。上班族 (25-45 岁): 这一群体对咖啡、茶饮等日常用品具有较高的消费需求, 倾向于选择便利的购买方式 (如外卖、自动排队机等)。旅游消费者: 泰国是全球旅游热点, 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国际游客, 其中包括大量中国游客。许多国际品牌进入泰国市场, 部分原因是希望借助旅游消费拉动销售。健康导向消费者: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泰国消费者关注饮料的健康成分, 如低糖、无添加剂、有机等, 这一趋势正在改变市场格局。

(二) 泰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作者简介: 宋林(1986—),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市场营销、创新创业;

通讯作者: 张一平(1984—), 女, 硕士研究生,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

在泰国精品市场，中国新兴饮品品牌需要面对多个本土和国际竞争者，包括传统品牌和新兴品牌。主要竞争对手如下：

1、本土品牌：泰国本地茶饮工会 Cha Tra Mue（手标茶），1945年成立的老品牌，核心产品主要是泰式奶茶、泰式绿茶、椰子茶等，作为泰国历史上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本土茶饮品牌，Cha Tra Mue 在全国拥有超过 200 家商店，并在超市和便利店销售瓶装饮料。其具有品牌知名度高，深受泰国本土消费者认可，产品定价较亲民，且拥有强大的本土供应链体系等特征。

ミクキャン，成立时间于 2007 年，主要核心产品是珍珠奶茶、果茶、泰式茶饮，在泰国拥有超过 500 家门店，主要采用加盟模式，开拓速度快。其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价格较低，迎合大众消费群体，在二三线城市市场占有率较高。

2、中国品牌的竞争情况

目前，多个中国时尚饮品品牌进入泰国市场，主要包括：

喜茶（HEYTEA）：采用直营模式，在曼谷等核心城市休闲式旗舰店，品牌主打“新茶饮+社交体验”概念。通过社交媒体推广、中国风品牌形象打造差异化对比。

奈雪的茶（Naixue Tea）：以“茶+软欧包”模式进入泰国市场，目标客户为年轻女性消费者。高端消费体验，定价相对较高，但人群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乐乐茶（LeLe Tea）：以健康、低糖概念切入泰国市场，凸显原创产品与新型茶饮文化。

（三）泰国市场的主要挑战与机遇

1、市场挑战

（1）品牌认知度问题：目前对于中国台湾品牌和本土品牌，中国品牌在泰国市场的认知度仍然较低，需要加强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

（2）文化偏好：泰国消费者对本土口味有偏好，例如更甜的泰式奶茶，品牌需要调整配方以适应该地市场需求。

（3）供应链管理：在泰国市场建立稳定的原料供应链和物流体系是中国品牌面临的重要挑战，特别是对于依赖进口茶叶、奶制品等原料的品牌。

（4）市场进入壁垒：泰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进入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在专利经营、食品安全标准和码头经营方面都有严格的法规要求。

2、市场机遇

（1）社交媒体营销红利：泰国消费者高度依赖社交媒体（如 Facebook、Instagram、LINE），中国品牌可以借助短视频营销和 KOL 推广迅速提升品牌影响力。

（2）健康饮品需求增长：消费者对低糖、无添加饮品的需求增长，中国品牌可以通过创新产品（如草本茶、鲜果茶）占领市场。

（3）旅游经济带动消费：泰国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中国游客的消费偏好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品牌可以强化品牌认知度。

（4）新零售模式发展：泰国市场的外卖和数字支付普及度持续提升，中国品牌可以利用智能点餐、外卖商品等方式提升市场渗透率。

二、中国时尚饮品品牌市场行为分析

本研究主要通过分析中国时尚饮品品牌的市场进入模式与品牌定位等方面分析他们在泰国市场的市场行为。通过分析这些市场行为，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品牌如何在泰国市场拓展竞争力，并为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一）市场进入模式分析

中国时尚饮料品牌在泰国市场的进入方式主要包括直营模式、加盟模式、合资模式等，众多模式各有优劣，品牌通常会根据市场环境和自身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方式。

以喜茶和奈雪的茶为代表选择了直营模式，通过在泰国品牌自营门店，直接控制形象、产品质量和服务体验。这样可保持品牌视觉形象的统一，确保质量一致性，增强消费者忠诚度，但这需要强大的供应链支持和强有力的市场推广力度。

以乐乐茶、一点点和书亦烧仙草选择了以加盟模式（特许经营模式），与当地品牌合作，提供标准化运营体系和原料支持，这样可以快速拓展，提高市场渗透率。同时可以降低资金压力，利用当地加盟商资

源拓展市场。

以蜜雪冰城为代表的企业则通过与泰国本土企业合作，共同建设品牌购物中心，并利用当地企业的供应链和市场资源，这样可以快速融入当地市场，降低政策法规和运营风险。

（二）品牌定位与市场解读

中国时尚饮品品牌在泰国市场主要采用高端定位、健康定位、本土化定位等策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以喜茶、奈雪的茶为代表品牌定位以高收入群体、都市白领、网红消费群体为主。选址于娱乐商圈（如曼谷暹罗百丽宫、ICONSIAM）。以提供高品质茶叶+特色水果/奶类组合，提高产品附加值，而店内设计极力简洁、时尚风格，增强社交属性。采用高端定价策略，每杯饮品价格 120-180 泰铢（约 24-36 元人民币）。

以乐乐茶、茶颜悦色则选择健康茶叶定位，以健康意识强的消费者为主要目标，推出低糖、无糖、植物奶茶、草本茶等产品，如燕麦奶茶、鲜果茶。营销时强调“0 添加”“低热量”等概念，以吸引健康消费人群，同时在商店及社交媒体上推广健康饮食理念，提高品牌认同感。

而蜜雪冰城与在国内的策略选择是基本一致的，还是主要以大众市场（学生、工薪阶层）为主，推出亲民价格，每杯饮品价格在 50-80 泰铢（约 10-16 元人民币）。尽量风味本土化，推出符合泰国风味的产品，如椰子奶茶、泰式奶茶风味饮品，同时拓展至二三线城市，通过加盟模式迅速覆盖市场。

三、市场策略与优化建议

在泰国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中国时尚饮品品牌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市场策略，以提高品牌、扩大市场份额，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本文从产品策略、渠道拓展、品牌营销及供应链优化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市场策略及优化建议。

（一）产品策略：本土化+创新驱动

1、本土化口味研发

优化甜度选择，泰国消费者普遍偏好较甜的饮品，品牌可提供多糖度选择（如全糖、75%糖、50%糖）。推出热带水果系列，基于泰国丰富的热带水果资源，开发芒果、椰子、柠檬、榴莲等特色饮品，如“椰子燕麦奶茶”“芒果芝士乌龙”。结合泰国传统风味，如将泰式奶茶（Cha Yen）与中国茶饮结合，推出创新产品。

2、季节限定及跨界联名

节日原创限定款，如泼水节（宋干节）特别版、宋干特别节杯，增强本土消费者的文化认同感。与泰国本土品牌（如泰国本土甜品品牌 Kyo Roll En）合作推出联名产品，提高品牌曝光度。

3、即饮产品开发（RTD、即饮）

推出瓶装/罐装即饮奶茶、冷泡茶等，进入 7-11、Big C、Lotus 等泰国主流便利店和超市。发展线上销售渠道，在 Shopee、Lazada 等电商平台推广即饮产品，吸引年轻消费者。

（二）拓展渠道策略：线上+线下全方位布局

1、线下渠道优化

拓展直营+加盟模式，结合直营店铺的品牌效应和加盟模式的快速拓展优势。

选择高人流地段购物中心，如购物中心、大学周边、旅游区（曼谷大皇宫、清迈古城等）。设立自动售卖机，在写字楼、地铁站、高校等高流量区域投放智能茶饮机，提高品牌曝光度。

2、线上渠道优化

发展外卖业务，与泰国外卖平台（GrabFood、LINE MAN、Foodpanda）合作，提高商品效率。建立品牌独立电商店铺，销售茶叶、周边产品，如奈雪的茶推出的茶礼盒、喜茶的联名杯具等。

（三）品牌营销策略：社交媒体+体验营销

1、社交媒体营销

主要推广渠道：Facebook、Instagram、LINE、TikTok，泰国人使用率高。定期发布品牌故事、产品介绍，增加品牌温度感。借助 KOL（网红）推广，在泰国美食知名博主账号投放广告，也可以采用短视频营销，在 TikTok 推出“#泰国最火奶茶挑战”，提高话题度。

2、体验营销

争取多种媒体渠道构建“网红打卡店”，如设置霓虹灯墙、品牌特色装饰，吸引年轻人自拍分享。组织线

下互动活动，如“DIY 你的特色奶茶”，增强用户参与感。

3、品牌联名营销

与泰国本土潮流品牌 Sretsis、Greyhound Café 联名推出限定包装，提高品牌调性。与动漫 IP 合作（如泰国本土动画角色“Khun Chang Khun Phaen”）推出特别版产品，吸引年轻人群。

（四）供应链优化策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1、本地化供应链建设

在泰国建立原料采购中心，减少进口依赖，降低供应链成本。选择泰国本地奶制品供应商，如 Meiji、Dutch Mill，确保原料稳定供应。

2、优化物流体系

与泰国物流公司（如 Kerry Express、Flash Express）合作，提高原材料库存效率。建立区域仓储配送中心，提高即饮产品原材料供应的效率。

3、智能化管理

引入数字化库存管理系统，减少库存浪费，优化成本结构。在店内采用 AI 智能点单系统，提高考勤下单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四、结论与展望

（一）中国时尚饮品品牌在泰国市场的竞争优势明显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中国时尚饮品品牌进入泰国市场的行为策略与优势，研究发现，中国品牌在泰国市场具备以下主要优势：

品牌创新能力强：相比于泰国本土品牌，中国品牌在茶饮创新、产品研发、门店体验等方面更加有经验，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数字营销策略成熟：通过社交媒体（Facebook、Instagram、TikTok）进行精准营销，利用 KOL（网红）、UGC（用户生成内容）等方式提升品牌认知度和用户粘性。

供应链与成本优势：部分品牌（如蜜雪冰城）凭借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最新的原料采购模式，在泰国市场具备价格竞争力。

高端化与大众化并存：不同品牌采用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如茶喜、奈雪的茶主打高端市场，蜜雪冰城、一点点等品牌走大众市场路线，形成市场互补。

（二）市场进入模式的有效性显著

直营模式适用于高端品牌，如喜茶、奈雪的茶，以品牌价值+高端商圈布局为核心策略，能有效增强品牌影响力。加盟模式有利于品牌快速拓展，如蜜雪冰城等采用了亮点、高起点的加盟体系，在泰国市场快速拓展。混合合作模式能够借助泰国本土企业的资源，降低市场进入风险，提高本土化适应能力。

（三）产品本土化与市场占有提升迅速

产品口味本土化是中国品牌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推出泰式奶茶风味、芒果绿茶、椰子奶茶等符合泰国消费者口味的产品。甜度调整迎合泰国市场需求，提供“全糖、75%糖、50%糖”等多种选择，提高消费者接受度。季节限定和节日营销，如泼水节特饮、宋干节特色包装，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本土品牌感。

（四）营销策略的形式多样、效果明显

社交媒体营销（Facebook、TikTok、Instagram）在泰国市场至关重要，短视频推广、KOL 合作、挑战赛等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品牌曝光率。门店体验营销（如网红打卡店、主题墙、会员体系）提升品牌忠诚度，增强消费者社交分享欲望。跨界合作（Co-branding），如与泰国本土时尚品牌、餐饮品牌联名，增强品牌影响力，提高市场渗透率。

（五）供应链管理 with 成本控制作用凸显

本地供应链布局是降低运营成本的关键，可通过建立原料采购中心、与泰国本地奶制品/水果供应商合作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自动化管理（数字化库存系统、AI 点单系统）提高运营效率，减少库存浪费，优化成本结构。

参考文献：

- [1] 侯怡琳.新消费趋势下的茶饮品创新与市场营销模式[J].贵茶,2024(5):63-66.
- [2] 信鸽.00 后新式茶饮消费对健康饮品市场机制的影响[J]经贸管理,2024(5):77-79.
- [3] 张鑫.品牌联名“卷疯了”现制茶饮市场竞争加剧[J]中国食品,2024:78-79.
- [4] 易佳颖,刘禹希.新茶饮出海韩国样本:品牌是冰山一角供应链是关键[N]21 世纪经济报道,2024-7-10.
- [5] 宋天杨.中国茶饮出海 3.0,“本土化”思维之下的品牌求生[J]国际经济观察,2024:43-46.

Analysis of the Behaviour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Fashion Beverage Brands Entering the Thai Market

Song Lin¹, Zhang Yiping¹

¹*Yunnan Economics Trade and Foreign Affairs College, Kunmi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s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domestic market competition, Chinese fashion beverage brands—such as HEYTEA, Nayuki, and CHAGEE—have been actively expanding into Southeast Asian markets. Among these, the Thai market has emerged as a key target due to its unique consumer environment and significant market potential.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entry behaviour and strategies employed by Chinese fashion beverage brands in the Thai market, with a focus on market conditions, consumer preferences, competitive landscape, and marketing model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uccess of Chinese brands in Thailand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precise market positioning, effective social media marketing, localised product innovation, and optimis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urthermore, the paper identifies key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brands in the Thai market, such as low brand awareness, cultural adaptation difficultie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ssues. In response, it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s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local R&D, expanding channel networks, enhancing brand influence, and improving operational cost efficiency. The finding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hinese fashion beverage brands and serve a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other industries seeking to expand into overseas markets.

Keywords: Fashion Beverages; Thai Market; Behaviour and Strategy Analysi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49

高职大学生“慢就业”原因分析及对策探索

明伟¹

(¹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57)

摘要: 面对当前高职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新态势,特别是“慢就业”现象的凸显,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的多重维度,剖析了高职大学生就业现状,揭示了“慢就业”背后的复杂原因,包括个人职业规划的模糊、市场需求与技能培训的不匹配、以及心理调适能力的不足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职业规划指导、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增强心理辅导服务、以及加强校企合作等建议,旨在促进高职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提升,以实现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的有效对接。

关键词: 高职教育; 慢就业; 原因分析; 对策探索; 就业市场

一、高职大学生就业现状与“慢就业”现象概述

(一) 高职大学生就业市场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市场对高技能、高适应性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当前高职教育体系在专业结构与教学内容上,仍存在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部分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转型的步伐,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新兴行业的需求;另一方面,课程体系中实践教学与企业需求脱节,导致毕业生在就业初期面临技能转换与适应的难题。此外,随着社会对知识更新速度的追求,高职教育在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上,尚有提升空间。职业教育的初衷在于培养具有实践技能的专业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教学资源、师资力量以及实践机会的限制,部分高职院校未能有效对接企业需求,导致毕业生在专业技能上存在短板。加之,职业技能的培养往往需要与行业趋势紧密结合,定期更新课程内容与实践项目,以确保学生能够掌握最新的行业知识与技能。然而,现实情况是,高职院校在课程更新与实践教学方面的反应速度往往难以跟上行业发展步伐,这进一步加剧了专业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再者,就业心态的转变也是影响高职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重要因素。随着教育普及与个性化就业趋势的兴起,高职大学生对职业选择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以往,就业被视为完成学业后的直接选择,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追求个性化发展路径,对职业规划的重视程度提高。这种心态转变,一方面促进了个性化就业模式的兴起,如自由职业、创业等;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慢就业”现象的出现。部分学生选择推迟就业,以期进一步提升个人竞争力,或是寻找更加符合个人兴趣与职业规划的工作机会。此种心态的转变,对高职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即如何在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就业态度,培养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1]。

(二) “慢就业”现象的界定与特征

“慢就业”现象,本质上是指大学毕业生在完成学业后,并不急着步入职场,而是选择继续深造、旅行、参与志愿活动,或者从事临时性工作,以此来追求更全面的个人成长,或是等待更贴合个人职业愿景的工作。这标志着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的转变,从传统的“毕业即就业”模式,朝着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职业道路迈进步伐。这既反映出当今大学生对职业规划的审慎思考,也折射出社会经济环境对就业市场产生的影响。

基金项目: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教育工作分会/全国轻工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4 年度课题 (QGJY2024075)

作者简介: 明伟 (1985-), 男, 助理研究员, 大学本科, 研究方向: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其特征包括展现个人选择的自由度提升。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对职业抉择的自主性增强,他们不再仅仅看重稳定的工作,而是更看重个人兴趣、职业发展和生活品质的平衡。因此,一些毕业生毕业后选择避开传统就业市场,通过旅行、志愿服务等方式拓展视野,增强个人技能和经验,为未来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高职大学生“慢就业”原因分析

(一) 个人因素对“慢就业”的影响

1. 不明确的职业规划路径,对高职学生的职业态度和行为起着关键性的影响。许多新生在步入大学时,可能对所学专业知之甚少,或者对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认识不清。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在大学期间往往难以构建清晰的职业蓝图,导致毕业后在面对就业市场的压力时,选择暂时不就业,以此来寻求更多时间探索符合个人兴趣和职业规划的工作机会^[2]。职业规划的不确定,不仅体现了个人对未来职业道路的迷茫,同时也揭示了教育体系在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认知和职业探索方面的不足。

2. 心理调适能力的缺失是“慢就业”现象的另一重要推手。大学生活与职场生活的显著差异,使得一些毕业生在毕业后需要时间适应新的社会角色。然而,部分高职学生在心理适应方面存在挑战,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和不确定性,他们可能会选择“慢就业”作为应对策略,以缓解心理压力,寻找个人价值和定位。这种心理调适能力的不足,反映了教育体系在心理辅导服务上的欠缺,以及社会和家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不够。

3. 技能不足和市场需求的不匹配,直接促成了高职学生“慢就业”的决定。在大学阶段,受限于课程设计和实践机会,许多学生难以充分满足企业需求,毕业时面临技能短板。此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使得一些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发现自身实际工作能力与期望之间存在差距。因此,他们选择“慢就业”,以便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实践来提升技能,以适应职场的高要求。这种技能脱节现象暴露了高职教育在课程设计、实践教学以及与市场需求的连接上的不足。

模糊的职业规划、心理调适能力的不足,以及技能与市场需求的不一致,是高职学生“慢就业”现象的三大关键个人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建了“慢就业”现象的多元成因。想要应对这一现象,高职教育体系需要在职业规划指导、心理支持服务,以及教学内容与实践机会的整合上下功夫,以增强学生的规划能力、心理韧性,以及提升技能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全面提升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二) 教育体系与就业市场匹配度分析

1. 教育体系的结构性问题“慢就业”现象的催化剂。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与不断变革的产业结构背景下,新兴行业和职业岗位层出不穷,而教育体系往往无法快速响应这些变化。许多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仍然是基于传统行业,对于如信息技术、绿色能源、创意产业等新兴领域的反应滞后。这导致教育输出与市场需求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断裂,使得许多毕业生在毕业后难以找到与所学专业完全匹配的工作,被迫选择“慢就业”,在寻找更适合个人职业规划的岗位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学习^[3]。

2. 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局限性也是影响教育与就业市场匹配度的重要因素。课程内容更新速度往往跟不上行业发展的脚步,尤其在科技日新月异的领域,学生在校期间学到的知识可能在毕业后不久就会显得过时。此外,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过于理论化,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使得学生在进入职场时,面临着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的挑战。而实践教学与企业需求的脱节,使得许多毕业生在技能上有所欠缺,无法迅速适应工作要求,因此他们倾向于选择“慢就业”,以期通过持续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3. 教育体系与就业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容忽视。学生在校期间获取就业市场信息的渠道有限,主要依赖于校园招聘会、就业指导讲座等途径,这些信息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就业市场的最新动态。加之,部分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程度不够紧密,无法及时向学生提供关于就业市场真实需求和趋势的反馈。这种信息的不均衡,使得学生在毕业前往往难以准确评估自己的就业竞争力,也难以准确理解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从而倾向于选择“慢就业”,等待更理想的机会出现^[4]。

在当前“慢就业”现象普遍的高职教育环境中,教育体系与就业市场的匹配度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深入分析教育体系的结构性问题、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局限性,以及就业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并寻找有效的策略来改善这一状况,以促进高职大学生更好地融入就业市场。

（三）社会经济环境对“慢就业”的作用

社会经济环境在高职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演变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个复杂且深远的影响机制，涉及到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

1. 深入理解宏观层面的影响，即经济周期性波动如何影响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在经济增长放缓或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企业招聘需求减少，导致就业市场紧缩，这可能促使一部分学生选择暂时不就业，寻求更合适的机会，实现“慢就业”。

2. 微观层面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心理预期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经济条件的提升使得部分家庭有能力支持子女在就业前的“缓冲期”，同时，家长对子女的就业期望和态度发生变化，他们更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和培训，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这种心理的转变体现了家长们对高等教育价值的重新认识，他们希望通过延长子女的学习时间，提升其实力，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

3. 社会心理预期的改变也与知识焦虑紧密相连。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生面临着激烈的技能竞争，担心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不足以应对市场的需求。这种焦虑促使他们采取“慢就业”的策略，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实践提升自我，以满足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和提升个人的竞争力。同时，社会对成功的过度追求和对竞争力的高期待，也使得大学生在就业选择上更加保守，更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以达到社会和自我期望的双重标准。

4. 新经济模式的崛起为“慢就业”提供了新的视角。共享经济、线上经济等新型业态的蓬勃发展，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灵活就业和创业机会。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拓宽了就业的边界，推动了就业市场结构的多元化，使得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选择更为个性化的职业道路。这种趋势反映了社会对职业发展多元化的接受度提高，也为“慢就业”现象注入了新的活力^[5]。

“慢就业”现象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到了家庭经济条件、社会心理预期、知识焦虑以及新经济模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个人和群体层面的交织作用，共同塑造了高职大学生的就业态度和决策。面对这一现象，社会各界应通力合作，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家庭支持和个体能力提升，构建一个有利于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就业环境，推动更加充分和高质量的就业，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融。

三、应对“慢就业”的策略与建议

（一）个人层面的应对策略

面对“慢就业”这一社会现象，个人层面的应对策略显得尤为关键，它不仅直接关乎个体的职业发展轨迹，而且是提升就业质量、实现职业生涯成功的重要基石。研究从深度探讨高职大学生如何从个人角度出发，采取积极且富有前瞻性的措施，增强职业竞争力，同时学会调整自身心态，以更好地适应瞬息万变的就业市场。

1. 强化职业规划与目标设定是关键的第一步。对于高职大学生来说，职业规划意识的培养应从大学入学之初就开始，甚至在更早的阶段。通过深入了解自身的兴趣、优势和潜在能力，结合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制定出贴合个人发展需求和行业趋势的职业规划。这要求他们定期评估自己的技能与行业动态的匹配程度，及时调整规划方向，确保目标的现实性和前瞻性。这样的规划将有助于他们在面对“慢就业”时，有清晰的方向，更有耐心和信心等待合适的机会。

2. 提升自我学习与适应能力是应对“慢就业”的核心策略。在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现代职场，终身学习已成为保持竞争力的不二法门。高职大学生应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时刻关注行业动态，掌握新兴技术与工具，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同时，他们应提升自身的软技能，如团队协作、跨文化交流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些在求职和工作中同样重要，甚至有时会成为决定性的竞争优势^[6]。

3. 积累实践经验和增强技能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直接途径。高职大学生应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实习、项目合作、技能竞赛等各种实践机会，将理论知识付诸实践，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参与专业相关的社团活动或志愿服务，不仅能提升个人技能，还能扩展人际网络，增加潜在的就业机会。

4. 调整就业心态，培养心理韧性也是应对“慢就业”的重要环节。高职大学生应树立积极的就业观念，正视就业市场中的竞争与挑战，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被就业焦虑和逃避情绪所困扰。同时，学会应对就业过程中的挫折与压力，通过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等途径，提升自我调适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以最佳面貌迎接每一个机会。

5. 在数字化时代，合理利用网络资源拓宽求职渠道是个人应对“慢就业”的有效手段。高职大学生应善

于运用社交媒体、专业网络平台和在线招聘网站,积极构建个人职业网络,获取最新的就业信息,主动向潜在雇主展示自己的简历。同时,他们也可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提升技能,参与在线项目,以此提高自己的可见度和吸引力。

(二) 教育体系改革与就业指导服务优化

在当前社会,一种被称为“慢就业”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高职大学生毕业后并没有立即投入职场,而是选择暂时休息、进修或寻找更符合个人兴趣的工作。针对这一现象,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就业指导服务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旨在帮助高职大学生提升就业竞争力,顺利融入日益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将深入探讨如何通过创新教育体系和升级就业指导服务,为高职大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就业支持,以有效应对“慢就业”的挑战。

1. 教育体系的改革是解决“慢就业”问题的切入点。改革的重心应放在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优化上,使之与市场需求保持同步。高职院校应定期进行行业趋势分析,及时调整和更新专业方向,确保教育输出与社会需求无缝对接。特别是在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绿色能源技术等方面,高职院校应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此外,通过跨学科项目,鼓励学生在不同领域之间融会贯通,以提升其综合素养^[7]。校企合作也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订单式培养、校企合作项目等方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参与实际工作,提前积累经验,提高就业竞争力。

2. 实践教学在提升高职大学生就业技能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教育体系应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通过实习实训、项目合作等途径,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成长。同时,邀请行业专家进行现场指导,提升教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确保毕业生能够符合职场的即时需求。教育机构应提供丰富的实践平台,使学生在动手操作中深化理论理解,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8]。

3. 优化就业指导服务也是应对“慢就业”现象的有力手段。高校应构建全面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包括职业规划咨询、简历撰写指导和面试技巧培训等,帮助学生确定职业目标,提升求职技巧。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为学生提供实时的就业市场动态和行业发展趋势,引导他们做出明智的就业决策^[9]。在这一过程中,心理辅导起着支持性作用,高校应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学生缓解就业焦虑,增强心理适应能力,培养积极的就业态度。

4. 深化校企合作,打造产教融合的教育模式,是提升高职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必要途径。高校应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组织实习实训、技能竞赛等活动,让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学习^[10]。此外,通过企业导师制度,邀请业界专家参与教学,让课程内容保持前沿性,确保教育与就业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

四、总论

通过对高职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其背后复杂的成因与多维度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职业规划的模糊、心理调适能力的不足、就业技能的欠缺,以及教育体系与就业市场匹配度的挑战,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等。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家庭条件与就业心理预期的变迁、社会心理预期与知识焦虑的加剧、新经济模式的推动与个性化就业选择的兴起,如何共同塑造了当代高职大学生的就业态度与决策。针对“慢就业”现象,通过调研提出了综合性应对策略,强调个人层面的自我提升,包括强化职业规划与目标设定、提升自我学习与适应能力、增强实践经验和技能、调整就业心态,以及利用网络资源拓宽求职渠道。同时,从教育体系的角度,倡导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优化、强化实践教学、升级就业指导服务、融合心理辅导与职业规划教育,并深化校企合作,以实现教育与就业市场的有效对接。

参考文献:

- [1]李金萍.大学生“慢就业”原因分析及对策探索[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24 (2): 102-104.
- [2]董晓宏.地方“双非”院校管理类大学生慢就业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2024 (3): 28-31.
- [3]李功华.新时代大学生“慢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J].高校辅导员.2024(1):75-80.
- [4]杨红娟.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原因及对策分析[J].就业与保障.2023(4):154-156.
- [5]朱向晨.大学生“慢就业”原因及建议[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4(1):109-111.

- [6]王旭旭.新形势下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原因与对策分析[J].大众文摘.2023(12):1-3.
- [7]倪科卿.高职院校大学生退役士兵就业能力提升研究--以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为例[J].就业与保障.2024(3):124-126.
- [8]马洪新.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分析及对策研究[J].就业与保障.2023(4):100-102.
- [9]桂文龙.高职女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职业技术.2022(6):4-7.
- [10]斯炎.当前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困难原因分析及指导对策[J].科教文汇.2022(16):155-157.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Slow Employment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loration of Countermeasures

Ming Wei

Huizhou Economics and Polytechnic College, Hui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prominence of the "slow employment" phenomen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reveals the complex reasons behind "slow employment," including the ambiguity of individual career planning, the mismatch between market demand and skill training,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biliti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areer planning guidance, optimizing the major settings and curriculum system, enhanc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and strengthen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se measures aim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achieve effec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market.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low Employment; Cause Analysis; Countermeasure Exploration; Employment Marke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50

移动支付特性对企业信任及使用意愿产生的影响 ——以支付宝与云闪付之间的比较为中心

陈宇¹ 张惠媛²

(¹ 淮北理工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²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 随着移动支付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成熟, 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传统金融支付手段已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移动支付以更便捷的支付体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后疫情时代, 电子支付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 成为一种基于网络、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沟通环境。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根据文献研究结果实施实证研究方法。银联快闪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 但研究表明, 消费者仍然倾向于使用支付宝。因此, 中国银联除了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外, 更重要的是完善银联支付, 拓展合作伙伴和应用领域, 整合自身资源优势, 创新移动支付产品, 推出具有银联快闪支付功能的个性化服务。银联要主动接受新变化, 适应创新趋势, 积极运用新技术, 提高服务质量, 积极创新产品, 提升客户应用体验。只有积极探索新的移动支付场景, 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才能在不断变化中获得新的发展优势。

关键词: 移动支付特性; 企业信任; 使用意愿

一、引言

(一) 背景

随着移动支付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成熟, 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越来越大。移动支付新型支付方式发展迅速, 传统金融支付手段已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移动支付以更便捷的支付体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根据 Statista 发表的《FinTech Report 2021-Digital Payments》显示, 2020 年世界最大的数字支付市场是中国, 数字支付规模为 24965 亿美元, 占 45.6%, 其次是美国, 为 10354 亿美元, 占 18.91%, 2020 年欧洲为 9198 亿美元, 占 16.8%,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支付市场。随着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移动支付商品的快速增长, 传统银行业的客户群和收益空间减少, 传统银行业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影响力也在减弱。据艾瑞咨询的报告显示, 截至 2024 年, 支付宝和微信的市场占有率合计已超过 90%, 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机构在移动支付领域严重失衡。中国银联针对这种负面情况, 积极推进了移动支付商品的革新。但产品起步较晚, 创新速度慢, 客户体验感差, 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客户黏度不高。中国银联作为传统支付市场的领军企业, 品牌知名度高, 在传统支付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居多, 但移动转型相对缓慢。因此中国银联根据移动支付时代的特点, 为了抢占移动支付领域的广阔市场, 于 2017 年 12 月与多家商业银行联合推出了移动支付手段——云闪付。经过几年的努力, 银联取得了明显的发展效果, 但与支付宝、微信支付相比, 在市场份额、盈利能力、应用场景、用户体验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在此背景下, 云闪付如何根据发展环境和自身的发展现状, 制定出合适的发展策略, 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 陈宇(1998—),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市场调查、服务营销;

通讯作者: 张惠媛(1997—),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社交网络服务、银发旅游、旅游危险感知;

（二）研究目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心理和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中国移动支付正在快速增长,但银行移动支付的产业体系形成还需要进一步升级。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移动支付行业整体发展状况和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移动支付产品的发展策略,传统支付机构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对支付宝及中国银联推出的移动支付手段云闪付进行了比较研究,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一种补充。从实践价值来看,移动支付市场前景广阔,但支付宝、微支付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直接影响行业整体增长,银行机构移动支付产品劣势明显。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达到研究目的。通过文献研究对移动支付特性、企业信任和使用意愿进行理论考察,并根据文献研究结果实施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支付宝和云闪付 APP 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 SPSS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进行频率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以识别和验证样本的特征。

二、文献综述

（一）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的概念

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学者们的研究也在不断变化。移动支付的定义已经出现了很多版本。本研究对移动支付的定义进行了整理,并从不同角度筛选出体现对移动支付的各种理解的定义。ChenKaidi (2007) 认为移动支付载体是通过短信、无线网络、射频等方式进行支付、资金支付、移动终端设备转移的一种金融支付活动。据 Bohle&Keueger (2001) 介绍,移动支付是指消费者利用手机等移动设备在网上向商品服务提供者进行商业性结算,获得必要的商品和服务的过程。据 Heijden (2002) 介绍,移动支付是可以进行个人、个人、组织间支付的移动功能,移动支付运营商是移动互联网。所以移动支付方式仍然是时尚的创新支付模式。

移动支付的类型和分类标准因情况而异。移动支付的定义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移动支付是指消费者利用手机、PDA 或其他移动终端支付商品或服务的新型方式。狭义的移动支付是指消费者消费的商品或服务利用移动支付的方式。本研究的移动支付是指狭义的移动支付(Mobile Payment)。在后疫情时代,生活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移动支付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支付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移动支付特性

许多学者研究了移动支付系统的可用性、隐私性、交易速度、社会规范、信任性等特点,提出并验证了移动支付技术的诸多因素影响和接受程度。移动支付是随着电子支付业务相对成熟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支付方式,研究主要有 3 种影响。一是诚信、社会规范风险、兼容性、技术问题、美观界面等;二是电子支付学者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易速度、隐私、安全等方面的构建相关问题;三是学者接受并考虑移动支付接受度等特点,具有便利性、流动性等。在文献中消费者的接受和采纳中,影响移动支付特性的因素总结如下表 1。

表 1 移动支付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一般因素	易用性、有用性、信赖、社会规范危险、兼容性、技术问题、美观界面
电子支付研究增加的原因	交易速度、隐私、安全
移动支付新的特定因素	成本、便利性、移动性

资料来源:以先行研究为基础整理后构成

（二）企业信任

企业信任概念

信任一词是各研究领域和学科不断讨论的话题。到目前为止,对信任的定义似乎还没有统一,并且每个研究领域的信任的定义都不同。从同一领域不同研究角度提出的定义似乎也不同。在网络环境下,McKnight,Chervany 2002)把信任被定义为一个人希望的新技术的信赖性和妥当性的程度。在电子商务和移

动商务领域,更多学者赞同 Mayeretal 的信任定义, MayerRC, Davis JH, Schoorman FD (1995) 认为无论一方是否有能力监视或控制对方,都会在期待对方做出重要的特定行为时处于弱势或不利地位。简单地以信任为单一变数进行研究的话,无法区分消费者在移动结算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或类型的信任问题。

(三) 使用意愿

消费者使用意愿是指是否有利用或购买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意向的心理活动。在心理学领域,学者们首先对其意愿进行了研究。

1975 年,通过 FishbeinM 和 Ajzen 的研究,将意愿定义为特定行为时个体表现的主观强度。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意愿通常被学者认为是概率和可能性,从而主导了后续行为的延长。那么,使用意愿(Usage Intention)可以理解为,用户对某种新事物从内在动机出发,表现出主观的行动倾向。在移动支付方面,消费者的使用意愿和消费者的使用感受、服务体验、购买行为紧密相连。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模型

根据此前消费者对移动支付使用意愿的研究,本研究将移动支付特点分为安全性、简便性、经济优惠 3 个因素,将企业信誉分为能力、正直性、善意性 3 个因素。通过这些,将进行构建移动支付特性、企业信赖和消费者使用意愿关系的模型研究,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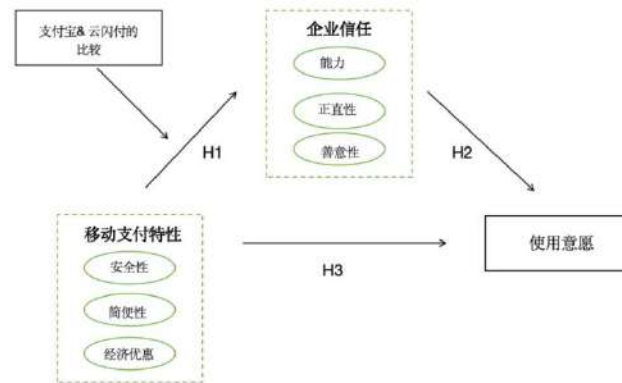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图

(二) 研究假设

移动支付特性与企业信任的关系

假设 1:移动支付特性对企业信任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 1-1:安全性对企业信任的能力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 1-2:简便性会对企业信任的能力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 1-3:经济优惠对企业信任的能力产生正向 (+) 的影响。

假设 1-4:安全性对企业信任的正直性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 1-5:简便性对企业信任的正直性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 1-6:经济优惠对企业信任的正直性产生正向 (+) 的影响。

假设 1-7:安全性对企业信任的善意性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 1-8:简便性会对企业信任的善意性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 1-9:经济优惠对企业信任的善意性产生正向 (+) 的影响。

企业信任与使用意愿的关系

假设 2: 企业信任对使用意愿产生正向 (+) 的影响。

假设 2-1: 企业信任中能力对使用意愿产生正向 (+) 的影响。

假设 2-2: 企业信任中正直性对使用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 2-3: 企业信任中善意性对使用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

移动支付特性与使用意愿的关系

假设 3: 移动支付特性对使用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 3-1: 移动支付的安全性对使用意愿产生正向 (+) 的影响。

假设 3-2: 移动支付的简便性对使用意愿产生正向 (+) 的影响。

假设 3-3: 移动支付的经济优惠对使用意愿产生正向 (+) 的影响。

支付宝和云闪付的比较

假设 4: 支付宝和云闪付相比, 支付宝的使用趋势更高。

(四)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模型, 根据文献的一般原则和步骤设计问卷。本研究第一部分对消费者特点和移动支付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第二部分是调查消费者的使用经验及移动支付使用意向。问卷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 5 分量表。5 个等级按照“完全不同意”、“不大同意”、“同意”、“非常同意”的顺序打 1 分到 5 分。第一部分设计 4 个问题, 第二部分设计 23 个问题, 共 27 个问题。研究采用问卷星在线填写问卷并采集数据。使用统计程序 SPSS 作为分析框架, 发放问卷回收了 550 份, 除 21 份无效回答外, 共有 529 份用于最终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 样本一般特性检验

从支付宝的样本来看, 男性为 134 人(52.3%), 女性为 122 人(47.4%), 男性比重较高。从年龄段来看, 10 多岁人群占 25 人 (9.8%), 20 多岁人群占 131 人 (51.3%), 30 多岁人群占 51 人 (19.9%), 40 多岁人群占 32 人(12.5%), 50 多岁及以上人群占 17 人(6.6%)。从云闪付的样本来看, 性别为男性 193 名(70.7%), 女性 80 名(29.3%), 男性比重较高。按年龄段来看, 10 多岁是 24 岁, 所占比率为 8.8%, 其后依次为, 20 多岁有 100 人 (36.6%)、30 多岁有 72 人 (26.4%)、40 多岁有 58 人 (21.2%)、50 多岁及以上有 19 人 (7%)。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的一般特性

变量	项目	支付宝		云闪付		变量	项目	支付宝		云闪付	
		频率(名)	比率(%)	频率(名)	比率(%)			频率(名)	比率(%)	频率(名)	比率(%)
性别	女性	122	47.4%	80	29.3%	年龄	10-19	25	9.80%	24	8.8%
	男性	134	52.3%	193	70.7%		20-29	131	51.2%	100	36.6%
	已婚	110	43%	161	59%		30-39	51	19.9%	72	26.4%
	未婚	146	57%	112	41%		40-49	32	12.5%	58	21.2%
	初中及以下	9	3.5%	16	5.9%		50-59	17	6.6%	19	7.0%
学历	高中	69	27%	110	40.3%	移动支付使用经验	0-1 年	23	9%	9	3.3%
	大学	76	29.7%	78	28.6%		2 年	14	5.5%	23	8.4%
	硕士	76	29.7%	48	17.6%		3 年	23	9%	33	12.1%
	博士	26	10.2%	21	7.7%		4 年	17	6.6%	43	15.8%
							5 年	49	19.10%	39	14.3%
							6 年	23	9%	29	10.6%
							7 年	38	14.8%	28	10.3%
							8 年	29	11.3%	27	9.9%
							9 年	21	8.2%	34	12.5%
							10 年	19	7.4%	8	2.9%
		N=256		N= 273							
		(Ali pay)		(Union quick pass)							

(二) 信度、效度分析

根据表 3 的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CMIN/DF (卡方自由度比) =1.246, 在 1-3 范围内, RMSEA (误差均方根) =0.022, 在 <0.05 以下为优秀。另外 IFI、TLI 以及 CFI, 的检验结果均达到了 0.9 以上的优秀水平, 因此综合本次分析结果可以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在量表 CFA 模型具有良好适配度的前提下, 将进一步检验量表各个维度的, 收敛效度 (AVE) 和组合信度 (CR) 检验流程, 通过建立 CFA 模型, 计算出各个检验题项, 在对应维度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然后通过 AVE 和 CR 的计算公式计算出, 各个维度的收敛效度值和组合信度值, 根据标准, AVE 值最低要求达到 0.5, CR 值最低要求达到 0.7, 才能说明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

计算公式: AVE: $(\sum \lambda)^2 / [(\sum \lambda)^2 + \sum \theta]$ (λ 表示因子载荷量、 θ 表示测量误差)

CR: $(\sum \lambda^2) / [(\sum \lambda)^2 + \sum \theta]$ (λ 表示因子载荷量、 θ 表示测量误差)

根据表 4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在本次健康素养量表效度检验中, 各个维度的 AVE 值达到了 0.5 以上, CR 值均达到了 0.7 以上。综合可以说明各个维度均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

表 3 Model fit test

Index	Reference standard	Measured result
CMIN/DF	1-3 为优秀, 3-5 为良好	1.246
RMSEA	<0.05 为优秀, <0.08 为良好	0.022
IFI	>0.9 为优秀, >0.8 为良好	0.994
TLI	>0.9 为优秀, >0.8 为良好	0.993
CFI	>0.9 为优秀, >0.8 为良好	0.994

表 4 自变量各维度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检验

	路径关系		Estimate	AVE	CR
安全性 3	<---	X1	0.824	0.736	0.893
安全性 2	<---	X1	0.802		
安全性 1	<---	X1	0.942		
便利性 4	<---	X2	0.802	0.705	0.905
便利性 3	<---	X2	0.813		
便利性 2	<---	X2	0.808		
便利性 1	<---	X2	0.928	0.724	0.887
经济优惠 3	<---	X3	0.815		
经济优惠 2	<---	X3	0.803		
经济优惠 1	<---	X3	0.929	0.727	0.914
能力 4	<---	M1	0.823		
能力 3	<---	M1	0.815		
能力 2	<---	M1	0.809	0.752	0.900
能力 1	<---	M1	0.955		
正直 3	<---	M2	0.824		
正直 2	<---	M2	0.811	0.701	0.903
正直 1	<---	M2	0.959		
善意 4	<---	M3	0.809		
善意 3	<---	M3	0.804	0.734	0.917
善意 2	<---	M3	0.819		
善意 1	<---	M3	0.913		
使用意愿 4	<---	Y	0.818	0.734	0.917
使用意愿 3	<---	Y	0.838		
使用意愿 2	<---	Y	0.840		
使用意愿 1	<---	Y	0.928		

区别效度检验: 根据表 5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本次区别效度检验中, 各个维度两联之间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均小于维度所对应的 AVE 值的平方根, 说明各个维度之间均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具体如图 2 所示。

表 5 因变量各个维度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X1	X2	X3	M1	M2	M3	Y

X1	0.858						
X2	0.438	0.840					
X3	0.516	0.419	0.851				
M1	0.495	0.439	0.484	0.853			
M2	0.514	0.425	0.529	0.507	0.867		
M3	0.427	0.366	0.408	0.417	0.468	0.838	
Y	0.493	0.425	0.452	0.474	0.487	0.360	0.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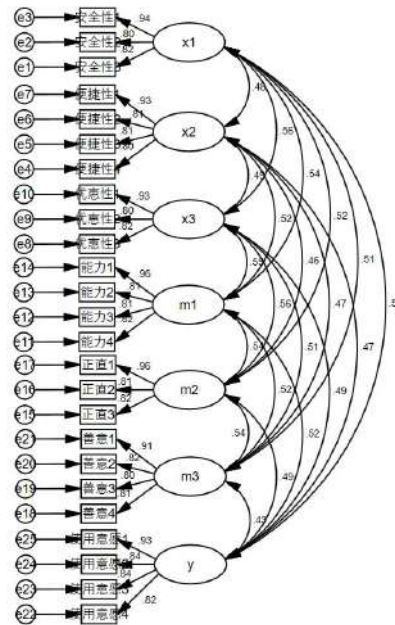


图2 自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图

(四)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在检验假设之前,为了掌握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强度和方向,实施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宋智俊(2009)认为,通常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20-在.40之间,相关性较低,大于.80时,可判定各自对因变量的影响无法区分。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支付宝 相关关系结果

Correlations (支付宝)							
	安全性	简便性	经济优惠	能力	正直性	善意性	使用意愿
安全性	1						
简便性	.610**	1					
经济优惠	.555**	.579**	1				
能力	.532**	.618**	.545**	1			
正直性	.556**	.530**	.500**	.533**	1		
善意性	.464**	.471**	.441**	.535**	.557**	1	
使用意愿	.527**	.532**	.470**	.521**	.557**	.402**	1

表7 云闪付 相关关系结果

Correlations (云闪付)							
	安全性	简便性	经济优惠	能力	正直性	善意性	使用意愿
安全性	1						
简便性	.312**	1					
经济优惠	.480**	.334**	1				

能力	.458**	.330**	.472**	1			
正直性	.368**	.312**	.525**	.483**	1		
善意性	.478**	.388**	.489**	.457**	.462**	1	
使用意愿	.391**	.358**	.409**	.478**	.354**	.376**	1

(五) 假设检验

表 8 支付宝-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Beta	T	p	VIF
Model1	企业信任 (能力)	安全性	.173	2.787	.006	1.766
		简便性	.380	6.007	.000	1.838
		经济优惠	.229	3.800	.000	1.667
Model2	企业信任 (正直性)	安全性	.307	4.692	.000	1.766
		简便性	.229	3.427	.001	1.838
		经济优惠	.197	3.105	.002	1.667
Model3	企业信任 (善意性)	安全性	.221	3.140	.002	1.766
		简便性	.229	3.183	.002	1.838
		经济优惠	.186	2.715	.007	1.667
Model4	使用意愿	能力	.304	4.875	.000	1.579
		正直性	.379	5.987	.000	1.633
		善意性	.029	0.452	.652	1.673
Model5	使用意愿	安全性	.271	4.054	.000	1.766
		简便性	.273	4.013	.000	1.838
		经济优惠	.162	2.491	.013	1.667

表 9 云闪付-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Beta	T	p	VIF
Model1	企业信任 (能力)	安全性	.271	4.615	.000	1.345
		简便性	.148	2.704	.007	1.165
		经济优惠	.268	4.945	.000	1.366
Model2	企业信任 (正直性)	安全性	.124	2.111	.036	1.345
		简便性	.133	2.424	.016	1.165
		经济优惠	.422	7.113	.000	1.366
Model3	企业信任 (善意性)	安全性	.276	4.850	.000	1.345
		简便性	.206	3.896	.000	1.165
		经济优惠	.287	5.006	.000	1.366
Model4	使用意愿	能力	.349	5.589	.000	1.435
		正直性	.108	1.727	.085	1.443
		善意性	.166	2.686	.008	1.399
Model5	使用意愿	安全性	.210	3.449	.001	1.345
		简便性	.213	3.755	.000	1.165
		经济优惠	.237	3.852	.000	1.366

假设检验结果整理

表 10 支付宝和云闪付研究假设结果

H	Path	结果(支付宝)	结果(云闪付)
H1-1	安全性 →	采纳	采纳
H1-2	简便性 → 能力	采纳	采纳
H1-3	经济优惠 →	采纳	采纳
H1-4	安全性 →	采纳	采纳
H1-5	简便性 → 正直性	采纳	采纳
H1-6	经济优惠 →	采纳	采纳
H1-7	安全性 →	采纳	采纳
H1-8	简便性 → 善意性	采纳	采纳
H1-9	经济优惠 →	采纳	采纳
H2-1	能力 →	采纳	采纳
H2-2	正直性 → 使用意愿	采纳	拒绝
H2-3	善意性 →	拒绝	采纳
H3-1	安全性 →	采纳	采纳
H3-2	简便性 → 使用意愿	采纳	采纳
H3-3	经济优惠 →	采纳	采纳
H4	支付宝和云闪付相比较, 支付宝的使用倾向更高	采纳	

两项研究比较后发现了两个不同点。

1. 支付宝的情况是,对移动结算的企业信任的正直性越高,使用意愿就越不会产生正(+)的影响,相反,云闪付的情况是,企业信任的正直性越高,使用意愿就越会产生正(+)的影响。
2. 支付宝的情况是,对移动结算的企业信任的善意性越高,对使用意愿就会产生正(+)的影响,相反云闪付则不会产生影响。

支付宝和云闪付各变量间的差异分析

表 11 支付宝和云闪付各变量间的差异

变量	Mean(SD)		t-value	p-value
	支付宝	云闪付		
安全性	3.87(1.09)	3.69(1.12)	-1.871	0.062*
简便性	3.87(0.99)	3.85(1.00)	-0.298	0.766
经济优惠	3.60(1.01)	3.44(1.08)	-1.814	0.07*
能力	3.93(0.99)	3.84(0.99)	-1.070	0.285
正直性	3.78(1.11)	3.72(1.17)	-0.529	0.597
善意性	3.97(0.93)	3.82(0.86)	-1.937	0.053*
使用意愿	3.81(1.07)	3.33(1.04)	-5.269	0.000***

*: $p < .05$, **: $p < .01$, ***: $p < .001$

结果如表 4-20 所示,在 90%显著水平下,安全性 ($t=-1.871$, $p=0.062$, $p<0.01$),经济效益 ($t=-1.814$, $p=0.07$),在善意性 ($t=-1.937$, $p=0.053$) 上,支付宝和云闪付用户之间差异显著,在 99%显著水平下,支付宝和云闪付用户之间差异极显著 ($t=-5.269$), $p=0.000$),用户之间差异显著。

调查显示, t 值为 -的原因可以认为,消费者比起云闪付,支付宝选择的使用倾向更大。

1. 从有差异的变数来看,支付宝用户对移动结算特性的安全性平均值为 3.87,云闪付的为 3.69。因为均值更高,所以支付宝用户在体验移动支付时更加安全。支付宝用户对移动支付特性的经济优惠的平均值为 3.60,云闪付高于 3.44 的经济优惠,因此支付宝用户在体验移动支付时会有更好的优惠。

2. 支付宝用户对企业信赖的好感性平均值为 3.97,云闪付比 3.82 的善意性高,因此判断用户对支付宝更好。

3.支付宝使用意图的偏差值为 3.81,云闪付比 3.33 的使用意愿高,因此判断用户使用支付宝的倾向更大。

六、结论

(一) 研究结果摘要

本研究使用由移动支付特性、企业信任、使用意愿和人口统计特征组成的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现将假设分析结果归纳如下。

第一,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导出了安全性、简便性、经济实惠等 3 个因素,验证了这些移动结算特性因素对企业信赖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移动支付特性中的安全性、简便性、经济实惠对企业信任子因素的能力、正直性、好感性向正(+)的方向产生了影响。这意味着在移动支付特性中,对安全性、简便性、经济效益的感知水平越高,企业的信赖度就越高;因此,假设 1 被采纳。

第二,验证支付宝的企业信赖对使用意图的影响关系的结果显示,企业信任子因素的能力、正直性对使用意愿产生了正(+)的方向影响。这意味着企业信任中对能力、正直性的感知水平越高,使用度就越高。另一方面,仅善意性对使用意图没有显著影响。云闪付的情况是,对企业信任对使用意愿的影响关系进行验证的结果显示,企业信赖的子变量能力、善意性对使用意图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这意味着企业信任中对能力、善意性的感知水平越高,使用意愿就越高。另一方面,表明只有正直性对使用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 3 被部分采用。

第三,验证移动支付特性对使用意愿的影响关系的结果显示,移动支付特性的子因素安全性、简便性、经济实惠对使用意愿产生了正(+)方向的影响。移动支付特性中对安全性、简便性、经济实惠的感知水平越高,使用意愿会变高。因此,假设 3 被采纳。

(二) 研究启示

首先,在支付宝数据中,除了企业信任的子因素—正直性不影响使用意愿外,都出现了积极的影响。云闪付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信任的子因素除因善意而对使用意愿无正面影响外,其余均具有正面影响。因此支付宝和银联都需要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其次,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用户对云闪付和支付宝的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安全性、经济优惠、可接受性在 90%显著水平上存在差异。

云闪付在短时间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研究表明,消费者仍倾向于使用支付宝。银行圈综合移动结算、移动支付便利项目、中国银联企业背景是云闪付的主要亮点,云闪付的发展也存在很多困难。因此,除了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外,更重要的是针对定位对象,完善银联快捷支付,拓展合作商和应用领域,同时整合自身资源优势,创新移动支付产品,推出具有银联快件支付特色的个性化业务。银联要主动接受新变化,顺应创新趋势,积极运用新技术,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创新产品,提升客户应用体验。只有积极开拓新的移动支付场景,创造新的收益增长点,才能在不断变化中获得新的发展优势。

(三) 研究的局限点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模型的一些假设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获得的。用户在回答问题时需要回忆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因此问卷的答案与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存在一定的偏差,可能对后续的分析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可以将调查方法与其他方法相结合,如访谈,进一步收集数据,保证数据质量。

其次,消费者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环境、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本研究特别考察了移动支付系统特征和企业信任对消费者使用行为的影响。此外,外部因素,如制度、文化和社会影响,虽然没有纳入模型,但由于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应在实践中予以考虑。第三,本研究的对象群体并不以大学生和年轻上班族为主。目前,包括中老年人在内的移动支付用户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因此,样本数据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第三方移动支付用户。结果可能不能完全捕捉到所有用户的想法和行为,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尽管上面提到了许多缺点,但本研究增强了对影响消费者采用移动支付意愿的决定因素的理解,并深入研究了移动支付行业的运作复杂性。

最后,未来应该增加额外的理论视角,如感知风险或用户体验,以扩大研究。样本来源具有同质性特征,研究群体主要集中在年轻受访者中。未来可以通过扩大样本范围,包括线下问卷调查或深度访谈,特别是增加中老年参与者的比例来提高代表性。

参考文献:

- [1] 노승훈, 권태경. (2014). 국내 모바일 환경 간편 결제 서비스에 대한 비교 연구. 한국경영정보학회 추계학술대회, 695-698
- [2] 디엠씨 미디어(DMC Media). (2015). 모바일 간편 결제 서비스 이용 실태.
- [3] 임병하, 김동현. (2015). 모바일 인터넷 서비스의 고객만족도에 관한 연구. 한국인터넷전자상거래학회, 131-156.
- [4] 정명문, 이해진, 박소현, 성민정, 박윤하, 윤재영. (2018). 모바일 간편결제시스템 보안결제 UI의 유형별 인식 비교분석. 커뮤니케이션디자인학연구, 63(0), pp.75-88
- [5] 정보통신정책연구원. (2016). 핀테크의 발전 배경과 주요 동향, 한국통신학회
- [6] 송지준(2011). 논문작성에 필요한 SPSS/AMOS 통계분석방법, 서울 : 21 세 기 사.
- [7]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移动支付的发展[J]. 中国人民银行廊坊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孙军红. 河北金融. 2021(01)
- [8] 疫情视角下的移动支付: 市场机遇与潜在挑战[J].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王越. 西部金融 2020 (10)
- [9] Ajzen I, Fishbein M.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 1980.
- [10] Bohle K, Krueger M. Payment Culture Matters a comparative EU-US Perspective on Internet Payments(Background No.4) [D].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s Observatory (EPSO), 2001.
- [11] Butler, J. K.(1991). Toward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conditions of trust: Evolution of a conditions of trust inventory.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 643-663.
- [12] DAVIS F.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 (J.management science, 2000, Vol.22(2), PP: 186-204.
- [13] Fishbein M,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J]. Boston: Addison-Wesley, MA, 1975.
- [14] GEFEN D. The role of familiarity and trus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0, 28(6): 725-737.
- [15] GEFEN D, STRAUB D W. Consumer trust in B2C E-commer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presence: Experiments E-Products and E-service [J]. Omeg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4, Vol8(1), PP: 1-18.
- [16] GEFEN D, KARAHARMA E, STRAUB D W. Trust and tam in online shopping: an integrated model [J]. Mis Quarterly, 2003, Vol27(1), PP: 51-90.
- [17] GEFEN D. E-commerce: the role of familiarity and trust [J]. Omeg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0, Vol,28(2), PP: 725-737.
- [18] Kim C, Tao W, Shin N,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customers' perceptions of security and trust in e-payment systems[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 Applications, 2010, 9(1):84-95.
- [19] Li-Ya Yan, Garry Wei-Han Tan, Xiu-Ming Loh, Jun-Jie Hew, Keng-Boon Ooi(2021). QR code and mobile payment: The disruptive forces in retail.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21-01, Vol.58, p.102300-102300
- [20] McKnight D H, Chervany N L. Conceptualizing Trust: A Typology and E-Commerce Customer Relationships Model [C].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2001.
- [21] McKnight D H, Choudhury V. Kacmar C.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Trust Measures for E-Commerce : An Integrative Typology[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2, 13(3).
- [22] MAYER, JH DAVIS, F.D .SEHOORMAN.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I].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Vol.24(3), PP: 709-734.
- [23] Mayer R C. Davis J H. Schoorman F D. An Integratio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3).
- [24] Nunnally.(1978). Psychometric Theory[M]. New York: McGraw-Hill.
- [25]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A., and Malhotra, A. (2005). E-S- 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assessing electronicservice quality. Journal of Retailing 7, 3, 213-233.
- [26] Rice, R. E., Grand, A. E., Schmitz, J., and Torobin J. (1990). Individual and Network Influences on the Adoption and Perceived Outcomes of Electronic Messaging. Social Networks 12, 1, 27-55.

- [27] Statista. 'FinTech Report 2021 –Digital Payments. Statista 前瞻产业研究院.
- [28] SUH B, HAN I. Effect of trust on customer acceptance of Internet banking [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02, 1(3/4): 247-263.
- [29] Xu G, Gutiérrez J A.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Killer Applications and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in M-Commerce[J].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 Organizations, 2006, 4(3):63-79.
- [30] Xu H, Luo X, Carroll J M, et al. The personalization privacy paradox: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for location-aware marketing 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1, 51(1):42-52.

The Influence of Mobile Payment Characteristics on Enterprise Trust and Usage Inten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lipay and UnionPay QuickPass

Yu Chen¹, Hui yuan Zhang²

¹ Yu Chen,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hui, China*

² Huiyuan Zhang, *Su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iangsu, China*

Abstract: Mobile payment is favored by consumers due to its convenient payment experience and h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daily lif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era, social distancing has become a daily habit and a web-based, consumer-le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his study adopts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implement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results. UnionPay Quick Pass has achieved certain development resul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research shows that consumers still tend to use Alipay.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increasing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efforts, 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China Union Pay to improve Union Pay payment, expand partners and application fields, integrate its own resource advantages, innovate mobile payment products, and launch personalized services with UnionPay Quick Pass payment features. Union pay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ccept new changes, adapt to the trend of innovation, actively use new technologies,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actively innovate products, and enhance customer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nly by actively exploring new mobile payment scenarios and creating new revenue growth points can we gain new development advantages in the constant changes.

Keywords: Mobile payment characteristics; Enterprise trust; Intention to us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51

青年“躺平”现象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再定位

陈 楠¹

(¹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 青年“躺平”现象日益凸显, 成为影响青年价值观塑造的重要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竞争加剧、阶层固化与经济压力增大, 部分青年通过降低生活期望、拒绝过度竞争等方式应对结构性困境, 这一现象反映了传统成功观与现实能力的矛盾, 以及青年对个体价值实现路径的重新思考。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客体认知模式面临挑战, 需适应青年主体性增强、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需求。“躺平”本质是青年在高压环境下的心理调适与社会抗争策略, 其对青年成长路径的双向影响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紧迫性。通过分析“躺平”现象, 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促进青年健康成长与社会发展协同。

关键词: 躺平现象; 青年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 客体认知; 结构性困境

一、引言

近年来, “躺平”一词在中国青年群体中迅速流行, 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躺平”作为一种新兴的青年亚文化现象, 反映了当代青年在面对社会压力时所采取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应对策略。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 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青年担当历史使命, 也承载民族梦想, 在时代脉搏之中, 青年思想是青年精神面貌的风向标。因此, 研究青年“躺平”现象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关系, 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此背景, 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年“躺平”现象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之间的关系, 分析“躺平”现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影响, 并提出基于“躺平”现象的客体认知再定位策略。试图站在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更好地理解 and 应对青年“躺平”现象,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二、青年“躺平”现象的多维度解析

(一) “躺平”概念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躺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生活态度, 其概念内涵随着社会讨论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躺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态度, 其内涵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演变。从词源学角度看, “躺平”一词最初只是描述一种身体姿态, 即身体平躺、放松休息的状态。

从历史发展来看, “躺平”一词最初源于网络社区的讨论, 随后迅速在青年群体中传播并引起广泛共鸣。李英华 (2021) 在研究青年亚文化流行语时指出, “躺平”作为一种网络流行语, 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 反映了这一概念与当代青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需求的高度契合^[1]。“躺平”从最初的个人生活选择, 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观表达, 成为青年群体对主流成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思和质疑。

然而, 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和网络传播的推动, 这一词汇逐渐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高山和吴金煌 (2022) 将“躺平”定义为青年群体主动选择降低生活期望值, 拒绝社会竞争压力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这一定义强调了“躺平”的主动选择性和对主流竞争文化的抵抗性^[2]。林龙飞和高延雷 (2021) 则从社会学角度将“躺平”解读为青年对当前社会结构性困境的一种应对策略, 认为“躺平”既是一种生活态度, 也

是一种社会抗议的表达方式^[3]。

杨宜音和牧石玲(2021)通过对大学生“躺平”心态的剖析发现,高强度竞争环境下的心理压力积累是导致青年选择“躺平”的重要因素^[4]。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中,青年群体容易产生心理疲惫和价值迷失,而“躺平”则成为缓解压力、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此外,李英华(2021)指出,“躺平”现象也反映了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个人实现能力之间的矛盾^[1]。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中,青年群体一方面受到物质成功标准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又面临实现这些标准的现实困难,这种矛盾心理促使部分青年通过“躺平”来重新定义个人成功与幸福的标准,进而选择“躺平”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二)青年群体中的“躺平”表现形式及成因探讨

“躺平”现象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领域的青年群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

肖翔尹(2022)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躺平”主要表现为学业上的消极应对,如逃避课业挑战、满足于及格线,这种现象是对高压教育环境和就业不确定性的反应,折射出对教育体系的质疑^[5]。

杨宜音和牧石玲(2021)进一步将大学生“躺平”细分为学业躺平(学习动力丧失)、就业躺平(降低竞争预期)和生活躺平(简化社交),揭示了该现象的复杂性及不同群体的心理调适策略^[4]。

职场青年的“躺平”则体现为工作态度的消极转变。高山和吴金煌(2022)指出,这一群体拒绝加班、不追求晋升,通过最低限度完成任务表达对工作压力过大、付出与回报失衡的反抗,实质是对职场文化的消极抵抗^[2]。

“躺平”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社会“内卷”加剧是重要诱因。“内卷”一词现指非理性内部竞争,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特征。林龙飞和高延雷(2021)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就业市场竞争加剧是核心因素^[3]。高等教育扩张使青年教育期望提升,但就业岗位增长滞后导致供需失衡,大量高学历者面临职业发展瓶颈,部分青年选择“躺平”以缓解压力。

其次,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强化了青年的消极选择。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强化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流动幅度减弱、贫富差距扩大,使得青年感到难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这种结构性困境削弱了奋斗动力,促使部分群体主动选择低压生活。

再者,经济发展放缓与就业压力增大构成另一关键因素。高山和吴金煌(2022)强调,房价高企与生活成本上升导致青年面临“买房无望”的现实困境^[2]。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房价收入比超过30:1,传统通过工作积累财富的路径受阻,使部分青年质疑奋斗意义,转而追求简单生活。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158万人,就业市场供需矛盾持续加剧,进一步加剧了青年群体的生存焦虑。

最后,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放大了“躺平”现象。社交媒体对“内卷”“996”等话题的讨论,以及成功叙事的过度渲染,加剧了青年的焦虑感。杨宜音、牧石玲(2021)从心理学视角指出,高强度工作模式挤压个人生活空间,导致身心健康问题^[4]。在“996”工作制普遍存在的行业中,青年为保护自身权益选择“躺平”,实质是对过度剥削劳动的消极抵抗。

综上,“躺平”现象是教育资源失衡、阶层固化、经济压力与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本质反映的是青年群体在结构性困境下的生存策略选择,而非单纯的价值观转变。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躺平”现象反映了当代青年在面对社会压力时的一种心理调适机制,这种心态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竞争压力与个人能力不匹配产生的挫折感是青年选择“躺平”的重要心理动机。当青年感到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无法满足社会竞争的要求时,容易产生挫折感和无力感,进而选择退出竞争,降低自我期望,以减轻心理压力。这种心理机制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习得性无助”,即个体在多次尝试后发现无法改变不利处境,便放弃努力,接受现状。

第二,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和焦虑也是促使青年“躺平”的重要心理因素。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青年对未来的职业发展、生活状况等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容易引发焦虑和恐惧。为了减轻这种焦虑,一些青年选择降低期望值,追求当下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表现为“躺平”行为。

第三,社会期望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冲突也是青年选择“躺平”的心理动因。社会对青年的期望往往包括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社会贡献等多个方面,而这些期望可能与青年自身的兴趣、能力和价值观不符。当青年感到无法同时满足社会期望和个人理想时,可能选择退出这种角色冲突,通过“躺平”来减轻心理压力。

第四,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的负面情绪共振也是促使青年“躺平”的心理因素。社交媒体上关于“内卷”、“996”等话题的广泛讨论,以及对成功人士光鲜生活的展示,都可能加剧青年的焦虑感和挫折感。同时,社交媒体也为持有类似心态的青年提供了交流平台,形成情绪共振,使得“躺平”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心理防御机制。

总体而言,“躺平”现象在青年群体中的表现形式呈现差异化,其成因涉及多个方面。青年通过“躺平”应对社会竞争与个人能力的不匹配、未来不确定性及社会期望与个人价值的冲突,本质是结构性困境下的适应性选择,而非价值观根本转变。社会对青年“躺平”现象应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转向更加理性的分析和多元化的引导。

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传统认知框架

(一) 思想政治教育中客体角色的历史演变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变迁。

在原始社会阶段,教育主要以生产劳动技能和生活经验的传授为主,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体现在部落规范和宗教禁忌的传承上。这一阶段的客体认知模式是简单而直接的,教育对象被视为被动接受的容器,教育内容通过模仿和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递。这种客体认知模式强调服从和遵循,缺乏对客体主体性的认识和尊重。

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统治阶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维护其统治地位,教育内容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一阶段的客体认知模式是工具性的,教育对象被视为统治的工具和对象,教育目的是使其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这种客体认知模式强调灌输和控制,客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被严重忽视。叶方兴和孙宁(2020)指出,早期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强调传统价值观念的传承和延续^[6]。孙佩锋和尉天骄(2019)指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模式主要将教育对象视为被动接受者,强调教育者的权威性和教育内容的灌输性^[7]。在这一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作为一种单向的知识传递和价值灌输过程,客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未得到充分重视。

进入近现代社会,随着民主思想的兴起和教育理念的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认知模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教育对象不再仅仅被视为被动接受的容器或统治的工具,而是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个体。教育目的不再仅仅是维护统治,而是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公民。这一阶段的客体认知模式开始注重客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教育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在赵敏凯和王亚萍(2020)看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模式开始将教育对象视为主动参与者,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互动性和对话性^[8]。这一转变反映了教育理念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客体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得到了更多关注和尊重。蔡诗敏(2021)进一步提出,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模式将教育对象视为共同建构者,强调教育过程中的平等性和协商,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作为一种主客体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客体不仅是教育内容的接受者,也是教育过程的创造者和教育意义的生产者^[9]。

客体认知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赵敏凯和王亚萍(2020)指出,不同历史阶段客体认知的变化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适应与回应^[8]。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理念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呈现出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从接受到创造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既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和完善,也反映了教育实践中对客体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日益重视。

(二)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下客体认知的基本理论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下,关于客体认知的主流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主客体二元论、主客体一体论和主客体互动论三种视角。

赵敏凯和王亚萍(2020)详细分析了主客体二元论的基本观点,指出这一理论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区分与联系^[8]。在这一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作为一种由主体(教育者)对客体(受教育者)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明确的角色区分和功能差异。蔡诗敏(2021)则重点探讨了主客体一体论的理论内涵,认为这一理论强调教育过程中的相互转化与统一^[9]。在这一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作为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也是学习者,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在影响和塑造教育者。主客体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整体关系。杨静(2019)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时,提出了主客体互动论的观点,强调教育过程中的双向互动与共同发展^[10]。在这一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作为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过程,教育效果取决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质量和互动深度。主客体互动论既承认主客体之间的区别,又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为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三种理论观点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反映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赵敏凯和王亚萍(2020)认为这些理论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共同构成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理论框架^[8]。在实际教育工作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些理论观点,避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理论中,客体的主体性、选择性和反作用性被视为核心要素,也是评价客体认知质量的重要标准。蔡诗敏(2021)强调,客体的主体性是指客体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表现为客体对教育内容的主动接受、理解和内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9]。客体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

这些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基本框架,也为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提供了重要标准。

（三）青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独特性

青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身心发展规律、社会角色定位以及时代环境影响的多重交织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青年作为社会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其思想观念处于动态建构阶段，具有显著的可塑性和开放性。青年处于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关键阶段，价值观、政治认同与道德判断尚未定型，对社会现象的感知兼具敏感性与批判性。这种未稳固的特性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塑造期”，但要求教育者以科学认知规律为依据，通过引导而非强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化。杨静（2019）指出，当代青年的思维方式呈现创新化与批判性特征，他们倾向于通过独立思考形成观点，而非被动接受结论^[10]。这种思维特点挑战了传统灌输式教育，要求转向启发式、探究式方法，以适应青年的认知需求。

第二，青年群体的主体性特征与客体性地位呈现辩证统一关系。青年既是教育内容的接受者与实践者，又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意识——通过批判性思考对教育内容进行选择性吸收。这种主客体互动性要求教育者摒弃单向灌输，构建平等对话场域，激发青年的参与意识与责任认知，实现教育内容的内化与外化。李英华（2021）研究发现，青年行为方式呈现个性化特征，追求自我表达与实现，对标准化、模式化教育存在抵触^[1]。这要求教育者尊重个体差异，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尤其需关注青年借助新媒体技术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主动性，实现教育过程的双向建构。

第三，时代语境下的青年客体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与时代性特征。全球化、信息化与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使青年面临文化冲突与价值选择的复杂情境。贾兆帅（2022）指出，当代青年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特征，既认同传统价值，又接纳新兴思潮，形成个性化、多样化的价值取向^[11]。这种矛盾性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整合资源，也带来引导挑战。教育者需在尊重青年亚文化、理解其价值诉求的基础上，创新教育载体与话语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接受的实践逻辑。

这些特点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青年的独特性不仅源于其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源于社会转型与技术变革对其认知方式、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思想政治教育需以发展性、主体性与时代性为逻辑起点，构建契合青年成长规律的教育范式。

四、“躺平”现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影响

赵敏凯和王亚萍（2020）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多维审视》中强调，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引导对于青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8]。

（一）“躺平”现象对青年价值观塑造的影响

“躺平”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价值取向的多维度变化。李英华（2021）研究发现，“躺平”现象反映了青年价值取向从物质成功转向精神满足的趋势。传统的成功观往往强调物质财富、社会地位和职业成就，而“躺平”青年则更加注重心理健康、生活品质和自我实现，体现了对成功标准的重新定义和价值追求的转变^[1]。

首先，青年价值取向呈现从奋斗向安逸的转变。传统的奋斗精神强调通过努力工作和不懈追求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躺平”心态则倾向于追求低压力、低竞争的生活方式，强调个人舒适和心理平衡。

其次，青年价值取向呈现从集体向个人的转变。传统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而“躺平”现象则反映了青年价值观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更加注重个人感受和体验，对集体责任和社会义务的认同感降低。这种转变使得青年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对社会价值的追求相对减弱。林龙飞和高延雷（2021）指出，“躺平青年”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困境，他们选择“躺平”是对激烈社会竞争的一种回避策略，这种策略反映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上升^[3]。

再者，青年价值取向呈现从长远向短期的转变。传统价值观强调长远规划和持续努力，而“躺平”心态则更加注重当下的生活体验和即时满足，对长远规划和未来发展的关注度降低。这种短期化的价值取向可能导致青年在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时缺乏长远考虑，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最后，青年价值取向呈现从竞争向回避的转变。传统价值观鼓励积极参与竞争，通过竞争提高能力和实现价值，而“躺平”心态则倾向于回避竞争，选择低竞争压力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种从积极参与竞争向消极回避竞争的转变，可能导致青年创新能力和竞争意识的弱化。

综合看来，“躺平”现象对青年个人成长路径的影响是双面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杨宜音和牧石玲（2021）指出，“躺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青年减轻心理压力，为自我反思和调整提供空间^[4]。这种自我反思过程有助于青年形成更加真实、自主的人生规划，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然而，高山和吴金煌（2022）也警示了“躺平”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长期的“躺平”状态可能导致青年丧失挑战自我、突破困境的勇气和能力，错过重要的成长和发展机会，加剧个人与社会的脱节^[12]。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面临的调整需求

面对“躺平”现象，思想政治教育需调整创新以适应青年新特点和需求。杨静（2019）指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注重引导青年建立健康的成功观与幸福观，帮助他们摆脱单一的物质成功评价体系^[10]。教育内容应当拓展成功和幸福的内涵和标准，强调精神追求、人际关系、社会贡献等多维度的价值，引导青年形成更

加全面、平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首先,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结合实际增强亲和力。其次,注重心理健康教育,结合心理学知识帮助青年应对压力、调适心态,增强心理韧性,建立积极心理状态。再者,融入职业发展教育,提供全面的职业指导服务,帮助青年了解社会需求与职业趋势,提高职业规划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同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成才观。最后,强化社会责任教育,让青年认识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

在教育方式上,需进行相应创新。利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技术,如开设网络课程、建立交流平台等,使思想政治教育更贴近青年生活。采用互动式教育方式,鼓励青年主动参与,通过讨论、角色扮演等形式增强教育效果。蔡诗敏(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过程主客体新论》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需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交流和对话^[9]。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难以适应当代青年的特点和需求,需要建立更加平等、开放的教育关系,通过互动交流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些调整需求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青年实际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和青年特点不断调整和创新,才能保持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在“躺平”现象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调整既是对青年需求的回应,也是对教育本身的创新和发展。

(三) 基于“躺平”现象的客体认知再定位策略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躺平”现象反映了年轻人面对激烈竞争和社会压力时的一种心理调适方式。为了有效应对这一现象,思想政治教育需对“躺平”青年的认知进行重新定位。

第一,强化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引导。高山和吴金煌(2022)指出,需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与劳动实践观,通过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和革命精神弘扬,激发责任感与使命感^[2]。杨宜音和牧石玲(2024)的研究强调,青年“躺平”心态涉及个体发展动力的自主性与方向性缺失,教育需同时培养其自主性并帮助明确发展方向,避免消极选择^[4]。

第二,深化社会实践与体验教育。赵敏凯和王亚苹(2025)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社会实践增强青年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参与中感受价值实现,摆脱消极态度^[8]。高山和吴金煌(2022)补充到,需利用网络平台把握青年思想动态,加强舆论引导,扭转“躺平”带来的消极倾向^[2]。

第三,实施个性化支持与关怀。林龙飞和高延雷(2021)指出,“躺平”青年普遍存在职业规划模糊与目标缺失问题,教育者需关注个体差异:对学习能力强群体增加挑战性任务,对能力较弱者提供阶梯式支持,同时通过家校合作缓解焦虑情绪,重建自信心^[3]。

第四,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与制度保障。高山和吴金煌(2022)强调,解决“躺平”需从社会结构入手,通过法治手段完善劳动制度,确保劳资关系透明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为青年提供创新展示平台^[2]。制度层面需调整利益分配机制,避免阶层固化,拓展青年发展空间。

综上,应对“躺平”现象需系统性策略:以理想信念为引领,社会实践为载体,个性化支持为手段,公平制度为保障,方能引导青年回归积极价值追求,成为新时代建设者。

五、结论

“躺平”现象作为当代青年对社会结构性压力的一种反应,其背后隐藏着青年人在面对复杂社会环境时的价值观重构与心理调适过程。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青年们面临着来自工作、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不仅对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构成了威胁,更深刻影响了他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和追求。因此,“躺平”不仅仅是个体对高压生活方式的暂时逃避,更是对传统成功观念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思与拒绝。

思想政治教育在此背景下,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以应对这种新情况。为促进其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教育工作者必须突破传统客体认知模式,转向尊重青年主体性、回应现实需求、创新教育方式,帮助青年更好地认识自我价值,激发内在动力,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英华.青年亚文化流行语的观察及审思[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5,78(01):80-88.
- [2] 高山,吴金煌.青年“躺平”现象的样态透析与应对之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0):25-28.
- [3] 林龙飞,高延雷.“躺平青年”:一个结构性困境的解释[J].中国青年研究,2021,(10):78-84.
- [4] 杨宜音,牧石玲.大学生“躺平”心态剖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06):109-117.
- [5] 肖翔尹,徐佳琪.情境策略:微观互动中当代大学生“躺平”实践的差异化呈现[J].中国青年研究,2025,(03):111-118+10.
- [6] 叶方兴,孙宁.唯物史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7):30-36.
- [7] 孙佩锋,尉天骄.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兼谈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J].学术论坛,2011,34(10):26-29.
- [8] 赵敏凯,王亚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多维审视[J].昌吉学院学报,2025,(01):94-99.
- [9] 蔡诗敏.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过程主客体新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9):30-33.
- [10] 杨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审视——评《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J].科技管理研究,2023,43(15):255.

[11] 贾兆帅. 数字青年: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新表征透视[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03):66-77.

The phenomenon of youth ‘lying flat’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object percep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en Na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During China's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the phenomenon of youth ‘lying fla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phenomenon affecting the shaping of youth values.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mpetition, class solidification and economic pressure, some young people cope with the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by lowering their expectations of life and refusing excessive competition, which 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uccess and the reality of ability, as well as the youth's rethinking of the path of individual value realisation.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object cognitive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facing challenges, and needs to adapt to the real needs of youth's increased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fied values. The essence of ‘lying flat’ is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social resistance strategy of young people in high-pressure environment, and its two-way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path of young people highlights the urg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By analysing the phenomenon of ‘lying flat’, we can enhance the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healthy growth of you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lying flat phenomenon; youth valu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 perception; structural dilemma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53

地域非遗视觉符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以黑龙江赫哲族图腾纹样为例

曹宇欣¹ 夏振宇² 李奇*

(¹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本文将黑龙江省赫哲族图腾图案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 主要围绕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觉符号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进行研究。结合赫哲族图腾图案类型、造型特征、文化内涵, 研究赫哲族图腾图案在现代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和价值。研究表明将赫哲族图腾图案融入到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 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赫哲族文化, 还能够为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提高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因此, 为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觉符号在文化创意设计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非遗视觉符号; 赫哲族; 图腾纹样; 文创产品设计

一、引言

作为民族文化瑰宝,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特定群体的历史记忆和生活方式, 其中, 独具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的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觉符号, 成为设计文化创意产品的重要资源。将有利于非遗传承、有利于提升产品文化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觉符号融入文化创意设计, 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赫哲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 居住在东北边陲, 世代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生息繁衍, 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先秦^[1]。先秦时称‘肃慎’、‘稷慎’, 汉魏时称‘挹娄’, 南北朝时称‘勿吉’, 隋唐时称‘靺鞨’、辽金时称‘女真’, 元时称‘兀的哥或水达达、硕达勒达’, 明清时称‘女直、女真’^[2]。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反映自然、神灵、祖先崇拜的图腾图案, 以及独特的审美和生活智慧, 是其文化的重要视觉符号。然而,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赫哲族图腾图案面临着传承人减少、传统技艺流失等困境。因此, 探索将赫哲族图腾图案运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 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激活, 也为区域文化资源的当代表达和产业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本研究旨在深入挖掘赫哲族图腾纹样的文化内涵和视觉特征, 探索其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和策略, 通过实际设计实践, 验证将赫哲族图腾纹样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为地域非遗视觉符号在文创设计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赫哲族图腾纹样的文化解读与视觉特征分析

(一) 赫哲族简介与图腾文化背景

赫哲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同江市、饶河县、抚远市等地, 是我国北方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之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民族, 赫哲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图腾文化。图腾崇拜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资金项目《数字化艺术作品数据库与版权平台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3-KYYWF-1637); 2024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一般项目“寒地说唱类非遗的视觉化商业传播应用--以赫哲族伊玛堪为例”, (项目编号: S202410212107S)。

作者简介: 曹宇欣(2002—), 女,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遗传播、数字艺术设计;
夏振宇(2001—),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通讯作者: 李奇(1980—),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在赫哲族社会中承载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生命和宇宙的理解和尊敬^[3]。赫哲族人民普遍认为,自然界中的某些动植物或自然现象拥有神秘力量,并与本民族存在特殊的血缘或精神联系,因而将其奉为图腾,给予崇敬与祭祀。这些图腾不仅承载着赫哲族的精神信仰,也成为其族群身份的重要象征,在日常生活与仪式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赫哲族自古信仰“万物有灵论”,而这种自然观在民族说唱史诗《伊玛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阔力”、“爱新达乌”、“库玛卡”等具有神力的动物形象经常出现在史诗中,被视为神的化身或图腾符号。如《安徒莫日根》中,一群“阔力”飞向空中,潜入水中营救“木初坤”设计的溺水“莫日根”,形象地反映了赫哲族图腾信仰对动物神力的依赖与敬畏。这些人物不仅丰富了赫哲族的神话体系,也成为图腾文化和视觉符号的重要来源。

(二) 常见图腾图案的象征意义

赫哲族自古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经的三江平原,那里江河密布,崇山峻岭,森林茂盛。在这片林海和峻岭中栖息着各种珍禽异兽,尤其以熊、老虎、鹰、鱼、鹿为居多,因此赫哲族先民认为其祖先与这些动植物或无生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形成图腾亲属观念和图腾祖先观念、图腾神灵观念等^[4]。

鱼纹是和渔猎生活密切相关的图腾纹样中最常见的一种,鱼是赫哲族重要的食源,在其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鱼纹象征着丰收、富贵、吉祥。赫哲族鱼纹造型多样,有的鱼纹线条简洁流畅,强调鱼的形态特征;有的鱼纹则夸张变形,融入了更多的装饰元素。鱼纹也寓意着赫哲族生命顽强的特点。

赫哲族世代于三江流域繁衍生息,熊作为其独特的图腾,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赫哲族的认知里,熊乃是他们的始祖,这一观念在《熊的后裔》这一传说故事中得以生动呈现,故事围绕人熊成婚这一极具民族特性的主题展开。满都呼教授在《阿尔泰语系民族熊传说的文化内涵》一文中肯定脚尔泰语系诸民族,如蒙古族、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赫哲族等民族都曾有过熊图腾崇拜,遗存至今的很多关于祭熊的习俗仪式等都是最好的反映^[5]。

赫哲族先民在与大自然紧密依存的岁月里,为满足生存的觅食需求,频繁接触到各类动物。其中,那些体型庞大、性情勇猛的动物,因其强大力量和神秘特性,激发了先民们心底的敬畏之情。这种敬畏在漫长时光中逐渐沉淀,使得先民们将这些动物视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甚至尊为始祖的象征。比如,他们把老虎神称作“山神爷”和“老把头”,饱含着尊崇与信仰,以此表达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深深敬意,这一称呼也成为赫哲族独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老虎的崇拜延伸到其纹路中,演化至图腾图案,希望老虎能护佑氏族和猎物的丰收。鱼纹也寓意着赫哲族勇猛无畏的特点。

太阳纹也是赫哲族图腾纹样中的重要元素,而太阳是自然界中光明和温暖的象征,赫哲族人民对太阳充满敬畏和崇拜,太阳纹通常表现为圆形,周围环绕着光芒四射的线条,寓意太阳的照耀和庇护。在赫哲族的观念中,太阳纹也代表着希望和生机,象征着生命的美好与快乐。

鸟羽图案在赫哲族图腾图案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赫哲族传说神鸟是一种有魔力的鸟,能帮助人们克服困难,满足愿望。鸟羽图案通常有大翅膀、锐利的爪子、亮眼睛等特性,显示出神鸟的高贵神秘。鸟羽图案象征着力量、勇气、智慧,是赫哲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

(三) 图腾纹样的视觉语言特征

赫哲族图腾图案在图形语言上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点,以自然图像为图形基础,对图形进行图形化、抽象化、变形、夸张等处理,使之简洁、生动、具有装饰性。例如赫哲族的鱼纹,为了突出鱼的主要特征,如鱼体的曲线、鳍的形状等,而省略一些细节,使鱼纹更加简洁、容易识别。

赫哲族图腾图案讲究对称与平衡,多以对称的方式构成,给人以稳重、庄重的视觉感受,有些以平衡的方式构成。通过对图形元素大小位置的巧妙安排,即使在不断变化,也保证了图形的平衡。赫哲族图腾图案运用了重复、连续等构图方式,增加了图形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赫哲族图腾图案色彩多用黑、白、红三种,黑色为神秘、庄严、威严的象征;白色为纯洁、善良、美丽的象征;红色为热情、吉祥、喜庆的象征。三种色彩搭配使用,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实际运用中,应当依据场合的性质、氛围要求以及具体需求,精准选定与之适配的色彩组合,并合理调配各色彩间的占比。

(四) 非遗价值与传承困境

赫哲族图腾图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它们反映了

赫哲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研究赫哲族历史文化生态观的重要资料。但随着社会变迁和渔猎文化的衰落，图腾信仰逐渐弱化，传承基础薄弱。同时，传承保护机制的缺失和人才缺口加剧了技能流失的风险，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使其面临同质化和异化的挑战，因此有必要通过创新路径实现传承和现代转型。

三、地域非遗视觉符号在文创产品中的设计策略

（一）视觉符号转译方法

抽象就是视知觉发挥相似性融合功能、视觉思维实现相似性突显功能，通过生成感性意象或意象图式以呈现视觉隐喻的能力，它不仅是思维的属性，也是艺术创造活动、艺术操作的基本特征^[6]。对于赫哲族图腾纹样而言，可以通过对鱼纹、太阳纹、神鸟纹等纹样的形态、线条进行简化和提炼，抓住其核心特征，将复杂的图案转化为简洁的抽象图形。例如，将鱼纹的曲线简化为流畅的几何线条，用简洁的图形组合来表现鱼的形态，使其既保留了鱼纹的基本特征，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

符号化将抽象的视觉元素发展成具有指称功能的符号，给予符号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信息准确传达给消费者。在进行形象特征层面的提取与符号化转译时，需对非遗视觉元素的外形、色彩、图案等进行分析和提炼，将其转化为具有代表性的视觉符号^[7]。以赫哲族图腾图案为例，将抽象的鱼纹、太阳纹、神鸟纹设计成特定的符号，并进行标准化设计与应用，使消费者能迅速辨识和理解。

现代图形设计包括正反两种形式，重复构图，渐变构图，运用正反两种形式设计，在有限的空间内，使赫哲族图腾图案产生丰富的视觉效果，巧妙地利用图形与背景的关系，使其具有丰富的视觉效果。如神鸟图案被视为正形，而周围空白部分则设计成相应的负形，形成独特的视觉张力，通过图腾图案的重复排列，重复构图，增强图案的韵律感和视觉冲击力。例如，鱼纹以等距的方式反复排列在产品包装上，营造出强烈的装饰效果，渐变构图通过渐变图样的色彩、大小、形状等元素，使图腾图案产生柔和的过渡和变化，从而增加图腾图案的艺术感染力。

（二）文创产品设计原则

文创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是文化导向，结合社会资源特征，对文化、历史、生活方式等进行深入挖掘、提炼和传承文化符号，深度思考具有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定位，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8]。文化创意产品应具有体现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和特征的属性，是传承和弘扬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设计以赫哲族图腾图案为题材的文化创意产品时，要挖掘赫哲族图腾图案背后的文化故事、传说、象征等文化元素，将这些文化元素巧妙地应用到产品设计中。例如，在设计以赫哲族图腾图案为主题的茶具时，可以在茶具表面雕刻鱼纹、太阳纹等图案，同时在产品说明书介绍这些图案的文化内涵，使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了解赫哲族文化。

审美要求文创产品在满足消费者对美的追求的设计上，要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提取地域文化的细节并以优美的符号形式加以呈现、应用，体现了对地域文化的尊重，有利于提高文创产品的价值，使人们感受地域特色文化的魅力^[9]。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上，要注意图形、色彩、材质等元素的搭配组合，在运用赫哲族图腾图案进行创意时，要营造和谐美观的视觉效果。同时，结合现代审美潮流，创新设计传统图腾图案，使之既有传统文化韵味，又符合现代流行趋势。例如，在设计以赫哲族图腾图案为主题的丝巾时，可以运用现代印花技术，将重新设计的图腾图案印在色彩时尚的柔软丝织物上，这样既有民族特色，又能使丝巾散发出时尚气息。

实用是文创产品的基本属性，真正走进消费者生活，只有具备一定的实用功能，文创产品才能真正成为文创产品的“产品”。在设计与赫哲族图腾纹相关的文创产品时，要把图腾纹与产品功能结合起来，做到文化与功能的有机统一，这是在充分考虑产品实用性的同时，也是在考虑产品实用性的基础上。如设计赫哲族图腾图案主题背包时，可在背包正面设计神鸟图案作为装饰元素，合理设计背包内部结构及口袋，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的存储需求。

国外案例以日本京都的清水烧瓷为例，清水烧瓷是日本传统的陶瓷工艺，其图案往往是在陶瓷设计中融入了樱花、枫叶、花鸟等具有日本特色的视觉符号，借鉴了日本传统的绘画、染织等艺术形式，在陶瓷设计中运用了日本传统的陶瓷工艺。清水烧陶瓷在设计过程中，既保留了传统工艺的精髓，又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审美需求，创新设计了传统的纹样，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设计。比如现代的一些清水烧陶瓷作品，设计师用简洁的线条和抽象的图形来表现樱花的图案，使它更具现代气息，更具艺术张力。清水烧陶瓷注重产品的实用性，除了传统的茶具、餐具外，还开发了许多创意十足的陶瓷家居用品，如陶瓷灯

具、陶瓷摆件等，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让产品的实用性得到了很好的提升。这些文创产品不仅在日本国内深受欢迎，在国际市场上也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国内案例以故宫博物院依托丰富的故宫文化资源，将故宫建筑、文物、宫廷文化等元素转化为各类文创产品为例，推出了一系列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文创产品。在视觉符号转译方面，故宫博物院运用现代图形设计手法，对故宫的建筑轮廓、文物图案等进行创新设计，使之更加符合现代审美。例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朝珠耳机”，将朝珠的造型与现代耳机相结合，保留了朝珠的文化特色，又具有实用功能，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10]。此外，故宫博物院还注重文创产品的文化性、审美性和市场性，通过举办展览、线上线下营销等方式，不断提升故宫文创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故宫文创成为国内文创行业的领导品牌，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业也将因此而得到新的发展。

四、赫哲族图腾纹样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实践

（一）设计构思与展示

本设计依据赫哲族图腾动物纹样，创做文创产品，赫哲族纹样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将其应用于蜂蜜包装上，是对赫哲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使包装不再只是简单的容器，而是承载了特定文化信息的载体。如图 4-1-1 所示。



图 4-1-1 赫哲蜂蜜包装前后视图

赫哲族图腾纹样与蜂蜜产品的特点巧妙结合，通过创意的设计手法传达出蜂蜜产品的品质和特点，这体现了文创设计中创意与文化相融合的特点。这种设计能够为蜂蜜产品赋予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增加产品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从而在市场上脱颖而出，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这也是文创设计的重要作用之一。如图 4-1-2 ~ 4-1-3 所示。



图 4-1-2 赫哲蜂蜜包装打开效果图



图 4-1-3 赫哲蜂蜜包装效果图

为了体现产品的高品质与环保理念，包装材质选用可回收的纸质与玻璃。纸质包装盒表面采用特殊的纹理处理，模拟赫哲族传统桦树皮制品的质感，使消费者在触摸包装时能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温度。玻璃瓶身则采用高透明度的材质，既能清晰展示蜂蜜的色泽与质地，又能体现产品的纯净与天然。同时，在设计的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循环保标准，减少能源消耗与废弃物排放，实现文化传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如图 4-1-4 所示。



图 4-1-4 赫哲蜂蜜整体包装效果图

五、结论

通过对赫哲族图腾图案的文化意义进行阐释并结合其视觉特征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赫哲族图腾图案作为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与重要意义，将赫哲族图腾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既有助于实现对这一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又能显著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吸引力和经济附加值。在实际的文创设计过程中，恰当运用赫哲族图腾图案的设计理念与方法，能够强化产品的文化归属感，同时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从整体上看，赫哲族图腾图案在文创产品中的成功应用，为其他地区非遗视觉符号转化至文创领域提供了明晰思路，在推广方面贡献了范式，为地域文化与现代设计融合提供了参照。

参考文献：

- [1] 朱秋菊,清末民初赫哲族文化变迁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
- [2]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M].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渐西村舍刻本.
- [3] 高汝思,赫哲族动物图腾元素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24,26(05):62-65.
- [4] 乌力汗,赫哲族民间故事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5.

- [5] 满都呼.阿尔泰语系民族熊传说的文化内涵[J].民族艺术,2003,(01):28-34.
- [6] 郭伟.抽象与相似性之图像符号逆转——视觉隐喻生成手段美学分析[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03):272-284.
- [7] 齐海涛.符号学语意下非遗视觉元素创新衍生设计探析[J].包装工程,2020,41(20):195-199.
- [8] 刘青.文化传承导向下的文创产品设计原则研究[J].艺术品鉴,2020,(03):89-90.
- [9] 孙德波,闫应军.地域文化视角下文创产品符号化设计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2,(14):85-87.
- [10] 江小凤.基于地域文化的博物馆系统文创产品设计研究[D]. 安徽:合肥工业大学,2017.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isual

symbols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ake the totem pattern of the Hezhe people in Heilongjiang as an example

Yuxin Cao¹, Zhenyu Xia², Qi Li*

¹Faculty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totem pattern of the Hezhe ethnic group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a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 and mainl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isual symbols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ombined with the types,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Hezhe totem patter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values of Hezhe totem patterns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Hezhe totem pattern into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not only inherit and promote the Hezhe culture, but als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cultural added value of the products. Therefore, it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isual symbol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isual symbols; Hezhe; totem pattern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727

1929 年昆明北门街火药爆炸案的灾情分析

樊雨晨¹

(¹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 1929 年 7 月 11 日下午, 在昆明城边北门街一带发生火药爆炸案, 爆发地居民死亡数百、受伤过万, 是昆明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这是一起发生于云南地方军阀龙云部与胡若愚、张汝骥等部争夺较量的大背景之下, 是人为造成的、与政治因素相关联的惨案。在没有考虑民众生命安全、城市规划建设的情况下, 贸然搬运危险物品到人群聚集区域, 是对民众生命的漠视。由于此次爆炸案灾情奇重, 造成原因特殊, 牵涉面较广, 与以往发生的灾祸不同, 具有特殊的个案考察意义。

关键词: 灾难社会史; 火药爆炸; 灾情分析; 档案资料运用

一、引言

马颖生曾说过: “七·一一火药爆炸事件, 是昆明近代史上的一件大灾难, 但很少见诸报媒, 现在所知的人也不多了, 很值得回顾。”^[1] 学界对于此次爆炸案的研究, 大多数用数百字介绍该事件的发生, 且侧重于从政治史和军阀斗争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于灾情的分析较少。本文则依托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档案资料、云南省图书馆馆藏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报刊、云南省地方志和昆明市地方志, 以及各类回忆录、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等, 采用个案分析法, 试图分析此次火药爆炸案的真实情况。

二、灾难发生的背景

1929 年 7 月 11 日午后 2 时 30 余分, 昆明市北门街一带发生重大灾害, 系火药爆炸引起人员、房屋等的巨大破坏, 给时人带来毁灭性打击, 损毁程度相当之深。究其爆发的原因, 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时云南省财政厅文件中仅仅提到“云南府昆明市近因军事关系政府搬运火药入城于七月十一号午后二时在北城内江南会馆忽然爆发天崩地坼, 烈焰浓烟充满空际, 须臾顽石破砖碎瓦, 黄尘杂裹尸肉骨血纷落如雨, 昆明城乡内外居民莫不奔号骇汗, 惨无人色, 附郭三四里住宅, 墙垣崩塌者无数, 东北城垣约三四里廛屋千余家, 立成瓦砾, 焚灰震裂死者千余人, 伤者近万人。”^[2]

1929 年龙云据守昆明, 为了怕胡若愚、张汝骥的军队“利用北门街外商山寺所藏火药炸药作为攻城之具”^[3], 下令军械局胡道文将北门外军火移入城内北门街江南会馆储存, 胡道文奉命派夫用牛车马车, 肩担赶运入城。由于夏季天气炎热, 加之来来往往火药沿途散落, 运输过程的疏忽, 最终导致了 7 月 11 日火药爆炸的巨大惨案。张希鲁在文中记录了火药爆发时的情形: “为防止敌方部队利用北门街商山寺所藏火药、炸药以为攻城之具, 乃派夫用牛车、马车肩担赶运入城, 储于北门街江南会馆, 一车方至, 马忽失足, 轮缘之铁与街面之石摩擦生热, 箱适投地, 引起火气, 遂成爆发, 一时车车相连, 人人并肩。风驰电迈, 直达会馆, 藏处遂成巨灾。”^[4]

由此可知, 火药爆发的当天下午, 应该是烈日当头, 正值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 恰好移运火药的马车失足, 造成轮子和地面产生摩擦生出热气, 再加上装火药的箱子跌落, 火药又是易燃品, 于是瞬间爆炸, 周围也全是移运的火药, 因此, 形成了巨灾。

作者简介: 樊雨晨(1998-), 女,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思政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

究其发生的原因,要从1927年5月23日唐继尧去世说起,唐继尧去世后,名义上是四镇守使联合统治,实际掌握在实力较强的胡若愚、龙云手中。此后发生了胡若愚发动“六一四”政变,派人囚禁龙云,在蒋介石的干涉下派胡瑛指挥龙云等人反击胡若愚部,胡部遭遇打击,后被迫与龙云签订“板桥协议”,龙云接任云南省主席,胡若愚暂时退走,龙云成了云南的头号人物。胡若愚转向川、黔军求助,在两方的支援下,胡、张与龙云之间的混战,在事实上成了川、滇、黔三省军阀在云南境内的混战。蒋桂战争爆发,龙云向贵州进军,意在支援蒋讨桂以及报复黔军“援滇之仇”,在贵州交战之际,胡若愚、张汝骥又向昆明发起攻击,驻守省城的胡瑛一方面忙于布置城防,一方面急电龙云回昆解围。于是在1929年的夏天,胡、张、孟联军攻击昆明时,昆明城危,龙云担心胡、张利用昆明城北门外商山寺所藏大批火药、炸药攻城,下令军械局将大批火药移入昆明城内北门街江南会馆内储存。就在运输过程中不慎发生了此次巨大的火药爆炸灾难。万揆一先生所著《昆明掌故》增加了一些细节的地方,如“滇第五军军长兼省府主席龙云与滇第二军军长、省府主席委员胡若愚和滇第十军军长省府委员张汝骥形成三军对垒局面后,胡、张二人引来川军、黔军,连攻陆良、师宗、宣威等县,扬言即将进袭昆明,此时昆明城局势紧张、人心惶惶,正值龙云在贵州不断获胜时,胡、张、孟三人联军袭击昆明,时代主席胡瑛急电龙云回援,危机才得以暂时解除。”^[5]至于火药的来源,据资料显示,此处北门城外商山寺(今莲花池附近)的火药早在清末时期就堆放于此,成为了火药库房。

1929年7月9日,警察三署的巡官、警长先后向署长岳树藩报告,军械局的官兵押解民夫、牛车、马车,运送军火到江南会馆,火药遍街泼洒,到处都是。作为地区治安机关的负责人,岳树藩明白沿街抛洒危险爆炸物品的严重性,于是采取了防范措施。他派出一群警士和夫役沿街洒水清扫,并向市政府公安局及时做出报告,雇佣一些妇女、儿童参加沿路清除工作,虽有防范措施,但由于火药数量庞大,运输过程中的火药损耗,最终边清边运,边运边洒,直到7月11日午时,还是不慎引发爆炸。事后云南陆军军械局局长龙雨苍在向云南省政府汇报自称,搬运火药一事,事前并未参与商议也没有接受任何上级指令完成此事,而是由军务处(军械局下属部门)直接派人到北门外商山寺搬运火药并导致失慎爆炸,表示对搬运火药一事严厉拒绝并向上层汇报此事,并于7月29日向灾民执委会陈述事实。

根据以上档案、地方志、史书、报纸媒体等史料记载,我们可知,此次“七·一一火药爆炸事件”是人为造成的、与政治因素相关联的惨案,我们能确定的是此次灾难的发生系民国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果,在没有考虑民众生命安全、城市规划建设的情况下,贸然搬运危险物品到人群聚集区域,是对民众生命的漠视;在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传达和沟通上没有协调一致,是政府运作机制的缺失;在对于当下局势没有正确的认知就贸然采取行动,是决策者的巨大失误。

三、灾难发生时的情形

爆炸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张希鲁即到现场调查采访,并依据采访材料撰写了《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一文,投诸报社。该文详尽地描述了火药爆炸后当时的景象,可谓是极其惨烈。文中可初步了解到当时灾难发生的一些情况,首先可知此次火药爆炸的威力非常大,几乎整个江南会馆及周围地区都受到巨大的影响,可谓是天塌地陷,附近的县都能听到爆炸的声音,甚至二十里外的九门里“空中忽落人腿”,整体的受灾情况相当严重;其次此次灾害发生的太过于突然,也是造成伤亡惨重的原因之一,由前文可知,火药的搬运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决策者和搬运者的疏忽,仍然使部分火药散落在地,最终不慎引发此次爆炸,当地的居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经历了此次灾害;最后北门街附近人口密集,加之还有畏惧城外战乱迁居进城的居民不在少数,使得受灾人数伤亡过多,且不用说周围的建筑众多,损毁严重。

灾害发生后市长李修家派驻各处的便衣警察纷纷去调查,所知的灾情均体现在市长报告中。该报告侧重于记录灾害发生后爆发地的状况、受灾的主要区域、主要灾区的受伤人数和房屋损毁程度以及昆明市其他地区受此次灾害影响的表现。

张希鲁先生的这篇报道非常及时的记录了灾害刚发生时的情形,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对于我们了解灾情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可以说是最为直接的现场记录,作者出于人道主义,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此次惨祸。灾民无疑是此次爆炸案中最无辜的群体,那么他们的损失如何得到弥补,精神的

创伤如何治愈？社会的应对及善后问题也会变得相当繁琐、复杂，政府官方组织采取的措施是否行之有效；中央对地方出现困境时的“关怀”是否到位；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对灾害的救助力度是否足够以及灾难之后人民的生活是否恢复如常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寻找答案。

四、具体灾情分析

结合《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征信录》提供的受灾区域图、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灾情统计数据 and 《昆明市志》中《民国时期昆明市行政区划建置表》三部分内容，对于此次爆炸的主要受灾区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内容包括该街道及附属巷户数、男丁和女口的总数、在此次灾害中分别受重伤、轻伤或是死亡的男女人口数量以及受损房屋的数量，其中房屋的毁坏数量又可分为“全房、半房、微房”三个层次都一一记录在册。事发地附近江南会馆、北门街下（《昆明市志》中为北门下街）、北门上街、北仓坡、世恩坊、双眼井一带居住人口最多，受灾情况也最为惨重，其中人口构成男女比例较为接近，多以家庭组织结构为主。该区域的房屋几乎是全部损毁，除大部分全部损毁外，其余的也都是一般程度以上的损毁，几乎没有能够完整保存的房屋，可见其爆炸的威力之巨。

毗邻这一带区域的左哨巷、龙门桥、贡院街（东陆大学附近）、贡院坡以及附属四个巷子：裴家巷、蔡家巷、四方井巷、堆子巷居住人口仅次于事发地附近，重伤、轻伤人口人数虽也不少，但死亡人数相较于事发地附近有明显减少，加之正值七月学生放假之际，所幸学生伤亡人数不多。

据东陆大学校方请求赈灾会拨款的函件中可知“查七·一一火药爆震，敝校弥迹灾区并遭波及，损坏屋顶、窗棂、门户、墙壁、用具以及物理测量仪器、化学药品等项，为数颇巨”，学校在此次爆炸中的损失以校舍、教学楼被炸毁和教学用具仪器被破坏为主。螺峰街、大小梅园巷、高帝巷（高地巷）、大兴街等区域的情况于左哨巷一带相近，相较于事发地周围，灾情稍好，但整体还是位于受灾范围之内，房屋的损毁程度约是全部损毁的较少，但近半损毁的较多，轻微损毁的也不在少数。

圆通下街附缘忠巷、圆通上街附初地巷、圆通西巷、小东门正街等区域一则距离事发地较远，二则居住人口较少，因此灾情较之前区域不算严重，无论是人口的损伤还是房屋的损毁，情况都稍好，另因该地区除居民居住外，还包含一些公共场所，如军队驻扎的太阳宫和忠烈祠，女子感化院和男子感化院，前者隶属于军队管辖，后者则为昆明市政府警务机构的下属会办机关。太阳宫和忠烈祠人员受伤以轻伤为主，重伤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女子和男子感化院均无人员伤亡，仅有部分房屋受损。翻阅 1928 年的期刊《昆明市声》，有一篇名为《参观昆明市男子感化院记》中记载道：“该院于前清季年成立，旧名游民习艺所，唯时款项支绌，仅每日由巡丁带往各处疏通沟道并应各处雇佣”^[6]人员应在四五百人左右，因此推测此次爆炸中感化院内并无人员伤亡可能与感化院规定有关，院内人员可能被巡丁带往各处干活暂未归来，因此避免了此次灾祸的发生。

张希鲁《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中提到除附近的居民是受灾主体外，押运火药入城的士兵、民夫和牛马车夫也是主要的受灾人群，并且由于这些人是最直接接触火药爆炸的人，基本无人生还。

受灾情况总计^[7]

表纲	灾区外合计	灾区内合计	总计
户数	37	3013	3050
男丁	54	6192	6246
女口	81	6982	7063
重伤人口男	1	310	311
女	2	474	476
计	3	784	787
轻伤人口男	2	808	810
女	7	1033	1040
计	9	1841	1850
死亡人口男		196	196
女	1	188	189
计	1	384	385

全房院数	1	104	105
毁屋间数	43	2475	2518
半房院数	1	132	133
毁屋间数	45	2540	2585
微房院数		65	65
毁房间数	14	896	910

资料来源：云南省档案馆馆藏：《云南省政府关于昆明市长所呈本市“七·一一”灾情调查各表已送赈灾会查照的指令》，档案号：1106-001-02120-025。

根据云南省档案馆此次“七·一一火药爆炸案”灾情统计可知，该数据表是灾区外和灾区内数据的总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数据是由灾区调查组调查后形成的数据为基础，并以灾民的自行投报登记相互核对形成，据上报的函件中称所有的受灾户口已经完全汇入到这个统计表中，截止日期应为当年的七月二十六日，之后如若还有需要更正校正的再继续统计。据总表可知，该区域的居住人口约在一万三千人左右，根据《1911-1948年昆明市人口统计》1929年昆明市区人口约有12-13万人，此区域人口约占昆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算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据统计表可知此次灾祸中受重伤人数有787人，轻伤人数有1850人，死亡人数有385人，全域记录在册的受灾人数高达3022人。

以上是官方给出的具体数据，此外一些史料对于受灾情况也有记录，如《昆明市志》中记载“在11日搬运途中不慎发生爆炸，波及五华里，受灾3200余户，12200余人，炸死329人（未包括过路者及尸体残毁无人认领者），重伤致残579人，炸毁房屋2927间。”^[8]政协文史资料中有“据统计此次受灾者远近共达1200余户，罹难灾民约12000余人。数日之后，痛苦哀嚎之声犹时有耳闻。”^[9]《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征信录》中记载道：“附部三四里住宅墙垣，崩塌者无数。东北城垣约三四里廛屋千余家，立成瓦砾，焚压震裂死者千余人，伤者近万人。”^[10]袁嘉谷为惨案所撰写的《北门街火药爆炸案碑记》中则称：计肢体纷飞者30余人，压毙震毙者480人，焦头烂额、负重伤者1790余人，负伤较轻、呻吟不绝者2340余人，无家可居、无米可炊者13570余人。”^[11]昆明市志、文史资料与征信录中的受灾人数相近，袁嘉谷先生撰写的碑记与官方统计数据接近，但增加了没有受伤过重但在灾难中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群仍有万数。官方统计的数据并未将其列入受灾人群之中，但官方具体的数据给我们一些参考，如不同街巷的具体受灾情况大致如何，精确的数据对于善后工作是否起到一定的作用还有待接下来的考察。受灾的总体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庞大的数字昭示着此次灾祸的严重性。

五、结语

此次北门街火药爆炸灾祸与以往发生的灾祸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场人为的，本可避免发生的灾祸。由于这一时期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各势力处于一个混战的阶段，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在为了争夺利益而博弈，此过程中忽视了民众的生命安全，强行调动火药堆放的位置，贸然将其搬运入城，必然会导致不可控的因素发生，于是在居民区火药的爆炸导致数量众多的居民和建筑被摧毁，无数生命丧生于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惨祸之中。这次灾祸是一次具体的、巨大的由于军阀斗争而导致人民受到极度摧毁的事件，放眼整个中国都是鲜有发生的，因此，值得我们反思。在战争年代，政治因素、军事活动对于民众所带来的打击是具有毁灭性的，民众的生存权、财产权受其影响的力度是不可忽视的。战争不能够成为损害民众权益的借口，民众的权益也不应为战争而牺牲。通过梳理此次灾情，也为现代灾害预防管理起到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 云南信息报编.旧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 [2] 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等函请募捐案的代电[Z].1929年7月22日.1106-004-02993-017.
- [3] 陆复初.昆明市志长编（卷10）古代之五[M].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
- [4] 张希鲁.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M].出版社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1929.

- [5] 万揆一.昆明掌故[M].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 [6] 作者不详.参观昆明市男子感化院记[J].昆明市声.1928(17).
- [7] 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政府关于昆明市长所呈本市七·一一灾情调查各表已送赈灾会查照的指令[Z].1929年8月7日.1106-001-02120-025.
- [8] 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市志 (第七分册) [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 [9] 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风雨忆当年: 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集粹 (上) 军政篇[M].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
- [10] 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编.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征信录 上册[M].云南省图书馆藏.1930.
- [11] 袁嘉谷著; 袁丕厚编.袁嘉谷文集 (第3卷) [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Analysis of the Disaster Caused by the Gunpowder Explosion on Beimen Street in Kunming in 1929

FanYuchen¹

¹*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ifang, Shandong 261000*

Abstract:On the afternoon of July 11, 1929, an explosion of gunpowder occurred in the area of Beimen Street on the outskirts of Kunming City. Hundreds of residents died and over ten thousand were injured in the blast. This was a huge disaste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Kunming. This incident took pla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local warlord Long Yun's forces and those of Hu Ruoyu and Zhang Rují. It was a man-made tragedy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factor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or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dangerous goods were transported rashly to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showing a disregard for human life. Due to the severity of the disaster, the special cause and wide-ranging implications, this explosion case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disasters and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Keywords:Social History of Disasters; Gunpowder explosion; Disaster situation analysis ; Applica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39

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视域下共同体思想的建构解析

赵静文¹

(¹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 马克思以“现实的历史的人”为出发点, 把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种历史形态。共同体思想的建构与其社会发展“三形态”思想——“人的依赖性”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视域下研究共同体思想的建构, 有助于从历史逻辑上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成理路, 对理解“真正的共同体”的当代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共同体思想; 社会发展“三形态”; 真正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其社会发展“三形态”思想统一于人的发展之中, 社会形态的更替与共同体的嬗变即为人类的发展进程。“现实的历史的人”只要从事物质生产劳动, 便会自发自觉地形成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 这也是人生存发展的共同性存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揭示了不同社会阶段的人际关系, 以此为线索去分析其共同体思想的嬗变过程, 寻找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可以深层次的发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理路。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的内容释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 马克思基于不同阶段的人的发展程度, 系统阐述了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此时期劳动资料简陋、劳动对象范围狭窄、劳动者经验技能匮乏, 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 商品出现拜物教性质, 颠倒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物统治于人。第三阶段是以自由个性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 全面发展与共同生产的能力成为人们的社会财富。

(一) 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人的依赖阶段中, 人不具备独立性, 缺乏实现个性发展的条件。这一阶段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只是作为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相互发生关系, 如作为封建主与臣仆、地主与农奴等等, 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 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1]。“人的依赖性”实际上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人身依附关系。“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点上发展着”^[2]的落后生产力是形成这种关系的根源。在狭小地域内以维持生存进行的小批量单一化生产, 使社会在短时间内难以发展。人们长期受制于自然只能联合起来形成共同体。这种“自然共同体”保障了人基本的生存所需, 但不是人们自发结成,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共同体内的统治者拥有决定人生死的权力, 这使得个人缺乏自主性。由于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活动, 人们只能遵照相同的自然规则进行小规模生产, 人的个性被集体的共性所掩盖, 个体隶属于集体。

作者简介: 赵静文(1999-), 女,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思政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之中，自然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人对自然是单一的依赖关系。在原始社会里，人出于动物的本能服从于自然，而奴隶社会形成的朴素自然观与封建社会的神学信仰，仍然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这种社会形态，是直接的共同体。社会关系局限于小范围的生产与偶然的产品交换。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极强，脱离共同体无法生存。

（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物的依赖阶段中，人的个性是物化后的个性。商品经济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体时期的经济形式。商品经济通过市场交换将人从血缘地缘的封闭式生产中解放出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但这种个性是以人对货币资本等物的依赖为前提的，离开物后，人的个性会随之消失。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转变、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在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与价值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质料交换，就是建立在人与人社会交往关系上的物质转换。这种物质转换具有支配商品生产者命运的权力，生产者把物化的商品价值作为虚无的神加以崇拜，使商品带有拜物教的性质。马克思指出，商品只有“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在能够有计划分配劳动时间的人的控制下，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才能被消除。“全面的关系”即是对物的依赖关系。在资本的全球扩张中，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使人际交往的时间和空间得以拓展，人的社会关系高度普遍化。在此过程中，人以资本为基础而获得独立性，凸显出人的主体地位。但这种独立性又基于人对物的信任依赖，无资本便无人格，由此造成了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的双重现象。

在“多方面的需求”上，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首要目的，会不断驱使劳动者“超过自然需求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4]，这种个性在生产与消费上呈现出多样的需求，取代了之前的自然需求。但资本主义阶段所形成的需求，实质上是用社会的普遍需求代替了个人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劳动者在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超过自身需求的普遍需求，具有社会性的特征。在“全面的能力”上，资本家无限扩张的财富欲望使人的物质生产能力得到了质变的提升，同时也提升了人们在精神文化创造、政治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对于身处物的依赖阶段的人来说，各方面的能力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人始终无法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能力的发展是以向资本家提供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代价的，“全面的能力”是社会总体的全面发展，人的个体发展却是片面的。

（三）以自由个性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自由个性阶段中，人的个性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了全面发展，此时人的发展状态不仅超越了第一阶段的“人的依赖性”，而且彻底摆脱了第二阶段中对“物的依赖性”。

人能够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前提是劳动自由，这得益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发达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首先，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缩减了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取代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成为个人时间消费的主体部分，因此“财富的尺度决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5]。其次，在生产关系上，公有制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私有制不复存在。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导者，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劳动产品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后的现实成果。此时生产的不再是简单生产或商品生产，而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对产品生产需要的满足。人们可以在自由时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兴趣做出自由安排。

马克思设想的最佳社会模式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类实现了从依附于人、依赖于物到个性全面发展的完美转变。人的自身发展的能力成为社会发展水平的主体目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的创造才能充分迸发、人的价值无限放大等等成为社会财富表现形式。此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6]。

三、契合于社会发展“三形态”的共同体思想的三重向度

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实际和历史趋势出发，通过对“自然共同体”的分析、“虚幻共同体”的批判、“真正共同体”的建构，形成了其共同体思想的逻辑理路。

（一）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共同体”的分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具体地描述了自然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前,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必须依赖自然才能获得人们生存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为了弥补个人在力量、速度、灵敏度等方面的生理弱点,人们必须相互协作,彼此联合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此时的共同体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石。在自然共同体中,个人的生存必须服从于共同体,共同体的内部不存在利益冲突,共同体成员之间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自然共同体是人类为抵御野兽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而自发组建形成的数量众多规模较小且聚集度低分布不均的自然联合体。在传统共同体阶段,由于生产力落后,共同体实际上是保证个体基本生存和繁衍的庇护所,在这一阶段,如若个体脱离群体,是难以在自然界存活的;而以地域、血缘为联结纽带,促成个体联合,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充分发挥集体作用、提高生产效率,也填补了个体能力不足的空缺。与此同时,在这个以地域、血缘为纽带建立的共同体阶段,由于其自身带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大多传统共同体内部并无显著的利益分化,且以独立形式存在。也就是说,自然共同体各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单一,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在此阶段中,个体既为维持自身生存而劳动,作为共同体成员自然而然也主动为共同体生产。不难发现,个体生产的目的仅是为维持自身生存,而不是出于其他什么目的。同时,在自然共同体当中,虽说个体依赖于共同体而存在,但事实上,在这个共同体中,存在一套稳定的社会关系,对个体来说,是客观、不可更改的存在,严重束缚着个体。

此外,个体之间存在客观上的地位差异。究其根本,这种差异根源于个体天然身份的差异,不同个体因先天身份、地位的差异,相应地,其日常生活和实践活动的范围也存在差异。简言之,个体因地位、身份的差异,自然在共同体内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地位高者必定身处层次高位,扮演重要角色,而地位低者与地位高者恰好相反,其不仅位于低位,还得从事必要的体力劳动。在此情形下,自然共同体自身蕴含的“内在规定性”强烈束缚了个体意志,使个体既不能放弃共同体天然成员的角色,不能自主选择其在共同体内部所扮演的角色,只能按照既定秩序装扮成固定角色,完全压制了其个性的展示和释放。可见,自然共同体自身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所以其只适用于传统时期。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渐冲破了以地域、血缘为重要纽带的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个体从先前的固有身份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呼之即来的则是旧共同体形态的解体和新共同体。

(二) 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幻共同体”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个社会阶段形成的关键是因为社会中的财富被少部分人所掌握。社会随着时间发展,出现了阶级和分工,经济运行方式转变成了商品经济。由于商品经济的出现,社会阶段变成了物的依赖性社会阶段,共同体内的利益,从所有人掌握变成了部分人所掌握。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研究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共同体换言之就是生活在一定相同区域的、拥有相同奋斗的目标、实现相同利益的群体。当共同体内少部分的个体利用共同目标或利益来满足这一小部分群体的私利,甚至共同利益只有少部分人所占有,导致共同利益或目标会化为泡影,利益也就变成了少部分阶级所掌握的利益,最终成为“虚幻共同体”。在这个社会里,人类劳动客观条件和产品不再是互为一体,它们彼此之间是脱离的,“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即人生产和制造出的劳动成果不再归自己享有,而是全部归统治阶级拥有,继而促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由资本家统治这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各个不同的阶层之间是相互斗争的。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不存在超越阶级之上的个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的私利或者特殊利益,但是这是破坏大部分人的利益和追求的目标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其中资产阶级是最为典型的。虽然这个社会促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但是它是虚幻、虚假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工人劳动的异化和“共同利益”的欺骗,社会中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只不过是为了掩盖统治阶级的谎言而已,它最终会走向灭亡的道路。

(三) 对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共同体”的建构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7]。“人类社会”在字面上就有不再是分化为阶级而统一的人类的社会的意思,这与马克思后面采用的共产主义

社会的说法相近。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已经被彻底消灭,阶级压迫也不复存在。此时人们才能真正掌握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从必然王国过渡至自由王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详细的构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人不再成为物的附庸,旧的市民社会将被新的联合体取代。在新的联合体中,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虽然当时还没有清晰的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宣言》以世界历史视域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将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首先要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即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交往。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实现真正共同体的路径:第一,在经济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实现共产主义第一步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二,在政治上,发挥无产阶级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使命,只有当无产者解放了全世界,他们才能解放自己。第三,在文化上,彻底清除与共产主义思想相对立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第四,在对外政策上,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都受到资本家无情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无产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全世界的无产者应该团结在一起,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去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9]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思想下“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

基于全球发展趋势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目前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还需要一定的过渡,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走向真正共同体的过渡阶段,是对真正共同体的当代阐释。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引领全球发展进程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对人的重视是与以往的历史史观相比最大的不同。同时,所关注“人”不是“虚幻的人”,也不是“离群索居的人”,而是现实中不断进行感性活动的人。而“现实的人”最终的价值指向是实现人的解放,人在现实中的幸福、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马克思最为远大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样朝着实现全体人类的最终解放这一远大理想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结合当前特定历史阶段下人的发展现状,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推向理论前沿的高度自觉:为实现人类解放而奋斗,在履行自己的使命职责的同时,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转化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从而将共产主义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10]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谋发展的家国情怀

在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尽管中国在近代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但随着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进行,中国已经成为了当前国际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中国不可能也不会对世界安全造成威胁。“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在经济上强调国家间的合作互助,保障不同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在政治上坚持和平崛起,为维护国际安全秩序作出贡献;在文化上主张不同文明平等交流,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体现了中国愿为世界和平贡献自身力量的大国胸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受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如何正确面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如何辩证地看待新科技革命和全球性危机,如何深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交往及其发展趋势,这是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的提出还需要以实践作为行动,中国正以众多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被广泛接受,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世界命运掌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彰显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11]

五、结语

“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根据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的变化说明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三种社会阶段的形成、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这三个共同体的特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新时代的中国面对当今世界的机遇和挑战，汲取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智慧和经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解决新时期所面对问题的决策，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113.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104.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104.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286.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222.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760.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6.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P489.
- [9]徐丽曼,吴纪龙.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三重意境、内在逻辑及其现实意义[J].青海民族研究,2024,(02).
- [10]尹莉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继承[J].延边党校学报,2023,(01).
- [11]王晓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02).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al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the Three Fo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Zhao Jingwen¹

¹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ifang, Shandong 261000

Abstract: Marx, starting from the "real historical person", divided the community into three historical forms: "natural community", "illusory community", and "true commun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though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theory of the "three fo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 the pre-capitalist society of "dependence on people", the capitalist society of "dependence on things", and the communist society of "free individuality". Stud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fo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elps to grasp the generation path of Marx's community thought from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has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the "true community" -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Community thought; Three fo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rue communit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56

“双减”背景下高中生家长的教育焦虑调查研究

步国星¹ 董晓瑜¹ 李烨¹

(¹ 韩国东新大学, 全罗南道 罗州市 58245)

摘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双减”政策背景下高中生家长的教育焦虑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研究发现高中生家长普遍存在较高程度的教育焦虑, 主要表现为对孩子学业成绩、升学前景和未来发展的担忧。“双减”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课外培训负担, 但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加剧了部分家长的焦虑情绪。研究建议, 应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完善配套措施, 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同时, 学校和社会应提供更多支持, 帮助家长应对教育压力,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关键词: 双减政策; 高中生家长; 教育焦虑; 家庭教育; 教育改革

近年来, 我国教育领域改革不断深化, 其中“双减”政策的实施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该政策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然而, 作为教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高中生家长群体对“双减”政策的反应和适应情况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高中生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 面临着高考等重要挑战, 家长的教育焦虑问题尤为突出。因此, 探讨“双减”背景下高中生家长的教育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 对于完善政策实施、促进家校协同育人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包括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以全面了解高中生家长的教育焦虑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 本研究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共同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实施。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包括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对象为某地级市 2 所普通高中的学生家长, 共回收有效问卷 550 份。问卷内容包括家长基本信息、教育焦虑程度、对“双减”政策的认知和态度等。同时, 研究者对 30 位家长进行了深度访谈, 以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

表 1-1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887	12

首先我们将上述搜集到的问卷结果用 IBM 的 SPSS 软件进行了一系列的采集与分析, 经过测算, 本调查结果的克隆巴赫 (Alpha) 信度系数为 0.887>0.8 说明了从信度分析数据来看, 该问卷调查的结果信度良好, 可用于接下来的研究。

二、高中生家长教育焦虑现状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 高中生家长普遍存在较高程度的教育焦虑。在焦虑程度自评中, 约 70% 的家长表示“比较焦虑”或“非常焦虑”。焦虑的主要表现包括: 对孩子学业成绩的过度关注 (80.5%)、对升学前景的担忧

作者简介: 步国星(1996—), 女, 韩国东新大学 (동신대학교)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数学教育;

董晓瑜(1996—), 女, 韩国东新大学 (동신대학교)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

通讯作者: 李烨 (1992—), 女, 韩国东新大学 (동신대학교)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75.3%)、对孩子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70.2%)等。与“双减”政策实施前相比,50%的家长认为焦虑程度有所增加,30%认为基本不变,20%认为有所缓解。

进一步分析发现,家长的教育焦虑呈现以下特点:首先,焦虑程度与孩子的年级呈正相关,高三学生家长的焦虑程度显著高于高一、高二年级。其次,家长的学历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与焦虑程度存在相关性,高学历、高收入家长的焦虑程度相对较低。最后,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教养方式对焦虑程度有显著影响,持有“唯分数论”观念的家长焦虑程度更高。

三、“双减”政策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

“双减”政策的实施对高中生家长的教育焦虑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政策有效减轻了家长的课外培训负担和经济压力。调查显示,约65%的家长表示课外培训支出有所减少,家庭经济负担得到缓解。同时,政策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也促使部分家长重新审视教育目标,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双减”政策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部分家长的焦虑情绪。首先,政策实施后,课外培训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大幅缩减,家长难以通过校外渠道弥补孩子学习上的不足,担心孩子在学习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次,政策对学校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部分家长对学校的教学能力持怀疑态度,担心无法满足孩子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最后,政策强调综合素质评价,但相关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家长对如何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感到迷茫。

四、影响高中生家长教育焦虑的因素分析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本研究识别出影响高中生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因素:

1. 政策认知和理解程度

对“双减”政策有深入了解的家长焦虑程度相对较低,而缺乏了解的家长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高中家长对其认知与理解程度呈现出逐步深入但仍有待提高的特点。总体而言,家长对政策的知晓率较高,但对政策内涵、具体措施和实施效果的理解存在差异,部分家长仍存在困惑和疑虑。主要表现为:

(1) 政策知晓率较高,但理解深度不足。随着政策宣传力度的加大,绝大多数高中家长都知晓“双减”政策,能够说出政策名称和主要目标。然而,知晓不代表理解深入。很多家长仅知道政策的大致方向,对具体条款、实施细节和背后深意把握不准,部分家长对政策的具体、实施细则和长远意义缺乏深入了解,存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比如在课后服务的质量标准、校外培训的规范细则上,家长的理解还存在模糊之处。这导致在为孩子规划教育路径时,难以充分依据政策做出科学决策。

(2) 对减负目标认同度高,但对具体措施存在疑虑:家长普遍认同“双减”政策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目标,认为这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然而,对于如何有效减轻负担,部分家长对减少作业量、限制校外培训等具体措施存在疑虑,担心会影响孩子学习成绩和升学竞争力。

(3) 对素质教育理念接受度提高,但评价体系尚需完善:“双减”政策强调素质教育,引导家长关注孩子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兴趣爱好、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发展。然而,现行教育评价体系仍以考试成绩为主,部分家长对如何平衡素质教育和升学压力感到困惑。

(4) 对政策实施效果期待与担忧并存:家长对“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充满期待,希望政策能够真正减轻学生负担,促进教育公平。但“双减”政策实施落地后,又使他们陷入焦虑。家长既期待政策能减轻孩子的学业负担,让孩子有更多时间休息、发展兴趣爱好,提升综合素质。同时,也期望教育环境更加公平,减少过度竞争。但他们又担心孩子在高考压力下,减少校外培训后成绩下滑,影响升学。而且,“双减”后新的教育模式还在探索阶段,家长对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速度、课后服务的效果心里没底。这些期待与担忧交织,让家长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左右为难,焦虑情绪不断蔓延,同时,部分家长对政策落实力度、学校教学质量、教师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担忧,担心政策执行不到位或出现新的问题。

(5) 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但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在“双减”政策推行的当下,高中生家长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丰富多样。学校是重要来源,家长会、班级群通知能让家长及时知晓政策要点;政府官方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发布的权威解读,提供了政策的详细内容和深层含义。社交媒体和资讯平台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的相关话题讨论和专家解读,使家长能紧跟政策动态。此外,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报道,以广泛覆盖和专业解读,让家长从不同视角了解政策。然而,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和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也导致部分家长对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和误解。

总而言之,高中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与理解程度正在逐步提高,但仍需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帮助家长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政策内涵和目标。同时,要完善配套措施,加强家校沟通,及时回应家长关切,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2. 学校教育质量

家长对学校教学质量的信任程度与焦虑程度呈负相关。对学校教学质量持肯定态度的家长焦虑程度较低。“双减”政策落地后,部分高中生家长陷入焦虑,学校教育质量成为关键因素。在“双减”前,校外培训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如今政策实施,家长担心学校无法满足孩子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若学校的师资力量有限,难以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精准辅导,或者课程设置缺乏多样性,不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家长就会忧虑孩子的学业进步受限。并且,若学校对“双减”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佳,比如课后服务内容单调、教学进度把控不当,家长就会对孩子的未来升学产生担忧,从而引发焦虑情绪。

3. 社会竞争压力

在当今社会,竞争压力无处不在,高考作为重要的人才选拔机制,竞争激烈,升学名额有限,家长们深知孩子在学业上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双减”政策虽旨在减轻学生负担,但家长们害怕孩子一旦减少学习时间,在同龄人中就会失去竞争优势。社会就业市场对学历和能力要求不断提高,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孩子未来获取好工作、好发展的敲门砖。家长担心“双减”会影响孩子知识储备和能力提升,无法在未来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这种对孩子前途的担忧,导致他们对“双减”政策充满焦虑。

4. 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情况是导致家长对“双减”政策产生焦虑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言,“双减”限制校外培训,意味着他们无法像过去那样通过大量资金投入课外辅导,为孩子争取更多提升机会,担心优势不再。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本就寄希望于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双减”后,他们担忧孩子失去校外辅导的助力,在学业上落后。

同时,“双减”后一些家庭可能会为孩子选择一对一的私教,这又增加了经济负担。若负担不起,家长就会陷入焦虑,害怕孩子在升学竞争中失利,影响未来发展。所以一般来讲,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多教育资源,家长的焦虑程度相对较低。

5. 家长教育观念

家长教育观念的差异,致使他们对“双减”政策的态度不一。部分秉持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家长,坚信成绩决定孩子未来,“双减”减少校外培训与作业量,让他们忧心孩子学业落后、升学受阻,对政策心存抵触。与之相反,注重素质教育的家长则大力支持“双减”,认为这能让孩子摆脱繁重课业,有更多时间探索兴趣、发展个性,提升综合素养。还有些家长在两种观念间摇摆,既希望孩子轻松成长,又怕“放养”影响成绩,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充满纠结,难以明确态度。研究表明,持有“唯分数论”观念的家长焦虑程度较高,而注重孩子全面发展的家长焦虑程度较低。

五、缓解高中生家长教育焦虑的对策建议

1. 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家长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一方面,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利用多种渠道,如官方网站、社交媒体、家长会等,详细阐释政策的目标、具体措施及预期效果,强调“双减”并非降低教育质量,而是为了营造更健康的教育生态。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组织专题讲座,邀请教育专家深入解读政策,针对家长关心的学业成绩、升学等问题进行答疑,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理解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此外,媒体也应发挥作用,通过报道“双减”政策下学生全面成长的案例,让家长看到政策带来的积极变化,从而缓解焦虑情绪,更好地支持“双减”政策的实施。教育部门应通过多种渠道,向家长详细解读政策的目标、内容和预期效果,消除家长的疑虑和误解。

2. 完善配套措施,保障政策有效实施

学校应积极提升教学质量,优化课程设置,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提供个性化辅导,确保学生在校内就能扎实掌握知识。同时,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开展各类兴趣活动和学术拓展项目,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教育部门要强化对校外培训的监管,规范培训市场秩序,防止违规培训行为死灰复燃,保障政策执行

到位。还可搭建家校沟通平台,及时了解家长诉求,向家长反馈政策实施进展与成效,增强家长对政策的信任。通过这些举措,让家长切实看到孩子在“双减”政策下健康成长,从而缓解焦虑情绪。

3. 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通过家长学校、专题讲座等形式,帮助家长正确认识教育的本质,摒弃“唯分数论”,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双减”政策推行后,部分高中生家长陷入焦虑,引导科学观念是缓解焦虑的关键。

教育部门、学校和媒体应协同合作。教育部门可发布专业解读,强调“双减”是为了纠正教育生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不是降低教育质量。学校可以组织家长培训,邀请教育专家分享科学教育理念,让家长认识到成绩并非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孩子的身心健康、兴趣培养同样重要。媒体可以通过报道“双减”后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案例,引导家长转变观念。当家长树立科学的“双减”观念,理解政策意义,看到孩子在更轻松的环境中健康成长,焦虑自然会得到缓解。

4. 加强家校沟通,建立协同育人机制

高中阶段加强家校沟通、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对学生成长意义重大。学校应定期组织家长会,向家长介绍教学计划、学生在校表现和教育政策,让家长全面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同时,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搭建线上沟通平台,方便家长随时与教师交流,及时解决学生出现的问题。

教师要主动关注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针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制定教育方案,并与家长保持密切沟通,共同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家长也应积极参与学校活动,为学校发展提供建议,配合学校教育工作。通过加强家校沟通,形成教育合力,助力高中生全面发展,提升教育质量。学校应定期与家长沟通,了解家长的需求和困惑,共同制定教育方案,形成教育合力。

5.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

“双减”政策下,优化高中教育资源配置对减少家长焦虑、促进教育公平至关重要。

在师资调配方面,建立区域内教师流动机制,鼓励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开展定期轮岗交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师培训,提升整体师资水平,让各学校的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教学。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加大对基础薄弱高中的投入,完善实验室、图书馆、多媒体教室等教学设施,确保学生拥有良好学习环境。

利用信息技术,搭建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将优质课程资源数字化并向各学校开放,实现课程资源均衡。如此一来,无论身处哪所学校,学生都能接触到丰富学习内容,家长看到孩子教育环境切实改善,焦虑感也会随之减轻。

6. 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出台配套政策,规范教育市场秩序,确保“双减”政策有效实施,保障学生的教育权益。比如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防止违规补课行为,营造公平的教育环境。

社会组织可积极参与,开展各类公益教育活动。例如举办学习方法讲座、心理健康辅导等,帮助学生提升学习能力,增强心理韧性,让家长看到孩子全面发展的可能。企业也可贡献力量,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拓宽学生发展路径。

媒体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多报道“双减”政策下学生全面成长的案例,传递正确的教育观念,让家长认识到“双减”对孩子长远发展的积极意义,从而减少焦虑。鼓励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服务,为家长提供更多支持和资源,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六、结论

“双减”政策的实施对高中生家长的教育焦虑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表明,高中生家长普遍存在较高程度的教育焦虑,且焦虑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双减”政策在减轻家长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包括加强政策宣传、完善配套措施、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等。只有家校社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实现“双减”政策的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本研究的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家长的教育焦虑差异,以及更有效的干预策略。同时,长期跟踪研究“双减”政策的影响,将为教育改革的深化提供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 [1] (人大代表建议)-平顶山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EB/OL].(2023-04-30)[2024-11-05]. <https://www.pds.gov.cn/contents/45999/374736.html>.
- [2] 渭南市教育局.对市六届政协三次会议第 553 号提案的复函[EB/OL].(2024-10-17)[2024-11-05]. <https://jyj.weinan.gov.cn/zfxgk/fdzdgknr/tajybl/1846848740187389954.html>.
- [3] 王卫东.回归教育本质, 让孩子全面健康成长[N].光明日报, 2021(13).
- [4] 杨兆山, 陈煌.“双减”引发的对基础教育的几点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6).
- [5] 田宏杰,张庆伟,邹盛濠等.家庭密集型教养路径受阻时的教育焦虑反应及阶层差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24,42(04):74-88.
- [6] 陈梦稀,何欣怡,邓玉蓉等.新时代家校共育的现状、困境与出路[J].当代教育论坛,2023(05):1-12.
- [7] 李宝庆,胡佳欣,唐智松等.中国教育政策研究进展与趋势——基于 2022-2023 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全文转载论文的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24(08):21-31.

A Study on Educational Anxiety among High School Parents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Reduction

Bu Guoxing¹, Dong Xiaoyu¹, Li Ye²

¹Korea Dongshin University, Dongshin Dae-gil, Naju-si, Jeollanam-do, 58245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lve into the current state of educational anxiety among high school parent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it. Through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found that parent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generally experience a high degree of educational anxiety,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concerns about their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college prospects, and future prospe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as to some extent alleviated parents' extracurricular training burdens, but it has also introduced new uncertainties, exacerbating anxiety among some parents. Research recommends strengthening policy publicity and interpretation, improving supporting measures, guiding parents to develop a scientific educational mindset, and jointly fostering a good educational ecosystem. At the same time, schools and society should provide more support to help parents cope with educational pressure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healthy growth of their student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arent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al anxiety; home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63

“人工智能+”背景下转媒体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中的应用研究

贾雨晴¹

(¹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 200040)

摘要: 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 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正朝着数字化、跨媒介化的方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已不仅是简单的文化保护, 而是一个涉及媒介转化、技术创新的复杂过程。由于全球化的影响, 保持民族独特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在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过程中, 艺术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艺术作品通过审美教育、艺术创作等方式,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年轻人的价值观、审美观等, 使优秀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同时, 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 对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研究, 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文化遗产的内涵。无论是通过现代方式表达传统内容, 还是借助传统方式表达现代内容, 依托人工智能技术, 借助转媒体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 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 转媒体; 人工智能技术

一、引言

在科技与媒介的不断推动下,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并使之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 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无论是通过现代方式表达传统内容, 还是借助传统方式表达现代内容, 依托人工智能技术, 借助转媒体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转媒体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创新方式, 打破传统艺术设计的媒介, 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逐渐成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的重要力量, 促进文化的创新与多元化。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的机遇

(一)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

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 前人留下大量宝贵的文化财富, 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如今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在我国各地引起各种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与消亡, 逐渐影响到文化生态平衡, 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2024 年 8 月 6 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 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艺术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传播力, 能够激发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增强民族自豪感。在艺术设计领域, 顺应时代发展而产生的艺术新生态, 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作者简介: 贾雨晴(1996—),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数字艺术、艺术与科技。

（二）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

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迎来了新的机遇。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和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而人工智能技术则通过创新性的应用，赋予传统文化新的表达形式。借助网络、社交媒体等展示文化遗产，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活跃度都在持续上升，为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了庞大的受众基础，精准的大数据推算使文化遗产可以更精准地投放给感兴趣的人群，有助于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与普及。

正在内测展出的大空间沉浸式 VR 探索体验项目《消失的圆明园》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圆明园研究中心与上海风语筑公司共同开发，其通过史料研读、图纸分析、专家配合，1:1 高精度地数字化还原圆明园。与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实地游览不同，人们可以在《消失的圆明园》中观赏到曾经的园中胜景，比如喷云泄雾的大水法、完好无损的生肖兽首等。跟随虚拟向导的指引，更全面地了解这座皇家园林的辉煌历史与壮丽景色，感受到圆明园作为“万园之园”的独特魅力。结合历史资料研究和 AI 大模型演算的方式，重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 2025 年初，上海图书馆新馆展出的“与时麒鸣——纪念周信芳诞辰 130 周年展”中，通过 AI 技术使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静态老照片“活”了起来（见图 1），使周信芳与当代观众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凝望与交流。在展览现场，人工智能技术使静态史料动态化，既符合当代观众“短视频”的阅读习惯，也丰富了展览的展示形式。这一案例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遗产创新中的潜力，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



图 1 “与时麒鸣——纪念周信芳诞辰 130 周年展”现场图片

三、转媒体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

（一）转媒体艺术的概念与特征

“转媒体”是指一个媒体跨越原有边界转化成另一个媒体的艺术形式。“转”是一个彼此传递的过程，是一个思想对撞、相互嵌入、裂变的过程，也是将创新能量物化的专业过程。从转媒体可以引申出转媒体艺术（Transmedia Art）的概念，即从一种或几种媒体转为另一种或几种媒体艺术。从转媒体艺术的视角，可以将艺术创作分为三个环节，先是输入端，即接触或接受几种不同专业领域的环节；再是转换器，即进行媒介转化或融合环节，可以是人或者机器；最后是输出端，即生成几种不同媒介融合的媒体作品的环节。

转媒体艺术可以整合不同领域的专长和资源，提升作品的创新性和丰富性，符合当代受众的兴趣点，

增加艺术作品的市场竞争力。在 2014 年法国品牌琳娜希曼朵将秀场布置成一位模特的巨大“裙摆”，运用 3D Mapping 技术，把“裙摆”作为幕布，每一系列主题开始前，“裙摆”顶部有演员会配合数字影像进行表演。将每个不同系列时装的主题灵感转化并制作成动画、灯光、投影相结合的数字影像，与正在 T 台上行走的模特相呼应，舞台设计师尝试把戏剧元素介入到时装展演中，借助服装、舞台、剧情三者之间的互通性，为舞台空间创造了新的时间维度，从而提高了舞台的虚实能力，让观众在视觉上获得更加冲击力和多样的体验。

（二）人工智能技术下的转媒体艺术

随着艺术创作的现代化发展，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进一步消融，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辅助艺术家创作。艺术家在创作中，更加有意识地跨出自己常用的创作方式，了解其他媒介的可能性，更多接触其它领域及专业的人士或工具，发现更多媒介交叉点后进行转媒体艺术创作。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能够吸引不同背景和兴趣的观众。

2024 年末，在上海 U12 剧场演出的《巨物之城》是由上海戏剧学院与上海理工大学进行科学与艺术融合共同创作的机器人戏剧，是国内首部以未来人机共生时代为背景，以机器人作为主要角色的作品。将 TIAGo、移动双臂机器人、仿生机器人等一批智能机器人转化为舞台上的“演员”，与真人演员同台演出，并且随着剧情的发展，每个机器人“演员”都展现出不同的个性，以其精确的动作和编程预设的表达，展现了一种与人类演员截然不同的表演风格。该剧将传统媒体与新兴科技进行互通融合，展现了未来艺术创新的无限可能。

四、转媒体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的表现

（一）传统内容与现代方式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保持民族独特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在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艺术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艺术作品通过审美教育、艺术创作等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年轻人的价值观、审美观等，使优秀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同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文化遗产的内涵。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其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吸引并影响数代中国人，从古至今不断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重新演绎。2024 年 8 月，国产首款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上线，引起全球范围的热潮。《黑神话：悟空》借助数字技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年轻人熟悉的游戏语言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表达，创新性地演绎名著《西游记》，使其在游戏交互中获得新的解读，焕发出新的活力。游戏中许多场景和建筑模型都真实取材于中国各地上百年的古代建筑、古代寺庙等 36 个建筑古迹，比如山西大同悬空寺、山西朔州应县木塔等。在配乐方面，还邀请中国陕北说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熊竹英演绎游戏内的唱词，并为游戏中的角色配置了动作捕捉，让角色边弹边唱，将陕北说书在游戏中再现，被更多人所知。

通过游戏这种现代艺术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高度复原到游戏之中，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广泛传播和认知。

（二）现代内容与传统方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曾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中国戏曲在明清时代曾风靡全国，无论穷人富人都以听戏作为自己重要的生活乐趣之一，但时至今日，听戏懂戏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以前经典戏曲剧目逐渐不适当下的时代审美。

2013 年上海越剧院推出的连台本越剧《甄嬛》，该剧根据热门小说《甄嬛传》进行改编，巧妙运用当代社会的热门题材带动逐渐边缘化的戏曲艺术，越剧《甄嬛》发挥了越剧擅长抒情的特点，着重刻画剧中人的情感经历，既忠实于原著，又具有鲜明的剧种特色。编剧将小说中皇后和华妃两个角色合二为一，并强化了温实初与沈眉庄之间的爱情戏，这样的改编使得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情节更加紧凑。同时，越剧版也削弱了原著中的“宫斗”成分，更加注重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纠葛和生死不渝的爱情。在保持越剧艺术传统韵味的同时，也呈现出更加时尚和多元的面貌。

将现代小说引入传统越剧，将现代流行的主题内容以中国传统方式演绎出来，是对传统中国戏曲艺术保护与传承的一次积极探索。

五、转媒体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的作用

（一）拓宽保护与创新路径：现代技术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现代数字化创作方式如 3D 建模、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等技术，随着技术发展，将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技术不仅为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确的数字化记录存储，还通过虚拟重建、智能监控等手段加强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

在 2024 年 5 月的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中，故宫博物院作为“数字文化”展区中的重要参展单位，展示了全景故宫、虚拟现实剧场、文物对比鉴赏、御花园 VR 体验等 8 个数字展项。从文物类型全覆盖到数字呈现多模态，其中“文物对比鉴赏”可以在故宫数据库中任意选择藏品投射到四联屏上，通过精细影像对比分析、研究、标注和鉴赏藏品，以及“御花园 VR 体验项目”以高精度数字三维模型复现故宫御花园区域，观众可以通过 VR 设备互动体验万春亭古建筑修缮、钦安殿祭祀、鹿囿喂鹿、澄瑞亭喂鱼等 4 个虚拟现实场景。

将古老的文物和古代建筑数字化，进一步挖掘数字资源数据新价值，不仅有利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存档与保护，还可以使公众能够通过互动体验更深入地了解文化遗产。

（二）促进创新发展：传统文化对文化遗产的转化设计

转媒体艺术促进了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不仅丰富了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还使文化遗产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得到传播和弘扬。中国戏曲服饰纹样，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现代设计中，以中国戏曲服饰纹样的基因、基元为对象，采用“十字挑花工艺”、“剪纸工艺”的手法进行转化设计，无疑为创新当代十字挑花艺术、当代剪纸工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十字挑花工艺是一种传统的手工艺技术。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通过解构和重组戏曲服饰的传统纹样，提取其基本的图形元素和结构原理，如龙、凤、鹤、梅、兰、竹、菊等一系列戏曲中常见元素，再将这些元素和原理以十字挑花工艺的形式重新组合和演绎，创造出既具有传统文化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新型纹样。

剪纸艺术讲究对称性、结构性，题材多结合中国古典文学、传说、历史和宗教故事，这与中国戏曲传统服饰纹样不谋而合。剪纸工艺常用流畅、自然的线条，非常符合纹样的表达，比如“云纹”和“火焰纹”等。戏曲中的龙、凤、狮、虎等纹样（见图 2），都可以被巧妙地融入剪纸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主题或背景。这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还为其增添了身后的文化内涵。



图2 中国戏曲传统服饰纹样转化为剪纸艺术

（三）推动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普及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通过文化传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本国文化根源，对于个人成长和性格塑造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教育方式的需求已显著改变，传统的课堂教育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革命历史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无数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统永远是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宝贵财富。对于红色文化资源，既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重无形遗产的传承。如何从呆板机械的说教中挣脱出来，用游客容易接受、易于共情的方式展现红色传统，一直是红色景区努力的方向。2024年国庆时期，在山东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推出了一项旅游体验项目“跟着团长打县城”，引起全国性的热议。该项目体验总时长约25分钟，以电视剧《亮剑》中攻打平安县城的场景为蓝本，还原1942年抗战时期的情景，游客们作为“报名参军”的群众进入景区，他们先参与“战前动员”，然后三支八路军连队汇集到城墙下，在团长的带领下向“县城”发起总攻。让游客在角色扮演中体验模拟战斗过程，重现解放县城的激情瞬间。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娱乐需求，还能够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学习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和历史渊源，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项目将红色文化资源与现代技术、旅游和教育相结合，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普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六、结论

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正朝着数字化、跨媒介化的方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已不仅是简单的文化保护，而是一个涉及媒介转化、技术创新的复杂过程。转媒体艺术创作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跨学科的合作，不仅为文化遗产提供了更加高效与精准的保护手段，也为其创新与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技术与文化、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平衡，确保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延续，更是对历史、文化与人类价值的深刻理解。

参考文献：

- [1] 董和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来源、保护与传承——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有感[J]. 戏剧之家, 2019(14):37.
- [2] 新华社, 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EB/OL]. (2024-08-06).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8/content_6966752.htm.

- [3] 夏萍, 郑蕾, “与时麒鸣——纪念周信芳诞辰 130 周年展”策展综述[J].上海艺术评论,2024(6):11-13.
- [4] 杨青青, 转媒体时尚艺术——当代艺术作品从灵感到质感的转换创作与实践[J].戏剧艺术,2012(4):113-116.
- [5] 陈永东, 杨青青, 基于转媒体的传统文化艺术转化与传播策略[J].新闻爱好者,2023(3):58-61.
- [6] 王强春, 《黑神话: 悟空》跨文化传播策略与路径研究[J].学术探索,2025(2):127-133.
- [7] 程延如冰, 李志斌, 戏曲创新问题浅议——从越剧《甄嬛》谈起[J].戏剧之家,2016(9):10-11.
- [8] 杨青青, 中国戏曲服饰纹样元素码设计研究[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23:230-243.
- [9] 新华社, 沂南县人民政府. 新华社 | 山东沂南: “红色+”激发文旅新活力[EB/OL].(2024-11-09).<http://www.yinan.gov.cn/info/7776/157540.htm>.

AI+ Driven Transmedia Applications i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JIA Yuqing¹

¹ JIA Yuqing,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drop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th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re evolving towards digitalization and cross-media integration.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have transcended mere conservation efforts, emerging as a complex process involving media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midst globalization, preserving national uniqueness and inheriting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critically important. In this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art serves as both a bridge and a bond. Through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artistic creation, artworks subtly influence the values and aesthetic perspectives of younger generations, thereby ensuring the continuity of exceptional ethnic culture. Simultaneously, artists'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f cultural heritage during creative processes contribute to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its inherent significance. Whether expressing traditional content through modern means or conveying modern themes via traditional method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ransmedia approaches provides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is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enables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s while maintaining cultural authenticity, creating a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historical legacy and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Keywords: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ransfer medi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64

儒家君子人格对新时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

张雯丽¹

(¹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 济南, 2510014)

摘要: 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范式。儒家所推崇的君子所具有的人格品质即仁智勇、独立守正、以天下为己任与新时代大学生所需人格存在契合性。新时代大学生人格塑造可以借鉴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仁者不忧的情感推扩、智者不惑的认知精进、勇者不惧的意志砥砺、心怀天下的处世追求四条路径进行, 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成为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

关键词: 儒家; 君子; 新时代大学生; 人格

大学生群体, 作为新时代的筑梦人, 承载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任,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量。正因如此, 将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兼具内在品德与外在才能的杰出人才, 助力其形成完善且卓越的人格,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重要论述, 从国家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此背景下, 深入挖掘和弘扬儒家思想中的君子理想人格, 对新时代大学生的人格塑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价值。

一、儒家君子人格的解读

“君子”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元素, 代表了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典范。这种人格范式不仅蕴含着深厚的道德追求, 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儒家君子人格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

其一, 君子具有仁智勇三位一体的德性修养。孔子曾自道: “君子道者三, 我无能焉: 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②。这句话揭示了君子人格的三重维度。首先, 仁爱精神是君子的根本特质。儒家强调“君子必仁”, 认为仁德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关键标准。其次, 智慧素养不可或缺。孔子提出“未知, 焉得仁?”^③, 表明道德理性必须以知识积累为基础。孔子本人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 其“十有五而志于学”^④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持续精进的精神。最后, 勇敢品质同样重要。“仁者必有勇”^⑤的论断说明, 真正的仁德必然包含道义勇气, 体现为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精神品格, 君子是儒生, 也应是勇者。

其二, 君子具有独立守正的人格操守。儒家特别重视君子的独立人格。孔子提出的“六本”原则, 包括“立身有义”“丧纪有礼”等^⑥, 它是君子处世行事之道, 君子人格的建构也必须以其为基础。君子应当保持精神独立, 不依附权贵, 不媚俗从众。在王孙贾问孔子: “与其媚于奥, 宁媚于灶, 何谓也”^⑦时, 孔子给予了“不

作者简介: 张雯丽(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②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年 8 月第二版, 第 219, 220 页.

^③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年 8 月第二版, 第 69 页.

^④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年 8 月第二版, 第 16 页.

^⑤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年 8 月第二版, 第 206 页.

^⑥ 黄敦兵. 注译. 孔子家语[M]. 长沙: 岳麓书社, 2021 年 3 月, 第 90 页.

^⑦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年 8 月第二版, 第 38 页.

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⑧这样的答复。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思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只是依照天理在行事，君子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不搞人身依附，也无需找靠山。儒家同时认为，君子在保持独立品格的同时，必须恪守正道。守正是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它始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最终体现于经世济民之中。这种守正精神不是外在约束，而是君子内在的道德要求，是其人格完善的必然追求。

其三君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儒家君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⑨的箴言，生动展现了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君子不可以不弘大而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路途遥远。“君子不器”的理念进一步说明，君子的价值不仅在于专业才能，更在于其心系苍生的博大情怀，君子应当具备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胸怀天下，以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为己任，而不应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像器具那样仅能发挥单一的作用。

总之，儒家君子人格构建了德性修养、独立人格与社会担当的完整体系，完美体现了品格、人格与天下己任之间的内在理性逻辑，这一人格范式不仅对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当下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儒家君子人格与新时代大学生所需人格之间的契合性

“新时代的立德树人工作正是对君子人格所涵盖的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以德为本”这一核心育人理念的传承弘扬与丰富发展。”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新时代大学生应淬炼的人格品质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其一，个人发展目标的契合。新时代大学生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与儒家君子人格在个人发展目标上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新时代大学生要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品德修养是人格塑造的基础，只有具备高尚的品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因此，新时代大学生需注重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诚信品质、责任感等，努力成为有道德、有担当的人。其次，新时代大学生也要追求智慧和知识的提升。知识和智慧是支撑个人发展的基石，因此新时代大学生要不断努力学习，追求真理和智慧，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要关注社会、人文、科技等领域的知识，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再次，新时代大学生也应具备勇于担当的精神。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勇于担当、敢于面对，不畏惧困难和挑战，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有担当、有作为的人。最后，新时代大学生需要具备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能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被外界干扰和左右。这与儒家君子所强调的独立性相契合，有助于大学生形成自主、自信、自强的品质。同时，新时代大学生应该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社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与儒家君子所强调的守正性相契合，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直、诚信、有担当的品质。这些个人发展目标与儒家君子人格的“仁智勇”及独立守正的内在品格相契合，都强调了个体在修养、智慧、勇气等方面的追求和提升。

其二，社会理想的契合。新时代大学生在塑造人格的过程中，与儒家君子人格在社会理想上也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新时代，大学生承载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与人民福祉的统一。回溯历史长河，从先秦儒家倡导的君子之道到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尽管社会形态历经沧桑巨变，但知识群体对家国和谐共荣的理想追求始终如一。新时代大学生在理想人格塑造过程中，应具备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要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发展，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应关注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和担当精神，成为社会的有益力量。这与儒家君子人格以天下为己任的真诚担当精神相契合。总之，无论是先秦儒家推崇的君子人格所应具有的修为，还是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塑造，都需将道德修养视为立身之本，所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离不开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涵养。

三、古为今用——依儒家君子人格，塑新时代大学生人格

儒家关于君子人格的思想中具有时代穿透力的优秀成分，在传承儒家人格合理成分中塑造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标准。借鉴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新时代大学生人格塑造可以从情感推扩、认知精进、意志砥砺、处世追求四条路径展开。

其一，仁者不忧的情感推扩。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之一就是“仁”，这种“仁”并非仅仅是表面的善良或仁爱，更是一种内在的、深沉的、能推及万物的情感。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来说，塑造理想人格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这种“仁者不忧”的情感推扩能力。首先，新时代大学生要学会理解和关爱他人。这包括理解和尊重他人的差异，包容他人的缺点，关心他人的需求，以及在他人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通过这种方式，

^⑧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8月第二版,第38页.

^⑨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8月第二版,第115页.

个体可以建立起深厚的人际关系,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新时代大学生要学会将个人的情感推扩到更广泛的领域。这包括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关心国家大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大学生可以将自己的情感与社会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培养出一种更为广阔和深远的情感视野。最后,新时代大学生要学会在情感推扩的过程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其应该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不忧不惧,不怨不怒。只有这样,新时代大学生才能在情感推扩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决策。总之,通过这样的过程,新时代的大学生可以培养出一种更为深厚、广阔和坚定的情感基础,为塑造理想人格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二,智者不惑的认知精进。新时代大学生要将崇高理想、志向转化为实际行动,就必须练就扎实的专业技能,以卓越的才能实现人生价值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可以汲取传统文化中儒家“智”的修养理念,通过持续学习来提升综合素质,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好学近乎知”^⑩,当代大学生应当保持求知若渴的态度,既要掌握促进个人成长的专业知识,更要培养服务国家建设的实践能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业,深刻认识国家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做到勤学不辍。此外,新时代大学生面对国家各领域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知识体系,重点掌握科技创新和人文社科领域的核心理论与实用技能,并深入思考如何将所学专业知识转化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实际贡献。

其三,勇者不惧的意志砥砺。儒家君子理想人格中,“勇”并非指简单的勇猛或鲁莽,而是指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坚定信念、勇往直前、毫不畏惧的精神状态。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而言,塑造“勇者不惧”的人格品质至关重要。在现实生活中,新时代大学生常常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如学业压力、就业竞争、人际关系等。面对这些挑战,部分大学生可能会感到迷茫、无助甚至退缩。然而,拥有“勇者不惧”的意志品质,能够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坚定信念,勇敢地迎难而上。要培养“勇者不惧”的意志品质,新时代大学生需要不断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一方面,大学生要学会制定目标并付诸行动,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极限;另一方面,要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将挫折转化为成长的养分,及时调整心态和方法,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进取姿态;除此之外,大学生要学会寻求帮助和支持,与身边的家人、朋友或老师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通过不断的锻炼和实践,“勇者不惧”的意志品质将逐渐内化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内在素质,成为新时代大学生迎接挑战、克服困难的重要支撑。塑造具有意志品质的人格不仅有助于他们在学业和事业上取得成功,更有助于他们成为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

其四,心怀天下的处世追求。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要素之一也包括心怀天下,这一思想深刻体现了君子将天下苍生的福祉置于个人得失之上的高尚情操。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一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精神与儒家君子心怀天下的理念高度契合。新时代的大学生,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应当秉持儒家君子的胸怀,将个人的成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心怀天下的处世追求,不仅要求大学生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需他们将这份情感内化为行动的动力。具体而言,大学生应当深入关心国家大事,密切关注社会热点,深刻理解国情民意,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去;同时,心怀天下的处世追求也要求新时代大学生具备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学生应当积极拥抱这种变化,不断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和科技成果。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的文化繁荣和科技进步,也有助于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心怀天下的处世追求是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方面。通过培养这种追求,大学生可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坚定理想信念,明确人生目标。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命,不断前行。

四、结语

儒家君子人格所蕴含的仁爱、智慧、勇气、正义、心怀天下等品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代大学生在塑造理想人格过程中应当追求和践行的道德品质和标准。借鉴继承创新儒家君子人格,不仅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有利于助推他们形成理想的人格,激励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同时,这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16-220.

^⑩ 焦金鹏.中庸[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1月,第42页.

- [2] 黄敦兵注译.孔子家语[M].长沙:岳麓书社,2021:90.
- [3] 焦金鹏.中庸[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42.
- [4] 王仕民,黄科.从“君子人格”到“时代新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理论探索,2022(04):23-29.
- [5] 冯刚,杜云.“道”“德”“仁”“艺”: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养成路径与当代价值[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6(05):36-44.
- [6] 高志强.君子人格的核心文化心理特质及其现实涵育路径[J].江淮论坛,2024,(01):86-92.
- [7] 陈秉公.中国传统人格发展历程与当代理想人格模式建构[J].思想理论教育,2015,(10):57-61.
- [8] 胡敏.儒家理想人格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的启示[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03):142-145+150.

The Enlightenment of Confuci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to the Personality Shaping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ZhangWenLi¹

¹*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Abstract:The concept of the Confuci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is an ideal paradigm of personality with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thought. The personality traits that Confucianism advocates for a gentleman, such as benevolence, wisdom, bravery, independence, uprightness,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ld, are in line with the personality qualities needed by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he personality shap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can draw on the ideas of the Confuci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through four pathways: the emotional expansion of "the benevolent are not worried," the cognitive refinement of "the wise are not confused," the willpower tempering of "the brave are not afraid," and the pursuit of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dealing with the world. In this way, they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overall quality and capabilities, and become outstanding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Confucianism; Gentleman;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Personali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480

混合研究法视角下高职院校“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构建与优化

乐冰洁¹

(¹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21)

摘要: 基于混合研究法, 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课堂案例分析, 该研究系统探讨高职院校“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现状及优化路径。理论框架整合复合型人才培育、内容与语言整合学习(CLIL)和产出导向教学(POA)理论, 从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评价机制四维度展开分析。结果显示: 课程内容与区域产业需求适配性不足, 教学方法融合深度和实际成效有限, 校企合作深度与广度不足, 评价体系过度依赖终结性考试。研究提出四项优化策略: 通过模块化设计提升课程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 强化任务驱动的真实情境与跨学科设计; 深化校企协同与技术支持的双向结合; 构建多维评价与动态反馈机制。研究为高职院校“专业+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实践参考, 同时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 高职院校; “专业+英语”; 教学模式; 混合研究; 复合型人才培育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高职院校“专业+英语”教学改革逐渐成为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路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 国际贸易、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领域对兼具专业知识与英语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需求显著增加。以舟山为例, 作为中国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地区凭借海洋经济和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 对国际商贸、航运物流等领域的双语复合型人才需求尤为迫切。

尽管高职院校在“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中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顶层设计层面, 如何实现课程体系与区域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仍需深入研究; 在教学方法层面, 尽管混合式学习、任务型教学等方法的应用已初见成效, 但如何进一步增强其与专业内容的融合度仍存在不足; 在实践教学层面, 校企合作虽不断深化, 但行业对接的深度与广度不足, 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依然有限; 在评价机制层面, 现有评价体系更偏向终结性评价, 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在语言能力与专业知识整合中的进步。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了“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的复杂性, 也突显了其现实紧迫性。

(二) 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复合型人才培育理论、产出导向教学理论(POA)和内容与语言整合学习理论(CLIL)为核心理论框架, 复合型人才培育理论为整个教学模式提供宏观指导, POA理论则从中观层面提供实践框架, 而CLIL理论则在微观层面指导具体的教学实施。分别从顶层设计、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图1)。

复合型人才培育理论为“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方向指引。该理论强调知识的交叉融合与能力的协同发展, 主张通过课程体系的优化实现语言能力与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在“专业+英语”教学模式中, 复合型人才培育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指导课程设计中专业模块与语言模块的深度融合; 二是为校企合作提供理论依据, 强调产教融合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三是为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多维度视角,

作者简介: 乐冰洁(1987-), 女, 浙江舟山人,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评估。

产出导向教学理论 (POA) 为教学实践环节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框架。POA 理论通过“驱动-促进-评价”的教学链条, 将语言学习与职业需求紧密结合。在“专业+英语”教学中, POA 理论发挥着三重作用: 一是通过真实的职业场景设计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二是通过任务链的设计促进语言知识向职业能力的转化; 三是通过多元评价机制保证教学效果的持续改进。POA 理论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形成良性互动, 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实践路径, 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理论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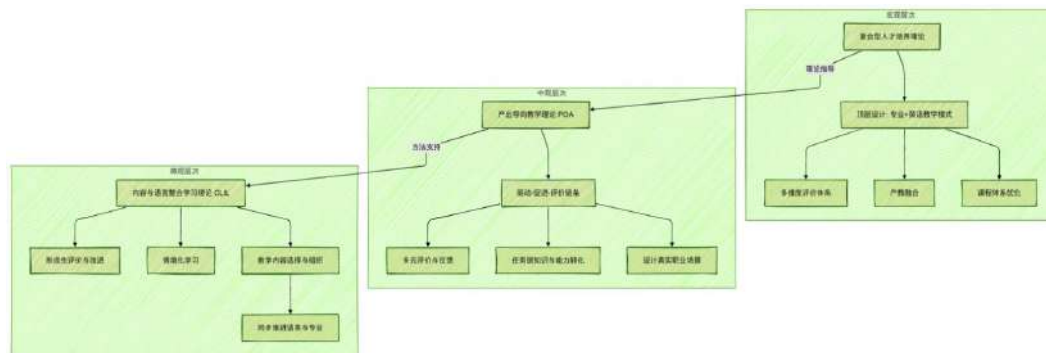


图 1

内容与语言整合学习理论 (CLIL) 为专业知识与语言技能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CLIL 理论强调在真实情境中实现语言与内容的双向促进, 这与 POA 理论的任务驱动理念高度契合。在“专业+英语”教学中, CLIL 理论主要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指导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 确保语言学习与专业知识获得的同步推进; 二是为教学方法的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强调情境化学习的重要性; 三是为学习评估提供多维框架, 注重过程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的结合。

(三) 研究目标与意义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与课堂观察, 系统探讨高职院校“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现状与优化路径。研究聚焦以下具体问题:

1. 顶层设计: 如何基于产业需求进行顶层设计? 深入分析产业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特征, 探索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路径。
2. 课程融合: 如何在课程实施中实现创新教学方法与专业特色的有效融合? 针对不同专业背景, 评估混合式学习、任务型教学等方法的适用性与实施策略。
3. 实践教学: 如何构建多元协同的实践教学体系? 通过深化校企合作, 整合教学资源, 设计符合专业需求的实践教学模式。
4. 质量保障: 如何建立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 探索构建动态改进的质量保障体系, 确保改革成效。

从理论层面, 本研究为复合型人才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同时扩展了 POA 与 CLIL 理论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 为“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提供支持。从实践层面, 研究聚焦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提出的教学改革方案为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具体路径, 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提供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专业+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研究

近年来, 基于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逐步深化, 从初期的需求分析发展到系统化的培养方案设计。韩高军和张媛媛^[1]通过企业调研发现,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专业知识的融合已成为企业选才的核心要素, 这一研究为后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奠定了实践基础。在此基础上, 张莉^[2]提出“课程群对接岗位群”的创新模式, 强调课程体系应与职业需求深度对接, 这一研究丰富了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王宁^[3]进一步构建了“六

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将职业认知、能力培养与实践创新有机结合，为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系统框架。在区域实践层面，陆莹^[4]针对浙江高职院校的实证研究，通过优化课程资源与深化校企合作，提出了“英语+专业”一体化教学模式，这为人才培养模式的区域化实践提供了有益经验。

（二）创新教学方法与专业内容的融合研究

创新教学方法与专业内容的深度融合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Coyle 等^[5]提出的 CLIL 理论框架为内容与语言的整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在真实情境中实现语言与专业知识的同步学习。这一理论在中国高职教育环境中得到了创造性应用，陈莹^[6]将 CLIL 与 BOPPPS 教学模式相结合的实践研究，验证了该理论在本土化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Ellis^[7]从理论层面论证了任务型教学在不同学科中的适应性，而 González-Lloret^[8]则探索了技术支持下的任务型教学模式创新。在混合式学习研究方面，高芬和胡际兰^[9]的研究证实了线上线下结合的学习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内化水平。

（三）校企协同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已成为研究热点。Brinton^[10]强调了学科特色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指出不同专业背景下的语言教学需要差异化设计。牛达^[11]从“三教改革”视角提出，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关键。鲁燕和文长虹^[12]进一步强调了实践教学应注重行业需求的适配性与课程资源的有效整合。然而，商芳^[13]的研究揭示了产教融合在实践深度和广度上的不足，特别是企业参与度亟待提升的问题。Macaro 等^[14]的研究表明，行业导师的介入能够显著提升实践教学效果，这为校企协同育人提供了新思路。

（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为模式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文秋芳^[15]提出的“师生合作评价”模式，通过引入多阶段评估活动实现教学效果的动态优化。Tsou 和 Kao^[16]构建的 ESP 课程评估框架强调了多维度评价的重要性，这对完善高职英语教学评价体系具有重要启示。在学习者视角研究方面，刘品^[17]的调查发现了教学环境对中国学生英语交际意愿的显著影响，这为评价机制的本土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商芳^[13]进一步指出，评价体系应注重过程性评价，而不仅局限于结果考核。

（五）研究述评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专业+英语”教学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然而，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在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方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理论构建，缺乏针对区域特色和产业需求的深入实证研究；第二，在教学方法创新方面，虽然提出了多种教学模式，但对这些方法在不同专业背景下的适应性研究较少；第三，在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方面，校企深度合作的具体实施路径和长效机制研究仍显不足；第四，在质量保障机制方面，缺乏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机结合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缺口与本研究拟解决的核心问题高度契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课堂案例分析系统探讨高职院校“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现状及关键问题。研究设计遵循方法三角验证原则，采用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方式，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其中，问卷调查用于收集学生对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实践教学与评估机制等维度的整体反馈；深度访谈旨在深入了解教师与企业代表对教学改革的专业见解；课堂案例分析则聚焦于教学实践的具体效果评估。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访谈对象，以确保受访者能够提供丰富且有价值的信息。在教师代表的选择上，本研究重点关注其教学经验、教研成果和教改实践。所有入选的教师均具有 5 年以上高职英语教学经验，并在英语类课程或专业英语课程教学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些教师主持或参与过省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专业视角。

企业代表的选取则着重考虑了区域经济特色和行业代表性。5 名企业代表分别来自舟山地区的跨境电商、航运物流、海事服务、对外贸易和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均担任人力资源总监或部门经理职务 5 年以上。这些企业代表均直接参与校企合作项目，其所在企业每年持续招收高职毕业生，对人才需求有深入的理解和第一手经验。这种选取标准确保了访谈数据能够真实反映区域产业对“专业+英语”复合型人才的具体需求。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层次的数据分析框架，通过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深入挖掘研究数据的内涵。在问卷数据分析方面，使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系统分析，除了基础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外，还对不同专业学生在各评价维度上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对于问卷中的开放性问题，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法提取关键信息，并进行系统归类，以补充量化数据的不足。

访谈数据的分析采用了系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在使用 NVivo 12 软件辅助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三级编码程序对访谈文本进行深入解析。首先，通过开放性编码标注原始语句中的关键信息；其次，运用选择性编码归纳形成主题类别；最后，通过核心编码提炼核心概念和关系。最终形成稳定的分析框架。

课堂案例分析采用了更为综合的评估方法。研究团队建立了包含课堂参与度、任务完成质量和创新应用能力在内的多维观察指标体系。通过过程性记录方法，详细记录每个教学关键环节的实施情况。同时，结合学生作品分析和教师反思日志，对不同教学方法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系统的质性比较分析，从而全面评估教学改革的实际成效。

（四）研究伦理

研究严格遵守伦理规范，所有参与者均在充分知情同意后参与调查或访谈，数据在分析过程中进行了匿名化处理，确保参与者的隐私不被泄露。所有访谈录音和文本均采用加密存储，仅用于本研究。

四、研究数据分析与关键发现

（一）课程设计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调查与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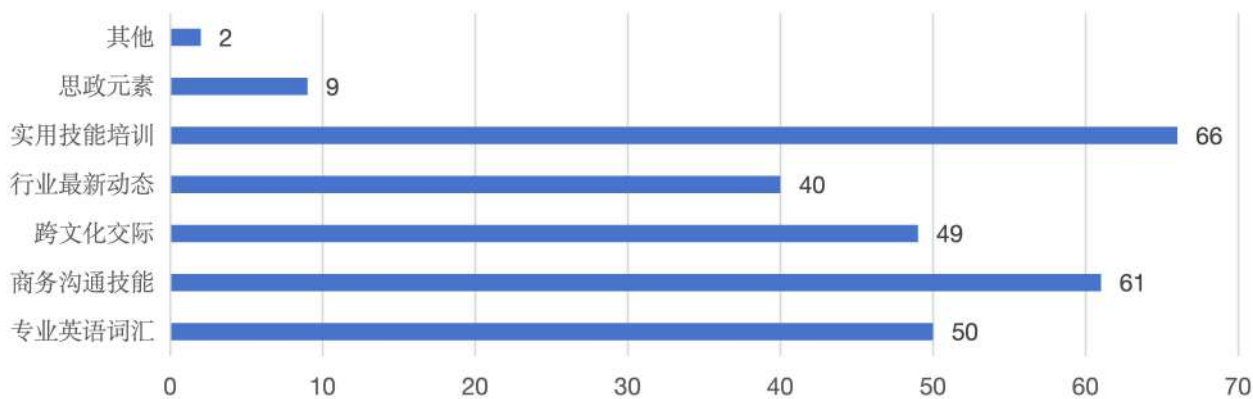


图2 课程内容期望（多选题）

根据学生问卷数据，45%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具有一定的职业导向性，但仅有 25% 的学生表示课程对未来职业发展帮助很大。在课程内容需求方面（图 2），学生最关注实用技能培训和商务沟通技能，反映了学生对实践性和应用性内容的强烈需求。专业英语词汇和跨文化交际也受到较高关注，表明学生认识到语言基础和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在关于课程是否体现地方经济需求的 54% 的学生认为课程关联较弱，特别是在跨境电商和海洋经济相关领域，学生普遍认为课程内容未能有效对接区域经济发展。

进一步的开放答题定性数据分析显示，67% 的学生希望课程中增加行业特色模块，如跨境电商英语、航运英语以及少儿英语教学相关技能。他们还指出，课程设计中的实践环节设置有限，无法为职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实战支持。学生对实践性的期待与课程内容的现状形成了显著对比。

教师访谈数据支持了问卷的结论。一位商务英语课程的教师提到：“课程内容的设计更注重基础语言教学，而没有明确的行业特色模块。例如，舟山的海洋经济发展对航运服务英语有实际需求，但课程中并未

充分体现。”另一位教授工业机器人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师也提到：“虽然我们尝试加入行业案例，但这些内容的深度不足，无法让学生真正了解行业应用场景或积累职业技能。”这样的反馈表明，课程设计在内容深度上仍需进一步提升。

企业访谈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浙江舟山至控智能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表示：“我们需要能够用英语讨论 PLC 设备的毕业生，但目前很多学生甚至无法掌握基本术语。”少儿英语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则提到：“课程内容更注重理论，而缺乏实际教学技能的培养，例如儿童心理学和家长沟通技巧，这些都是少儿英语教育中的核心能力。”这些反馈说明，课程内容的行业针对性与应用性有待加强。

课堂案例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一堂工业机器人专业英语课程中，学生被要求用英语描述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然而，课堂观察显示，仅有 32% 的学生能够准确使用专业术语完成任务，多数学生对任务中涉及的技术内容和语言表达显得力不从心。

（二）教学方法与语言专业融合的现状与成效分析

教学方法是实现“专业+英语”教学目标的关键，其有效性直接影响语言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程度。然而，根据学生问卷、教师访谈及课堂案例的分析，当前教学方法在融合深度和实际成效上仍存在改进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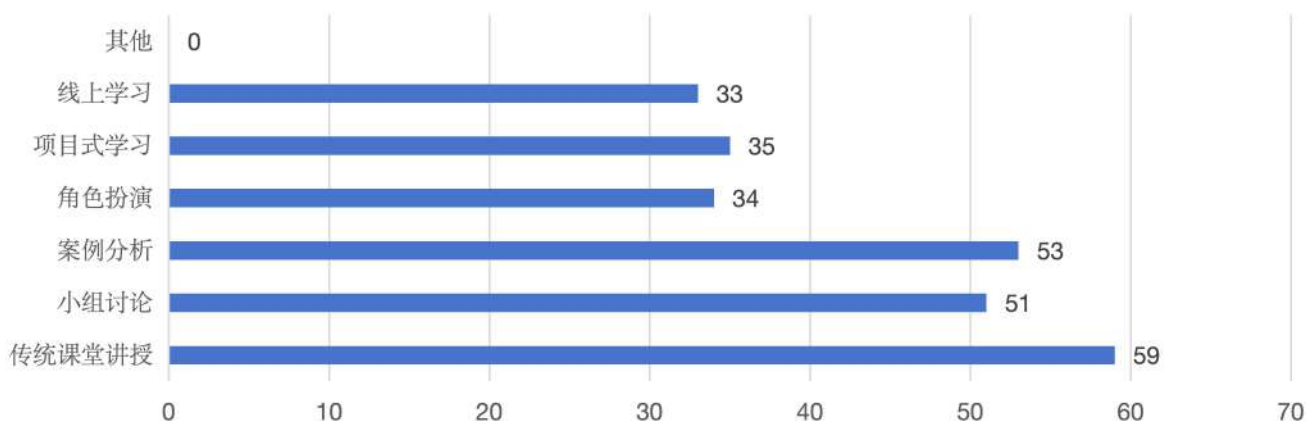


图3 目前开展的教学方式偏好（多选题）

问卷数据显示，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图3）。传统课堂讲授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也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反映出学生对互动性和实践性教学方法的认可。学生期待更多参与式学习机会，这与“专业+英语”教学模式强调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相契合。然而，项目式学习、角色扮演等深度融合专业内容和语言技能的教学方法支持率相对较低，这可能暗示了当前这些方法的实施效果未能充分满足学生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线上学习获得 30% 的支持率，表明数字化教学方式已经成为重要补充，但同时也反映出在线教学模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然而，仅有 49% 的学生认为当前教学方法显著提升了语言与专业知识的结合能力，这一比例在商务英语和工业机器人专业英语课程中尤为明显（图4）。部分学生提到，任务设计往往流于形式，缺乏与实际行业需求的紧密关联。

教师访谈提供了对问卷数据的验证。一位教授《工业机器人专业英语》的教师提到：“我们采用情境模拟教学法，让学生用英语进行技术介绍和讨论，但由于学生的语言基础较弱和专业知识欠缺，这种任务难以深入。”另一位《商务英语》课程的教师也指出，任务型教学法在设计任务时面临挑战：“如果任务内容过于简单，学生的学习效果有限；但如果任务过于复杂，学生又可能因为能力不足而失去兴趣。”这样的反馈表明，当前教学方法虽然形式多样，但在内容深度和融合性上仍需进一步优化。

课堂案例数据进一步反映了教学方法的问题。在《少儿英语教学设计》课程中，学生被要求模拟课堂教学情境，但教师总结显示，仅有 35% 的学生能够在任务中准确表达教学目标，其余学生更多依赖预设模板完成任务，难以体现语言与教学设计能力的深度结合。

■ 非常有效 ■ 比较有效 ■ 一般 ■ 不太有效 ■ 完全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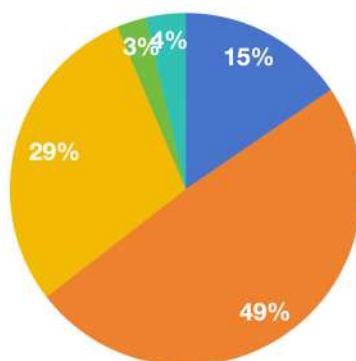


图4 现有教学方法的学习效果分析

企业访谈也提供了相关证据。例如，舟山某少儿英语培训机构的主管提到：“高职毕业生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出现语言表达与教学内容脱节的问题。他们能够完成基础教学任务，但在面对复杂情境时表现较为乏力。”

（三）实践教学体系与多方需求的匹配性调查与分析

实践教学体系是“专业+英语”模式的重要环节，其目标在于通过真实任务的训练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与职业技能。然而，通过学生问卷、教师访谈和企业访谈的分析发现，当前实践教学体系在满足学生、教师和企业多方需求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在受访学生中，73.63%对现有实践教学表示认可，包括20名学生“非常满意”，61名学生“比较满意”。然而，深入分析发现，实践教学供给与学生职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差距。问卷调查显示，学生的就业意向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主要集中在外贸公司（n=80人次）、跨境电商（n=65人次）和少儿英语教育（n=55人次）三个领域。与职业规划相对应，学生对实践教学设施的需求也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图5）：有意向从事外贸工作的学生群体表现出对实践设施的多元化需求，其中对专业英语在线学习资源库（37人次）、多媒体语言学习中心（37人次）和跨境电商实操平台（37人次）的需求最高。计划从事跨境电商的学生对跨境电商实操平台的需求最高（34人次），同时对多媒体语言学习中心也维持较高需求（31人次），体现出对实践操作与语言能力的双重重视。在少儿英语教育方向的学生中，对多媒体语言学习中心的需求达到28人次，对专业英语在线学习资源库的需求为25人次，这种分布特征与该职业对语言教学能力的核心要求高度契合。这种职业导向与实践需求的对应关系，凸显了实践教学资源配置优化的必要性。

校企合作作为连接教学与职业需求的重要桥梁，其实施效果呈现出明显的供需失衡。调查显示79名学生（71.82%）表示从未参与过校企合作项目，在参与者中仅有8名学生表示收获很大。这一数据反差凸显了优质实践教学资源的供给不足。

教师访谈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发现。一位负责校企合作的教师提到：“实践课程主要以校内模拟任务为主，真正到企业参与工作的机会较少。即使有校企合作项目，大多数时间也集中在短期观摩上，学生难以深入体验工作流程。”另一位教师提到，实践教学的企业参与度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对行业需求的真实理解。

企业访谈从实际用人角度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舟山某外贸企业的业务经理表示：“很多实习生在基本外贸流程上缺乏经验，比如订单处理和客户沟通都需要大量培训。”另一家海运企业的经理指出：“毕业生进入企业后需要较长时间适应，这说明学校的实践课程与岗位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课堂案例也验证了问卷和访谈中的反馈。在工业机器人实践教学，学生被要求完成一项自动化系统的调试模拟任务，但教师记录显示，超过50%的学生在实际操作中表现出明显的陌生感，表明课程中的模拟场景与真实岗位需求仍存在显著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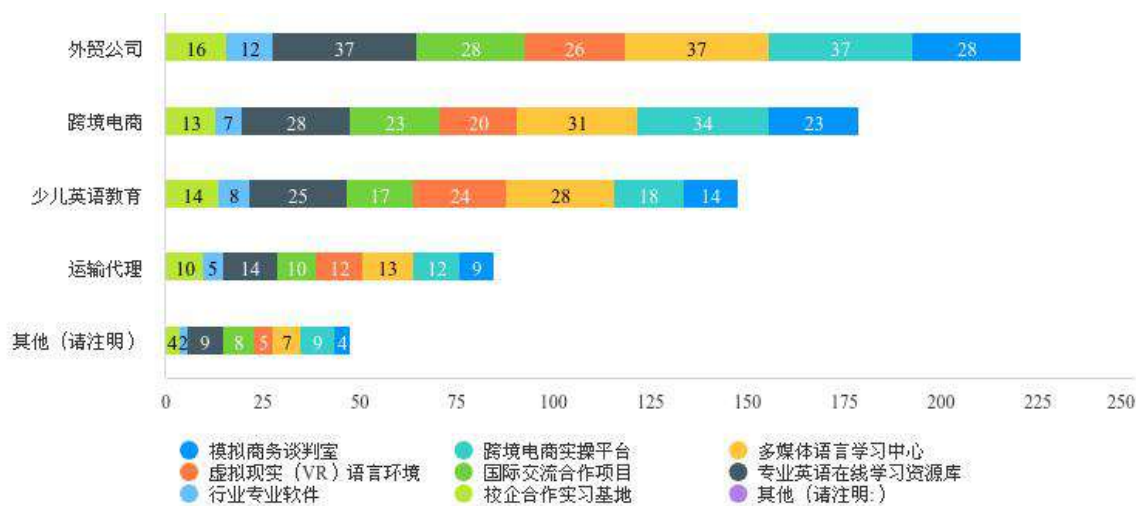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就业意向群体实践教学设施需求交叉分析图 (多选题/人次)

(四) 教学评价机制与能力提升的反馈与需求分析

教学评价机制是衡量“专业+英语”教学成效的重要工具，其科学性直接影响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教学改革的推进。然而，通过问卷、访谈及课堂观察发现，现有评价机制在全面性和动态性上仍有改进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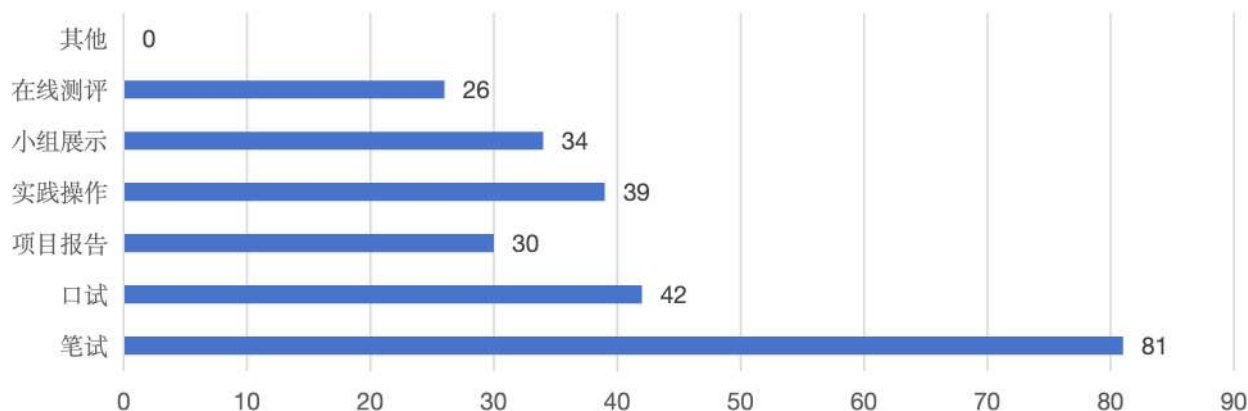


图6 学生偏好的考核评估方式 (多选题/人次)

从问卷数据来看，虽然 65.46% 的学生表示目前的考核评估方式能够“非常全面”(14.55%)或“比较全面”(50.91%)地反映其学习成果，但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特别是在评价方式的选择上(图6)，传统笔试仍占主导地位(73.64%)，而更能体现应用能力的实践操作(35.45%)和小组展示(30.91%)等评价方式的占比相对偏低，这与“专业+英语”强调实践应用的培养目标存在一定差距。

在反馈机制方面，虽然 82.73% 的学生表示能够经常(20.91%)或有时(61.82%)收到教师反馈，但反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仍需加强。数据显示(图7)，学生期待更加多元化的反馈渠道，尤其是课堂即时反馈(70%)、在线评论(48.18%)和定期学习报告(42.73%)的需求较为突出。这反映出在“专业+英语”教学改革中，构建更加科学、动态的评价反馈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教师访谈验证了问卷数据的部分结论。一位教师提到：“评价方式还是以期末考试为主，虽然我们也尝试加入项目任务的评分，但占比很低，难以全面体现学生的学习能力。”另一位教师指出，过程性评价的实操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特别是如何科学衡量学生在实践任务中的表现仍缺乏有效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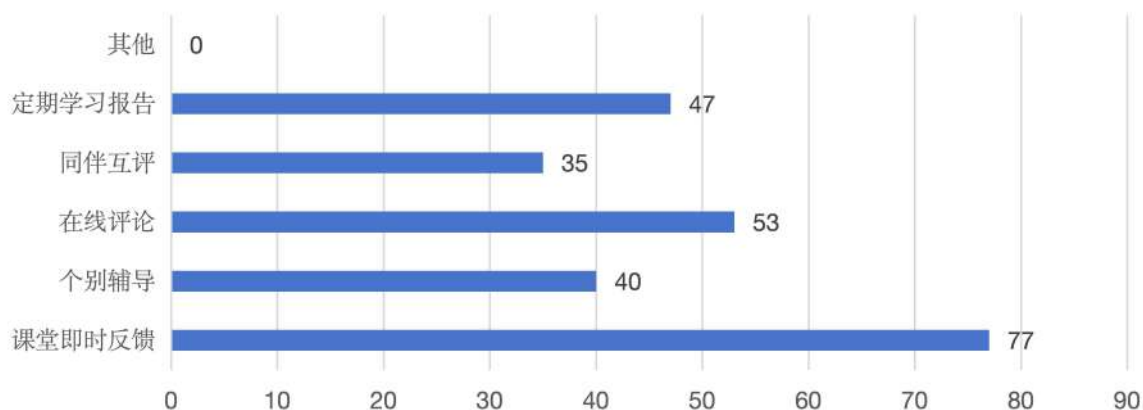


图7 学生期望的学习反馈渠道 (多选题/人次)

企业访谈也提出了引入企业参与评价的需求。浙江舟山至控智能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表示：“如果企业能够参与学生的实习评分，将有助于学校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实际能力，这样的评价方式更能反映行业需求。”少儿英语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则提到：“评价应更关注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表现，而不是单纯依赖考试成绩。”

课堂案例分析显示，在一项学生设计的少儿英语教学展示任务中，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任务完成情况上，而对学生在过程中展现的创新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关注较少。这种评价方式显然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

五、综合讨论

“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构建需要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评价机制四个核心维度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及课堂案例分析，揭示了这些维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内在关联性，并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内容与语言整合学习理论 (CLIL) 和产出导向教学理论 (POA) 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了系统剖析。研究表明，教学模式优化的关键在于深化理论支持、增强行业适配性和完善实践路径。

课程设计作为“专业+英语”模式的顶层架构，其核心在于满足地方产业需求，构建动态适配的学习路径。然而，研究数据显示，现有课程设计多集中于基础语言能力的培养，未能充分结合地方经济特色和行业需求。这种现象反映了校企合作深度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企业在课程开发中的参与较为有限，使课程内容难以获得实时的行业需求反馈，动态调整机制也难以有效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强调，课程设计需要通过知识交叉与能力协同发展实现语言与专业技能的深度融合。CLIL 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情境化学习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够通过将课程嵌入真实职场场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语言迁移能力。然而，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实施仍受限于地方资源的利用率不足及动态反馈机制的缺失。

教学方法作为“专业+英语”模式实施的核心，其有效性在于通过任务设计实现语言与专业任务的高度融合。本研究发现，尽管混合式教学与任务型教学方法在提升课堂互动与学生参与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任务设计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仍存在显著不足。多数教学任务仍停留在简单的情境模拟，难以反映复杂行业背景的实际需求。这种问题不仅与课程内容的行业适配性不足相关，也受到教师对跨学科任务设计能力限制的影响。POA 理论明确指出，任务设计应以“驱动—促进—评价”为核心逻辑，通过精准的情境设置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促进其知识内化与能力迁移。本研究的课堂观察进一步表明，当任务设计能够体现行业复杂性（例如跨境电商订单处理或工业机器人故障诊断任务链）时，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实际应用能力均显著提升。CLIL 理论的视角同样指出，多层次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是任务设计的关键，能够有效增强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的语言表达与专业技能应用能力。

实践教学是“专业+英语”模式的重要环节，其目标在于通过真实任务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然而，本研究揭示，现有实践教学的行业对接深度和企业参与广度仍显不足。多项访谈数据显示，实践教学主要集中

于校内模拟,企业参与多停留在观摩和短期实习层面,学生在实践任务中的深度参与程度较低。这种现象暴露了校企合作模式的局限性,使得实践教学难以为学生提供系统的行业体验。POA 理论指出,实践教学需通过真实任务驱动学生完成从课堂知识到岗位能力的转化,然而当前校企资源整合的不足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课堂案例分析表明,虚拟仿真技术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真实场景的缺失,但其推广仍受限于技术成本与应用能力。

评价机制作为“专业+英语”教学质量保障的重要工具,其科学性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力提升的全面性与教学目标的实现。本研究发现,现有评价体系更多依赖终结性考试,忽视过程性评价与动态反馈,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在语言与专业能力协同发展中的表现。这种局限性表明,目前的评价方式尚未充分体现 CLIL 与 POA 理论所强调的多维度评价与动态反馈的重要性。动态反馈的缺失使得教学策略无法根据学生的能力变化进行及时调整,进一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优化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中寻求突破口。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评价机制四个维度的协同优化中,解决行业适配性不足与动态反馈机制缺失的问题是关键。通过强化校企合作、提升教师跨学科能力以及推广技术支持的应用,可以为实现语言与专业知识的协同发展提供有效路径。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评价机制四个核心维度的系统性分析,本研究不仅明确了高职院校“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主要问题,还提出了一系列优化路径。这些路径基于复合型人才培育理论、CLIL 理论与 POA 理论,为实现语言与专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方案,同时为区域经济发展和高职教育改革注入了新动力。

课程体系的优化需要紧密围绕区域经济需求,通过模块化设计与动态调整机制提升适配性与灵活性。舟山地区的研究表明,现有课程内容偏重基础语言能力的培养,未能满足复杂行业对语言与专业能力的双重需求。未来课程体系的优化应通过模块化设计,将语言学习与专业技能训练深度结合。例如,在航运服务课程中,可引入基于真实行业案例的学习模块,如国际货运合同的起草与执行、跨境物流的协调与跟踪等,帮助学生在过程中掌握行业实际需求的核心技能。此外,动态调整机制应依托校企协同,通过行业反馈定期更新课程内容,确保课程内容与地方经济发展保持同步。这种模块化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也为课程的跨区域推广提供了可能性。

教学方法的创新需要进一步强调任务驱动的真实情境与跨学科设计。任务的真实性和复杂性是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提出,在工业机器人课程中,可通过多阶段任务链帮助学生适应复杂行业场景,例如从设备调试到问题分析和报告撰写的全过程任务。这种任务设计的多维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增强其在实际工作中的适应能力。同时,教师的跨学科能力对任务设计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通过定期组织行业导师培训、跨学科教师工作坊和学术交流活动,可有效提升教师在任务设计中的创新能力与行业敏感度。此外,技术支持也应成为教学方法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行业特定情境,如工业机器人故障排查或跨境电商的订单处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实战能力和学习体验。

实践教学的深化需通过校企合作与技术支持的双向结合。研究发现,企业的深度参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但现有合作模式多停留在短期实习或浅层观摩阶段,难以为学生提供系统的行业体验。未来实践教学的优化应探索建立长效校企合作机制,如通过行业导师制,由企业导师全程参与学生的实践教学任务,包括任务的设计、指导和评价。例如,在跨境电商英语课程中,可引入企业真实业务作为任务基础,由导师指导学生完成订单管理、客户沟通和问题处理等核心工作任务。此外,结合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可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学习场景,弥补实践资源不足的问题。这种深度校企合作与技术支持的结合,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能为校企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奠定基础。

评价机制的优化需要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并注重动态反馈的实际应用。目前的评价体系过于依赖终结性考试,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力变化和表现。未来的评价机制应融入企业导师的深度参与,结合多维评价方式科学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例如,在跨境电商英语课程中,可通过课堂任务完成情

况、企业导师评价、学生自主学习成果与智能化评价工具相结合的综合框架，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与职业能力发展。同时，过程性评价应成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动态记录学生在课堂、任务和实践中的表现，为教学策略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利用学习数据分析平台生成的报告可为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教学改进建议，帮助学生实现更高效的能力提升。



研究结果显示，“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优化需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实现协同改进。这一模式的优化不仅为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清晰路径，也为其他区域和行业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价值。例如，内陆地区制造业和物流行业的语言与专业需求也可借鉴本研究的模式，开展基于地方经济特点的模块化课程设计与动态调整。同时，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和技术支持，将更多行业特色融入教学中，能够更好地满足复杂行业场景下的人才需求。

综上所述，“专业+英语”教学模式的优化不仅是高职教育应对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也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实践路径。通过区域特色化课程、情境化教学方法、行业导向的实践教学以及科学的多维评价体系，高职教育能够更有效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实现教育质量和学生职业能力的双重提升。

七、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围绕高职院校“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揭示了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和评价机制四个维度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优化路径。然而，研究的区域性与方法局限仍需关注。

首先，研究样本主要集中于舟山地区，其海洋经济与跨境电商背景具有典型性，但难以完全反映内陆地区制造业、文旅产业等其他产业背景对“专业+英语”教学的需求。这种区域性限制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广泛适用性，未来应通过多地区对比研究，构建更具普适性的模式框架。

其次，尽管本研究以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CLIL理论与POA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但未通过长期实证研究验证其实际效果。例如，动态课程调整机制和企业导师评价如何在实际教学中落地，仍缺乏教学实验的支持。未来研究应以行动研究为基础，检验优化措施的实施效果，明确其对学生能力提升的作用。

此外，技术支持的应用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尽管研究提及虚拟仿真技术和智能化评价工具，但未深入探讨其具体应用场景。未来可聚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课程调整与个性化评价中的应用，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和学生学习体验。

最后，文化与国际化视角的融入需进一步深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全球化视野的需求日益增加。未来研究可探索如何在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中有效融入国际化内容，特别是通过多元文化任务设计培养学生的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韩高军, 张媛媛. “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实施[J].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2007, (06): 65-67.

- [2] 张莉, 张修海, 高秀石.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群与岗位群的建立与对接探究[J].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06): 49-50.
- [3] 王宁. 高职英语+专业“六位一体”教学模式的探索[J]. 辽宁高职学报, 2022, (02): 51-54+58.
- [4] 陆莹.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英语+专业”教学体系实践探索[J]. 校园英语, 2024, (05): 100-102.
- [5] Coyle, D., Hood, P., Marsh, D.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6] 陈莹. BOPPPS 框架下基于内容语言融合 (CLIL) 教学理念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J]. 教育探讨, 2024, 6(2): 211-212.
- [7] Ellis, R.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8] González-Lloret, M. Using Technology-Mediated Tasks in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to Connect Speakers Internationally[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20.
- [9] 高芬, 胡际兰. 混合学习在国内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述评(2005—2021)[J].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0(03): 78-85.
- [10] Brinton, D.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Reflecting on its Applicability to the Teaching of Korean[C]//12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Korean. Chicago, 2007.
- [11] 牛达. “三教”改革背景下高职院校外语教学改革思考[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 (17): 93-96.
- [12] 鲁燕, 文长虹. “三教改革”背景下高职英语教师专业成长的策略研究[J]. 林区教学, 2021, (02): 84-86.
- [13] 商芳. 高职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评价[J]. 大学教育, 2014, (11): 168-169.
- [14] Macaro, E., Curle, S., Pun, J.,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 Language Teaching, 2018, 51(1): 36-76.
- [15] 文秋芳. “师生合作评价”: “产出导向法”创设的新评价形式[J]. 外语界, 2016, (05): 37-43.
- [16] Tsou, W., Kao, S.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M].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2017.
- [17] 刘品. 高职涉外旅游专业学生英语交际意愿调查研究[J]. 南方职业教育学刊, 2019, 9(03): 91-97.

Developing and Enhancing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Field + English” Teaching Model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 Mixed Methods Study

Le Bingjie¹

¹*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Zhoushan, China*

Abstrac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was employed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the "Professional Field + English" teaching model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lassroom case analyses. Grounded in Compou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ory,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and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 the analysis spanned four dimensions: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ethodology, practical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Results indicated insufficient alignment between course content and regional industry demands,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ment in both depth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methods, limited scope and depth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an overreliance on summative assessme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enhancing curriculum-industry alignment through modular design; strengthening task-driven authentic contexts and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with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establishing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with dynamic feedback mechanism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Field +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while offer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technically skilled professionals with global perspectives.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Professional Field + English"; teaching model;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67

在高等数学课堂上融入思政元素的几点思考

何永明¹ 于晟伟^{1*} 付亚坤^{1*} 赵赫¹

(¹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北京 102202)

摘要: 随着教育的不断推进,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理念, 逐渐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找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契合点、以学员关注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发挥好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消解西方话语霸权四个方面, 深入探讨了在课堂上融入思政元素的有效途径。通过理论阐述和实践案例分析, 旨在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落实课程思政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以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 课程思政; 思政元素; 课堂教学; 育人功能; 西方话语霸权

一、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 教育承担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使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 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2]。课程思政理念在教育领域的推广, 使得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进行了深入探讨, 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课程思政的总体发展趋势方面, 张大良于 2021 年指出, 课程思政是新时期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 强调了课程思政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3]。同年, 孔翔和吴栋则从混合式教学改革的角度, 探讨了如何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来服务课程思政建设^[4], 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在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方面, 陈志刚等学者于 2023 年构建了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 并探索了实践路径^[5], 为教师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提供了理论支持。王丽等学者于 2022 年则从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应用入手, 分析了高等数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 如数学史、数学家精神等, 并提出了具体的教学策略^[6]。李晓培和胡树祥于 2021 年探讨了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的话语表达与当代意义, 强调了课程思政在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方面的作用^[7]。同年, 李建华从学理角度分析了课程思政的本质, 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观点^[8], 为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方面, 部分研究者指出, 当前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尚不完善, 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9-11]。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 以科学评估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课程思政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实施仍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 部分教师在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形式化的问题, 未能真正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 课程思政的实施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教学创新能力, 而目前部分教师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仍需在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评价体系的构建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未来的研究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加强教师培训, 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以更好地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如何在课堂上有效融入思政元素, 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以期对课程思政的实施提

作者简介: 何永明 (1978—), 男,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抗洪抢险、高等数学教育;

赵赫 (1997—),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代数学表示论、高等数学教育。

通讯作者: 于晟伟 (1995—),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偏微分方程、次黎曼流形、动力系统、复杂网络、高等数学教育;

付亚坤 (1981—), 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电工电子、大学物理教育;

供有益的思路和方法。

二、找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契合点

课程思政的核心在于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实现“思政”与“专业”的相长。教师应深入挖掘本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绘制“课程思政元素地图”,明确每个思政元素的切入点,并厘清其与专业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思政教育融入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做到自然流畅、有迹可循。以理工科课程为例,教师可以在讲解专业知识时,融入科学家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社会责任感等思政元素。例如,在物理学课程中,介绍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伟大成就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以及科学探索的艰辛历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科学探索精神。在工科课程中,如机械工程专业课程,可以结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讲述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引导学生树立为国家制造业发展贡献力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文科课程中,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契合点更加丰富多样。例如,在历史学课程中,通过对历史事件、人物的深入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文学课程中,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赏析,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总之,教师要善于发现并找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契合点,使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传授相得益彰,达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三、以学员关注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

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信息时代,对社会热点问题有着高度的关注和敏锐的感知。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以学员关注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结合专业知识进行延伸性学习和研究,促进“思政”与专业相长,实现良好的育人效果。例如,在经济学课程中,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等。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等活动,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经济理论知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使学生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增强对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在法学课程中,可以结合当前社会中的热点法律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犯罪治理、劳动权益保障等,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治意识,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如社区调研、志愿服务、创新创业实践等,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将思政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四、发挥好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

学科文化是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积淀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行为习惯的总和,对个体的德育涵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学科文化通过严格的训练、引导和熏陶,对学科成员的思想认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深层次素养进行濡染和塑造,是课程思政实践成为可能并收到预期效果的重要依据。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挖掘和利用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将学科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融入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科价值观和学术道德观。例如,在理工科课程中,可以强调科学精神、创新意识、严谨态度等学科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在文科课程中,可以注重人文精神、社会责任、道德修养等学科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情怀。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科文化活动,如学术讲座、学术竞赛、学科文化节等,营造浓厚的学科文化氛围,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学科文化魅力,增强对学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学科文化的熏陶和引导,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五、消解西方话语霸权

近年来,西方媒体凭借其强大的传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经常对我国进行不实报道和恶意抹黑,企图分裂我国国家和民族统一,干扰我国的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承担起消解西方话语霸权的责任,做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导的统一,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智慧。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向学生客观、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国际热点问题,引导学生批判性地看待西方媒体的报道,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国际视野,使学生能够理性地看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如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等,让学生在國際舞台上展示中国青年的风采,传播中国声音,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

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六、课程思政实施的保障措施

课程思政的实施需要从多个方面提供保障,以确保其顺利推进和有效落实。加强教师培训:教师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通过组织专题培训、教学研讨、学术交流等活动,帮助教师深入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和要求,掌握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的方法和技巧,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水平。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将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纳入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内容。评价指标应涵盖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深度和广度、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升情况等方面,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客观、公正地评价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激励教师积极投入课程思政建设。加强教材建设:教材是课程思政实施的重要载体,应加强教材建设,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材内容。组织编写具有课程思政特色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注重挖掘和整合各学科中的思政元素,使教材内容既具有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又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为课程思政实施提供有力支撑。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应营造浓厚的课程思政校园文化氛围,通过举办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项目等,将思政元素融入校园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时刻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增强课程思政的实效性。

七、结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应找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契合点,以学员关注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发挥好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消解西方话语霸权,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在课堂上有效融入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同时,还需从加强教师培训、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加强教材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等方面提供保障,确保课程思政的顺利实施和有效落实,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 [1]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北京召开[N]. 北京: 新华社, 2016.
- [2] 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Z]. 2020.
- [3] 张大良. 课程思政: 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 329(1): 5-9.
- [4] 孔翔, 吴栋. 以混合式教学改革服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初探[J]. 中国大学教学, 2021, 1: 59-62.
- [5] 陈志刚, 李明, 王强.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探索[J]. 高等数学研究, 2023, 26(2): 45-49.
- [6] 王丽, 张华, 李伟. 高等数学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应用[J]. 数学教育学报, 2022, 31(4): 89-93.
- [7] 李晓培, 胡树祥.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的话语表达与当代意义[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1: 100-104.
- [8] 李建华. 知识即美德: 课程思政的学理意蕴[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2: 94-99.
- [9] 邓艳君. 红色基因融入课程思政建设的三重路向[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2: 111-115.
- [10] 张旭, 李合亮. 廓清与重塑: 回归课程思政的本质意蕴[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5: 116-121.
- [11] 陈旻. “三同三力”推进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析论[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5: 122-126.

Reflec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Advanced Mathematics Class

He Yongming¹, Yu Chengwei^{1*}, Fu Yakun^{1*}, Zhao He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reform,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educators. This explores effective way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lassroom from four aspects: finding the convergence points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aking the real problems that students attention to as the starting poin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disciplinary culture, and resolving the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Through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practical case analys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teachers to better implemen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value guidance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Keyword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lassroom; Educational Function;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74

本科生与高职生英语学习愉悦、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探究

张 静¹

(¹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马来西亚 槟榔屿州 11800)

摘要: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学习体验往往存在显著差异, 尤其是在愉悦感、学习倦怠和自主学习行为等方面。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本科生与高职生在英语学习愉悦度、自主学习行为和高考成绩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 而在英语学习倦怠感上差异不显著, 表明本科生与高职生在英语学习体验和学习成果方面存在显著差别。这些发现不仅能够为教育者提供研究依据, 也可为高校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和个性化学习支持提供实证指导。

关键词: 英语学习愉悦; 英语学习倦怠; 自主学习行为; 本科生; 专科生

一、引言与背景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 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关系到各层次学生的学业成就和长远发展。对于高职生而言, 英语学习面临诸多挑战。首先, 高职生普遍存在英语学习基础薄弱的问题, 部分学生在中学阶段未能系统地掌握英语语法和词汇知识, 进入高职院校后面对更为复杂的英语学习任务时, 容易产生畏难心理和低成就感。其次, 自主学习能力不足是高职生英语学习中的突出问题。自主学习能力是指学生能够主动设定学习目标、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并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的能力。然而, 许多高职生在英语学习中缺乏明确的学习规划和有效的自我调节能力, 表现为在面对学习困难时容易产生逃避心理, 缺乏持久的学习毅力和自我调整机制, 在英语学习中缺乏主动探索和思考的习惯^[1]。此外, 高职生在英语学习中常常伴随着消极体验, 研究发现, 高职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普遍存在焦虑、挫败感和倦怠感^[2]。当高职生在学习中频繁遭遇失败或未能获得外部认可时, 容易形成自我否定的态度, 进一步降低其学习动力和自信心。因此, 高职生在英语学习中面临的自主学习能力不足和消极学习体验相互交织, 形成了阻碍其英语学习成效的重要因素。

随着积极心理学持续受到关注, 外语学习愉悦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的研究在国内外得到长足发展。这一概念是指在参与外语活动或任务时能够激发学习者更加投入到学习过程的愉悦感。此外, Dewaele 和 MacIntyre 通过对全球 1746 名外语学习者的调查, 从个人体验、教师支持和学习氛围三个维度, 构建了外语学习愉悦的基本框架^[3]。研究发现, 通过个人体验和学习氛围产生的愉悦感, 有利于学生提升自我效能感, 增加学习投入^[4]。而英语学习倦怠 (English Learning Burnout) 作为一种负面情绪, 表示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感到筋疲力尽并失去热情, 会对学业表现、人际关系, 甚至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李成陈等针对英语学习倦怠构建了疲惫感、玩世不恭和低效能感三个维度, 并指出学生面对苛刻的学习要求时会感到疲惫不堪 (疲惫感); 对学业、教师或同伴表现出疏远和冷漠的态度 (玩世不恭); 在学习中感到无能为力或缺乏成就感 (低效能感)^[5]。长期的英语学习倦怠会削弱学生在语言学习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从陷入消极循环, 影响学习的持续投入和效果^[6]。

自主学习行为在语言学习中同样重要, 表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自主规划学习目标、监测学习进度

作者简介: 张静 (1991-), 女, 山东临沂人,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 二语习得、教育技术、教育心理学

和调节学习策略。在外语学习领域,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果自主学习能力较强,学生通常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有效设定学习目标,及时识别学习中的困难,并通过调整学习方法和策略来克服挑战,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7]。此外,自主学习行为与学习者的情绪状态也存在紧密联系。研究发现,积极的学习情绪通常能够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动机,促使学生更主动地参与语言学习活动。然而,学习倦怠和焦虑等消极情绪可能削弱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持续的压力和疲惫感时,往往会降低主动探索和调节学习策略的能力,导致学习效率下降,甚至可能引发逃避学习的倾向^[8]。

与本科生相比,高职生在学习背景、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但英语学习愉悦感、学习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普通本科生群体,针对高职生群体的研究仍较为匮乏。因此,该研究深入探讨本科生与高职生的英语学习愉悦感、学习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不同教育层次学生在学习体验和行为上的差异,为推动高校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和优化学习支持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

围绕以下三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索本科生与高职生英语学习愉悦、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的现状和差异。

- (1) 本科生与高职生英语学习愉悦、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是否存在差异?
- (2) 不同性别的学生在英语学习愉悦、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 (3) 高考英语分数、英语学习愉悦、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是否存在相关性?

为测量参与者对学习愉悦感的结果,研究采用李成陈等编制的中文版外语学习愉悦量表^[9],共11个题项,例如“学英语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同时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a=0.919$)。此外,研究根据采用外语学习倦怠量表,共9个题项,例如“英语学习让我觉得自己被消耗殆尽”,该量表具有极佳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a=0.939$)。针对自主学习能力,研究借鉴了林莉兰编制的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量表^[10],该量表Cronbach α 系数为0.976,说明具有极佳的内部一致性。

为了收集量化数据,研究人员于2024年5月至6月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从某东部省份一所公立大学和一所职业学院共收集了254名大学生的有效答卷。所有参与者均为大一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具有参加2023年6月高考的经历,并且大学英语课程是必修课。参与人员基本信息见表1。

问卷收集完成后,研究人员首先对问卷进行筛查,确保填写完整。随后通过SPSS 25开展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和皮尔森相关分析。

表1 参与人员基本信息

		数量	百分比%
就读层次	本科生	129	50.8
	高职生	125	49.2
性别	男	155	61.1
	女	99	38.9

三、研究结果

通过表2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本科生和高职生在英语学习的愉悦度、倦怠感、自主学习行为和高考英语分数上存在区别。首先,本科生在英语学习愉悦度方面的平均值($M=3.5962$)高于高职生($M=3.3978$),表明本科生在英语学习中可能体验到更多的乐趣。同样,在自主学习行为方面,本科生的平均值($M=3.4205$)也高于高职生($M=3.1873$),反映出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更积极主动。然而,在英语学习倦怠感上,高职生($M=2.6190$)略低于本科生($M=2.6725$),表明本科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可能更容易产生学习倦怠。此外,在高考英语成绩上,本科生的平均分($M=105.357$)远远高于高职生(M

= 73.844)，且标准差也较大，表明本科生在英语成绩上可能存在更大的个体差异。总体而言，本科生在英语学习的愉悦感、自主学习行为和成绩方面表现更佳，而高职生在英语学习倦怠感方面略低，说明本科生在英语学习中具有更强的动力和积极性。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学生类型	平均值	标准偏差
英语学习愉悦度	本科生	3.5962	.82759
	高职生	3.3978	.71093
英语学习倦怠	本科生	2.6725	1.05051
	高职生	2.6190	.90235
英语自主学习行为	本科生	3.4205	.91227
	高职生	3.1873	.85729
高考英语分数	本科生	105.357	36.3090
	高职生	73.844	31.2978

表 3 展示了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本科生与高职生在英语学习愉悦度、学习倦怠、自主学习行为及高考英语成绩上存在区别。首先，在英语学习愉悦度方面，本科生与高职生在英语学习愉悦度上的差异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 ($t = 2.046, p < .05$)，且本科生在英语学习愉悦度上明显优于高职生。在英语自主学习行为方面，本科生与高职生在英语自主学习行为上的差异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 ($t = 2.098, p < .05$)。本科生在自主学习行为上更为积极。在高考英语成绩方面，本科生与高职生在高考英语成绩上的差异在统计上极为显著 ($t = 7.399, p < .001$)，显示本科生的高考英语成绩明显优于高职生。然而，在英语学习倦怠感方面，本科生与高职生在英语学习倦怠感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t = 0.435, p > .05$)，说明本科生和高职生在英语学习倦怠感上的表现相对接近。综上所述，本科生与高职生在英语学习愉悦度、自主学习行为和高考英语成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两个群体在英语学习倦怠感上差异不显著。

表 3 就读层次对英语学习愉悦度、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的影响

	F	t	自由度	Sig. (双尾)	平均值差 值	标准误差 差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英语学习愉悦度	3.198	2.046	252	.042	.19838	.09694	.00746 .38929
英语学习倦怠	3.786	.435	252	.664	.05348	.12305	-.18885 .29581
英语自主学习行为	1.643	2.098	252	.037	.23321	.11115	.01430 .45212
高考英语分数	.788	7.399	252	.000	31.5126	4.2592	23.1245 39.9007

表 4 展现了性别对英语学习愉悦度、倦怠、自主学习行为以及高考英语分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性别方面，英语学习愉悦感存在显著差异 ($t = -2.602, p = .010$)，表明女生的英语学习愉悦感显著高于男生。英语学习倦怠也差异明显 ($t = 3.338, p = .001$)，说明男生的英语学习倦怠感显著高于女生。然而，英语自主学习行为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男生和女生在自主学习行为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此外，不同性别的学生在高考英语分数上存在显著差异 ($t = -3.731, p < .001$)，显示女生的高考英语成绩显著高于男生。综上所述，性别在英语学习愉悦感、倦怠感和学业成绩方面具有显著影响，但对自主学习行为方面的影响不显著。

表 4 性别对英语学习愉悦度、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的影响

	F	t	自由度	Sig. (双尾)	平均值 差值	标准误差差 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英语学习愉悦度	1.484	-2.602	252	.010	-.25723	.09888	-.45196 -.06250
英语学习倦怠	.659	3.338	252	.001	.41224	.12348	.16906 .65543

英语自主学习行为	3.362	-1.486	252	.139	-.17002	.11444	-.39539	.05535
高考英语分数	.372	-3.731	252	.000	-17.4960	4.6892	-26.7311	-8.2610

表 5 高考英语分数、英语学习愉悦度、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高考英语分数	英语学习愉悦度	英语学习倦怠	英语自主学习行为
高考英语分数	皮尔逊相关性	-			
	Sig. (双尾)				
英语学习愉悦度	皮尔逊相关性	.302**	-		
	Sig. (双尾)	.000			
英语学习倦怠	皮尔逊相关性	-.286**	-.676**	-	
	Sig. (双尾)	.000	.000		
英语自主学习行为	皮尔逊相关性	.218**	.666**	-.561**	-
	Sig. (双尾)	.000	.000	.000	

表 5 为相关性分析结果, 首先, 高考英语分数与英语学习愉悦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302$, $p<.001$), 说明在统计学上, 学生的高考英语成绩越高, 英语学习愉悦度越高。同时, 高考英语分数与自主学习行为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r=.218$, $p<.001$), 表明自主学习行为对高考英语成绩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此外, 英语学习愉悦度与英语学习倦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676$, $p<.001$), 表明愉悦度越高, 倦怠感越低。此外, 英语自主学习行为与英语学习愉悦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666$, $p<.001$), 说明愉悦度较高的学生更倾向于积极参与自主学习。英语学习倦怠与自主学习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561$, $p<.001$), 意味着英语学习倦怠感越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倾向越低。综上所述, 高考英语分数对英语学习愉悦度和自主学习行为具有积极作用, 而倦怠感则可能对自主学习行为产生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 本科生在英语学习愉悦度和自主学习行为方面均显著优于高职生, 这提示了学历层次在英语学习体验和学习策略上的重要作用。相比于高职生, 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具备更强的学习动机和更丰富的学习资源, 因此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因此, 在教学实践中, 针对高职生的教学设计应更多关注如何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例如, 教师可以设计开放性任务和探索性学习项目, 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和掌控感, 进一步提升学习愉悦度。

此外, 本科生与高职生在自主学习行为上的差异, 可能源于本科生接受更为系统的学习策略训练和更严格的学业要求。相比之下, 高职生缺乏自主学习的经验和方法。因此, 针对高职生开展教学改革时, 公共英语教师应重点强化学习策略和自主学习行为的培养。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设置学习目标和监测学习进度, 帮助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建立自我调控的能力, 最终提升自主学习行为。

另外, 本科生与高职生在英语学习倦怠感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表明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可能都面临相似的压力和挑战。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可以通过引入更多互动性和趣味性的教学活动, 帮助学生在获得更积极的情感体验。例如, 通过游戏化教学活动, 设计小组合作活动,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学生的参与度。此外, 公共英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英语学习情绪, 及时提供心理支持和学业辅导, 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学习态度, 减少学习倦怠感的产生。

综上所述, 针对本科生与高职生的差异, 公共英语教师可以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设计, 强化个性化学习支持和分层教学策略。例如, 可以通过任务驱动、情境化教学和互动学习, 提升学生的学习愉悦感, 减少学习倦怠感。同时, 公共英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策略, 帮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自我调控能力, 关注性别差异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针对不同性别的学习者提供适应性的教学指导和支持, 提升长期学习效果。在职业院校和本科院校中, 建立系统的学业辅导和心理支持体系, 帮助学生在保持积极的态度和稳定的学习动力。通过上述策略, 公共英语课程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学业成就,

还能够促进自主学习能力, 提升长期英语学习效果, 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白欢.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高职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调查研究[J].职业技术,2022,21(06):90-96.
- [2] 刘洋,张增田.基于扎根理论的高职学生英语在线同步学习倦怠的概念维度及提升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4,(16):105-111.
- [3] Dewaele J-M & MacIntyre P D. The two faces of Janus?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J] .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4, 4(2):237 – 274.
- [4] 崔雨,孟亚茹.积极心理学视角下自我效能感、外语愉悦与英语水平的关系研究[J].外语研究,2023,40(01):75-80.
- [5] Li, C., Zhang, L. J., & Jiang, G.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urnout among Chinese EFL students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24,45(4):906-920.
- [6] 陶伟.正念、外语学习倦怠与英语自主学习行为的关系[J].现代外语,2017,40(02):223-231+292.
- [7] 华维芬,冷娜.自主学习与动机调控策略研究[J].外语研究,2017,34(04):49-52.
- [8] 王幼琨.大学生英语学习倦怠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 响: 动机调控策略的中介效应[J].山东高等教育,2023,11(04):70-76.
- [9] Li C, Jiang G & Dewaele J-M. Understandi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J] . System, 2018, 76: 183 – 196.
- [10]林莉兰.基于三维构念的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力量表编制与检验[J].外语界,2013,(04):73-80+96.

The Explor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burnout and learner autonomy between undergraduates and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Zhang Jing¹

¹ Schoo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enang, 11800, Malaysia

Abstract: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underwent varied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language enjoyment, learning burnout,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ehavior. Through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survey data,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undergraduate and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terms of English learning enjoyment,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ehavior, and English scores from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Gaokao). However, the difference in English learning burnou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s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educators and offer empirical guidance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level general English i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support.

Keywords : Foreign learning enjoyment; learner burnout;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ehavi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75

《好东西》：女性意识的迷失与重塑

曾雪枝¹, 王 竣²

(1.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9; 2.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 在“她经济”浪潮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双重语境下, 电影《好东西》以三位女性角色的生活图景为切入点, 试图探讨当代女性 in 自我认同建构中的困境与重塑路径。由剧情观之, 影片突破“悲情叙事”窠臼, 以女性互助的集体叙事对抗个体孤立, 同时借男性角色探讨女性处境。通过生活化的处理与温暖、幽默的细节, 影片为女性自我认同的重塑提供了参照, 亦为影视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建构注入新的叙事维度。

关键词: 影视传播; 女性自我意识; 自我认同; 电影《好东西》; 女性主义

一、问题意识

当前新时代可被视为“她时代”(李昂&王竣,2025)。CBNData 连续六年描绘“她经济”的变迁, 并于 2025 年 3 月的报告指出, “她经济”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力概念, 而是逐步成为女性群体情绪与价值理念的载体。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女性成为文化产业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消费群体。以女性为题材, 女性叙事为主的影视作品闯入公众视野。更加多元和立体的女性形象不断涌现, 她们拥有独立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和多彩的生活。不管是《出走的决心》(2024) 中说出“我等不了了”的李红, 还是《热辣滚烫》(2024) 中哭诉“怎么一点伤都没有”的乐莹, 她们的出现让更多女性不被看见的情绪得以表达。

2024 年 11 月, 中国青年导演邵艺辉的新作《好东西》在金鸡百花电影节首映。凭借独到的情感描绘与“诗意”叙事风格, 影片反响热烈。截至 2025 年 4 月 16 日, 好东西累计综合票房 7.21 亿, 在《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4 年观众高满意度影片》中, 以 86.8 分位列榜首。影片以王铁梅, 小叶, 王茉莉三位女性为主要塑造对象, 描绘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下单亲母亲、年轻女性、小女孩三个阶段女性的困境与相互救赎, 借角色之口娓娓道来映射现实生活的女性生活细节, 诉说对未来世界的憧憬, 为观众呈现出一部温暖、幽默又不失深度的女性电影。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 大众传播对性别认知的形塑作用愈发显著, 乃至引导着女性气质。进入互联网时代, 女性形象在媒介中的呈现形式趋于极端刻板化, 女性的“性别特质”被不断强化与放大, 而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则被严重边缘化(张恒军, 2012)。这种传播生态与现实境遇形成互文关系: 影视作品的女性形象既是社会性别特质的镜像, 也是规训女性自我塑造的媒介。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女性处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 仍然会因男权社会长期压迫与社会规训丧失自我认同, 这种看似矛盾的状态, 恰恰是自我身份认同重构的必经阶段。

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 《好东西》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突破性意义。影片没有停留在概念化表达的层面, 而是将女性自我认同的挣扎与蜕变过程具象化为真实可感的生命经验。生活化的场景处理与细腻的情感描摹, 使三代女性的困境突破银幕界限, 引发观众广泛共鸣。值得关注的是, 影视作品作为重要的“他者”参照系, 不仅反映现实, 更通过新女性视角的叙事传播应对策略与自洽方式。当创作者以平视姿态展现女性在男权规训与自我觉醒之间的摇摆时, 这种真诚的影像书写本身就成为破除刻板印象的利器, 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身份认同的重塑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文化样本。

作者简介: 曾雪枝(2003—), 女, 四川成都人, 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

通讯作者: 王 竣(2002—), 男, 广西崇左人, 电影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媒体与电影、艺术媒介与社会包容。

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社会规训的冲突

受到每一特定时代的影响,伴随着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女性”这一形象逐渐被赋予了更具主体性的语义内涵。在不断与客体接触的过程中,女性逐渐明确自身主体性的确定证据(程檣,2024)。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作为主体的女性能够基于本体,在意识层面构建“自我”的认知。一方面指女性身体上的自由,掌握选择权;另一方面指的是心灵上的自由,追求自我价值。这种认知源于女性对自身存在的感知,既具备对世界的有限认知,又形成对自身的主体意识。但自我意识的生成一方面依赖个体的内在感知能力,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结构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与规训。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必然充满张力——当社会性规训与内在感知发生冲突时,女性在追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将面临结构性的困境(李婷,2024)。

具体于影片之剧情,影片中王铁梅帮助小叶“报复”尾随男,怒吼路边小便男;小叶用自己肌肉反击“白幼瘦不健康”;王茉莉在饭桌上谈起“月经羞耻”治愈小叶……诸多不曾在影视作品呈现的现实行为让观众感受到女性角色传递出主体意识觉醒的信号。这种具象化的艺术表达,恰恰印证了程檣提出的“主体性确定证据”理论,即女性通过实践不断确证自我认知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在呈现女性觉醒的同时,也通过男性角色的塑造构建了深刻的对照体系。“女权表演艺术家”人设的前夫在影片中并没有自己的姓名,只是王铁梅推文所称呼的“育友”。通过他对自我的“反思”,同小马在车上的交流,道出诸多男性既得利益者的表现。尽管他在言语上给予女性理解,但在行为上仍然存在男权社会烙印。此外,性别权力的角力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更通过群体性场景得以放大。小马和前夫的第一次见面,便在“雄竞”,即男性为获取异性青睐进行的直接竞争。影视作品中对于男性的塑造,常常运用“雌竞”来展现男人的无限魅力,不惜污名化、丑化女性,似乎女人就该围绕男人转。这种性别秩序的倒置处理,实际上构成了对传统叙事范式的双重解构。

日常生活的微观场景往往最能暴露深层的社会规训。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同框,借以言语和行为映射现实生活中多个“约定俗成”。影片中男性在某些方面的无动于衷和女性下意识的反应行为是从小到大的社会规训与默认分工所导致的。当小叶和小马打开汽水不小心喷洒满屋,王铁梅和小叶直接开始收拾打扫,而前夫仅仅扔过纸巾袖手旁观,小马在一旁不知所措。这里传达出两种男性的不同状态,一种已经习惯于享受女性的劳作,另一种是意识到女性的处境但不知如何破局。

餐桌作为家庭权力关系的展演空间,其符号意义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开掘。饭桌是男女地位展现的重要地方,当“男外女内”的形成默认分工时,男性常常在饭桌上居于主导。当王铁梅请“无条件投降”的乐队成员吃饭时,男性成员仅在内部协商点菜,女性则在默默整理餐具。男性在外展现个人“男性气质”,顺其自然考虑自身需求,并不考虑、询问女性需求。在王铁梅家中,王铁梅虽被前夫推上主桌,却仍然以“吃得少”抢夺小叶的碗自己上桌,可见他口中所说的尊重女性、理解女性也是在服务于男性利益基础上的行为,是狭隘的。现实生活中社会将家务、带孩子视作女性分内之事,当有些男性成为“家庭主夫”时,却难以真正在心中摆脱社会对于男女分工颠倒的成见。

三、女性认同的迷失与重塑

(一) 从“他者定义”到“自我命名”

波伏娃在《第二性》(2018)中认为“女性并不是生下来即为女性的,而是在生长过程中逐渐被塑造为女性的”。男人赋予女性以形象,社会又把这一形象加以刻板化、定型化,使其成为刻板印象,从而发挥着社会导向作用。譬如,女性就该擅长文科,学会烹饪,能歌善舞,似乎这些特征就是永恒的女性气质,不然就不够“淑女”。因此,当人们面对女性的其他特征,不论多么真实,人们则持以怀疑,趋于否定。在父权文化中,女性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应该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摆脱自己的本真性又不断重构自己形象的过程(孙燕,2004)。

这种他者定义的困境在当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尤为明显。于电影《好东西》,王铁梅无意间收到王茉莉的作文《我不再幻想》,匆忙赶去接女儿放学,得知乐团老师评价王茉莉——“没有团体意识,脱离大众”,因此需要留下同乐团一起训练。王铁梅为增强女儿信心,打算让王茉莉学门乐器。学习乐器一直以来都作为拓宽孩子特长的选择之一,甚至出现兴趣班攀比的现象,就算是不喜欢乐器的孩子也不得不卷入这场漩涡中。同样的,语文老师给班级布置作文《一次难忘的旅行》,身边的同学都写出国游,不想显得“低人一等”的王茉莉故作轻松对同桌闻闻撒谎说自己写法国。学乐器和出国游的根本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符合社会期待,融入群体对于某一群体的印象,其中不乏人与人之间互相攀比的心理。

当社会期待与个体选择产生冲突时，代际间的观念碰撞往往成为突围的契机。王铁梅并不强迫王茉莉学习乐器，但在小叶的开导下，想要去做女鼓手。王茉莉第一次接触打鼓，询问道“女孩应该怎么打鼓”。架子鼓常常因男人使用而逐渐作为男性特征的符号，因此王茉莉在潜意识里不知道如何进行此项行为，希望得到男性的指导。但某一行为本身并无规则，乃至正误之分，有的只是世俗眼光如何看待。小叶告诉王茉莉：“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鼓励她去追求自己。王茉莉从“我喜欢做观众”，听完大家的鼓励想做飒爽帅气的女鼓手，经历内心挣扎完成 live house 演出后还是认为自己喜欢做观众。她充分感受到自己目前最喜欢的是写作，认为多尝试比短期决定最喜欢的事物更重要。在王茉莉的自我意识中，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是被规训所以产生“喜欢做观众”。而当所有人都劝王茉莉去喜欢代表“独立女性”应该喜欢的、重构传统女性符号的事物，她在尝试之后做出了代表自我的选择。个人拥有自由去做任何喜欢的事情，也可以跳脱出所有的规训，不受任何主义的枷锁，找出自我。

（二）从“传统性别”到“自我突破”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性别规训，实质上是整个社会性别观念体系的具体投射。这种投射在母亲角色的塑造上体现得尤为典型。“母亲”这一形象，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受到几千年以来“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父权观念的极大影响。不管是《渴望》（1990）中“相夫教子、贤良淑德”的刘慧芳，还是《家有儿女》（2005）中任劳任怨的“贤妻良母”刘梅。她们的身上被赋予着固有女性特点，即家庭主妇、依附男性、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这些特点因作品传统观众的喜爱受到大量传播，逐步形成对女性分工的固有观念，影响着一代代观众（文丽敏，2013）。

这种传统母亲形象的突破，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王铁梅不同于以往的“母亲”这一形象，她不再是男凝视角下的工具，而是一个独立坚强的单亲母亲。她同所有的母亲一样，要对家庭负责，要照顾孩子，但不同的是，她拥有自己的事业，不依附于男人。即使如此，她仍然因为生计无法继续追求新闻理想，而“认清现实，放弃幻想”，为了家庭撰稿带货。当她发表《单亲妈妈必须过得很苦吗？》受到大量网暴后，陷入自我质疑。评论区中的言论极其犀利，“你以为你在解放女性”，实则不然。男同事“泼冷水”的表现不仅传递出当下女性困境并不能通过少数人努力而改变，还暗含社会环境长期积习下的困难。但只有真正将单亲妈妈的处境暴露，不再沉浸在虚假、重复的叙事中，女性的困境才能真正得以被看见。这类似于鲁迅先生铁屋理论（2020），女性主体觉醒的是少部分人，呼喊的声音愈大，才会有愈多的女性在固化的观念中苏醒，挣脱压制在女性身上的枷锁。

这种觉醒过程往往陷入新的困境。这同样也说明社会将女性价值绑定于“贤妻良母”角色，导致职业女性陷入“双重负担困境”，尤其是承担双重角色的单亲妈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当代女性题材影视作品中对于完美女性形象要求是苛刻的。社会观念逐渐从女性“主内”转向能够家庭与事业两手抓的女性才是成功的（吕优，2023）。王铁梅全能、坚强的形象不仅吸引着小叶，还吸引着母亲早逝的小马。两人都格外喜爱王铁梅。但王铁梅也囿于这一形象，面对网暴的时候否定自己的所有，折射出社会对女性“全能型完美人设”的过分苛刻，王铁梅也受限于社会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社会规训往往披着进步的外衣悄然登场。当下，“独立女性”这一概念已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标签化存在，甚至内化为许多女性群体自我规训的隐形标尺。当代影视剧对“大女主”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现象，成为推动女性群体不断拔高自我要求的意识形态工具。通过叙事与角色塑造，这种观念被巧妙地转化为女性对自身的期许，进而规定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生存姿态、自我认知以及生活方式。表面上看，这种现象似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由男性主导的外部规训，而是女性群体自发形成的要求。然而，其本质依然是对女性群体的深度压迫——只是这种压迫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察觉，甚至因缺乏明确的对抗对象而让女性陷入无从反抗的困境。当压迫性内容转化为女性的自我要求时，反抗的现实基础也随之瓦解，形成一种隐性却强大的社会规训机制（朱凯，2022）。

（三）从“他者对照”到“自我重塑”

这种新型规训的破解之道，或许存在于人际关系的镜像重构之中。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自我”的构建由“自身”与“自我”的对应物两者所组成。当母亲与孩子出现在一部作品中时，双方互为镜像（江凌&丁雅洁，2024）。孩子在成长阶段需寻求模仿的对象，常常身处家庭给予孩子更多陪伴的母亲便担负起这一被模仿对象。对于成人来说，成人常常通过“对应物”构建理想自我。王铁梅认为自己的女儿很敏感，不随自己，总是护着她。对于王茉莉而言，母亲肩负着赚钱养家的责任，从小受到父亲照顾的她不免受到父亲的影响，但她一直很崇拜曾从事于“调查记者”的母亲，视作自己的榜样。她看完王铁梅所有的报道，还继承

母亲的写作天赋。母亲在报道中的言论也逐渐成为她心中的认可与行动的指南。

镜像关系的重构需要突破自我认知的惯性。小叶是一个从小因原生家庭缺爱，讨好性极强的“恋爱脑”女孩。即使上床对象小胡从不主动留夜，从不送小叶回家，仅仅是在关键时刻给予情绪价值，小叶依然倾心于他，精心打扮主动去找他。当得知小胡是“海王”后，小叶假装当妈，“借用”王茉莉当女儿等自认为不让男方觉得掉价的形式试图将不平等的关系合理化。看似反击，实则是对自己的内向消耗。原生家庭的影响致使“讨好性”伴随小叶，当母女俩因“撒谎问题”在小叶面前吵架，小叶在王铁梅面前败露“假当妈”，她立刻道歉将原因全部归为自己，十分恐惧关系的恶化。王铁梅用心感受着小叶的苦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她的出现让小叶看到了另一种独立女性的生活方式。王铁梅因小叶“假装当妈”而“生气”，但也理解小叶心中爱的缺失与渴求。两人抱在一起的谅解是给予小叶不同于童年的救赎。小叶在与母女俩的相处中逐渐拥有归属感，也逐步重塑自己的自我认同。在王铁梅因受到网暴天台落泪时，小叶以人的有限性与脆弱性安慰王铁梅，由此可看出小叶在“自我”上并不受到社会规则约束，她有着对“自我”的坚持，以及对环境的反省与洞悉。

四、集体叙事的构建与个体困境的消解

深入女性的精神世界，探究其所面困境的真正原因，思索引发女性同频的深层次原因，直面女性在面临生存压力的真切状态。程檣（2024）认为，相较于一味的“教导”与“口号”，通过共情的表现去还原女性真切的生活图景更容易满足女性观众的情感诉求，也让角色形塑与传统女性角色有了本质的区别。这种叙事策略的突破，在近年女性题材影视作品中逐渐显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以《好东西》中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为例，她们的关系由双轨逐渐归为一路，在动态发展中完成了共鸣、理解到互相帮助的蜕变。影片中多处从现实生活中进行艺术化处理的片段让观众不免会心一笑。王铁梅做家务的声音与王茉莉童真的猜想所构成的声音蒙太奇，正是同为女性的小叶所观察到的单亲母亲日常。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恰恰在日常又细微的地方见证着单亲母亲的“无所不能”。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关系的递进始终伴随着互助行为的具体展开——小叶在王铁梅繁忙时陪伴王茉莉，成为母女间的润滑剂；王铁梅洞察小叶缺爱，以朋友的身份给予其未曾拥有的归属感；王茉莉则以出生那年的报道抚慰母亲，用最直接的赞美给予小叶情绪鼓励。正如田秋生、王琴（2023）指出的，“女性帮助女性”的深层动因，源自对彼此生存境遇的深刻体认，她们知道女性为解放做出的努力。当社会仍存在诸多性别枷锁与偏见时，这种基于共同生命经验的互助与救赎，呈现出超越个体利益的纯粹性。

然而，女性自我认同的建立并非仅靠女性自身的努力就能完成。影片在展现女性互助的同时，也构建了具有突破性的两性对话场域。在饭桌场景中，男性与女性可以平等探讨敏感的性别议题；live house演出前，王茉莉从小马手中接过鼓槌、共同登台的画面，暗示着两性协作的可能性。这种处理印证了张丽丽、曹彦菊（2024）的观点：男性对女性处境的理解与支持，既能拓宽女性在社会场域中的作用维度，也有助于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深化。当两性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桎梏，在人性层面建立连接时，真正的性别平等叙事才可能获得更为稳固的根基。

五、结语

电影《好东西》以三代女性角色的生命经验为叙事主线，通过细腻的日常场景与深刻的性别议题探讨，揭示了当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面临的认同困境与重塑可能。影片通过单亲母亲王铁梅、年轻女性小叶与少女王茉莉的群像塑造，展现了女性在传统规训与主体觉醒之间的摇摆：从“他者定义”到“自我命名”的挣扎，从“传统性别角色”到“自我突破”的尝试，再到通过“镜像重构”实现主体性的觉醒。这一过程既暴露了社会结构对女性主体性的隐性压迫——如家庭分工的固化、完美女性人设的绑架、“独立女性”标签的异化——也通过女性互助的集体叙事与两性对话的平等尝试，为女性自我认同的重塑提供了实践路径。

影片的突破性在于其摒弃悲情化表达，转而以温暖幽默的笔触呈现女性真实的生存困境与互助力量。三代女性的互动不仅消解了个体孤立，更构建了基于共同生命经验的共鸣场域，使女性议题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讨论。同时，影片通过男性角色的对照性刻画，揭示了性别权力关系的深层矛盾，并尝试探索两性协作的可能性，为性别平等叙事注入新的维度。这种创作实践不仅呼应了“她经济”时代女性对多元叙事的需求，也通过影视媒介的传播力量，推动社会对女性困境的认知从“被看见”迈向“被理解”。

作为一部兼具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作品，《好东西》的局限或许在于其理想化叙事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张力，但其对女性主体性的真诚书写无疑为影视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唯有摒弃刻板化塑造，回归真实生命经验的表达，才能真正实现女性形象的解放与性别话语的重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影视作品中女

性互助模式的文化意义,以及男性角色在性别平等叙事中的功能转型,从而在更广泛的语境中探索女性自我认同与社会结构变革的互动可能。

参考文献:

- [1] 李昂&王竣.(2025).嬗变轨迹·文化症候·未来面向:国产小姐电影的文化审视.美与时代(下),(03),150-152.
- [2] 猫眼专业版.(2025-04-16).截至2025年4月16日,好东西累计综合票房7.21亿.from <https://piaofang.maoyan.com/dashboard/movie?date=2025-04-16&movieId=1491059>
- [3] CBNDData.(2025-03-27).4亿女性消费新趋势:个人情绪驱动下的三重消费叙事|CBNDData报告.from https://mp.weixin.qq.com/s/hNyLqZShTCPiuM_396qAMQ.
- [4] 中国电影报.(2025-01-04).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4年观众高满意度影片.from https://mp.weixin.qq.com/s/C_6UIYPiZOXUB-EeojlNfQ.
- [5] 张恒军.(2012).当代传媒中女性刻板印象批评.新闻界,(01),50-53.
- [6] 程檣.(2024).由“女性”到“她”——国产剧集中女性形象的迭变与期待.中国文艺评论,(04),92-103.
- [7] 李婷.(2024).自我与他者:国产动漫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时空错位与意识表达.电影文学,(16),50-54.
- [8]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2018).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9] 孙燕.(2004).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中州学刊,(05),78-82.
- [10] 文丽敏.(2013).女性仍在被“忽悠”——《家有儿女》的女性形象剖析.江淮论坛,(04),169-172.
- [11] 鲁迅.(2020).呐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12] 吕优.(2023).由《梦华录》看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转型.文艺评论,(01),121-128.
- [13] 朱凯.(2022).中国影视剧中女性形象变迁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04),69-71.
- [14] 江凌&丁雅洁.(2024).女性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的镜像叙事研究——以《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为例.传媒,(21),88-90.
- [15] 田秋生,王琴.从私下到公开:中国女性电影叙述声音及话语权威的流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03):53-60.
- [16] 张丽丽,曹彦菊.新主流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及话语叙事探索[J].电影文学,2024,(16):45-49.

Her Story: The Loss and Reshap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Zeng Xuezhi¹ Wang Jun²

¹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China

²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Abstract: In the dual context of the "She Economy" wave and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subjectivity, the movie *Her Story* takes the life scenes of three female charact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dilemma and reshaping path of contemporary women in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ot, the film breaks through the stereotype of "tragic narrative" and uses a collective narrative of women helping each other to combat individual isolation, while exploring the situation of women through male characters. Through life oriented processing and warm, humorous details, the film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shaping of women's self-identity and injects new narrative dimension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Keywords: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Female Self-awareness; Self-identity; The movie *Her Story*; Feminism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66

“美丽的新世界”萌芽：《我城》的乌托邦书写研究

初瑛竺¹

(¹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我城》不仅标志着西西香港意识的萌发，也构成其乌托邦书写的开端。西西在《我城》中构筑出具有独特思想内涵的“香港乌托邦”图景，其核心可从人与城市、人与自然以及时间维度三重关系加以理解。这一乌托邦构想不仅展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也折射出彼时香港社会的复杂处境与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乌托邦书写体现出作者对当时香港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承载着对未来社会结构与多重关系的积极展望与美好愿景。在理想与现实的交错之中，乌托邦不仅成为西西批判现实的镜像空间，也成为想象未来共同体的精神寄托，展现出西西对香港现实及其未来可能性的深切关怀与思考。

关键词：西西；《我城》；乌托邦；香港

在香港文学史中，西西的《我城》无疑是一部如地基一般的经典名作。《我城》于1975年开始在《快报》连载，1979年发行第一版单行本^[2]。此前其文本解读和研究方向多种多样，此后也将随着读者和研究者不断地阅读和挖掘，生发无限阐释的可能。在之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我城》的探讨大多聚焦于城市书写、本土意识、童话写实、跨媒介等方面，多是针对《我城》这本书的写作手法，较少联系到乌托邦这一文学讨论中的经典议题。而在少数关于《我城》与乌托邦的研究中，陈洁仪的《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与现代性》^[1]从地域空间视角探讨“我城”与恶托邦的关系；王蕴懿的《美丽的新世界：谈西西的乌托邦书写》^[2]结合《我城》、《飞毡》和《我的乔治亚》三部作品，综合分析西西乌托邦书写的脉络，并认为其乌托邦书写进程呈现为内在统一的多重变奏。然而在上述两篇文章中，一篇以点带面，目光聚焦于科幻元素、现代性与恶托邦；一篇则是主要关注《我的乔治亚》，对《我城》乌托邦书写的整体分析不够全面。然而，纵观西西的写作历程可以发现，《我城》不仅是西西香港意识的萌芽，更可以说是她乌托邦意识呈现的起点。西西的乌托邦意识为何从《我城》开始生发？其乌托邦书写又如何如何在文本中得以初步呈现？诸如此类《我城》与乌托邦意识和书写的联结亟待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本文将以“乌托邦书写”为基点，对《我城》进行深入解读，探索西西在《我城》中渗透的乌托邦意识，为研究西西的乌托邦书写做进一步扩展与补充，并进一步考察这一乌托邦书写如何映射出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与文化愿景。

一、乌托邦·我城·香港

乌托邦 (Utopia) 一词来源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于151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在这本极富有创新性和想象力的作品中，莫尔借探险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描述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国度，即乌托邦。从构词层面上来看，“Utopia”囊括了希腊语的“ou” (表否定) 与“topos” (地域)，直译为“不存在的地方”；但同时，这个词又暗含“eu-topia” (美好之地) 的谐音双关，由此构成一语双指。因此，乌托邦既表示无处可寻的幻想之境 (不存在的地方)，又最终指向人类的完美社会追求 (美好之地)，具有批判现实与构建理想的双重属性。

“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3]。纵览此前种种乌托邦形象可知，孕育乌托邦意识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现实世界里有一个急需改进、令人不满的社会。例如，莫尔的乌托邦对彼时英国的社会阶级分化、资本主义的罪恶表示了不满；柏拉图笔下的乌托邦形象“理想国”对希腊社会的现实、政治和教育进行了批判；陶渊明的“桃花源”基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香港文学中的‘香港书写’与岭南文化认同研究 (1985—2017) (21CZW047)”；本文获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香港文学中的饮食书写与岭南文化认同研究” (2025KYLX023) 资助。

作者简介：初瑛竺 (1998-)，女，山东烟台人，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香港文学。

^[2] 西西的《我城》单行版版本共有四种，分别为素叶版、允晨版、素叶增订本、洪范版。本论文使用版本为承袭洪范版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内地版本。

的东晋而诞生,西西“我城”的现实基础——香港,也是如此。众所周知,香港的经济于20世纪70年代起飞,而《我城》反映的是正是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港督麦理浩于1971年上任之后,在任内推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中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发展新市镇、扩展中学及高等教育、改善社会服务及设施、打击罪恶等”^[4]。这些改革使香港社会面貌发生深刻转变,港人因此充满斗志与希望。经济发展带动身份认同的增强,香港逐步摆脱边缘地位,港人更多开始关注本土,并以身为香港人为荣。由此港人逐渐产生香港意识,香港作家开始进行“香港书写”^[5]。此种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是西西进行“香港书写”的动因之一,西西爱香港,也通过笔尖反映香港,因此“我城”意识和《我城》就此诞生。然而希望与忧虑并存,彼时的香港伴随经济发展也产生许多社会问题。面对石油危机、人口膨胀、淡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电力紧缺这些社会问题,西西借助阿发班主任之口表示了对当下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待:“目前的世界不好。我们让你们到世界上来,没有为你们好好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实在很惭愧……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的新世界。”^[6]值得注意的是,“美丽的新世界”来源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西西在书中有意且多次使用该词组,正是其乌托邦意识的一个明显表露。西西本人也在手稿中对乌托邦有这样的评价:“好像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我的体内就埋着那样的一粒种子,不时发芽抽叶,令我不安于室。”^[7]实际上,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二者融洽地相交辉映于《我城》中,其动因都是源于一种“不妥协、要改善现实的精神”^[8]。西西谈到《我城》的时候说过:“以往我写的是存在主义式的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图》等等,都相当灰色……这小说不同,看事物抱持另一种态度,开朗多了,收结也充满希望。出现了一个地图上没有的新大陆,大家可以搬到那里去。”^[9]这个“地图上没有的新大陆”,不仅是西西在当时的香港环境下建设心灵家园和精神家园的乌托邦书写,也是她用来构建理想社会生活与和谐人际关系的载体,西西笔下营造出的“我城”正是她乃至无数港民心中的“香港乌托邦”。可以说,因为香港意识的生成,西西写出了关注香港的《我城》;又因为彼时香港社会存在许多问题,西西在表达不满的同时对香港的未来进行展望,以乌托邦的形式对“我城”进行虚幻建构,同时对现实社会的危机进行乌托邦式的解构与“童话”和“寓言”式重塑,其乌托邦书写于此得到初步展现,因此“《我城》可以说是西西乌托邦的构建”^[10]。

二、“我城”中的人与城

纯洁高尚的人格、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以及稳固牢靠的社会结构一向是乌托邦社会的核心追求之一。当西西面对飞速发展的香港,感受到资本主义以一种迅猛的态势席卷香港并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结构时,她的不安与担忧也随之而来。在《我城》的乌托邦构建中,她对众多个性迥异的角色进行塑造,使人物展现出一种趋向极致的人格崇高性。这些人物具备纯善、乐观等理想化品质,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为“我城”做出个人贡献以维护社会稳定。在近乎稳定和谐的社会背景下,人的本性逐渐被引导至完美状态,从而超越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文本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构建出一种接近无暇的纯净状态,进而逐步建造与表现高度和谐的社会关系。通过对人本身、人际关系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西西展现了对“我城”这个美好社会的文学想象,实现对社会现实的理想化超越,同时蕴含对现实社会局限性的思考。

(一) 至真至善:人的主体性与纯洁性塑造

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通过对个人集体化的描绘,试图消解个体的独立人格,削弱人物的个性特征,使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吞噬个体存在。与此相反,西西将创作视角聚焦于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在希伯来先知者关于乌托邦的叙述中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个人,此后乌托邦叙述注重对个人的主体性及美好品质的书写,“个人”因此成为乌托邦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通读文本可以发现,书中没有固定的主角或处于中心位置的主人公,即角色无主配之分,人人都是“我城”的主角。随着叙述人物的转变,叙述视角也是移动的,“每一个人物或场景的单元不啻一个固定的视点”^[11],这极大地突出了人物形象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和存在价值。不仅如此,在主体性之上,还可窥见人物之间“内在的联系”。此种联系可以理解为是人物的聚合,是对香港年轻一代本土青年的整体形塑。这主要体现在“我”——阿果身上。阿果是《我城》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也只有阿果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其余叙述者在叙事口吻上则处处蕴含阿果的影子,与阿果具有相似性。如果说阿果是香港新生代青年的“点”,那么其余人物则是香港本土青年的“面”。所有人物既是自己本身,也是千千万万个香港“阿果”的缩影,即20世纪70、80年代香港新生代群体的代表性象征。正如何福仁所言:“《我城》的我,是小写的我……这个我,当然是主观的创造;是表现,而非再现。”^[12]《我城》的众我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改善“我城”的环境,就必须改进自我,然后众志成城。“然而这样子的我,平凡里已见不平凡。所以书名《我城》,而不是《我们的城》”。^[13]通过描写日常人物

的奉献,《我城》彰显了个人自由意志与主体性的价值,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独立性与自我决定的力量。

在这座城中,阿果、阿发、麦快乐、阿北、悠悠、阿游等人的工作与生活虽显平凡,却蕴含深刻的人文意涵:“如果说《我城》是有关某个时空的年轻人的小说,则这种形式,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体现了年轻人美好的质素:开放,乐观进取,不断发展,充满可能。”^[14]他们皆秉持善良纯洁的品性,展现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并以温和的视角关照“我城”,体现了对生活的坚定信念与美好追求。西西认为:“香港有许多这样的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穿牛仔裤唱民歌,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不会放在嘴边,对生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我写他们,写他们的生活态度。不过,我可不想太突出其中任何一个,不要忘记,那是反英雄的时代。他们做的不过是卑微的工作:看守公园、修理电话,没有什么了不起,生活环境却困难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乐乐。这小说是献给这些无名英雄的。”^[15]当阿果谈到其职业规划时,邮差、清道夫、农夫、渔夫等平凡的“蓝领”职业都是志愿的一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余人物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我城”的发展贡献个人力量。根据“异化论”可知,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往往会伴随人性的异变。然而西西却反其道行之,在书中赋予人物纯洁高尚的人格和趋于极致的单纯和善良,这在麦快乐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例如,麦快乐帮助游客赶走黄蜂而自己的双手却被叮肿,牺牲两天的午餐费刊登失物招领广告,帮助阿果适应工作,自己多承担工作等等,都是其善良的体现。文本与现实对读见,这种描写实际上是西西对当时香港社会情境的情感投射,体现了她对现实中人性的思考和重构。西西以孩童视角和童话口吻描绘“我城”,塑造一群至真至善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纯洁与崇高。这恰恰是对现实人性关系弊病的强烈反思与深刻批判,呈现了一种渴望回归真挚情感与人性关怀的理想状态。

(二) 打破冷漠: 人际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西西在文本中多次表现出机械工业社会带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情感的冷漠,这也是反乌托邦文学着重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间离状态。在第4节中,西西明确表示:“现在可是引力能的时代了,一切都变了许多,那么触目即是的人,那么繁琐的工作,想彼此了解多一点,实在很困难了。”^[16]这体现她对图腾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向往。在第10节中,则体现她对人际关系的进一步思考。西西塑造了一个被包裹的世界,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断。在这里的人与物都被包裹起来,失去与外界沟通的途径,“包裹是意味人们不相往来了”^[17]。在整篇文字的叙述和渲染下,城市呈现出一种缺乏活力的状态,充斥着沉闷与萧条。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显得极为匮乏,社会关系趋于冷漠,体现出一种情感上的隔阂和人际关系的疏松。不过西西依然内置希望在其中——一个舞挥着一把剑朝周围刺割的人。西西并未对该人物有过多描述,其形象显得尤为模糊。因此,此人物具备某种程度的泛指性,亦可视为“任何人”的代表。西西将生机蕴藏在剑中,以第二人称的叙述将读者也带入包裹世界,并且试图将这把剑传递给“你”。“你”要选择继续留在包裹里,还是割破一个个城市的包裹?这既是她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抗和不满,也期待着读者从故事中得到启发和收获,运用这把“剑”,和她一起积极割开包裹,构建美丽新世界。

乌托邦社会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不过《我城》中塑造的人际关系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十分和谐融洽的状态,而是伴随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在第6节中,麦快乐因打扮新潮,被社区居民误认为“不务正业”,并因此在赶电梯时被留在电梯里。尽管他竭力为自己解释,但仍未能打破刻板印象。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慢慢搭电梯并主动打招呼,最终逐渐获得居民的接受。麦快乐作为香港新生青年的代表之一,与阿果有所不同,他的“牛仔裤”和“长头发”代表的是一种新潮思想。居民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到逐渐接受,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开放、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贯穿始终,最终指向的是对人际关系的建构,以及多元社会价值体系的认可。西西通过麦快乐的经历,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从冷漠疏离到和谐共处的转变,成功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病态人际关系的重塑与调整,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建构和人际关系的复归。

虽没有在一开始就呈现完美的人际关系,但西西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关注在《我城》中也有体现。同样是在第6节中,麦快乐对于公园门口的“黄人绿狗,不得入内”十分愤怒,于是自己写了一张“咖啡或茶,免费供应”的牌子替换,并表示将来的公园就会如此。这是对未来的展望:人与人之间没有歧视,而是一种平等温情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展望与重构作为西西乌托邦书写的关键组成部分,展现了一种充满生机的未来图景,成为构建理想社会的核心要素。它不仅是乌托邦人性表现的载体,更通过其内在的张力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推动了社会关系的重塑与情感的复苏。西西“敏锐地遇见了全球化征象下的市区重建、经济转型所导致的‘有机社群解体’……她‘寄望于人际的沟通、文化的觉醒和多元开放’,从而建立互助信任和开放包容的有机社群。”^[18]

三、人与自然——和谐与抗争

在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描绘占据重要地位。自然不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而是共生共存的伙伴。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反映了人类对于理想生态秩序的追求：“只有实现了生态理想，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理想、道德理想、人格理想；反之，如果缺乏生态理想的引领和烛照，则不足以在社会发展、道德修养、人格建构等方面达到理想境界。”^[19]由此可见，生态理想深嵌于乌托邦的社会结构中，为其稳定发展提供自然支持。在《我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和谐”与“抗争”两种互为张力的模式：一方面体现在对自然与事物的尊重与顺应，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也不乏人类在极端环境中对自然的抗衡与挣扎。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关系中，构建出一种人与自然的深层互依关系，使自然既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成为乌托邦叙事的内在支柱。

（一）尊重与顺应：万物有灵

“万物有灵论”（Animism）来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该观点认为“自然界中遍布‘类人’的生命和意志”^[20]，即万物皆有其内在的生命力与意识，具备独立的情感结构与认知方式，能够对外在世界作出反应。“万物有灵论”因应的是人类社会进入人类世以后遭遇的巨大生态危机。^[21]香港的能源主要依赖进口。在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国际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电力供应面临压力。另一方面，由于香港长期依赖火力发电，能源的使用不仅成本增加，而且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1]此外，香港的河流和地下水稀少，水资源匮乏，再加上人口激增，香港面临水资源紧缺的问题。所以，当西西建筑“我城”时，对万物几乎都赋予灵性，她以此种方式构建理想中的人与生态。“我城”里的房子是开朗活泼的，字词和存钱罐会肚子饿，电线杆也有触觉，巴士喜欢闹脾气，草会对人喊话，袜子也有愿望……所有事物在西西的笔下都拥有了自己的灵性，人与万物在这个城中和谐相处。在城市空间中，事物不仅具有自身的思想与个性，作为城市主体的人类亦展现出对城市万物的充分尊重。这种人与物之间的互为主体、彼此尊重的关系，构成了城市生态的一种和谐共生。例如阿果遇到浴缸会道午安，阿邮和大炮们打招呼，阿傻替大炮拍照等等。神性与灵性弥漫“我城”中，“人仅仅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在大自然中只有与其他生命同样的、而非更高的地位”^[22]。西西笔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一种基于平等与共生的互动结构。在这样的关系中，城市并非是人类意志的主观产物，而是由包括自然元素在内的多重主体共同参与构建的有机整体。正是这些富有生气与灵性的非“人”事物的参与，使城市空间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生命力与内在和谐。西西通过赋予万物以灵性，展现出她丰富奇幻的想象力与对未来理想图景的积极建构。这种书写不仅体现了她对自然与人类共生状态的设想，表达了对理想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同时也构想出一个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乌托邦。

（二）抗争与挣扎：不必担心

乌托邦文学在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界时，并非是一味地顺应与屈从，而是展现出人类主体对自然的回应与合理利用。随着科技进步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人利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逐步改造自然、满足物质需求。然而，这种对自然的持续干预也带来了生态失衡与环境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在经历经济飞跃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西西试图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使人与自然的互相依存关系找到新的突破方向和可能，进行生态乌托邦的美好构建。在此背景下，她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深入反思，并在《我城》中予以艺术化呈现，同时表现其乐观心理。《我城》的第11节集中反映了生态问题，西西写“石油枯竭了”和“水库干涸了”等资源危机。她在构建生态乌托邦的时候，不反对人类对自然做合理范围内的改造，而且支持在不过分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下，让人类拥有自己改善生活环境的权利。例如城中居民在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用斧头砍闪电，抢集电光；利用各种容器储蓄水资源，使用各种方法储存能源。尽管文本中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这类带有夸张色彩的叙述策略，实则是西西在构建其生态乌托邦“我城”过程中的一种艺术性想象与有为之的选择，旨在通过非现实化的表达强化其对理想生态秩序的构想与批判现实的力度。在虚幻与现实对应下，她同样表达了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不必过分担心的”，“对于这个世界，你无须感到绝望”^[23]。

在面对现实这些生态、资源、人口危机的时候，西西并没有采取逃避的态度，而是积极应对。她在文本中试图解决用电用水问题，让城中人生存得到保障，同时也显示了西西对于这座城的乐观期待和愿望：人们在面对能源危机的时候，没有放弃，而是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文中借新闻评述员的视角叙述：他从

[1] 参考央视中文国际：《国家记忆·香港生命线》之《照耀明珠》。

来不曾见过别的城市发挥过类似的同舟共济精神，因此很是感动；同时，他忽然对人类、世界，重新充满信心。^[24]在西西的笔下，城中的人类努力实现“对自然的适应、与自然的和解、与自然的交融”^[25]。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调整自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逐步实现与自然的协同共处，从而构建出一种和谐共生的理想生态图景。

四、时间维度——向前看和向后看

《我城》的叙述缺乏明确的时间指向，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时间递进结构。基于此，贺小力提出《我城》存在三重时间建构：凝固的时间，流动的时间，幻想的时间。这种划分方式认为文中时间是主观的，“时间的分层是通过共时的行为产生”^[26]。然而，细细拆解小说中的叙述，可以发现文本中其实存在“隐形的时间”。西西并未直接给出准确的时间点，而是以意识为载体，以当下为依托，回溯过去，展望未来。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认为，“每一种乌托邦都在过去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基础——既有向前看的乌托邦，同样也有向后看的乌托邦……被想象为未来理想的事物同时也被投射为过去的‘往昔时光’——或者被当成人们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到其中去的事物”^[27]。这提醒我们，乌托邦不仅是对未来进行美好遐想的产物，同样也会从过去社会中提取理想元素进行建构。事实上，西西在《我城》中所呈现的时间意识体现为一种与主体意识紧密交织的内在时间结构。时间不再是线性、客观的背景，而是随意识的流动而变动，与现实的当下形成对应与交汇，展现出一种隐秘而深层的时间意识形态。换言之，西西呈现的是一种心理时间，而非现实中真正流逝的线性时间。这恰与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时间观相似：过去在记忆里，现在在感知中，未来在期待中。^[28]西西正是立足当下，通过向前看与向后看，进而于无形的时间意识中蕴含乌托邦的建构。

（一）向前看的乌托邦——展望未来

“向前看的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是基于现在向未来推进的，它所描述的是关于未来的愿景，这是一种展望性的文学想象。“未来意识与对‘新’的向往，是《我城》里最显而易见的时间痕迹”^[29]。《我城》的开篇以阿果父亲的葬礼为始，这一事件不仅象征着父亲生命的终结，也标志着主人公阿果新生活的开启。随葬礼而来的搬家成为叙事的新起点，开启了阿果生活变化和个人成长的新历程，从而引出时间意识中的“新”。葬礼在文本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它既是死亡的具体展现，也是时间更替的契机。在第9节中，西西通过对出殡场景的细致描写，深化了这一意识。她在章节结尾写道：“在这个城市里，每天总有这些那些，和我们默然道别，渐渐隐去。”^[30]此处的“道别”寓意着过去的消逝与未来的开启。而在对死亡的描述里，西西更明确指出：“人是不生不灭的呵。你以为我死了之后，我就没有了么。什么地方没有我呢，我成为历史，我成为过去的经验，我是过去与未来的一道桥。”^[31]死亡在此被赋予具有超越性的时间意义，其不再只是象征终点，而是成为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体现出她鲜明的未来意识。此外，在第18节的收束部分，文本以连续5次“再见”结束。重复性的词语既构成了对“过去”的情感告别，也象征着城市与人物将持续向未来行进的开放性。文中对未来的准确书写出现在第4节和第5节中，西西在这两节中准确使用了表未来的词——将来，这是西西未来意识的显著表达。在第4节中，阿果作文的题目是“将来”，其围绕“将来”表明了自己的愿望，阿果希望将来可以拨电话到月球、土星、银河上，这种具有童真的愿望也暗含科技可能带来的乌托邦图景。电话作为70年代的新兴科技产物在《我城》中频繁出现，成为连接现实与未来的重要媒介与承载“我城”未来发展的叙事工具。在第5节中，阿发的愿望之一是“将来长大了要创造美丽新世界”^[32]。“将来”作为明确的时间指示词，将叙述视角从现实抽离，投向具有开放性的未来。将来的“美丽新世界”显然承载着理想化的未来图景，表达了对社会整体进步的期许，使文本由当下的城市现实转向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场域。而西西的未来意识同样体现在对本土空间之外——外太空的遐想，她在文中多次将地球与宇宙联结，进行一种互动式的未来书写。书中的第1节搬家、第3节超级市场节目、第4节以“将来”为题写作文、第18节与陌生声音对话均可见外太空或宇宙的元素。特别是在第18节中，阿果与神秘声音的对话体现了西西对未来的美好遐想：人类会在新的星球上建立美丽的新世界。^[33]这是对前文阿发愿望的回应，也是西西对未来的眺望与书写。通过对未来图景的持续想象，体现了西西在乌托邦建构中指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乌托邦不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在对未来的展望中被具体而稳固地塑造为一种可能的现实。

（二）向后看的乌托邦——回溯过去

“向后看的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是追溯式的，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和复归。在《我城》的时间意识中，明显蕴含一种对以往的追寻。这种追寻并非单纯的怀旧，而是牵涉对身份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深层探究。西西通过回溯性的记忆和叙述穿插，实质上是对自身及集体身份的持续探问与重构。陈洁仪认为这可以使用

拉丁美洲的“立根小说”概念来解释^[34]，而笔者认为，这体现了西西的“寻根意识”。当香港在英国和中国的夹缝中生存之时，港人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身份上的不安意识进一步加剧。在“现代‘入侵’之下，‘前现代’的美好早已失落，‘传统’成为乡愁的乌托邦”^[35]。因此，西西将目光投向过去，意图在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中寻求身份的根源与定位。此种回溯式的身份建构体现出一种典型的“乡愁乌托邦”式想象，既是对“我城”的情感投射，也反映了在现实认同困境中的精神寄托与文化寻求。在《我城》中，“向后看”将香港与中国连接，成为“乌托邦香港”构建的重要支撑。西西在书中将家国意识贯穿，试图找到属于自己和港人的“根”。在文中，她笔触多次涉及对内地的描写，最为明显的“寻根意识”体现第12节与第17节对黄帝的两次书写上。她明确表示喜欢黄帝并愿意做黄帝的子孙，展现出一种重复性的追寻。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一，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承担着凝聚族群意识、构建文化认同的功能。两次书写黄帝不仅唤起港人对民族起源的追思，也显现出对自身文化归属与身份的思考。在《我城》中，黄帝成为联结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从而揭示出西西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对身份的复杂思索与持续追问。在只有城籍没有国籍的尴尬情况下，西西对做一个炎黄子孙依然有很强的执念。这不仅承载着她个人由内地迁居香港的独特经验，也映射她建构“家园^[1]乌托邦”的文化设想。在第13节中，母亲通过记忆追问阿果看见了什么，最后引出了“天佑我城”这个蕴含着乐观精神的愿望。“天佑我城”来源于英国的国歌《天佑女皇》，西西在这里把“女皇”一词改成“我城”，试图打破殖民话语对本土的遮蔽，开启一种基于自身文化经验与主体意识的重新命名过程。在对过去的追溯中，通过“阿游记得”，西西再次将香港与中国联结：我们的国家在地图上是一片形状如海棠的叶子。^[36]空间的轮廓、界限和地理往往被用来作为身份认同的论述工具。^[37]阿游的记忆勾起对国家地图的想象，西西希冀从过去中展望未来，她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其中，构建属于自己的城。

结语

《我城》是“一本有关年青人在这个城市的故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本土意识萌芽的香港活现眼前，既描画美好一面，亦带有时代隐忧，整体是一片希望、朝气蓬勃，正立于发展起步点的年青城市”^[38]。香港这座城市在当时既充满忧虑，也孕育希望。正是基于强烈的爱港情怀与深切的忧患意识，西西创作了在香港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我城》。本文对《我城》的乌托邦意识与书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从乌托邦与香港和“我城”的关系出发，分别讨论“我城”中人与城、人与自然、时间维度的关系。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西西在《我城》中并未构建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梦幻乌托邦，而是通过扎根香港这片土地，进行富有创意的想象，勾画出一个“香港乌托邦”。“乌托邦对理想城市的想象始终伴随着现实城市，同时又与现实城市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既保持了对现实城市的批判性，又具有未来的指向性”^[39]，西西在作品中通过文字塑造的“香港乌托邦”，突破了传统地域的限制，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边界。这一构想不仅体现了作者对香港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突出与批判了彼时香港存在的社会问题，也表现了其对香港未来发展的积极展望。《我城》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想象和现实结合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文化符号，使得文本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保持着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魅力。正如陈智德评价：“香港是一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顾不上理想。如西西这样，沉溺在醒着的梦里，无功无用，实在是这世界分出的一点心、走开的一点神。所以，西西其实是替香港做梦，给这个太过结实的地方添一些虚无的魅影。西西，她是香港的说梦人。”^[40]此后西西也沿着她的乌托邦设想，进行了一系列有关“香港”的造梦，例如此后她在《浮城志异》中塑造的“河之第三岸”，再到《飞毡》中发出“乌托邦就在肥土镇”的感叹，其乌托邦构建也随之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 [1][34]陈洁仪.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与现代性[J].东华汉学,2008,(8):231-253.
- [2]王蕴懿.美丽的新世界：谈西西的乌托邦书写[J].华文文学,2023,(3):91-99.
- [3]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M].章国锋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22-123.
- [4]转引自刘智鹏,刘蜀永:香港史——从远古到九七[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378.原见中央文献编辑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00-501.
- [5]徐诗颖.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
- [6][16][17][23][24][30][31][32][33][36]西西.我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0,49,131,141,140,126,1

^[1]“家园”一词在汉语中原本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寄寓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思乡感、归家感。见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90,61,238,184.

[7]何福仁,甘玉贞,樊善标等.西西研究资料[M].香港:中华书局,2018.

[8]西西,何福仁.乌托邦、敌托邦、异托邦[J].西方科幻小说与电影——西西、何福仁对话[M].香港:中华书局,2018:21.

[9]何福仁.胡说怎么说——与西西谈她的作品及其他 2[J].素叶文学,1983,(17·18):46.

[10]凌逾.跨媒介香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2.

[11][12][13][14]何福仁.《我城》的一种读法[J].西西.我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49,252,254,250.

[15]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M].台北:洪范书店,1997:201.

[18]陈智德.解体我城: 香港文学 1950-2005[M].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9:159.

[19]姚文放.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生态乌托邦思想[J].曾繁仁:人与自然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292-295.

[20][21]杜树海.西方人类学界万物有灵论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23,(5):117-134+142.

[22][25]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1,35.

[26]贺小力.时空的轻盈之舞——论西西《我城》的时空结构[J].名作欣赏,2013,(23):18-20.

[27]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72.

[28]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9][35]陈洁仪.《我城》的现代性:“未来观”与“时间共存”[J].中山人文学报,2008(26):61-76.

[37]ANTHONY VIDLER. 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p.167, 转引自 JANE M. JACOBS. 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3.

[38]《i-城志》编辑小组.有关《i-城志》[J].见香港艺术中心及 Kubrick 编.i-城志——我城 05 跨界创作[M].香港:香港艺术中心出版社,2005:1.

[39]陈岸瑛.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23-131.

[40]陈智德.西西:香港说梦人[J].南风窗,2006,(5):82-83.

The Emergence of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Utopian Writing in My City

Chu Yingzhu¹

¹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My City* not only marks the emergence of Xi Xi's Hong Kong consciousness but also signifi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er utopian writing. In her works, Xi Xi constructs a "Hong Kong utopia" imbued with distinctiv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city, human and nature, and human and time. This utopian vision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while simultaneously reflecting the complex socio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identity issues of Hong Kong during that period. On the one hand, her utopian writing conveys dissatisfaction with and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society; on the other, it embodies a hopeful outlook toward future social structures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 utopia becomes not only a mirror space for critiquing reality but also a spiritual vessel for envisioning a future community, illustrating Xi Xi's profound concern for Hong Kong's present condition and its future possibilities.

Keywords: Xi Xi; *My City*; Utopia; Hong Kong;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76

高校师德师风法治化路径探索

孙宁宁¹

(¹湖北工程学院, 湖北 孝感 432100)

摘要: 本文根据我国高校师德师风的法治现状, 分析了近五年高校教师失德失范的案例, 初步探索了高校师德师风法治化的完善路径, 包含 (1) 建立三权分置法治监管程序, 学生、教师 and 高校、社会组织相互制约; (2) 鼓励社会人士、学生等参与学术监督; (3) 提高高校教师收入, 减少教师的经济压力; (4) 增强高校教师的法律意识。高校师德师风法治化既依赖于高校教师的德才兼备, 也需要培养学生、社会人士的监督和参与。

关键词: 高校教师; 师德师风; 法治化路径

一、引言

近年来, 高校教师失德失范的案例层出不穷, 例如, 2024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性骚扰事件, 2024年北京邮电大学15名学生联名举报导师失德失风, 2023年西南大学教授胁迫学生与其保持三年不正当关系等, 此类事件的曝光也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这类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教师职权的滥用, 当事学生出于对毕业的担心, 或前程的诱惑等原因而选择忍气吞声, 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着极坏的影响, 高校教师职权的滥用与我国有待健全的师德师风法治化建设有着密切关联。在这个信息传播迅速的新时代, 高校教师的师德师风法治化面临着新的形式和挑战, 本文基于对过去高校失德失范案例的分析以及当前高校教育行业师德师风法治建设的现状, 讨论并总结了高校教师师德师风法治化建设的可能路径。

二、师德师风法治建设现状

目前, 我国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以规范高校教师的行为,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关于高校教师失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 这些法律详细规定了高校教师的权利和义务。然而, 除实体法律之外, 保证程序正义是推进高校师德师风的法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对于教师失德失范行为的法治化程序, 不同学校的处理部门具有不同的处理流程, 但这相当于把程序的制定权交给不同主体, 使得高校在治理程序上仍缺乏统一、透明的完整机制。本文先分析近年来的相关案例, 并讨论高校师德师风的法治化路径。

三、案例讨论

经过查阅教育部官网发布的近五年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 发现高校教师存在失德失范行为主要表现为: 性骚扰学生、学术不端、获取不正当利益、发表不正当言论等多个方面。

(一) 高校性骚扰问题

近年来, 互联网媒体曝光了较多高校教师性骚扰女学生的事件, 该类人群凭借自己掌握学生毕业的权力胁迫学生, 并达到自己不被检举揭发的目的。高校性骚扰问题是国内外高校共同的挑战, 欧美国家高校

作者简介: 孙宁宁, 女, 安徽阜阳人, 湖北工程学院教师。

性骚扰问题频发。^[1]根据教育部发布既往典型案例,其中高校男教师的性骚扰案件较多。

(二) 学术不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2024年4月发布了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学术不端问题主要为:干扰基金项目评审秩序,科研材料弄虚作假;剽窃、抄袭他人成果;套取科学基金经费。2024年华中农业大学某教授被其学生举报并核实篡改实验数据,编造实验结果。2020年国际学术打假专家Elisabeth Bik质疑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等人发表的顶级学术期刊,该文章成为中国作者首次被权威期刊《Science》撤稿的文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国科金发诚〔2022〕53号)第四条规定,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依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章程》的规定,具体负责受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投诉举报,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建议并且监督处理决定的执行。因此,学术不端问题往往是个别高校教师学术行为不端而被同行、学生、学术打假人士等关联人士举报被查处才会揭发。如果缺乏对学术诚信的监管,那么学术界将会坠入混沌。

(三) 获得不正当利益

高校教师掌握学生的成绩考核权,平时的学习成绩也关系着学生奖学金、出国升学、评优评先等。学校行政岗教师大多掌管着经费管理、选人用人、国有资产、考试招生等多方面权力。近年来,出现了高校教师利用权力寻租,权“利”交换,利用规则制定权等公权力或个人影响,为特定关系人或团队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仅在2020年通报了30余起高校贪腐案。^[2]

(四) 不正当言论

少数高教教师存在发表不正当言论的男性为,例如,在课堂上发表错误言论,宣扬错误历史观,长期在网络上发布或转发错误言论,在课件中夹带低俗不雅言论,这不仅会造成恶劣的舆论影响,还会误导学生,对他们的未来发展造成相当不利的形象。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认为,教师在决定课堂教学内容方面起着首要作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发表过声明,“教师对课程、教学主题和方法、研究、教师地位以及与教育过程相关的学生生活等基本领域负有主要责任。”类似地,在2007年的《课堂自由》报告中,美国教师协会指出:“尽管教师在道德上有义务遵守经批准的课程准则,但‘课堂自由’为教师提供了广泛的自由,以决定如何处理一个主题,如何最好地呈现和探索材料等等。”^[3]可见,高校教师的言行对学生未来发展影响深远,高校教师的课堂自由也是有条件的自由,必须遵守法律与道德观念。

四、师德师风法治化路径探索

近年来,高校教师失德失范的案例层出不穷,且影响深刻,有必要探索高校教师师德师风的法治化路径,应当合理规范化高校教师的权力,建立完善的监督权、执行权、决策权的制约协调机制,来预防高校教师失德失范的事件再次发生。有外国学者提出包括政策、教育和培训、案例管理和支持结构的预防工作,来完善高校教师师德师风的法治化。此外,旁观者方案、积极的领导技能和其他组织因素对预防工作都有促进作用,且高校教师参与组织文化也可以有效预防此类事件。^[4]失德失范事件的预防工作需要高校教师、学生、学界以及社会的参与。

(一) 完善高校监督机制

高校建立统一的学生事件处理部门来预防失德失范案例,专门处理一系列不正当的师生关系或者事件,从外部社会组织中选取评审库专家成员,轮职介入案件处理过程,并对外宣传普及该部门的职责及联系方式,便于高校教师失德失范事件的预防宣传与学生的求助。这类部门可在电子数据、物证等材料即可启动预防程序,并将案件处理结果将与教师绩效考核挂钩。通过这类部门的设立,形成学生、教师与高校、社会组织专业人士组成专业处理的部门,形成三权分置局面,从而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因此,需要尽快建立高校程序法治的规范性文件,让社会群体了解、宣传、共同监督执行。

(二) 鼓励学术监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可以制定相关办法鼓励社会人士、学生进行学术打假,对于追回的国有资产可以给予举报人部分奖励。上文提到的高校成立的专业处理部门同时也负有协助国际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处理学术不端问题的义务。

(三) 提升高校教师待遇

目前, 高校教师的待遇普遍偏低, 提升高校教师待遇或者给予教师更多机会努力创收, 可以预防教师由于经济压力而出现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根据2009年8月27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并逐步提高。建立正常晋级增薪制度,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有学者提到教育强国建设的艰巨而复杂任务迫切需要充分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应确立“教师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人才”的政策理念; 逐步将“教育行业在城镇非私营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排名”提高到前五名。^[5]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待遇, 防止教师成为社会收入底层, 进而引起社会问题。

(四) 增强高校教师的法律意识

相关部门主要对高校教师、学生进行教育培训, 以案例促教, 以法促改。要培养学生、社会相关人士的举报意识, 形成高校教师不愿腐、不敢腐, 学生愿意反抗、不怕举报失德失范的高校教师, 净化高校的学术氛围, 形成和谐、务实的高校治学和科学研究风气。

五、总结

本文通过检索我国师德师风法治化现状, 讨论分析近五年教育部发布的高校教师失德失范的案例, 初步讨论并总结了高校教师师德师风的法治化路径: (1) 建立高校教师失风失德处理程序法, 设立三权分置机制, 高校建立专业处理部门并由外部组织审查专家介入, 创建灵活举报条件, 处理结果与绩效考核挂钩; (2) 鼓励社会人士、学生进行学术打假, 对于能追回国有资产可以给予一定奖励; (3) 提高教师待遇, 多渠道促进高校教师创收, 减少教师经济压力; (4) 增强高校教师法律意识, 对教师及学生进行培训教育, 形成法治思维意识, 以案促教, 以法促改, 教育高校教师德才兼备, 培养学生、社会人士监督与维权思维。

参考文献:

- [1] 马春波, 张栋梁, 庞贵明, 高校反性骚扰制度体系的设计与构建研究[J], 高教探索, 2023(2): 44-45.
- [2] 李潇潇. 高校贪腐案 中纪委一年通报 30 多起[J]. 人民法治, 2020(23):4.
- [3] Aaron Nisenson, Faculty Rights in the Classroom, September-October 2017: In the Crosshairs, Volume 103, Number 5.
- [4] Fredrik Bondestam and Maja Lundqvist, 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20, VOL. 10, NO. 4, 397-419
- [5] 李廷洲, 李阳杰, 童春林. 构建面向教育强国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J]. 教育研究, 2023, 44(09): 22-30.

Exploration on the Legalization Path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Rule in Universities

Sun Ningning

¹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ubei Xiaog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legal situation of teacher ethics and conduct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ses of immoral and unprofessional behavior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initially explores the improvement paths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teacher ethics and conduct in universities. These include: (1) Establishing a separation legal supervision procedure of three powers, where students, teachers and universit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mutually restrain each other; (2) Encouraging social individuals an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academic supervision; (3)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o reduce their economic pressure; (4) Enhancing the legal awarenes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he legalization of teacher ethics and conduct in universities not only relies on the moral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but also requires the supervis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and social individuals.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the path of legaliz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78

论涉外法治人才的国际化培养

孙宁宁¹

(¹湖北工程学院, 湖北 孝感 432100)

摘要: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能够促进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地位, 目前我国存在涉外法治人才短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待改善、政府相关部门与律协等社会组织支持与赋能力度待提高等问题, 改善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设立国际教育及国际信息交流的专项法律, 拓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赋能平台等措施有助于满足国际化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 涉外法治; 法治人才; 国际化培养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我国早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与数量的忽视,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短缺逐渐显现, 涉外法治人员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处于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地位, “走出去”与“引进来”需要涉外法治人才保驾护航。知己知彼, 方寸百战百胜, 了解对外贸易国及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 才能保障我国外贸发展的稳定与长远。同时, 吸引外商投资也离不开涉外法治人才的法治服务。本文意在探索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路径以促进我国对外开放, 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提升中国国际地位。

一、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意义

(一) 促进对外开放

1. 促进对外贸易质升量稳与建设贸易强国。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2023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新时代新征程, 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不断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涉外法治人才是我国走向世界的军师与智囊团, 了解贸易国的法治环境与法律政策, 能够在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跨境投资、金融与资本市场、海商海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吸引外商投资与促进合作顺畅。培养法治人才能够丰富与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为投资者提供顺畅、专业的法律服务, 增强营商环境透明度,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增强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竞争能力。对于在投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或争议, 涉外法治人才要能保障及时、顺畅的与投资者或客户进行沟通, 定纷止争, 促使合作愉快。

(二) 维护国家利益

1. 处理贸易摩擦。对国际贸易中可能发生的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申请保障措施、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等方面, 专业的涉外法治人员能够及时利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企业的贸易利益。

2. 处理国际争端。叶青表示当前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国涉外法治领域的主要挑战有: 国际规则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不适应, 国际法治改革和国际秩序重构, 有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利用国际法律规则对我国采取限制; 在海洋权益上企图用法律和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威胁和影响等。^[1]面对未来国际局势的瞬息多变, 更需要涉外法治人才处理国际争端, 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简介: 孙宁宁, 女, 安徽阜阳人, 湖北工程学院教师。

（三）提升国际地位

1.参与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王柠表示,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取决于国家间实力的较量,实质是国际法律规则的变革,尤其是网络空间、海洋、基地、外空、核安全、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的国际法律规则对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培养高层次涉外法治人员能够为我国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上提供人才基础,能够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争端解决机构中的比例,并在国际法治理论创新、研判协调、舆论宣传方面的发挥重大作用。^[2]涉外人才处理和应对复杂多变的涉外事务,其专业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及相关主体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核心利益。^[3]

2.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增强国际社会对本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的重要方面^[4]。我国涉外法治人才需要集中文、外语、法律、政治、商业、文化等知识于一体的精英,对传播我国文化,对外交流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能够扩大我国文化影响力,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与尊重。

二、我国涉外法治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涉外法治人才短缺

截至2022年,我国能够熟练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仅有7000余名,其中可以从事“双反双保”业务的律师仅500余名,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独立办案的律师只有300余名。^[5]黄进教授表示现有涉外法治专业人才还远远不能够满足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数量不足、能力不足、经验不足、培养不足。一是真正能够熟练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足,离实际需要有很大的差距;二是在国际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学术交流等各个领域都需要涉外法治专门人才,而我国在有些领域还缺少合格的人才;三是我国在各类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仲裁机构、调解机构、法律服务组织、法学学术组织等任职的人员偏少,即使在一些机构有我国任职人员,但处于领导层、发挥领袖作用的不多;四是我国法学教育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重视不够;五是我国法学法律界对涉外法治工作队伍的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也不够。^[6]

（二）高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有待改善

广西高校开展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有待改进,国际资源的引入和持续性不确定,涉外人才实践能力不足。^[7]国际法研究过于强调理论,对于案例和实践重视不够。^[8]海南高校大部分国际法教师仅有国外访学经历,学习时间较短,同时受境外对实习和工作的签证限制,很少有学者能够真正在留学、访学期间从事法律实务工作。^[9]笔者查阅了国内部分高校官方网站公示的法学师资队伍教师简介,其中少有教师具有长期国外求学与工作实践经验,大多数高校教师为纯国内培养人才或仅有短期访学经历,也未能在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等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孔繁华建议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在本科层次授予“法学+外语”“法学+国际贸易”等双专业学位,开设外语、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核心课程。同时,实行本硕博贯通培养,本科阶段打牢专业基础知识和外语能力,硕士和博士阶段细化人才培养方向,设立国家贸易争端解决、国际组织、企业合规等不同专业方向。^[10]近年来,一些高校已在尝试整合校内外资源,打通校院系间的壁垒,加快构建多学科与法学专业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但仍要探索高效高质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我国涉外人才培养决不能闭门造车,高精尖的涉外法治人才不仅是能说外语,懂中国法治,还需熟悉他国文化、灵活应用法治知识以及能够进入国际组织、跨国组织等国际型组织任职。我国需要的不仅是在中国的涉外法治人才,还需要遍布世界的中国涉外法治人才,我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鼓励中国法治人才走向世界的舞台,为中国长远发展做出贡献,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三）政府相关部门与律协等社会组织支持与赋能力度不够

美国之所以能够向国际组织输出大量人才,与美国整体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战略密不可分。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公共外交法律以促进人才进行国际交流,提高人才的全球胜任力,扩大美国影响力。其中,《美国法典》(U.S. Code)中的国际教育计划、《富布莱特法案》(Fulbright Act)、《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Smith-Mundt Act)、《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国际教育法》(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ct of 1966)、《自由促进法》(Freedom Promotion Act of 2002)直接涉及美国的国际教育政策,其目标是促进美国与他国的教育交流、向国外传播美国的政策信息、推进区域研究和外语教学、提高美国教育机构对外国留美学生的影响力等以及提出通过积极的教育外交(education diplomacy)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增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促进美国的繁荣^[11]。而我国在法治顶层设计方面欠缺关于国际教育、国际信息交流的专项法律,目前没有关于国际教育、涉外信息交流方面的专项法律,这无论对我国推进国际化教育,还

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都是不利的。我国目前对于教育国际化, 批量培养国际化人才还处于探索试点状态, 推动速度较美国来说过慢。

人才的培养不仅仅靠大学几年光阴, 还有走社会步入工作, 在工作中的锻炼与自我提升。政府相关部门、律协等社会组织对涉外法治人员的赋能欠缺, 例如, 司法部、商务部、外交部、法院等相关部门未能整合资源成立一个协同培养赋能体系, 未能形成涉外法治案件、涉外法律知识和经验沉淀的知识传播、涉外法治意识培养的媒体平台以及大量应对国际涉外问题的实操指引。

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善路径

基于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现存问题, 本文提出了既立足现实需求又面向未来发展的培养路径改善方式。笔者查阅了一些国际组织、跨国组织发布的用人需求, 并进行了归纳概括: 1.最基础的要求通常是英语可以作为工作语言, 同时还可能会要求有其他语种; 2.要求了解影响业务的监管和法律环境、内部政策和行业趋势; 3.有业务相关经验,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管理能力, 能够维持良好信任关系与人际关系。本文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从高校、政府相关部门与社会组织方面提出关于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进方案。

(一) 高校层面

美国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其教育体系、实践机会和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全球法治人才培养的标杆。所以本文选取了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杜克大学三所大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分析, 详见表1, 同时选取了国内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分析, 详见表2。

针对我国目前法治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上述国内外优秀大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以及结合我国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情, 从高校层面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提前培养学生职业规划意识。杜克大学在法学生入学第一年就会进行职业规划辅导, 第一年的学期主要偏理论和专业技能, 第二第三年进入高级课程的学习, 将传统课程与实践技能、课程和诊所相结合。学生做研究或者实习也有获得学分的机会。^[12]我国高校可以借鉴这一做法, 在法学生入学第一年时, 对学生进行职业辅导, 让学生早早为个人职业规划做准备。

表1 美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摘录

学校	人才培养方案摘录	亮点分析
耶鲁大学	体验式的国际项目、体验式的国际调查、体验式的诊所研讨会、国际法方法定向研究课程、外交关系与国际法实践、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融资、国际裁决和国际先进法律研究、走向净零温室气体排放的未来、人工智能法和政策、网络安全政策和法律、民主、腐败和问责政府国际商务交易、隐私和数据治理、国际税收等等	1.耶鲁大学法学院涉及国际、跨国、比较法和外国法律问题的范围非常广泛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 从讲座到研讨会设置, 再到模拟实践和实践导向的体验。 2.设置很多研究机构和活动平台, 例如国际安全研究机构, 为学生设置了能够与知名人士进行辩论的论坛。 3.学生可自主创建课程, 学生也是耶鲁法学院课程创作的积极参与者。
哈佛大学	国际税收、全球事务中的法律、卫生法律政策、中国法律协会、哈佛非洲法律协会、哈佛欧洲法律协会、南亚法律协会、土耳其法律协会、墨西哥法律协会等等	哈佛大学有较多的学生组织, 学生组织和期刊越来越多地涵盖国际性问题, 参加这些活动很大程度地增加了学生法学实践经验。
杜克大学	比较法、外国反贿赂法、国际法、外国法和比较法的研究方法、美国法院的跨国诉讼、国际投资法: 外国投资的保护和金融化、中国法律与政策研究方法、对外关系法、互联网和电信法规、网络法律和政策简介、国际税务、国际商法、海洋法、空间法则 / 火星法则、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的风险监管等等	1.学生能够实地考察和体验法律问题, 在老师带领下与基层组织、新型过渡时期司法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密切合作。 2.在入学第一年, 学生能够与指定的职业顾问会面, 为个人职业规划做准备。

表2 北京大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摘录

学校	人才培养方案摘录	亮点分析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区别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传统的法学教育,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下于2008年创设独立的国际法学院专注于跨国法律教育,是一所创新型、国际化的法学院^[13]。 国际商业交易、国际民事诉讼、国际金融机构法、跨国商标法与地理标志、高级跨国法、食品安全法律与政策、跨国能源法律和政策、国际难民和移民法、国际项目融资、国际金融监管、从意向到意向书:当法律遇上商业、商业销售:美国和国际、中非投资仲裁、中国与世贸组织、国际税法等等	1.引进了丰富的国际化师资力量 2.聚焦前沿法律事项 3.具有一些法律研究中心与项目

2.增加外国法及国际法课程的学习。哈佛大学法学院课程涉及很多他国法律的学习,为适配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高校法学院也需要根据我国进出口情况以及国家战略部署,细化研究涉外相关法律问题,增设外国法系统学习课程,有助于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流通。例如增设美国法律及其政策研究方法、外国投资的保护及金融化、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地区的风险监管、合规研究、国外维权方式、外国反贿赂法等方面课程。一些课程要根据国际法、外国最新法律、政策聚焦前沿问题,在争取为我国政府与企业做战略决策贡献的同时,也争取构建覆盖企业海外经营全生命周期的法律合规保障体系。目前一个学校法学院教师是不可能承担起上述全部工作,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统筹协调各学校法学院国内外法律研究工作的分工定位。

3.增加学生共建课程项目。学生参与到课程共建项目中,既能提升学生自身专业能力、组织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也可以在具体工作中更深入地了解实际内容和要求,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所在,明确与坚定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除此之外,学生共建课程还能各学校法学院教师分担课程建设与知识创新的压力。

4.增加国际组织、国外组织、国内组织的体验式活动项目。以耶鲁大学法学院为例来看,耶鲁大学法学院为学生提供奔赴全球许多角落体验临床项目的机会,例如前往南非律所、欧洲会议、印度商会、法国巴黎的非洲保护举报人平台、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夏威夷原住民的非营利性律师事务所、南非的法律资源中心、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奥地利萨尔茨堡全球研讨会、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知识产权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等^[14]进行实践与交流。耶鲁法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起“理论认知体系构建→理解反思与批判性思维培养→模拟应用与场景化实训→实践体验与社会服务创新”的进阶式培养体系,通过四阶递进式教学架构实现法律专业人才从知识接受到价值创造的全周期能力塑造。针对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不足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副会长马怀德先生也提出将优质的实践教学资源引入学校,让学生更多地参与涉外法律事务的实践。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合作,设立实习实践基地,开展国际研习计划,选派学生到国际组织、政府涉外部门、跨国企业等单位实习。^[15]我国高校可以借鉴耶鲁大学在涉外法治人才方的实践教学方式。增加国际组织、国外组织、国内组织的体验式活动项目,打造从知识接受到价值创造的全周期能力塑造的教育培养体系。

5.促进院校搭建跨境法律协会平台。哈佛非洲法律研究中心是哈佛法学院的一个由学生经营的组织。该协会使命是团结来自非洲或对非洲感兴趣的学生,并提高对塑造和关注非洲大陆的法律、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认识。哈佛非洲发展会议(ADC)由哈佛法学院和哈佛肯尼迪学院的非洲裔学生领导的年度活动。ADC旨在提供一个促进全球讨论非洲发展主要问题的平台,加强知识和实践辩论,以及促进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创造非洲更美好的明天。笔者检索了一些知名高校,并未发现建立法学院跨境法律协会。笔者认为建立院校跨境法律协会平台,由学生组织运营,在锻炼学生组织管理能力,深入国内外法律知识探讨的同时,也能开拓境外资源,助力推动我国法学教育的对外开放,扩大跨境学术交流和合作,有利于中国法学院校在全球教育事业贡献中国法学力量。

6.引进知名国外专业人士与提升国内师资力量。笔者查阅了耶鲁大学公布的法学院师资力量介绍,国际法相关教师的简历中大多数都具有常年居住在他国工作、学习的经验,或者具有在国际或者政府组织中任职等实践经验^[16]。耶鲁大学法学院教师通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许多教师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学者提出为提高我国国际组织中公务员的数量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可以扩大能够用外语授课的教师规模,聘用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或国际关系、外交研究专业背景的教师,

以及聘请在国际组织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家或国际组织问题专家,为学生举办研讨会、短期讲座,并为学生的实习和就业提供指导。^[17]在涉外法治教学改革初期,引进部分知名的国外师资、专家等知名专业人士资源有利于改善我国涉外法治化人才培养状况,帮助我国更多人才走向世界舞台。涉外法治教师的跨国交流对于国家文化传播、政治交流等都具有积极推进作用,可以尝试确定试点高校,将高校教师的对外交流、搭建资源、培养国家所需的涉外法治人才等作为高校加分项绩效考核标准之一。此外,外语在对外沟通方面十分重要,国内大多数国际法教师授课语言需要调整至少为双语模式,且中文版国际法律相关教材也需要调整至少为双语模式。

(二) 政府相关部分与社会组织方面

1. 设立国际教育及国际信息交流的专项法律。制定国际化教育、国际信息交流专项法律能够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结合我国国情基础上,借鉴美国民法典中关于国际教育计划法条^[18]、Fulbright Act^[19]等,出台关于我国国际教育的法律,明确立法目的:(1)支持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中心和奖学金促进外语、地区研究及其他国际研究;(2)培养一批国际专家以满足国家需要;(3)发展和批准为国外语言学习的先进技术与学习材料;(4)促进获得海外研究和培训的机会,包括与海外机构的联系;(5)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推进各种学科的国际化;(6)支持多语言知识教材和研究;(6)协调政府在外语、区域研究和其他国际研究领域的项目。围绕国际化教育立法目的展开国际教育法的立法工作。

出台国际信息交流的法律的目的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加强国际合作关系,内容包括相关政府的职权、财政拨款、资助、运转原则、在本法授权下为实现本法的宗旨和目标进行的所有计划和活动出具季度、半年度、年度报告。围绕国际信息交流的立法目的开展国际信息交流的立法工作。

2. 拓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赋能平台。王振江表示建立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机制,促进成员国之间在法律和司法行政领域的务实合作。^[20]司法部牵头成立政府参与国际组织的涉外法律服务委员会,参与涉外法治国际机构开展的工作,处理商事争议,持续深化法律服务的国际交流。^[21]制订涉外人才培养计划,举办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涉外法律人才培训班、涉外律师人才高级研修班、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训班、“涉外法律服务大讲堂”等。^[22]我国仲裁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提高涉外仲裁案件办理水平^[23],为涉外法制人才提供实践平台。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整合资源成立一个协同培养赋能体系,形成关于涉外法治案件、涉外法律分析和经验沉淀的媒体平台以传播涉外法治知识、培养人民涉外法治意识以及形成大量应对国际涉外问题的实操指引。建立官方涉外法律传媒平台,助力企业出海。鼓励律师协会积极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律师协会签订合作协议,进行联合交换培养跨国涉外律师,促进律师同行的互访及业务交流,共同推动涉外法律服务的发展和合作。拓宽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提供赋能平台,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合力。

四、结论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涉外法治人才短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传统培养方式不适配、政府相关部门与律协等社会组织支持与赋能力度不够,本文从高校、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多方面讨论了涉外法治人才的国际化培养共同赋能的模式,通过对标国内外优秀院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倡导促进高校国际法教师改善教学模式与加强对外交流,呼吁设立国际教育及国际信息交流的专项法律,倡议政府与社会组织拓宽涉外赋能平台等措施以达成涉外法治人才国际化培养的目标,进而促进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利益与提升国际地位。

参考文献:

- [1] 叶青:《培养涉外法治紧缺人才亟需法学教育改革》,《学习时报》2023年8月18日,第6版。
- [2] 王柠:《论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法制与社会》2020年第35期,第166页。
- [3] 张清、刘艳:《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的多语能力培养探索——中国政法大学的人才培养实践》,《外语界》2023年第1期,第23页。
- [4] 赵霞:《传统立场与现代言说:扩大当代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实践反思》,《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33页。
- [5] 黄进:《涉外法治人才,你的舞台无比广阔》,《光明日报》,2022年1月15日,第5版。
- [6] 黄进:《涉外法治人才,你的舞台无比广阔》,《光明日报》,2022年1月15日,第5版。

- [7] 张晓敏:《RCEP 背景下广西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实现机制》,《大学》,2023 年第 13 期,第 129 页。
- [8] 宋杰,郑和英:《我国国际法教学与研究存在的问题》,《政治与法律评论》,2022 年第 1 期,第 126 页。
- [9] 纪韶昱:《海南自贸港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现状与思考》,《今日海南》,2023 年第 9 期,第 55 页。
- [10]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35b24e100d/42b7e72ae4.shtml, 2025 年 3 月 5 日访问。
- [11] 张汉、赵寰宇:《中国大学如何培养全球治理人才?——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验及其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 年第 1 期,第 86 页。
- [12] <https://law.duke.edu/study/>, visited on 25 February 2025.
- [13] <https://stl.pku.edu.cn/cn/about/aboutstl.html>, visited on 18 February 2025.
- [14] <https://hls.harvard.edu/clinic-stories/winter-term-across-the-world/>, visited on 23 February 2025.
- [15] 马怀德:《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红旗文稿》2023 年第 24 期,第 28 页。
- [16] <https://law.yale.edu/faculty?type=faculty>, visited on 23 February 2025.
- [17] Wang. Li, Y. Meng & Li Menglong,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Выпуск № 2(29),Архонт124(2022).
- [18]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0/chapter-28/subchapter-VI/part-A>, visited on 24 February 2025.
- [19] <https://www.usagm.gov/who-we-are/oversight/legislation/smith-mundt/>, visited on 28 February 2025.
- [20] 王振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中国法治》2023 年第 10 期,第 6 页。
- [21] 王振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中国法治》2023 年第 10 期,第 6 页。
- [22] 王振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中国法治》2023 年第 10 期,第 6 页。
- [23] 王振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中国法治》2023 年第 10 期,第 8 页。

On the Internationalized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Sun Ningning¹

¹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ubei Xiaogan,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can promote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enhance national status. Currently, China faces problems such as a shortage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support and empowerment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bar associations. Improving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establishing special law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expanding the enabling platform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will help to meet the demands of internationalized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Keywords: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legal talent; internationalized cultiv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79

无约束境遇下的群体极化：《蝇王》中的暴力本能与文明脆弱性

陈立立¹ 曹一君¹

(¹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广东 廉江 524400)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威廉·戈尔丁《蝇王》中儿童群体在荒岛的权力更迭与秩序崩塌, 揭示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实为脆弱的动态平衡。小说以杰克与拉尔夫的二元对立为核心, 通过“火堆熄灭”“误杀西蒙”“眼镜争夺”等关键事件, 展现人类在无约束环境下对暴力本能的沉溺。本文结合恩格斯的兽性理论, 指出戈尔丁通过孩童视角解构了启蒙主义对人性向善的预设, 其笔下的“蝇王”既是具象的猪头图腾, 更是深植人性的恶之隐喻。

关键词: 野蛮与文明; 人性考验; 权力斗争; 群体极化; 暴力本能

一、人性实验的叙事框架与核心论点

戈尔丁在一九八三年, 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 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在戈尔丁的作品中, 《蝇王》无疑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作。恩格斯曾说过: “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 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 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蝇王》描写的正是这么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荒岛之上, 却不同于以往的荒岛文学, 《珊瑚岛》和《鲁宾逊漂流记》类的儿童文学, 以描写流落荒岛的人如何团结友爱, 抗强扶弱, 文明和理性战胜野蛮和本能为宗旨。戈尔丁反其道而行之, 写的是一个恰恰相反的故事, 他认为野蛮战胜文明是更自然和真实的东西, 正是如此, 《蝇王》中展露出来的人性引发了笔者深深的思考, 即人性不可考验, 野蛮并不遥远。



表 1《蝇王》人性实验可视化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 曹一君(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

通讯作者: 陈立立(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

二、象征系统的权力机制解析

故事设定在“世界第三次大战”即核战争之中，转移一群小男孩的飞机不慎失事，这群小男孩全部流落在了一个荒岛之上。荒岛美丽，物产丰富，有着足够饮食的清泉和野果，还有野猪在这里繁衍，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片游戏的天地，更重要的是，这里没有权威的大人，没有人会管束他们，他们是如此自由，当然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就是需要救援。

这个群体非常自然的出现了一个头儿，就好像他们在学校里生活游戏一样，有一些特质的人、比如召集能力，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引领者，当然还有几位骨干成员。拉尔夫用捡来的海螺召集到了全部散落的男孩，他成为了那个头儿，岛上的其他人都服从他，就像曾经无条件服从大人。他最先认识了猪崽子，于是猪崽子成为了他亲密的伙伴，也就成为了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杰克是流落荒岛的唱诗班头领，他具备一定的头领经验和特质，但由于不是第一个召集大家的人，他在和拉尔夫的博弈中败落，可以称他为二当家的，还有一个智慧但虚弱的西蒙，罗杰等。

等待救援是大家公认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们需要离开荒岛，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在拉尔夫海螺的带领下，大家比较有序的保持一个点燃的火堆，以及日常饮食的野果采摘。海螺成为一个权力的象征，大家都听拿着海螺的人说话。但身为首领的拉尔夫，开始逐渐暴露他的缺点，他的威信只依靠着海螺，自己却不能管理和合理分配任务，不能真正发动每个人朝着获救的目标前进，这种涣散在日复一日得不到救援的日子里，一点一滴的瓦解拉尔夫作为头儿的威信，由于得不到救援，大家开始习惯岛上的生活，变得麻木，原本的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遥远，渐渐的大家甚至忘记了为什么要点燃火堆，因此也越来越不满拉尔夫的管理。与此同时，带有暴虐天性的杰克蠢蠢欲动，他渴望打猎，尽管岛上的野果食用不尽，却仍认为大家需要肉，他们开始组织队伍去打猎，而这不符合拉尔夫的安排，这个群体开始逐渐出现了分化。

导致分裂的事情开始出现，由于杰克带领了队伍去寻找猎物而没有人照看火堆，火堆熄灭了没有释放烟雾，却恰好有船只经过，他们错过了一次得到救援的机会，被救再次变得遥遥无期。就在这次错过里，杰克小队第一次成功抓捕了一头野猪，他们抬着猎物回到聚集地，一路兴高采烈，却得到了头儿拉尔夫的责骂，拉尔夫责备他们为了不必要的猪肉错过了救援，杰克为自己捕杀了一头猪，掌握了一种主宰的力量而兴奋不已，他并不觉得错过了救援有怎样，可以看到文明已经开始从他身上退化。杰克小队的孩子都是如此，他们沉迷于杀戮的快感，享受那只猪死亡的挣扎和喷涌的鲜血，甚至反复表演杀猪时的场景，围着圈子跳舞，发明了口号。

群体里开始有小男孩说岛上有野兽，也许是鬼魂，大家开始惶惶不安，他们害怕岛上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悄无声息的摧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说自己见到了野兽，身为首领的拉尔夫不得不解决这件事情，他和杰克等人进行了全岛的寻找，依然没有找到所谓的野兽，他没能解决这份笼罩群体的不安，他这个头领显得越来越无能，他天天挂在嘴边的火堆的意义，被大家选择性忽略，大家已经忘记文明的样子，或者说不想回到文明的世界。和杰克比起来，他软弱没有成就，至少杰克给大家实打实的弄来了猪肉，群体终于在一次拉尔夫无数的会议里彻底分裂，这分裂由杰克主导，杰克宣布脱离拉尔夫，并且欢迎大家跟随他，只剩下了猪崽子还有少数几个人依然跟着拉尔夫。自此，这个群体彻底分成了野蛮和文明两个派别，并且野蛮占据了上风。

在野兽这个问题上，文明派拉尔夫选择相信科学，即寻找的结果，相信没有野兽，忘记野兽。野蛮派杰克则选择讨好野兽，崇拜野兽，用打猎到的猪头来献给野兽，以换取野兽不伤害他们。在这里，只有一个人发现了真相，不管是在野兽问题之初，他说“也许野兽就是我们自己”，还是他在自己的寻找中发现了那个其他孩子们看到的野兽——坠落悬挂在树上的、死去的飞行员。分裂出去的杰克小队野蛮屠杀了又一头猪，文明派拉尔夫和猪崽子也闻风而来，他们开着巨大的狂欢盛宴，在下着雷雨的岛上围着圈子跳舞狂欢，重复着屠杀的舞蹈和口号，竟然杀死了从山上跑下来，想要告诉他们野兽真相的西蒙，乌合之众的奥义显示的淋漓尽致。文明彻底堕落，从杀猪到杀人，还有带有原始野蛮意味的上供野兽，把脸涂的花花绿绿的杰克，已经俨然成为了原始部落的首长，权力和权威在他的武力之下凝聚于他的掌心。拉尔夫和猪崽子亲眼目睹甚至参与了这场杀害，他们身上的文明逐渐被同化，他们不断说服自己，这只是一场意外，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杀害了西蒙。大家都心照不宣，却不敢再提起那场跳舞。

三、关键事件链与人性堕落图谱

在一个黑夜，杰克带领小队偷袭了文明派拉尔夫，为了得到火种，火种在猪崽子的手里，那就是猪崽子的眼镜，杰克为了得到火种，再次采取了野蛮的方式，强取，双方扭打在一起，杰克成功拿到了猪崽子的眼镜，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头领。

拉尔夫和猪崽子前去寻找杰克，他们打算采用文明的方式，和野蛮派讲道理，拿回眼镜，再次重申火堆的重要性，却只得到了野蛮派的耻笑，双方争执之下，在拉尔夫和杰克对峙的时候，猪崽子被罗杰杀死了，罗杰的残暴天性比杰克更甚，身上隐藏着比杰克更大的野性和恶意，到这里，我们已经全然忘记了文明，杰克和罗杰，他们曾是唱诗班的孩子，唱着天使的歌。

拉尔夫逃走了，文明派只剩下了他一个，杰克带着其他全部的人展开全岛的搜查，为了抓住他，杀了他，给岛上那未知的野兽作为供品，这些孩子全部彻头彻尾的成为了野蛮人。他们甚至在整个岛上燃起了大火，为了逼出拉尔夫，就在拉尔夫即将被追上杀死的千钧一发之刻，他们居然迎来了救援，因为这场燃烧全岛的大火。

四、哲学反思与现实隐喻

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绝对自由、脱离制度的社会会有多么的可怕，书中有着许许多多的象征暗喻，象征文明的拉尔夫，象征智慧者的猪崽子，象征哲学家、上帝的西蒙，象征野蛮的杰克，象征文明的火堆和眼镜。正如开头说的，戈尔丁擅长用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当今人类社会的现状。比如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智慧的发言是缺少观众的，武力是征服的有力手段，杰克的涂脸象征着羞耻感和自我意识的摆脱，而西蒙的悲剧是许多先觉者的悲剧，一种卡珊德拉式的悲剧，即第一个说出某种真理的人是难逃毁灭的。作者认为小孩子并不是天真无邪的，相反，小孩子最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因为文明还没有来得及留下太深的烙印，所以这个故事设定了小男孩们的故事，运用小孩子来更能揭露人性的本质及其黑暗面，充满了反乌托邦色彩。

合上书本的时候，笔者想到了看到过的诸多人性的实验，包括著名的玛丽娜的人性实验（大致是承诺任何人都不需要负责任，实验者可以任意使用道具对待她），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下意识逃避人性的问题，试图用善和道德伪装欺骗自己，只有少数人鼓起勇气去试探人性，人对自己的本性有一种惊人的无知，笔者认为这种逃避是带着一种恐惧色彩的。

小说结尾的现代文明救援，打破了在这个小岛上诞生的小范围组织，仿佛天神降临，故事的最后却留下了疑问，大人拯救了小孩子，谁来拯救大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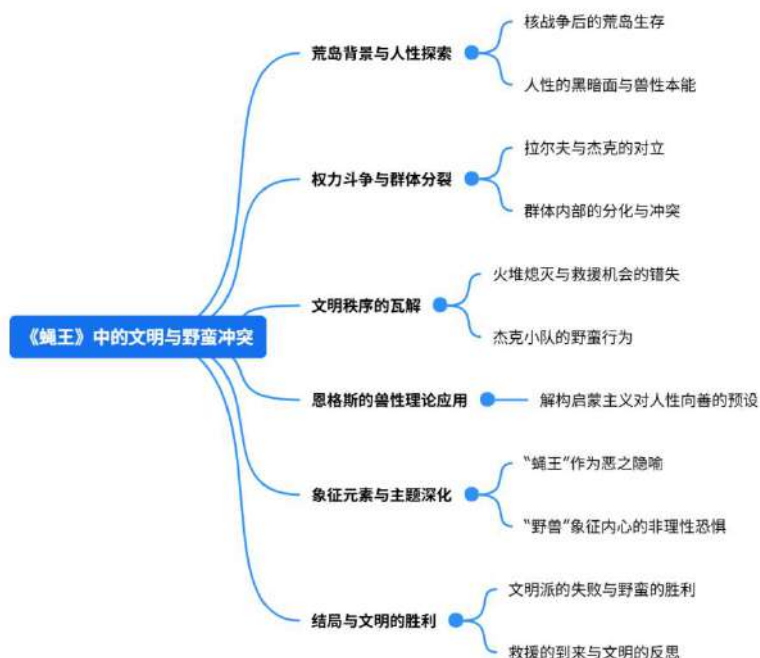


表 2 《蝇王》中的文明与野蛮冲突

参考文献：

- [1] GOLDING, W. *Lord of the Flies*. Faber and Faber, 1954 .
 [2]赵青.探索自然与文明交织下的人性[D].东北师范大学,2011.

- [3] 恩格斯. 《反杜林论》. 人民出版社, 1963 .
- [4] 高珺钺. 威廉·戈尔丁作品中人性观的转变研究[D]. 上海大学, 2023. DOI:10.27300/d.cnki.gshau.2023.001368.
- [5] 龙超. 从象征主义看《蝇王》里的人性恶[C]//福建省外国语文学学会. 首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外国语文学学会 2011 年会论文集.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2011:363-378.
- [6]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 中华书局, 2012 .
- [7] 李泽厚. 《美的历程》. 三联书店, 2009 .
- [8] 萨特. 《存在与虚无》. 三联书店, 2014 .

Group polarization in unconstrained situations: the instinct for violence and the fragility of civilization in Lord of the Flies

LILI CHEN¹, YIJUN CAO¹

¹ Affiliation,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ianjiang, Guangd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wer transition and order collapse of children on a deserted island in William Golding's "Lord of the Flies", revealing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is actually a fragile dynamic balance. The novel revolves arou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Jack and Ralph, and through key events such as "extinguishing the fire", "accidentally killing Simon", and "fighting for glasses", it portrays humanity's addiction to violent instincts in an unconstrained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combines Engels' theory of animality and points out that Golding deconstructed the Enlightenment's assumption of human goodness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is "Lord of the Flies" is not only a concrete pig head totem, but also a metaphor for the evil deeply rooted in human nature.

Keywords: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Human nature test; Power struggle; Group polarization; Instinct of Violen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81

观察深浅与铸就经典：当代学者钱念孙的文艺观念与科技伦理探析

王浩楠¹

(¹ 澳门大学, 中国 澳门 999078)

摘要：《文学的俯察与仰观》作为展现当代学者钱念孙文学评论与文艺思想的经典文集，充分反映了其对文艺创作的深层观察和本质探讨、对科技发展的理性审视和价值判断。本文沿循“俯察与仰观”的方法论，从文艺作品的创作底蕴与意义、人工智能的深层挑战与省思，以及外国文学的融汇吸收与影响等问题视角出发，探讨钱念孙的创作理念、文艺观察与文化视野，揭示文艺的内在审美与形式构建。以作品创作者和科技运用者为主体，表明文艺经典既需回溯历史经验事实，也需聚焦当下社会风貌；文艺鉴赏既需立足本土审美传统，也需吸收异域文化精粹；文艺精神既需提升艺术品味修养，也需开拓思想精神境界。

关键词：《文学的俯察与仰观》；文艺评论；人工智能写作；外国文学；文化接受与变形

一、引言

钱念孙，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文艺学、美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他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生涯以跨文化视野和理论创新见长，其研究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尤其擅长从接受美学、文化比较等角度剖析文学的民族化、现代化问题。钱念孙的学术成果丰硕，除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外，还著有《文学横向发展论》《朱光潜与中国文化》《重建文学空间》等学术专著，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

《文学的俯察与仰观》^[1]是钱念孙的代表性文集，收录了其多年来的重要学术论文与评论文章。此作品的书名取自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之句，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而且隐喻了作者研究文艺的双重视角。“俯察”微观的文本肌理与创作实践，意味着要亲身躬行，扎根生活，品味世间冷暖，感知生活变迁；“仰观”宏大的文化传统与时代思潮，表明了要恪守本心，归纳总结，辨明人性是非，开掘崇高之美。“俯察与仰观”这一方法论贯穿全书，既彰显了钱念孙对文艺本体的深刻洞察，又体现了其融通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全球的学术格局。文集中辑录的论文与评论，既涵盖对经典作家创作理念的再阐释，亦涉及对人工智能写作、外国文学民族化等关键议题的批判性思考，展现了其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的广度与深度。

二、文艺作品的创作底蕴与意义

文艺家的根本意义就是以内在心灵琢磨生活，以内在心灵外化艺术。不论是文字语言、影视传媒，抑或编曲奏乐、绘画设计，文化艺术创作在生活实践中的展现是需要不断切磋琢磨、合于时世的。每个人的真实性就在于生活的现实性，文艺的琢磨性也源于日常的思想性，文艺家的观察与体悟、情绪与灵感、身份与际遇皆可以在作品中体现真材实料与真情实感。这也就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对创作者而言，反映生活情感、遵循时事变化既是一种历史精神，也是一种时代责任。

钱念孙在《从琢磨生活到表现生活》中讲述了傅雷对张爱玲创作题材的评论。傅雷在其《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认为张爱玲的故事题材囿于男女情愫，且又有一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张爱玲的写作风格和

作者简介：王浩楠（2002—），男，浙江乐清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宗教学系硕士研究生。

背景设定是与其本人经历境遇相类似、相呼应的,但傅雷仍指出了其不足之处。由此可见,生活体验与经历于文艺创作者而言是因人而异、各具特点的。当一位作家以其个人视角观察其他作家时,既可有肯定与赞许,亦会有批评与反思。这也足以反映生活经验和文艺思考之于创作个体的复杂性、特殊性与丰富性。进而,钱念孙在此文中也对其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创作思考产生回忆与联想。他通过一次乡村住宿活动,从而引发了对城乡社会发展的二元性思考,从城乡发展的差异与变迁,城乡居民矛盾与妥协以及城乡生活的现状与未来出发,延伸出独具生活韵味与时代特点的文学情节创作构思。

琢磨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心灵记忆与感受转化为艺术的智慧与美感,展现艺术的哲理与意蕴。若是仅限于传达现实层面的信息与普通生活的内容,那么文艺的深刻意义就将遭受折损。钱念孙认为,琢磨生活是“炼意”,而表现生活是“炼句”。由此更具体而言,炼意是提炼思想内核、锤炼情感表达、修炼意涵深度;炼句则是为了凝练现实感官、磨练艺术造诣、熔炼虚实之美。从炼意的角度来讲,意境的深远优美、雅致经典既来源于历史的回溯,也来源于当下的开拓。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其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讲:“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2]在文艺创作中,炼意之柱础就在于知晓历史脉络以构建现实框架,梳理文化记忆以明确主题思路,最终实现历史经验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同时,从炼句的角度讲,创作是基于历史文化与现实发展,在意境底蕴之上的艺术拓展、审美塑造与哲学探索。布洛赫笔下的历史之论犹如文艺之辨,“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2]文艺的意境如果无历史文化的底蕴根基,无广阔综合的视野架构,无古今相融的人文性质,那么将会成为虚无之意、管窥之景。

技术革命与消费浪潮的形成与兴起,推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范畴的发展与繁荣,促使文艺理论讨论日趋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资讯与思想、科学与人文、时尚与文艺彼此交融互渗。就文学领域而言,文学研究逐渐转向文化研究,从文本审美转变为视觉观赏,但文化研究本身并不是文学理论的简单泛化,而是当今时代信息密度爆炸与科技力量进步所催生的结果。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就强调,在近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有许多关于“理论”的探讨,但这些“理论”已不是指关于文学的理论,不再系统地解释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实质上已经偏离了文学主体的范畴。^[3]这种理论泛化现象的本质,在于文学的关注对象包含了过多非文学因素,其焦点在社会媒介的转型发展之中发生了偏移。若放任理论研究的边界持续扩张,文学理论将会逐渐边缘化,文学也必然会遮其真貌,失其专精,丧其要点。

与之相应,整个文艺的扩容如今已成定势,网络文学、有声书、脱口秀、微电影、短视频等形式重塑了文艺的传播及呈现形态。钱念孙亦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他对于当下文艺作品态势的观察与批判。钱念孙认为目前的文艺创作良莠难辨,既有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的启智之佳作,也不乏价值混乱、曲解真相的消极之劣作。在炼意层面,许多作品在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历史的回溯与反思、人性的审视与拷问等方面皆有不足与欠缺。在炼句层面,不论粗劣之作还是上乘之作皆有表现形式、思想观念、艺术手法、模式借鉴、内容创新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真正优秀之作的内涵意蕴不应被各种媒介与模式裹挟,而须坚守“表现生活”的使命。

无论是以冷静沉稳的心灵琢磨洞悉生活的细微之处,还是以热忱真挚的心灵描绘体现生活的深层之蕴,文艺家矢志不渝的任务就是攀登艺术之高峰。钱念孙在《经典作品的意蕴开掘和艺术超越》中谈及,攀登艺术高峰之阶梯是创作经典,反映艺术高峰之标杆是铸造佳作。经典之作之所以能够表现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能够推动一个社会的文艺创作,不仅在于其作品数量上的灿烂浩繁、不可胜数,更在于其作品质量上的精益求精,也就是去描摹人性,阐发真情,体验生活,揭示社会,精炼艺术,诉诸时代。意大利的当代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即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讲:“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4]这就意味着经典作品具有跨越时代与人际的作用,即使人们身处不同时空,身临不同环境,遭逢各种境遇,经典的思想光芒依然可以充分照耀心灵。

童庆炳教授发表的《文学经典结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其中专门探讨了经典作品的构成兼具若干要素,其中包含有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5]如何铸就经典作品,如何创造伟大文艺,结合钱念孙的思想,这其中也涉及复杂的问题。但从文艺家的创作主体性出发,创作者对于社会生活的刻画与反映,能否支撑涵盖广泛的“意蕴开掘和艺术超越”,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对意蕴的挖掘可以反观出作品的艺术价值、阐释空间,对艺术的超越可以理解到文艺理论和作品的价值倾向,以及读者的阅读和思考视域。

钱念孙在《提升文学的精神高度和情义浓度》中毅然阐述,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文学作品的意境与格调全在于创作者的素质培育、内在修养与精神追求。欺诈与冷漠、绝望与罪恶、邪念与丑陋并不能成为最终倾向,不仅如此,文学正面积极、美善光明的主题是始终能够征服人心、铸就精品的。

由此可观,文学艺术的创作既需要回望历史、立足生活,也需要推陈出新、杜绝单一;既需琢磨巧思、追寻匠心,也需要体现意境,反映真理;既需要心怀博爱、摒弃阴暗,也需要讴歌人性、沐浴清朗。文艺与哲思是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文艺家亦可是思想家。文艺家不仅要描绘浮世沧桑,知晓世道人心,还应当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展现人生命运的真谛。

三、人工智能的深层挑战与省思

在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中有言:“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6]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及文艺的意义正名辩护,其本意旨在为确立文学的独立性,文学必须以文艺创作为中心,理论的研究也不能沦落为泛滥之文化、新兴之文化的纯粹附庸与过度衍生。但是除了经济与社会的作用,科技的信息力量与实践运用在文艺中的巨大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不容忽视。人工智能是继蒸汽、电气、互联网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突出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人工智能写作,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算法生成文本内容的创作方式,根据智能程度,又可进一步分为自动写作和辅助写作。各类垂直大模型在图像算法、仿真虚拟等方面功效强大;各类通用大语言模型在文本生成、情感分析、语言处理等方面运用广泛。可以说,人工智能写作既成为了高等教育需要面对的课题,更成为了文艺创作不可回避的话题。

钱念孙在其《文学的浅涉与深耕——对人工智能写作的认识与回应》一文中开门见山,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领头雁,智能机器的运用节省人力资源与社会成本,改变了社会的运行轨迹和生活节奏。因此,他认为探讨人工智能创作的问题,从科技智能的角度,可以全面把握人工智能写作的特点和功能;从文艺创作的角度,可以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内涵和价值。钱念孙对于人工智能写作的思考和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方面:第一,人工智能写作已有的优秀创意成果和表现形式;第二,人工智能写作对于价值判断的局限性与割裂性;第三,人工智能写作对于人类创作与审美的参照性与提升性,以及人类对此应有的内在反思与深入探索。

就人工智能已有的强大功能和不俗表现而言,人工智能写作已达到一定水准。钱念孙举例,较早的微软小冰出版的第一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其中的诗作几无瑕疵,很难辨是出自非人类之手。其后的机器人小封也出版了诗集《万物都相爱》。此外,还有不少人工智能模型可以逢题作诗,看图写诗,即刻成诗。钱念孙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继续发展终将会取代中低端的文字写作,但目前仍有一定差距。因为人工智能写作的功能仅在诗歌创作上较有成就,但在小说及散文等更多领域效果欠佳,缺乏佳作精品。究其更深层缘由,是因为人工智能对于确定性与格式化的追求,在其所需要撰写的文本中,比如公文函件、通知材料等有明确格式和规制的稿件内容中,其完成度便较高。但若是小说、散文等思想性、抽象性、情感性及随机性较强文体领域,人工智能的完成度通常不如前项。在机器人小封的诗作中,钱念孙认为小封在《爱情》中的语言流畅自然,富有节奏张力,隐喻意蕴丰厚,但他亦认为小封的《一只瘦弱的鸟》存在诸多弊病,例如逻辑混乱、词不达意、意象混乱、整体失质等。在古体诗方面,人工智能的发挥较近体诗更好,无论是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机器人薇薇又或是携程小诗机的诗作,都整体通顺、基本流畅,具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依然存在浅俗直白、词语混搭、语义矛盾等缺陷。

人工智能在学习能力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就在于其对于对于文献语料库及历史数据库的深度学习和模仿,使得人工神经网络得以轻松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7]这部论著中,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对艺术与技术的内在关联展开了深入阐释。本雅明的论述揭示,技术维度构成了艺术创作的核心命题,艺术价值的本质植根于其物质载体属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化工业通过技术化艺术产品的生产机制,不仅强化了艺术的本质特征,更赋予艺术更为直接地复现现实生活的能力。本雅明强调技术的决定论视角与艺术的物质性转向相结合,是确定的趋势。而在这一点上,钱念孙指出人工智能在旧体格律诗、回文藏头诗等方面的良好表现是来自于写作规律要求和文字算法的确定性或限制性。人工智能在艺术的物质性转向上的完成度与人类写作有着重要差异,确定性会束缚人类写作,限制性却能激发人工智能。据此可知,钱念孙在文艺的主体性上认为机器只能是人类的工具和延伸,在文艺的创造性上认为机器不具备价值判断和主导思想。因此,这是一个灵动深邃的人心与精密研算的机芯之间的差别。

同时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写作在价值判断与伦理选择上容易晕头转向,对人类的感官与言行也不能全然领悟。人类的思想情感看似两相矛盾,但实则并行不悖;人类的文化魅力看似迥乎不同,但实则兼收并蓄;人类的是非判断看似各执一理,但实则宽严相济。人类的文艺作品看似千差万别,但实则是在不断追问求索、鉴史通今。人心的潜意识和文艺的复杂性与智力与机能无关,是人工智能无法完全掌握领悟的。

尽管如此,但正如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所表达的,“新的艺术从一开始,就坚守着自己的根本性

自律”，并且“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8]。人工智能所写的诗文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新的艺术形式与新的文学表达。虽然人工智能目前的创作能力仍有待提升，情感立意仍需要明确，但不意味着就应该被草率轻视或全盘否定。因为文艺的进步就在于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也就是在开掘原有的规制边界后创新求变，而人工智能作为新的艺术力量正以信息化的迭代方式进行着。在这个“既抗拒又超越”的发展过程中，人机的存在关系可以不断磨合，人机的文学技艺可以继续切磋，这都有利于焕发人类的创意灵感，让科技更好地为思想助力。

在人机关系上，人工智能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和改变必然导向更深刻的伦理探讨。人工智能在不同的语境下时而为敌，时而为友，钱念孙始终明确地强调在文艺中人的创作主动性和审美观，并且文艺需要“自省与自强”。与人工智能相比，文艺家应当追寻独特视角和独到见解，既要观察总结，也要呈现新意，避免模板套路化。总结而言，若想要与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模型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有根本不同，除了创作者自身需要文化熏陶、文艺品味、历史积累之外，还需要有特色鲜明的文学观察、始终坚守的创新意识。具体来说，就是从外在表现和内在思想上“写好每个句子”，淬炼出有别于机械的人情冷暖、岁月记忆、文化底蕴以及价值判断，让历史与现实共振，让情感与思想交融，让文艺与算法各美其美，让人文与科技各尽其用。

四、外国文学的融汇吸收与影响

文学的民族化是个复杂辩证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对异域文艺的内化吸纳既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与提炼里，也潜藏于读者的赏析与解读中。读者对于异域文学的审美感知和接受程度，会以一种无形的反应力和理解力反馈文艺家的创作。进一步而言，异域文学民族化并非仅仅是文艺家根据本地域本民族的社会经验和生活实际，有机有度地汲取异域文学的经验方法，同时也在于读者以地域性的习惯和态度评判异域文学，并以受异域文学潜移默化影响而形成的新眼光与新视角，反作用于文艺家后续的再创作。钱念孙在《论吸收外国文学影响的潜在形态及其作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谈文学的民族化问题》中认为，文学接受与民族化的实践并非仅体现为本土作家对异域文艺的单向借鉴与吸收，而是构成了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同参与、彼此互动的双向艺术过程。

传统关于文学民族化的讨论多聚焦于作家如何通过创作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例如作品的形式创新、主题融合或语言改造等显性层面。这虽能解释文化创新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却难免存在视野的局限性与阐释的片面性。首先，忽视了读者群体在文艺作品解读中的有效作用，使文学接受简化为单向灌输过程；其次，弱化了传统审美范式对接受取向的深层塑造，导致对文化内容延续性的解释不足；最后，遮蔽了跨国传播中本土化调适的复杂性，未能充分观照外来元素与在地语境的融合协调过程。钱念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作品的意义并非作者单方面赋予，也是在读者阅读中生成的。读者以意识的“先结构”为基础，即由历史环境、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共同塑造的认知架构，决定了他们对文本的理解与诠释。因此，当外国文学呈现异域文化时，读者会本能地以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对其进行“本土化”解读，甚至无意识地修正文本的意义。例如，中国读者在阅读易卜生《玩偶之家》时，往往将娜拉伪造签名借款的行为视为合乎道德之举，而忽略其法律争议性；西方观众则因文化背景的差异，更关注剧中个体自由与法律责任的冲突。这种因民族心理差异导致的解读分歧，恰恰是民族化在读者接受层面的具体表现。

钱念孙的文艺思想通过丰富的跨文化案例，进一步揭示了外国文艺吸收的双向性。一方面，读者通过“文化过滤”将外国文艺纳入本民族的理解范畴和情感氛围。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世界各国的改编中，就常被删减或重构以符合当地观众的审美习惯。而自二十世纪初期莎翁剧目在中国登台以来，几乎每次演出都会有适时的调整，八十年代中国版的《威尼斯商人》就淡化了宗教矛盾和种族冲突，犹太人夏洛克的形象被抽离为贪婪的象征。法国人在情感上也曾无法接受莎剧的悲喜混杂的风格，以至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亦对莎士比亚大加贬斥。德国的歌德在其《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就阐述，莎剧之所以能在德国舞台大获成功，正是因为创作者合理地有所抛弃，更有所保留。歌德认为如果莎剧被奉为圭臬，不能改编一丝一毫，那么“它是多么荒谬”。因此，文艺的“过滤”与“变形”接受看似是在扭曲经典、颠覆艺术，实则是民族心理对外来文化的主动调适。

另一方面，外国文艺也在潜移默化中冲击并重塑读者的审美心理。例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入中国后，不仅启发了作家对意识流、象征手法的运用，更促使读者重新发现李贺、李商隐诗歌中的超现实意象，以及《天净沙·秋思》中“意象叠加”的现代性。这种反向影响表明，民族化并非封闭的自卫机制，而是开放的文化对话，外来文艺既作为外质被本土化，也为本土文艺注入新质，在本国土壤重获新生。

对于读者而言，减弱或消除不同国家与地域的文艺之间天然的“心理防御机制”其实并非偶然。钱念孙认为这里存在两种因素：一是作品的自身价值，即作品含有的世界属性；二是读者的需求取向，即读者对于

某种异域属性的需求。一般来说,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普适性越强、世界意义越大的作品也就越容易满足其他国家读者的需求,但具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以及能够以什么角度和层面被接受,则更多取决于读者的文艺取向。莎士比亚对人性与命运的描绘,莫泊桑对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批判,以及大仲马对历史的通俗叙事,都具有强烈的世界属性,各国读者都可以跨越文化隔阂,在其中找到共鸣与启发。又例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文学评论家茅盾就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了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9]在茅盾看来,当时中国读者阅读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需求应该是获得“世界的现代思想”,主要就是提倡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反对封建与愚昧。茅盾在这里既重视作品的艺术鉴赏性,也强调作品的社会功效性。所以,当时译介的诸多经典作品中所蕴含的世界意义就起到了传递新知、启迪人心的作用,进而在更深层次被中国读者广泛理解和吸收。

然而,钱念孙并未将外国文学的民族化视为对本土文化的削弱或压制。他提出频繁的跨文化接触能够削弱民族心理的保守性,促进更开放的接受姿态。中国对西方小说技巧从拒斥到吸纳的转变,以及油画技法从“匠气”到“艺术”的地位提升,均证明了文化心理的可塑性。这一观点也蕴含了民族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越是深入理解他者,越能反观自身传统的特质。正如西班牙作家德利维斯通过游历欧洲重新认知卡斯提亚的地方性,中国作家王蒙在跨国体验中反思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异同,作家的创作经历就是跨文化的体验和理解,而外国文学作为一面文化之镜,既能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学的差异,也能帮助读者发现本土文学的独特魅力与价值。这种双向审视,可以为文化交流互鉴查缺补漏,为本土文学创新提供动力源泉。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二》中曾有过生动的论述:“盖创作犹鱼之初漾于洲渚,继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鳞鬣始展也。”^[10]创作在于特别感及个性化,在于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对于异域文艺而言,从“鱼之初漾”到“泳游自恣”是创作、改进过程和过滤、接受过程的结合,也是在寻找归化与异化的平衡点。无论是戏剧、文学、绘画还是风俗,地域性的阅读者与观赏者越是能感知、接触、理解异域文艺,有关的跨文化知识积累愈发厚实,就越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恢宏大气的姿态了解本土,通晓世界。反之,如果一个民族闭关自守、盲目排斥,进而固步自封,观赏者就会固执己见,疲于审美,本土文艺也将逐渐衰颓。

五、总结

诚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11]钱念孙通过对文艺的辩证思考,揭示了文艺创作需以“炼意”锤炼思想深度、以“炼句”雕琢艺术质感的本质逻辑,强调经典之作必须承载人性的真情实感、时代的独特精神与文化的深厚积淀。面对人工智能写作的冲击,他并未陷入技术恐慌或盲目乐观,而是清醒指出机器的“确定性”与人类的“创造性”之间的本质差异,即前者依赖算法的规定、数据的分析及模型的训练,后者则源于创作的温度、价值的抉择及历史的自觉。在跨文化语境下,钱念孙通过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重新阐释了文学民族化过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审视与影响的动态关系。文学的审视既非单向的文化移植、盲目接受,亦非固化的传统持旧、一味拒斥,而是创作者与读者者共同参与的文艺交流与实践。因此,钱念孙的文艺观察、判断与解读,恰如一座人文之桥,连接着传统文脉的深邃底蕴与未来文艺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 [1] 钱念孙.文学的俯察与仰观[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
- [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 [3]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4]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 [5] 杨宁.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6]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7]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8]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9] 黎舟.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历史经验[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4):61-67.
- [10] 刘东方,王佳昕.科技与人文共舞——人工智能文学写作初探[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43(10):1-16.
- [11] 鲁迅.鲁迅杂文集[M].北京:台海出版社,2022.
- [12] 王晓敏.“大文学”视野下文学理论扩容的路径之思[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46(02):135-143.

Observing Depth and Forging Classics: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

Qian Niansun's Literary-Artistic Concepts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Wang Haonan¹

¹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China

Abstract: As a classic collection that demonstrates the literary thought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 Qian Niansun, *Scrutiny and Contemplation in Literature* fully reflects his profound observations and essential explorations into literary creation, as well as his rational examination and value judgments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methodology of “scrutiny and contemplation”, the study explores Qian’s creative philosophy, literary observations, and cultural vision through three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the foundational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works, the deep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 po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impact of foreign literature. It reveals the intrinsic aesthetics and form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art. Centering on creators of literary works and practitioners of technology, the study asserts that literary and artistic classics must both trac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realities, and focu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humanity; the apprecia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must root itself in local aesthetic traditions while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the spirit of art and literature must elevate artistic taste while expanding spiritual horizons.

Keywords: Scrutiny and Contemplation i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riting; Foreign Literature; Cultural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82

探讨度假村的服务场景对品牌形象、消费者感知价值和满意度的影响

——以中国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为例

梅琼奥¹, 张惠媛²

(¹韩国世翰大学, 韩国 木浦58613, ²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215000)

摘要: 现代人从单纯的住宿旅游形态转向健康和休养休闲, 喜欢拥有体育、文娱、文化旅游综合设施的度假村, 但旅游产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也追求娱乐产业的内容和节目多样化。能够体验复合旅游要素的度假村-不仅对地方自治团体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而且在许多国家, 复合度假村的开发正在成为吸引海外游客和谋求地区经济发展的手段。根据这种模式的发展趋势, 对于消费者的特性和决定过程需要深入去理解, 需要找出与消费者需求和要求相适应的营销管理方案。值得一提的是, 服务场景在服务行业为顾客提供最大价值与顾客满意有着直接、积极的关系, 是旅游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服务场景; 品牌形象; 感知价值; 满意度

一、绪论

(一) 背景

随着旅游消费升级与休闲需求多元化, 现代旅游模式正从传统观光向健康休闲度假转型, 消费者愈发青睐集体育、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四季综合性度假村。这类度假村不仅通过“一站式服务”满足多元化需求, 更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例如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村以海洋主题为核心, 整合住宿、水上乐园、海洋馆等八大业态, 2023年实现16.8亿元收入及81.9%的高入住率。在服务竞争层面, 服务场景作为连接消费者的核心媒介, 已从传统物理环境延伸至包含社会互动的多维体验系统, 通过环境线索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服务价值的预判与满意度。当前研究趋势强调需突破单一物理维度, 深入探讨物理环境与社会因素共同构建的品牌形象、感知价值及满意度之间的动态关系, 从而为差异化服务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二) 研究目的

现代旅游业正经历从单一住宿向复合型度假模式的深刻转型。游客日益追求集娱乐、体育、文化、教育及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度假体验, 传统单日住宿模式已难以满足其对多样化休闲活动的需求。尽管学界对物理环境因素的研究已覆盖餐饮、节庆等多个领域, 但针对度假村场景的系统性探索仍存在明显缺口。现有服务场景研究多聚焦于情感反应、品牌态度等维度, 而对感知价值与满意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缺乏深入探讨。基于此, 本研究以服务场景为核心竞争优势, 构建“场景要素—感知价值—满意度”的影响路径模型, 通过实证分析识别亚特兰蒂斯等标杆度假村中显著影响游客价值感知的关键因素。通过本研究, 期望能够识别出游客在访问亚特兰蒂斯度假村时看重的服务场景因素, 从而提出可行的细分管理方案和营销策略, 以最大化游客的感知价值, 提升游客满意度, 为有效且理想的管理提供建议。

作者简介: 梅琼奥(1996—),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旅游管理;

通讯作者: 张惠媛(1997—),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社交网络服务、银发旅游、旅游危险感知;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研究目的。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对服务场景、品牌形象、感知价值和满意度的理论进行探讨,并以文献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曾体验过中国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村的顾客进行调查,数据分析使用SPSS统计软件,通过频率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以及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验证,以探讨样本特性及检验研究假设。

二、文献综述

(一) 服务场景

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特性,通常在评估时会感到困难。服务场景 (Servicescape) 的概念最初由Bitner (1992) 提出,旨在将服务行业中的无形服务具象化,定义为可以通过视觉和感官感受到的物理环境 (정경균, 2021)。尽管各学者对服务场景的定义因研究目的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本研究根据度假酒店相关前期研究的定义,将服务场景定义为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发生互动的人工建造的物理环境。研究表明,度假村服务场景对顾客感知价值与满意度具有多层次影响:物理环境(如设施便利性、空间美学)与社会互动(如服务专业性、场景氛围)通过提升功能性价值(设施实用性)与情感性价值(文化沉浸感)共同作用于消费者决策。其中,物理场景在塑造顾客价值时解释力更为显著,而社会场景对品牌形象构建的作用更为突出;在特定场景如赌场度假村中,物理环境改造对再访意图呈现完全中介效应,对满意度则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这提示度假场景设计需兼顾物理空间优化与社会互动强化,通过差异化要素组合(如主题化设施联动、员工服务标准化)驱动价值感知转化,进而实现满意度提升与品牌忠诚度沉淀。本研究将基于与度假村的关联性及研究目的,参考박민아·윤세목 (2018)、하상도 (2023)、ZHANGWENJUN (2018) 的研究,将度假服务场景应用为娱乐性、社会性、便利性、美感和空间性作为组成要素。

(二) 品牌形象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品牌”这个观念源于“市场”,它是供求之间持续变动的产物。品牌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王长征和寿志钢,2007) 在参考 (Dobni & Zinkhan,1990) 的品牌形象定义划分的基础上,并对之后十多年来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最终总结出品牌形象定义的不同类型。他们探讨了品牌形象在:心理要素的定义、意义、自我意义以及个性方面的强调。根据이은호(2020) 的研究,酒店品牌形象被定义为由酒店内外特性复合而成的情感反应,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体验形成的心理结果。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定义度假酒店的品牌形象为消费者在实际接触后,脑海中留下的与特定品牌相关的一系列信息所引发的感觉和印象。研究表明,酒店及度假村的品牌形象作为涵盖功能属性(设施便利性)、象征意义(文化独特性)与情感价值(沉浸体验)的多维认知体系,通过“服务场景—品牌认同—消费决策”的链式路径深刻影响顾客行为。物理场景(如空间美学、娱乐设施)与社会互动(如员工专业性、文化体验)共同塑造品牌形象的吸引力与独特性,其中社会性场景对品牌形象构建的解释力更强;而品牌形象的价值性、象征性等维度进一步通过提升客户感知价值(如情感共鸣、社交满足)显著作用于满意度及推荐意图,且其影响力超越满意度成为忠诚度的首要驱动因素。同时,满意度与品牌形象形成双向强化机制:高满意度体验可增强品牌记忆度与信任感,而鲜明的品牌形象(如独创性主题、正向联想)则能激发使用意愿与口碑传播。因此,从业者需以“场景优化—价值传递—情感沉淀”为核心逻辑,通过主题化空间设计、标准化服务交互及沉浸式体验融合,构建高辨识度的品牌符号系统,最终实现从功能满足到品牌忠诚的价值跃迁。

(三) 感知价值

感知价值是指消费者为购买特定商品或使用服务所投入的要素与获取要素之间的交换价值 (Zeithaml, 1987)。即,消费者通过服务所获得的收益与愿意支付的费用之间的相对差异,构成了价值的基础,从而会影响其购买决策。本研究将顾客对度假村的感知价值定义为、顾客在不同体验情境中对被提供到的东西的、感知的偏好和评价。感知价值作为目标导向行为模型的扩展变量,已被广泛用于探讨休闲活动参与者的满意度与评价的前置变量 (고동우·이준원, 2009),并被应用于多项探索行为意图的研究中 (이민석 等, 2021)。特别是在旅游领域,感知价值被认为是旅游体验的结果,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和吸引力等因素,以及所投入的时间和费用进行的总体评价 (윤병국·김홍길, 2018)。感知价值在服务场景、品牌形象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中是一个重要变量。本文旨在探讨度假村使用者的感知价值及其影响关系。本研究基于关于酒店

度假村的前期研究, 根据本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将对度假村的感知价值分为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进行测量。

(四) 满意度

Richard L. Oliver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提出了满意度这一重要影响变量。Oliver将满意度定义为基于产品或服务体验后期待与实际表现之间比较结果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可以分为积极(满意)、中立(没有特别感觉)和消极(不满)。满意度不仅是即时的情感反应, 也是影响未来行为和决策的认知评估(Oliver, 1997)。根据研究需要, 借鉴了这些学者(R. L. Oliver, 1997; Kotler. P, 2000; 이예, 2019)对满意度的定义并结合满意度的特点, 本研究将满意度定义为通过多种方式, 由于顾客的总体体验, 可能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今后的旅游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模型

通过对有过使用中国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村的顾客的服务场景、品牌形象及感知价值和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以使用亚特兰蒂斯度假村的顾客为对象, 探讨了服务场景对品牌形象和感知价值与满意度的影响关系, 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设定了如下图1的研究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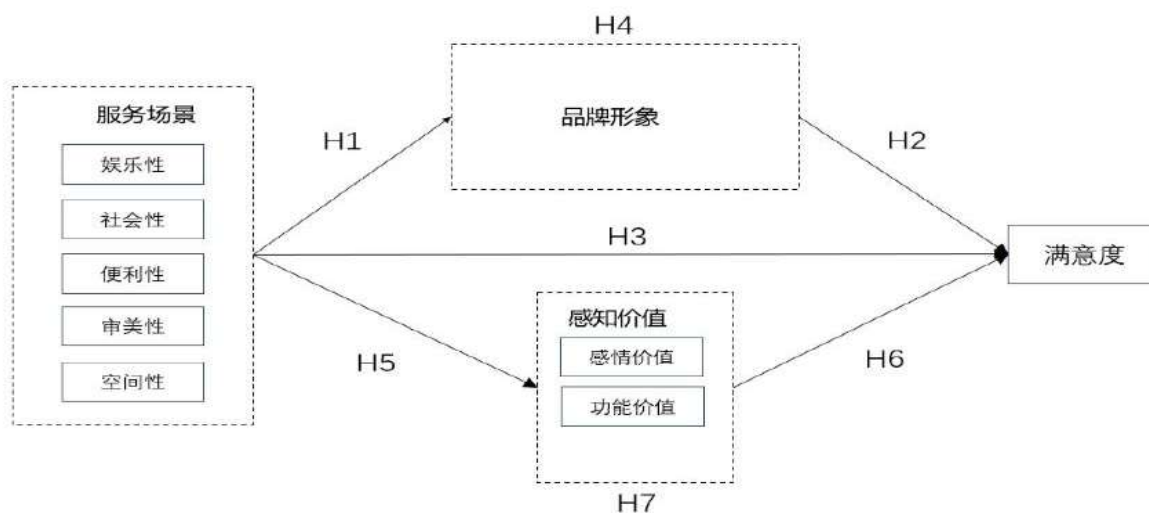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模型

(二) 研究假设

服务场景与品牌形象的关系, 假设 1 服务场景对品牌形象具有正向 (+) 影响。

品牌形象与满意度的关系, 假设 2 品牌形象对满意度具有正向 (+) 影响。

服务场景与满意度的关系, 假设 3 服务场景对满意度具有正向 (+) 影响。

服务场景与满意度关系中的品牌形象中介效应, 假设 4 品牌形象在服务场景与满意度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服务场景与感知价值的关系, 假设 5 服务场景对感知价值具有正向 (+) 影响。

感知价值与满意度的关系, 假设 6 感知价值对满意度具有正向 (+) 影响。

服务场景与满意度关系中的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假设 7 感知价值在服务场景与满意度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三) 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 本研究采用了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献研究, 对服务场景、品牌形象、感知价值和满意度的理论进行了探讨, 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实证研究。问卷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 于2024年6月30日至2024年7月26日期间, 对曾经体验过中国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村的客户进行了问卷调查, 共回收400份问卷。在剔除重复和无效问卷后, 共有360份有效问卷用于分析。收集到的数据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 样本的一般性检验

为了解样本的基本人口统计特征,进行了频率分析,结果如下:性别分布:男性占45% (162人),女性占55% (198人)。年龄分布:20多岁占25.6% (92人),30多岁占39.7% (143人),40多岁占19.8% (71人),50多岁占12.5% (45人),60多岁占2.5% (9人)。婚姻状况:未婚占17.8% (64人),已婚占73.6% (256人),其他占8.6% (31人)。同行者类型:独自旅行占14.4% (52人),与家人同行占40.8% (147人),与朋友/同事/恋人同行占23.9% (86人),通过旅行社同行占20.8% (75人)。消费水平:消费在1万人民币以下占32.8% (118人),1万~2万人民币之间占37.2% (134人),2万人民币以上占30% (108人)。职业:企业家/管理者占21.4% (77人),公司职员占48.9% (176人),公务员及军人占8.9% (32人),农业/畜牧业/渔业从业者占1.9% (7人),退休及无业人员占11.1% (40人),个体经营者占7.8% (28人)。月收入:月收入在5000元人民币以下占9.2% (33人),5000~10000元人民币之间占22.8% (82人),10000~15000元人民币之间占16.7% (60人),15000~20000元人民币之间占21.4% (77人),20000元人民币以上占30% (108人)。

(二) 假设检验

假设1检验:服务场景对品牌形象的影响

在假设1-1中,娱乐性对品牌形象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娱乐性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3.101,在 $p<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娱乐性对品牌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1被验证通过。

在假设1-2中,社会性对品牌形象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社会性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31.914,在 $p<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社会性对品牌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2被验证通过。

在假设1-3中,便利性对品牌形象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便利性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32.547,在 $p<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便利性对品牌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3被验证通过。

在假设1-4中,美学性对品牌形象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美学性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32.762,在 $p<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美学性对品牌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4被验证通过。

在假设1-5中,空间性对品牌形象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空间性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5.434,在 $p<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空间性对品牌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5被验证通过。

表1 服务场景与品牌形象的回归分析结果

假设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公差	VIF
假设1-1	.065	.021	.093	3.101	.002**	.305	3.274
假设1-2	.862	.027	1.206	31.914	.000***	.193	5.182
假设1-3	1.001	.031	1.46	32.547	.000***	.137	7.302
假设1-4	.839	.026	1.18	32.762	.000***	.213	4.702
假设1-5	.141	.026	.216	5.434	.000***	.175	5.716

$R^2=.902$, 调整后的 $R^2=.901$, $F=654.481$, $p=.000***$, Durbin-Watson 1.684

*: $p<.05$, **: $p<.01$, ***: $p<.001$, 下同。

2) 假设2检验:品牌形象对满意度的影响

在假设2中,品牌形象对满意度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品牌形象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52.049,在 $p<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因此,品牌形象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被验证通过。

表2 品牌形象与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假设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公差	VIF
假设2	.976	.019	.94	52.049	.000***	.031	31.925

$R^2=.883$, 调整后的 $R^2=.883$, $F=2709.062$, $p=.000***$, Durbin-Watson 1.159

3) 假设3检验:服务场景对满意度的影响

首先,在假设3-1中,娱乐性对满意度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娱乐性的回归系数的p值为0.359,大于0.05,因此不显著,假设3-1被拒绝。

在假设3-2中,社会性对满意度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社会性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32.406,在 $p<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社会性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3-2被验证通过。

在假设3-3中, 便利性对满意度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 便利性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33.251,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便利性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3-3被验证通过。

在假设3-4中, 美学性对满意度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 美学性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37.925,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美学性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3-4被验证通过。

最后, 在假设3-5中, 空间性对满意度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 空间性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4.567,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空间性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3-5被验证通过。

表3 服务场景与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假设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公差	VIF
假设3-1	.021	.023	.029	.919	.359		.3	3.336
假设3-2	.967	.03	1.317	32.406	.000***		.187	5.358
假设3-3	.959	.029	1.424	33.251	.000***		.168	5.954
假设3-4	1.054	.028	1.443	37.925	.000***		.213	4.699
假设3-5	.12	.026	.182	4.567	.000***		.194	5.149
R ² = .891, 调整后 R ² = .889, F=578.109, p= .000***, Durbin-Watson 2.711								

4) 假设4检验: 服务场景与满意度关系中, 品牌形象的中介效应

为了验证中介效应, 采用Hayes, A. F. (2017) 提出的Macro PROCESS模型4, 设定Bootstrapping重复采样5000次, 置信区间为95%, 并进行分析以检验统计学显著性 (Hayes, A. F., Montoya, A. K., & Rockwood, N. J., 2017)。

• 假设4-1: 在“娱乐性→品牌形象→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中, 置信区间包含数字0 (95% CI: -0.045 ~ 0.023), 且 $p > 0.05$, 因此不具有中介效应。假设4-1被拒绝。

• 假设4-2: 在“社会性→品牌形象→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中, 置信区间未包含数字0 (95% CI: 1.320 ~ 1.607)。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 直接效应(c')与间接效应(a*b)均为正值,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因此, 假设4-2显示部分中介效应。

• 假设4-3: 在“便利性→品牌形象→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中, 置信区间未包含数字0 (95% CI: 1.704 ~ 2.261)。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 直接效应(c')与间接效应(a*b)均为正值,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因此, 假设4-3显示部分中介效应。

• 假设4-4: 在“美学性→品牌形象→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中, 置信区间未包含数字0 (95% CI: 1.657 ~ 2.085)。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 直接效应(c')与间接效应(a*b)均为正值,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因此, 假设4-4显示部分中介效应。

• 假设4-5: 在“空间性→品牌形象→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中, 置信区间包含数字0 (95% CI: -0.081 ~ 0.163), 且 $p > 0.05$, 因此不具有中介效应。假设4-5被拒绝。

表4 服务场景与满意度关系中品牌形象的中介效应

假设	a*b	Boot SE	z	p	95% BootCI	c'	结果
假设4-1: 娱乐性 => 品牌形象 => 满意度	-.007	.017	-.409	.683	-.045~.023	-.004	驳回
假设4-2: 社会性 => 品牌形象 => 满意度	1.082	.074	14.641	.000***	1.320~1.607	.225***	部分中介
假设4-3: 便利性 => 品牌形象 => 满意度	1.404	.141	9.95	.000***	1.704~2.261	.404***	部分中介
假设4-4: 美学性 => 品牌形象 => 满意度	1.376	.111	12.389	.000***	1.657~2.085	.526***	部分中介
假设4-5: 空间性 => 品牌形象 => 满意度	.024	.063	.39	.696	-.081~.163	.141***	驳回

5) 假设5检验: 服务场景对感知价值的影响

• 假设5-1: 娱乐性对情感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具体而言, 娱乐性的回归系数p值为0.372, 大于0.05, 因此不显著, 假设5-1被拒绝。

- 假设5-2: 社会性对情感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社会性的回归系数t值为20.706,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社会性对感知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2通过。
- 假设5-3: 便利性对情感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便利性的回归系数t值为3.252, 在 $p < 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便利性对感知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3通过。
- 假设5-4: 美学性对情感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美学性的回归系数t值为5.572,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美学性对感知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4通过。
- 假设5-5: 空间性对情感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空间性的回归系数t值为10.848,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空间性对感知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5通过。
- 假设5-6: 娱乐性对功能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娱乐性的回归系数t值为3.633,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娱乐性对功能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6通过。
- 假设5-7: 社会性对功能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社会性的回归系数t值为22.423,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社会性对功能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7通过。
- 假设5-8: 便利性对功能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便利性的回归系数t值为133.19,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便利性对功能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8通过。
- 假设5-9: 美学性对功能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美学性的回归系数t值为57.963,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美学性对功能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9通过。
- 假设5-10: 空间性对功能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空间性的回归系数t值为32.83,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空间性对功能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10通过。

表5 服务场景与感知价值的回归分析结果

假设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公差	VIF
假设5-1	.032	.036	.035	.893	.372	.3	3.336
假设5-2	.965	.047	1.036	20.706	.000***	.187	5.358
假设5-3	.146	.045	.172	3.252	.001***	.168	5.954
假设5-4	.242	.043	.261	5.572	.000***	.213	4.699
假设5-5	.445	.041	.532	10.848	.000***	.194	5.149
假设5-6	.043	.012	.029	3.633	.000***	.3	3.336
假设5-7	.345	.015	.226	22.423	.000***	.187	5.358
假设5-8	1.977	.015	1.416	133.19	.000***	.168	5.954
假设5-9	.83	.014	.547	57.963	.000***	.213	4.699
假设5-10	.444	.014	.325	32.83	.000***	5.149	5.149
$R^2 = .834$, 调整后 $R^2 = .832$, $F = 356.95$, $p = .000***$, Durbin-Watson 2.567							

6) 假设6验证: 感知价值对满意度的影响

- 假设6-1: 情感价值对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具体而言, 情感价值的回归系数t值为24.741,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情感价值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假设6-1被接受。
- 假设6-2: 功能价值对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然而, 功能价值的回归系数t值为-13.2, 在 $p < 0.00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表明功能价值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因此假设6-2被拒绝。

表6 感知价值与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假设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value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Beta			公差	VIF
假设6-1	.887	.036	1.112	24.741	.000***	.49	2.04
假设6-2	-.289	.022	-.593	-13.2	.000***	.49	2.04
$R^2 = .646$, 调整后的 $R^2 = .644$, $F = 326.401$, $p = .000***$, Durbin-Watson 2.302							

7) 假设7检验: 服务场景与满意度关系中,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 假设7-1: 娱乐性 $\rightarrow$ 情感价值 $\rightarrow$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包含0 (95% CI: -0.041~0.014)。因此, 中介效应不存在, 假设7-1被拒绝。
- 假设7-2: 社会性 $\rightarrow$ 情感价值 $\rightarrow$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包含0 (95% CI: 0.775~0.953)。 $p < 0.001$, c' 和 $a*b$ 均为正且显著,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假设7-2被接受。

- 假设7-3: 便利性 → 情感价值 →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包含0 (95% CI: 0.143~0.447)。p < 0.001, c' 和 a*b 均为正且显著,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假设7-3被接受。
- 假设7-4: 美学性 → 情感价值 →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包含0 (95% CI: 0.088~0.293)。p < 0.001, c' 和 a*b 均为正且显著,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假设7-4被接受。
- 假设7-5: 空间性 → 情感价值 →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包含0 (95% CI: 0.386~0.654)。p < 0.001, c' 和 a*b 均为正且显著,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假设7-5被接受。
- 假设7-6: 娱乐性 → 功能价值 →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包含0 (95% CI: 0.022~0.059)。a 和 b 显著, c' 显著, 但 a*b 和 c' 符号相反, 显示出抑制效应。假设7-6表现出抑制效应。根据文献 (Kim Ha-Hyeong & Kim Soo-Young, 2020; MacKinnon, D. P. et al., 2000), 抑制效应是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符号相反时发生。
- 假设7-7: 社会性 → 功能价值 →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包含0 (95% CI: 0.09~0.199)。p < 0.001,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假设7-7被接受。
- 假设7-8: 便利性 → 功能价值 →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包含0 (95% CI: -2.779~-2.122)。p < 0.001, c' 和 a*b 均为负且显著,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假设7-8被接受。
- 假设7-9: 美学性 → 功能价值 →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包含0 (95% CI: 0.301~0.598)。a 和 b 显著, c' 显著, 但 a*b 和 c' 符号相反, 显示出抑制效应, 假设7-9表现出抑制效应。
- 假设7-10: 空间性 → 功能价值 → 满意度的中介路径不包含0 (95% CI: 0.517~1.01)。p < 0.001,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假设7-10被接受。

表7 服务场景与满意度关系中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假设	a*b	Boot SE	z	p	95% BootCI	c'	结果
假设7-1: 娱乐性 =>情感价值=> 满意度	-.011	.014	-.773	.439	-.041 ~ .014	-.001	驳回
假设7-2: 社会性 =>情感价值=> 满意度	.647	.045	14.322	.000***	.775 ~ .953	.210***	部分中介
假设7-3: 便利性 =>情感价值=> 满意度	.201	.078	2.597	.009	.143 ~ .447	1.201***	部分中介
假设7-4: 审美性 =>情感价值=> 满意度	.139	.053	2.624	.009	.088 ~ .293	.710***	部分中介
假设7-5: 空间性 =>情感价值=> 满意度	.355	.067	5.298	.000***	.386 ~ .65	.521***	部分中介
假设7-6: 娱乐性 =>功能价值=> 满意度	.029	.01	3.097	.002**	.022 ~ .059	-.054*	抑制效应
假设7-7: 社会性 =>功能价值=> 满意度	-.102	.027	3.732	.000***	.090 ~ .199	1.110**	部分中介
假设7-8: 便利性 =>功能价值=> 满意度	-1.734	.168	-10.347	.000***	-2.779~-2.122	-.734***	部分中介
假设7-9: 审美性 =>功能价值=> 满意度	.303	.076	3.982	.000***	.301 ~ .598	-.330**	抑制效应
假设7-10: 空间性 =>功能价值=> 满意度	-.565	.125	4.505	.000***	.517 ~ 1.010	.446**	部分中介

五、结论

研究表明, 服务场景通过社会性互动 (如员工专业性、友善服务)、物理设施优化 (如清晰标识、舒适温湿度控制) 及功能价值提升 (如空间布局高效性、成本感知降低) 多维驱动游客感知价值, 其中社会性场景对情感价值 (身份认同、文化共鸣) 的塑造尤为关键, 而物理场景则通过美学设计与设施便利性强化功能价值。感知价值作为核心中介变量, 直接影响满意度及重访意愿, 例如三亚亚特兰蒂斯通过主题化空间叙事与个性化服务设计, 使游客沉浸体验转化为品牌忠诚。实践层面, 建议度假酒店以“场景—价值—忠诚”为逻辑链, 聚焦三大策略: 差异化服务 (如针对团体游客优化动线流程)、场景要素升级 (融合艺术装置与智能设施增强情感联结)、社会价值深化 (通过标准化培训与文化互动强化品牌独特性), 从而将服务场景从功能载体转化为情感黏性工具, 为行业提供从“体验优化”到“品牌溢价”的转型路径。

本研究以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为案例, 揭示了服务场景通过品牌形象与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对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影响, 为度假酒店通过场景设计提升情感共鸣与功能价值提供了实证支持。然而, 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 其一, 样本局限于单一高端度假品牌, 结论外推性受限; 其二, 未限定游客近期体验时间, 可能弱化服务场景动态影响的精准性; 其三, 变量聚焦于满意度与品牌形象, 未涵盖忠诚度、跨文化差异等深层行为机制。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突破: 样本扩展 (对比不同区域、定位的度假村以验证理论普适性), 时间优化 (追踪游客近期体验以分析场景对恢复性体验、口碑传播的即时效应), 变量深化 (引入文化背景、再访意图等变量构建更复杂的影响路径模型)。通过多维拓展, 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服务场景在体验经济中的核心作用, 为行业从“标准化服务”向“场景化价值创造”转型提供系统性理论框架与实践工具。

参考文献:

- [1] BITNER M. J. Servicescapes: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2):56(2).
- [2] 정경균. 웰니스 관광목적지의 물리적·사회적 서비스스케이프가 지각된 가치와 만족 및 행동의도에 미치는 영향. 호남대학교 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 2021.
- [3] 박민아, 윤세목. 리조트 서비스스케이프, 회복환경지각, 여가만족의 구조적 관계 연구. *관광경영연구*, (2018):22(4).
- [4] 하상도. 리조트 서비스스케이프가 고객만족과 목적지애착 및 재방문의도에 미치는 영향 연구. 경기대학교 대학원, 국내석사학위논문, 2023.
- [5] ZHANG W. 호텔의 서비스스케이프가 고객의 지각된 가치, 만족도와 충성도에 미치는 영향. 경희대학교 대학원, 국내석사학위논문, 2018.
- [6] 王长征, 寿志钢. 西方品牌形象及其管理理论研究综述.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29(12), 8. DOBNI D, ZINKHAN G M. In search of brand image: A foundation analysi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90):17.
- [7] 이은호. 호텔 서비스스케이프와 브랜드 이미지, 고객가치, 고객만족의 영향관계 연구. 동명대학교 대학원, 국내박사학위논문, 2021.
- [8] ZEITHAML V A.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 quality and value: 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7):52(3).
- [9] 고동우·이준원. 수상스포츠클럽의 고객지향성, 지각된가치, 고객만족, 서비스품질 평가 및 재이용의도의 관계. *한국스포츠산업경영학회지*, (2009):14(4).
- [10] 윤병국·김홍길. 한국 전통산사(山寺)의 야생차산지 관광테마 개발을 위한 스토리텔링, 관광객의 지각된 가치, 만족, 행동의도 간의 구조적 영향 관계와 매개효과. *유라시아연구*, (2018): 15(3).
- [11] OLIVER R L. Satisfaction. A Behavioral Perceptive on the Consumer, Singapore: McGraw-Hill, 1997.
- [12] KOTLE P. Marketing Management: The Millennium Edition. Person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2000.
- [13] 이예. 서비스스케이프와 인적서비스가 만족도 및 재방문 의도에 미치는 영향. 신라대학교 일반대학원, 국내석사학위논문, 2019.

The Impact of Service Scape at Resort on Satisfaction through Brand Image and Perceived Value - As A Case of Sanya Atlantis in China

Qiongao Mei¹, Huiyuan Zhang²

¹ Qiongao Mei, Sehan University, Mokpo, Korea

² Huiyuan Zhang, Su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zhou, China

Abstract: Modern tourism has evolved from traditional accommodation-based models to leisure activities focused on health and wellness. Contemporary travelers increasingly prefer resorts that offer integrated experiences encompassing sports, cultural entertainment, and tourism facilities. In response,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expanding its entertainment offerings to meet diverse consumer demands. Such resorts not only generate substantial economic benefits for local governments but also serve as strategic tools for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nd promo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ing is essential to inform marketing strategies aligned with consumer preferences. Importantly, the Servicescape—the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services are delivered—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nhancing customer value and satisfaction, and is recognized as a key success factor in tourism management.

Keywords: ServiceScape; Brand Image; Perceived Value; Satisfac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84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高校“红绿思政”的生态哲学范式及实现路径

石婷婷¹

(¹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四川成都 61130)

摘要: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 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构建“红绿思政”生态哲学范式, 是深化思政教育改革、服务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战略的关键举措。当前, 部分高校通过校地共建红绿实践基地, 初步实现红色基因与绿色理念的课程融合, 但仍存在学科壁垒突出、实践教学浅表化、资源协同不足等问题。对此, 建议以“学科交叉-实践深化-数字赋能-多元协同”为路径, 构建“红色文化+生态哲学”跨学科课程群, 设计“红绿融合”劳动教育项目, 开发红色文化沉浸式传播与生态技术模拟实训, 完善“高校-政府-乡村-企业”共建机制, 打造红绿思政赋能乡村振兴的可持续生态。

关键词: 新农科; 涉农高校; 红绿思政; 生态哲学

2019 年 9 月 5 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 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涉农高校为“三农”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深刻阐述了高等农林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涉农高校的历史使命, 并对广大涉农高校办学方向提出新要求, 成为新时代涉农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服务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2024 年 9 月 26 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重要回信精神五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5 年来, 全国高等农林教育战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以新农科建设为统领, 不断推动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呈现出格局性变化。随着社会对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重视, 涉农高校从传统农业技术教育转向“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要求思政教育回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可持续、农民主体性等多元命题, 这就对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建设提出了“红绿融合”的深层需求, 即以“红色文化铸魂”强化价值引领, 以“绿色生态塑形”赋能实践能力, 二者协同服务于新时代“三农”人才的培养目标。

一、理论溯源: 生态哲学与“红绿思政”的内在耦合

(一) 生态哲学的理论图谱

1. 以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西方生态哲学

西方生态哲学是 20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重要思想流派, 聚焦于反思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主要分为社会批判和生态中心两大路径。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代表, 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通过“代谢断裂”(生产体系与自然循环的割裂) 导致生态危机, 主张通过社会革命重建可持续的“社会-自然”关系, 其核心在于揭示环境问题本质是资本积累逻辑与生态有限性间的结构性矛盾。深层生态学则由奈斯创立, 提出激进的整体主义生态观, 强调所有生命具有内在价值, 倡导“生态中心平等主义”,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自我实现”理论主张突破狭隘的个体意识, 将人类视为生态网络中的节点, 通过“追问式思考法”引导根本性的价值观变革。二者有着差异显著, 福斯特侧重社会经济结构的物质性改造, 而奈斯强调文化意识和价值体系的生态转向, 共同构成当代生态哲学批判性与超越性的双重维度, 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镜鉴。

基金项目: 涪江流域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项目: 涉农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建设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FJSY2024ZC33)

作者简介: 石婷婷(1985—), 女,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2.以“天人合一”“耕读传家”为内核的农耕文化哲学

“天人合一”“耕读传家”为内核的中国本土农耕文化哲学，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智慧。特别是成都平原依托都江堰水利工程构建的“道法自然”灌溉系统，将顺应天时、因地制宜的农耕实践升华独特的天府农耕文化。蜀地特有的“晴耕雨读”传统将土地耕作与经典研习相融通，扬雄《方言》著书立说与务农并举、杜甫草堂“力耕不吾欺”的诗文创作，均折射出物质生产与精神培育的双重维度。这种文化形态通过蜀绣纹样中的桑蚕意象、川西林盘聚落的空间布局以及竹编农具的工艺美学，将自然伦理转化为生活美学。其深层价值在于以土地为纽带，在春种秋收的循环中培育出敬畏自然、克勤克俭的生态人格，在典籍诵读与农事劳作间建构起“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

3.新农科语境下的生态哲学重构

新农科视域下的生态哲学重构，本质是对工业化农业范式的价值纠偏，其核心在于建立人—地—技术—伦理的动态平衡系统。现代农业科技突破传统“征服自然”的思维定式，通过卫星遥感、基因编辑等技术深化对土地生命网络的理解，推动“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共生主义”的认知转向。在耕地智慧化监测与精准滴灌实践中，技术不再作为剥削自然的工具，而是转化为维系土壤微生物群落稳定的调节器，实现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辩证统一。这种重构要求将土地伦理从资源载体升格为生命共同体，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评估制度、农业大数据的隐私保护机制，均体现着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前置原则。

（二）“红绿思政”的内涵解构

1.红色文化的生态伦理意蕴

红色文化的生态伦理意蕴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以“人与自然协同共生”为核心，呈现出独特的实践理性与价值关怀。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南泥湾开荒”既强调改造自然的革命意志，又通过轮作制、水土保持技术维系生态平衡，体现了“斗争性与规律性统一”的辩证思维。毛泽东“绿化祖国”的号召将植树造林纳入国家战略，赋予生态建设以政治使命，形成“红色动员—群众参与—生态修复”的行动逻辑。这种伦理观突破工具理性束缚，在集体化农田水利建设中，既追求粮食增产的物质目标，又通过水库-梯田-林带系统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这种做法深层价值在于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延伸至生态领域，将土地革命时期“耕者有其田”的公平理念升华为“代际生态正义”的伦理自觉。

2.天府农耕文化的生态智慧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

天府农耕文化的生态智慧以“天人共育”为核心，在都江堰无水利工程中展现为“乘势利导”的水土治理哲学，通过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淤的动态平衡，实现两千余年“水旱从人”的可持续灌溉。川西林盘聚落“田-林-宅”的复合生态系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生产生活空间，竹篱茅舍与湿地稻田构成天然的碳汇网络。这种智慧在耕作时序上体现为“三阳开泰”农事历法，依节气轮作水稻、油菜等形成土壤养分自循环机制。其“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节制伦理，与当代生态经济学中的“行星边界”理论形成跨时空呼应，共同指向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当前崇州天府粮仓示范区运用卫星监测与AI虫情分析时，仍保留鸭稻共生、秸秆还田等传统技艺，在数字技术与生态农法的融合中重构“科技向善”的农业伦理。这种文化基因提示着现代农业转型的根本路径，即将无人机播种的精准性与“斧斤以时入山林”的节制性相结合，在生产力提升中重建人与土地的伦理契约。

3.“红绿思政”的耦合逻辑

“红绿思政”的耦合逻辑体现为红色精神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互动，其核心在于通过价值引领与实践反馈的双向建构，形成政治认同与生态自觉的共生机制。红色精神以“人民至上”的宗旨为绿色实践注入价值灵魂，延安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当代转化为库布其沙漠治理中党员先锋队带领群众“向沙要绿”的生态攻坚；“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升华为塞罕坝林场三代建设者创造“沙漠变绿洲”奇迹的精神动能。绿色实践则通过生态福祉的可感知性强化红色认同，四川省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出台小微湿地建设规范，实施黄河上游若尔盖草原湿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启动四川省千岁古树名木保护三年行动，这都是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地为乡村生态振兴的具象成果，使群众在环境改善中深化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价值体认。这种耦合逻辑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党政同责”的生态环保责任制，将“党的领导”政治优势转化为流域综合治理的组织效能。在文化维度则通过“红绿融合”教育基地，

形成“精神传承—生态实践—价值内化”的闭环。这种耦合路基的本质是通过红色精神赋予生态治理以政治高度，又借绿色转型的实践成效反哺红色文化的时代生命力。

二、范式构建：“红绿思政”生态哲学范式的三维模型

（一）“红绿思政”生态哲学范式构建的目标体系

1. 培养“红色信仰+生态责任”的双重使命感

“红绿思政”生态哲学范式的构建目标，在于锻造兼具政治定力与生态自觉的新型主体性，通过红色信仰的价值引领与生态责任的实践淬炼，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生态智慧的时代融合。其核心机制在于红色基因的“精神源代码”为生态治理注入“人民至上”的价值灵魂，生态责任的具身化实践又反向激活红色文化的当代生命力。在新农科建设中，通过“红绿思政”教育，使学生深刻理解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同时将生态责任意识融入专业学习和未来职业规划。在农业实践中，以红色信仰为精神支柱，凭借生态责任驱动，积极投身农业绿色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共进，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2. 理解“人-自然-社会”的协同进化关系

“红绿思政”生态哲学范式构建的核心目标之一，在于超越机械论的人地关系认知，以辩证唯物主义重构“人-自然-社会”的协同进化图谱。从红色文化视角看，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深刻体现了人类为推动社会进步所付出的努力，其中蕴含着对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与改造，展现了人与自然、社会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互动。在新农科建设语境下，又需要红绿协同进化的深层逻辑，形成科技创新与生态规律的共振机制。这种范式最终指向“红色动员力—绿色生产力—社会凝聚力”的螺旋上升，实现保护生态行动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变革同步演进，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永续发展。

3. 掌握绿色农业技术伦理与红色文化传播能力

随着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如基因编辑、农业无人机等技术广泛应用，学生需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与准则。一方面要确保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另一方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损害生物多样性为代价，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技术与生态的平衡。红色文化传播能力则体现为对技术实践的意识形态赋义，延安南泥湾“自力更生”精神被转译为现代生态农场中的“循环农业”示范教育，大寨“铁姑娘队”的奋斗叙事转化为生物防治技术推广中的巾帼先锋故事。这种双向建构的终极目标是在田间地头培育“红色工程师”，既能用生态阈值约束技术异化，又能以红色叙事重塑农业科技的人文温度。

（二）“红绿思政”生态哲学范式构建的结构模型

1. 结构模型的四重逻辑框架

“红绿思政”生态哲学范式的结构模型以四重逻辑为支撑。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哲学阐释立足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天人合一”智慧，揭示人类作为“生态命运共同体”成员的伦理定位；红色精神与生态智慧的辩证统一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中实现革命意志与生态规律的价值共振；基于农耕劳动的体验式学习构建具身认知路径，使“土地伦理”从抽象理论转化为“手沾泥土”的生命体悟；服务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则聚焦实践向度，形成“红色基因—生态资本—共富路径”的转化链条。四重逻辑环环相扣，彰显理论与实践交织的范式创新。

2. 结构模型的运行机制

“红绿思政”生态哲学范式的结构模型运行机制，通过政策驱动、资源整合与主体协同的三维联动，形成价值传导与实践转化的闭环系统。以教育部“新农科”建设为引擎，通过《新农科建设指南》等政策文件，将生态伦理教育纳入涉农学科核心课程体系。构建“红绿基因库”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重构，形成沉浸式教学资源。让高校作为知识枢纽，乡村作为实践场域，企业作为技术桥梁，三主体主体合作协同，形成“三螺旋”协作生态。

三、实现路径：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化设计

（一）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课程体系重构

1. 开发“红绿融合”模块化课程

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发的“红绿融合”模块化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轴心，通过“红色基因+绿色技术+农耕伦理”的课程重构，形成“理论-实践-价值”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这种体系强化了涉农学生思政教育，提升其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又赋予学生绿色生态理念，助力培养具备生态素养的新农科人才，为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输送新生力量。

2. 设计“田间党课”“生态研学”等实践课程

“田间党课”与“生态研学”实践课程以土地为课堂、以农事为教材，通过“红色基因激活绿色实践”的沉浸式教育，构建劳动育人与价值引领的双向通道。将劳动教育与红色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田间劳作中感悟红色精神，增强对党的认识与理解，培养艰苦奋斗的品质。实践课程选择具有生态特色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或生态保护示范区域作为研学地点。研学过程中，安排专业生态讲师讲解当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知识，组织学生参与生态保护实践活动，如湿地保护、植树造林等。同时，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参观革命纪念馆、红色遗址等，了解革命先辈在这片土地上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为保护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努力。这种教育模式将镰刀锤头的政治象征转化为镰刀锄头的劳动实践，在汗滴禾土中培育“脚沾泥土、心怀家国”的新时代三农人才。

（二）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方法创新

1. 数字技术赋能

在涉农高校“红绿融合”模块化课程中，数字技术扮演着重要角色。借助VR技术，能生动地重现红色革命历史与天府农耕文化。学生戴上VR设备，便能穿越时空，深入革命历史现场，如泸定桥战役、红军过草地等，真切感受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同时，沉浸式体验天府农耕场景，从春耕播种到秋收归仓，领略传统农耕智慧。而大数据分析可以为乡村生态治理案例教学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收集乡村气候、土壤、水资源等多维度数据，精准剖析生态问题，展示成功治理案例，像分析某乡村通过数据监测优化灌溉系统，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改善生态环境。这些数字技术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还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助力“红绿融合”思政教育落地生根。

2. 具身认知导向的情境教学

具身认知主张认知生成于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学习需通过身体行动、情境感知和情感参与实现。通过模拟农业生态合作社决策、“生态创业项目设计”、红色生态剧编演等，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知识理解与价值认同，将红色文化与生态理念融入情感与行动，切实提升思政教育成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种教学模式将抽象知识转化为可体验、可操作的行动，使学习者在“做中学、演中悟”中实现认知、情感与价值观的统整，符合新时代劳动教育、生态文明教育与思政教育一体化的改革方向。

（三）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源整合机制

1. 构建“红色、农耕文化数据库”

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构建“四川红色、天府农耕文化数据库”，是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思政教育的关键举措。四川红色文化在革命进程中熠熠生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英雄事迹承载着不屈的革命精神。天府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孕育出独特的农事传统与智慧。数据库广泛汇聚各类资料，对四川红色文化深挖革命遗址信息、历史文件及亲历者回忆，生动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以及天府农耕文化中蕴含的川人独特智慧。数据来源多元，涵盖省市级档案库、高校图书馆的珍藏，以及深入乡村田野向民间艺人、农耕老手的访谈。建成后，数据库为思政教学注入鲜活内容，助力教师以史育人，让学生在浓厚的四川红色与天府农耕文化氛围中，筑牢理想信念，厚植爱农情怀，成为契合时代需求的新农科人才。

2. 校地共建“红绿思政实践基地”

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地方共建“红绿思政实践基地”，是以红色文化传承与绿色生态发展为主线，依托校地资源协同，打造集思想政治教育、乡村振兴实践、生态文明教育于一体的育人平台。旨在培养涉农人才的家国情怀、生态伦理与社会责任感，服务地方乡村振兴，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校地共建过程中，双方整合资源，发挥各自优势。高校提供专业知识与人才支持，地方则提供实践场所与丰

富的本土素材。在实践基地,学生们既能参观红军长征遗址,聆听革命故事,接受红色文化洗礼,传承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艰苦奋斗精神;又能深入现代生态农场,参与农事劳作,学习生态种植、养殖技术,了解农业绿色发展路径。通过这种“红绿融合”的实践教学,不仅丰富了思政教育内涵,更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实践能力,为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输送优秀人才。

(四) 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育人评价体系优化

1. 引入“生态素养指数”

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对育人评价体系进行优化,创新性地引入“生态素养指数”,从知识、情感、行为三维度进行量化评价,助力培养更具生态意识与责任感的新农科人才。在知识维度,考查学生对生态哲学、农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课程考试、论文撰写、案例分析等方式,评估学生对生态知识的理解深度与应用能力。情感维度上,关注学生对生态环境的态度与价值观,利用问卷调查、小组讨论、课堂表现观察等方法,了解学生是否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积极情感,是否认同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行为维度主要评估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实践中的生态行为表现,比如参与校园环保活动、投身生态农业实践项目的积极性与实际贡献,观察学生在农业生产模拟场景中是否践行绿色生产方式。“生态素养指数”的引入,使育人评价体系更加全面、科学,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更重视学生生态素养的培育与提升,有助于引导学生将生态理念内化为自身素养,外化为实际行动,为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出知行合一的高素质人才。

2. 形成动态跟踪机制

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形成动态跟踪机制,可以进一步优化育人评价体系,致力于全面、精准地评估学生成长。学院借助电子成长档案袋,详细记录学生在红色铸魂与参与乡村生态治理方面的实践成效。在红色铸魂实践中,档案袋收录学生参与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的资料,如参观红色革命纪念馆的感悟心得、红色文化讲座的学习笔记,以及在红色文化传播活动中的表现记录,以此衡量学生对红色精神的领悟与传承情况。对于参与乡村生态治理实践,档案袋记录学生参与乡村生态调研的成果,包括对乡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记录学生参与乡村生态修复项目、推广绿色农业技术的实践过程与成果,如参与植树造林活动的次数、帮助农民采用生态种植方法后的产量变化等数据。通过这种动态跟踪机制,学院能够实时掌握学生在思想政治与实践能力方面的发展轨迹,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依据,确保育人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全面,培养出既具有坚定红色信仰,又能积极投身乡村生态治理的优秀新农科人才。

结语

在新农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耦合的背景下,涉农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红绿思政”生态哲学范式的构建,既是回应新时代农业教育变革的理论自觉,也是推动“大思政课”与生态文明实践深度融合的创新探索。这一范式以马克思主义生为理论根基,以红色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与绿色发展的生态伦理为双核驱动,通过“红绿融合”重构涉农人才的价值坐标与实践路径。核心在于将农业教育的知识传授升华为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将思政课的“课堂叙事”转化为具身化的“田野行动”,使学生在红色基因的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在绿色实践的淬炼中涵养生态智慧。实现路径上,以“知行合一”为方法论导向,构建“红色文化+生态哲学”的跨学科课程体系,通过理论阐释与案例剖析,揭示革命精神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依托校地共建的“红绿思政实践基地”,打造“情境浸润—劳动体验—创新赋能”的育人链条,让学生在修复革命遗址、参与生态农场运营等实践中,体悟“人与自然共生”的哲学意蕴,锻造服务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未来,这一范式需进一步深化“新农科”与“大思政”的协同机制,探索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传播与生态知识普及的融合模式,同时推动“高校—乡村—企业”多元主体共育共享,使“红绿思政”真正成为撬动农业转型升级、引领乡村价值重塑的文化引擎,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式农业教育的智慧与方案。

参考文献:

- [1] 吴丹.进一步深化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创新[N].人民日报,2024-11-03.
- [2] 胡一笑,董军.剖判与镜鉴: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论要[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23,33(01):33-38.
- [3] 李瑞芬.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D].吉林大学,2021.
- [4] 宋昌素,王育哲.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述评[J/OL].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5,(01):138-144.
- [5] 谢慧敏.新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意蕴探究[J].探求,2025,(01):45-53.

- [6]程淑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域下绿色乡村发展探析[J].智慧农业导刊,2024,4(24):91-94.
- [7]王宽.论“尊重自然”的证明——基于西方生态伦理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比较分析[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04):8-13.
- [8]王文英.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42(06):31-34.
- [9]张颖.耕读传家: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遗产保护活化的文化逻辑[J].贵州社会科学,2019,(05):68-73.
- [10]石婷婷.天府农耕文化载体研究[J].长江丛刊,2022(22):7-9.
- [11]石婷婷.耕读教育融入成都涉农专业大学生德育研究[J].模型世界,2023(3):119-121.
- [12]彭琼琼.新时代涉农高校耕读教育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24,41(09):121-128.
- [13]王晖.中国红色旅游生态化转型升级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3.
- [14]欧婷婷.产业转型背景下川西林盘聚落空间重构研究——以成都市崇州市三个村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合肥市人民政府.美丽中国, 共建共治共享——2024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 乡村规划).昆明理工大学,2024:13.
- [15]程雅妮,徐春英.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院校服务川西林盘保护与建设路径研究[J].现代农业研究,2024,30(06):86-89.
- [16]郭晓鸣,董欢.崇州市建设“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的战略构想与建设进路[J].粮食问题研究,2024,(06):18-21+56.
- [17]董小红,胡旭,康锦谦.绿水青山在“天府”[N].新华每日电讯,2024-11-26(004).
- [18]靳婷,朱玉磊,杨莹.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农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J].智慧农业导刊,2025,5(01):159-162.
- [19]张玲,傅琼.涉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涵养大学生强农兴农使命的价值及策略[J].北京青年研究,2023,32(03):101-107.
- [20]李姣.新农科背景下涉农高校深化耕读教育的路径探析[J].智慧农业导刊,2025,5(02):157-160.
- [21]孙雪敏,朱革,宋致远.新农科视域下大学生爱农情怀培育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J].高教论坛,2024,(10):82-85.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Development: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Paradig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Red-Gr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arxism Schools of Agriculture-Related Universities

Shi Tingting¹

¹Chengdu Agricultur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61130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Constru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d-Gr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cological philosophy paradigm by Marxism colleges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represents a critical initiative to deepen reform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erve the strategi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urrently, some universities have preliminarily integrated "red genes" (revolutionary heritage) and green concepts into curricula through university-local 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Red-Green practice bases."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prominent disciplinary barriers, superficial practical teaching,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 coordination persist. To address these, a pathway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ractical deepening,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is proposed. This includes establishing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clusters centered on "red culture and ecological philosophy," designing labor education programs that fuse red and green values, developing immersive platforms for red culture dissemination and simulated training in ecological technologies, and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university-government-rural-enterprise" mechanism to build a sustainable ecosystem where Red-Gr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s; Agriculture-Related Universities; Red-Gr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cological Philosoph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85

心理治疗在阈下抑郁中的疗效：文献综述

于文丽¹, 潘璐彤², 李奇遇³, 葛蒲⁴, 杨绿^{1*}

(¹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²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2;

³ 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22; ⁴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抑郁症是全球致残首位精神疾病, 阈下抑郁作为其前驱阶段可引发显著功能损害及进展风险。心理治疗凭借非侵入性和防复发优势成为阈下抑郁管理的核心策略。证据表明: 认知行为疗法通过修正负性认知模式, 结合团体干预强化社会学习效应; 行为激活疗法以重建积极行为循环为核心, 兼具短期缓解与长期预防效能; 正念认知疗法特异性阻断高认知易感群体的反刍思维; 人际心理疗法通过改善社会支持系统调节情绪; 团体治疗利用群体动力降低病耻感; 中医情志疗法提供文化适配干预路径。当前研究存在长期疗效证据不足、方案标准化欠缺及神经机制不明等局限。未来需整合多模态生物标记物解析治疗靶点, 构建阶梯式干预模型, 开发数字化精准诊疗平台。阈下抑郁心理干预既是抑郁症二级预防关键环节, 更是实现心理健康关口前移的重要实践, 对降低全球疾病负担具有重大公共卫生价值。

关键词: 心理治疗; 阈下抑郁; 认知行为疗法; 行为激活疗法

前言

阈下抑郁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SD) 作为一种介于心理健康与临床抑郁症之间的过渡状态, 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流行病学数据显示, 其检出率在青少年及青年群体中尤为突出, 部分研究显示青年群体患病率可达14%至54%不等^[1]。尽管阈下抑郁未达到重性抑郁障碍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的诊断标准, 但其伴随的社交退缩、职业功能损害及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 显著增加了进展为全面性抑郁障碍的风险, 并可能加剧社会经济负担。因此, 针对阈下抑郁的早期识别与有效干预具有迫切的临床意义^[2]。

目前, 心理治疗因其非药物干预特性及预防疾病进展的潜力, 逐渐成为阈下抑郁的核心干预手段^[3]。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行为激活疗法 (Behavioral activation Therapy, BAT) 等一线疗法已积累较多循证证据, 而人际心理疗法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IPT)、正念认知疗法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等非一线疗法亦展现出独特的临床价值。然而, 现有研究存在显著异质性: 评估工具、干预形式及疗效指标的差异导致结论难以整合; 针对不同人群 (如青少年、慢性病患者) 的适用性仍需深入探讨; 新兴疗法与传统干预的协同效应亦缺乏系统性梳理。

本综述旨在系统整合国内外阈下抑郁心理治疗的循证研究成果, 从作用机制、临床疗效及长期预后等维度, 厘清不同疗法的优势与局限。通过对比分析一线与二线疗法的适用场景, 以及家庭治疗、中医心理干预等多元化策略的潜力, 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并为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以期推动阈下抑郁干预体系的优化与创新。

1 阈下抑郁的概述

1.1 阈下抑郁的定义及主要特征

作者简介: 于文丽(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潘璐彤(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

李奇遇(2000—),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医患心理;

葛蒲(1997—),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通讯作者: 杨绿(1977—), 女,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阈下抑郁指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抑郁症相关的症状表现,但并未达到抑郁症的临床诊断标准的精神状态,通常会对生活质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4],也称为亚临床抑郁(Subsyndromal depression),阈下抑郁的主要特征为存在情绪和认知方面的症状^[5]。阈下抑郁较重度抑郁症更为普遍,易过渡至中重度抑郁,被认为是重度抑郁症的重要风险因素^[6]。阈下抑郁常伴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功能损害,严重威胁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日常行为活动和社交活动,部分研究表明阈下抑郁会降低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7],反作用于和社会心理功能,影响主观幸福感^[8]。

1.2 阈下抑郁的流行病学

阈下抑郁的流行病学特征在不同研究间呈现显著异质性,其检出率受到评估工具、界定标准及人群特征的共同影响。国际研究显示,阈下抑郁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较高的流行水平。Ruibin Zhang等开展的全球一般人群荟萃分析表明,阈下抑郁的总体检出率为11.02%,其中青年群体检出率最高(14.17%)^[9]。美国国家流行病学研究数据显示,约25%的成年个体存在抑郁症状但未达到DSM-IV重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10]。这一发现得到Cuijpers系统综述的支持,其对瑞士、德国等五国20项研究的汇总结果显示阈下抑郁的全球平均检出率为14%^[11]。值得注意的是,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专项调查揭示了更为严峻的现状:Langer团队使用PHQ-9量表对智利大学生群体的评估显示,阈下抑郁与重性抑郁的检出率分别达到14.3%和32.3%^[12]。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调查数据呈现出更为显著的异质性。李一云团队基于5000人样本的筛查研究显示阈下抑郁检出率为9.2%^[13],而张静等采用CES-D量表(界值20~25分)对高校学生的调查发现阈下抑郁及以上症状者占比达27.4%^[14]。研究工具的差异对结果影响显著:当使用更敏感的CES-D低界值(16~20分)时,李雪团队对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的研究显示相关症状检出率激增增至54%^[15]。类似地,宋旭升团队应用STDS量表在北京医学院校的调查中,阈下抑郁患病率为34.56%^[16]。Bertha的系统综述进一步佐证,这种流行病学特征的异质性在青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可能与心理发展阶段特征及应激暴露水平相关^[17]。

综合国内外研究可见,阈下抑郁的流行病学特征存在显著异质性,其检出率受评估工具、界值标准及人群特征等多重因素影响。研究工具的敏感性差异(如CES-D量表的16分与20分界值可导致检出率相差27个百分点)以及人群的年龄结构特征(青年群体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是造成国内外数据差异的核心因素。这提示在制定预防策略时需充分考虑评估工具的特异性及目标人群特征。

2 心理治疗的概述

2.1 心理治疗的定义

心理治疗是基于心理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由专业人员系统实施的治疗技术,旨在通过建立治疗性关系,引导患者改善心理功能、缓解症状并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其核心是通过语言、行为或非语言互动,帮助患者减轻情绪痛苦、修正适应不良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并促进人格的完善与发展^[18]。

2.2 心理治疗的分类

心理治疗的分类体系具有多维性,主要依据以下标准划分:按理论流派,心理治疗可分为精神分析及心理动力学治疗(聚焦潜意识冲突)、人本主义治疗(强调自我潜能与共情支持)、认知行为治疗(修正负性认知与行为模式)以及系统式治疗(关注家庭或社会系统互动)。治疗形式方面,心理治疗按干预对象可分为个别治疗、夫妻/婚姻治疗、家庭治疗及团体治疗;按技术载体分为言语性治疗(如认知重构)与非言语性治疗(如艺术或沙盘疗法)。干预强度方面,心理治疗可分为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提供情绪疏导)、深层治疗(如创伤修复)及危机干预(急性心理应激处理)。

为便于临床应用与疗效分析,本综述依据循证医学证据等级,将心理治疗划分为一线疗法(实证支持充分,如认知行为疗法)、二线疗法(辅助性或新兴疗法,如人际心理疗法)及其他疗法(如中医心理治疗)^[19]。

3 心理治疗对阈下抑郁的疗效

3.1 一线疗法(强证据支持,推荐首选)

3.1.1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作为循证医学支持下应用最为广泛且成效显著的干预手段,在治疗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方面已得到广泛验证^[20]。其治疗阈下抑郁的核心机制在于结合认知干预与行为策略,通过识别和调整引发阈下抑郁状态的负面思维模式与适应不良行为,帮助患者缓解情绪困扰、改善认知功能并适应生活环境。

认知行为疗法着重通过系统性的训练与指导,修正患者不健康的思维模式,从而改善情绪状态。在干预过程中,治疗师引导患者觉察并纠正认知曲解,帮助患者培养积极、理性的思维方式,同时练习新的应对策略。在这一过程中,持续的支持性引导与反复训练不可或缺,旨在使患者能够逐步重新适应环境,矫正不良的认知与行为模式。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是认知行为疗法中临床常用且效果明确的治疗形式。相较于个体治疗,团体形式不仅能够通过同伴间的经验分享与互动学习,强化认知偏差的纠正效果,而且能培养成员采用更适宜的应对方式来处理问题,以此替代原有的不良认知与行为模式,从根本上消除或减轻患者内心的负性情绪。这种团体治疗形式对于改善轻度抑郁患者症状意义重大。一方面,能显著降低患者表现出的消极情绪,为其恢复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持;另一方面,能切实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增强治疗效果。研究为团体认知行为疗法在临床应用中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支持。例如,有研究表明,将团体认知行为疗法应用于轻度抑郁症患者群体中,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6-7]。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轻度抑郁患者对于日常事件所形成的关于自身的负面自传性记忆,在维持其抑郁症状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些消极记忆往往以自动化方式被提取,进一步强化其自身负面的自我认知,加重抑郁情绪。国内学者相关研究也显示,将团体认知行为疗法用于轻度抑郁患者治疗中,能够有效改变患者的自我图式内容与功能。从神经心理层面分析,这种疗法可能通过改善与前额叶皮质相关的情绪调控环路和认知控制功能,从而优化患者的思维模式,有助于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有效促进患者快速恢复^[21]。

3.1.2 行为激活疗法

行为激活疗法是一种结构化的短期心理治疗方法,其核心机制是通过帮助患者增加生活中的愉悦感与掌控感,强化有意义的适应性行为,最终激活患者心理状态,改善心理健康水平^[22-23]。

该疗法理论的建立基于对抑郁症易感人群的研究。这类群体因长期处于支持性资源匮乏的生活情境中,其认知功能和行为模式逐渐产生适应性变化,最终表现出部分抑郁症状的临床特征。行为激活疗法将所有技术聚焦于一个根本目标——增加行为激活。通过实施该疗法特有的技术,引导患者积极参与那些能带来愉悦感与掌控感的日常活动,这有助于个体在生活中建立正向强化机制,同时有效缓解社交回避等适应不良行为,促进其社会功能的渐进式恢复^[23-24]。行为激活疗法以“减少抑郁患者的惯性行为、回避行为、日常生活的破坏情况以及消极的沉思默想”为导向开展干预。基于行为干预原理,通过系统性的行为激活策略,指导患者规划能够显著提升正向情绪体验和主观控制能力的日常活动(旨在增强适应性行为的奖励效应),并同步干预逃避退缩等负性行为模式(从而削弱抑郁相关行为的负面强化),最终实现情绪状态的临床改善。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患者和治疗师共同制定活动计划,使患者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从而培养其自助能力,引导自身走向正常生活。

行为激活疗法在抑郁症治疗中展现出诸多优势,尤其在治疗阈下抑郁方面效果显著,能有效防止阈下抑郁发展为重度抑郁症。众多研究为其有效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Takagaki^[25]和Mori^[26]团队针对阈下抑郁大学生开展研究,采用行为激活疗法进行干预并评估疗效。结果显示,干预组在进行5周的行为激活疗法干预后,抑郁症状明显改善。而且在1年后对这些大学生进行随访发现,干预组的抑郁量表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这充分说明行为激活疗法干预可有效降低阈下抑郁个体的抑郁水平。覃涛运用该疗法对护理专业阈下抑郁学生进行了为期6周的干预,结果表明干预前后学生抑郁症状显著减轻,行为激活水平明显提高。在干预结束1个月后,干预组学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降低,行为激活水平显著提高^[27-28]。许海莲等学者^[29]对脑卒中后阈下抑郁患者展开研究,探索行为激活疗法对抑郁症状及行为特征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病程在3个月以内的脑卒中后阈下抑郁患者,该疗法对其抑郁症状疗效显著,能提高患者行为激活水平,并降低脑卒中后6个月的抑郁发病率。综上所述,行为激活疗法对阈下抑郁个体具有良好的维持效果。该疗法通过矫正患者的消极回避行为,改变行为抑制系统,使患者不仅能在本次治疗中受益,而且在治疗结束后,仍能长期运用所学行为模式,重新回归正常生活^[30]。

3.2 二线疗法(辅助/特定情境使用)

3.2.1 人际心理疗法

人际心理治疗是由 Klerman 等于 1970 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结构化、限时性的心理干预方法。该疗法起初主要用于门诊重性抑郁症患者的维持治疗,其重点在于处理因犹豫不决、歪曲的认知和社会功能损害而带来的不良人际关系,核心在于改善情绪。

人际心理疗法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改善人际关系来缓解抑郁症状,核心治疗焦点在于直接缓解情绪障碍的临床表现,而非对患者人格特质进行修正。该疗法具有独特的干预路径:区别于传统心理治疗对

抑郁病因的追溯性分析（例如将社会应激事件归因为致病源），人际心理疗法着重培养患者建立情绪反应与人际互动之间的认知联结，借助人际关系网络的适应性调整来实现抑郁症状的缓解^[31]。

在阈下抑郁的干预领域，人际心理疗法凸显出独特的临床价值。尽管阈下抑郁群体尚未达到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但长期的情绪低落和认知偏差会显著增加发展为全面性抑郁障碍的风险。人际心理疗法紧密围绕人际角色冲突、社会支持缺失、哀伤反应及社交隔离这四大核心领域，帮助个体精准识别当前人际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功能性失调进行有效干预。具体而言，人际心理疗法帮助患者增强应对各类人际压力源的技能。例如，在处理人际角色冲突时，引导患者通过沟通技巧的训练和角色期待的重新定义来改善关系；针对社会支持缺失问题，协助患者建立并拓展支持性的人际网络。通过重建和优化社会支持系统，人际心理疗法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反应，还能在阈下抑郁症状尚未恶化为全面性抑郁障碍之前采取积极干预，降低疾病进展风险。

3.2.2 正念认知疗法

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是一种将正念冥想与认知行为疗法有机结合的治疗方式。国内外多项研究^[32-33]证实，正念认知疗法在改善焦虑和抑郁症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34]。

正念认知疗法的心理学作用机制聚焦于帮助人们在面对情绪困扰时，实现从行动模式到思维的存在模式的转换^[35]。当人们在应对某些事情或情感时，常常陷入难以释怀的状态，总是习惯性地追求期望中的事物，同时回避不想要的状况，此时行动模式就容易演变为“被迫行动”^[36]。这种强迫性思维模式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反刍思维和持续性担忧。具体而言，反刍思维倾向会导致个体对普通生活事件进行过度认知加工，使得原本短暂的情绪低落状态被持续强化和扩展，演变为严重的抑郁情绪；将瞬间的担忧情绪不断累积，转化为深度焦虑。与之相对，思维的存在模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应对方式。这种模式能够引导人们从纷繁复杂的头脑思绪中抽离出来，全身心地沉浸于当下的实际体验中，而不是一味地陷入无尽的思考与分析。同时，存在模式倡导人们无条件地接纳自己以及自身的各种体验，不过分纠结于自身的不足和需要改变的地方。此外，在存在模式里，想法被视为心智中的内在事件，而非一定反映客观现实，这就极大地削弱了想法对情绪产生负面牵引的力量，使人们能够充分地、与当下的时刻和自身的体验和谐共处^[37]。

正念认知疗法在阈下抑郁的干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它能够增强个体对内心体验的觉察能力，让个体更为敏锐地感知自身情绪和思维的变化，同时提升对自身各种体验的接受程度，避免因过度抗拒或压抑而导致的情绪累积。另一方面，正念认知疗法引导个体以客观、不评判的态度去观察自己的情绪和思维，从而有效降低过度反应的频率和消极思维的影响，显著减少抑郁症状的复发风险。正念认知疗法还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心理灵活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缓解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促进心理状态的改善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3.2.3 团体心理治疗

团体心理治疗借助教育和团体动力学原理，提升成员对自身状态的觉察能力，实现共同学习、训练与成长。该疗法主要借鉴西方心理治疗理论中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现实疗法、阿德勒疗法等，针对抑郁状态人群开展团体心理干预。

团体心理治疗通过多重机制改善阈下抑郁症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成员在角色扮演中观察并模仿他人的适应性应对策略（如模拟冲突解决），从而促进社交技能泛化；团体动力学则通过营造普遍性感知（如“他人也有相似困扰”）显著降低病耻感，同时借助希望重塑（见证同伴康复）增强治疗信心^[38]。神经影像学进一步揭示，团体互动中的共情反馈可激活前额叶-镜像神经元系统，提升情绪识别与调节能力。

基于理性情绪行为治疗理论，林霞玉^[39]开发了针对认知应对策略的团体干预方案。实施效果评估显示：干预后被试在以下方面呈现显著变化：（1）生活事件应激强度降低；（2）症状自评量表（SCL-90）多项维度得分下降；（3）适应性应对策略使用频率提升；（4）自我评价水平提高。追踪测量发现，这些干预效果在后续3个月内保持稳定（ $p < 0.05$ ），证实团体干预对大学生抑郁倾向的持续改善作用。魏义梅^[40]通过设计与实施基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和认知应对策略训练的团体辅导活动，证实该方式对于缓解和改善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具有显著效果。国际循证研究也支持团体干预的双重效益：既提升亚临床抑郁患者的康复预后，又减少42%的心理治疗需求频次^[41]。在阈下抑郁干预中，团体心理治疗凭借社会支持重建与群体动力激活发挥了独特作用。该疗法以结构化小组形式（通常每组8—12人）开展，综合运用认知行为技术、人际技能训练及情感表达模块。在团体活动中，参与者通过角色扮演、共情反馈和集体问题解决等机制，打破因抑郁症状导致的社交退缩循环。相关研究显示，阈下抑郁个体在团体治疗过

程中,通过观察他人的应对策略,并获得同伴的情感共鸣,能够显著降低病耻感,同时增强自我效能感,进而更积极地应对抑郁情绪,改善自身心理状态。

3.3 其他疗法(探索性/文化适应疗法)

除上述常见心理治疗方法外,家庭治疗、中医心理干预等也在阈下抑郁治疗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

家庭系统干预是一种以整个家庭单元为治疗对象的心理治疗模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家庭系统恢复正常功能状态,消除不良互动模式。与传统个体心理治疗聚焦于成员内在心理状态不同,这种治疗方法特别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它基于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个体的行为问题实质上是家庭系统功能失调的外在表现,因此强调必须通过改善家庭整体结构和互动模式来解决个人心理问题。研究表明,家庭治疗对轻性抑郁障碍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然而,国外一项大样本研究^[42]对青少年抑郁症进行的为期12-16周的不同治疗方法对比发现,个别认知行为治疗组得分降低率显著高于系统家庭治疗组和支持性心理治疗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治疗方法在针对青少年抑郁治疗中的效果差异。

与此同时,中医学“治未病”的思想突出对疾病早期发现与预防的重视。鉴于阈下抑郁若未得到及时干预,可能进一步发展为临床抑郁症,因此针对处于这一疾病萌芽阶段的阈下抑郁群体开展及时且有效的心理干预显得尤为关键。除了传统的针灸、中药治疗手段,传统医学在阈下抑郁的心理干预方面展现出独特的治疗价值,其治疗体系包含若干特色疗法:中医认知行为调节、五行情绪相克疗法、祝由心理疏导、五音调神疗法以及中医特色团体心理治疗等。

五行情绪相克疗法作为传统医学心理干预的重要分支^[43],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黄帝内经》中关于“五气郁结”的论述,确立了“木郁宜疏、火郁宜发、土郁宜夺、金郁宣泄、水郁宜折”的治疗法则。元代医家朱丹溪对此理论进行了深化发展,系统阐述了“以情胜情”的治疗原理,例如“怒则气逆,以悲制之;喜则气缓,以恐制之”等情绪调节法则,为情志病症的干预提供了系统的治疗思路。根据抑郁的不同证型表现,该疗法采用差异化的情志调节策略:对于表现为悲忧、思虑过度或恐惧不安的抑郁倾向患者,可相应采用“喜乐制悲忧”、“愤怒克思虑”等针对性干预方案^[44]。

综上所述,在抑郁障碍的干预体系中,不同治疗范式各具特色:系统式家庭治疗通过重构家庭互动模式和调整系统功能,为抑郁问题提供了关系维度的解决路径;而传统医学心理干预则基于“形神一体”的整体观和“以情胜情”的治疗理念,为阈下抑郁的调治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干预策略。多样化的心理治疗方法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阈下抑郁的干预策略,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有助于提升阈下抑郁的干预效果。

4 结语

当前研究表明,心理治疗作为阈下抑郁的重要干预手段,通过多样化机制呈现显著疗效。一线疗法中,认知行为疗法通过修正负性认知与行为模式,在团体干预中强化社会学习效应;行为激活疗法以重建积极行为循环为核心,短期症状改善与长期复发预防(如1年随访疗效维持)均获实证支持。二线疗法中,人际心理疗法通过优化社会支持系统缓解情绪反应;正念认知疗法以非评判性觉察阻断反刍思维与情绪恶化,对高认知易感性群体具特异性优势;团体心理治疗依托群体动力降低病耻感并增强自我效能。中医情志相胜疗法则为本土化干预提供文化适配路径。不同疗法存在人群适配特征:行为激活疗法更适用于行为抑制型个体,正念认知疗法对高反刍思维群体效果显著,认知行为疗法则广泛覆盖认知偏差主导型症状谱。

现有研究仍存局限:其一,长期疗效证据(>2年)不足,跨文化成本效益需进一步验证;其二,干预方案标准化程度低,对照组设计差异影响疗效归因;其三,疗效的神经机制(如前额叶-边缘环路可塑性)与数字化技术整合亟待探索。未来需多层面突破:理论层面,结合多模态标记物(如默认网络动态变化)解析治疗靶点;方法层面,构建阶梯式干预模型并开展机制导向亚组分析;应用层面,开发“症状-机制-疗法”精准匹配的数字化平台。阈下抑郁的心理干预既是抑郁障碍二级预防的关键环节,亦是实现“心理健康关口前移”的实践路径,其临床转化价值需通过跨学科创新进一步释放。

参考文献:

- [1]Balázs J, Miklósi M, Keresztény Á, et al. Adolescent subthreshold-depression and anxiety: Psychopathology,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increased suicide risk[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3, 54(6): 670-677.
- [2]Cuijpers P, Smit F, Van Straten A.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 of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J].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07, 115(6): 434-441.

- [3]张颖,刘婧,付格西.中医团体心理辅导下医学生阈下抑郁状态的干预方案设计[J].黑龙江科学,2024,15(03):111-113.
- [4]Noyes B K, Munoz D P, Khalid-Khan S, et al. Is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clinically relevant?[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2, 309: 123-130.
- [5]Liao Y, Zhang H, Guo L, et al. Impact of cognitive-affective and somatic symptoms in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transition in adults: Evidence from Depression Cohort in China (DCC)[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2, 315: 274-281.
- [6]Cuijpers P, Smit F.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as a risk indicator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ospective studies[J].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04, 109(5): 325-331.
- [7]Goldney R D, Fisher L J, Dal Grande E, et al. Subsyndromal depression: prevalence, use of health service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n Australian population[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04, 39: 293-298.
- [8]Ying Y, Ji Y, Kong F, et al. Efficacy of an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adul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23, 53(9): 3932-3942.
- [9]Zhang R, Peng X, Song X, et al.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of developing major depression among individuals with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23, 53(8): 3611-3620.
- [10]宋旭升.大学生成人依恋、自尊与阈下抑郁状态的关系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
- [11]Cuijpers P, Smit F.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as a risk indicator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ospective studies[J].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04, 109(5): 325-331.
- [12]Langer Á I, Crockett M A, Bravo-Contreras M, et al.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threshold and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in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2, 10: 893483.
- [13]李一云,樊洁,史永成等.抑郁的亚综合征(SSD)两年后随访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04):275-276+320.
- [14]张静.不同抑郁状况下大学生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比较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 64-69.
- [15]李雪,于林露,高佳楠等.中医药高校学生抑郁症状的流行病学调查 [J]. 中国医药导报, 2017, 14 (08): 49-52.
- [16]宋旭升.大学生成人依恋、自尊与阈下抑郁状态的关系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
- [17]Bertha E A, Balázs J.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 systematic review[J].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13, 22: 589-603.
- [18]Norcross JC, Wampold BE. Evidence-based therapy relationships: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clinical practices. Psychotherapy (Chic). 2011 Mar;48(1):98-102.
- [19]A guide to treatments that work[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0]刘哲宁,姚树桥.认知行为治疗[J].中国临床康复,2002,(21):3159-3160.
- [21]马彩娥.团体认知行为疗法在轻度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及疗效评估[J].中国康复,2019,34(07):360-363.
- [22]张洪昌,葛茂宏.行为激活疗法的研究进展[J].精神医学杂志,2022,35(1):109-112.
- [23]李英仁,刘惠军,杨青.行为激活疗法:一种简易而经济的抑郁症干预措施[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04):854-858+853.
- [24]代硕,况利.抑郁症治疗与行为激活疗法研究进展[J].现代医药卫生,2019,35(09):1362-1364.
- [25]Takagaki K, Okamoto Y, Jinnin R, et al. Enduring effects of a 5-week behavioral activation program for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among late adolescents: an explorator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 2018: 2633-2641.
- [26]Mori A, Okamoto Y, Okada G, et al. Behavioral activation can normalize neural hypoactivation in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during a monetary incentive delay task[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6, 189: 254-262.
- [27]覃涛.行为激活疗法对护理专业学生阈下抑郁的应用效果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22.
- [28]覃涛,钟清玲.行为激活疗法对阈下抑郁学生情绪和行为特征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22,43(02):221-224.DOI:10.16835/j.cnki.1000-9817.2022.02.014.
- [29]许海莲,吕雨梅,何宇迪,等.脑卒中后阈下抑郁患者行为激活疗法干预方案的设计与验证:预试验[J].中国全科医学,2019,22(14):1672-1677.
- [30]陈凌婧.大学生阈下抑郁的行为激活疗法干预研究[J].心理月刊,2023,18(08):222-224.DOI:10.19738/j.cnki.psy.2023.08.069.
- [31]李扬,李莉,谭曦,等.阈下抑郁的临床干预方法研究[J].中医学报,2014,29(06):884-886.
- [32]李媛媛,王策,丁晓超,等.正念认知疗法联合度洛西汀治疗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焦虑症状的随机对照试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3,37(07):558-563.
- [33]Chayadi E, Baes N, Kiropoulos L. 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on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cancer-related fatigue in oncology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PloS One, 2022, 17(7): e0269519.

- [34]祁继鹏,平丽慧,王进进,等.正念认知疗法在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25,31(01):55-58+112.
- [35]Boyd J E, Lanius R A, McKinnon M C. Mindfulness-based treatment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review of the treatment literature and neurobiological evidence[J].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 2018, 43(1): 7-25.
- [36]Creswell JD.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7. 68: 491-516.
- [37]Wielgosz J, Goldberg S B, Kral T R A, et al. Mindfulness medit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9, 15(1): 285-316.
- [38]Tavares L R, Barbosa M R. Efficacy of group psychotherapy for geriatric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J].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2018, 78: 71-80.
- [39]林霞玉.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抑郁倾向干预效应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0:50.
- [40]魏义梅.大学生抑郁的心理社会机制及认知应对干预[D].长春: 吉林大学,2007:50.
- [41]Wells K, Sherbourne C, Duan N, et al.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depression in primary care: do patients with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benefit in the long run?[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5, 162(6): 1149-1157.
- [42]Harrington R, Whittaker J, Shoebridge P,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efficacy of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ie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disorder[J]. BMJ, 1998, 316(7144): 1559-1563.
- [43]谭曦.大学生抑郁倾向的特点及中医心理干预[J].吉林中医药,2010,30(9):741-744.

The Efficacy of Psychotherapy in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A Literature Review

Wen-li Yu¹, Lu-tong Pan², Qi-yu Li³, Pu Ge⁴, Lv Yang¹

¹ Jilin Sport University, Changchun, China

²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³ 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ies,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China

⁴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Abstract: Depression is the most disabling mental illness worldwide, and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i.e. the prodromal stage, can trigger significant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risk of progression. Psychotherapy is a core strategy for the management of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due to its non-invasive and anti-relapse advantages. The availabl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has been shown to modify negative cognitive patterns and strengthen social learning effects in combination with group interventions; behavioral activation therapy (BAT) focuses on re-establishing positive behavioral cycles, combining short-term remission and long-term prevention.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specifically blocks rumination in groups of highly cognitively vulnerable individuals;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IPT) regulates mood by improving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and group therapy (GAT) utilizes group dynamics to reduce the sense of stigmatiz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ffective therapy provides a pathway for culturally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However, the extant literature is not without its limitations, including a paucity of evidence regarding long-term efficacy, a lack of standardisation of protocols, and an absence of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these interventions. In the future, there is a need to integrate multimodal biomarkers to analyse therapeutic targets, construct a stepwise intervention model, and develop a digital precis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tform.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bthreshol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depression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the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mental health. This is of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value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Keywords: Psychotherapy;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Behavioral Activation Therap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88

列宁《怎么办？》中党的理论建设的现实意义

吴佩瑶¹

(¹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要: 列宁在《怎么办？》中对经济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论述了革命理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意义, 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怎么办？》不仅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而且对于我国新时代党的理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怎么办？》; 无产阶级政党; 理论建设

理论应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改变, 当今正处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列宁理论之精华也应将其赋予时代新意义, 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理论、实践、现实价值。从理论价值看, 列宁在《怎么办？》中有关理论建设的思想对在党的建设中加强思想、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突出了革命理论的指导地位,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 在具体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实践价值看, 列宁在其思想理论上提出了很多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方法原则, 在对经济主义做了彻底清算后, 结束了党内思想混乱的局面, 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从现实价值看, 一个政党只有理论基础雄厚有力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稳步发展, 而理论建设容易受到忽视, 因此更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建设, 在列宁的思想理论上要矢志不渝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加强党的理论建设, 充分发扬斗争精神, 积极开展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 建设高质量干部队伍,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把党建设的更坚强有力。

一、列宁《怎么办？》写作的历史背景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与经济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由于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和“经济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误解, 列宁指出有必要对党内思想混乱和组织动摇的现象进行一次坚决的思想清洗, 指出“必须做一次尝试, 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 用大量具体的例证, 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 向所有的‘经济派’做系统的‘说明’”^[1], 这样才能推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针对党内出现的思想混乱, 理论水平下降的现象, 列宁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象‘批判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 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2]“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都谈不拢?”^[3]列宁指出, 党内“批判派”其实就是机会主义者的伪装, “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 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 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自由”^[4]列宁看到了这种“批判自由”的折中态度、无原则性和虚伪性, 以及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披着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外衣实则是倒向机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受到了曲解和倒退, 列宁指出必须要坚决地同“批判自由”这种思想做斗争, “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 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5]列宁清醒的认识到, 党内的经济派实则就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 经济派利用党内思想混乱, 利用《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等杂志报刊宣传其观点, 主张“批评自由”, 盲目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 虽然使工人运动在自发的催化下有壮大作用“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的发展, 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6]以经济斗争用来对抗政治斗争, 严重阻碍了党的政治斗争和革命理论建设发展, 只有党内的思想得到肃清, 革命运动才能向前发展, 才能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列宁在1902年2月完成《怎么办？》奠定了新型无产阶级党的思想基础, 指出了革命理论对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 是列宁建党思想产生的标志。

二、《怎么办？》中党的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作者简介: 吴佩瑶 (1997-),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历史。

列宁指出经济派否定革命理论作用、盲目崇拜自发性行为这实质上就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机会主义者在其政治思想、行动策略等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确引领，否定了理论的重要作用，列宁在此也深刻的指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7]其原因是经济派等机会主义者以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忽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导致当时俄国一些革命理论素养差的人忽视了运动的实际意义和原则。列宁在此深刻论述了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

（一）革命理论是革命运动的先决条件

列宁敏锐的看出机会主义者正是虚伪的利用“批评自由”的旗号忽视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只有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人运动，工人运动才会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工人阶级只有运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无产阶级政党在形成初期，道路问题和党内思想纷争问题是影响无产阶级政党未来前途的方向性问题，只有坚持科学的革命理论才能走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革命理论是革命运动的深厚基础

列宁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运动”^[9]且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处于萌芽期，需在发展的过程中借鉴别国的经验，但盲目的顺从和照搬照抄只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僵化，列宁认为要以批评的态度对他国的经验进行实践检验以适应本国的实际情况，这需要强大的理论和实际经验支撑，因此革命理论是绝不可以忽视，只有革命理论基础深厚才能在面对本国复杂的环境和困难下结合具体实践，走好自己发展道路。

（三）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体现

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推翻的是压在人民身上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座大山，“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10]革命理论的先进性是一个政党先进性的体现，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工人运动不能以自发性代替自觉性，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无产阶级要不断提升自身觉悟性，提高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列宁深刻指出“只有以先进性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1]，一个政党的理论基础决定政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深厚，政党才能统一，党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先进性，带领人民展开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运动。

（四）理论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斗争

列宁在此引用了恩格斯关于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观点，“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12]并举例德国工人相较欧洲其他国家工人的优越处就在于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成熟的他国经验。通过这两个观点可以得知理论斗争和政治、经济斗争一样重要，但理论斗争往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开展工人运动，只有进行坚决地理论斗争，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推动无产阶级走向伟大胜利。

三、理论强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理论的重要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列宁在《怎么办？》也深刻阐述了革命理论对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14]可见，要想使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就必须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增强理论自信、推进理论创新、强化理论武装。

（一）理论自信是理论强党的基础

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5]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同不同时期的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开始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其经验教训就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才能前进发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创造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其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党和人民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中华民族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6]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断丰富其理论和

实践经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来源,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优势和理论优势。

树立理论自信最关键的就是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党领导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工作”^[17]。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工作当中的指导地位,坚决同抹黑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切思想理论做斗争,不断深入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新变化,以科学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要求,正确认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发展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下党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坚定不移地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才能牢牢巩固全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 理论创新是理论强党的内核

列宁在《怎么办》中深刻指出:“只有以先进性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真理性和科学性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不断丰富完善,其内在原因就是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理论创新要立足以下几点:

一是立足实践,实事求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只有立足实践,才能紧跟时代变化,能及时回应和解决重大问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在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挑战面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对困难难题和风险挑战,形成解决问题的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理论内涵、积累理论经验、拓展理论视野,推进理论创新。

二是立足时代,矛盾变化是理论创新的前进动力。时代是思想之母,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理论。纵观历史,不同时期社会矛盾变化推动着理论的变化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上取得了巨大发展成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然不适应新的发展状况,因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现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才能科学、正确的制定发展计划,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两个时代大势中应运而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的科学理论。

三是立足人民,人民至上是贯穿理论创新的红线。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发展的目标,为中华民族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与使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8]在党的理论创新历史中,人民性是贯穿理论创新的一根红线,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邓小平也强调“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20]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正是因为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性融入党的理论创新当中,党才能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 理论武装是理论强党的关键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理论学习对于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灌输理论最早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马克思指出,“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21]恩格斯认为对于灌输必须给予正确理论的灌输,而不能盲目的灌输,要将灌输和实践经验相结合。考茨基也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当中去。”列宁通过对经济派自发论的批判,科学化、系统化的诠释了灌输理论。列宁深刻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22]可见由于工人自身的局限性,在其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不能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就要发挥先锋队作用,把科学社会主义通过灌输使工人阶级接受科学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并转化为思想武器,推动自发性工人运动转变为自觉性的革命运动。

由此可见,“作为政治生活的灵魂,党内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党的兴衰成败”^[23]。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是理论武装的理论基础,理论如果束之高阁那么就是僵化的理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只有将先进科学的理论为党员和人民所掌握,才能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首先要加强全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教育,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阵地意识落到实处。要坚定政治理想信念,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做到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其次要抓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能力强、责任大、影响广,是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对标杆,因此更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以关键少数带动全

党上下理论武装发展,领导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深刻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要做到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真正地做到扎根人民,服务群众。最后,国民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要,“列宁一方面从扫盲视角阐释了教育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就推进教育事业发展,提出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和加大教育投入等措施”^[24],要让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人民群众通过学习真正地了解新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在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武装头脑,在实际生活中充分应用,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推动马克思主义更好的掌握群众,把理论力量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力量。

参考文献:

- [1]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 [2]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 [3]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 [4]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
- [5]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8.
- [6]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
- [7]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2.
- [8]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
- [9]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
- [10]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
- [11]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
- [12]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 [14]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 [1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 [1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社,2017.
- [17] 冯兵.列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OL].思想战线,2025-04-20.
-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社,2017.
-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 [20]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7.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22]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页.
- [23] 史为磊,高嘉晨.列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03):111-118.
- [24] 陈依.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当代启示[N].河南经济报,2025-03-20(009).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arty'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Lenin's "What Is To Be Done?"

Wu Peiyao¹

¹ Baotou Iron & Steel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Baotou, China

Abstract: In *What Is To Be Done?*, Lenin thoroughly criticized economism and expounded on the crucial significance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for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lay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a new type of proletarian party. *What Is To Be Done?* not only provided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 at the time but also holds profou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in China's new era.

Keywords: *What Is To Be Done?*; Proletarian party;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90

DeepSeek 大语言模型在高校落地的伦理风险治理与多维应用价值评估研究

尹立君¹ 宋海军¹ 史雪魁¹ 陈婧¹

(¹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河北 邢台 054035)

摘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大语言模型在高校教学、科研与管理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作为国产大模型代表, DeepSeek 在落地高校过程中展现出良好的技术适配性与场景应用潜力, 但同时也伴随着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内容偏见与学术诚信等伦理风险。本文通过系统分析 DeepSeek 的技术架构与高校部署现状, 构建了以技术防护、制度规范与智能监测为核心的伦理风险治理机制, 有效应对多重风险挑战。同时, 构建以教学成效、学生参与和教学创新为核心的多维教学评价模型, 并提出科研创新效能评估体系, 涵盖成果产出、协作效率与创新启发等关键指标。研究成果可为高校在人工智能技术部署、使用与管理中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推动大语言模型技术在高校实现规范、安全与可持续应用。

关键词: DeepSeek; 伦理治理; 教学评估; 科研效能评估

一、引言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 以大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教育领域掀起了系统性变革浪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在《人工智能与教育: 政策制定者指南》中明确指出,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 通过自适应学习系统、智能辅导工具和知识图谱的深度重构, 正推动着教育范式从“标准化”向“个性化”快速跃迁, 重塑“教”与“学”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模式^[1]。当前, 以 ChatGPT、Gemini 为代表的国际主流大模型已广泛应用于课程设计、作业批改、学习诊断及科研协作等多重教育场景, 显著提升了教育效率与教学效果。

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明确提出“推动智能教育发展, 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2]; 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进一步强调,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教育教学新模式”, 以促进高校教育实践与技术革新的深度融合^[3]。

DeepSeek 作为国产自研大语言模型的典型代表, 凭借“多模态理解—知识推理—情境化交互”三位一体的创新技术架构, 在高校应用场景中展示出强大的场景适配性与实践价值。教学领域方面, DeepSeek 支持智能备课系统快速生成个性化教案, 能够大幅降低教师在教学准备环节的重复性劳动; DeepSeek 在科研领域通过智能化的文献综述和实验设计建议, 可以有效加快科研周期与成果产出; 在管理领域, DeepSeek 使用 NLP 技术优化行政流程、增强高校内部跨部门沟通与协作效率。已成为推动高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工具之一。

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作者简介: 尹立君(1980—),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

史雪魁(1981—),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应用、网络技术。

陈婧(1978—),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室管理。

通讯作者: 宋海军(1976—), 男,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软件开发;

2.1 研究问题

据统计 2025 年以来已有 50 多所高校进行了 DeepSeek 本地化部署应用,但随之产生的伦理风险逐渐显现,成为高校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如何准确识别、监控并有效处理 DeepSeek 在教学、科研及管理实践中可能涉及的数据隐私泄露、内容偏见、算法歧视以及价值导向偏差等伦理风险;另一方面,如何构建科学、系统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大语言模型多维度价值评估框架,以全面衡量其在提升教育质量和推动科研创新的实际成效与潜在影响。

2.2 实践意义

本研究具有显著的现实指导价值。围绕高校在部署 DeepSeek 过程中所面临的伦理治理挑战,将提出一套可行的风险识别与应对机制,为高校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包括:协助高校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保护体系,降低信息泄露与隐私侵犯的风险;推动在模型训练与应用过程中引入价值导向审查与偏见识别机制,以减少算法不公所导致的教育不均问题;并进一步为构建高校层面的伦理监督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与实施建议,助力大语言模型的规范、安全、可持续应用。

另一方面,本文拟构建的“DeepSeek 高校应用多维价值评估模型”,将为高校在模型部署与优化过程中提供量化、系统化的评估工具。模型不仅识别影响模型应用效果的关键因子,实现教学与科研场景的精准匹配与持续改进;为高校管理者在模型选型、资源配置及应用策略制定等方面,提供数据驱动的决策依据,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确保 DeepSeek 技术真正服务于高校教育质量提升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DeepSeek 在高校落地部署的现状与挑战

2.1 技术架构与实施难点分析

2.1.1 DeepSeek 技术结构解析

DeepSeek 基于 Transformer 深度神经网络结构,结合大规模参数训练与自监督学习方法,具备出色的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模型架构采用了改进型混合专家机制 (Mixture of Experts, MoE),通过动态路由策略对计算资源进行智能调度,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显著降低了计算消耗,特别适用于资源受限的高校场景。与传统 Transformer 架构相比,DeepSeek 引入稀疏激活机制,使得模型在推理过程中仅需激活约 20% 的参数节点,从而有效控制计算资源消耗并提升处理效率。在专业语言理解方面,模型在学术文本分析任务中能够精准区分高频术语之间的语义边界,例如在医学领域准确识别“细胞凋亡”与“细胞坏死”等术语差异。同时,结合 Prompt 预训练策略与指令微调 (Instruction Tuning) 机制,DeepSeek 在多任务处理与跨学科知识迁移方面展现出优异的泛化能力,为高校提供了智能化、个性化的语言理解与交互支持。

算法原理层面,DeepSeek 通过海量文本语料进行自监督学习,综合采用掩码语言建模 (Masked Language Modeling, MLM) 和因果语言建模 (Causal Language Modeling, CLM) 方法,协同实现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的双重目标。同时,DeepSeek 引入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方法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通过人类偏好反馈不断优化模型表现,使其在复杂指令理解、人机交互等任务中展现更优异的性能。

数据处理策略层面,DeepSeek 具有高效的数据预处理和并行计算方案,支持超大规模语料库的并行训练和分布式学习,能够快速响应高校多元化、实时化的应用需求。此外,DeepSeek 还强化了少样本学习 (Few-shot Learning) 和零样本学习 (Zero-shot Learning) 机制,帮助模型快速泛化到各类教育教学和科研任务中,可以有效降低高校部署应用过程中的训练与调优成本。

2.1.2 与高校现有技术系统的兼容性挑战

尽管 DeepSeek 在技术层面具有显著的先进性与灵活性,但在实际部署到高校现有技术生态中时,也面临诸多兼容性挑战。一是高校现有教务系统普遍使用基于关系型数据库 (如 Oracle、MySQL) 的数据管理模式,而 DeepSeek 则依赖于图数据库 (如 Neo4j) 实现知识关联与推理,两类数据库在数据模式转换过程中容易产生结构化数据损失,影响知识图谱的完整性;二是高校计算资源主要基于传统 CPU 集群架构,而 DeepSeek 所需的 GPU 或 TPU 异构计算资源在配置上存在明显冲突,增加了运行成本与能耗;最后,高校主流教学管理软件 (如 Blackboard、Moodle) 所采用的 RESTful 接口与 DeepSeek 基于 gRPC 的接口协议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导致系统集成困难,降低了模型应用的实时响应速度与用户体验。

2.2 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难点应对策略

针对上述兼容性挑战,在实施 DeepSeek 过程中,高校可采取以下应对策略:一是构建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平台,通过制定数据交互规范和部署基于中间件的数据转换引擎(如 Apache NiFi),实现多源数据的实时高效转换,降低异构数据之间的结构化损失,有效解决数据孤岛问题。二是采用分层架构与容器化部署技术,以微服务架构与容器技术(如 Kubernetes)实现 DeepSeek 服务与现有高校系统的融合,既确保新旧系统的并行运行稳定性,又高效实现 CPU 和 GPU 等异构算力资源的动态调度与优化。三是建立严格的数据治理与安全合规机制,通过明确数据访问权限、强化数据加密与脱敏措施以及建立数据访问审计体系,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合规,降低伦理风险。

三、伦理风险治理机制构建

3.1 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治理机制

3.1.1 数据安全的技术保障路径

为有效规避 DeepSeek 在部署与应用过程中面临的数据安全隐患,尤其是数据泄露、恶意篡改及非授权访问等风险,高校构建多维度的技术保障体系,综合运用数据脱敏、访问控制与加密保护等手段,全面提升数据安全防护水平。

数据脱敏技术作为保护敏感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模糊化、匿名化、混淆化及泛化处理等方式,有效阻断对师生个人敏感信息的直接识别与非法利用。以清华大学智慧校园系统为例,广泛部署的数据脱敏机制在防范师生信息泄露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其它高校数据治理提供了可借鉴范式。

在权限管理方面,遵循“最小权限”原则,构建严密的访问控制策略,确保数据访问权责清晰、机制完备。基于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或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等技术方法,实现对数据访问行为的精准管控与实时追踪。

此外,在数据存储与传输环节,高校需采取强加密策略保障数据链路安全。通过部署对称加密算法(如 AES)与安全传输协议(如 TLS、SSL),可有效抵御数据在传输与存储过程中的篡改与窃取风险,确保数据完整性与保密性。

3.1.2 隐私保护制度的构建与规范

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是实现高校师生数据隐私保护的关键所在。高校在应用 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晰个人数据在采集、存储、处理、使用、共享及删除等生命周期环节的具体操作规范,构建覆盖全过程的隐私治理框架。明确各方责任主体,建立数据隐私责任人制度,厘清模型提供方、高校信息化部门与具体使用者在数据治理中的职责边界。同时,推动形成“动态透明”式告知机制,通过公开数据用途、使用范围、技术方式及潜在风险,确保师生在充分知情基础上参与数据授权与交互。

3.2 学术诚信和内容真实性风险防范体系

3.2.1 学术诚信智能监测机制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全国科技大会等场合明确提出要加强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高校师生在使用 DeepSeek 过程中可能引发学术不端行为,如抄袭、代写、剽窃等现象,亟需构建以技术为核心支撑的学术诚信监测体系。引入文本相似度检测、引文网络分析与作者风格识别等智能化工具,对师生提交的学术作品与现有文献资源进行多维比对与动态监控,实现学术不端行为的实时预警与风险管控。例如,华北电力大学、湖北大学及福州大学等高校已先行部署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识别机制的学术检测系统,使用 AI 辅助相似度分析与语体风格比对,降低了学术成果造假、剽窃现象的发生率。

3.2.2 学术规范治理与违规行为处置

3.2.2 智能生成内容的质量控制与学术治理体系融合架构

为应对大语言模型在高等教育应用中引发的学术风险,需建立贯穿内容生成全周期的“质量管控-规范治理”协同机制。在质量管控维度,实施三级递进式审核体系:基础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筛查逻辑冲突与事实性错误,中间层依托跨学科专家团队优化内容结构与学术表达,终审层对接权威知识库实现多源交叉核验,从而系统性保障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与规范性。同步构建智能学术治理框架,将传统学术伦理准则迭

代为涵盖 AI 创作特征的《生成式内容应用规范》，如《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使用 AI 工具的规定（试行）》，明确界定 AI 辅助抄袭、虚构数据等新型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同时建立“智能监测 - 人工核查 - 分级惩戒”的处置链条，实现违规行为可追溯、可定责。多所高校已将学术诚信专题纳入新生入学教育、研究生开题培训及教师继续教育课程，有效提升了全校范围内的学术自律水平与制度执行力。

四、DeepSeek 高校应用的多维价值评估模型构建

4.1 教学质量提升的评价模型设计

4.1.1 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

构建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时，综合借鉴了 Kirkpatrick 四层次评估模型、Community of Inquiry (CoI) 框架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最新应用成果，从多维度全面评估 DeepSeek 在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效能^[4]。最终形成的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涵盖教学成效、学生参与度与教学方法创新三大维度。

在“教学成效”维度，核心评价内容包括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技能水平的提升幅度以及课程教学目标的完成程度。“学生参与度”指标聚焦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活跃程度与主动性表现，主要通过课堂互动频率、学习动机强度以及自主探究行为等要素进行度量。“教学方法创新”评估 DeepSeek 技术在推动教学模式改革中的具体作用，涉及教学手段优化、教学工具革新以及教师教育理念更新等方面。

表 1 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	二级指标	权重 (%)
教学效果	50	学生成绩提升情况	25
		学生知识掌握程度	15
		教学目标达成率	10
学生参与度	30	学生课堂互动情况	15
		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15
教学方法创新	20	教学手段创新性	10
		教学模式优化情况	10

4.1.2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

为了保证评估体系中各项指标权重的分配科学、客观且具可操作性，研究结合了德尔菲法 (Delphi Method) 和层次分析法 (AHP) 来确定指标权重^[5]。

第一步，邀请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学专家及高校一线教师开展多轮德尔菲法咨询，通过专家意见汇总与匿名反馈，初步确定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第二步，基于德尔菲法所得结果，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并运用 AHP 方法构建判断矩阵，执行一致性检验，从而完成对各项指标权重的量化计算。

具体显示结果：“教学成效”维度权重最高，占比 50%，强调教学产出的核心地位，契合余“以学习成效为导向”的教育技术应用原则^[6]；“学生参与度”权重为 30%，强调教学过程中的动态反馈与学习过程质量，与 Fredricks 所提出的行为、情感与认知三维度参与理论相契合^[7]；“教学方法创新”则占据 20% 的权重，用以衡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教学方式变革的深度与广度，符合《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关于“技术引领教学创新”的战略要求。

4.1.3 评价模型构建与应用

基于上述评价指标与权重，研究构建了 DeepSeek 教学质量提升的综合评价模型。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通过权重计算得到最终的综合评分，以评估 DeepSeek 技术在教学实践中的实际表现。综合评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数学表达式为： $Q=0.5E+0.3P+0.2I$

其中，Q 为教学质量指数，E、P、I 分别为教学效果、学生参与度、教学方法创新的标准化得分 (0-100 分)

在模型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具体通过课堂观察记录、问卷调查、成绩分析、访谈反馈等多种途径，对每个评价指标逐一进行详细评分，再依据上述公式进行权重计算，最终获得代表 DeepSeek 技术综合教学质

量提升效果的总评分。

4.2 科研创新支持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4.2.1 指标体系框架构建

科研创新支持效能评估指标体系需综合考虑 DeepSeek 在促进科研成果产出、提升科研合作效率、启发科研思维等方面的作用。包括科研成果数量与质量（如论文发表数量及引用率、项目申请成功率）、科研合作频率及效率、跨学科合作情况以及科研人员对新方法、新思路的接受与应用程度。基于科技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协同理论^[8]，结合生成式 AI 的科研赋能特性，构建科研创新支持效能评估指标体系（见表 2）。

表 2 科研创新支持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数据来源	测量工具
科研成果产出（40%）	学术论文质量	15%	WoS/Scopus 数据库	影响因子加权算法
	专利转化效率	10%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数据	收益-成本比模型
	科研项目层级	15%	科研管理系统	NSFC 项目分级标准
科研合作效率（35%）	跨学科合作指数	12%	合作网络图谱	模块化指数（Q 值）计算
	国际合作频次	10%	国际合作项目清单	频次-影响力复合指标
	人机协作深度	13%	系统操作日志	行为序列挖掘技术
	创新路径突破性	10%	技术预见报告	颠覆性创新指数（TDI）
科研思维启发（25%）	研究范式转型度	8%	Altmetrics 数据	社交媒体传播力分析
	科研人员认知跃迁	7%	认知行为实验数据	脑电信号复杂度分析

4.2.2 指标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应结合多种手段确保数据可靠性与有效性，可采用“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混合研究方法”。具体包括文献计量分析（如通过 Web of Science、CNKI 等数据库进行科研成果文献分析）、科研人员问卷调查（评估科研人员的主观感受及满意度）、科研项目跟踪（动态监测项目进展、合作交流和技术应用情况）。

4.2.3 评估结果应用与反馈

科研创新支持效能评估结果积极应用于科研管理决策和科研人员激励机制之中。通过评估结果，更准确地识别 DeepSeek 在科研领域的应用优势与不足，制定更加精准的激励政策和资源配置方案，建立“评估-决策-优化”闭环管理系统，将效能评估深度嵌入科研管理全流程。另外，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根据评估反馈结果，调整优化 DeepSeek 技术在科研实践中的应用策略，推动高校科研能力持续提升。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 DeepSeek 大语言模型在高校落地应用过程中的伦理风险治理与多维应用价值评估，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并形成了若干创新性成果：DeepSeek 作为新一代国产大语言模型，凭借多模态理解、知识推理和情境化交互三大核心优势，具备显著的技术先进性与高校应用适配性，其在教学、科研与管理等场景中展现出高效能与强泛化能力。针对高校在部署过程中面临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与学术诚信风险，本文构建了涵盖数据脱敏、权限控制与加密保护在内的技术体系，同时辅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指引下的隐私治理制度与学术规范监测机制，实现了从技术到制度的综合治理路径。本研究系统性构建了高校教学质量提升评价模型与科研创新支持效能评估框架，前者基于 Kirkpatrick 模型与 CoI 理论，融合教学成效、学生参与度与教学方法创新三大维度，后者围绕科研产出、合作效率与创新思维三要素。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填补了国内在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价值评估领域的研究空白；在实践层面，为高校部署与管理大语言模型技术提供了可操作、可推广的模型与策略，具有广泛的现实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 UNESCO. AI and Education: Guidance for Policy-makers[R].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21.
- [2] 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Z]. 国发〔2017〕35号, 2017.
- [3] 教育部.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Z]. 教技〔2018〕5号, 2018.
- [4] Lee J, Toutanova K. Pre-training of deep bidirectional transformers for language understanding[J]. arXiv preprint arXiv:1810.04805, 2018, 3(8).
- [3] 张小艳, 段正宇. 基于句级别 GAN 的跨语言零资源命名实体识别模型[J]. 计算机应用, 2023, 43(08): 2406-2411.
- [4] 龚苏宁, 陈荣华, 吴耀华. 基于 Kirkpatrick 模型的高校艺术设计专业 SPOC 混合式教学效果评估模型构建研究[J]. 美与时代 (上旬刊), 2022(12): 142-147.
- [5] 傅盈盈.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1(07): 14-19.
- [6] 曹建磊, 黄迎辉, 吕部. 基于学习成效的地方应用型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2024, 24(05): 1-6.
- [7] Fredricks, J.A., Blumenfeld, P.C., & Paris, A.H. (2004). School Engagement: Potential of the Concept, State of the Evidence.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4, 59-109.
-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EB/OL]. (2016-05-19). http://www.gov.cn/zhengce/2016-05/19/content_5074812.htm.

A Study on the Ethical Risk Governance and Multidimensional Application

Value Assessment of the DeepSeek Large Language Model in Higher Education

Yin Lijun, Song Haijun, Shi Xuekui, Chen Jing

Hebe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Xingtai, Hebei 05403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applied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teaching,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s a representative domestic LLM, DeepSeek has demonstrated strong technical adaptability and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various university contexts. However, its deployment also raises ethical concerns related to data security, privacy protection, content bias, and academic integr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of DeepSeek and its current deploy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it proposes an ethical risk governance framework centered on technical safeguards,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to effectively address multiple layers of risk. Furthermore, the study develops a multidimensional teaching evaluation model focusing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tudent engagement, and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It also establishes a researc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ramework, incorporating key indicators such as research output,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stimulation. The research outcomes aim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deployment, utilization, and governance of AI technologies in universiti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ed, secure, and sustainable applica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DeepSeek; Ethical Governance; Teaching Evaluation; Research Performance ; Assess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91

协同视角下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研究及启示

唐家杰¹

(¹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本研究从协同治理视角出发, 探讨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新加坡率先构建系统化治理模型, 协调技术发展与社会利益。研究以“治理理念—治理范围—治理行动”为框架, 梳理其政策文件与治理措施, 涵盖责任机制、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公众信任与国际合作, 并与中国政策环境对比。研究认为, 中国可借鉴其多方协作、数据透明、风险预防与公众参与机制, 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治理框架; 新加坡; 中国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成为引领新一代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 如何在应用和推动创新的同时, 有效地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安全风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体系总体并不成熟, 但各国已尝试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旨在进一步推动创新并确保行之有效的监管, 努力防控其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于 2023 年 1 月发布了《AI 风险管理框架》, 欧盟理事会在 2024 年 5 月正式批准欧盟《人工智能法案》, 标志着全球首部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监管的法案即将落地。新加坡在几经修订后, 也于 2024 年 5 月更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我国政府亦高度重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工作, 从国家战略层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2024 年 7 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2024 年 2 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治理问题是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围绕其涉及的知识侵权^[2]、伦理法律^[3]、信息泄露^[4]、犯罪风险^[5]等诸多议题, 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十分激烈的探讨。但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方案。跨国合作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建立对于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6]。人工智能发展的快速步伐往往超出了治理框架能跟上的能力, 这就需要全球利益相关者不断适应和合作^[7], 在充分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治理方案的基础上, 寻找有效适配新环境、新形势的治理策略。

在全球已有的治理方案中, 新加坡提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型框架》(Model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Generative AI) 是首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旨在通过系统和平衡的方法来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担忧和继续促进创新。在推崇全球共治的基础上, 尤其强调“建立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让公众安全并有信心地使用人工智能”。公众信任是新兴技术制定政策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人工智能治理应将公众信任作为核心原则, 但对现有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审查显示, 公众信任很少被讨论^[8]。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型框架》的整体性、协同性以及以公众信任为目标的治理思路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参考价值。鉴于此, 本研究从协同理论视角建构分析框架, 从治理理念、治理范围和治理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型框架》进行深度分析, 以期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方案的持续优化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 (QNXXSF2024008) “短视频内容生产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理与效果研究”

作者简介: 唐家杰(1998—),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网络与新媒体、亚文化、网络舆情;

二、研究框架

治理理念、治理范围以及具体的治理行动是政府治理框架的核心内容，通过对三单个方面的深入分析能够揭示政府治理的主要逻辑。本文以治理理念、治理范围、治理行动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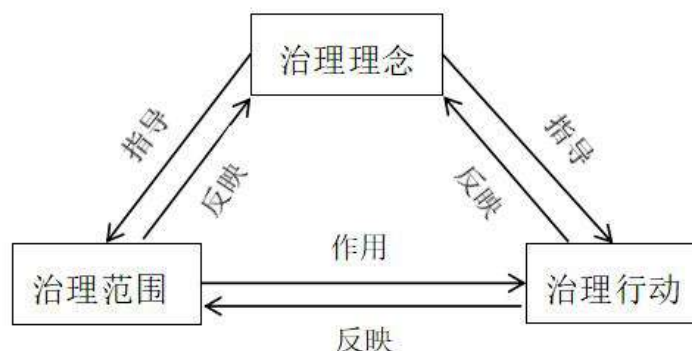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

治理理念作为治理框架中价值指导的元素，为整个治理体系提供了方向与原则。治理理念是引导公共服务需求治理实践的基础和先决条件^[9]，源于其指导治理范围与行动的核心重要性，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目标导向与理论支撑。治理范围体现了治理的对象、领域和边界，是了解政府治理和政策制定的主要维度。如鲍静等人表示数字政府的治理范围不仅涵盖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境内议题，还包括跨越地理边界的网络空间议题^[10]。治理范围关系治理活动实施的空间或领域，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范围涵盖了技术开发到技术使用的全过程，并以系统与全面的思路作用于治理行动。因此，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型框架》中的治理范围，进而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边界实属必要。治理行动是实现治理理念与治理范围的具体措施与反映。治理行动是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等行为体为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行动^[11]。应对人工智能领域众多问题频发的状况，并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准确实施治理行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据此，本文将协同视角下的主体、客体和过程框架与治理逻辑中的治理理念、治理范围和治理行动框架加以整合，尝试建立一个二元三维的研究框架，进而对新加坡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进行结构性，将其协同行动与治理逻辑进行深层次的拆解，进而准备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型框架》如果通过整体性、系统性来突出公众信任的核心原则。

三、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分析

2024年5月30日，新加坡信息媒体发展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以下称“IMDA”）和AI Verify基金会正式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型框架》。该框架最初于2019年发布，并在2020年进行了更新，此前该框架于2024年1月对外发布进行公开咨询。

（一）治理理念

《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型框架》认为构建一个值得信赖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有助于人们更有信心地接受人工智能，为创新提供最大的空间，并将其作为利用人工智能造福公众的核心基础。“全球合作、多方共治、平衡发展、建立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让公众安全并有信心地使用人工智能”的治理理念始终贯穿于该框架之中，充分体现了主体协同治理的思想。

在全球合作上，新加坡强调与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进行全球合作。通过跨国界和跨领域的合作，推动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配置。在多方共治方面，新加坡的治理框架提出责任共担、数据管理和安全评测等治理行动，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和协作。通过多方共治，构建可靠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平衡发展方面，力求在规制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又保护用户权益。建立公众信任方面，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和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使公众能够理解和信任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决策过程的可解释性，使用户能够理解和评估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和结果。

上述各方面须以政府、行业、社区和公众共同参与为治理前提，力求各个主体通过协同作用来实现整

体效应的提升。首先，政府在制定政策、监管和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建立法律框架与监管机制，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保护用户和推动创新之间保持平衡，符合社会利益。行业主体，包括技术公司和企业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推广，为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提供支持。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主要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为行业提供前沿技术和知识储备，因此亦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参与的重要主体。此外，框架强调了公众在治理中的主体性。公众不仅是最终用户和受益者，也是治理的主要参与者。

（二）治理范围

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中提出责任、数据、可信的开发和部署、事件报告、测试和保证、安全性、内容出处、安全性和一致性研究与开发、人工智能促进公益等九个概念，现依照各概念含义与特性，将它们分别规划进个体、数据、流程、安全性、效果等治理范围维度之中。

1. 个体

责任概念是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中首先提出的理念，它主要确保各参与主体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与应用过程中，参与主体对用户的负责度。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框架强调，责任机制的建立是激励人工智能开发链条上各参与主体对最终用户负责任的关键点，从而确保各参与方在开发过程中采用必要手段保护用户。责任维度分为以下方面：

模型开发。模型开发主体承担着人工智能系统质量与安全性的责任，作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与创造者，他们需要确保系统能抵御潜在安全威胁，因此他们也承担着确保设计与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预定标准与最佳实践的责任。

应用部署。作为应用部署主体，参与主体需负责将开发完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放置于实际环境中，并确保系统具有可靠与安全性。参与主体需要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能、隐私保护等方面进行持续性监控，并在必要情况时对系统进行修复与改正。

云服务供给。云服务供给主体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托管方身份存在，其承担着人工智能系统在云环境中安全运行的责任。作为云服务供给商，他们需要供给安全可靠的云基础设施，以及严格管制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储存与传输，对启进行严格管理，从而保护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

2. 数据

数据维度强调数据的安全、质量、合规，它是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维度包括个人数据与版权的使用，以及数据来源于处理的透明度。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中，数据维度的治理机制是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中，数据安全性与可靠性的关键一环，它有助于保证各参与主体在开发人工智能的过程中，以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数据。数据维度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数据来源与处理透明度。数据来源与处理的透明度是为确保人工智能系统中，数据来源为透明与可追溯，数据处理时遵循预先设定的标准与实际行动。数据来源与处理透明度包括对数据来源的核查、数据处理与储存的合规，以及数据使用和共享的透明。在数据处理透明度中，还包括代码、数据模型的可审计，在系统管理中，系统的安全与隐私保护也是数据处理透明度中的措施。数据来源于处理透明度，它们有助于用户进一步了解数据意义，并在安全与合法的数据之中，帮助用户理解数据如何被使用与处理的过程与情况。

数据质量的把关。数据质量的控制作为人工智能对数据质量把关的环节，其作用为保证数据质量符合人工智能系统标准。其中包括对数据来源检验与数据规范化储存与处理等数据质量控制环节。数据质量控制有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拥有可靠与准确的数据，对用户需求进行正确的满足。

数据集池的扩张。数据集池是在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下，以多种方式与手段，不断增加人工智能可用于训练自我的数据集。数据集池的扩张，能加强人工智能适应源源不断的数据进入过程，从而促进人工智能对数据准确与合理的识别与应用。

3. 流程

新加坡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中，可信的开发和部署、事件报告、测试和保证、内容出处等四个概念，将人工智能的开发到内容输出流程涵盖，据此，本文将其归纳于流程层面。

可信的开发和部署为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开发与部署过程中符合预先制定的标准与实践要求。为保证人工智能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发挥作用。在该概念之中，首先强调的便是可信与安全，因此在人工智能

系统开发过程中,将透明度作为首要节点,对代码与模型的开发给予高透明度的赋予,让用户了解系统的运作与过程。并且为保证可信度,该概念提出与用户交互的设计理念,关注用户体验与反馈,从而更好地设计人工智能界面,并让人工智能系统不断更新以此符合用户需求。

事件报告概念被解释为,当人工智能系统发生故障等安全事件与意外时,能够迅速生成事件相关报告,从而得以问题解决。其具体包括,系统监测与记录、事件报告与通知、问题传递与解决。在人工智能中建立监测系统从而当安全事件发生时,系统迅速记录事件发生的各节点,包括时间、具体方位、影响范围等,随后形成报告将它发送至相关部门进行问题解决。

测试和保证概念为,以标准化测试与可信的第三方测试机构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及可靠性加以保证。测试和保证中,以建立安全和可靠的人工智能系统为目标,无论是标准化测试,还是第三方测试机构的成立,都是为了不断发现并填补安全漏洞和持续改进系统而存在。

内容出处概念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中内容的是否可靠与可信。内容出处涉及了数据披露与数据透明度,以及算法决策过程的透明与决策输出一致性确认。数据披露与透明度与数据概念部分解释相似,对数据来源于处理的验证与透明度保证,让用户了解数据的来源与处理的过程和使用情况。算法决策过程的透明与决策输出一致性确认的核心就是让用户信任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透明与决策输出一致获得用户信任与满意。

4.安全性

安全性维度中,以安全性与一致性和一致性研究与开发两个概念构成。两个概念构成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外部安全构建与内核系统的自我改造。

安全性概念关注于对系统外部安全架构的设计,以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得以稳定维持。在系统安全性的设计之中,为保证安全性,会不断利用新技术加强系统安全,例如技术加密、系统入侵检测、恶意软件阻挡等技术实践,并以预防安全威胁为己任,定期更新安全补丁,预防潜在的安全威胁。

安全性和一致性研究与开发概念是对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内核进行重构与升级。系统会不断对自身内部进行持续监测,并以新技术的探索加强系统对安全问题的识别与解决。该概念中,还有制定安全标准,依据实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安全标准,从而适应人工智能面临的新型安全挑战。

5.效果

效果维度中,以人工智能促进公益概念组成。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框架提出以人工智能促进公益,旨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于多种领域之中,如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随后促进众多领域的发展,并且以人工智能促进公益,还能应对社会不平等与歧视的问题。对于领域促进方面,教育与医疗领域在人工智能的运用下,能提供给用户更具个性化的教育方案以及治疗方案,并拥有更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促进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发展。在环境保护领域中,人工智能以环境问题持续监测和灾难预警为方式,从而推动环境保护领域的发展。在缓解社会不平等与歧视问题上,人工智能的运用或许能帮助社会更具包容度、公平性、责任性,通过人工智能的运用来促进社会公平,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让各行各业中提供机会的人群能承担社会责任,预防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

(三) 治理行动

治理行动维度是治理理念与治理范围的具体反映。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中,治理行动的举措众多,例如安全性和一致性研究与开发、标准化测试方法、建立可信第三方测试机构、透明披露、数字水印与加密技术处理、用户教育与培训、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系统开发与安全防护层面中。安全性和一致性研究与开发,通过持续对人工智能进行安全性风险评估、技术更新、漏洞检验,进而稳定人工智能抵御风险能力。一致性研究与开发方面,通过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逻辑、系统输出一致性,以此提高系统可解释性与可靠性。并促进系统的用户满意度;标准化测试与第三方测试机构,其多为实现系统的可信与可靠度提高而实施。标准化测试方法对系统性能与安全性进行评估和验证,建立可信的第三方测试机构,以对人工智能系统的独立验证,以及提供机构自我的认证结果;数字水印和加密出处技术,是为保护数据,防止人工智能系统中数据被篡改与滥用,并且在内容上,以加密技术的运用,确保内容的可追溯,加强内容可信与可靠度。

在系统责任层面中,透明披露体现为数据使用与算法透明,旨在以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被透明与数据使用的透明,增强用户对系统的信任。

就用户能力与知识共享而言。用户教育与培训行动,从用户意识到用户技能提升出发,为让用户安全

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从而促进他们对系统的风险认识，并不断促进他们的人工智能使用能力，帮助用户更深层次理解与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国际合作与交流行动中，以标准制定与经验分享为行动内容。为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以国际合作标准为规制，以各国人工智能治理经验分享为连接，促进各国对人工智能的合作建设，从而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聚集更稳固的力量。

经上述对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分析，以此对“治理理念-治理范围-治理行动”研究框架进行补充，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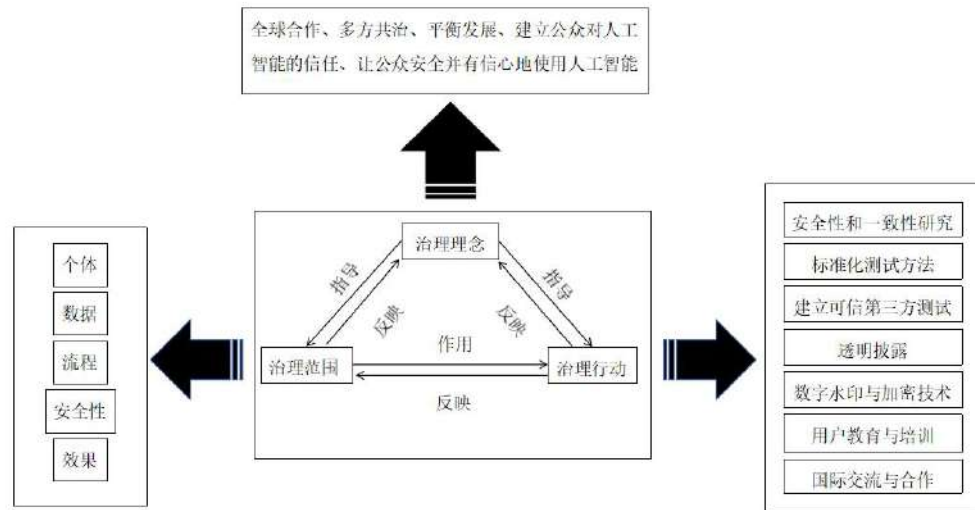


图2“治理理念-治理范围-治理行动”研究框架

四、新加坡经验的启示

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从多方面给予中国启示，以下，将从个体、数据、流程、安全性、效果五个维度对启示进行阐述。

（一）个体维度

新加坡经验中，责任共担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能提供一定的参考。在人工智能的开发与治理中，各参与者共同承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系统的合理开发与管制，对用户而言，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因此若中国借鉴新方法，对于人工智能的开发与治理能更具合理性。

（二）数据维度

在新加坡经验中体现出对数据质量的把控以及第三方检验机构的输出认证，此为数据管理与安全检验。中国可借鉴此经验，为人工智能的数据获取、使用以合理的方式进行处理，让版权安全也获得保障，并在内容输出上有着可靠的检验，为用户的人工智能使用和内容获取上一把安全锁。

（三）流程维度

新加坡人工智能治理经验中，针对流程维度而言，以下方面可进行借鉴。

新加坡以数据透明度加强，让用户知晓数据来源，系统的透明让用户看清数据的处理过程，从而加强用户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

在创新与规制平衡中，为防止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快速创新而导致的安全问题，新加坡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对系统的风险防范机制提升也同样关注，让人工智能在稳定中得到提升，从而中国可借鉴此经验，以规制的创新来促进国内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提升了国内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又减少了系统内安全问题的发生，这有助于国内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在鼓励创新与公平竞争中，中国可在规制政策中保留有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创新空间，在鼓励他们进行技术改革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给予人工智能市场政策规定，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防止人工智能市场垄断与恶意滥用，保证市场的健康运作与发展。

在风险预测与预防层面内，新加坡经验表示，人工智能中分有高、低风险区域，例如数据与隐私方面

为高风险区域,那么在该区域中的管理需要高强度规划,但在低风险区域中,如文字输出、辅助优化中,能给予更大的创新空间,实现人工智能的规制与创新的平衡。

新加坡经验中,强调着公众的重要性,因此在公众参与和教育层面中,公众作为人工智能的使用主体,需要他们更多地参与人工智能的使用,从而加深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提升他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程度,以此加深公众与人工智能的连接与参与度。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他们应得到专业人员的人工智能知识教育,当他们大力参与并使用人工智能时,能以更合理与克制的方式来有效使用人工智能。

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容纳技术、伦理等多领域问题,因此在多方共治层面,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应进行多国家的共同开发与治理,以国外新技术与政策治理的经验为借鉴,以中国国情为实际状况,从而大力创新人工智能领域同时得到安全预防。

(四) 安全维度

预见性规制作为安全维度中,对潜在问题做预期性防范的途径,当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安全和技术等问题进行预见性规划,可让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安全性的保护。预见性规制中,政府、人工智能开发者、用户都可一起制定策略,从而确保政策的普遍适用性与可行性,促使人工智能潜在问题的有效预防与解决。

除此之外,动态调整也极为重要。当今技术更新换代快,人工智能的迅速升级也会带来政策的不适应,因此,人工智能规制需要与时俱进,跟随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动态政策调整,并及时检验实施效果,从中发现问题并修正,保证政策的可行性。

(五) 效果维度

探讨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与发展时,对国际交流的关注是重要的。通过国际交流,中国人工智能在技术与安全层面,依据新经验可获得一定提升。

具体而言,由于国际交流与多方参与的原因,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与问题解决上,能以更便捷与高效的方式进行应对,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积淀更厚实的力量。当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与交流时,新技术、新经验进入国内后,对国内人工智能系统的升级与安全机制改善有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内用户在人工智能使用层面也会得到正向引导,

同时,人工智能进入公益领域,可开拓中国人工智能多领域参与的篇章。新加坡经验中,人工智能进入公益领域是中国借鉴的一大要点。该要点能启示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改善社会不平等与歧视问题,增加社会包容度,是为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铺垫力量。借鉴新加坡经验,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这样的中国人工智能使用不仅能在公益领域中有所成效,对中国其他领域的发展或许都有着借鉴意义。

五、结语

本研究以协同视角为切入点,分析了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启示。在研究意义上,研究揭示了协同治理在平衡技术创新与安全规制方面的有效性。不同主体间的协作机制和治理理念能够促进治理体系的优化,为政策制定和行业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该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方面的研究空白,也推动了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理论发展。

从理论意义来看,研究构建了“治理理念-治理范围-治理行动”三维分析框架,提出了以公众信任为核心的协同治理路径。该框架强调不同主体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将治理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作为核心目标,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理论模型。在治理实践中,新加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应用有助于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适配策略,扩展了人工智能治理研究的理论边界。

在实践意义方面,研究为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务实的改进方案。通过引入责任分担、数据透明、风险预测和公众参与等治理措施,可以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国际合作的加强也有助于获取最新技术和治理经验,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稳步发展提供支撑。众多措施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落地、产业升级和用户体验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无法获取全面、实时的政策实践数据,结论在时效性上可能存在不足。此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得部分建议在中国的适用性可能受限。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多来源数据采集和跨国比较分析,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实证研究,以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从而进一步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参考文献:

- [1]何萍, 刘继琨. 法域协调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物涉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以ChatGPT为例 [J]. 法治研究, 2024, (03): 47-56.
- [2]吴逸菲, 樊春良. 中国语境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路径塑造——基于价值-工具二维理性的融合框架 [J]. 科学学研究, 2025, 43 (01): 79-90.
- [3]李川. 生成式人工智能场域下个人信息规范保护的模式与路径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4, 44 (08): 68-80+206.
- [4]Tong Y. Research on Criminal Risk Analysi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ch as ChatGPT[J]. Studies in Law and Justice, 2023, 2(2): 85-94.
- [5]Jobin A, Ienca M, Vayena E.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AI ethics guidelines[J].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2019, 1(9): 389-399.
- [6]Dixon R B L. A principled governance for emerging AI regimes: lessons from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J]. AI and Ethics, 2023, 3(3): 793-810.
- [7]Bandelow N C, Hornung J, Sager F, et al. Discourses and bottom-up policymaking in Europe and the EU[J].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 2024, 10(2): 158-161.
- [8]苏有丽, 牛春华. 数智赋能公共服务需求治理: 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2 (01): 166-176.
- [9]鲍静, 范梓腾, 贾开. 数字政府治理形态研究: 概念辨析与层次框架 [J]. 电子政务, 2020, (11): 2-13.
- [10]余南平. 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与国际政治未来变革 [J]. 政治学研究, 2023, (06): 76-90+232-233.

Research on Singapore'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from a Collaborative Perspective

Tang Jia-jie¹

¹ Communication,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s generative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from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Singapore took the lead in building a systematic governance model to coordinat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ith social interest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Concept - Governance Scope-Governance Actions", the study compares its policy documents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including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data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public trus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s policy environmen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hina can draw on its mechanisms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data transparency, risk preven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I governance.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framework; Singapore; China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96

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的范围综述

刘佳欣¹ 刘德宇¹ 韩沁² 潘璐彤³ 赵丽萍⁴

(¹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3, ²山东中医药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广东 深圳 518000, 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 长沙 410011)

摘要 背景: 中学生作为伤害事件的高发群体, 评估其现场救护知识水平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总结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的主要特征, 以推动和改进工具的开发、验证和使用。**方法:** 依据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的范围综述指南规范, 检索 7 个常见数据库, 时间范围从建库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文章筛选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纳入初高中学生急救知识定量测量评估工具。本研究遵循 PRISMA-ScR 检查表。**结果:** 共检索出 9549 篇文献, 经过筛选确定 25 篇文献 (包含 23 项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这些工具主要评估一般现场救护知识、基础生命支持、急症救护、创伤救护以及意外伤害救护相关知识。研究测试了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但往往缺乏心理测量特性测试的细节, 部分研究也没有报告明确数值。**结论:** 当前, 23 种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主要集中在基础生命支持和创伤救护知识的评估, 但大多数工具存在内容和方法上的局限。完善开发流程, 结合中学生的特点开发具备良好信效度的评估工具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中学生; 心肺复苏; 知识; 评估工具; 范围综述; 现场救护

1 前言

意外伤害影响着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存活率仍然很低^[1]。每天有大量患者死于院外心脏骤停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意外创伤等意外伤害^[2]。现场救护是对急性疾病或损伤提供的初步处理, 目的是挽救生命、减轻痛苦、预防进一步伤害以及促进康复^[3]。如旁观者心肺复苏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外出血的控制, 这对于提高 OHCA 等伤害存活率、促进预后有关键作用^[4]。据估计, 旁观者实施急救措施每年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挽救 200,000 人的生命^[5]。因此, 加强对公众现场救护知识的评估并提升公众对现场救护的认识, 最终促进更多的非专业人士愿意并能够拯救生命至关重要^[6]。

需要关注的是, 目前许多旁观者缺乏识别 OHCA 等意外伤害或采取急救行动的知识和能力^[7]。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 Kids Save Lives 声明, 为了提高紧急救援的有效性,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将急救教育扩展到幼儿及中学生人群^[8, 9]。美国心脏协会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 主张为接受正规教育的学生 (即 12-18 岁初中和高中学生) 提供心肺复苏术培训, 从而覆盖该国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急救知识与技能需求^[10]。据观察, 青少年能够吸收执行 CPR、包扎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11]。在学生时期接触急救教育不但提高自身的自救互救水平, 还能增加突发意外伤害时伸出援手的意愿^[12]。此外, 拥有正确的现场救护知识在学生生活

基金项目: 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重大科研专项(R2023112);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 (23YBA022)

作者简介: 刘佳欣(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健康教育;

刘德宇(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健康教育;

韩沁(2004—), 女, 学士, 研究方向为公共卫生;

潘璐彤(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

通讯作者: 赵丽萍(1974—), 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动范围内可以引起“辐射效应”，增加急救旁观者的数量，为意外伤害事件做好充足的准备^[13]。因此，通过问卷评估来可靠地衡量和对比中学生的救护知识水平，对于了解其现状与不足，并据此制定急救教育策略，加强急救教育至关重要^[2, 8, 14]。

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可以帮助评估青少年具备的急救知识水平。其范围从强调 CPR 关键步骤的整体框架到灾害预防避险素养等^[15-18]。评估参与者所学知识的工具必须在内容、标准和结构方面进行验证，以确保测量有效、可靠^[19]。此外，为了评估急救教育计划的有效性，必须进行方法学一致的评估^[20]。然而，目前关于经过验证的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水平评估工具的研究有限。尚未发现公认的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价标准，相关评估证据存在异质性。且评估工具的评估内容复杂，在不同地区和学校间可能存在适用性差异。据我们所知，之前的研究暂未系统总结各种中学生救护知识评估工具。因此，鉴于该群体独特的成长阶段和教育需求，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本综述旨在系统检索和分析帮助评估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水平和评价急救教育计划措施有效性的工具，比较它们的开发过程、内容特色及心理测量特性等，并总结工具的局限性以提出改进建议，为开发更为可靠有效的评估工具提供科学依据。

本综述研究问题如下：

- (1) 目前国内外有哪些工具可以应用于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
- (2) 这些评估工具主要涵盖哪些内容？
- (3) 各评估工具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如何？
- (4) 针对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存在的知识缺口及未来研究方向是什么？

2 方法

2.1 确定相关研究

本综述遵循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的范围综述指南及系统综述的首选报告项目和范围综述的 Meta 分析扩展 (PRISMA-ScR) 指南^[21, 22]，并已在开放科学框架网站注册 (<https://osf.io/4kch2>)。研究聚焦于“可用于评估初高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的工具有哪些？”这一主题，采用“PCC”模型作为纳入标准框架。具体而言，人群 (Population, P) 为 12 至 18 岁的初中和高中学生；概念 (Concept, C) 为用于评估现场救护知识的工具；背景 (Context, C) 任何环境，包括学校或其他机构 (包括家庭和户外)。如果只有一部分相关受试者为中学生，研究只有在单独报告这些学生的数据时才被纳入。本综述考虑所有类型的现场救护知识。工具定义：为评估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而设计、修改或使用的任何问卷、量表和清单等。

综述中纳入能从论文、附录或参考文献中获取所有条目并通过验证的定量测量工具。证据来源包括原始研究、指南、专家共识及系统综述等。排除质性研究、书籍章节、海报摘要、信件、会议摘要、新闻报道、重复发表及正在进行的研究，因其不适合或不足以回答研究问题。纳入研究限于可获取全文的中英文文献。

2.2 检索策略

研究采用三阶段策略进行检索。首先在 MEDLINE 和中国知网 (CNKI) 上进行初步检索，确定检索词并制定检索策略。其次采用整合数据库特定主题词 (如 MESH) 并识别关键词的检索方法。最后，全面检索 MEDLINE (PubMed)、EMBASE (Ovid)、CINAHL (Ebsco)、PsycINFO (Ebsco)、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 (SinoMed)、中国知网 (CNKI) 和万方 (Wanfang) 数据库，检索时间从建库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相关检索词包括 ‘adolescent (MeSH)’, ‘first aid (MeSH)’, ‘knowledge’ (MeSH), ‘surveys and questionnaires (MeSH)’ 等。最后，查看检索记录的参考文献列表以获取其他相关文章。

2.3 文献筛选

我们使用 EndNote X9 管理文献并移除重复项。两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所有文献的标题和摘要。随后，对具有潜在相关性的文章进行全文评估，依据纳入标准做最终决定。当遇到使用或改编他人工具的文章时，我们会追溯至原始文献，并评估其是否符合纳入标准。筛选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分歧将由第三位研究者调解或通过团队讨论解决。

2.4 数据提取

研究团队共同制定了数据提取表，并通过预提取确保表格的有效性。正式数据提取由两位研究者独立

完成,再由另一位研究者审核。提取的数据包括:文献特征(作者、年份、国家、研究设计)、目标人群(年龄、教育水平)、背景环境(学校或其他)、工具特征(名称、用途、内容、结构、条目数、结果评价、开发/修订详情及其信度和效度)。研究根据工具覆盖的知识领域(如基础生命支持(Basic Life Support, BLS)或创伤救护)进行分类,并总结各评估工具的应用对象、测评内容及其心理测量特性。

3 结果

3.1 证据选择及描述

共检索出 9549 篇数据库文献,经过参考文献列表检索纳入 3 篇文献,删除 2446 篇重复文章后,通过审查标题和摘要筛选了 7106 篇文章。其中,310 篇文章被纳入全文审查,得出 25 篇符合条件的研究被纳入本综述(如图 1 的流程图所示)。共纳入 10 项横断面研究、5 项干预性研究、2 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1 项随机对照试验、1 项问卷验证研究、1 项方法学研究、1 项前瞻性前后可行性研究、1 项混合研究、1 项实证研究、1 项类实验性前后设计和 1 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所有研究均于 2013 至 2023 年发表。17 项研究在亚洲区域进行,5 项研究在欧洲区域进行,1 项研究在大洋洲区域进行,1 项研究在美洲区域进行,1 项研究在非洲区域进行。研究对象年龄 8-21 岁不等,2 项研究对象包括了小学生^[23, 24]。

3.2 评估工具一般特征

23 个工具被纳入定性综合。详见表 1。23 项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使用问卷或量表收集所有定量研究的数据。工具的目的因研究目的而不同,10 项研究的目的是测量学生的现场救护知识现状,12 项研究使用问卷来评估现场救护知识的变化,以衡量干预措施或计划的影响或有效性,3 项着力于开发或验证问卷^[19, 20, 25]。工具条目数量范围广泛,从 4 至 48 条不等。最常见的测量结构是多项选择题,此外还包括李克特量表、单选题、二元或三元选项(如是/否,对/错)及开放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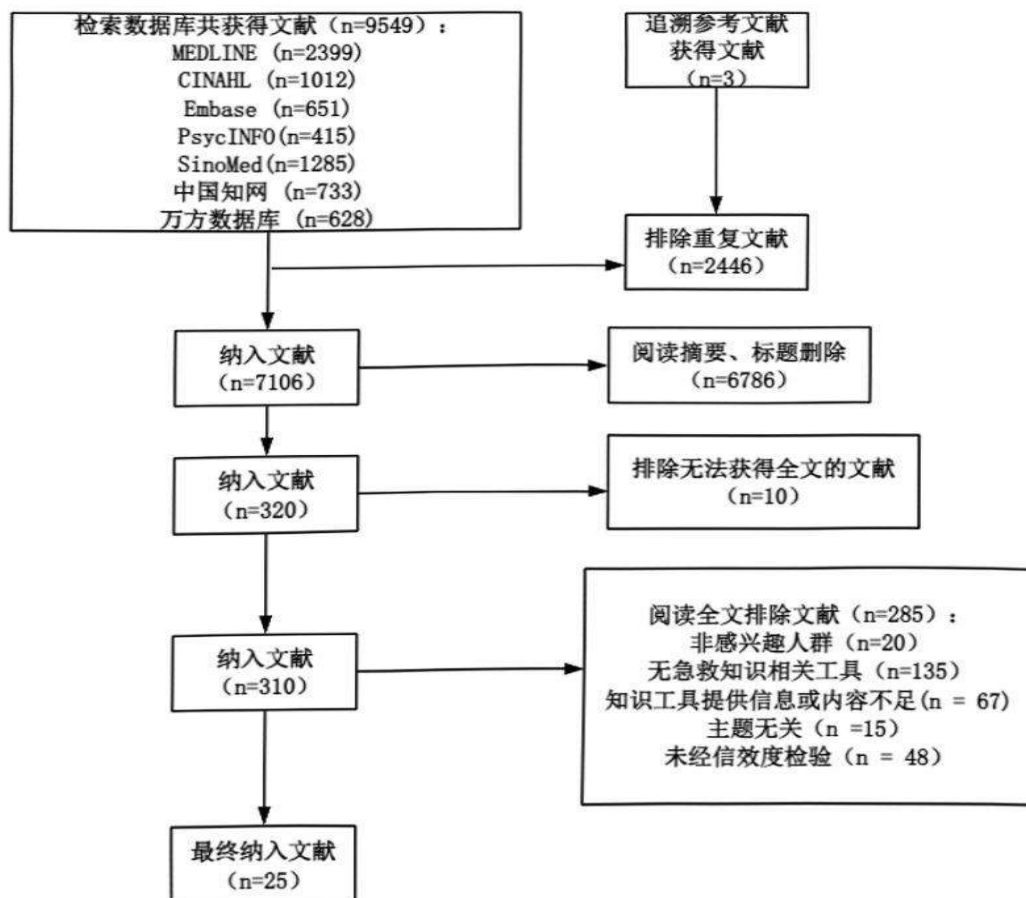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表 1 纳入急救知识评估工具的研究摘要 (n=25)

作者 (出版年份) 国家	设置类型	研究设计	急救知识评估工具	评估工具的目的和目标人 群 (年龄/年级)	工具的结构和内容	结果评估	工具的开发、修订和试点测试	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BLS Koca et al. ^[26] (2022) 土耳其	学校	随机对照试验	心肺复苏知识与行为 问卷	评估高中生与心肺复苏术 有关的目的和行为,并确定 心肺复苏术培训的影响, (16-17 岁, 10 年级)	S: 6 个条目 (MCQ) C: 与心脏骤停症状有关的知识 和行为、以前的心肺复苏经验、 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全国电话号 码、BLS 知识、对心肺复苏的担 忧以及对应用心肺复苏的态度	未报告	调查问卷已提交给六位急诊医学 专家进行修订	V: 内容效度: CVI = 0.98
Tsai et al. ^[27] (2019) 中国	农村学校	类实验前-后设计	心肺复苏术/自动体外 除颤器前后测试问 卷	评估初中生在教育干预前 后对心肺复苏术和自动体外 除颤器的了解程度。(7 年级)	S: 10 个条目 (开放式问题) C: 应急知识、紧急情况下在家 中和户外的正确行动、心肺复苏 知识、自动体外除颤器相关知识 以及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的意 愿	未报告	自制问卷	V: 内容效度: CVI = 0.92-0.98; 确立了表 面效度
苗晨曦 ^[28] (2019) 中国	学校	横断面研究	长春市中学生对体外 心肺复苏的认知和训 练意向问卷	评估长春市初中生对心肺 复苏的认知状况。(年龄 12-15 岁)	S: 32 个条目 (30 个单选题 + 2 个 MCQ) C: 心肺复苏基础知识、开放气 道和人工呼吸知识、复苏效果判 断知识; 自动体外除颤器相关知 识	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 答案 错误得 0 分。多项选择题每 题 2 分。答对部分选项得 1 分, 答错得 0 分。总分为 64 分	问卷根据梅媛等人的研究进行了 修改。参照《2015 年 AHA 心肺复 苏和心血管急救指南 (更新版)》。 预调查对象为长春市某中学的 60 名学生	R: 内部一致性: 态 度问题的信度 Cronbach's alpha = 0.843
赵玉兰 ^[29] (2018) 中国	学校	干预性研究	青少年心肺复苏知识 和信念调查问卷	调查中学生心肺复苏术的 知识、态度和实践现状。 (12-15 岁, 1-2 年级)	S: 48 个条目 (16 个 Likert + 30 个单选 + 2 个 MCQ) C: 与心肺复苏相关的知识和信 念	心肺复苏态度满分为 36 分。 心肺复苏知识中, 1-30 题为 单项选择题, 每答对一项得 2 分; 后两项为多项选择题, 全部答对得 2 分, 少选得 1 分, 错选不得分, 总分为 64 分。问卷满分为 100 分	根据梅媛等人的研究对其进行了 修改	V: 内容效度: CVI = 0.79; 建立了表面效 度 R: Cronbach's alpha = 0.78
Pivač et al. ^[30] (2020) 斯洛文尼亚	学校	混合研究	心肺复苏知识问卷	调查实施心肺复苏培训对 学童知识的影响。(12-15 岁, 7-9 年级)	S: 15 个条目 (对/错) C: 急救编号、人工呼吸、胸外 按压和自动体外除颤器相关知 识	每个正确答案得一分。按照 最终得分计算: 优秀 (15-13 分)、很好 (12-11 分)、 良好 (10-9 分)、满意 (8-7 分) 和不同意 (6 分或以下)	根据以前的相关研究制定。开展了 两项试点研究	V: 表面效度和内容 效度 (未报告结果)
Schmid et al. ^[31] (2018) 美国	教育中心	干预性研究	HOCPR 知识问卷	获取 HOCPR 知识, 以检 验针对中学生 (11-18 岁, 6-11 年级) 的 HOCPR 培 训的有效性	S: 4 个条目 (MCQ) C: 按压的速度、按压的深度、 HOCPR 的正确步骤以及何时应 停止 CPR	未报告	该调查问卷是心肺复苏术培训研 究所用问卷的西班牙语译本	根据当地专家的意见, 验证是否可在哥 斯达黎加的学校中 使用

表1 纳入急救知识评估工具的研究摘要 (n=25) (续)

作者 (出版年份) 国家	设置类型	研究设计	急救知识评估工具	评估工具的目的和目标人 群 (年龄/年级)	工具的结构和内容	结果评估	工具的开发、修订和试点测试	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Calvo-Francés et al. ^[25] (2023) 西班牙	学校	问卷验证研究	心肺复苏知识问卷	评估高中生掌握的心肺复苏技术知识。(14-16岁)	S: 20 个条目 (MCQ) C: 生理病理学概念、心肺复苏实践和自动体外除颤器相关知识	知识 (正确计分)	11 位专家对问卷条目的措辞和代表性进行了评估, 并对问卷提出了补充、修改或删除建议。专家们确定了条目的内容效度, 问卷已通过 IRT (Rasch 分析) 验证	V: 相关性为正 (从 0.16 到 0.50); 内容效度 (0.83); 分离指数 (7.53) R: 可靠性指数 (0.98)
Urbina-Rojas et al. (2022) ^[19] 西班牙	学校	方法学研究	心肺复苏知识和态度问卷	评估青少年的心肺复苏知识和态度 (11-13 岁)。	S: 19 个条目 (8 个 MCQ + 11 个是否) C: 关于基本心肺复苏术的知识和态度	未报告	(i) 由作者开发评价工具; (ii) 由 14 名该领域的专家评委使用内容有效性指数进行分析, 对内容进行验证; (iii) 在 30 名 11 至 13 岁青少年的参与下, 对语义进行验证	V: 知识: 内容效度指数 (CVI) =0.92-1.00, 一般指数=0.98; 态度: CVI=0.85-1.00, 一般指数=0.98; 语义验证 V: 内容效度: CVI = 0.945
Ma ^[32] (2015) 中国	学校	横断面研究	心肺复苏知识和态度问卷	评估高中生的心肺复苏知识和态度。(15-16 岁)	S: 20 个条目 (10 个 MCQ+10 个 likert) C: 心肺复苏知识 (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等); 对心肺复苏的态度 (心肺复苏的意义等)	知识: 每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均得 1 分 (范围为 0 至 10 分)。分数越高, 表示正确答案越多, 因此心肺复苏知识越丰富	2012 年 12 月, 学生们填写了一份根据大量文献综述编制的简短问卷, 并在 10 名学生中进行了试点测试	
So et al. ^[33] (2020) 中国	前瞻性前后可行性研究			评估在中学生中开展 2 小时纯按压式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课程的可行性和初步效果。(12-15 岁)		态度: 采用 5 分制李克特量表。非常同意/同意=3, 中立=2,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1, 总分越高, 对心肺复苏的态度越积极 (10-30 分)		
Gradwohl et al. ^[20] (2023) 匈牙利	学校	横断面研究	关于知识和态度的 BLS 调查问卷	调查知识传授和态度形成的效果, 以及在该计划中青少年对复苏知识的遗忘程度 (例如忘记有关 BLS 的知识)。(12-15 岁)	S: 19 个条目 (3 个正确/错误 + 1 个真假 + 2 个是否 + 2 个单选多选 + 1 个多选多选) + 2 个条目 (正确/错误) + 8 个条目 (5-likert)。 C: 国家紧急电话号码、胸外按压、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比率、BLS 的可能终点等 (9 个条目); 在特定情况下实施 BLS 的意愿 (2 个条目); 对提供帮助的人的态度以及用不同陈述对其进行的评估 (8 个条目)	未报告	调查问卷的条目是通过文献审查生成的, 以便对同伴教育计划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V: 知识条目难度指数: 9 个条目在可接受范围内, 20%-80% 的参与者回答正确。15 个条目超出范围 (14 个条目大于 80%, 1 个条目小于 20%) R: 知识: 重测可靠性: 8 个条目的 r 值低于 0.4, 9 个条目 (0.4 < r < 0.7), 10 个条目 (r > 0.7)
叶卓范 和 梅玲明 ^[34] (2019) 中国	学校	横断面调查	心肺复苏知识和认知问卷	评估 15-19 岁高一学生的心肺复苏知识和认知状况。	S: 4 个条目 (MCQ), 17 个条目 (正确/错误) C: 心肺复苏认知 (4 个条目) 和心肺复苏知识 (17 个条目)	未报告	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	V: 未报告结果 R: 未报告结果 对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测试

表1 纳入急救知识评估工具的研究摘要 (n=25) (续)

作者 (出版年份) 国家	设置类型	研究设计	急救知识评估工具	评估工具的目的和目标人 群 (年龄/年级)	工具的结构和内容	结果评估	工具的开发、修订和试点测试	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Rahman et al. ^[35] (2013) 马来西亚	学校	前瞻性干预研究	测试前后的复苏知识和态度	确定心肺复苏培训对 13-15 岁中学生的复苏知识和态度的影响。	S: 25 个条目分为两部分: 18 个知识条目 (4 分制 Likert 量表) 和 7 个态度条目 (4 分制 Likert 量表) C: (1) 与心脏病、心脏骤停的危险因素和心肺复苏术有关的知识; (2) 态度: 与昏倒病人有关的各种情景、在家庭成员中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在学校教授 BLS 和向公众教授 BLS	在第二部分中, 知识领域的总分上限为 72 分; 在第三部分中, 态度领域的总分上限为 28 分	为客观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 作者自行编制了一份调查问卷	V: 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 (未报告结果) R: 内部一致性 (未报告 Cronbach's alpha 系数)
李海兰 ^[36] (2020) 中国	学校	实证研究	中学生心肺复苏知识问卷调查	评估学生对心肺复苏术理论知识掌握情况以及在教学实验前后态度的变化。 (7 年级)	S: 11 个条目 (10 个单项选择题 + 1 个愿意/不愿意/不确定), C: (1) 知识: 心肺复苏最佳抢救时间、心肺复苏流程、复苏体位、胸外按压频率、胸外按压深度、胸外按压部位、气道开放方法、按压与通气比、人工呼吸和吹气成功的标志; (2) 情感态度	未报告	问卷中有关心肺复苏基本知识的问题由红十字会和医务人员共同选定	V: 内容效度 (未报告结果) R: 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大于 0.8
Aaberg et al. ^[37] (2014) 丹麦	学校	前瞻性队列研究	BLS 实践培训课程前后的 10 个条目调查	评估丹麦高中学生目前的 BLS 知识, 以及由初级医生主持的 45 分钟 BLS 实践教学对理论知识、自我评估技能和自我感觉与实施 BLS 有关的恐惧的影响。 (17-21 岁)	S: 10 个条目 (8 个 MCQ + 1 个四点量表 + 1 个视觉模拟量表) C: 问卷包括 BLS 培训历史、BLS 理论的多项选择题和自动体外除颤器知识 (第 1-8 题)、自我评估技能 (第 9 题) 以及自我感觉对成为 OHCA 患者第一响应者的恐惧 (第 10 题)	未报告	未报告	V: 内容效度 (未报告结果) R: 重测可靠性 (未报告结果)
急症 Ezeala-Adikaibe et al. ^[38] (2013) 尼日利亚	学校	横断面研究	定制设计的多选题问卷	了解初中/高中学生对癫痫及其治疗的认识和态度。 (10 至 19 岁)	S: 18 个条目。知识问题 (是/否) 和态度问题 (MCQ) C: 有关癫痫的一般信息、对癫痫的认识和看法、癫痫发作的治疗以及对癫痫患者的态度	四个选项的评分如下 SA-4、A-3、D-2 和 SD-1。对态度的总分进行排序并转换成百分比。高于和低于中位数的分数分别被归类为积极和消极态度	在两名调查员 (EAB 和 AJU) 的指导下, 调查员自行发放了问卷, 并在宣传讲座开始前收集了问卷	R: 信度指数 (KR-20) 为 0.672。内部一致性: 态度问题的信度 Cronbach's alpha = 0.825
创伤 杨昆鹏 ^[23] (2016) 中国	学校	干预性研究	关于中小學生骨折情况的调查问卷	深圳地区中小学生的骨折风险认知和行为。 (8-18 岁)	S: 43 个条目 (42 个 MCQ + 1 个是/否) C: 骨折判断和急救; 骨折的危险行为; 对骨折的态度和行为	未报告	预调查检验了条目设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R: 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 0.8402

表1 纳入急救知识评估工具的研究摘要 (n=25) (续)

作者 (出版年份) 国家	设置类型	研究设计	急救知识评估工具	评估工具的目的和目标人群 (年龄/年级)	工具的结构和内容	结果评估	工具的开发、修订和试点测试	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Young et al. ^[39] (2014) 中国	学校	横断面研究	牙科创伤知识问卷	评估香港中学生对牙科创伤紧急处理的了解程度。 (美国 7-12 年级加 1 年)	S: 14 个条目 (MCQ) C: 牙外伤知识	答对得 1 分, 答错扣 1 分。 (答对得 1 分, “不知道” 不给分, 答错扣 1 分)。如 果选择了多个答案, 如果答 案不正确, 该题将扣 1 分。)	自行制作了中英文问卷。问卷在 59 名学生中进行了试点测试	V: 表面效度由专家 意见确定; R: 重测信度 (0.88-1)
Young et al. ^[40] (2014) 中国	整群随机对照试验			评估教育海报在提高中学生 牙科创伤应急处理知识 方面的效果。(美国 7-12 年 级加 1 年)				
楼婷 ^[41] (2013) 中国	学校	横断面研究	创伤现场救援知识和技能调查问卷	调查初中生现场创伤救护 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初 中 7 年级学生)	S: 17 个条目 (4 个开放式答案 + 13 个 MCQ) C: 概况、创伤现场救护知识与 技能、创伤现场救护培训现状及 创伤现场救护培训需求	未报告	问题的设计参考了相关资料	V: 内容效度: CVI=0.832 R: 重测可靠性: 皮 尔逊相关性 $r = 0.745$
意外伤害 郭雨 ^[42] (2016) 中国	学校	横断面研究	应急能力问卷	中小学生对应急避险能力现 状评估 (8-16 岁)	S: 24 个条目 (MCQ) C: 自然灾害 (如地震)、意外 事故 (如交通事故、火灾)、公 共卫生事件 (如食物中毒) 和社 会安全事件 (如校园暴力)	每项正确得 1 分, 错误得 0 分, 分值从 0 分到 24 分不 等, 评分标准按百分制计算, 分值越高, 应急能力越强	对问卷进行了预先调查	R: 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 0.643
急救 (两类以上) 王玉晖 ^[43] (2014) 中国	学校	横断面研究	高中生急救知识和技能调查问卷	吉林省吉林市高中生急救 知识与技能现状研究。(年 龄 16.43±2.71 岁)	S: 20 个条目 (15 个单选题 + 5 个填空题) C: 心肺复苏技能、心跳、呼吸 的判断和方法、出血、包扎、骨 折外伤等的处理、触电、中暑、 中毒等日常生活中的急救测试	每题 5 分	参考李文涛等的工具	R: 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 0.793
李然 ^[24] (2017) 中国	学校	干预性研究	安全教育问卷	评估中小学生对安全教育的 现状和需求, 分析安全教育的 干预效果。(8-16 岁)	S: 39 个条目 (MCQ) C: 安全应急基本知识、基本认 知、态度、行为和能力	安全与应急基础知识: 答 对 (2 分), 答错 (0 分)。 基本认知问题: 知道 (2 分)、 知道一些 (1 分) 和不知道 (0 分)。得分越高, 说明 知识掌握得越好。根据得分 比例换算成百分制, 得分分 为三个等级: <60 分、60-80 分、80 分以上	设计参考了相关文献	V: 未报告结果 R: 未报告结果 对可靠性和有效性 进行了测试

表 1 纳入急救知识评估工具的研究摘要 (n=25) (续)

作者 (出版年份) 国家	设置类型	研究设计	急救知识评估工具	评估工具的目的和目标人群 (年龄/年级)	工具的结构和内容	结果评估	工具的开发、修订和试点测试	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Revenuzzi et al. ^[11] (2020) 澳大利亚	学校	整群随机对照研究	急救知识问卷	评估高中生的急救知识。 (未报告年龄)	S: 7 个条目 (MCQ) C: 检查危险、处理出血、优先响应、处理脊柱损伤、处理骨折、处理窒息病人和处理烧伤	知识 (正确计分)	急救知识由 7 个问题进行测量, 这些问题改编自 Lynch 等人 (2006 年) 的文章, 并由专家 (澳大利亚圣约翰救护中心, 澳大利亚急救培训的主要提供者) 进行了内容有效性审查。条目在早期研究进行了试点测试, 总计分具有内部一致性	V: 内容效度 (未报告结果) R: 二分类测试 (Kendall's tau = 0.34, p = 0.47) ; 重复测试可靠性: Cohen's Kappa 范围为 0.31 至 0.47
Deekshitha et al. ^[44] (2018) 印度	学校	横向比较研究	混合知识问卷	评估中学生对急救的认识、态度和实践。(未报告年龄)	S: 28 个条目 (13 个是/否+15 个 MCQ) C: 18 个知识导向条目: 体外出血 (包括鼻衄)、窒息、蛇咬伤、烧伤、癫痫、心肺复苏知识等; 5 个态度导向条目和 5 个实践导向条目	未报告	未报告	V: 经过验证的问卷。 未报告结果

注: 基本生命支持 (Basic Life Support, BLS) ; 结构 (Structure, S) ; 内容 (Content, C) ; 内容效度指数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 Kuder-Richardson 20 系数 (KR-20) ; 心肺复苏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 自动体外除颤器 (Automatic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 ; 紧急医疗服务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EMS) ; 多项选择题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MCQ) ; 有效性 (Validity, V) ; 可靠性 (Reliability, R) ; 单纯按压式心肺复苏 (Hands-only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HOCPR) ; 项目反应理论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 皮尔逊相关系数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3.3 评估工具内容

3.3.1 一般现场救护知识与基础生命支持

总体而言, 15 项工具测量一般现场救护信息, 如紧急医疗服务电话或求救信息。17 项工具测量基础生命知识, 包括 CPR、AED 相关知识和窒息。主要评估学生关于心脏骤停症状 (发绀、呼吸困难、胸痛等) (n=4)、心脏骤停危险因素 (n=4)、既往 CPR 经历 (是否知道 CPR、目睹 CPR、实施 CPR、接受 CPR 培训等) (n=3)、基本生命支持应急响应 (家中/户外有人晕倒等如何做、确保环境安全、判断心脏骤停意识和呼吸) (n=14)、CPR 实施步骤 (胸外按压的深度、开放气道方法、人工呼吸频率等) (n=16)、CPR 效果的评估 (何时停止心肺复苏, 可能的终点) (n=6) 以及对 AED 认知、使用场景、使用步骤和放置地点的相关知识 (n=7)。两项工具评估窒息相关知识, 例如如何去除气道异物 (n=2)。

3.3.2 急症救护相关知识

4 项 (包含多类) 工具测量急症救护知识: 癫痫的救护 (病因、识别、症状) [38] (n=1)、中暑 (预防和处理) [24, 43] (n=2) 和痉挛 [44] (n=1)。

3.3.3 创伤救护相关知识

6 (包含多类) 项工具测量创伤救护知识: 骨折 (判断、症状、处理如搬运) [11, 23, 41, 43] (n=4)、牙外伤 (牙齿断裂、脱落的处理) [39] (n=1) 和出血 (止血、包扎) [11, 41, 43, 44] (n=4)。

3.3.4 意外伤害相关知识

5 项 (包含多类) [11, 24, 42-44] 意外伤害救护知识: 自然灾害 (如地震) (n=2) [24, 42]、事故灾难 (如交通事故、火灾、触电、烧伤等) (n=5)、公共卫生事件 (如食物中毒和一氧化碳中毒) (n=3) 和社会安全事件 (如学校暴力) (n=2)。

3.4 评估工具的信效度

在 23 项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中, 17 项进行了效度检验, 其中 8 项提供了具体数值; 16 项进行了信度检验, 其中 12 项提供了具体数值; 1 项进行了难度检验。研究中对工具的验证较为有限, 仅有 4 项详细记录了问卷验证流程, 6 项在小样本中进行了初步测试, 1 项进行了语义验证。在 17 个测试了效度的工具中, 12 项报告了内容效度, 5 项报告了表面效度, 1 项报告了区分效度, 效度良好。在 16 个有信度检验的工具中, 7 项报告了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C α) 或 KR-20 系数), 其中 1 项低于阈值, 表明内部一致性不足, 其余工具的信度良好。另有 4 项报告了重测信度数值, 1 项报告了分半信度数值。详见表 1。

4 讨论

4.1 现场救护知识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应评价多方面要素

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主要涵盖一般现场救护知识、基础生命支持、急症救护、创伤救护及意外伤害救护等内容, 重点在于救护原则及关键步骤, 如识别、求救和处理等。其中, 17 项工具包含基础生命支持, 6 项工具关注创伤救护, 表明研究者对此两类知识的关注度较高。特别是 CPR/AED 相关知识。OHCA 是全球重要的死亡原因之一^[4], Zheng 等研究表明, 其急救生存链的执行情况不佳——在没有目击者或有旁观者的 OHCA 案例中, 仅 20.3% 的患者接受了目击者心肺复苏, 而由目击者使用 AED 的比例更低, 不到 0.1%^[45]。在专业救援到来前, 由目击者提供早期 CPR 并使用 AED 是提高 OHCA 生存率的关键措施^[4, 46]。这些内容应当被纳入中学生的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 并作为重要评估点。创伤救护评估内容主要包括骨折 (判断、症状、处理如搬运) (n=4)、牙外伤处理 (牙齿断裂、脱落的处理) (n=1) 和出血处置 (止血、包扎) (n=4)。全球每年约有 580 万人死于各种伤害, 其中创伤性伤害尤其值得关注, 目击者及时有效的急救措施能够显著改善创伤患者的预后^[47], 因此应成为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的重点评估内容。Tatebe 等通过 10 道多项选择题评估参与者对创伤急救知识的理解, 结果显示高中生在接受创伤急救课程干预后, 其知识水平有所提升, 尤其是在出血控制、现场安全评估、伤者定位与转移以及减轻心理创伤等方面^[47]。然而, 本综述中的工具在创伤现场评估及心理安抚方面的内容较为匮乏, 未来设计时需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及特定国家或社区的需求^[48]。此外, 急症救护 (如癫痫、中风急救) 和意外伤害救护 (如中毒、车祸、溺水) 在中学生现场救护中也是两个未被充分重视的领域。今后可通过多中心研究或循证实践研究, 进一

步确认这些内容纳入中学生现场救护评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4.2 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的开发方法尚需完善

本研究发现,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构建方法不统一。其中,仅有5项研究^[11,25,26,31,34]通过征集专家意见进行问卷的开发或修订。此外,4项研究未对构建过程进行描述^[27,35,37,44]。而苗晨曦^[28]的研究中,根据梅媛等^[49]制定的“社区居民心肺复苏相关情况调查问卷”自行设计问卷,同时参考《2015美国心脏学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更新版)》^[50]对部分专业心肺复苏知识予以更新,随后问卷经多位专家老师共同审议及预调查后决定可用。合理的构建方法有助于快速挖掘出有效评估指标,可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及效率。因此,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的开发方法尚需进一步完善。建议未来相关研究可基于大数据筛选知识评估指标,并结合德尔菲法对指标体系进行完善,以促进筛选有效评估内容的过程,从而提高问卷的科学性及可行性。

4.3 中学生现场救护评估工具应用前仍需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收集了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在中学生人群中的信效度验证指标。内部一致性系数及重测信度是信度检验的重要指标,Cronbach's α 系数 ≥ 0.78 代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组内相关系数 ≥ 0.70 提示重测信度良好,除郭雨^[42]研制的应急反应能力问卷外,其余评估工具信度良好。17个评估工具进行了效度验证,多采用内容效度、表面效度。另外,结构效度是验证评估维度与理论构念结构同源性的的重要指标,但多数评估工具并未在中学生人群中进行结构效度检验,有待验证其在中学生人群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26]。此外,校标关联效度(同时效度或预测效度)是工具验证的另一重要指标,然而本研究纳入的工具中并未进行校标关联效度检验。建议工具在临床应用前系统完成信效度验证,除常规外部构念效度检验外,应补充结构效度分析以验证评估维度与理论构念的结构同源性,从而强化心理测量学特征的系统性评估。

5 本综述优势和局限性

本综述依照注册计划进行,着重于质量控制和最小化偏倚。本范围综述纳入了评估单一或多种现场救护知识的工具,识别了五类现场救护所需的通用和特定知识,并指出了现有工具的局限性。这些总结为未来开发和验证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提供了参考,有助于准确评估其知识水平并促进急救教育的有效实施,推动中学生急救实践的发展。

然而,本综述亦存在局限性。首先,排除了未能提供完整形式现场救护知识评估工具的文章(即评估工具未作为补充材料或在引用文献中提供)。其次,综述仅侧重检索文献标题和摘要中的关键词,并且仅纳入了中英文文献。此外,研究仅关注了定量测量工具(如具有明确正确答案的工具),而知识是多维度的,未来可能还需考虑其他数据收集方法,如质性访谈,以实现更全面的评估。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考量中学生的具体特点及现场救护知识的特殊性,以制定合适的评估工具。

6 总结

本研究通过范围综述总结了23项用于评估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的工具,主要评估内容聚焦于基础生命支持和创伤救护知识。然而,大多数工具仍需进一步验证,因此针对中学生现场救护知识评分时需谨慎。未来仍需进一步研究来验证现有工具或开发新的评估工具,确保其具备足够的效度和信度,并体现整体性。建议开展多中心研究,利用大数据筛选评估指标,并结合德尔菲法完善指标体系,评估多维度、多形式现场救护知识的必要性,使工具反映最新的急救科学证据、教育趋势和政策。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包括评估知识类型完善、工具验证或开发新工具,将指导基于证据的急救教育方案和公共卫生实践,有效减少中学生急救知识缺乏带来的风险,提升中学生紧急应对能力和公众健康素养。

参考文献:

- [1] Kwak J, Ok Ahn K, Chan PS. Sex differenc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ype of bystander CPR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J]. Resuscitation plus, 2023, 13: 100342.
- [2] Semeraro F, Wingen S, Schroeder DC, et al. KIDS SAVE LIVES-Three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in Europe[J]. Resuscitation, 2018, 131: e9-e11.
- [3] Singletary EM, Zideman DA, Bendall JC, et al. 2020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First Aid Science With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s[J]. Circulation, 2020, 142(16_suppl_1): S284-S334.
- [4] Myat A, Song KJ, Rea T.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current concepts[J]. Lancet, 2018, 391(10124):

970-979.

- [5] Böttiger BW, Van Aken H. Training children i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worldwide[J]. *Lancet*, 2015, 385(9985): 2353.
- [6] Ko YC, Hsieh MJ, Schnaubelt S, et al. Disparities in layperson resuscitation education: A scoping review[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023, 72: 137-146.
- [7] Lim XMA, Liao WA, Wang W,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Bas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on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Adolescent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2, 24(12): e36423.
- [8] Reveruzzi B, Buckley L, Sheehan M. School-Based First Aid Training Programs: A Systematic Review[J]. *Th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016, 86(4): 266-272.
- [9] Tse E, Plakitsi K, Voulgaris S, et al. Teach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Defibrillation in Children[J]. *Pediatric emergency care*, 2022, 38(9): e1577.
- [10] Böttiger BW, Bossaert LL, Castrén M, et al. Kids Save Lives - ERC position statement on school children education in CPR: "Hands that help - Training children is training for life"[J]. *Resuscitation*, 2016, 105: A1-A3.
- [11] Reveruzzi B, Buckley L, Sheehan M. First aid train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A comparative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 2020, 75: 32-40.
- [12] Zenani NE, Bello B, Molekodi M, et al. Effectiveness of school-based CPR training among adolescents to enhanc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CPR: A systematic review[J]. *Curationis*, 2022, 45(1): e1-e9.
- [13] Stroobants J, Monsieurs K, Devriendt B, et al. Schoolchildren as BLS instructors for relatives and friends: Impact on attitude towards bystander CPR[J]. *Resuscitation*, 2014, 85(12): 1769-1774.
- [14] Tse E, Plakitsi K, Voulgaris S, et al. The Role of a First Aid Training Program for Young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J]. *Children (Basel, Switzerland)*, 2023, 10(3): 431.
- [15] 叶镱, 余杨, 蔡阳林, 等. 开展高质量同质化 CPR 培训对中学生 CPR 专业知识认知度的影响分析[J]. *广州医科大学学报*, 2022, 50(01): 112-115.
- [16] 程玉红, 黄榕, 殷婷婷, 等. 厦门市高中学生心肺复苏知识掌握现状调查及干预效果[J]. *护理研究*, 2018, 32(16): 2641-2643.
- [17] 陈镭, 杨桂丽, 毛紫娟. 温州市初中学生安全与急救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21, 37(04): 457-460.
- [18] 李囡. 微课在咸阳市农村中学生应急救护教育中的应用研究[D]. 陕西: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2021.
- [19] Urbina Rojas YE, Leiton-Espinoza ZE, López-González A, et al. Development and semantic validation of an instrument for the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 adolescents[J]. *Investigacion & Educacion en Enfermeria*, 2022, 40(1): 201-211.
- [20] Gradwohl E, Lukács Á J, Takács J,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resuscitation-related knowledge and attitude for adolescents[J].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023, 100: 102338.
- [21] Peters MDJ, Marnie C, Tricco AC, et al. Update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duct of scoping reviews[J]. *JBIM Evid Synth*, 2020, 18(10): 2119-2126.
- [22] Tricco AC, Lillie E, Zarin W, et al. PRISMA Extension for Scoping Reviews (PRISMA-ScR): Checklist and Explanation[J]. *Ann Intern Med*, 2018, 169(7): 467-473.
- [23] 杨昆鹏. 深圳市中小学生骨折发生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短期干预效果的研究[D]. 广东: 汕头大学, 2016.
- [24] 李然. 郑州市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现状及干预效果研究[D]. 河南: 郑州大学, 2017.
- [25] Calvo-Francés F, Cilleros-Pino L, Barraza-Illanes PA,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knowledge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of th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program in high school students[J]. *Medicine*, 2023, 102(42): e34609.
- [26] Koca B, Bayram B, Pakdemirli A, et 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pr training methods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A randomized trial[J]. *Current Psychology: A Journal for Diverse Perspectives on Diverse Psychological Issues*, 2022, 41(10): 7049-7058.

- [27] Tsai MF, Wang LH, Lin MS, et al. What do adolescents learn from a 50 minut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education in a rural area: A pre-post desig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6): 1053.
- [28] 苗晨曦. 长春市 960 名中学生对院外心肺复苏术认知状况的调查分析[D]. 吉林:长春中医药大学,2019.
- [29] 赵玉兰. 青少年校园急救知信行的教育干预研究[D]. 山东:山东大学,2018.
- [30] Pivač S, Gradišek P, Skela-Savič B. The impact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training on schoolchildren and their CPR knowledge, attitudes toward CPR,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others and to perform CPR: mixed methods research design[J]. *BMC public health*, 2020, 20(1): 915.
- [31] Schmid KM, García RQ, Fernandez MM, et al. Teaching Hands-Only CPR in Schools: A Program Evaluation in San José, Costa Rica[J]. *Annals of global health*, 2018, 84(4): 612-617.
- [32] Ma AWW, Wong KL, Tou AYL, et al. CPR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ged 15-16 in Hong Kong[J]. *Hong Kong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015, 22(1): 3-13.
- [33] So KY, Ko HF, Tsui CSY, et al. Brief compression-only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course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 multischool feasibility study[J]. *BMJ open*, 2020, 10(10): e040469.
- [34] 叶卓荪, 梅玲明. 三门县 2017-2018 年高中生心肺复苏知识和认知状况调查[J]. *中国乡村医药*, 2019, 26(17): 53-54.
- [35] Rahman NH, Keng Sheng C, Kamauzaman TH, et al. A multicenter controlled trial on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bout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mong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in Malay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013, 6(1): 37.
- [36] 李海兰. 初中体育与健康课程引入心肺复苏知识与技能内容的实证研究[D]. 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20.
- [37] Aaberg AM, Larsen CE, Rasmussen BS, et al. Basic life support knowledge, self-reported skills and fears in Danish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effect of a single 45-min training session run by junior doctors;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trauma, resuscitation and emergency medicine*, 2014, 22: 24.
- [38] Ezeala-Adikaibe BA, Achor JU, Onwukwe J, et al.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towards epilepsy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Enugu, South East Nigeria[J]. *Seizure*, 2013, 22(4): 299-302.
- [39] Young C, Wong KY, Cheung LK. A survey o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knowledg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dental trauma[J]. *PloS one*, 2014, 9(1): e84406.
- [40] Young C, Wong KY, Cheung LK.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poster on knowledg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dental trauma - Part 2: Cluster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J]. *PloS one*, 2014, 9(8): e101972.
- [41] 楼婷. 初中生创伤现场救护能力研究——以遵义市为例[D]. 贵州:遵义医学院,2013.
- [42] 郭雨. 离异家庭中小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避险能力与家庭教养方式相关性研究[D]. 辽宁:锦州医科大学,2016.
- [43] 王玉晖. 吉林省城市 1481 名高中生急救知识与急救技能现况调查分析与对策[D]. 吉林:吉林大学,2014.
- [44] Deekshitha P, Dhivya K, Pravalika S, et al. Evaluation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n first aid measures among students[J]. *In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8, 9(10): 50-56.
- [45] Zheng J, Lv C, Zheng W, et al. Incidence, process of care, and outcomes of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in China: a prospective study of the BASIC-OHCA registry[J]. *Lancet Public Health*, 2023, 8(12): e923-e932.
- [46] Hewett Brumberg EK, Douma MJ, Alibertis K, et al. 2024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nd American Red Cross Guidelines for First Aid[J]. *Circulation*, 2024, 150(24): e519-e579.
- [47] Tatebe L, Speedy S, Kang D, et al. Empowering Bystanders to Intervene: Trauma Responders Unify to Empower (TRUE) Communities[J]. *The Journal of surgical research*, 2019, 238: 255-264.
- [48] Satchell E, Carey M, Dicker B, et al. Family & bystander experiences of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s care: a scoping review[J]. *BMC emergency medicine*, 2023, 23(1): 68.
- [49] 梅媛. 长沙市居民心肺复苏知信行现状及培训效果研究[D]. 湖南:中南大学,2013.
- [50] Neumar RW, Shuster M, Callaway CW, et al. Part 1: Executive Summary: 2015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Guidelines Update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J]. *Circulation*, 2015, 132(18 Suppl 2): S315-S367.

First aid knowledge assessment tools for Middle and High School Aged Adolescents: a scoping review

Jiaxin Liu¹, Deyu Liu¹, Qin Han², Lutong Pan³, Liping Zhao⁴

¹ Xiangya School of Nurs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² College of Health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China

³ Tsinghu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 Shenzhen, China

⁴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s a high-risk group for injury incidents, require an assessment of their first aid knowledge level. This study aims to summariz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ssessment tools for first aid knowledge amo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validation, and use of these tool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s guidelines for scoping reviews, seven common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with a time rang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April 25, 2024. Article screening was independently completed by two researchers. Included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assessment tools for first-aid knowledge amo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follows the PRISMA-ScR checklist. **Results:** A total of 9,549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and after screening, 25 article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23 tools for assessing first aid knowledge amo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se tools primarily assess knowledge related to general first aid, basic life support, emergency care, trauma care, and accident injury care. The studies test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tools but often lacked detaile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some studies did not report specific values. **Conclusion:** Currently, the 23 assessment tools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irst aid knowledge mainly focus on evaluating basic life support and trauma first aid knowledge, but most of these tools have limitations in content and methodology.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developing assessment tools with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ll be the focus of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Knowledge; Assessment tools; A scoping review; First aid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510

不甘平凡的“浪荡子”——阿尔蒂尔·兰波及其诗歌当中的“反叛”元素

许 昌^{1,2}

(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² 巴黎索邦大学, 法国, 巴黎 310029)

摘要: 阿尔蒂尔·兰波 (1854-1891) 在文学长河中的“浪荡”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作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他有着不肯固步自封、不愿向传统低头的反叛精神。他鄙视一些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的行为与创作, 并希望通过他的诗歌与切身行动来向世人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通过从兰波的“逃离情怀”、诗歌相比于传统的“创新性”等方面入手, 兰波这位伟大诗人的人生及其诗歌创作中的“反叛”元素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读。

关键词: 兰波; 反叛; 不羁; 人生; 诗歌创作

引 言

宛若一颗流星划过群星斑斓的夜空, 兰波用他短短的 37 年人生为法国乃至世界文学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 19 世纪象征主义流派诗歌代表人物的兰波, 其影响力早已波及诸如超现实主义的其它文学流派, 他人生及其创作中的“反叛”色彩在反传统文学的画卷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痕迹。出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他自幼聪颖过人, 并深受老师们的赏识。一方面, 1870 年的普法战争时期, 他曾几度离家出走, 并通过一系列的书信往来和他的老师阐明自己“流浪”情怀的原因。最后, 他选择“逃离”自己的家乡: 沙勒维尔, 前往原始、人迹罕至却又自然真实的非洲大陆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这种极度个性的反叛之举值得我们去深思。此外, 在他的诗歌创作中, 他不局限于把自己框在“象征主义”的流派之内, 而是更多地在诗歌中去充当一个“通灵者”的角色。作为波德莱尔的完美继承者, 他富有想象力的诗歌当中融合了诸多的感官体验, 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与读者内心交织在一块的独特的阅读体验让其与传统的诗歌作品在风格和内容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匠心独具的诗歌创作也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挖掘的另一面。

一、不愿被束缚的“骄子”: 兰波人生中的“逃离”情怀

兰波的“逃离”情怀早在兰波青少年时期就已形成, 作为一个早熟的天才, 兰波从小就展现出一种不同于同龄人的叛逆感。他不“安分守己”, 很早就对家乡以外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兰波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性格, 一方面是天性使然, 另一方面也和他的家庭情况密不可分: 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兰波, 从小的家庭生活过得并不算十分幸福, 父母关系不和睦, 经常因为一些琐碎的事而争吵, 父亲因此而离家出走, 抛下了年幼的兰波与家庭, 父亲走后, 母亲变得专横霸道, 由此严厉而又缺乏温情的母亲陪伴着兰波走完了人生中最关键的童年时期, 这样一种形象的母亲的陪伴让兰波觉得窒息与压抑……这样的童年经历无疑给兰波往后反叛性格的形成埋下了伏笔。终于青春期的到来让悸动、焦躁不安的兰波因忍受不了这种生活环境而彻底爆发, 此时的他只渴望能尽早“逃离”这个让他感到压抑的地方与环境。在《感觉》这首诗中, 兰波曾明确表明了自己渴望自由, 想要逃离的心愿:

项目基金: 2024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后现代主义视角下欧仁·尤涅斯库戏剧作品中的“反美学”因子探析 (项目编号: 24GWCXXM-052);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408440417);

作者简介: 许昌 (1995-), 男, 汉族, 湖南长沙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巴黎索邦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等。

夏日蓝色的傍晚，我将踏上小径，
拨开尖尖麦芒，穿越青青草地：
梦想家，我从脚底感受到梦的清晰。
我的光头上，凉风习习。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
无尽的爱却涌入我的灵魂，
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
与自然相伴——快乐得如身边有位女郎。²

我们可以从时态与意象两个方面来对兰波的“逃离”精神进行解读。在法语原版诗歌中，作者采用的是将来时态，这表达了兰波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他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通过诗语记录了下来，并赋予其生命力，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具体而又生动的画面。诗人仿佛遇见了自己的未来，那田园牧歌似的生活正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他想与大自然作伴，过着像波西米亚人一般无忧无虑的生活。面对美好事物的吸引，诗人仿佛已听到召唤，时刻准备着出发。兰波对于大自然仿佛天生就具有一种好感，他认为他“流浪”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回到自然、从而回归到一种思想与肉体上的纯粹状态：尖尖的麦芒搔动着他的身躯，青青的草地承载着他的自由灵魂与对未来无限的渴望，梦想与现实不同，因为前者是不需要言传的，此时的内心只需要做到完全接纳这份美妙就好，因为灵魂正等着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也会发现，兰波的生活年代正好处于波西米亚思潮的黄金时期，在波西米亚人身上承载着那个时期所有有着浪荡子情怀的一批文艺青年渴望流浪、渴望逃离现世生活的强烈感情。而兰波则是这类人的最佳代表之一，他鄙视资产阶级，对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感到措手不及，内心的排外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积聚了下来。兰波的离经叛道、放浪形骸让他在中学时代就引起了足够的关注。他曾经三次通过逃票乘火车逃出沙勒维尔，却被老师和家人“捉回”。

终于在1871年，他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并前往巴黎去寻找他的“理想国”。在那儿，他认识了很多文艺界的上层名流，并结交了当时颇有盛名的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此后，他与魏尔伦的相恋则更加印证了他骨子里所蕴涵的反叛精神。在当时看来，同性之间的恋情是不可思议的，甚至都会被打上“变态”的称号，但是他们俩却又无反顾地在了一起。当时巴黎上层阶级的文人都以他们为耻，并想法设法地排挤他们，但兰波却不以为然，丝毫未受影响，相反，他选择去鄙视这些墨守成规、思想僵化的文人墨客。相爱的兰波与魏尔伦互诉情意，混迹于肮脏的小酒馆，写着露骨的情诗.....

几年之后，他所做的一件事又让所有人为之汗颜，那就是他选择彻底放下诗歌并离开法国本土前往遥远而又神秘的非洲大陆，去追寻内心向往已久的“非洲梦”。作为本世纪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的兰波竟然在自己人生最为辉煌灿烂，前途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选择了放弃了自己在创作领域的天赋，并与诗歌彻底决裂。这样子的行为想必在整个法国文学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像这种大胆的决定如果没有内心强大的反叛意识来作为支撑，一般人无法做到。在非洲，兰波曾和骆驼商队穿过撒哈拉沙漠，之后又开始了武器贸易...在非洲大地的各处都留下了这位曾经耀眼的诗人的脚印，面对艰苦的环境，他不曾退缩，以至于后来身体健康出现异样，他也不选择离开，而是继续待在非洲这个让他心旷神怡的地方。

兰波曾说过：“生活在别处”，他恰好也是这样去实践的。他是如此不甘于被恶意的平庸生活所围困，以致于他要不断地出发，去“到新的爱与新的喧闹当中”去。³在兰波的身上仿佛有种“执念”，他对现世生活中的一种看似虚无缥缈却又十分纯粹的东西特别着迷，并为此付出了一生，在他的《永恒》中，兰波曾写道：“终于找到了！/什么？永恒。那是苍海，融入太阳。”⁴他的执念铸就了他的反叛，他的反叛又反过来加深了他的执念。总之，兰波的一生都是在“反叛”中度过的，他用他的行动为我们展示了他的“逃离”意识与不屈从于现实的反抗精神。

二、“反传统”的样式：兰波诗歌中的“创新”因子

兰波诗歌中的“创新性”首先体现在诗歌格式的创新上，这是对绝对的现代性的展现。传统的诗歌多采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格式，而兰波诗歌中的十四行诗大多采用彼特拉克的格式，即4433的结构。但是兰波又不完全满足于传统的样式，以代表作：《元音》为例，兰波在彼特拉克诗体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即将本诗在音韵上调整为“ABBABAABFFDCDC”的结构。首先在音韵上，一方面变化性增强了，另一方面音

² [法]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0。

³ [法]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241。

⁴ [法]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诗全集》，葛雷，梁栋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210。

律感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样的创新让这首诗歌从头至尾都显得流畅自如，宛如一首动听的乐曲。通常而言十四行诗体多用于一些情诗的创作，这些情诗累赘繁琐，显得毫无新意。但是这种诗体在兰波的笔下却活了起来，我们看到了兰波的新意，他仿佛就像一名文字炼金师，这种最为传统的诗歌格式在他诗语的陪衬下亦成了其表达自己反叛诗歌创作观念的工具。

其次，兰波诗歌中的“创新性”体现在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无限而又磅礴的想象力之上。在兰波看来，在一些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中间都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联系，只是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去感受它。在《元音》中，看似毫无生机的字母却和视觉感官建立了一种联系。兰波眼中的字母竟然活了起来，变得五彩缤纷：“A 黑、E 白、I 红、U 绿、O 蓝：元音们，有一天我要泄露你们秘密的起源……”⁵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这些字母怎么会和颜色有关联，但将元音字母与颜色串联起来的正是隐藏在兰波灵魂里的一套庞大的象征主义体系。事实上，兰波选择这些元音来探析其中的象征意义是别有用意的。我们知道，相较于辅音，元音在一个单词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离开了元音，语言的音律感将会消失，此时的语言将变得不再动听，而语言通达交流的功用也将会消失。元音字母在“想象力”的指引下，穿梭于兰波的时空观之中，这些元音字母仿佛插上了隐形的翅膀，闪烁在读者的眼前，形成一幅难以置信的画面：字母 A 化作了围绕阴暗的海岸嗡嗡乱飞的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蝇虫；E 则成了纯粹与圣洁的代表，仿若白色的小花在雾气中微微颤动；I 披上了一层红袍，在怒火中忏悔与微笑；U 成为了神秘的化身，隐匿着勤奋的和平；而 O 则是紫蓝色的，如天使般静默却又如号角般刺耳锐利……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幅迷狂式的图景超越了我们生存的现实环境，兰波用他“磅礴”的想象力为我们开辟一个不一样的新世界。

再之，兰波诗歌中的“创新性”与其中强大的“反叛性”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怎么去追溯兰波诗歌中所蕴涵的“反叛性”呢？一方面，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会发现兰波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兰西正处于极度动荡时期，封建政府与资产阶级政权轮番交替，这让一些的文人的思维也变得极度活跃起来，旧的思想与古典的文学范式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文人墨客的需要，并成为其抒发己见的工具了。另一方面理性思潮在文坛上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旧的文化体系在受到质疑的同时，在艺术家们灵魂深处，一种恐慌与叛逆的情绪在酝酿着。

另一方面，关于尼采的“超人哲学”对于兰波及其诗歌中的反叛性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亦是值得我们去商榷的。兰波用他的人生给我们塑造的形象无疑是反叛与抗争的，这种形象与尼采的“超人形象”不谋而合：反宗教、反科学、渴望找寻远古以来就已失去的自由。兰波急于打开被时代所禁锢的枷锁，并逐步实现对于自身与所处时代的超越。在《地狱一季》中，兰波的“反叛”意识显得尤为明显：“我闻到了异端的焦味，确实无疑。”“地狱不能控告异教徒。”“往后，下地狱将变成一种更深的乐趣。”⁶面对火刑的威胁，诗人不为所动，并做好了觉悟，连最可怕的地狱之刑在诗人眼中却成为了一种乐趣，这是由“反抗”与“叛逆”所带来的乐趣，乐趣与激情在此时掩盖了恐惧与焦虑…这短短的几句诗凝聚着诗人诗歌中的反叛意识，十分具有代表性。在这个时代，诗人是一个流浪者，他的思想漂泊而无定所，不受宗教的制约，也不屑于尊崇传统给其设定的条条框框，相反，他信奉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并从未动摇，他坚信着总有一天自己将会达到自己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再来谈谈兰波的名作：《醉舟》，这部作品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颠覆传统感官的视听盛宴，他新的诗歌创作理念在本诗中一览无余。在《醉舟》中，诗人给我们造成了一种感官错乱的感受。颜色在本诗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彩色的支柱”、“甜蜜的绿波”、“蓝色的酒迹”、“乳白色的吞没青天”、“白鸽”、“紫色的凝滞的低垂的太阳”、“绿色的夜晚”、“黄蓝相间的欢腾”、“青绿色的马群”、“银白色的阳光”、“棕色海湾”、“金色的鱼”、“黄色吸盘”、“金黄色的眼睛”、“紫色的轻雾”、“淡红色的空际”、“碧蓝色的鼻涕”…首先，全诗大量地出现了关于颜色描绘的运用，这为我们塑造了一副色彩缤纷的画面。其次，逻辑的跳跃性与随机性亦成为了本诗的另一大亮点。想象力则在传递嗅觉、听觉与视觉之间冲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诗人笔下的意象囊括万物，这些意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但又区分于通常意义上所存在的意象。在兰波的描绘下，每一个意象都显得独具特色，比如说，兰波在《醉舟》中将海浪比作“碧蓝色的鼻涕”，乍一看，这样的比拟似乎有些恶心，但兰波恰好是选用了一种传统诗人一般所不会用到的描绘方式去解读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再常见不过的意象，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我们会发觉，想象力是一切能力的皇后。而在以兰波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笔下的意象则披上了卓越“想象力”的外衣，变得闪闪发光，我们需要突破这层光芒去感受其中所隐含的精华。

⁵ 飞白：《世界诗库：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343。

⁶ 飞白：《世界诗库：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194。

以波德莱尔和兰波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所认为的在诗歌创作中最为核心理念就是：“déchiffrer les signes”即对意象的“解码”。兰波笔下的意象在色彩的映衬下仿佛会随着阳光的渐弱渐强而散射开来，从而进入到读者的味蕾与鼻腔，与视觉一道形成共鸣。碧绿色的大海在兰波的描绘之下却成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读者在这种美好与混乱中感受着兰波想象力的癫狂，可大脑在一片混沌之中逐渐变得明晰起来...这些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因为我们对于诗歌阅读的体验不会再随着诗人的文字而愈发清晰，相反，一种错乱迷离的阅读感受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新意、一种不同于传统诗歌所带来的阅读感受。

结 语

同为象征主义代表作家的马拉美曾这样评价兰波：“他像一颗流星，倏然出现，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光源，他的出现也是他的泯灭。但确定无疑，他一旦出现，就将永存...”⁷兰波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对诗歌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兰波用他“反叛”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象征主义诗歌背后的无限“潜力”与强大的“精神号召力”。一方面，“兰波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鼓起勇气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去追寻精神上的洒脱与自由，另一方面，作为“反抗”的产物的兰波诗歌，散发着反理性的“光”与“热”，给法国乃至世界诗歌的长河注入了一股清泉。

参考文献：

- Bonnefoy. L'innachevable: Entretiens sur la poésie (1990-2010). Paris: Albin Michel, 2010.
 Baronian J. Dictionnaire Rimbaud, coll. Bouquins. Paris: Robert Laffont, 2014.
 Delattre L. Le Déséquilibre mental d'Arthur Rimbaud (1854-1891). Paris : Librairie le François, 1928.
 傅华.《谱系、形象与病的隐喻——当代诗歌对兰波的接受与过滤》. 当代文坛, 2014 (01): 102-106.
 林晓筱.《愚人船上的渡客——兰波和吉姆·莫里森》. 书城, 2014 (01): 87-94.
 乔琦.《形式反叛、自由精神与诗性功能——理解李国辉〈风行〉杂志与象征主义自由诗的三个关键词》. 台州学院学报, 2023, (04): 80-83.
 尚笑, 郑丽娜.《盗火:兰波诗歌创作中的反叛意识与自由精神》.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02): 92-95.
 于晓蕾.《兰波与革命》. 博士学位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 2013.
 王梦笛.《张炜与兰波作品中的神秘因素比较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2023.

A Vagrant unreconciled to the Ordinary ---Arthur Rimbaud and the Elements of rebellion in his Poems

XU Chang^{1,2}

¹Faculty of European Languages & Cultur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²Center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Sorbonne University, Paris

Abstract : The image of a vagrant for Arthur Rimbaud (1854-1891) has been craved deep in many people's hear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modern and temporary french literature, Rimbaud possesses a spirit of not standing still and not being willing to be resigned to the tradition. He looks down upon the standard and prescribed creation of literature, on the contrary, Rimbaud wishes to express his attitude towards life by his poems and action. To start with some aspects like “the feelings of escaping” of Rimbaud and “the creativity of Rimbaud's poems in comparaison with the traditional ones”, the legendary life of Rimbaud and the elements of rebellion in his poems can be explained in a profounder way.

Keywords : Arthur Rimbaud ; rebellion ; vagrant ; life ; creations of poems.

⁷ [法]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诗全集》. 葛雷, 梁栋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 287.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01

节外生枝，归于原线：漫威电影宇宙的叙事逻辑与现实映照研究

曹一君¹ 陈立立¹

(¹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广东 廉江 524400)

摘要: 本文探讨了漫威超级英雄电影的类型特点和叙事逻辑, 分析了其如何通过“节外生枝, 归于原线”的叙事结构塑造观众的观影体验, 并揭示了这类电影中平凡与英雄主义的结合。文章还探讨了漫威电影中人物塑造的立体性以及反派角色的复杂性。最后, 结合当前社会背景, 讨论了漫威电影在传递现实问题意识方面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漫威电影宇宙; 超级英雄; 叙事结构; 人物塑造; 现实主义

一、叙事结构分析：节外生枝与回归原线的逻辑

一直以来, 科幻类型的电影深受广大青年观影者的喜爱, 笔者也不例外。在科幻电影里面, 漫威超级英雄系列可谓是历史悠久, 从 2008 年的《钢铁侠》开始, 漫威电影宇宙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其中包括 2008 年《钢铁侠》、《无敌浩克》, 2010 年《钢铁侠 2》, 2011 年《雷神》、《美国队长: 复仇者先锋》, 2012 年《复仇者联盟》, 2013 年《钢铁侠 3》、《雷神 2: 黑暗世界》, 2014 年《美国队长 2: 冬日战士》、《银河护卫队》, 2015 年《复仇者联盟 2: 奥创纪元》、《蚁人》, 2016 年《美国队长 3: 内战》, 2017 年《银河护卫队 2》、《蜘蛛侠: 英雄归来》、《雷神 3: 诸神黄昏》, 2018 年《黑豹》、《复仇者联盟: 无限战争》、《蚁人 2: 黄蜂女现身》, 2019 年《惊奇队长》、《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蜘蛛侠: 英雄远征》, 2021 年《黑寡妇》等等。

超级英雄系列的电影寄托了人们对英雄的期待和崇拜, 成为无数孩子童年的向往。超级英雄们无数次拯救陷入危难的地球甚至是宇宙, 在没有发生世界危机的时候, 又大隐隐于市。今时今日, 谈一谈超级英雄, 似乎是应景的。在日本向全球宣布排放核废水, 全民陷入核恐慌的今日, 我们担忧地球未来的状况, 却无可奈何。此时, 多么希望出现一位超级英雄, 像电影里无数次上演的那样, 酷炫的拯救地球于危难的边缘。

漫威是一系列非常伟大的电影, 它集中了许许多多关于宇宙的宏观思考, 有着一套独特的世界观。在漫威体系里面, 宇宙是可以自由穿梭的, 每一颗星球像城市一样可以到达, 且有着生命体, 每颗星球又像一个个国家, 有着自己的生态文明、领导者和文化。在漫威体系里面, 也有许许多多关于时间线的思考, 时间线是否可以穿梭, 时间是单线进行还是双线进行, 时间在不同的量子领域是否保持一致, 原子结构领域是否存在微小的生命体, 微小的生命体是否拥有它们的历史和文明, 以及诸多关于能源、基因、变异、民族色彩、原始崇拜等的思考。漫威系列电影体现了对诸多问题的种种思考, 并且以电影情节的发展来体现这种思考。总体而言, 漫威系列将英雄与宇宙宏观问题联系, 但是又让每一位超级英雄保持着绝对的人性色彩, 没有完全绝对的神化, 笔者认为这也可以算是对古希腊人神同性的一种致敬。在跌宕起伏的毁灭危机边缘, 依旧用人类的幽默让观众忍俊不禁, 也用人类的真善美让观众落泪。因此, 今日来谈一谈, 这类电影的共同特点。

作者简介: 陈立立(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通讯作者: 曹一君(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首先,一个最大的特点,超级英雄类型的科幻电影,无论具体的故事走向如何,它一定遵循一个原则,“节外生枝,归于原线”。何谓“节外生枝,归于原线”,这是笔者结合自己的思考总结出来的一个要点。

先解释“节外生枝”,我们的世界和宇宙原本是按照一切正常的形态进行的,电影必须要从这种正常形态里面创设出非常规的事件,这种事件可以是出现生物公司研发基因工程失败,意外创造出了会毁灭世界的物种,也可以是出现某个星球的野蛮物种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要入侵全宇宙,也可以是出现了灭霸这样强大的极端主义者,想要收集足够的原石再打一个响指,让宇宙一半的人消失为世界减负。这样的“节外生枝”就为超级英雄的出现做足了铺垫。“节外生枝”之后就是“归于原线”,既超级英雄如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是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把这种节外生枝的事件扼杀于摇篮,或者通过扭转时间回到过去,把节外生枝的事件扼杀于摇篮,取消节外生枝的事件对世界发展方向的主导作用,让一切事物归于原本正常的情况。

这种设置方式的美妙之处在于非常符合逻辑,足以让观众产生对超级英雄的信仰与崇拜,因为也许在昨天晚上我熟睡的时候,世界正陷入毁灭的危机,但是有超级英雄已经摆平了这种麻烦,所以今天早晨,我依旧如往常一样正常的醒来了。本来是平凡的日子,也许本来也只有平凡的日子,但是观众相信,这种平凡也许无数次遭遇动荡,在无数不为人知的时刻,超级英雄们守护了这种平凡。

掌握了这个思路,编导和作家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和喜好创设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人物,创设好“节外生枝”的事件,引入超级英雄的出场,根据具体的节外生枝事件设置具体的拯救世界方法,然后使一切归于主线,守护平凡。这便是科幻英雄电影的底层逻辑,各电影的亮点则因“节外生枝”事件和解决危机的途径所体现的理念而不同。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超级英雄电影里传递出的最隐秘、最深层的信息是,平凡足以可贵,珍惜每一个的今日。

掌握了这类电影的底层思路,我们再来看看情节的塑造。拯救全人类和全宇宙,听起来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宏观的事情。但是由于底层思路中节外生枝事件的创设,拯救世界也就有了着力点。节外生枝的事件是具体的,有了具体的事件目标,拯救世界的内容随之具体化。有时候是拿到某个盒子,有时候是按下某个按钮,有时候是阻止某个事件的发生,终止某个事件的进程。但这具体的内容也绝不简单,超级英雄也得拼的丢盔弃甲、头破血流,争分夺秒,最后在千钧一发之际取得成功,如此才足以构成电影的高潮部分。

二、人物塑造的立体性:英雄与反派的复杂性

我们来说说电影的人物塑造。漫威的超级英雄系列人物塑造都非常的立体饱满,其他系列的超级英雄电影也大差不差。这种饱满体现在英雄不是完美的英雄,坏蛋也不是十足的坏蛋。超级英雄们一开始也不是绝对的勇敢,也受到情感的牵绊,会拌嘴,会吵架,会嫉妒,会自恋,会臭屁,甚至是某些社会边缘人物,带一定的反社会属性。在武力值方面,也并不是十分的强大,在和反面角色斗争的时候,第一回合往往被揍的体无完肤。也因为这种设定贡献出了无数名场面,超级英雄们上一秒刚刚威武勇猛地喊出战斗宣言,下一秒就狼狈的被甩出十里地外。而且超级英雄们并非不死不灭,即使他们拥有超能力,也一样面临死亡和衰老,一样对亲人好友的生离死别束手无策。即使是拯救世界的大英雄,时间和死神也并没有给他们特别的优待,他们也要学会释怀和往前走,这是超级英雄们更具有英雄色彩的一面,并且这种传奇更加指向现实。

而反面角色也并不是十足的坏蛋,不是完美的施暴者。灭霸想要灭亡一半的人类,是因为觉得资源有限,人类太多,因此引发诸多斗争和不公,它固执认为消灭一半的人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在新出的《银河护卫队3》中,拿浣熊等小动物去做研发的基因研发集团是因为觉得人类这个物种充满野蛮和杀戮,希望通过加速进化小动物的工程,研发出纯善良的乌托邦物种,来组建一个没有杀戮的世界。反派的很多想法其实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会产生,他们的初心也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三、现实问题的隐喻与批判:超级英雄电影的社会价值

这里也传递出一个理念,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可能也仅仅是因为一个思想上的出发点错误导致。笔者也是非常认同李诞在综艺《奇葩说》中关于“美术馆失火,救猫还是救画”的辩论总结。正是有一群人,总是觉得存在一些遥远的哭声,需要自己去拯救,而导致我们的世界频频陷入大火。回到电影中,这种反派的设定也往往让电影多了一些令人动容的地方。

正是一系列的情节设置和人物构建,使得这类型的电影带给观众综合的观影体验,笑中带泪,又觉得回味无穷,引发思考,也呼吁了人们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关注。

四、参考文献

- [1]张婕妤.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中的角色塑造与明星神话——“邪神洛基”及其饰演者汤姆·希德勒斯顿[J].戏剧之家,2024,(07):122-124.
- [2]张婉言.漫威电影的跨媒介叙事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23.DOI:10.27422/d.cnki.gxzf.2023.000358.
- [3]康金阳,陈运金.信息传播中的“后真相”症候研究——以漫威电影为例[J].文化学刊,2024,(02):100-103.
- [4]李凌凌,王子健.“漫威电影宇宙”:构设逻辑与经验启示[J].电影文学,2023,(04):44-49.
- [5]任彤婕.漫威系列电影的叙事空间[J].西部广播电视,2022,43(15):90-92.
- [6]吕铁金.漫威系列影片的英雄叙事维度与具象符号[J].电影文学,2021,(19):92-94.

To rock the boat and return to the original line: a study on the narrative logic and realistic reflection of Marvel's film universe

YIJUN CAO¹, LILI CHEN¹

¹ Affiliation,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ianjiang, Guangdo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nre characteristics and narrative logic of Marvel superhero movies, analyzes how it shapes the audience's viewing experience through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adding complications and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line", and reveals the combination of ordinary and heroism in this kind of movie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ization in Marvel Comics's films and the complexity of villain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ocial background, the unique value of Marvel Comics's films in conve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realistic problems is discussed.

Keywords: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Superheroes, Narrative structure, Character development, Realism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640

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践策略 ——以贵州“村超”足球赛为例

杨雅馨¹, 于晖¹, 周欣芸¹, 姜岩¹

(¹ 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天津, 300392)

摘要: 本研究以贵州“村超”足球赛为切入点, 深入剖析了民俗与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通过对政策支持、民族文化融合、新媒体传播、群众参与及经济效益等一系列核心要素的理解与分析, 进一步揭示乡村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研究发现, 民俗与体育的深度融合、政府的引导作用、自媒体的放大效应以及群众的主体性参与是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通过剖析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动力机制, 发掘实践策略, 进一步为其他地区民俗体育文化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民俗体育文化; 贵州“村超”足球赛; 文化传承; 乡村振兴; 动力机制; 实践策略

1. 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 体育与民俗文化的耦合, 成为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赓续民族文化血脉的创新路径。贵州“村超”作为乡村体育赛事的典型代表, 自其发端以来, 凭借独特的魅力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这一赛事以足球竞赛为核心载体, 参赛队伍广泛覆盖贵州各地乡村, 并且吸引了外国友人组队参与, 充分展现了其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征。这种将民族风情与现代体育深度交融的模式, 使得贵州“村超”为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协同振兴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发挥了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

贵州“村超”的火爆绝非偶然, 其成功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逻辑与动力机制。本文则结合政策文件和学术研究, 分析贵州“村超”的成功经验, 探索民俗与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 进一步提出实践策略, 为全国各地民俗体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借鉴意义。

2 贵州“村超”成功举办的动力机制

社会运行机制是指某事物发展过程中来自社会各方面持续的、有机的激励与促进力量。动力机制作为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为事物发展提供能量保证和动力支持, 是事物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我们将从以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为主的内生动力和以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等外部驱动力来研究贵州“村超”作为乡村体育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其背后蕴含的独特且复杂的动力机制。

2.1 内生动力

2.1.1 全民参与的文化认同

“村超”赛事吸引了超过 10 万名村民直接参与。其中, 村民既是球员、啦啦队员, 也是摊主、民宿经营者, 观众人数累计超过 50 万人次, 形成“人民体育人民办”的全民参与模式。许多村民自发组建球队, 利用农闲时间训练, 形成了浓厚的体育氛围。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使得村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据《贵

基金项目: 2024 年天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202410061020); 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2021JWZD33)

作者简介: 杨雅馨 (2004—), 女, 山西晋城人, 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

于晖 (2004—), 女, 河南鹤壁人, 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

周欣芸 (2002—), 女, 甘肃白银人, 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

通讯作者: 姜岩 (1966—), 女, 博士, 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州日报》2023年7月的报道，村超赛事在当地的群众基础深厚，村民的积极参与是赛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激发了村民的归属感和创造力，使赛事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

2.1.2 民族文化的活化传承

贵州村超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场文化盛宴。赛事融入了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元素，开发文创产品450余种，如民族歌舞、传统服饰、特色饮食等，吸引了大量文化爱好者，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通过赛事，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展示和传播，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村超通过文化展示，不仅丰富了赛事内容，还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这种文化遗产与体育的结合，使得村超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魅力，成为一张展示贵州多元文化的靓丽名片。

2.2 外部支持

2.2.1 政府扶持力

政策支持是乡村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贵州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贵州“村超”的发展，在政策、资金、场地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了极大支持^[6]。2023年，贵州省政府出台《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县发展特色体育运动，持续办好“村超”等乡村体育赛事，支持榕江打造重要区域性支点、节点城市，为“村超”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赛事组织方面，贵州形成了政企协同机制，相关部门不仅提供专业指导协助制定比赛规则、科学安排赛程，更通过资源整合保障赛事全流程安全，协调公安、医疗等部门建立立体化保障体系，确保赛事期间的安全防护与应急救援无缝衔接。在品牌推广维度，政府通过政务宣传平台矩阵式传播、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构建多层次传播体系。截至2024年底，“村超”全网综合浏览量超850亿次，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热搜，其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成为展示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窗口，实现体育赛事与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

2.2.2 经济拉动力

贵州“村超”成功举办，以“赛事经济”模式激活区域产业联动效应，形成多维度经济拉动力。在“体育+旅游”模式下，据不完全统计，赛事举办期间，榕江县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200万人次，旅游订单量增长150%。通过开发民族体育文化主题旅游线路和民俗体验活动，有效吸引客流并延长消费链，带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在“体育+文化创意”方面，赛事相关文创产品销售额已突破500万元，不仅催生特色衍生经济，还推动非遗手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助力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赛事传播窗口助力榕江蜡染、苗绣工艺品、有机农产品等依托“村超”标识实现品牌化升级，使传统农副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推动“土特产”向“精品伴手礼”转型，重塑乡村产业价值分配结构。数据显示，2023年“村超”赛事周期内，榕江县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5%，新增市场主体注册量激增68%，当地GDP增长2.3个百分点，印证了“小赛事撬动大经济”的乘数效应。

2.2.3 社会推动力

贵州“村超”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和高度热情。足球在贵州乡村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无论是参赛球员还是现场观众，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赛事中，许多村民更是自发组织训练，积极参与比赛，形成了浓厚的足球氛围。并且民俗表演覆盖人群广泛，男女老少都能够参与其中，激发各个年龄层的参与热情，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充实、更幸福。参与球队从2023年的20支球队到2024年的62支球队，再到2025新赛季108支村级足球队，赛事规模连创新高。群众的主动参与和热情支持，为贵州“村超”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另外，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群众各主体聚集一起，共同参与“村超”的策划、组织和推广，形成上下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这样，通过有效的公共治理，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融合资源要素，实现成果共享，更好的推动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2.2.4 科技引领力

贵州“村超”通过与百度智能云、索尼中国等企业合作，“村超”打造了中国首个大模型驱动的体育数智技术融合平台，引入骨骼级追踪捕捉技术和“3D+AI”智能系统。这些技术不仅实现了对比赛数据的实时分析和可视化呈现，还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赛信息，如实时球速、球员跑动距离等，并支持多种观赛视角和AI智能解说。此外，在赛事推广方面贵州“村超”也充分利用了新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将贵州“村超”的精彩瞬间传播到全国各地^[4]，至今，“村超”全平台综合浏览量超900亿次。此外，邀请了很多知名体育人士、网红等参与赛事，增加了社会对此的话题度和关注度，打造了“贵州村超”这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俗体育文化品牌^[2]

3 我国乡村民俗体育文化现存问题

3.1 受众群体萎缩，传承链条断裂

现代社会娱乐方式丰富多样,传统民俗体育的吸引力下降,尤其是年轻人对这些文化缺乏了解和兴趣,导致受众群体逐渐减少。随着城镇化发展越来越成熟,人们选择在生活更加便利,机会更多的城市生活,乡村老龄人口更多,因此传承人老龄化问题严重,而随着时间推移,传承人也逐渐减少,即使有年轻的传承人他们也经常忙于生计,在重要活动举办临近之际,才会组织排练,鲜少有全身心投入来创新民俗体育文化形式的,从而也导致民俗体育文化缺乏创新。同时这也反映出我国对于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人的生活保障不完善,这也是传承后生群体不足,文化创新群体缺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2 文化内涵弱化,创新形式不足

部分民俗体育项目在传承过程中,仅保留了外在形式,而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被忽视,导致文化传承的完整性受损。此外,多数地区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多以原始形式呈现,缺乏与现代体育理念和科技手段的结合,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甚至个别地区为了经济发展,编造“民俗体育起源故事”来吸引游客,由于缺少文化底蕴的支撑,则难以长久发展。我国还出现颇多诸如民俗商业街、“快餐式模仿”等创新形式,缺乏地域特色,同质化严重,看似将其发展壮大,实质上是虚假繁荣,“文化商品化必然导致去地域化和同质化”。

3.3 资源保障失衡,保护意识薄弱

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意识薄弱,这也源于其并没有意识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经济繁荣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从而对乡村民俗体育文化缺少系统性的编整。资金缺少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对传承人的生活保障不足,使乡村民俗体育文化难以得到重视与规模化的发展,也影响了民众对乡村民俗体育文化的认识 and 关注,削弱了乡村民俗体育文化活动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限制了乡村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 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实践策略

4.1 立足群众参与,构建“自下而上”的文化生态

“村超”的核心在于群众自发组织的足球赛事,其草根性、低门槛和广泛参与度成为吸引全国乃至国际关注的关键。所以,建议其他地区在民俗体育活动中,弱化行政干预,强化村民自主性,注重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通过组织多样化的赛事活动,吸引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和不同体育爱好的群众参与,满足参与人员的多样性,进一步面向全国人民。^[2]通过成立民间赛事委员会、鼓励村民主导规则制定等方式,增强文化认同感^[8]。此外,贵州“村超”也将侗族大歌、苗族芦笙等民族文化元素融入赛事开幕式和周边活动中,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其他地区也可挖掘本地传统节日、服饰、音乐等元素,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化+体育”品牌,例如在武术赛事中融入地方戏曲表演,或在龙舟赛中结合传统祭祀仪式。

4.2 推动“体育+”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村超”通过赛事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赛带百业”的效应。建议其他地区以赛事为核心,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农旅融合、文旅体验、商旅合作等复合模式。例如,榕江县在“村超”期间,通过合理规划夜间经济聚集街,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等产业发展,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增收渠道。此外,吸引企业合作与资本注入也是推动赛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榕江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通过品牌赞助、产品定制等方式实现互利共赢。其他地区可以探索“赛事IP+企业资源”的合作路径,通过冠名权、衍生品开发等方式吸引投资,形成可持续的资金链。

4.3 强化政策支持与数字化传播

贵州省政府将“村超”写入工作报告,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优惠等政策。建议地方政府将民俗体育纳入乡村振兴规划,设立专项基金,完善交通、场馆等硬件设施,同时建立赛事标准化管理体系^[8]。还可借力新媒体扩大影响力“村超”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实现“破圈传播”,全平台浏览量超900亿次。在赛事推广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培养本地“乡村网红”,联合平台开展赛事直播、互动挑战赛等,利用算法推荐精准触达目标受众^[4]。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制作精彩的赛事视频、直播比赛过程等方式,扩大赛事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关注。

4.4 构建多层次赛事体系,推动国际化交流

为了提升民俗体育的影响力,建议构建多层次的赛事体系。如贵州计划通过“村超全国赛”选拔草根球员,备战“村超世界杯”。其他地区可以建立“村-县-省-全国”四级赛事体系,设置奖金池或职业晋升通道,激发参与热情。在赛事组织方面,要引进专业的赛事运营团队,制定科学合理的赛事规则和赛程安排,提高赛事的效率和专业性。要加强比赛场地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为参赛队伍和观众提供良好的比赛和观赛环境。^[1]同时,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也是重要方向。“村超”吸引了多国球员参与,并被非洲国家借鉴。建议通过国际邀

请赛、文化节等形式，将民俗体育作为对外交流的载体，推动文化输出。此外，可以参考北京冬奥会的经验，通过国际赛事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

4.5 注重可持续发展，平衡保护与创新

在商业化过程中需避免过度开发，需注重文化原真性的保护，避免过度商业化。例如“村超”保留村民自发组织的赛制，拒绝职业化倾向。建议建立文化保护机制，通过非遗传承人认定、传统技艺培训等方式维系民俗体育的“根”。深入挖掘本地的民俗文化资源，将民俗文化与体育赛事有机结合。^[3]例如，河南拥有丰富的传统武术文化，可以在赛事中融入武术表演、武术体验等环节，增加赛事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通过这种方式，既能传承和弘扬当地的民俗文化，又能使体育赛事更具特色和魅力，进一步吸引当地人民了解参与，增加群众基础。同时，创新表现形式也是吸引年轻群体的重要手段。通过科技手段或跨界融合，通过数字化传播和创新性展示，吸引年轻群体参与^[7]。

5 结论

贵州“村超”的成功举办，为我国乡村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他地区在借鉴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更应该立足本地实际，深入挖掘当地民俗文化资源，积极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推动民俗体育文化与多产业融合发展。同时，要在发展过程中保护文化原真性，平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实现乡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更要做好乡村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工作，使其成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繁荣的新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独特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 [1] 李立志,费文海,张想.体旅融合背景下贵州“村超”出圈的内因及发展路径研究[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5,(02):34-36.
- [2] 任仕广,孙淼,田奔奔.贵州“村超”赛事助力乡村体育发展的意义、经验与路径[J].武术研究,2024,9(12):141-143+147.
- [3] 姚远,王文洋.乡村振兴背景下体育运动文化传播的新探索——以贵州“村超”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4,(10):125-128.
- [4] 张兆龙.数字经济驱动民俗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探究[N].淮南日报,2024-11-08(A03).
- [5] 张立江,毛浓选.“健康中国”背景下群众民俗体育与文化遗产的关系研究[C]/陕西省体育科学学会,陕西省学生体育协会.第二届陕西省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专题四).西安体育学院,2024:7.
- [6] 陈细中.民俗体育运动文化传承现实困境与传播策略研究——以平南双龙舞为例[J].当代体育科技,2024,14(17):115-119.
- [7] 吴俊杰,喻强,韦学究,等.体育赛事与民俗文化结合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以贵州省榕江“村超”为例[J].辽宁体育科技,2024,46(02):19-23.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Guizhou "Village Super" Football Tournament

Yang Yaxin¹, Yu Hui¹, Zhou Xinyun¹, Jiang Yan¹

¹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92,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Guizhou "Village Super" football tournament as a case to deeply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and sports culture. By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a series of core elements such as policy support, 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new media dissemin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benefits, it further reveals how rural sports events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folk and sports,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he amplifying effect of self-media,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are the key driving forces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y dissecting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folk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practical strategi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folk sports culture in other regions.

Keywords: Folk Sports Culture; Guizhou "Village Super" Football Tournam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Dynamic Mechanism; Practical Strategie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04

从虚拟现实（VR）看技术对审美经验的重构

邹孟作

（四川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1745）

摘要：本文探讨虚拟现实（VR）技术对审美经验的重构。从康德的静观美学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文章梳理了审美经验的理论谱系，并分析 VR 如何通过具身交互、空间重构和时间性变革重塑审美范式。研究指出，VR 使审美对象去物质化、审美主体具身化、审美关系互动化，但也带来了深度消失、孤独狂欢和技术霸权等危机。本文主张将技术视为居间者，构建交互性审美理论，并展望虚实共生的未来审美形态，以实现技术与人文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虚拟现实；审美经验；具身交互；交互性审美

一、理论谱系：从静观到沉浸——审美经验的历史嬗变

（一）传统美学中的“距离”与“静观”范式

康德的“静观美学”^[1]为传统审美经验奠定了基石。他提出，审美判断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愉悦，即审美经验不应掺杂任何实用目的或个人欲望。当我们欣赏一幅画作时，不应考虑其市场价值或作者的生平，而应专注于作品本身所带来的感官和精神的满足。此外，康德强调审美判断的“非概念性”，即审美经验无法被完全归纳为理性的、逻辑的规则，它是一种直观的感受，一种超越概念的把握。在这种静观美学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如同隔着一条无形的河流，静静地欣赏对岸的风景，不涉足，不索取，只感受其带来的心灵的震颤。

海德格尔的“在场性”^[2]则进一步深化了对审美经验的理解。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不仅仅在于其物质形态，更在于其“世界”的显现。以梵高的《农鞋》为例，海德格尔指出，这幅画作并非仅仅描绘了一双破旧的鞋子，而是通过“筑居”的方式，将农妇的辛劳、大地的馈赠、生命的轮回等“世界”的意义都凝聚其中。艺术作品通过其“物性”，即其物质存在，将“世界”的意义揭示出来，使人们在“在场”的体验中感受到存在的真谛。在这种视角下，审美经验不再仅仅是感官的愉悦，更是一种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和领悟。

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现象学则为传统审美经验注入了身体的维度^[3]。他强调，身体并非被动的感知工具，而是感知的中介和主体。我们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来感知和体验世界，身体在感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传统审美经验中，尽管身体参与其中，但它仍然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例如，在欣赏画展时，我们的身体移动范围有限，无法真正融入作品所构建的世界之中。身体的这种局限性，也使得传统审美经验中的“参与”和“交互”大打折扣。

康德的“静观美学”、海德格尔的“在场性”以及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共同构成了传统审美经验的核心范式。它们揭示了传统审美经验的无功利性、非概念性、主客体的距离、艺术作品的意义显现以及身体的局限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数字技术革命和 VR 技术的冲击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

（二）VR 技术的“沉浸式审美”新维度

1、沉浸交互：VR 审美经验的技术基础与美学突破

作者简介：邹孟作(1993—)，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史。

虚拟现实是一种沉浸式体验技术，它通过同时刺激主体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多种感官，实现人与虚拟环境的实时互动^[4]，其强调身体在认知和交互中的核心作用。VR 技术通过头戴式显示器、动作捕捉系统和触觉反馈设备等硬件设施，将主体的身体动作实时映射到虚拟环境中，使身体成为直接操控虚拟世界、进行审美交互的界面。例如，在 VR 游戏《节奏光剑》中，主体的肢体运动被精确捕捉并转化为虚拟空间中的光影效果，实现了身体动作与审美经验的直接关联。传统审美经验往往以视觉为主导，而 VR 技术通过整合视觉、听觉、触觉和动觉等多种感官通道，实现了多感官通感的审美经验。主体在 VR 环境中不再仅仅是被动、静态的观察者，而是通过身体的参与主动建构审美对象。如在体验《节奏光剑》时，我们不仅看到光影的变化，还能感受到节奏的震动和肢体运动带来的动觉反馈，从而获得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审美经验。

2、空间重构：从物理在场到数字具身

社会学家鲍曼提出的“液态现代性”概念，强调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5]。VR 技术创造的虚拟空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可塑性，与液态现代性的特征相契合。VR 构建的“可进入式空间”打破了笛卡尔式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使主体能够以具身的方式存在于数字环境中，实现了从“物理在场”到“数字具身”的转变。在 VR 体验《漫游者》中，主体通过身体的运动和视角的转换，自由探索虚拟宇宙的奥秘。这种体验方式体现了主体在虚拟空间中的“具身存在”，即主体不再仅仅是观察虚拟世界的旁观者，而是通过数字技术的重构成为虚拟世界的一部分。

3、时间性变革：从线性叙事到实时生成

VR 技术为主体提供了高度的自由度和交互性，主体的选择和行动能够实时影响虚拟世界的状态和演变。在互动叙事 VR 游戏《隐形守护者》中，主体的不同选择会导致剧情走向不同的分支，最终产生不同的结局。这种机制使得审美经验的时间性不再局限于作者预设的线性叙事，而是呈现出多线程、非线性的特征。传统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时间性通常由作者预设，观众被动地跟随作者的叙事节奏进行体验。而 VR 技术通过引入主体的选择和交互，使得审美经验的时间性转变为主体与系统共同创造的过程。主体在 VR 环境中与虚拟世界共同演化，共同构建审美经验的时间轨迹。

二、主体建构：VR 技术对审美经验核心要素的重构

VR 技术以其独特的沉浸式特性，重塑传统的审美范式。具身交互、空间重构和时间性变革是 VR 技术引发审美范式转型的三个关键维度。虚拟现实（VR）技术不仅改变了审美经验的方式，更在深层次上重构了审美经验形成的核心要素，即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和审美关系。

（一）审美对象的“去物质化”与“可交互性”

在传统艺术中，审美对象通常依赖于特定的物质载体，如油画的画布、雕塑的石材等。这些物质载体赋予了艺术作品以实体存在，并限制了其表现形式和交互方式。然而，在 VR 环境中，审美对象呈现出“去物质化”的特征，它们不再是物理实体，而是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数据化形态”。例如，TeamLab 的《无界美术馆》，动态的光影结构完全由代码生成，不再受限于任何物理介质。这种“去物质化”使得审美对象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可交互性”。主体可以通过触碰虚拟花朵来触发色彩扩散的效果。这种交互行为不仅改变了审美对象的形式，更使其意义在交互过程中实时生成。这与克莱夫·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概念形成鲜明对比。贝尔认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在于其形式，这种形式通过线条、色彩、形状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激发观者的审美情感。当艺术作品不再有物质意义上的形式时，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另外，《无界美术馆》中，我们看到的“形式”不再是预先设定、一成不变的。主体通过触碰虚拟花朵来触发色彩扩散的效果，这一交互行为本身就成为了艺术作品“形式”的一部分。这种“形式”是动态的、生成的，它随着主体的参与和互动而不断变化，每一次体验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色彩、线条、形状不仅是视觉元素，也不仅是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情感意象的中介，同时它们也成为了主体互动过程中的反馈和表达，成为了意义生成媒介。因此，《无界美术馆》不仅挑战了“有意味的形式”这一传统美学概念，更揭示了数字艺术的新的美学可能性。在虚拟现实，艺术可以摆脱物质形式的束缚，通过交互性和生成性创造出更加动态、开放、个性化的审美经验。这种体验不再是单向的、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双向的、主动的参与和创造。

（二）审美主体的“具身化”与“身份流动性”

从现象学角度来看，虚拟现实(VR)技术为审美经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一个核心转变在于审美主体从“离身”到“具身”的体验。传统审美中，主体往往被视作理性的观察者，身体作为接收感官信息的容器。

而 VR 技术将身体引入审美经验的核心,身体不再是被动地接收感官信息的容器,而是成为主动参与虚拟环境构建的“技术具身”。“技术具身”并非简单的身体存在,而是身体与技术深度融合后的新型存在方式。VR 头盔、手柄、体感设备等硬件将主体的身体动作实时映射到虚拟世界中,使主体成为虚拟环境的积极参与者和塑造者。主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眼神的流转,都与虚拟世界产生互动,并影响虚拟环境的呈现。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使主体不再只是一个观察者。

此外,VR 技术赋予了审美主体以“身份流动性”。主体在虚拟世界中体验到的“身体”不再是固定的、统一的,而是可以自由变换的、流动的。主体在虚拟世界中自由选择和切换身份,突破现实世界中性别、种族、物种等身份限制,可以体验微小化的、动物化的、机械化的身体视角,例如,以蚂蚁的视角探索草丛的微观世界,以鸟儿的视角翱翔天际,甚至以机器人的视角执行任务,体验不同的人生轨迹,甚至可以同时拥有多个虚拟身份。这种全新的身体经验彻底重构了主体的感知尺度,打破了日常经验中的身体限制,为主体打开了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这种身体视角的转换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变化,更是对主体身体主体性的重新定义。这种身份流动性使得审美经验成为一个可以进行身份实验的场域,一个探索自我、表达欲望、释放压力的安全空间。正如雪莉·特克尔在《第二人生》所表明的,主体在虚拟世界中的身份选择往往反映了其现实中的欲望、焦虑、渴望和恐惧^[6]。虚拟身份成为主体探索自我、表达自我、甚至疗愈自我的工具。虚拟身份的流动性为主体提供了探索自我身份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人类心理和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三) 审美关系的“互动性”对“无功利性”的挑战

在传统美学体系中,审美的核心前提是“无利害关系”,即审美主体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带有功利目的。然而在 VR 环境中,审美体验不再局限于对静态形式的观照,而是融入了动态的、交互的、功利性的元素。例如,在 VR 游戏《亚利桑那阳光》中,玩家扮演在僵尸横行的末日世界中求生的角色,射击僵尸的行为本身就是审美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玩家在游戏中追求感官刺激,体验紧张刺激的生存挑战,或许成为体验的主要目的。这种情况下,功利性——消灭僵尸追求感官刺激以生存,与审美性——体验游戏画面、音乐、氛围所带来的精神享受的边界变得模糊。这种模糊性挑战了传统美学中“无利害关系”原则。在 VR 中,审美主体的经验融入了功利性的行动、目标和结果。这种转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审美的本质,以及如何界定审美性与功利性之间的关系。

三、批判与反思:沉浸式审美的潜在危机

尽管 VR 技术为审美经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但其潜在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波德里亚的“拟像理论”^[7]为我们理解 VR 审美经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VR 技术创造的“超真实”环境,使得审美经验可以脱离对“原初真实”的依赖。高度拟真的虚拟场景使主体产生一种“数字生存”的错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真实的、可感知的世界之中。这种“拟真审美”也带来了潜在风险。过度拟真也可能导致审美经验的“异化”。

(一) “深度”的消失:从“现象学还原”到“感官刺激”

传统审美理论,无论是面对一幅绘画、一座雕塑,还是一首诗歌、一部电影,都强调对事物本质的深入理解和洞察。鼓励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去探寻作品背后的深层含义、象征意义以及它所揭示的关于人性和世界的真理。这种对“深度”的追求,与现象学所倡导的“现象学还原”不谋而合。然而,在 VR 技术主导的沉浸式艺术中,这种对深度的追求往往被感官刺激所取代。主体被淹没在眼花缭乱的视觉奇观和震耳欲聋的音效之中,无暇也无需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验。当艺术作品仅停留于提供感官愉悦时,主体便失去了通过审美活动追问存在本质的可能。审美沦为一种浅尝辄止的娱乐活动。更值得警惕的是,VR 技术创造的超真实场景,其逼真程度甚至超越了现实,这可能导致审美经验沦为“拟像游戏”,正如波德里亚所警示的“真实的消失”。在波德里亚看来,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拟像”的泛滥,即符号和影像不再指涉现实,而是自身构成了一种超现实。VR 技术的沉浸式体验,很容易加剧这种“拟像”的泛滥,使人们沉迷于虚拟的快感之中,而逐渐丧失对现实的感知和判断。

(二) “孤独的狂欢”:具身交互中的主体异化

尽管 VR 以“媒介即人的延伸”(麦克卢汉)为理论基底,试图通过数字化具身重构主体的感知方式,使其在虚拟世界中获得“在场”幻觉。然而,这种技术中介的具身化体验实则暗含深刻的断裂——物理空间的隔离使主体被囚禁于“数字茧房”之中,与真实世界的肉身性联系被强行割裂。真实世界的贫瘠与虚拟世界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预示了技术乌托邦背后的存在危机。身体并非仅是感知的载体,而是主体“在世存在”的根

本媒介。触觉、温度、呼吸、肌肉张力等具身性体验共同构成了主体与世界的原初联系，而 VR 技术却通过数据化模拟抽离了这种整体性。触觉反馈手套能模拟握手的力学反馈，却无法复现掌心汗液的黏腻、体温的微妙变化，以及无意识的身体微颤所传递的情感；眼球追踪技术可以记录凝视的轨迹，却滤除了瞳孔收缩、睫毛颤动等细微的生理反应，使“注视”沦为空洞的数据流。这种碎片化的感官代偿，使主体陷入一种“去肉身化”的交互模式，身体的丰富性被简化为可计算的参数。

更进一步，VR 环境中的审美体验呈现出高度的技术中介性。当主体沉浸在虚拟景观中时，其感知被算法预设的交互逻辑所框定，主体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即时快感，却丧失了对存在本真性的追问能力。虚拟狂欢中的“共在”仅是数据层面的连接，真实的“面对面”被降维为头像与语音的组合，人际关系的厚度在比特洪流中被不断稀释。技术看似拓展了感知的边界，实则制造了一种更隐蔽的异化：主体在数字具身的幻象中，逐渐遗忘肉身世界的重量与温度，成为悬浮于虚实夹缝中的“无根之人”。VR 技术的终极困境或许在于，它试图以技术逻辑填补人类对具身性的渴望，却因剥离了身体的不可计算性而陷入更深的孤独。当虚拟握手无法替代真实拥抱的暖意，当数字凝视无法承载眼神交汇时的震颤，技术所承诺的“延伸”便显露出其本质——一种精致的隔离。

（三）技术霸权与审美自主性的消解

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VR 内容生产正加速审美经验的标准化进程。阿道尔诺批判的“文化工业”特征在此显现^[8]：大量低成本 VR 游戏通过算法推荐形成“刺激-成瘾”循环，将审美沉思压缩为短暂的感官轰炸。这种现象导致双重危机：一方面，主体逐渐丧失对复杂艺术形式的解码能力，审美判断退化为对技术参数的机械比较（如分辨率、帧率）；另一方面，创作端为迎合市场，将康定斯基倡导的“内在需要”原则^[9]异化为流量导向的内容生产。VR 技术驱动的沉浸式审美在带来全新体验的同时也潜藏重重危机。这些危机不仅关乎审美经验的质量，更关乎人类在技术时代的存在方式。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在拥抱技术进步的同时，守护审美活动的本质价值，并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数字审美生态。

四、结论：重构审美经验的哲学可能性

（一）技术作为“居间者”而非“替代者”

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理论指出，媒介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对人体器官、感官及功能的强化和放大，这种延伸类似于服装对皮肤的覆盖和汽车对四肢行动能力的提升^[10]。VR 技术的哲学意义在于其作为“居间者”的潜能，而非割裂主体与世界的本真联系。它应通过技术中介重构人与存在的共属关系，而非将世界降格为可计算的资源。VR 作品不应该以超真实视效取代自然体验，而应通过沉浸式交互唤醒主体对自然秩序的敬畏，这种实践呼应了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生态智慧。技术伦理的核心在于拒绝“座架”的霸权逻辑，恢复人与世界的共生性对话。

（二）建立“交互性审美”的新理论框架

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为数字时代的审美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其“艺术即经验”理论强调审美并非孤立于生活的超验领域，而是“活的生物”与环境动态交互的产物。在 VR、AR 等沉浸式媒介中，这一理念可拓展为“主体-技术-对象”的耦合模型：主体通过手势追踪、触觉反馈等技术界面与虚拟对象互动，其审美经验既非被动接受亦非单向操控，而是在技术赋能的“具身认知”中生成意义。如混合现实 (MR) 设备 Trimble XR10 将 BIM 模型叠加于施工现场，工人通过手势操作实现设计意图与建造实践的无缝对接，这种“做中学”的体验模式正是杜威“经验连续性”理论的数字具象化。由此，审美活动从静观式“凝视”转向参与式“实践”。

（三）未来展望：从“沉浸式”到“共生式”审美

随着 AR/MR 技术的演进，“虚实共生”的生态审美将成为可能。我们应该构建一个数字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交叠，消解虚拟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使技术成为激活自然美学潜能的催化剂。这种实践预示着一个新的审美范式：技术不再制造“拟像的囚笼”，而是构建虚实互渗的“第三空间”。在此空间中，海德格尔的“大地与世界之争”获得调和——数字艺术与自然景观共同构成存在之真理的显现场域。未来的技术哲学需超越“工具理性批判”的单一视角，转而探索“技术-自然-人文”的协同进化路径。正如海德格尔所引用的诗歌：“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唯有将技术重新锚定于存在论的根基，才能实现从“沉浸式异化”到“共生式栖居”的审美救赎。

VR 技术驱动这场审美变革，既带来了主体性消解的危险，也蕴含着重建人文价值的机遇。它迫使我

们重新思考：在一个技术深度介入感知的时代，什么是真正的审美经验？技术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人与世界的关系将如何重构？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将引领我们走向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深度的“共生式审美”范式——在这种范式中，数字与自然不是对抗的双方，而是共同编织存在意义的合作者；技术不是统治自然的工具，而是人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审美不是逃离现实的虚拟狂欢，而是对存在本真性的诗意追寻。未来的研究需要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深化，既要警惕技术异化的风险，更要发掘技术救赎的潜能，为数字时代构建一种既能拥抱技术创新、又能守护人文精神的审美新秩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从“沉浸式异化”到“共生式栖居”的真正跨越。

参考文献：

- [1] 康德.批判力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
- [2]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9-22.
- [3]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6-288.
- [4] 伯迪.虚拟现实技术[M].上海: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1.
- [5]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1-45.
- [6]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221-240.
- [7] 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1-102.
- [8]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7-153.
- [9] 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43-69.
- [10] 埃里克·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60.

Reconfiguring Aesthetic Experience through Virtual Reality: Embodied Intera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Zou Mengzuo

Sichuan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hengdu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driven by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ology. Tracing the theoretical genea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from Kantian contemplative aesthetics (characterized by 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 to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embodiment (emphasizing bodily percep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experience), the analysis reveals how VR reshapes aesthetic paradigms through embodied interaction, spatial-temporal reconfiguration, and multisensory immers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VR facilitates the dematerialization of aesthetic objects, the embodiment of aesthetic subjects, and the interactivity of aesthetic relationships. However, it also precipitates cri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erosion of hermeneutic depth (as simulated environments prioritize sensory immediacy over reflective interpretation), the paradox of collective isolation in carnivalesque experiences, and the potential hegemony of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wherein algorithmic frameworks dominate aesthetic judg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that positions technology as an intermediary, advocates for an interactive aesthetic theory, and envisions a symbiotic aesthetic morphology integrating virtual and real dimensions, thereby fostering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umanistic values.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Aesthetic Experience; Embodied Interaction; Interactive Aesthetic Theor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05

技术进步与薪酬不平等：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企业分配格局？

王筱淳¹

(¹ 桂林学院 组织人事处,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企业生产与管理流程的背景下，其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水平指标，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发展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水平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倾向于拉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上述结论在使用替代变量与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该影响在非劳动密集型企业、非资产密集型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技术变革背景下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机制的研究视角，对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分配效应及其区域和行业差异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人工智能；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非劳动密集型企业；非资产密集型企业；区域异质性

一、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企业的组织运作方式与管理逻辑。从生产线的自动化到决策流程的智能化，人工智能逐步渗透至企业的制造、服务、营销乃至战略决策等多个环节，对企业的经营模式产生了系统性影响（郭凯明, 2019; 徐鹏和徐向艺, 2020）。伴随着算法优化、算力提升与数据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企业推动流程革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产品服务能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姚加权等, 2024）。

围绕人工智能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技术采纳对企业创新能力、经营效率、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机制（宣旻和张万里, 2021; 张涵钰等, 2023; 孙慧等, 2025; 宁楠和惠宁, 2025）。相比之下，对于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考察尚属初步，特别是在薪酬体系层面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变动，仍缺乏深入的理论与实证探讨。

事实上，人工智能作为一类兼具替代性与赋能性的通用技术，其扩散过程中极可能对不同人力资本群体的边际产出产生非对称效应，进而改变企业内部的薪酬分布格局。一方面，企业高管或中高层管理人员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往往承担着战略导向、系统集成与资源协调等关键角色，其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可能通过薪酬制度反映出来；另一方面，重复性强、技术含量较低的岗位则更易受到自动化替代的冲击，导致普通员工在薪酬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弱化（韩清和陈澍, 2025）。

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背景下，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在行业间、区域间、企业属性间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不同企业在资源禀赋、制度安排及组织惯性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其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时采取不同的转型路径与激励策略，从而进一步影响内部薪酬结构的变动方向与程度。因此，识别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企业的薪酬体系，既是深入理解技术变革社会效应的重要视角，也对于当前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性优化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 2010—2023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人工智能水平、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及相关控制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系统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同时，考虑到

基金项目：桂林学院 2024 年校级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广西应用型高校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简介：王筱淳（1997-），男，桂林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在劳动密集度、资本结构与区域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进一步从异质性视角出发,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在不同企业类型中产生差异化的分配效应。本文拟回答的核心问题包括:(1)人工智能是否显著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2)其影响路径在不同企业特征下是否表现出系统性差异?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力求为理解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企业内部收入再分配机制提供经验证据,并为完善相关政策设计与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工智能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人工智能作为一类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通用性技术,其在企业端的深入应用正日益重塑组织运作逻辑与资源配置方式,尤其在薪酬结构与人力资本体系层面所引发的调整趋势,已引起学界与政策层面的广泛关注(韩清和陈澍, 2025; 钟玉婷等, 2025; 康晨等, 2025; 刘林和李猛, 2025)。尽管技术扩散带来效率提升与资源优化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也促发了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与收入分配体系的重新塑型。

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下,人工智能的引入显著提高了高技能人才的边际产出,并强化了其在组织内部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带来薪酬溢价的上升趋势(周洁, 2023; 余玲铮等, 2025)。特别是在企业推动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高层管理者及关键岗位人员在技术路径选择、资源统筹与组织变革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其在薪酬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也相应提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低技能岗位受自动化替代的影响较为直接,工种的标准化与可被替代性增强,导致其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逐步下滑(姚笛等, 2023; 刘红英等, 2024; 胡善成等, 2024)。这一过程中,不同层级员工的收入差距在技术变革的驱动下被进一步拉大。

此外,从企业治理结构与内部制度演化的角度观察,人工智能的推进往往伴随绩效考核体系、激励方式以及权责结构的系统性重构。在强调目标导向与绩效产出之间直接挂钩的管理逻辑下,企业更倾向于将激励资源向具备技术整合与决策能力的高层岗位集中,这种薪酬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管理层的薪酬优势。同时,人工智能所依托的技术基础设施与组织适配性要求,也促使企业在资本投向、组织流程与人力配置方面进行再平衡,从而推动企业内部由“岗位驱动”向“能力驱动”与“技术—治理协同”导向的薪酬分配机制演进。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企业人工智能水平越高,内部薪酬差距越大。

(二)人工智能对企业薪酬差距的异质性影响

人工智能在企业内部的推广应用,受到企业要素禀赋结构与区域制度环境的深刻制约,进而导致其对薪酬结构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首先,在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生产过程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而对自动化、算法优化等技术要素的需求更为突出。人工智能的部署不仅提高了流程运行的标准化程度,还强化了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管理方式。在此背景下,高技能人力资本,尤其是具备技术整合与组织协调能力的管理层,其在企业战略与运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相应的薪酬激励机制也更侧重于此类岗位,由此拉大了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许清清等, 2020; Wu et al., 2024)。

其次,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尽管在传统意义上的设备投资较为有限,但其在数字工具与平台系统方面具有更高的响应能力与转型灵活性。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更倾向于构建“轻资产、强智力”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凸显对复合型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的依赖。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保留关键人力资本,企业往往通过有针对性的薪酬结构设计予以激励,从而加剧了劳动收入在内部各类岗位间的分化态势。

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端人才流动方面相对滞后,企业在引进外部 AI 相关专业力量方面面临一定障碍。在此情形下,企业为推进技术转型,往往更多依赖内部管理层主导技术部署与流程重构,因此不得不在激励机制上向管理层倾斜,以弥补其在资源与技术能力方面的不足。这一内生性的治理响应机制,实质上放大了管理者在企业转型中的边际贡献,也在客观上推升了其相对薪酬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 人工智能水平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

H3: 人工智能水平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非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

H4: 人工智能水平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0—2023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以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数据处理方面,首先对初始样本进行了系统筛选:剔除了被特别处理

(ST 与 PT) 标识的公司样本, 以排除经营异常企业带来的系统性偏误; 其次, 删除了财务指标缺失或存在显著异常值的样本, 以确保数据质量与估计结果的稳定性; 再次, 为控制极端值干扰, 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前后 1% 的缩尾处理。经上述处理后, 最终获得了包含 33297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的有效样本。

核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水平的构造, 采用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文本挖掘方法, 通过爬取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关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表述频次作为衡量指标。具体操作过程中, 依托词典法与人工识别相结合的方式, 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词表, 并通过文本识别技术对年报中的关键词进行计量, 进而构建公司层面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度指标。该方法能较好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的技术关注度与技术实践情况, 已在近年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较为广泛的应用与验证。其余变量主要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Gap)。本文借鉴魏志华等 (2022) 的研究范式, 选取“管理层薪酬与员工薪酬之比”作为薪酬差距的度量方式。其中, 管理层薪酬指企业年报中披露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 员工薪酬则由企业财务报表中“应付职工薪酬”除以年末员工人数得出。

2. 解释变量: 人工智能水平 (AI)。本研究参考姚加权等 (2024) 的方法, 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实践, 基于文本挖掘构建反映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权重的核心变量。具体做法是, 首先构建人工智能相关关键词词典, 涵盖当前主流 AI 技术与应用领域的核心术语; 在此基础上, 统计样本企业年报全文中相关词汇的出现频次, 并以其作为衡量企业人工智能战略关注度的代理指标。考虑到部分企业在年报中未提及 AI 内容, 导致词频为零, 为避免取对数后的数值缺失问题, 对词频加 1 后取自然对数处理, 形式为: $AI = \ln(\text{词频} + 1)$ 。该指标作为企业 AI 战略导向的外显表征, 在大样本范围内具备较强的可比性和稳定性。在稳健性检验中, 考虑到年报全文可能包含大量非战略性信息, 本文进一步提取“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MD&A) 部分作为文本来源, 构造替代变量。该部分由高管撰写, 集中体现企业对未来发展战略的判断与规划, 因而能够更精准反映企业高层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倾斜与资源配置意图。通过对 MD&A 中 AI 词频的独立计量, 本研究能够从文本结构上识别不同企业间在人工智能投入上的差异, 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更具解释力的指标基础。

3. 控制变量。为准确识别人工智能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路径, 本文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以控制企业在资本结构、成长潜力、治理机制、股权格局及制度属性等方面的异质性影响, 降低模型估计的偏误风险。具体而言, 资产负债率 (Lev) 以期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计量, 反映企业的杠杆水平。杠杆较高的企业在薪酬发放上通常更受资金约束, 其激励机制的制定亦受到一定限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Growth) 度量企业成长性, 计算方式为本期与上期营业收入之差占上期收入比重, 预期成长性强的企业更愿意通过薪酬激励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董事会规模 (Board) 采用董事总人数衡量, 规模越大可能意味着治理结构越复杂, 进而对高管薪酬的审议与决策程序产生影响。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为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之比, 代表董事会中独立性监督机制的强弱, 在薪酬激励制度的约束性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在所有权结构方面,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用于衡量股权集中度, 高集中度可能意味着企业治理由少数股东主导, 其对薪酬制度的影响可能更具倾向性。企业性质 (SOE) 为虚拟变量, 国有企业取值为 1, 非国有企业为 0, 用以考察制度背景对薪酬结构的调节效应。两权分离度 (Seperate) 通过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衡量企业内部可能存在的代理冲突, 从而识别其对薪酬差距的潜在干扰路径。

(三) 模型构建

为系统评估人工智能发展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Gap_{i,t} = \beta_0 + \beta_1 AI_{i,t} + \text{Control} + \text{Ind} + \text{Year} + \varepsilon_{i,t}$$

其中, $Gap_{i,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内部薪酬差距, 衡量标准为管理层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 用以反映企业内部薪酬结构的相对分化程度。 $AI_{i,t}$ 表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采用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关键词词频构建, 基准模型使用全文词频加总并取自然对数, 稳健性检验中则选取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MD&A) 部分构建指标。 Control 为控制变量集合, 包括企业的财务状况、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特征与制度属性等, 旨在剔除可能干扰薪酬结构的其他因素; Ind 和 Year 分别表示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异质性以及共同时间趋势影响; $\varepsilon_{i,t}$ 为误差项。

在上述模型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引入分组回归方法, 考察人工智能影响的异质性。具体而言, 将样本按照企业要素禀赋和区域分布划分为不同子样本, 分别进行回归估计: 一是以行业中位数为基准, 将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与非劳动密集型, 检验人工智能对不同劳动结构企业的影响差异; 二是基于固定资产比重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与非资本密集型, 探讨技术替代在不同资本结构中的作用机制; 三是根据企业注册地划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 以识别在制度环境与技术基础存在显著差异条件下, 人工智能对薪酬结构

的影响边界。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被解释变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Gap) 来看, 其均值为 5.458, 标准差为 3.961, 最小值为 0.9477, 最大值达到 25.0511, 说明样本企业间管理层与员工薪酬比值存在较大差异, 企业内部薪酬结构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核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水平 (AI) 的均值为 0.899, 标准差为 1.221, 最大值为 4.663, 最小值为 0, 表明不同企业在人工智能相关表述的披露程度差异显著, 暗示其数字化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其中部分样本未出现 AI 相关表述, 可能源于行业属性、信息披露规范或数字战略尚处于初始阶段。控制变量方面, 资产负债率 (Lev) 均值为 0.411, 反映出样本企业普遍维持在中等偏低的负债水平;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Growth) 均值为 0.160, 说明企业整体具备一定成长性, 但标准差达 0.344, 且最小值为-0.509, 表明部分企业仍面临营收下降的困境。董事会规模 (Board) 均值为 2.113 (取对数后), 波动范围相对较窄, 体现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化特征。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均值为 37.67%, 符合我国公司治理规范中“独立董事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制度要求, 但样本内波动范围仍较大。股权结构方面,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均值为 34.32%, 反映出控股股东在样本企业中仍具有较强控制力; 国有企业占比 (SOE) 为 31.87%, 说明样本中非国有企业占比更高, 利于探讨产权差异下的机制变化。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Gap	33297	5.4580	3.9610	0.9477	25.0511
AI	33297	0.8989	1.2212	0	4.6634
Lev	33297	0.4114	0.2045	0.0549	0.8861
Growth	33297	0.1603	0.3437	-0.5089	1.7399
Board	33297	2.1136	0.1940	1.6094	2.5649
Indep	33297	0.3767	0.0532	0.3333	0.5714
Top1	33297	0.3432	0.1458	0.0879	0.7257
SOE	33297	0.3187	0.4660	0	1
Seperate	33297	4.6609	7.2258	-0.3900	30.2542

(二) 基准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人工智能水平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 (1) 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与年度固定效应, 列 (2)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在不同设定下均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 人工智能水平 (AI) 在列 (1) 中的估计系数为 0.0919, 在 5%水平上显著; 在控制变量加入后 (列 2) 系数为 0.0915, 显著性依旧保持,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人工智能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 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薪酬比值平均上升约 0.0915 个单位。该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H1, 表明人工智能的引入可能强化了对高阶管理人才的激励机制, 从而拉大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

控制变量方面,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Growth) 和董事会规模 (Board) 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 系数分别为 0.2905 和 0.8202, 且在 1%水平上显著, 说明成长性较强和治理结构较完善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更具差异化的薪酬激励机制。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亦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独立性较强的董事会并未抑制薪酬差距扩大, 可能反映出独立董事制度在约束激励结构方面的执行效能尚未充分发挥。其余变量如资产负债率 (Lev)、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企业性质 (SOE) 与两权分离度 (Seperate) 均未呈现统计显著性, 显示这些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对企业薪酬结构的边际解释力相对有限。

表 2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Variable	(1)	(2)
	Gap	Gap
AI	0.0919** (2.3425)	0.0915** (2.3711)
Lev		-0.1718 (-0.7188)

Growth		0.2905***
		(5.4263)
Board		0.8202***
		(2.8302)
Indep		1.9576**
		(2.4993)
Top1		0.1100
		(0.1899)
SOE		-0.1413
		(-0.6524)
Seperate		0.0115
		(1.6434)
Constant	7.7536***	5.1534***
	(5.4374)	(3.0812)
行业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3297	33297
R-squared	0.015	0.019

注：***、**、*分别表示通过了 1%、5%、10%的显著性测试，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因果识别的可信度，本文进一步开展两类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二是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首先，考虑到人工智能在企业年报中不同板块的表达存在异质性，本文将基准回归中以整份年报文本计算所得的人工智能词频指标替换为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构建的词频指标（AI2）。MD&A 部分由高管直接撰写，反映了企业对技术战略与经营风险的核心判断，因此更具战略导向性与前瞻价值。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AI2 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回归系数为 0.0883，在 5%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说明即便调整度量方式，人工智能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展效应依然显著存在。

其次，针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构建工具变量模型。在理论上，企业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具有一定路径依赖特征，其当前水平很大程度上受过去技术积累与组织学习进程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人工智能水平的滞后一期（L.AI）作为工具变量。L.AI 与当前人工智能水平显著相关，但在控制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之后，可合理视为外生变量，不直接影响当前的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仅通过 AI 水平这一渠道发挥作用，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两项设定要求。列（2）展示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L.AI 的回归系数为 0.8828，且在 1%水平下高度显著，验证了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强相关性。列（3）报告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AI 的回归系数为 0.1042，依然显著为正，且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一致，表明引入工具变量后核心结论依然稳健，未受到严重内生性干扰。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替换自变量	工具变量法	
Variable	Gap	AI	Gap
AI2	0.0883**		
	(2.3721)		
L.AI		0.8828***	
		(265.0845)	
AI			0.1042***
			(3.7555)
Lev	-0.1584	-0.0180	1.8128***
	(-0.6624)	(-0.9829)	(14.0848)
Growth	0.2918***	0.0794***	0.5418***

	(5.4538)	(6.8860)	(7.4828)
Board	0.8298***	-0.0022	2.5512***
	(2.8573)	(-0.0982)	(14.9110)
Indep	1.9637**	0.0676	2.4827***
	(2.5026)	(0.8906)	(4.4021)
Top1	0.0980	-0.0005	0.3374*
	(0.1693)	(-0.0224)	(1.8232)
SOE	-0.1393	-0.0402***	-0.9137***
	(-0.6433)	(-5.1580)	(-14.8749)
Seperate	0.0114	-0.0005	0.0303***
	(1.6305)	(-1.1583)	(8.4664)
Constant	5.1294***	0.0031	-0.3156
	(3.0688)	(0.0421)	(-0.5231)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3297	27701	27701
R-squared	0.018	0.808	0.068

（四）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人工智能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是否因企业禀赋结构与区域特征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生产要素结构（劳动密集型与非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非资本密集型）与区域发展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两个维度进行了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首先，从劳动密集度来看，人工智能对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薪酬差距扩大效应显著为正（系数为 0.0932，5%水平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不显著。该差异可从企业对人力资本结构的依赖程度加以解释。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过程中更依赖技术系统与流程管理，人工智能的引入往往伴随着企业对具备技术理解力、系统整合能力和组织领导力的中高层管理者的更强依赖，导致管理层的议价能力与薪酬占比随之上升。相对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仍以重复性劳动为主，人工智能尚未实现对大规模基础岗位的完全替代，技术引入对内部薪酬结构的重塑尚不明显。

其次，资本密集度异质性回归显示，人工智能对非资本密集型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系数为 0.0912），而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不具统计意义。该结果反映出不同资产结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落地路径存在差异。资本密集型企业智能化改造中更倾向于通过大型设备、机器人替代实现“硬件式”效率提升，技术部署侧重于物理资产投入，对管理结构与人力资源的再配置相对有限。而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往往依赖轻资产模式，其智能化更依赖算法、数据系统与运营管理的协同优化，推动了对复合型管理人才的薪酬激励，从而加剧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分化。

第三，从区域维度观察，人工智能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薪酬差距扩大效应显著（系数为 0.1644，5%水平显著），而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不具显著性。这一差异的出现与区域制度环境与人力资本禀赋密切相关。中西部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与外部高端人才供给方面相对薄弱，企业在引进和保留 AI 技术相关人才方面存在更高成本与不确定性。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内部激励机制提升关键管理层的技术采纳积极性与组织协调能力，进而在报酬分配上产生更强的“上倾”效应。而在东部地区，AI 技术推广更为成熟，人才流动性强，企业在薪酬制度设计上相对规范、理性，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报酬差距受控制的程度更高。

表 4 异质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劳动密集型	非劳动密集型	资产密集型	非资产密集型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Variable	Gap	Gap	Gap	Gap	Gap	Gap
AI	0.0234	0.0932**	0.0584	0.0912**	0.0549	0.1644**
	(0.3387)	(2.2194)	(0.6132)	(2.2203)	(1.2678)	(2.1088)
Lev	-0.3566	-0.0880	-0.3775	-0.0841	-0.2697	0.0186
	(-0.8873)	(-0.2926)	(-0.6789)	(-0.3287)	(-0.9021)	(0.0465)

Growth	0.1970**	0.3063***	0.1761	0.2765***	0.3403***	0.1475
	(2.1432)	(4.8542)	(1.6231)	(4.5297)	(5.1879)	(1.5557)
Board	0.6680	0.4845	0.1547	0.9350***	0.7383**	0.7895
	(1.2604)	(1.5664)	(0.2379)	(2.8534)	(2.2874)	(1.3493)
Indep	1.6239	1.0559	2.2404	1.9191**	1.9349*	1.5625
	(1.3852)	(1.2043)	(1.2778)	(2.1756)	(1.9499)	(1.2991)
Top1	-0.3852	0.8028	2.5975	-0.4767	0.1705	0.0753
	(-0.4568)	(0.9882)	(1.5783)	(-0.7862)	(0.2572)	(0.0678)
SOE	-0.1592	-0.0128	-0.6167	0.0241	0.0273	-0.4526
	(-0.4307)	(-0.0512)	(-0.9765)	(0.1079)	(0.1004)	(-1.2780)
Seperate	0.0157	0.0047	0.0077	0.0133*	0.0205**	-0.0119
	(1.4625)	(0.5282)	(0.4594)	(1.7634)	(2.4841)	(-0.9418)
Constant	5.9773***	2.3618	4.4383**	5.2539***	6.0787***	4.5142*
	(2.6557)	(1.4610)	(2.0619)	(2.9770)	(2.7134)	(1.8749)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1376	21921	5569	27728	23968	9329
R-squared	0.018	0.025	0.019	0.021	0.020	0.023

五、结果与讨论

(一) 研究结果

基于 2010—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显著扩大了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比值，说明其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对企业内部收入结构带来新的不均衡趋势。该发现在采用替代变量、工具变量法等多种稳健性方法检验后依然稳固，表明人工智能对薪酬结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内生稳健性。

进一步的分组回归揭示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人工智能对薪酬差距的扩大效应在非劳动密集型、非资本密集型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而言，在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多集中于流程自动化与系统集成，其技术溢价主要体现在管理岗位与关键技术岗位，导致普通员工的相对收益边际递减。在非资本密集型企业中，AI 技术多以平台化或轻资产形式嵌入，推动组织结构扁平化与高效决策机制建设，对高端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上升，由此也强化了向上倾斜的激励模式。而在中西部地区，受制于人才资源供给不足与基础设施限制，企业难以通过外部市场配置 AI 人才，更依赖内部薪酬激励以稳定高管与核心技术人员，这种路径依赖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内部薪酬结构的极化。

(二) 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其深度嵌入企业治理与运营流程的过程正在重塑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与资源分配逻辑。本研究发现，其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呈现出结构性倾斜与分化趋势，需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层面予以精准回应。

首先，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机制，强化对技术红利内部分配结构的监管。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企业管理层在战略制定与资源调配中的权重提升可能带来薪酬激励上的不对称。建议相关监管部门推动薪酬披露标准与高管薪酬结构透明化，健全公司治理中的薪酬委员会制度，促使企业在制定薪酬政策时充分考虑组织内不同岗位间的贡献与价值匹配，避免因高管激励过度而损害整体公平性与组织凝聚力。

其次，应加大对轻资产企业中技术性人力资本体系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本文发现，人工智能在非资本密集型企业中的扩散过程伴随着对复合型人才的高度依赖，若缺乏相应的激励与培训体系，容易加剧组织内部的薪酬分化。建议政府通过专项资金、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企业构建覆盖初中高级别的人才梯队，加快制定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人力资源制度，推动形成以能力为导向、结构优化的人才激励体系。

最后，针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在技术转型中的结构性短板，应通过“区域公共平台+企业联合参与”的方式提升其数字化适配能力。具体而言，可设立区域性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心、高管能力提升基地，支持本地企业在人才获取、流程改造、绩效管理关键环节的系统优化。同时，应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

构发挥服务功能,通过政策宣导、经验交流和案例推广,提升中西部企业在技术变革中实现均衡转型的能力和韧性。

参考文献:

- [1] 郭凯明.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J].管理世界, 2019, 35(7): 60-77+202-203.
- [2] 徐鹏, 徐向艺.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逻辑与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 2020, 36(1): 122-129+238.
- [3] 姚加权, 张银澎, 郭李鹏, 等.人工智能如何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基于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的视角[J].管理世界, 2024, 40(2): 101-116+133+117-122.
- [4] 宣畅, 张万里.智能化对企业生产绩效的微观影响机理——以产能利用率和盈利能力为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1, 42(11): 96-119.
- [5] 张涵钰, 张文韬, 李涛.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发现[J].宁夏社会科学, 2023, (5): 118-129.
- [6] 孙慧, 罗添, 夏学超.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质量[J].产业经济评论, 2025, (2): 5-26.
- [7] 宁楠, 惠宁.人工智能与制造企业创新: 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J].经济体制改革, 2025, (1): 120-126.
- [8] 韩清, 陈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J].上海经济研究, 2025, (2): 79-92.
- [9] 钟玉婷, 赵惠珍, 钟坚.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研究动态与评述[J].科技管理研究, 2025, 45(4): 1-10.
- [10] 康晨, 李代悦, 程名望.人工智能、城乡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J/OL].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18[2025-04-1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267.n.20250106.1728.016.html>.
- [11] 刘林, 李猛.工业机器人应用、资源配置与流动人口收入分配[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5, 40(3): 98-116.
- [12] 周洁.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与对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湖南社会科学, 2023, (6): 51-60.
- [13] 余玲玲, 林凤婷, 魏下海.企业数字化发展、供应链溢出与就业增长[J].学术研究, 2025, (1): 116-123.
- [14] 姚笛, 陈东, 郑玉璐.人工智能与企业内工资差距: 任务偏向还是技能偏向[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3, 43(9): 99-112.
- [15] 刘红英, 黄旭, 朱琪.人工智能、技能培训与劳动者工资差距[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4, (11): 103-116.
- [16] 胡善成, 张云矿, 张彦彦.信息化与性别工资差距——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 2024, (1): 134-148.
- [17] WU Y, LIN Z, ZHANG Q,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ge dynamics, and ine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 96(C): 103739.
- [18] 许清清, 董培超, 路兰.智能制造驱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实证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07): 25-38.
- [19] 魏志华, 王孝华, 蔡伟毅.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J].中国工业经济, 2022, (3): 152-170.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Wage Inequality: How Do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e Corporate Pay Structures?

Xiaochun Wang¹

¹ Office of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Guilin University, Guili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being deeply embedded into corporat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es, its impact on intra-firm income distribution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scholarly atten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irm-level AI intensity index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between 2010 and 2023,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AI development on internal wage dispar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gher levels of AI adoption significantly widen intra-firm wage gaps, with AI technologies tending to increase the income divide between executives and ordinary employee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ccounting for endogeneity through alternative measure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es.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non-labor-intensive firms, non-asset-intensive firms, and firms locate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offering a novel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under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grounding and policy insights into the distributive implications of AI adoption across regions and industrie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ra-firm wage gap; Non-labor-intensive firms; Non-asset-intensive firm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06

商业性与批判性博弈：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转向与现实困境

李柯慧¹ 李 昂² 王 竣³

(¹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63, ²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4,

³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在“她经济”与社会性别意识觉醒的双重驱动下，当代女性主义电影通过叙事主体重构与类型化生产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商业突围，但其批判内核也面临着消费主义收编的现实困境。本文以文化工业理论为支点，结合中外案例系统梳理当代女性主义电影在叙事主体、生产机制、议题传播上的创作转向，深入剖析流量逻辑导致的批判内核简化、性别叙事二元化等问题，以期当代女性主义电影在商业性与批判性之间寻求平衡提供理论参照，为性别议题的银幕叙事拓展新路径。

关键词：女性主义电影；创作转向；消费主义；现实困境；文化工业理论

一、引言

近年来，主流院线涌现出多部“女性主义电影”佳作，其深度聚焦女性主体的身份困境与精神图谱，引发市场与学界的双重关注。2019 年韩国电影《82 年生的金智英》（金度英，2019）以女性主义视角，尖锐批判韩国家庭主妇因过度承担育儿家务而导致的主体性消解现象；同年我国影坛亦涌现两部女性主义代表作：杨荔钠导演的《春潮》（杨荔钠，2019）将镜头对准家庭内部异化的母女关系，通过职业女性郭建波的生存轨迹，揭示当代女性在婚恋伦理、代际冲突中的真实困境；滕丛丛执导、姚晨监制并主演的《送我上青云》（滕丛丛，2019），则以都市高知女性盛男的癌症困境为叙事切口，以充满哲学思辨的女性主义立场解构传统性别秩序下的生存焦虑。2021 年清明档影片《我的姐姐》（殷若昕，2021）更以“她电影”的鲜明属性，通过安然面临的“扶弟魔”伦理困境，触发社会对女性题材创作、女性电影人话语空间及女性主义思潮的多维讨论。这些作品以差异化的叙事策略，共同构建了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多元面貌，既彰显了影像媒介对性别议题的介入深度，也为社会文化转型提供了镜像参照。

相较于传统影视作品中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角色，当代银幕上的“新女性”被赋予更为充分的主体话语权与行为自主性。女性主义题材电影的市场成功本质上源于角色塑造维度的突破，其通过叙事重心的转移与人物弧光的重构，使女性不再仅是情节推进的辅助符号，而成为承载时代精神的叙事主体。这种创作转向既呼应着现实社会中女性自主表达权的回归，也折射出文化工业对性别议题的商业性收编。当 80、90 年代的女性主义还局限于学院理论场域的精英化讨论，当下的“女性意识”已借助影视工业的类型化生产与社交媒体的流量逻辑演变为兼具商业属性与公共议题价值的文化景观，如女性向影视内容的井喷式增长、“她经济”驱动下的出版热潮，以及社交平台“性别视角重构”引发的传播裂变等。

然与此同时，这种看似“下沉”的女性意识传播却也正伴随消费主义的渗透而陷入新的现实困境。女性话语在获得更多曝光度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简化为流量标签的危险，诸如“独立女性”形象的模板化生产、性别议题的情绪化表达，正逐渐消解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内核。当大众文化将“女性声音”简化为商业逻

作者简介：李柯慧（1999—），女，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艺术理论；

王 竣（2002—），男，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电影、艺术媒介与社会包容。

通讯作者：李 昂（1999—），男，电影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影像美学、电影媒介文化与社会现实议题。

辑下的标准化产品,性别叙事的丰富性可能被压缩在“反叛—觉醒”的二元框架内,反而遮蔽了现实中性别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这种文化症候不可避免地提示市场,关于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与批评,亟需在商业性与批判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避免让“女性意识”的传播沦为另一种形式的话语规训。

二、女性主义电影界定

“女性主义电影”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实践,始终与性别权力结构的解构密不可分。其定义并非简单的题材分类或风格标签,而是根植于对女性主体性的探索以及对电影语言本身的革命性反思。自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与电影理论结合以来,女性主义电影逐渐从边缘化的政治工具发展为多元化的艺术表达,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影像媒介重构性别话语权,揭示并颠覆社会文化中的隐形压迫机制^[1]。

“女性主义电影”界定需回溯至1970年代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穆尔维以精神分析理论揭露好莱坞电影如何通过“男性凝视”将女性物化为被观看的客体,这一批判奠定了女性主义电影的理论基石^[2]。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电影逐渐形成两条实践路径。其一,批判性重构。通过解构主流电影中的性别编码(如类型片中的“蛇蝎美人”或“天使母亲”)暴露父权叙事的意识形态操控,此类实践是对“自然化的意识形态”的“去神秘化”过程^[3],当主流电影将性别权力关系伪装成“自然法则”时,批判性重构便以影像为手术刀剖开其伪装表皮,使“被讲述的女性”变为“讲述中的女性”。其二,另类表达。以实验性叙事、非传统镜头语言构建女性主体视角,如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在《让娜·迪尔曼》(1975)中以极端写实主义呈现家庭主妇的日常劳动,将“私人领域”政治化。这类作品拒绝套用既有叙事框架,转而以实验性手法构建女性专属的感知结构,让镜头成为女性眼睛的延伸而非男性欲望的代理^[4]。

进入21世纪,女性主义电影的内涵随社会运动的深化而不断扩容。首先为交叉性研究的介入,其突破单一性别视角,强调种族、阶级、性取向等多重身份的交织影响。其次为商业类型片的突围,流媒体时代的女性主义电影在商业框架内植入性别议题的微叙事。这种“温和的颠覆”恰是女性主义从边缘话语向文化渗透的表征。从劳拉·穆尔维的“男性凝视批判”到当下的前瞻性叙事实践,其核心从未偏离对“权力关系”的质问。只不过,这份质问从早期的锋芒毕露逐渐演变为更复杂、更具弹性的对话姿态。

三、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转向:从边缘到主流的叙事重构

在影视工业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形象长期困陷于男性凝视框架。然当当代文化语境遭遇性别议题的深度重构,女性主义电影正经历着从边缘话语到主流叙事的范式转换。

(一) 叙事主体的去中心化突破:从“附属符号”到“意义中心”

传统影视中的女性常被编码为两种极端形态。要么为《渴望》(1990)中刘慧芳式的“贤妻良母”,以自我牺牲成就男性价值;亦或为《色戒》(2007)中王佳芝式的“欲望客体”,沦为推动男性叙事的情欲符号。这种天使与魔鬼的二元塑造本质上是男性凝视的产物,女性缺乏独立的主体意志。但是,当代女性主义电影颠覆了这一范式。《送我上青云》(2019)以癌症患者盛男的情欲觉醒为主线,打破“女性性欲=羞耻”的文化禁忌,其直白诉求将女性身体从男性凝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承载自我意识的主体。《我的姐姐》(2021)中,安然面临的“是否抚养弟弟”的伦理困境构成叙事核心,影片通过她在亲情与自我、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间的挣扎,构建了具有现实穿透力的女性决策空间。女性不再是情节的被动承受者,而是推动叙事发展、承载时代精神的意义中心。

(二) 类型化生产与:从“作者表达”到“她类型片”崛起

为适应市场规律,女性主义电影逐渐形成成熟的类型化生产模式。在家庭伦理片领域,如《春潮》(2019)以郭建波与母亲纪明岚的代际对抗为切口,将个体命运与性别制度、代际创伤相勾连,使私人领域的情感冲突成为社会结构的镜像。职场女性片则以《找到你》(2018)则以女律师李捷与保姆孙芳的双线叙事,揭示不同阶层女性在职场与家庭的双重挤压,将性别议题嵌入社会现实。女性成长片《少年的你》(2019)虽以校园暴力为主线,但其对陈念与魏莱女性友谊及敌对关系的刻画突破了传统刻板印象。于商业策略层面,明星效应与话题营销则成为破圈关键。姚晨以监制+主演身份参与《送我上青云》(2019),其“独立

女性”的公众形象与影片的女性主义内核形成完美互文；《82年生的金智英》（2019）通过“每个女性都经历过金智英的一天”的扩散式传播，将电影议题转化为社会运动，创造了现象级传播案例。

（三）社会议题的影像化转译：从抽象理论到可感知的现实寓言

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重要贡献亦在于将抽象的性别理论转化为具象的影像叙事。首先为代际冲突的可视化，《春潮》中，母亲纪明岚通过控制女儿郭建波的生活来填补情感空缺，女儿则以沉默对抗母亲的情感勒索，这种充满张力的母女互动将父权制下女性互为压迫者的理论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家庭悲剧。其次为职场歧视的日常化呈现，《加油，妈妈》（2022）中，周南南求职时遭遇的“已婚已育”隐性歧视、何晓涵因丈夫失业面临的职场边缘化，这些被镜头捕捉的职场切片将“性别歧视渗透在职业发展每个环节”的现实困境具象化。这些影片通过个体命运到结构批判的叙事转化，使观众在具体人物命运中体认结构性性别不平等，进而触发公共讨论。例如《我的姐姐》（2021）结尾的开放式处理，“安然是否签字收养弟弟”在社交媒体引发“女性是否有拒绝牺牲的权利”的持续辩论，实现了从银幕叙事到社会行动的意义生产。那些曾被视为私人领域的情感创伤、职场挫折，在集体讨论中显影。这种社会议题的影像化转译，正是女性主义电影在当代社会的独特价值，其让结构性压迫可见、可感、可讨论，并在光影流转中种下改变的种子。

四、消费主义收编下的文化困境：批判性内核的消解与重构

当代女性主义电影通过去中心化叙事与类型化生产突破边缘圈层，在“她经济”浪潮中斩获票房与话题的双重丰收时，消费主义的文化收编机制亦悄然显现。这种收编并非简单的商业侵蚀，而是资本逻辑与性别议题在媒介场域的复杂博弈。

（一）女性话语的流量化陷阱：从多元叙事到标签狂欢

当“独立女性”成为消费主义的流量密码，其内涵也正历经着标签化生产：经济独立被简化为“年薪百万+CBD写字楼”的职业景观，情感反叛退化为“不婚不育+拉黑前任”的行为装置，形象塑造则臣服于“冷白皮+奢侈品傍身”的视觉规训。这种模板化叙事在众多“大女主剧”中呈现出典型的符号拜物教特征，如《都挺好》（2019）里苏明玉的性别觉醒却最终落实为购买千万豪宅、掌掴原生家庭的物质胜利；《欢乐颂》（2016）对安迪的独立女性想象异化为“高学历+冷漠症”的阶层区隔。这些叙事策略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对女性解放话语的符号异化，其将性别主体的精神觉醒转化为可量化的消费指标，将结构性批判窄化为个体层面的物质逆袭，使女性解放叙事沦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

同样，部分“她电影”也陷入“爽感叙事”误区，将女性觉醒简化为“手撕渣男”“职场逆袭”的套路化表达。如《二十不惑》（2020）《三十而已》（2020）以离职换工作等同于女性意识觉醒及“包治百病”的消费主义解决方案消解了性别议题的深度批判。当“独立女性”成为可明码标价的文化商品，其毫无疑问成为消费主义符号的能指狂欢。此类现象鲜明折射出消费主义时代商业化诉求的文化悖论，看似繁荣的“她叙事”背后，也是女性主义批判性内核的空心化。那些本该指向制度性变革的性别议题，被异化为供观众消费的视觉景观。而本应复杂的女性生存困境，被简化为符合消费主义审美的爽剧套路。这种符号异化的过程，不仅是创作层面的叙事退化，更是社会性别话语在商业化资本漩涡中的价值迷失。

（二）批判性与商业性的失衡表现：从颠覆到妥协的蜕变

在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批判性与商业性博弈之中，其批判性内核与商业逻辑的张力正催生叙事策略的显著蜕变，突出表现为批判力度的温和化转向与叙事框架的二元对立陷阱。首先是批判深度的温和化处理。即使是被视为激进之作的《82年生的金智英》，也不可避免地在市场压力下软化了批判锋芒。影片对韩国父权制的揭露停留在家庭场景（丈夫忽视育儿、婆婆催生），却回避了职场性别隔离、政治领域女性缺席等结构性问题。而对金智英精神崩溃的处理却最终诉诸“丈夫的理解”，暗示家庭内部的情感调和即可解决系统性性别不平等，这种“温和批判”其实是对商业接受度的妥协。其次为性别叙事的二元对立陷阱，当下女性主义电影时常陷入“觉醒/沉沦”的非此即彼框架。要么如《送我上青云》盛男般拒绝婚姻、追求情欲自主的彻底反叛，要么如《找到你》孙芳般沦为制度牺牲品。这种简化的叙事策略忽视了现实中女性生存的复杂性，因更多女性仍在传统期待与自我实现间艰难平衡。

（三）文化工业理论视角下的困境根源：从批判武器到商业工具的异化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对艺术自主性的消解机制^[5]。当标准化生产成为文化产品的主导范式，艺术不再是批判现实的武器而沦为资本盈利的工具，其标榜的“个性化”本质是掩盖同质化生产的虚假表象^[6]。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现实困境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注脚，集中体现为批判维度的结构性收编与受众认知的单向度塑造。首当其冲的就是批判精神的去锐化，其为迎合主流市场，性别议题被包装成“安全的反抗”。允许女性抱怨家庭琐事，但不能质疑制度；允许展现职场歧视，但要以“升职加薪”作为解决方案。这种改良式批判实质是资本对激进思想的收编。于是接踵而来的便是被动化塑造的受众认知，流量逻辑下，电影不再追求引发深层思考，而是通过“金句营销”“人设炒作”制造即时情绪共鸣。当观众习惯了一键式觉醒的爽感叙事，其认知能力被削弱即为必然，形成阿多诺担忧的“文化工业麻痹受众批判意识”的恶性循环。

四、突围路径：寻找商业性与批判性的平衡点

于当代女性主义电影而言，突破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具有张力的叙事策略。既非放弃商业性的纯粹批判，也非沦为资本附庸的妥协表达，而是通过多元话语体系的创新建构，在商业可行性与批判锐度之间寻找平衡点。

（一）塑造“非典型觉醒”的复杂女性形象

真正的女性主义叙事需要告别“觉醒/沉沦”的二元认知范式，转而聚焦觉醒过程的矛盾性、渐进性与策略性。《春潮》对郭建波的形象塑造提供了突破性样本，她的性别觉醒并非通过《送我上青云》式的宣言式反叛，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褶皱中悄然发生。其通过摄像机记录母亲纪明岚的谎言，在病历单隐瞒的细微对抗里体认代际创伤，于婚外情的情感裂隙中触摸婚姻制度的本质。这种“非典型觉醒”拒绝将女性主体简化为符号化反叛者，而是呈现其作为“策略性生存者”的真实状态：既无法完全挣脱母性天职的文化规训，又在私密空间构建微小的反抗飞地。类似的，《我的姐姐》结尾的握手镜头也具有深刻的符号学意蕴。安然与收养家庭的妥协性握手，并非传统叙事中“自我牺牲”的道德崇高化，也非“彻底决裂”的激进宣言，而是展现现实语境下女性的生存智慧，在户籍制度、亲属伦理的多重制约下，选择暂时承担抚养义务的同时保留未来反悔的权利。这种选择恰恰戳破了消费主义营造的“一键觉醒”神话。

（二）运用开放式叙事保留议题讨论空间

消费主义叙事偏好的“问题解决式”闭环，本质是对性别议题的虚假缝合。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突围之道，同样在于通过开放式叙事保持议题的讨论张力。《82年生的金智英》结尾的处理极具象征意义，镜头定格在金智英重新握起笔的瞬间，既暗示她通过书写获得暂时的精神救赎，又未交代这种救赎能否抵御现实中的育儿压力与职场排斥。这种留白不是叙事缺陷，而是对“家庭/自我”二元困境的真实呈现。当社会支持系统尚未完善，个体层面的平衡始终处于脆弱状态，这种开放式结局则更具社会性探讨，亦是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影像化实践。拒绝提供虚假的和谐图景，通过保留矛盾的未解决状态，维持对现实的介入力度。当《春潮》的家庭悲剧拒绝温情化收尾，《我的姐姐》的伦理困境悬而未决，这些“不完美”叙事恰恰构成对消费主义“爽感闭环”的有效对抗。在商业性与批判性的天平上，这种既保持现实痛感又具备传播效能的叙事探索，或许能为当代女性主义电影创作开辟一条崭新路径。

五、结语

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商业性与批判性博弈，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与社会进步诉求的话语角力。一方面，商业转型使女性主义从边缘理论转化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实践，推动了性别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消费主义的收编导致批判内核被简化、稀释，甚至异化为新的话语规训。本文通过梳理创作转向、解构困境根源、探索突围路径，揭示了当代女性主义电影在市场化进程中“进步与妥协并存”的复杂图景。强调其健康发展既不能因商业压力放弃批判锋芒，也不应以精英姿态拒绝大众传播，而应于商业性与批判性中寻求平衡，以商业外壳承载社会议题，以批判内核提升商业价值。总之，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使命不能仅

限于展现困境,更要成为撬动社会变革的支点。当商业性与批判性形成良性互动,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才能真正超越消费符号,成为照进现实的一束光。

参考文献:

- [1]李晓红,王亚茜.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及其后现代主义思考[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4(05):160-172.
- [2]朱婧文.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解析[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02):141-143.
- [3]祁涛,辛小月.传播意图生成的物质基础及其言说的自然化——基于对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的重读与分析[J].新闻爱好者,2021,(03):61-63.
- [4]连洁.电影《让娜·迪尔曼》:沉寂之中的爆发[J].四川戏剧,2022,(05):125-130.
- [5]胡绪明,陈学明.启蒙的逻辑与现代性的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本学解读[J].学海,2007,(05):83-87.
- [6]赵勇.何谓“文化工业”——解读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01):29-39.

The Tensions Between Commerciality and Criticality: Creative Shift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Cinema

Li Kehui¹, Li Ang², Wang Jun³

¹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²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China

³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her economy" and the awakening of social gender consciousness, contemporary feminist films have achieved a commercial breakthrough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through narrative subject reconstruction and typological production. However, their critical core also faces the cultural dilemma of consumerism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industry as the fulcrum, and combines domestic and foreign case studie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creative turn of feminist films in terms of narrative subjects, production mechanisms, and issue dissemination. It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caused by flow logic, such as the simplification of critical core and the dualization of gender narrative.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eminist films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commercialism and criticality, and also expands new paths for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gender issues.

Keywords: Feminist films; Creative shift; Consumerism; Realistic dilemma; 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20

双重视角下人工智能驱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卜谊榕¹

(¹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与数据要素视角, 探究人工智能驱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制及实践路径。数据要素通过“资源化—产品化—资本化”三级跃迁重构制造业价值链, 创新生态系统依托政府引导、链主企业主导、高校科研支撑的协同网络, 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双要素协同模式通过算法优化资源、数据激活生态、主体协同破瓶颈, 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理论与实施框架。

关键词: 创新生态系统; 数据要素; 人工智能; 先进制造业

一、引言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织的背景下, 人工智能技术与数据要素的深度融合正成为重塑制造业竞争格局的核心驱动力。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与数据要素双重视角, 系统探讨人工智能驱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聚焦于数据资源化—产品化—资本化的价值跃迁机制, 剖析“政产学研用”协同网络的构建路径, 揭示人工智能通过算法优化、数据赋能与主体协同重构制造业全链条的作用机理。研究旨在为突破传统制造系统的经验依赖与局部优化局限, 构建自感知、自决策、自进化的智能制造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施框架, 为新质生产力培育与产业竞争力提升提供创新范式。

二、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源于生态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早期研究中, Frosch & Gallopoulos (1989) 首次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产业研究, 强调产业系统与自然环境的互动。随后, Cooke (1992) 提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将创新主体与制度环境结合。21 世纪以来, 学者进一步拓展理论边界, 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 强调开放性、协同性和动态演化性 (李万等, 2014)。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以及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开放式创新网络。各主体之间通过知识流动、技术转移、资源共享以及合作研发等多种方式紧密相连, 协同互动, 共同致力于技术创新与价值创造。在技术产业化加速背景下,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基本搭建, 该模型包含创新主体群落、创新生态环境及创新评价三大核心模块, 以提升企业与产业国际竞争力 (张治河等, 2023)。 (施锦诚等, 2024) 则从技术架构、组织架构和产业链架构的多重嵌入视角, 系统解析了大模型产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 并构建了涵盖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强度、创新生态成熟度三个核心维度的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这些研究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2.2 数据要素理论

数据要素是指通过数字化手段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和分析后, 能够形成具有经济价值、可量化且

基金项目: 安徽省科研计划编制项目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融合应用“科技+绿色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编号:2024AH052674);

作者简介: 卜谊榕(1995—), 女, 助教, 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大数据财务会计;

可交易的数据资产。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相互融合、协同作用，成为驱动产业发展与创新的关键力量。从作用机制来看，数据要素可以降低经营决策的信息不对称性，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加速技术创新迭代周期，显著提升数字化转型效能（徐晔等，2024）。在宏观经济层面，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孙明茜，2025）。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构成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资源。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的双轮驱动（张夏恒等，2024）通过技术创新赋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吴武清等，2024），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核心动力源。

2.3 人工智能驱动

人工智能驱动是指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先进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服务等全链条环节，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管理决策的智能化支持以及服务模式的智能化升级，从而提升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例如，在智能工厂中，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生产线上的传感器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可实现设备的故障预测与预防性维护，避免生产中断；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测，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缺陷，提高产品质量；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智能客服，提升客户服务效率与满意度。

三、人工智能与双要素的协同逻辑

3.1 数据要素视角下的价值挖掘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产化成为激活数据要素市场的核心环节。数据交易市场的繁荣为数据资产化提供了流通渠道。通过数据资产化，企业能够将数据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实现数据的经济价值，为 AI 驱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与数据资源保障。

在先进制造业生产流程中，数据驱动决策发挥着关键作用。时序数据库能够高效存储和管理时间序列数据，为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与分析提供支持。机器学习算法则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潜在模式与规律，为生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李培根院士曾提出“暗数据”挖掘概念，强调从企业日常生产中产生的未被充分利用的数据中提取有价值信息。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对生产线上传感器产生的“暗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发现生产环节中存在的潜在质量风险点，提前调整生产参数，优化生产流程，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AI 算法在数据处理方面具有强大能力，能够实现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在供应链管理中，AI 算法通过对市场需求数据、库存数据、物流数据等进行综合分析，并利用运筹学算法和机器学习模型来最终实现智能调度、库存优化和物流路径规划，优化供应链全流程。低代码平台的出现为数据产品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降低了数据应用门槛，使更多企业能够参与数据产品的开发与创新。低代码平台还允许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协作开发，促进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使数据产品更贴合企业实际业务需求。通过数据产品创新，企业能够将数据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与服务，拓展业务领域，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

3.2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主体协同机制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网络是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引导角色，其政策支持与基础设施建设对人工智能驱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政府通过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绿色生产的先进制造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鼓励企业积极投入绿色制造技术研发与应用。在财政补贴方面，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对购置环保型人工智能生产设备的企业给予补贴，推动企业加快设备升级换代，提高生产效率与绿色化水平。政府还积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化生产提供了高速、稳定的数据传输保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供充足的数据资源。链主企业在先进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企业负责牵头技术攻关与供应链协同创新，对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至关重要。高校与科研机构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技术支撑力量，通过产学研合作，为先进制造业提供前沿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服务。高校与科研机构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与专业人才，能够开展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探索。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融合领域，高校科研团队开展机器学习算法优化、智能控制理论等基础研究，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先进制造业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同时进一步通过与

企业合作开展项目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高校还通过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为先进制造业输送新鲜血液，满足企业对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重构多主体协同的创新网络，并加速知识溢出效应的扩散。AI 技术的复杂性要求产学研主体突破传统的线性合作模式，转向开放化、网络化的协同创新。

四、人工智能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4.1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全链条技术融合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全链条的技术融合，本质上是通过数据-算法-算力的三维技术范式，对传统制造系统进行系统性重构。这种重构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深度耦合为特征，通过算法对制造流程进行全局建模与动态优化，突破传统制造中存在的经验主义、局部优化和静态决策的局限，推动制造系统向具有自感知、自决策、自进化能力的智能形态演进。在设计环节，人工智能通过建立设计参数与性能目标的非线性映射关系，实现设计空间的智能化拓展。利用生成式设计模型将工程师经验与历史数据进行编码，再通过对抗训练和强化学习，AI 系统可以自主搜索满足多约束条件的最优解决方案组合，突破人类设计师的认知边界。这种设计范式创新驱动制造业从“经验驱动”向“智能驱动”重大转变。在生产环节，要强化 AI 技术在制造系统的动态调控能力。传统生产控制依赖预设的工艺参数，难以应对复杂工况。AI 通过构建生产过程的数字孪生体，实时融合设备传感器数据、环境参数与物料特性，运用时序预测模型进行多尺度建模。基于模型预测控制与深度强化学习，可优化工艺参数并动态调整生产节奏，使制造系统在扰动环境下保持稳定运行。这种动态优化机制不仅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一致性，还通过实时能耗物耗最小化实现绿色制造。在服务环节，通过 AI 技术重塑制造价值链的价值创造逻辑。用 AI 赋能的主动服务系统取代传统被动式售后服务，融合设备运行数据、用户行为数据与环境数据，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知识图谱，进而实现预测性维护与服务资源精准配置。同时，利用 AI 需求挖掘算法通，分析用户操作日志等非结构化数据，提炼潜在需求特征并反馈至设计生产环节，形成“服务-设计-生产”的闭环价值流。

4.2 数据要素重构价值链

数据要素重构价值链的本质是数据资源化到资源产品化再到产品资本化的三级跃迁，将制造业从“物理实体运营”升级为“数字孪生运营”。在这一过程中，数据不仅是生产过程的记录载体，更成为驱动制造系统自适应、自演进的核心生产要素。

在数据治理体系构建方面，首先要建立统一的工业数据分类与元数据标准，定义数据接口规范，解决多源异构数据的对齐问题。其次要设计数据清洗、去噪、标注的自动化流程，构建覆盖“采集-存储-应用”的质量追溯体系。同时，要基于区块链与隐私计算技术，建立数据确权、分级授权、跨境流动的合规框架，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共享模式，破解数据孤岛与隐私泄露矛盾。在数据技术支撑体系方面，要大力构建数据中台，提供标准化数据服务接口，支持快速开发预测性维护、智能排产等场景应用。

在数据价值转化体系方面，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制造系统，注入实时生产数据进行仿真推演，动态优化工艺参数并生成决策建议，形成“感知-分析-执行-反馈”的生产链条。同时开发数据订阅服务、数据质押融资等新型交易形态，将数据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现金流与资本溢价。最终要整合研发端、生产端、服务端，构建跨生命周期数据图谱，驱动产品迭代。

在数据生态协同体系方面，要推动制造业与金融、物流、能源等领域的数据联邦学习，通过多行业数据关联分析发现系统性优化机会；还要实现政产学研的深度联动，形成“数据开源社区-商业化应用-反哺基础研究”的创新循环。

4.3 多元主体共建创新网络

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跨领域、跨层级的系统性工程，需通过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的深度协同，构建开放共生、动态演化的创新生态系统。政府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为生态协同奠定结构性基础。一方面，通过算力网络、数据开放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制定数据流通标准来促进跨域共享；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法规引导生态演进方向，如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激发创新活力，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共性技术攻关，构建兼顾安全与发展的监管框架。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向“赋能者”，通过规则设计平衡各方利益，确保生态的可持续进化。在企业端要激活生态价值网络。企业作为技术落地的主体，需在生态中承担“链主”与“枢纽”的双重职能。龙头企业依托技术积累与场景优势，搭建开放共享的技术平台，将核心能力模块化、工具化输

出,例如开放 AI 开发框架、工业算法库等资源,降低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本;中小企业则聚焦垂直场景创新,通过接入平台资源快速实现技术适配,并将实践经验反哺生态优化。企业间通过数据共享、联合研发等协作机制,构建起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价值网络。在科研端要突破生态能力边界。科研机构是生态系统的创新引擎,其核心使命在于突破人工智能与制造融合的底层技术瓶颈。一方面,聚焦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另一方面,通过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知识流动。科研端的创新不仅为生态提供技术储备,更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带动整体能力升级。

多元主体的协同并非单向传导,而是通过资源交互与反馈调节形成的动态平衡。政府通过政策工具引导资源流向关键领域,企业将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攻关方向,科研机构以前沿突破反哺产业升级,三者形成“需求牵引-技术供给-制度保障”的三角支撑结构。在此过程中,数据、算法、算力等要素通过标准化接口自由流动,技术扩散从“中心辐射”转向“多点互联”,最终形成去中心化的创新网络。这种网络具备自组织、自适应特性,能够通过主体间的持续互动,动态调整技术路线与协作模式,实现生态系统的韧性生长。

五、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创新生态系统与数据要素协同驱动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数据要素通过“资源化-产品化-资本化”三级跃迁重构制造业价值链,而创新生态系统通过“政产学研用”协同网络实现技术扩散与价值创造。实践路径呈现为数据-算法-算力三维技术范式对制造全链条的系统性重构,以及政府引导、链主企业主导、科研机构支撑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研究揭示,这种双要素协同模式通过算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数据激活创新生态、协同突破技术瓶颈,为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施路径,对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全球产业竞争格局重塑具有重要启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与跨产业生态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 [1]唐露源,谢士尧,徐源.大模型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及风险识别研究[J/OL].科学学研究,1-12[2025-04-01].
- [2]张治河,高中一.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型的构建与分析[J].科研管理,2023,44(10):10-21.
- [3]施锦诚,王迎春.大模型创新变革:新模式、新挑战与新趋势[J].中国科技论坛,2024,(07):31-40+51.
- [4]尹西明,钱雅婷,武沛琦,等.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理论逻辑与典型实践路径研究[J/OL].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27[2025-04-01].
- [5]徐翔,李帅臻,李涛.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逻辑、机理与路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06):41-50.
- [6]孙明茜.数据要素赋能绿色低碳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西南金融,2025,(02):44-55.

Stud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Dual Perspectives

Yirong Bu¹

¹ Smart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nhui,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data ele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 dri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Data elements reconstruct the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through a three-stag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ization — productization — capitalization," while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relies on a collaborative network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led by leading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orted by university research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dual-element collaborative model optimizes resources through algorithms, activates the ecosystem with data, and breaks bottlenecks via entity collaboration,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and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high-end development,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 Innovation Ecosystem; data elemen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15

透视教师专业眼光：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中的挑战与策略

吕朔冰¹

(¹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新手教师在使用教科书时往往未能充分认识到课程标准的指导意义，对教科书整体结构的理解和把握有限，对教科书各部分内容的用途没有领会到位。此外，他们在教科书的诠释和整合方面倾向于照搬，缺少诠释和整合意识，对教科书内容的价值挖掘也不够深入。文章基于教师专业眼光的视域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来提升新手教师的教科书使用能力，包括深入研读课程标准、构建教科书知识体系、整合教科书内容、创新教科书诠释和开发利用教科书资源。这些策略旨在帮助新手教师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教科书，提高教学质量，并促进其专业成长。

关键词：教科书使用；教师专业眼光；新手教师

一、问题的提出

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特殊，又最被读者信赖甚至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深远的文本^[1]。教科书作为教学活动的核心材料，其有效使用对提高教学质量至关重要。教师懂得教科书，把握好教科书，会使用教科书，教科书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学界对教科书使用做出了更丰富的研究，对教师教科书使用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师群体的后备军，即师范生，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丰富学科知识，学习教学方法上，而几乎不关注提高教科书使用的能力。新手教师甚至是在站上讲台的前一刻，才拿起教科书开始备课，这样的教科书观念必定会导致不当的教科书使用。比起专业教师，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方面有着诸多不足。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过程中未能充分认识到课程标准的指导意义；对教材整体结构的理解和把握有限；对教材各部分内容的用途没有领会到位；在教材的诠释和整合方面，新手教师倾向于照搬教材，缺少诠释和整合意识；在对教材内容的价值挖掘上，新手教师能发现一般性的价值，但没有深入挖掘潜在价值；对教材配套资源的依赖更强，无法积极、灵活地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2]。

专业眼光(professional vision)一词最初由语言人类学家查尔斯·古德温(Charles Goodwin)于 1994 年提出，指的是具有相同兴趣的特定社会群体留意、理解和解决某些事件的独特方式，它反映了教师所具有的情境化的综合性教学品鉴能力^[3]。这种能力对于职前教师培养课程设计、在职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产出具有直接的指导价值。在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新手型教师由于缺乏经验，往往难以准确把握教科书的核心价值和有效运用教学策略，这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制约了教师自身的成长。因此，研究新手型教师如何运用专业眼光处理教科书，对于提教师教学质量和推动教师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新手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中遇到的挑战，分析他们如何运用专业眼光应对这些挑战，并探索有效的策略以提升新手型教师的专业眼光和教科书使用能力，力图为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教科书的使用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并逐渐成为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议题。霍秉坤将教科书使用研究框架分为教科书使用影响因素、教科书使用模式和教师转化教科书三个部分^[4]，其中教师如何转化教科书，一直是研究教科书使用的关键问题。霍秉坤认为，在中国课堂中，教师是主导者。因此，教学关键在于教师如何转化教科书内容^[5]。教师转化教科书可以理解为教师将文本形式的教科书经过加工处

作者简介：吕朔冰，女，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科书基本理论。

理,最终应用到教学的过程。对于教师转化教科书,众多学者做出了研究并且绘制了模型。安桂清分别从课程视角和教学视角构建出教师转化教科书的框架模型^[6]。雷米勒德(Remillard)从课程视角出发,分别构建出两种教师转化教科书的框架。第一从课程设计角度出发,绘制了教师与教科书互动关系的模型^[7];第二从课程要素构成出发,提出了教师—课程要素关系之间的互动框架^[8]。孔凡哲、史宁中在霍德(S.M.Hord)等人设计的IC成分检核表的基础上分析了教师使用教科书进行课程实施的主要过程,进而构建了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水平模型^[9]。总的来说,教师转化教科书的研究模型构建多着眼于课程与教学两个方面,并且大多关注到了教师的反馈。

2001年,美国西北大学米里亚姆·谢琳(Miriam Sherin)教授将“专业眼光”一词引至教师专业发展领域,提出“教师专业眼光”这一学术概念,强调当个体成为某一专业学科的一部分时,个体会被训练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去看待一组特定的现象^[10]。教师专业眼光就是学会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注意和解释课堂中的重要交互事件的能力,主要包括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和基于知识的推理(Knowledge-based Reasoning)两大过程^[11]。选择性注意涉及教师从复杂的课堂情境中选择注意什么教学事件的能力,而基于知识的推理则指教师对注意到的关键事件进行认知加工的过程^[12]。教师专业眼光的理论框架主要基于对教师如何捕获信息、解释和推理关键课堂事件,并据此采取行动的能力的分析。这一框架不仅关注教师对教学事件的感知,也涉及教师如何基于这些感知做出教学决策。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探索教师专业眼光的构成要素、影响因素以及如何通过专业发展活动提升教师的专业眼光。

三、教师专业眼光视域下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中面临的挑战

(一) 课程标准理解与专业眼光的目标导向偏离

教师专业眼光强调依据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准确把握教学目标,而课程标准是教学目标设定的重要依据。众多研究表明教科书与课程标准主题内容、认知水平以及核心素养落实程度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13]。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时多忠实于教科书的客观内容,而没有将教科书看作是一个整体,在课程标准的角度上,促进学生的发展。从选择性注意的角度看,新手教师难以精准聚焦教科书中的关键要求,如对学生在不同学科核心素养方面的培养目标关注度不够。以数学学科为例,对于“数据分析观念”这一核心素养在课程标准中的具体阐述,新手教师可能无法准确使用教科书去渐进式地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导致在教学内容选择和教学深度把握上出现偏差。在基于知识的推理方面,新手教师缺乏将教科书要求转化为具体教学行为的能力。他们在使用教科书时多关注内容本身,而不能很好的理解教科书编写者的意图,无法合理推断出适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使得教学过程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难以有效落实课程标准要求,影响学生对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核心素养的培养。

(二) 教科书结构把握与专业眼光的整体架构缺失

专业眼光要求教师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从宏观角度理解教科书结构,构建知识体系框架^[14]。新手教师在这一环节表现出明显的能力欠缺。在选择性注意方面,新手教师往往只关注到教科书中单个知识点或章节的局部内容,而忽视了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联。例如,在语文教材中,对于不同单元的主题编排、文体分布以及读写结合的整体设计意图,新手教师难以敏锐察觉。这使得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引导学生建立起系统的语文知识网络,学生难以理解不同知识点在提升语文综合素养中的相互作用。从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分析,新手教师由于缺乏对教科书结构的整体把握,无法基于学科知识体系推理出合理的教学顺序和教学重点分布。他们不能像经验丰富的教师那样,根据教材结构特点设计螺旋式上升的教学路径,以促进知识逐步深化和迁移应用,导致教学过程碎片化,学生难以形成完整的学科认知结构。

(三) 教科书内容整合与专业眼光的灵活运用障碍

教师专业眼光要求教师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根据教学实际灵活整合教科书内容,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15]。然而,新手教师在这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且在教科书相关运用上存在明显不足。在选择性注意方面,新手教师受自身经验及对学科知识理解程度的限制,难以精准定位教科书中适宜整合的内容以及整合方式。教科书内容丰富多样,但新手教师往往只能看到表面的、孤立的知识点,无法深入挖掘其内在联系。以历史学科教学为例,对于同一历史时期,教科书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史实呈现。但新手教师可能仅关注到某一个方面,如在讲述某朝代时,只着重讲解政治事件,而忽略了经济发展对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文化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根源。他们不能像经验丰富的教师那样,敏锐地识别出这些分散知识点之间的关联,难以将其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无法向学生全面呈现历史发展的

全貌。这种对教科书内容选择性注意的欠缺,导致教学过程碎片化,学生难以构建完整的历史认知体系。

在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新手教师由于缺乏跨学科知识整合的意识与能力,在运用教科书时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他们未能基于学科教学知识深入推理不同学科知识与教科书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难以将其其他学科相关知识融入本学科教学。他们不能为学生创造综合性的学习情境,将物理光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及生活实际相联系,不利于培养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养和跨学科思维能力。这使得教科书在新手教师手中仅被当作单一学科知识的载体,限制了专业眼光在教科书内容整合中的有效发挥,无法充分挖掘教科书的多元价值,进而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四) 教科书诠释与创新与专业眼光的深度挖掘局限

专业眼光促使教师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深入挖掘教科书内涵,进行创新教学诠释,新手教师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从选择性注意角度看,新手教师大多只能关注到教材表面呈现的知识和活动,对教材内容背后所蕴含的学科思想方法、文化内涵以及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意义缺乏敏锐洞察力。例如,在科学教材中关于自然现象的描述,新手教师往往仅完成知识传授,而忽视引导学生从科学探究精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深层次角度去理解和思考。

在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新手教师由于对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的掌握不够深入,难以基于这些知识对教材进行创新性诠释和教学方法设计。他们习惯于照搬传统教学模式,不能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情境推理出更具创意和启发性的教学活动。例如,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新手教师可能只是按照教材顺序逐句讲解,而无法根据文章主题和学生兴趣设计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使得教学过程缺乏活力,难以充分发挥教材的教育价值,体现专业眼光在教科书诠释与创新中的深度挖掘能力。

(五) 教科书资源开发与专业眼光的拓展意识薄弱

教师专业眼光要求教师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积极拓展教科书资源,丰富教学素材^[16]。新手教师在这方面表现出拓展意识淡薄的问题。在选择性注意方面,新手教师对教材配套资源过度依赖,对身边丰富的课程资源缺乏关注和识别能力。例如,在地理学科教学中,对于学校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地方特色文化等潜在教学资源,新手教师往往视而不见,不能将其纳入教学内容,使教学局限于教材中的案例和图片。在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新手教师由于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的局限,难以推理出如何将生活资源、社会资源和网络资源等转化为有效的教学资源。

四、基于教师专业眼光的新手教师教科书使用策略

(一) 以专业眼光深入研读课程标准,明晰教学方向

教师专业眼光中的选择性注意和基于知识的推理能力为新手教师研读课程标准提供了重要视角。新手教师应深入分析课程标准对应的教科书内容的各个部分,精准把握其中对学科核心素养方面的要求,以及不同学段的目标层次差异。新手教师要将课程标准中的要求、教科书内涵、学科知识体系和教学实际相结合,合理推断出每节课的具体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同时,要根据课程标准对教学评价的建议,设计合理的评价方式,以检验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确保教学活动始终围绕课程标准展开,使专业眼光在课程标准研读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 借专业眼光构建教科书知识体系,把握整体架构

借助教师专业眼光的视域结构,新手教师构建教科书知识体系可从以下方面着手。在选择性注意方面,对教科书进行全方位审视,从教科书的目录、章节标题、小标题等结构元素入手,深入分析其编排逻辑。关注教科书如何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顺序和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组织,识别出教科书中的核心知识模块、关键概念以及贯穿全书的知识线索。

其次,运用基于知识的推理,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通过构建思维导图或知识框架图等可视化工具,将知识点以层级结构、网络结构等形式呈现,清晰展现知识之间的相互关联和逻辑层次。在教学过程中,依据构建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遵循从整体认知到局部深入、从宏观把握到微观理解的路径逐步学习,帮助学生建立起系统、完整的学科认知结构,使专业眼光在教科书结构把握中发挥核心作用,提升教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教师专业发展进程中,构建教科书知识体系的能力是提升教科书使用能力的关键环节。教师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教科书结构,有助于在教学中灵活调用教科书内容,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时调整教学顺序和重点,使教科书成为教学的有效指导和工具。

（三）用专业眼光整合教科书内容，优化教学安排

教师专业眼光有助于新手教师灵活整合教科书内容。在选择性注意上，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深入分析教科书内容，挖掘知识点之间的潜在联系，确定可整合的内容。从知识的本质属性、应用场景、学科思想方法等多维度寻找关联点。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合理规划整合后的教学内容顺序。设计连贯、有序的教学活动，使教学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注重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依据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点，将相关学科知识有机融入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综合性的学习情境。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从多学科视角理解和运用知识，从而提升专业眼光在教科书内容整合中的有效性和创新性。在教师专业发展中，不断提升教科书内容整合能力，能够使新手教师更好地适应不同教学情境和学生需求，充分发挥教科书的的教学价值，提高教学质量，推动自身专业成长。

（四）凭专业眼光创新教科书诠释，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专业眼光促使教师深度挖掘教科书内涵并创新教学方法。新手教师结合学生特点和教学情境，运用选择性注意寻找教材内容与学生兴趣爱好、生活经验以及社会现实的契合点。关注教材中能够引发学生共鸣、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探究欲的元素，以此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

在基于知识的推理方面，基于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对教科书进行个性化诠释。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根据学生的思维特点、学习风格和认知水平，设计富有创意和启发性的教学活动。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提出独特见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同时，积极营造民主、开放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参与教材诠释过程，尊重并重视学生的观点和想法，与学生共同探索教材的多元意义，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彰显专业眼光在教科书诠释创新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种诠释教科书的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新手教师在教学中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增强教科书对学生的吸引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而提升自身在教科书使用方面的专业能力。

（五）靠专业眼光开发利用教科书资源，丰富教学内涵

教师专业眼光有助于新手教师拓展教科书资源。在选择性注意方面，提高对各种潜在教学资源的敏感度，拓宽资源获取渠道。不仅关注教科书配套资源，更要善于发现身边的生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等，如自然现象、社会热点事件、地方文化特色等，并将其与教材内容有机联系起来。

在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将挖掘到的资源与教科书内容进行深度融合。通过巧妙设计教学环节，将资源合理引入教学过程，丰富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和内涵深度。同时，注重提升多媒体资源制作和运用能力，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教学目标的需求，制作或筛选高质量、针对性强的多媒体资源，如教学动画、视频、音频等。利用多媒体资源的直观性、形象性和交互性，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充分体现专业眼光在教材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价值。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开发利用教材资源能力的提升，能够使新手教师丰富教科书的教学资源库，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展示了教师在教科书使用上的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石鸥,石玉.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12,33(04):92-97.
- [2]彭尔佳.不同发展水平教师教材使用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21.
- [3]Goodwin C. Professional vision[M]//Aufmerksamkeit: Geschichte-theorie-empirie.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2015: 387-425.
- [4]霍秉坤.教科书使用研究框架的评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6,45(08):31-42.
- [5]霍秉坤.教科书使用取向的核心:教师专业发展[R].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4.
- [6]安桂清.教材使用的研究视角与基本逻辑[J].课程.教材.教法,2019,39(06):69-74.
- [7]Remillard, J. T. Curriculum material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form: A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eachers' curriculum development[J]. Curriculum Inquiry,1999,29(3): 315-342.
- [8]Remillard, J. Examining key concepts in research on teachers' use of mathematics curricular[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5, 75(2), 211-246.

- [9]孔凡哲,史宁中.教师使用教科书的过程分析与水平测定[J].上海教育科研,2008,(03):4-9.
- [10]张音,陈欣.教师专业洞察力:内涵、要素与发展评价方法[J].外国教育研究,2019,46(02):89-104.
- [11]Van Es E A, Sherin M G. Learning to notice: Scaffolding new teachers'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s[J].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2, 10(4): 571-596.
- [12]Hiebert J, Morris A K, Berk D, et al. Preparing teachers to learn from teaching[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07, 58(1): 47-61.
- [13]魏缓,禹娜.新版教科书与课程标准一致性研究——以沪科版高中《生物学》为例[J].上海教育科研,2022,(09):19-26+45.
- [14]Jacobs V R, Lamb L L C, Philipp R A. Professional noticing of children's mathematical thinking[J].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10, 41(2): 169-202.
- [15]Steffensky M, Gold B, Holdynski M, et al. Professional vision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support in science classrooms—Does professional vision differ across general and content-specific classroom interac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15, 13: 351-368.
- [16]Richert A E. Inquiring About Practice: Using web-based materials to develop teacher inquiry[J]. Teaching Education, 2005, 16(4): 297-310.

Perspective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Visi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Novice Teachers in Textbook Utilization

Lv Shuobing¹

¹*Faculty of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Novice teachers often fail to fully recognize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demonstrat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extbooks' overall structure, and lack thorough grasp of the purposes of various textbook components. Additionally, they tend to mechanically replicate textbook content with insufficient interpretation and integration consciousness, along with inadequate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s within textbooks. Based on the visual structur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to enhance novice teachers' textbook utilization capabilities, including: conducting in-depth studies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constructing textbook knowledge systems, integrating textbook content, innovating textbook interpretation approaches, and developing textbook resource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assist novice teachers in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extbooks,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moting professional growth.

Keywords: Textbook utiliz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vision; Novice teacher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21

潮州市非遗文旅融合发展研究：现状、挑战与赋能模式

陈奕敏¹ 吴姗燕² 张芷莹¹

(¹广州软件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 本文聚焦于广东省潮州市非遗文旅融合发展的现状和态势, 通过分析潮州市的非遗文旅资源在官方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现状, 探讨其优势、劣势与挑战。本研究将从线上线下两个维度提出非遗文旅赋能创新模式, 例如线上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新媒体平台创新型社交互动形式; 线下通过政府合作共同打造潮州非遗传承体验和非遗文旅品牌节庆活动, 旨在为潮州非遗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为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非遗; 文旅融合; 新媒体

一、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重要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 正逐渐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潮州市拥有丰富多样的非遗资源, 如大吴泥塑、潮绣、潮州工夫茶等, 这些非遗项目承载着潮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是潮汕地区文化的瑰宝。截至目前, 潮州市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7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7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9项, 工艺美术品类的多样性在全国独树一帜。然而, 在文旅融合的大趋势下, 潮州非遗文旅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瓶颈。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 线上线下融合的文旅模式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 如何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实现潮州市非遗文旅的深度融合, 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此基础上, 本文深入研究潮州市非遗文旅融合的传播现状, 剖析其优势、劣势与挑战, 同时深入探讨潮州市线上线下非遗文旅融合的路径与举措, 并提出针对性的文旅赋能新模式, 旨在为潮州市非遗文旅产业的创新型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同时对于推动潮州乡村振兴、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潮州市非遗文旅发展现状

(一) 官方媒体传播现状

潮州官方媒体在非遗文旅融合传播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一方面, 传统地方性媒体平台如潮州电视台、潮州日报等, 均有开设非遗文化栏目, 对潮州非遗项目进行深度报道, 包括技艺展示、传承故事、文化内涵解读等, 官媒主要以权威、专业的视角向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传播潮州非遗文化。例如《遇见·湘桥文旅》电视专区由湘桥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和广东广电网络潮州分公司联合打造, 设有“非遗与手工艺”“历史文化街区”“红色印迹”“美食探觅旅游路线”“活动赛事”五大栏目, 涵盖潮剧、潮绣、木雕等非遗文化展示, 以及古城建筑、红色文化、美食路线、文化活动等内容。而广播电台如《潮汕风情话》、《914

基金项目: 202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文化流动与传承: 大吴泥塑艺术跨时代的非遗传播策略研究与应用》(编号: 202412618010)

作者简介: 陈奕敏(2003—),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非遗传播, 文旅传播;

吴姗燕(2004—),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新媒体平台, 文旅传播;

通讯作者: 张芷莹, 女, 博士, 副教授, 广州软件学院

潮故事》《听说潮州》等固定栏目采制潮州非遗专题节目 300 多期,邀请潮州金漆木雕、潮绣、潮菜、嵌瓷等项目传承人录制非遗教学慕课进行播放。另一方面,央视《走遍中国》之《文脉粤传—潮州》、央视《正大综艺》走进潮州视频等等也全面展示了潮州多项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了潮州非遗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同时,官方新媒体平台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账号,通过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及时发布非遗文旅活动信息、非遗文化知识普及内容等,增强了传播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例如,潮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非遗文旅相关文章,涵盖非遗展览、演出、体验活动内容,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为非遗文旅融合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而潮州市政府的抖音账号“潮州发布”也吸引了25.5万的点赞,有超过十分之一的视频内容都在报道非遗相关的主题。

(二) 社交媒体传播现状

社交媒体为潮州非遗文旅融合提供了广阔的传播空间。众多民间自媒体创作者、旅游博主等积极参与到潮州非遗文旅的传播中。他们通过拍摄精美的短视频、撰写生动的旅游攻略等方式,分享自己在潮州体验非遗文化的经历和感受,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和讨论。例如,在抖音平台上发起与“潮州非遗”“潮州文旅”相关的话题,许多游客在游玩后将自己参与非遗体验活动的视频上传至平台,吸引了更多人对潮州非遗文旅的关注。以 #潮汕过大年# 为例,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话题播放量突破 20 亿次。内容主题上,聚焦潮州大锣鼓、英歌舞、潮绣等非遗文化元素,还有潮汕牛肉火锅、潮汕工夫茶、潮州菜等特色美食,以及年轻人发布的潮汕逛吃攻略等,掀起“48 小时吃遍潮汕”热潮(如图1所示)。

同时,社交媒体上的用户互动性强,游客和粉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分享看法,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传播效应,并且依托网络亚文化,结合流行的热梗如“look in my eyes”等进一步去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另外,一些非遗传承人也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直播非遗技艺制作过程,与网友进行实时互动,进一步拉近了非遗与大众的距离,激发了大众对非遗文旅的兴趣。



图1 “48 小时吃遍潮汕” 主题抖音平台关键词词云图

三、潮州市非遗文旅发展的优势、劣势与挑战

(一) 潮州市非遗文旅的优势

潮州拥有丰富的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涵盖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多个领域,这些丰富的非遗资源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例如,大吴泥塑作为传统美术领域的璀璨明珠,起源于南宋,距今已有七百余年历史。它以当地优质黏土为原料,经捏塑、雕刻、彩绘等工序,塑造出造型夸张、生动传神的形象,成为潮州非遗文旅的一张亮眼名片。另外,潮绣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于世,成为吸引游客体验和购买的热门非遗产品。而潮州工夫茶作为一种独特的茶文化,不仅融入潮州人日常生活,而且利用茶博会等线下活动形成完整的文旅生态链。

而潮州作为旅游胜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旅资源和产业。潮州古城保存完好,古街古巷、牌坊街等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将非遗文化融入到现有的文旅线路和景点

中,能够丰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例如,在牌坊街设置非遗展示馆和体验店,让游客在游览古城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目前市工信局与百度集团携手打造的潮州工艺美术元宇宙精品馆在“Meta 彼岸”APP 上线,成为国内首个“元宇宙”地方工艺美术馆,馆内首期展出 46 位潮州工艺美术大师的 54 件精美作品,包括潮瓷、潮绣、潮雕、朱泥壶、麦秆贴画等^[1]。

(二) 潮州市非遗文旅的劣势

目前,潮州非遗文旅的发展存在资源分散、缺乏系统整合的问题。非遗项目之间、非遗与旅游景点之间的协同合作不够紧密,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例如,一些潮州非遗项目虽然有自己的展示场所,但与周边旅游景点的联动不足,游客难以在一次旅行中全面体验非遗文化和旅游资源,导致旅游体验的碎片化。同时非遗文旅融合需要能深刻领悟非遗文化且具备旅游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潮州目前在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非遗传承人大多专注于技艺传承,缺乏旅游营销和运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但是旅游从业人员对非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深入,难以将非遗文化与旅游产品进行有机结合,影响了非遗文旅融合的质量和效果。

(三) 潮州市非遗文旅面临的挑战

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发展,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潮州非遗文旅面临着来自潮汕其他地区的竞争压力,如果不能突出自身特色,打造具有差异化的文旅产品,就难以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例如,在传统手工艺旅游产品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相比,潮州的非遗产品在创新设计、品牌推广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另外在潮州非遗文旅融合过程中,如何平衡文化保护与开发是一个重要挑战。一方面,要充分挖掘非遗的文化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实现经济价值;另一方面,过度开发可能会对非遗的原生性和文化内涵造成破坏。例如,一些非遗项目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在制作过程中简化工艺、降低品质,导致非遗文化的失真,影响了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四、潮州市线上非遗文旅融合路径

(一) 数字化展示与传播

在数字化浪潮下,潮州市非遗文旅融合需紧跟时代步伐,大力推进数字化展示与传播。这不仅契合文化数字化的战略方向,也能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新路径^[2]。从理论层面来看,文化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的过程^[3]。对于潮州非遗而言,数字化展示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丰富多样的非遗资源更广泛地呈现给受众,提升其影响力;另一方面,数字化手段可实现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其魅力。

目前,潮州市在非遗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方面已有所行动。潮州市博物馆推出了线上 3D 云展厅,还对珍贵文物进行数字化扫描,在数字文物墙展示^[4]。然而,与广州、佛山等城市相比,潮州在数字化建设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加强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潮州市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强化数字化基础建设与平台搭建

加大对非遗数字化的资金投入力度,这是实现数字化展示与传播的重要物质基础。构建功能完备的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整合大吴泥塑、潮绣、潮州工夫茶等各类非遗资源,以多样化的形式呈现给大众。除了运用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常规手段,全方位展示潮州非遗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外,还应充分利用前沿技术,提升展示效果。例如,借助虚拟现实(VR)技术,打造虚拟的大吴泥塑制作工坊场景,用户戴上 VR 设备,仿佛真实置身其中,能够 360 度全方位观察艺人从挑选黏土、捏塑成型到精细雕刻、精心彩绘的全过程,甚至可以通过手柄操作,模拟体验泥塑制作的手感和步骤。利用增强现实(AR)技术,当用户使用手机扫描潮绣作品时,手机屏幕上会叠加显示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所运用的独特针法解析,以及历史上同类优秀作品的对比展示等信息,让用户更加深入地理解潮绣的艺术魅力。

2、深化产学研合作,培育专业人才

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是解决非遗数字化人才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潮州市可与本地及周边地区的高校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例如与韩山师范学院等院校合作,在相关专业中增设非遗数字化相关课程,如“非遗数字化展示设计”“数字技术在非遗传播中的应用”等,培养既懂非遗文化又掌握数字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二) 社交媒体营销与互动

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潮州市非遗文旅融合带来了新机遇^[5]。潮州市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多样化的营销与互动活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可定期发布非遗文化的相关内容,如非遗项目的介绍、传承人的故事、非遗活动的预告等,通过生动有趣的图文、视频,吸引用户关注,提升潮州非遗的知名度。其次,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功能,开展线上活动,如非遗知识问答、手工制作挑战等,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和互动性。以大吴泥塑为例,可以发起“大吴泥塑创意大赛”,鼓励用户上传自己的泥塑作品或创意设计,激发公众对非遗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再者,与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博主合作,邀请他们体验和宣传潮州非遗,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扩大传播范围。

五、潮州市线下非遗文旅融合举措

(一) 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开发

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开发是潮州市线下非遗文旅融合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整合非遗资源,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依据相关研究,旅游产业与非遗的融合能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文化体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6]。潮州市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和良好的文旅基础,开发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开发过程中,应深入挖掘潮州非遗的特色和文化内涵,结合当地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设计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线路。比如,以潮州古城为核心,串联起牌坊街、广济桥、韩文公祠等景点,融入大吴泥塑、潮绣、潮州工夫茶等非遗项目,打造“潮州古韵·非遗之旅”线路。游客在游览古城美景的同时,可在牌坊街的非遗展示馆和体验店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欣赏大吴泥塑的精美造型,观看潮绣的刺绣工艺,品尝正宗的潮州工夫茶,深入了解潮州的历史文化和非遗传承。

为提高线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需加强宣传推广。通过旅游宣传册、官方网站、社交媒体等渠道,广泛宣传非遗主题旅游线路。与旅行社合作,将线路纳入旅游产品体系,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同时,注重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

(二) 非遗体验活动与场景营造

非遗体验活动与场景营造能让游客更直观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增强旅游的趣味性和参与性。相关研究表明,通过打造非遗体验场景,开展丰富多样的体验活动,可提升游客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促进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非遗旅游体验的融入让旅游体验有了核心承载力。像傣族新年的“泼水节”、“花车巡游”和“傣味小吃”等地域习俗与符号,能唤醒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向往,成为旅游体验中极具当地气质的文化消费物。同样,在蠔埔村,国家级非遗“簪花围”与蚵壳筑成的房屋相互映衬,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体验簪花,使这个小渔村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洛带古镇将簪花与汉服旅拍相结合,发展出成熟且性价比高的消费产业链,满足了游客的潜在需求,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非遗的魅力,这充分说明了打造非遗体验场景和开展体验活动对提升游客认知的重要性^[7]。像贵州省通过拓展非遗旅游体验空间,打造了一批融非遗技艺体验、产品展示、互动社交业态为一体的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如黎平侗品源、榕江倚山人、丹寨国春银饰等。依托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打造的“多彩贵州非遗文创集市”,融入了黄平泥哨、银饰锻造技艺、蜡染技艺、苗绣、剪纸、竹编等非遗项目,通过传承人现场互动开展研学体验,使游客在参与过程中深入了解非遗文化,有力地促进了非遗的传承与发展^[8]。

潮州市可依托当地的非遗资源,举办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如大吴泥塑制作体验、潮绣刺绣体验、潮州菜烹饪体验等。让游客在专业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参与制作,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在大吴泥塑制作体验活动中,游客可以学习大吴泥塑的制作工艺,亲手捏塑出自己的作品,体验创作的乐趣;在潮绣刺绣体验活动中,游客可以了解潮绣的针法和技巧,尝试绣出简单的图案,感受传统刺绣艺术的魅力。

在场景营造方面,应注重还原非遗的原生环境,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在非遗体验场所的设计上,融入潮州的传统建筑元素、民俗文化等,让游客仿佛置身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结合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举办非遗文化节、民俗庙会等活动,展示潮州的非遗项目和民俗风情,让游客全方位感受潮州的非遗文化魅力。在春节期间举办潮州非遗文化节,展示大吴泥塑、潮绣、潮州剪纸等非遗项目,还有舞龙舞狮、潮州大锣鼓等民俗表演,让游客充分感受潮州的节日氛围和非遗文化的魅力。

六、结论

潮州非遗文旅融合在丰富的非遗资源和良好的文旅基础等优势下,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也面临着

资源整合不足、专业人才短缺、市场竞争激烈以及文化保护与开发平衡等问题。通过线上数字化展示与传播、社交媒体营销与互动,线下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开发、非遗体验活动与场景营造等赋能模式,能够有效推动潮州非遗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加大对非遗文旅融合项目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企业要积极参与,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创新非遗文旅产品和服务;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增强非遗保护意识,共同参与非遗传承和传播。通过各方共同努力,不断优化潮州市文旅发展策略,能加强文旅资源整合和文旅人才培养,并且在保护非遗文化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进一步打造具有潮州特色的非遗文旅品牌,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双赢。

参考文献:

- [1] 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94 号提案答复的函,2023-7-28 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94 号提案答复的函
- [2] 章牧,郭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以广东潮州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4,(06):93-100.
- [3] 张振鹏.文化产业数字化的理论框架、现实逻辑与实现路径[J].社会科学战线,2022,(09):74-83.
- [4] 湘桥共青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 | 逢数字化浪潮起 赋能潮州文化扬,2024-08-05https://mp.weixin.qq.com/s/IS_c30BMs4iUcj3TZPnkow
- [5] 廖春花,胡燕巡,周创如.文化非遗 || 潮州木雕时代功能演变与旅游审美研究,2024-8-30<https://mp.weixin.qq.com/s/W6cJwmE5-7cQPpAZIM9enQ>
- [6] 赴浙江柯桥支队.“清”年系民生 | 非遗与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浙江省柯桥区为例,2024-8-11<https://mp.weixin.qq.com/s/Rp0nr6h8JJ2Q7LbHSezOqw>
- [7] 宿州文化旅游.它山之石 | 文旅融合时代下,五类“非遗+”发展模式,2024-10-24<https://mp.weixin.qq.com/s/BwDiM9FIz2VG8yesxwZTvA>
- [8] 王明,刘孝蓉.王明 刘孝蓉 | “融”与“活”:非遗赋能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贵州探索,2024-11-15<https://mp.weixin.qq.com/s/26Vq7AE0Pimmfetr7W-uFg>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aozhou City: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Empowerment Models

Chen Yimin¹, Wu Shanyan², Zhang Zhiying¹

¹ Undergraduate, 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Guangzhou,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tourism in Chao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By analyzing the dissemination statu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Chaozhou City on official media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t explores its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This study will propose innovative models for empower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from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dimensions. For instance, online, digital technologies will be utilized to develop new media platforms and innovative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Offline, through government cooperation, jointly create Chaozho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experienc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brand festival activities, aiming to provide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haozho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and offer references for the local rural revitalization work.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New media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17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与实践路径

——以《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为例

傅丽君¹

(¹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的经典之作, 也是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核心特征及其中国化转型的梳理, 系统探讨了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框架与实践逻辑, 并深入分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继承与创新之处。本文还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基层治理实践, 探讨了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价值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方法;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引言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 是理解社会历史变迁、分析阶级关系和制定革命策略的关键方法。马克思在其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 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深刻揭示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复杂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 开创了阶级分析与具体历史事件相结合的独特模式, 成为后世研究阶级问题的重要典范。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 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本土化改造, 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出了深入解析,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 也为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和基层治理提供了启发。

当前关于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和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 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相关研究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 探讨其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揭示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与政治权力的更替^[1]。学者们普遍认为, 马克思通过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 奠定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范式。第二, 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本土化创新研究^[2]。研究者们关注毛泽东如何在中国社会特殊背景下对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 特别是对农民阶级的重视以及阶级划分标准的多元化, 被视为其方法论创新的核心内容。第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3]。这类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毛泽东如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然而, 现有研究大多偏重于单独考察马克思或毛泽东的阶级分析, 鲜有系统比较两者在阶级分析方法上的异同及内在逻辑联系。在方法论层面尚缺乏对毛泽东如何具体改造和发展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深入探讨。因此, 本文拟通过深入分析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阶级分析方法与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核心内容, 探讨两者在阶级划分标准、分析视角、政治功能及历史作用等方面的异同, 揭示毛泽东如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核心原则的基础上,

作者简介: 傅丽君(2000—),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

实现阶级分析方法的本土化与创新，进而总结这一方法在当代社会研究中的启示。

一、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渊源与主要内容

（一）理论渊源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土壤中，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斗争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阶级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为阶级的定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后续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变。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阶级分析成为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核心工具，马克思展示了阶级如何通过其经济地位与生产资料的控制，影响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与斗争。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并非简单地将阶级视为经济角色的载体，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阶级的政治行为，揭示了阶级之间复杂的斗争与妥协关系^[4]。例如，马克思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法国政治中的互动，以及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巩固其政治权力。此外，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还深受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影响。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中“对立统一”的思想应用于阶级斗争的分析中，强调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阐明了阶级斗争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对抗，也在政治层面上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格局。

（二）主要内容与逻辑

中国农村的生态管理实践深受传统生态智慧文明的影响，传统农业技术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多维度、动态的，它不仅揭示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还通过阶级斗争的视角探讨了阶级如何在历史中不断互动、对立、变化，并最终推动社会形态的转变。

首先，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了社会阶级的形成和其在社会中的地位^[5]。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构成了阶级区分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社会主要分为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次，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一切历史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不仅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也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动力源泉。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统治将被无产阶级推翻，最终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此外，马克思在阶级分析中还提出了阶级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他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是动态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在封建社会，贵族和农民是主要的阶级对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线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视角使得阶级分析不仅局限于静态的阶级划分，而是融入了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中。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不仅关注经济地位的划分，还高度重视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社会政治局势的分析，提出了阶级的“政治行动”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马克思通过对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历史经验及其在社会危机中的表现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了阶级如何在历史事件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塑造政治结果。

二、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历史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的历史产物，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结构中。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复杂，既有传统的封建阶级（地主、士绅等），也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此外，还面临着外来殖民势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亟需一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阶级分析方法，以明确不同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为中国的解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6]。毛泽东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阶级分析，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也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情况的应对。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阶级分析主要关注经济基础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但毛泽东深知，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不仅仅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划分。在中国，农民是绝大多数，且处于经济困境中，而革命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引导农民阶级的力量。因此，毛泽东在阶级分析中充分考虑了农民的多样性，并提出了农民与其他阶级的联合策略，这也是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与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关键差异之一。

（二）毛泽东阶级分析与阶级结构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独特的划分和分析，这一划分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框架，又根据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创新。毛泽东的阶级划分依据不仅考虑经济地位，还充分考虑了阶级的政治立场、革命态度以及在革命中的战略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动态的阶级分析框架。

首先，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主要由六大阶级构成：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一划分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经济划分标准，特别是对农民阶级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区分了贫农、中农、富农等不同层次的农民群体。农民阶级被视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农民阶级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决定了不同农民群体在革命中的作用和态度。毛泽东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还与他们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其次，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划分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并非简单地按照经济基础划分，而是依据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在对外压迫下的不同表现，划分为两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虽然其政治立场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抵抗外来侵略、推动民族独立方面具有革命潜力。而买办阶级则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必须孤立和打击买办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对阶级划分的核心是注重阶级的动态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性。在他看来，阶级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不断调整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并非一成不变，革命的力量配置随着社会阶级的变化、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不断调整。因此，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及时作出策略性调整，为革命提供理论指导。

（三）毛泽东阶级分析的革命策略与战略意义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阶级分析不仅是理论的构建，更是革命实践的指南，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和战略意义。首先，毛泽东通过精确的阶级划分，为革命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他指出，农民阶级，特别是贫农和中农，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则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民阶级团结在一起，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同时孤立和打击反动的地主和买办阶级。这一分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具体的政治策略，即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农民阶级，争取资产阶级中的中立力量，同时彻底反对和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其次，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帮助确定了革命的战略重点和战术灵活性。他深刻认识到，不同历史阶段阶级力量的变化要求革命策略要具有动态性。例如，在土地革命阶段，毛泽东提出要先从农村破局，打击地主阶级，赢得农民的支持，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则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对抗外来侵略。通过这一策略，毛泽东使阶级分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与实际的革命任务紧密结合^[7]。

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8]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继承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核心理论，特别是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框架上，保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逻辑和方法。

首先，毛泽东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起点，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社会阶级的划分。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确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等不同阶级的对立关系。并明确指出，社会阶级的根本矛盾依然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

其次，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方面深受马克思的影响，特别是对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的继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毛泽东继承这一思想，强调中国革命的核心在于阶级斗争，尤其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他通过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指出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并提出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变革，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再次，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关于革命力量的联合与分化策略。马克思在分析各国革命时，强调了对各阶级力量的审视，指出革命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需要联合其他进步力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了这一思想，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将不同阶级的力量进行有机结合，争取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同时孤立和打击反动派。这种策略性灵活性既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又根据

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二）创新性发展与本土化实践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与复杂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创新性发展与本土化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方法^[9]。首先，毛泽东的创新体现在对中国农村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入分析与具体化划分。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中，主要以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为基础，强调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然而，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最广泛的群体^[10]。因此，他提出了更加细致的农民阶级划分，将其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明确了各类农民在革命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贫农是中国革命最坚定的力量，中农是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而富农则需要采取区别对待、策略性争取的方针。这种农民阶级的精细划分，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补充。

其次，毛泽东在阶级分析方法中引入了政治态度和历史条件的动态考量，突破了马克思基于经济地位的静态阶级划分。他认为，阶级关系是历史的、动态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各阶级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态度会发生变化，因此革命策略也必须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调整^[11]。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强调打击地主阶级、动员农民力量开展土地革命。这样的动态分析方法，使阶级分析更具实践性和灵活性。

最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突出了阶级分析的政治功能与革命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关系，并提出了灵活多变的革命策略。他不仅关注社会阶级的经济关系，还特别重视各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及其对革命的实际贡献，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策略的不断调整和发展。

（三）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成效

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成效主要体现在其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指导和推动上。通过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毛泽东精准识别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立场，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动力和盟友，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革命策略。这一策略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动员了农民阶级这一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此外，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党和国家制定阶级政策、处理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提供了科学依据，展现了极高的实践价值和历史影响力。

四、阶级分析方法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尊重和扬弃传统文化的目的在于“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12]，在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3]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分析方法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意义尤为突出。从阶级分析方法的现代化转型与当代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毛泽东的动态分析思维为理解当代多元化社会结构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一）阶级分析方法的现代化转型与当代社会结构分析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强调动态、历史和现实的结合，这一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依然具有借鉴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阶层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被逐步打破，出现了包括新兴中产阶层、个体经济从业者、民营企业主和新产业工人等在内的多层次社会群体。这种多元化社会结构使得简单的二元阶级划分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现象，迫切需要阶级分析方法的现代化转型。毛泽东强调根据不同历史阶段调整阶级分析策略的思想，为我们理解新兴社会阶层的形成机制、利益诉求及其社会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可以借鉴这一方法，将经济地位、职业属性、政治态度和社会影响力等多重维度纳入分析框架，全面反映新型阶层在经济发展和变革中的地位及作用。

（二）农村改革与基层治理中的阶级视角

在农村改革和基层治理中，阶级视角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土地制度、农业生产模式和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阶层也呈现出高度分化的趋势，包括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合作社经营者、外出务工者和乡村精英等不同群体。毛泽东关于农民阶级的精细划分和其在不同时期中的角色定位，依然可以为分析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化和冲突提供参

考。在基层治理中,借助阶级分析方法,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各类农村群体的利益诉求,防范乡村社会矛盾的激化,促进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同时,毛泽东提出的以人民为主体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帮助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更加注重农民主体地位,确保农村改革朝着公平、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三) 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原则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强调,阶级划分必须基于实地调查。这一原则对当前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首先是政策精准性,如乡村振兴需深入农村调研,避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帮扶。其次,数据驱动决策,通过大数据、社会调查等手段,动态掌握不同阶层的收入、教育、住房等数据,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同时要警惕阶层矛盾激化风险,毛泽东强调“对中产阶级要提防其动摇性”,要防止垄断资本侵蚀劳动者权益,如平台经济对劳动者的压榨。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可能加剧“数字鸿沟”,需通过技术普惠政策缩小差距。

(四) 对国际关系的启示,注意全球视角下的阶级矛盾

毛泽东的分析方法可扩展至国际领域,如:南北差距,发达国家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需通过国际协作(如“一带一路”)实现共赢。技术垄断与反全球化方面要警惕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支持“南南合作”以平衡利益。同时要防范“和平演变”风险,毛泽东曾提出防止外部势力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需警惕西方“颜色革命”对国内阶层矛盾的利用,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增强社会凝聚力。

结论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独特历史条件和阶级结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明确界定了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策略和实践路径。这种阶级分析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从理论层面来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拓展了阶级分析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农村社会和多元化阶级结构的研究中具有突破性贡献。他强调阶级关系的动态性和历史性,根据不同时期各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地位,灵活调整革命目标和策略,赋予阶级分析方法更强的实践性。这一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从工业社会的理论模式向多样化社会现实的延伸。从实践层面来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阶级分析,中国共产党明确了革命的敌我友关系,成功动员了农民阶级这一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构建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方法继续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在当代,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不断变化,我们在进行社会结构研究、农村改革、基层治理及阶层政策制定时,依然可以从毛泽东的方法中汲取智慧和启示。毛泽东的创新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也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变革和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

参考文献:

- [1]杨志超,余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理论界,2024,(12):1-8.
- [2]唐辉,张俭松.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的批判性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04):102-110.
- [3]萧诗美,蒋贤明.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J].东岳论丛,2012,33(08):5-11.
- [4]袁富民,索静雨.农民视角的工农联盟——基于马克思法国史“三书”的考察[J/OL].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0[2025-02-15].
- [5]夏莹.从政治到社会:马克思走向历史具体的基本路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当代阐释[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61(01):55-64+236.
- [6]鲍金.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基于“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0(07):58-66.
- [7]吴清军,许晓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阶级阶层关系的理论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05):83-88.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 [9]本刊记者,李崇富.必须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01):14-20.
- [10]徐建萍.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的关系演变及特点分析[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06):17-21.
- [11]胡启南,郑百灵.正确认识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新变化[J].求实,2002,(06):27-35.
-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2.
- [13]杨志超,余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理论界,2024,(12):1-8.

Localis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Marxist Class Theory - An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as an Example

Fu Liju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Mao Zedong's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is a classic work of the Chineseisation of Marxist class theory an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 change.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Marxist class analysis method, its core features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logic of Mao's class analysis method, and analyses in depth Mao'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s of Marxist class analysi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Mao Zedong's class analysis method and it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in the light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practi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 marxism;class analysis method;analysis of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Chineseised marxism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16

基于 SATI 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姚镇城^{1,2}

(¹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东惠州 516025;

² 惠州市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惠州 516025)

摘要: 研究采用 SATI 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统计分析我国核心期刊双师型队伍研究情况。数据来源于 CNKI 数据库, 发表日期为 1994 年--2024 年。研究揭示了双师型师资队伍研究的脉络、研究群体与研究热点, 为研究工作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双师型师资队伍; SATI; 文献计量

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师资的提法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1]。双师型师资概念的提出, 旨在解决职业学校教师偏理论教学、轻视实践教学, 且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双师型师资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产生, 其内涵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不断变化。学界对“双师型”教师的内涵界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认为双师型教师即具有“双证”、“双能”、“双职称”和“双素质”等等^[2]。尽管如此, 但国家对于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决心却始终如一。2019 年 1 月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一次明确指出要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3]。2022 年, 教育部首次发布了《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试行)》^[4], 明确了双师型师资队伍的认定范围、认定标准与实施方法。

研究工作者对双师型师资队伍做了大量而系统的研究, 发表了大量有关“双师型师资队伍”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了解双师型师资队伍各方面的研究现状, 研究拟采用 SATI 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对双师型师资队伍相关文献进行统计, 为研究工作者下一步进行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在中国知网数据库, 使用高级检索的方法, 以“双师型师资队伍”为主题, 选择中文核心期刊作为数据库进行检索, 共获得 395 篇文献。以 endnote 格式对这些文献进行导出, 将这 395 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导入到 SATI 3.2 版本软件中。SATI 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文献题录统计分析软件, 通过该软件可以实现对期刊全文数据库题录信息进行计量分析、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 挖掘和呈现出可视化数据结果^[5]。研究使用 SATI3.2 软件进行年份、作者、第一作者、关键词、来源的字段抽取和频次统计, 使用 SATI3.2 软件的 NetDraw 功能绘制作者共现图谱。

2. 数据分析

2.1 文献年度分布

通过 SATI3.2 软件进行“年份”字段抽取和频次统计, 输入到 Excel 软件中, 按照年份顺序排列, 得到发文统计情况。从发文时间上看, 最早的核心期刊文献出现在 1994 年。次年, “双师型”教师从学术概念变成政策概念出现在《国家教委关于开展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工作的通知》中。进入新世纪, 研究工作者对双

基金项目: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4 年度规划课题(学校发展类)(课题编号: CANFZG24139); 惠州市 2024 年职业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基于 CIPP 模型的物流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 姚镇城(1984.10-), 男, 广东潮阳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物流系统方法论。

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研 究逐渐升温, 发文量逐年递增, 在 2011 年到达最高峰 (45 篇)。该年, 教育部《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0-2020 年) 》提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四大目标, 其中包括使“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 60%。总体看, 发文主要集中在 2005 年-2024 年的近 20 年。具体年份发文数量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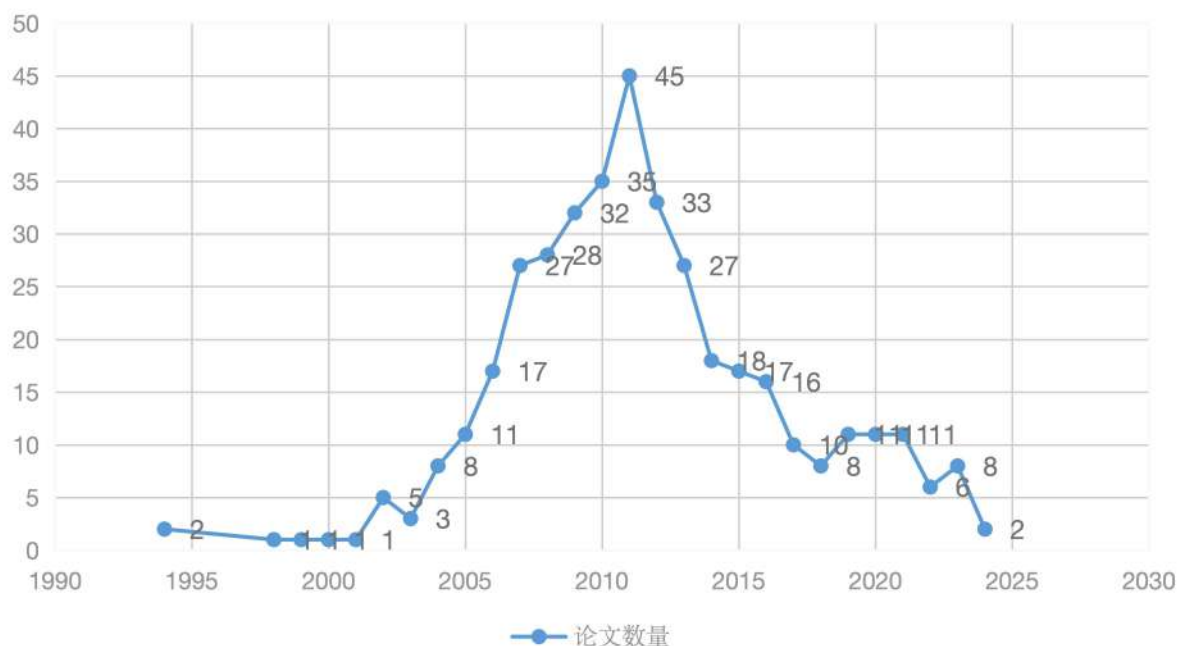


图 1 发文量统计图

2.2 核心期刊分布

研究对象的文献来源于 58 种核心期刊, 其中 2 篇及以上的 26 种, 图 2 显示了 4 篇以上的 16 种。从排名前 5 的期刊看, 《教育与职业》、《职教论坛》、《中国成人教育》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是研究的主阵地所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期刊是刊载双师型师资队伍相关文献最多的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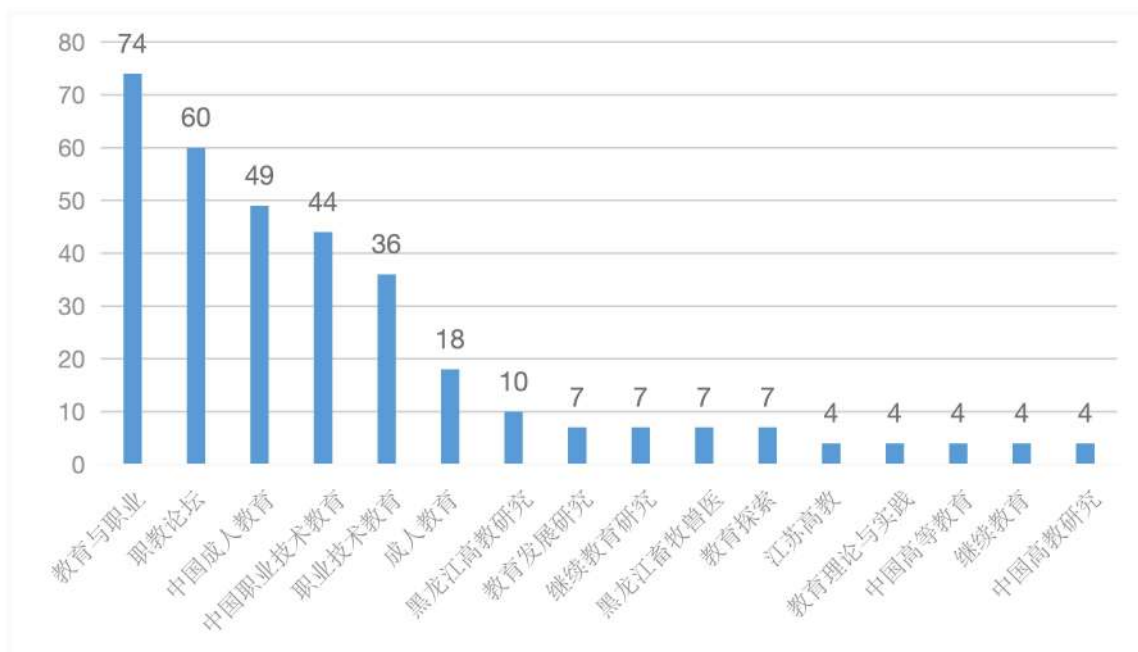


图 2 核心期刊分布

2.3 作者分布

文献共涉及作者 573 位，第一作者 355 位，其中发表 1 篇的有 336 位，2 篇 13 位，3 篇以上的见表 1。高产的作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高校学者，如李梦卿、徐英俊、曹晔、王子原；另一类是研究机构研究工作者，如贺文瑾、朱孝平。

表 1 核心作者表

作者	篇数	作者	篇数	作者	篇数
李梦卿	12	曹晔	4	朱孝平	3
徐英俊	7	贺文瑾	3	王子原	3

双师型师资队伍研究的作者合作情况如图 3 所示。从图 3 可以看出，该研究领域出现 4 个比较突出的研究群体，而其中李梦卿为主导的团队之间合作尤为突出，其研究涉及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标准、师资培养工作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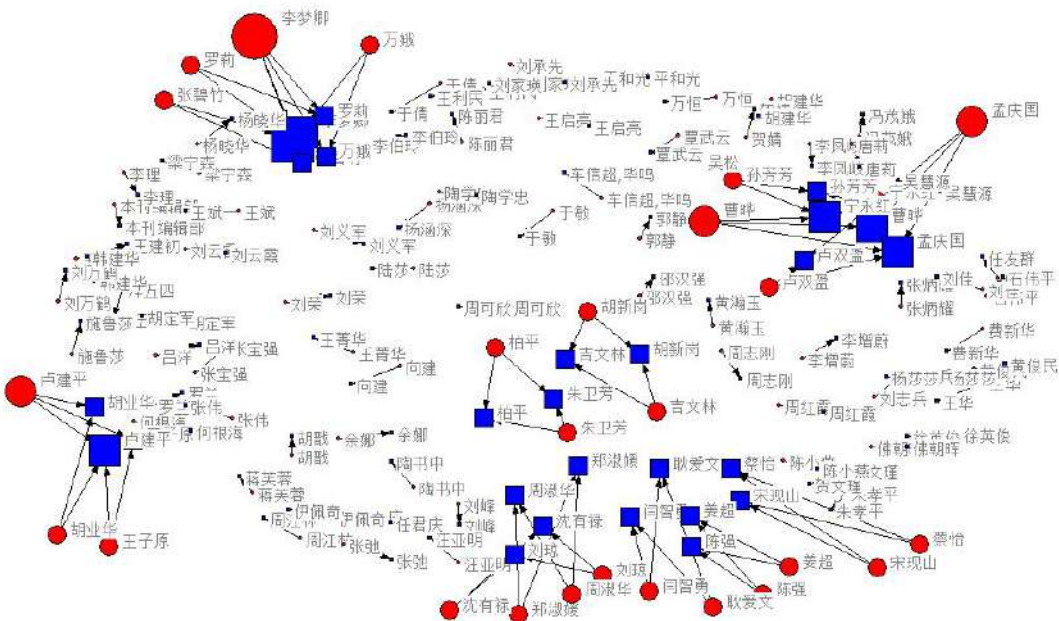


图 3 作者共现图谱

2.4 主题分析

按照关键词进行统计，395 篇文献共涉及关键词 321 个。其中高频关键词排行前 4 分别为“双师”教师、“双师型”、“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表 2 列出了排行前 18 的关键词。从高频关键词看，双师型师资队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表 2 关键词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双师型”教师	131	“双师型”	24	高职	15
双师型	91	师资队伍建设	22	“双师型”师资	14
高职院校	69	建设	21	队伍建设	14
职业教育	42	教师队伍	19	高等职业教育	14
师资队伍	30	双师型教师	18	职业院校	11
高职教育	29	校企合作	16	-	-

3. 总结

研究借助 Excel 软件、SATI3.2 软件等计算机工具,探索了双师型师资队伍领域 30 年来的研究情况,对样本文献的发表年份、文献来源、作者、关键词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3.1 重要研究成果少

研究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不设时间段限制的搜索,从最早出现核心期刊文献的 1994 年至今,跨度为 30 年,仅检索获得 395 篇文献,平均每年发文量为 10 余篇,核心期刊文献数量比较有限。说明该领域未引起相关研究工作者的足够关注。特别是 2010 年以后,发文量逐年下降,关注度和研究力度均呈现递减趋势。

3.2 研究群体分散

从作者共现图谱看,除了李梦卿卿、曹晔、卢建平、孟庆国等几个研究团队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以外,大量的研究者处于独立研究的状态,研究群体分散。加大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形成研究合力,探索解决该领域当前面临的共性现实问题是必要的。

3.3 研究领域集中

对于双师型师资队伍的研究,高度集中在职业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师资的建设。双师型师资是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特色。其概念提出的出发点就在于满足以能力为主线的职业教育教学需要。因此,双师型师资队伍的研究,高度集中在职业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师资的建设也就理所当然。进入新世纪后,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需求,中职教育成为职业教育的起点,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研究者聚焦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研究也就顺理成章。

参考文献:

- [1]曹晔.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师资的内涵及发展趋势[J].教育发展研究,2007(19):22-26.
- [2]焦后海,刘桂霖,柴然.中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准入制度研究[J].成人教育,2020(3):67-72.
- [3]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1-24)[2025-04-24].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 [4]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基本标准试行——教育部印发文件部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J].中国培训,2022(12):10-12.
- [5]蔡萍萍,杨峰.高职院校教师职后培训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基于 SATI 计量视角的可视化分析[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59-62.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Dual-Teacher Teams Based on SATI

Yao Zhencheng¹

¹City College of Huizhou, Huizhou, China

²Huizhou Modern Logistic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Hui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he SATI literature citation inform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 to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research on doublel-qualified teachers in core journals in China. The data was sourced from the CNKI database, with publication dates ranging from 1994 to 2024. The study revealed the trajectory, research group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studies on doublel-qualified teacher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conducting related studies.

Keywords: doublel-qualified teachers; SATI; bibliometric analysi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22

桌面角色扮演游戏（TRPG）的思辨体验 作为伦理困境推演与价值观澄清的场域研究

杨亨冉¹ 蔺艺喆²

(¹ 韩国京畿大学, 韩国 京畿道 水原市 16227, ² 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 北京 102209)

摘要: 桌面角色扮演游戏 (Tabletop Role-Playing Game, TRPG) 作为一种独特的互动叙事与社交娱乐形式, 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旨在探讨 TRPG 如何提供独特的思辨体验, 成为参与者推演伦理困境、反思并澄清自身价值观的特殊场域。本文通过剖析 TRPG 的核心特性, 揭示其催生伦理思辨的内在机制。随后, 重点分析了 TRPG 如何利用其虚构性、互动性和低风险性, 构建出激发深度思辨体验的模拟情境。进一步地, 本文探讨了互动叙事在游戏中如何通过激发价值观的碰撞与对话, 有效深化参与者的道德反思体验与成长。根据讨论也对 TRPG 在伦理教育、心理探索等领域中, 运用其思辨体验特性的潜在价值与局限性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 TRPG 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 更是一种能够生成深刻思辨体验、具有重要文化意涵和潜在教育价值的实践活动, 值得学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桌上角色扮演游戏; 思辨体验; 伦理困境; 价值观澄清; 互动叙事; 伦理教育

引言

桌上角色扮演游戏 (TRPG) 是一种依赖规则书、骰子、纸笔以及参与者想象力共同驱动的叙事游戏。它通常涉及一名游戏主持人 (Game Master, GM) 负责描绘世界、扮演非玩家角色 (NPC), 以及多位玩家扮演各自的角色 (Player Character, PC)。玩家们在 GM 构建的虚构世界中进行探索、互动, 共同经历一段故事。这种独特的“共享幻想” (Shared Fantasy) 形式是 TRPG 的核心魅力之一^[1]。近年来随着亚文化社群的发展和数字媒介的传播, TRPG 及其所承载的复杂互动模式^[2], 逐渐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

与此同时, 伦理困境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难题, 一直是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3]。如何在复杂情境下做出合乎道德的判断, 如何认识并澄清自身的价值观, 是个体成长和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石。传统的伦理教育往往依赖理论讲授或案例分析, 但可能缺乏足够的情境代入感和实践性。本文提出, TRPG 或许能提供一种新颖的路径, 关键在于它能生成一种独特的“思辨体验”。这种体验涉及在安全、模拟的情境中, 通过扮演、互动和面对后果, 个体得以探索不同的道德选择, 观察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并在认知与情感交织的过程中, 进行深度反思和学习。TRPG 因此如同一个思想的演练场, 一个激发伦理反思的催化器。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TRPG 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何种机制, 创造并引导玩家产生深刻的伦理思辨体验, 并进而促进价值观的澄清? 本文将结合 TRPG 的特性、叙事理论、伦理学及游戏研究的相关理论, 结合多年作为 TRPG 主持人的经验,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旨在揭示 TRPG 在促进道德认知与发展方面的独特潜力, 特别是其生成思辨体验的机制与价值。

一、TRPG 的特性与伦理推演的可能性

TRPG 的核心魅力深植于其高度的互动性与参与者所享有的广阔自由度。相较于许多电子游戏中预设的线性剧情或有限分支选项, TRPG 的叙事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动态性和开放性, 故事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作者简介: 杨亨冉(1982—),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游戏的设计美学及艺术理论、应用研发; ORCID:0009-0006-9533-2105

蔺艺喆(2002—), 男, 中央戏剧学院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第九艺术与交互叙事;

通讯作者: 杨亨冉

玩家的即时行动与游戏主持人（GM）的临场反应共同塑造而成^[1]。这种独特的互动模式赋予了 TRPG 一些关键特性，使其成为一个激发并承载伦理思辨体验的潜在场域。

（一）规则框架下的自由扮演是 TRPG 的基础

玩家并非被动接受信息，而是在一套共享的规则体系内，扮演一个拥有背景、性格、动机的角色。这种扮演远超简单的模仿，它是一种基于角色设定与玩家自身理解的能动性创造。玩家通过角色的眼睛观察世界，以角色的身份做出决策，这个过程本身就构成了探索不同身份视角下伦理立场的核心体验^[2]。

（二）互动叙事的生成机制是 TRPG 的灵魂

故事并非由单一权威（如作者或设计师）预先写定，而是 GM 与所有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共同编织而成。玩家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可能改变故事的轨迹，这种不确定性与可能性正是其魅力所在，也使得叙事本身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1]。叙事作为一种核心的人类交流方式，其互动性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4]，并直接塑造了玩家在伦理选择中的沉浸感和责任感体验。

（三）深度情境模拟与代入感是 TRPG 引人入胜的关键

GM 通过生动的语言描述，辅以地图、模型或音乐等手段，构建出可信的虚构世界和具体的挑战情境。玩家则调动想象力，全身心投入角色，仿佛身临其境。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使得抽象的伦理原则和两难困境变得具体可感，让参与者能够更真切地体验虚构世界中的事件及其道德分量^[5]。

（四）紧密的社交互动与协商过程是 TRPG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TRPG 本质上是一种社交活动，玩家之间、玩家与 GM 之间的沟通、协作、辩论乃至冲突，共同推动着游戏的进行。团队成员需要协商目标、分配任务、解决分歧，这个过程不仅塑造了游戏内的叙事，也构建了玩家间的社群关系和互动规范^[2]，每一次协商都可能是一次价值观的碰撞与思辨的实践体验。

表 1：TRPG 核心特性及其对思辨体验的贡献

TRPG 核心特性	描述	对思辨体验的贡献
自由扮演	在规则框架内扮演角色，拥有较高行动自由度	提供换位思考的实践体验；激发角色行为与自身价值观冲突的内在反思
互动叙事生成	故事由 GM 与玩家共同创造，玩家决策影响剧情	增强伦理选择与后果关联的体验感与责任感；营造动态、非预设的思辨情境
情境模拟与代入	通过描述和想象构建沉浸式体验	深化对抽象伦理原则和困境的情感卷入与具体理解；放大伦理抉择的体验强度
社交互动与协商	多人参与，强调沟通、协作、冲突解决	创造价值观碰撞、辩论、协商的直接体验；促进在群体互动中进行社会规范与道德行为的反思

这些特性相互交织，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场域”，使其天然地适合进行伦理推演。TRPG 能够模拟出比现实生活更为极端或集中的伦理困境，例如经典的“电车难题”变体、资源匮乏下的生存抉择、忠诚与背叛的考验、个人利益与集体福祉的冲突等。玩家需要以角色的身份直面这些困境并做出决策，这迫使他们跳出日常视角，体验从不同立场进行道德逻辑思考的过程，并承担决策在虚构世界中带来的情感冲击和道德责任^[6]。游戏过程中的互动讨论，为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辩驳和交流提供了平台，使得伦理思考不再是孤立的内心活动，而成为一种充满动态张力的社会性思辨体验^[7]。

二、 思辨的场域：TRPG 中伦理情境的模拟与体验

将 TRPG 视为一个独特的思辨场域，是因为它在模拟伦理情境的同时，能够有效激发并保障深度伦理反思体验的发生。这主要得益于其两个关键优势：情境模拟的逼真性与探索过程的安全性

如同科学实验致力于在可控条件下模拟复杂的自然或社会现象，TRPG 在游戏主持人（GM）的引导下，精心模拟出包含伦理抉择的社会互动情境。GM 可以设计出蕴含道德两难的剧本、设置充满伦理张力的突发事件，或者扮演持有特定道德观点的 NPC，从而将玩家置于需要进行严肃伦理思考的框架之中^[2]。例如，在一个典型的奇幻冒险场景中，玩家团队可能发现一种能够治愈肆虐瘟疫的古老仪式，但仪式的代价是牺牲一名无辜者。此时，团队成员就必须亲身体验在“拯救多数人”的功利主义逻辑与“保护个体生命权”的道义论原则之间，做出艰难抉择的认知与情感压力。在这个模拟情境中，抽象的伦理原则不再是书本上的条文，而是化为具体可感、牵动人心的两难处境。玩家需要仔细权衡不同的价值诉求，预判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并最终承担起选择在虚构世界中所产生的“虚构后果”，整个过程构成了一次完整的伦理思辨实践。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切伦理探索都发生在一个虚构的游戏世界框架内，从而获得了高度的安全性。玩家的决策虽然会在游戏世界内部产生显著影响——可能导致角色受伤、失去同伴、名誉扫地，甚至角色永久死亡——但这些后果并不会直接转化为现实世界中不可逆转的伤害或损失。这种由虚构性所保障的“低风险”环境^[8]，极大地降低了参与者进行伦理实验和道德反思的心理门槛，使得他们能够更自由、更大胆地投入到思辨体验中。玩家可以尝试不同的行为策略，甚至可以扮演一个与自身日常价值观相悖的角色（比如

一个冷酷的杀手或一个自私的商人），借以观察不同道德选择，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和社会评价，而无需过度担心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指责或法律惩罚。这种宝贵的“试错”机会，这种在安全网内进行思想实验的体验，对于深刻理解伦理规范的复杂性、模糊性以及情境依赖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处理那些伦理意涵丰富、挑战直觉判断的游戏情境时^[9]。TRPG 因此成为了一个允许思想自由驰骋、进行深度伦理反思的安全港湾。

三、互动叙事与价值观的碰撞与澄清

TRPG 的互动叙事特性是其生成和深化伦理思辨体验的核心机制。叙事本身就蕴含着伦理维度，它不仅讲述事件，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我们对世界、他人和自身的理解与评价^[4]。TRPG 的叙事尤为独特之处在于其高度强调参与者的能动性与选择性，使得伦理思考不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式评判，而是要求玩家切身投入、主动实践的思辨过程，这一点与部分电子游戏叙事伦理的研究视角相呼应^[10]。

在游戏过程中，玩家常常会遭遇以下几种典型情况，这些情况往往会引发其固有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并触发强烈的内在思辨体验：

（一）角色与玩家的价值冲突

玩家时常需要扮演与其本人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的角色，例如，一个信奉“力量至上”的野蛮人，或一个将“规则与秩序”置于一切之上的圣骑士。为了成功地扮演这些角色，玩家必须努力去理解角色的行为逻辑、动机来源和价值排序，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换位思考和拓宽认知边界的练习^[6]。更有趣的是，玩家有时会在“忠于角色设定”与“遵循自身道德底线”之间体验到深刻的内心挣扎和认知失调。比如，扮演一个盗贼角色时，是否应该偷窃一个贫困 NPC 的救命钱？这种内在的伦理张力，这种在扮演中进行的自我对话与价值权衡的体验^[11]，往往成为玩家澄清自身价值观、明确道德边界的催化剂。

（二）玩家间的价值碰撞与协商

团队合作是许多 TRPG 的核心玩法，但团队成员（即不同的玩家）之间可能持有迥异的道德立场或行事风格。当团队共同面对一个棘手的伦理困境时，例如，是否应该为了获取关键情报而拷问一名战俘，或者是否应该将有限的治疗资源，优先分配给更有战斗力的队员，玩家们往往需要进行激烈的沟通、辩论甚至艰难的妥协。这个过程不仅生动地暴露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迫使每位玩家更清晰地阐述自己的道德理由，体验倾听、理解、反驳、被说服或坚持己见的完整论辩过程，最终在互动协商中，共同寻找可接受的行动方案或群体规范^[2]。有时，这种碰撞甚至会发生游戏之外，例如，当一个玩家的角色不幸离队或死亡后，其他玩家如何处理其留下的虚拟资产，有时也会引发关于公平、友谊和游戏契约精神的讨论，这些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性的思辨实践。

（三）“功利主义”倾向与伦理盲点的反思体验

在追求游戏目标（如完成任务、获得奖励、提升角色能力）的过程中，部分玩家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将游戏世界中的 NPC，仅仅视为达成目的的工具或资源，而忽略其在叙事中被赋予的情感和权利。例如，为了快速获取信息或完成任务，玩家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欺骗、威胁甚至伤害 NPC，将自身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更有甚者，一些玩家可能认为自己扮演的“主角”角色，天然比虚拟世界中的其他存在更为重要，从而在行动中忽视基本的道德约束，为了所谓的“胜利”或“效率”而不择手段，比如为了寻找线索，而擅自闯入贵族的私宅进行搜查。这些行为虽然发生在虚拟世界，但它们清晰地折射出玩家在特定情境下的价值排序和潜在的伦理盲点。当行为通过 GM 的描述带来负面反馈（如 NPC 的悲惨遭遇、团队成员的质疑、长远的不利后果）时，玩家可能会体验到惊讶、懊悔、自我辩解或进行合理化的心理过程，这些都是极具价值的伦理反思体验，为后续的讨论和成长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四）选择、后果与伦理反思的深化体验

TRPG 中的选择往往伴随着具体而可见的后果，这些后果由 GM 根据规则和叙事逻辑进行呈现。一个看似充满“善意”或“正义感”的决定，有时却可能引发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负面连锁反应；而一个出于“无奈”或“权宜之计”的选择，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相对积极的结果。这种非预设的、往往是复杂的因果链条，有力地打破了简单化的道德二元论，促使玩家超越“好与坏”的标签，体验到对行为长远影响、动机与结果复杂关系，进行深度思考的必要性，以及特定情境对伦理判断的塑造作用^[9]。这种对自身行动及其后果进行反思并承担其情感重量的体验，构成了角色扮演游戏中主体性与伦理规训互动的重要体现^[7]。

（五）思辨体验讨论

通过上述这些机制，TRPG 超越了单纯的故事讲述，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参与式的伦理反思场域。玩家在扮演、选择、承担后果、与人协商的复杂过程中，其固有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审视、经受检验、并可能进行调整。这个充满挑战和反思的思辨体验过程，有助于参与者达成更深层次的自我理解 and 价值澄清，并在虚构体验中探索和建构个人化的生命意义^[8]。

四、TRPG 在伦理教育与心理探索中的应用前景

鉴于 TRPG 在生成深度思辨体验、模拟伦理困境以及提供沉浸式互动方面的独特潜力，其在伦理教育、心理探索乃至团队建设等特定领域的应用前景日益受到关注。其核心价值在于利用这种独特的体验式学习来达到特定目标。

在伦理教育领域，TRPG 有望成为一种创新的教学工具。其关键优势在于能够引导学习者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转向主动的体验、反思与意义建构^[8]。相较于传统的课堂讲授或案例分析，TRPG 能够提供更生动、更具代入感和高度互动性的学习环境，创造出难以在课堂中复制的伦理思辨体验。教育者可以精心设计特定的游戏模组（scenario），将抽象的伦理理论、原则或经典的伦理困境（如资源分配、信息披露、权力制约等）融入具体的游戏情境中。学生通过扮演不同立场、拥有不同信息的角色，在两难情境中进行决策、辩论和行动，并在游戏结束后，由教师引导进行深入的复盘讨论（debriefing），反思决策过程中的思辨体验、行为后果以及背后的价值权衡。这种体验式学习对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共情能力、沟通协商能力以及道德推理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12]，也符合功能游戏（serious games）研究致力于将游戏应用于非娱乐目的的探索方向^[13]。

表 2: TRPG 在伦理相关领域的潜在应用（聚焦思辨体验）

应用领域	核心机制 (利用思辨体验)	潜在益处 (通过思辨体验达成)	面临挑战与伦理考量
伦理教育	体验式学习；情境化思辨；角色扮演反思；复盘讨论	提升道德推理、共情、批判思维能力；深化对伦理理论的体验性理解	GM 引导思辨能力要求高；评估体验效果难；避免思辨流于表面或过度简化伦理问题
心理咨询与治疗	安全空间下的替代性体验；扮演探索；叙事重构	探索自我面向；改善人际模式；处理内在冲突；（辅助）创伤的体验性加工	治疗师/GM 专业要求极高；处理强烈情绪体验；保密性；避免二次创伤；需验证思辨体验的疗效
团队建设	协作与冲突的实践体验；沟通协商模拟	增进理解与信任；改善沟通；提升协作效率；体验团队动力	目标设定需清晰；确保所有成员的参与体验；避免强制性；与组织文化契合度

将 TRPG 应用于这些严肃领域并非没有挑战，必须审慎考虑相关的伦理考量与实践难点，尤其是在引导和保障高质量思辨体验方面。游戏主持人（GM）的专业素养变得至关重要。除了掌握游戏规则和具备良好的叙事能力外，应用于教育或治疗场景的 GM，还需要具备引导深度伦理讨论、敏锐捕捉并回应参与者思辨过程、处理强烈情感反应、觉察潜在心理风险以及维护安全、尊重的互动边界的能力^[2]。

需要警惕过度沉浸可能带来的现实混淆，以及游戏中可能出现的冒犯性或歧视性内容，对思辨体验的干扰或扭曲。GM 有责任设置清晰的界限，并及时处理可能引发不适或伤害的内容，这也是广义的游戏伦理研究所关注的问题^[14]。评估 TRPG 所带来的思辨体验及其效果仍然是一个难题。如何设计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来衡量其对参与者道德认知、价值观或心理状态的具体影响，仍需要更严谨的实证研究来支撑^[9]。同时，游戏作为一种以“游戏精神”为核心的文化现象^[5]，其内在的趣味性、自愿性和非功利性，与严肃的教育或治疗目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张力，如何在实践中平衡这两者，确保思辨体验的发生而非仅仅是娱乐，是应用过程中需要仔细权衡的问题。

五、结论

TRPG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与互动媒介，其魅力远不止于提供娱乐消遣，更在于其能够生成并承载一种深刻、复杂且高度个性化的伦理思辨体验。通过其规则框架下的自由扮演、参与者共同创造的互动叙事、以及由虚构性保障的低风险情境模拟，TRPG 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推演复杂伦理困境、亲身体验不同道德选择后果、并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深度价值观碰撞与对话的宝贵场域。在这个动态生成的反思空间中，参与者不仅可能深化对抽象伦理问题的具体理解，更有机会在强烈的思辨体验中反思、澄清、挑战甚至重塑自身的价值观体系。

尽管 TRPG 在伦理教育、心理探索等领域的应用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其实践效果和理论基础，仍需更多严谨的研究来验证，且面临着对引导者专业素养的高要求，以及潜在的伦理风险等挑战，但其激发深度思辨体验的独特潜力不容忽视。未来的研究可以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拓展：例如，比较不同类型 TRPG 规则系统（如强调战斗与资源管理的 D&D，侧重调查与心智考验的 CoC，鼓励叙事驱动的 PbtA 等）在塑造不同类型思辨体验方面的差异；深入探究游戏主持人（GM）的引导技巧、提问方式如何影响伦理思辨体验的深度与参与者的反思水平；以及通过更可靠的实证研究方法（如结合前后测问卷、行为观察、深度访谈、甚至神经科学手段），来更精确地评估 TRPG 活动，在促进道德认知发展、改变价值观念或提升特定社会情感能力方面的实际效果。深入理解 TRPG 生成思辨体验的运作机制及其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游戏本身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也可能为我们创新伦理教育模式、丰富个人成长路径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 Fine G A. Shared fantasy: Role playing games as social world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 [2] Bowman S L. The functions of role-playing games: How participants create community, solve problems and explore identity[M]. McFarland, 2010.
- [3] 林火旺. 伦理学[M].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
- [4] Corbett S. Learning by playing: Video games in the classroom[J]. The New York Times, 2010, 15.
- [5] 杨钧. 角色扮演中的心理和伦理问题[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农林教育版, 2004, 6(2): 99-100.
- [6] 李瑶静. 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伦理失范与规制路径研究[D]. 浙江传媒学院, 2019.
- [7] 曾勍.“后设伦理”如何可能——电子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伦理与历史[J].天府新论,2024(2):150-160
- [8] 杨丽,孙芳芳.关于角色扮演型教育游戏的构建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1,21(1):102-104
- [9] Zagal J P. Ethically notable videogames: Moral dilemmas and gameplay[C]//Proceedings of DiGRA 2009 Conference: Breaking New Ground: Innovation in Games, Play, Practice and Theory. 2009.
- [10] 黄思杰.“游戏者”及其伦理[D].河南大学,2023.
- [11] 曾勍.“后设伦理”如何可能——电子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伦理与历史[J].天府新论,2024(2):150-160[J]. 艺术百家, 2021, 37(02): 156-161.
- [12] 李蕾. 角色扮演游戏中的道德教育功能探析[J]. 教育探索, 2018(07): 111-113.
- [13] 刘梦霏.叙事 VS 互动:影游融合的叙事问题[J].当代电影,2020(10):50-59
- [14] 乔小艳. 角色扮演游戏情境中的心流影响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

Reflective Engagement In Tabletop Role-Playing Games(TRPGs) As A Space for Navigating Moral Dilemmas and Value Clarification

Hengran Yang¹ Yizhe Lin²

¹ Graduate School, Kyonggi University, Suwon-si, Gyeonggi-do 16227, Korea

²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Beijing 102209, China

Abstract: Tabletop Role-Playing Games (TRPGs) represent a distinctive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and social experience which has gained more attention over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flective experiences offered by TRPGs which create a special environment for players to deduce ethical dilemmas and clarify their personal values through reflection. The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RPGs and how they engender ethical reflection. Secondly, it analyzes how TRPGs, by virtue of their fictional nature, interactivity, and low-risk environment, construct a simulated situation that stimulates deep reflective experiences. Thirdly, it elaborates on how interactive narratives in TRPGs trigger collisions and dialogues of values, deepening participants' moral reflection experiences and growth.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value and limitations of utilizing the reflective experience characteristic of TRPGs in fields such as ethic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RPGs are not merely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but also a practical activity capable of generating profound reflective experiences, possessing significant cultural implications and potential educational value, thus deserving more in-depth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Tabletop Role-Playing Game (TRPG); Reflective Experience; Ethical Dilemma; Value Clarification; Interactive Narrative; Ethical Educ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23

论《熊谷阵屋》中替身悲剧的构造

——以替身悲剧的动因与替身悲剧的本质为焦点

霍云立¹

(¹ 四川轻化工大学 外语学院日语系, 宜宾 644005)

摘要: 替身, 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悲剧情节设定。《熊谷阵屋》便是日本古典戏剧中的替身剧名篇。《熊谷阵屋》以《平家物语》中关于“敦盛之死”的故事为素材。净琉璃版本初次上演于 1751 年, 次年又上演了歌舞伎版本。该剧不仅在江户时代脍炙人口, 如今仍被视为义太夫狂言的代表作, 作为歌舞伎的经典剧目被反复搬上舞台。本论将尝试对《熊谷阵屋》中的主要悲剧设定——替身悲剧的动因和替身悲剧的本质——进行拆解分析, 以明确该剧中替身悲剧的构造。

关键词: 《熊谷阵屋》; 替身悲剧; 悲剧结构

一、《熊谷阵屋》的情节概要

源平之战中的一个春日。熊谷阵屋前一株樱树旁立着一块写着“此花江南所无也。伐一枝者可剪一指”的告示。

熊谷的妻子相模因为担心初征的儿子小次郎而远道赶来阵屋, 不想偶遇了被梶原平次景高的家臣番场忠太追赶而逃入阵屋的平敦盛生母藤局, 并从藤局的口中得知敦盛已被熊谷讨伐的消息。熊谷回阵向妻子说起儿子小次郎初征的英姿和自己讨伐敦盛的战功。闻言, 藏身一旁的藤局怒不可遏冲地冲了出来。熊谷大惊, 随后向她描述了敦盛最后的情景。正当此时, 大将源义经登场, 当场验证了熊谷呈上的“敦盛”首级, 并对熊谷大加赞赏。

实际上熊谷呈上的首级并非敦盛的, 而是他亲生子小次郎的。熊谷领会了义经“伐一枝者可剪一指”的深意——即“不能让法皇的骨肉(笔者注: 剧中敦盛并非平氏子孙, 而实为法皇血脉)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不得已时以自己的儿子替之”(此处“花”指敦盛, 而“指”接通“子”, 指熊谷之子)——而将亲子小次郎作为敦盛的替身杀死。

最终, 「因父子至情起菩提心」³的熊谷在义经的允许下皈依佛门。

二、《熊谷阵屋》中替身悲剧的动因

无需赘言, 《熊谷阵屋》一剧最为重要的情节即原本应该被讨伐的敦盛未死, 而被杀死的却是小次郎这一“替身”设定, 这一设定同时也是该剧的戏剧高潮。在本节中笔者将围绕《熊谷阵屋》的“替身”设定, 从替身计划的“实施方”“命令方”的双重视角来对替身悲剧的动因进行分析。

2.1 替身计划“实施方”的动机

正如日本演剧学大家河竹登志夫所指出的那样, 替身这一悲剧高潮虽然是直接出现在《一谷嫩军记》的第三段《熊谷阵屋》, 但其铺垫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

作者简介: 霍云立(1982—), 女, 四川成都人, 比较文明学博士, 四川轻化工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研究方向: 日本古典文学, 中日比较文学。

³ 杉山其日庵、《浄瑠璃素人講釈》、鳳出版刊、1975、p.150。

为使悲剧高潮成立的铺垫——也就是所谓“准备”——在全剧的第一段就已经做好。其实就是义经在熊谷出征前交给他的那块由便庆手书“此花江南所无也。伐一枝者可剪一指”的禁令告示。⁴

从这个角度来讲,《熊谷阵屋》也可以被视为一篇讲述熊谷如何解开这一谜题的故事。义经的本意是以花作喻告诉熊谷即使以亲生子做替身,也要救回敦盛。而熊谷不仅解开了义经的谜题,并且严格执行了主公的密令。也就是说基于义经与熊谷之间主仆关系的神秘“命令”成为了替身悲剧展开的原动力。从这个角度河竹将义经与熊谷之间存在的这种凌驾于熊谷与小次郎间“亲子关系”之上的绝对的“主从关系”称为“优先于其他任何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夫妇,亲子关系)的绝对化的近世社会的无情规律”⁵,并将它视作替身悲剧的根本动因。

诚如河竹所言,义经和熊谷之间存在的“主从关系”无疑是《熊谷阵屋》剧情主线发展的外在动因。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无视另一个与此外因一起支撑熊谷判断与行动的内在动因。

在“熊谷樱之章”中,为躲避梶原平次景高的臣下番场忠太的追赶,敦盛生母藤局逃入熊谷阵内,与熊谷之妻相模不期而遇。在熊谷登场之前,两家人之间的渊源便通过二人的对话展现在观众面前。

原来,16年前当时藤局还在宫中侍奉法皇时与相模便是主仆。不仅如此,藤局还在时任北面武士的熊谷与相模的私情被发现时帮助二人出逃。也就是说,旧主藤局对熊谷夫妇二人有着救命之恩。换言之,除了现主——义经的命令之外,熊谷夫妇与敦盛生母藤局之间还有着旧恩的牵绊。正式因为这种恩情,义经才会认为“能够读懂禁令,保护幼小樱树者非熊谷莫属”⁶。

从以上论述可知,熊谷之所以会忠实地实施替身计划并非只因为现主义经的命令这一外在的强制性动机,同时也存在着对旧主藤局的报答这一内在的自发性动机。

2.2 替身计划“命令方”的动机

与熊谷一样,替身计划的策划者义经其实也是一位被外在的“主从关系”和内在的“恩义关系”所束缚,同时受到这两种动机驱使的人物。

毋庸置疑,义经下达替身命令的直接,或者说表面动机与敦盛的血统有着密切关系。阵屋中逃亡的藤局与相模相遇,敦盛的身世之谜也由两人的对话揭开。果真是时光如梦。当年您还在宫中,后来我与武士佐竹次郎(笔者注:即熊谷)相爱,离宫东逃。听到传言说您入平家之门,嫁给参议经盛大人时已怀有身孕。⁷

由此,敦盛实为藤局在宫中受孕之事得以确认。“正因为敦盛是法王的骨肉,义经才会特别下令救助,熊谷也才会绝对地遵从”⁸。换言之,后白河院私生子的身份使敦盛成为了“江南所无”之花,也因此成为了超越源平之争的绝对存在。从这个角度,敦盛血统所隐含的“君臣”这一主从关系也可以被视为潜在的悲剧前提,同时也是义经冒着与哥哥赖朝不和的风险下达密令,熊谷牺牲亲子执行替身计划的外在动因。

但这是否就是义经制定替身计划的唯一契机?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因追赶藤局而进入熊谷阵屋,偷听到替身计划的真相,妄图向镰仓的赖朝告密的源氏武士梶原被弥陀六——实际上是曾经救助过年幼义经的平家家臣弥平兵卫宗清——所杀。宗清的真实身份也在此时被义经识破。

当年我还在母亲常盘的怀中,在伏见冰雪里,是你出于仁慈救助了我们一家四人。我至今都记得被你搭救时的喜悦。虽然那时我只有三岁,但却记得你的相貌。我记得你眉间有一颗黑痣,你想遮掩也遮不住吧。听说你在平重盛去世后便行踪不明了,如今见你无恙,我十分欣慰。⁹

义经的这段回忆揭示出了平家对义经的“恩义”这条隐藏伏线。因而,之后义经将敦盛藏身的盔甲箱交与宗清的行为也就自然可以被视为“义经报答清宗”¹⁰,甚至报答平家的行为了。

⁴ 笔者译。原文见河竹登志夫、《比較演劇学》、南窓社、1967、p.111。

⁵ 笔者译。原文见河竹登志夫、《比較演劇学》、南窓社、1967、p.111。

⁶ 笔者译。原文见武智鉄二、「熊谷陣屋検討」、《定本武智歌舞伎 武智鉄二全集 3 文楽舞踊》、三一書房、1979、p.227。

⁷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楽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33。

⁸ 武智鉄二、「熊谷陣屋検討」、《定本武智歌舞伎 武智鉄二全集 3 文楽舞踊》、三一書房、1979、p.227。

⁹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楽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48。

¹⁰ 水原信子、「浄瑠璃における身代わり——一谷嫩軍記・熊谷陣屋の段を中心に」、《古文学の流域》、新典社、1996、p.450。

如此，义经对替身计划的策划及命令的背后同样存在着表、里两种动机。救助法皇骨肉是计划的表面，也是直观动机，而隐藏在其之后的则是对昔日恩人的最后的“报恩”。

三、《熊谷阵屋》中替身悲剧的本质

河竹登志夫将以亲子的分离为趣向的悲剧形式称为“家庭悲剧”，并进一步主张正是这种家庭悲剧的场面构成了日本近世悲剧的“核心”。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所指，以近松的情死剧为代表的世话悲剧就是将市井的话题进行加工而产生的作品，自然以家庭作为舞台的例子占据大多数。然而，不仅仅是世话悲剧，时代剧的悲剧本质也同样是“家庭悲剧”，我认为这才是日本近世悲剧的真正特质。而家庭悲剧并不仅指单纯意义上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件，同时也包括以政治、战争等国家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时代剧中的英雄主义主人公在情节的高潮处，溶解到亲子离别及牺牲这类家庭·亲属间的悲剧场景中，并从中凝结出悲叹场面这一结晶的情况。¹¹河竹的这一论点确实可以在《熊谷阵屋》中得到印证。

逃亡途中得知儿子死讯，孤身一人仍试图在敌阵中为儿子报仇的母亲滕局；担心儿子初征，从家乡赶到战场，却只等回儿子首级的母亲相模；看似回忆敌方的年轻武士，实则淡淡述说着亲生子之死的父亲熊谷。《熊谷阵屋》中有一种鲜明的创作倾向，即比起替身计划实施的具体情节过程（此情节仅在熊谷的回忆中出现），更加重视对计划参与者双方的家庭立场、家庭身份，和由此产生的心理活动进行描写。而全剧的悲剧性也正存在于这些家庭身份及家庭性场景所表现出的朴素人性，以及深厚亲情之中。

下面让我们逐一分析以下这些细节描写。

回到阵屋的熊谷见到远道而来的妻子大吃一惊。“瞥了妻子相模一眼，入座后”¹²，熊谷的第一句话便是责骂：“一介女流竟敢独闯军营，简直岂有此理”¹³。

关于此处熊谷的这一瞥，戏剧研究家武智铁二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此刻小次郎的首级还没有验认，必须要说明小次郎不在的理由，（引用者注：对熊谷来说）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而对真相一无所知（引用者注：的相模），又让他十分同情。这些情绪都通过这一瞥表现了出来。今时今日，“瞥”这个动作一般用于表示无视或忽视，但此处的用法却有所不同。这里的“瞥”更多表现的是意识到并在意对方的存在，却故意视而不见。¹⁴

而相模自然不会了解丈夫的这番苦心。被训斥后的她如此解释道：“我知道一定会被您责备。但是实在放心不下小次郎的初征。想着也许走一里就能听到他的消息，走五里也许就能收到他来信，接着七里，十里，等回过神来已经走了百里有余，到了京城。啊……那时胸中的焦躁啊。在京城听到战况，说在一个叫一之谷的什么地方正在酣战。为孩子担心就是父母的宿命啊。于是就走到了这里。请您理解。那，小次郎在哪里？他可安好？”¹⁵

小次郎已死，却必须面对为了儿子独自一人跋涉百里而来的妻子的询问，此时的熊谷该如何回答。以下便是这一场中夫妻二人的对话。

熊谷：古来征战几人回，还问什么“安好”，如此就是执念。小次郎这次若是战死沙场你将如何？

相模：不，不，不。小次郎出征便能与名将对阵，即使因此战死我也倍感欣慰。

（中略）

熊谷：喔！说到小次郎的功勋，他奋勇冲锋，闯入敌军军门立下战功，虽然负了些轻伤，却是武门之家传世的荣誉。

相模：啊！那伤可要紧？

熊谷：如何？才说他负伤就如此表情，若是重伤，你可会悲伤？

相模：不，不。能因战斗而负伤，定是在战场上大有作为，我是为他的战功高兴才出此问。那当时你可在身边？

熊谷：我当时见情况危急便冲进敌阵军门，硬拉出小次郎夹在腋下将他带回我方阵中。而我也在敌军中取到了后方军大将有官大夫敦盛的首级。¹⁶

¹¹ 笔者译。原文见河竹登志夫、《比較演劇学》、南窓社、1967、p.88。

¹²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楽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36。

¹³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237。

¹⁴ 笔者译。原文见武智鉄二、「熊谷陣屋検討」、《定本武智歌舞伎 武智鉄二全集 3 文楽舞踊》、三一書房、1979、p.228。

¹⁵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楽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37。

¹⁶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p.237-238。

无需赘言，仅仅听到儿子受了轻伤便心急如焚的母亲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不仅如此，此处同时也是熊谷第一次正面提到小次郎的重要场景。

在夫妻二人短短的对话中，熊谷两次提出了两个假设。“小次郎这次若是战死沙场你将如何”和“若是重伤，你可会悲伤”。明明早已洞悉一切真相，熊谷此处两个“若是”的用意值得进一步揣摩。正是从这明明不存在，却被重复了两次假设中，一个有别于之前的熊谷形象被塑造出来。此处的熊谷不再是一名刚毅勇猛的武士，而更是一位担心妻子得知儿子死讯后无法承受，因而想要尽力试探妻子心情的“丈夫”。

随后，原本躲在一旁的藤局再也按耐不住失去儿子的悲愤，冲到了熊谷面前要替儿子报仇。震惊之余，熊谷以一句“战场之上无是非，请您务必看开”¹⁷安慰藤局。联系后文替身真相的揭晓，与前文中的两个假设呼应，此处的这句“请您务必看开”也饱含着熊谷对妻子相模的体恤和安慰。

接下来，他便开始为藤局描述“敦盛”的最后时刻。

对阵中敦盛被熊谷打下马背，按倒在地。他脸上用铁浆涂黑，眉目纤细。看起来与我儿一般年纪，父母定还健在。身为父亲，我深知他如果在这里被我杀死，他的父母想必万分悲痛。思及此处，我拉起他，为他拍打掉身上的尘土，让他逃跑。

（中略）

但他却说：“我既已被你制伏，又有何颜面再逃，速速取我首级吧，熊谷。”

（中略）

听到他这番话，我更是泪水涌上心头，不禁又想若是我儿小次郎被敌军所制，是否也会如此英勇地战死。

（中略）

我便对他说：“若还有挂心之事，请讲，我必定转达”。

闻我此言，他眼中浮起了泪水，说到“我父亲已在濑户内海的波涛之中，现在唯一担心的只有母亲。此番战争结束也不知世道将会如何。如今我心里挂念的也唯有母亲了”。¹⁸

替身的真相还不能揭开，此时的熊谷必须继续隐瞒儿子小次郎已死的真相。如此，《平家物语》中华丽的战争场面在本剧中变成了一段虚构的故事。被杀的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熊谷却只能以敦盛的身份来回忆。而另一方面，这段谎言中又潜藏着本剧独有的真实。“与我儿一般年纪”，“泪水涌上心头，不禁又想若是我儿小次郎被敌军所制，是否也会如此英勇地战死”，从这些言语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在谎言里熊谷也在不经意地描绘着儿子真实的身影。而“此番战争结束也不知世道将会如何。如今我心里挂念的也唯有母亲了”这句“敦盛”的遗言，从替身情节发展的脉络来看，完全也可以作为小次郎的遗言成立。若是如此，这句话同样也是全剧中小次郎的唯一一句台词。无论是敦盛，还是小次郎，这一句遗言的存在都成功让一位勇敢赴死的年轻武士形象瞬间转换为一位直到最后时刻仍然挂念母亲的孝子形象。换言之，在阵屋一段最大迷局的最高潮，被强调的并不是“武士”这一社会身份，而是“儿子”之一家庭身份。

而此刻的藤局也强压下最初的愤恨，开始以母亲的身份来哀悼逝去的儿子。儿子奔赴战场之时还曾经“欣喜相送”¹⁹的母亲，如今天人两隔“即使早有准备，也难忍胸中悲伤”²⁰。这短短一句话却道出了一位“武士”母亲心中——来自于社会、家庭双重身份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随后大将义经登场，剧情渐近高潮。看到“敦盛”（实为小次郎）的首级后义经大赞熊谷的忠义，并命其将首级呈给“有缘之人”过目。如此，在获得义经的肯定之后，对熊谷来说主公交与的任务圆满完成。随之，他必须要见证的是妻子与儿子“重逢”的悲伤时刻。

此前一直被排除在替身计划的两位母亲也终于迎来了真相大白的时刻。

手捧头颅，欲看却泪水盈目。看着儿子的遗容，胸口郁结，浑身颤抖。手中头颅微微晃动，如同我儿在轻轻颌首。离家时回首的一笑，如今想来都是可怜可哀。声音哽咽在喉头。²¹

儿子突如其来的死讯，对刚从丈夫口中得知儿子初征英姿，并对儿子的平安深信不疑的相模来说无疑一道晴天霹雳。一直以来母子之间日常重复无数次的相送，如今已成遥不可及的隔世之梦，通过泪水模糊的视线，不可抑制的颤抖，此处的描写让观众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一位母亲在得知儿子死讯之时的那深不见

¹⁷ 笔者译。原文见祐田善雄校注、『一谷嫩軍記』、『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案浄瑠璃集』、岩波書店、1965、p.239。

¹⁸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p.239-241。

¹⁹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241。

²⁰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241。

²¹ 笔者译。原文见同书、pp.245-246。

底的悲伤，同时也让替身的悲剧明确地展示出了它属于家庭·亲子悲剧的一面。

由此可见，《熊谷阵屋》中的悲剧性场面都有着一个共通的特点。即，都是借被卷入替身计划的悲剧主体之口，表现和强调他们各自的家庭身份、并细致刻画存在于他们之间家庭关系，以及血亲间的天然羁绊。

四、结语

本论以考察日本替身悲剧代表作《熊谷阵屋》中的悲剧构造为目的，从“替身悲剧的动因”和“替身悲剧的本质”两个角度对该剧进行了分析。

首先，从“替身计划”切入，从替身计划的实施方和命令方的双重角度剖析了登场人物推动替身悲剧发展的行为动机，并指出对于设计和实施替身计划的义经熊谷主仆来说，其动机中都同时存在着“主从关系”这一外在强制性动机和“恩义”这一个内在自发性动机。

接下来，本论又论证了《熊谷阵屋》中的悲剧性场面是通过参与或悲卷入替身计划的三位“父母”的“家庭关系”、“家庭身份”和由此而生的亲子或夫妻间存在的爱与亲情等人性的角度的强调来表现的。因此，该剧从本质上也可以被视为是一部围绕“家庭身份”、“家庭爱”和亲情而展开的家庭悲剧。

从比较文学、比较戏剧研究的角度，《熊谷阵屋》作为日本替身悲剧的代表作之一，其展现出的悲剧动因即悲剧主体的行为动机以及悲剧的本质，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类似题材的悲剧文本及中日比较悲剧研究领域提供一个重要的视点。

参考文献：

- [1] 杉山其日庵,浄瑠璃素人講釈[M].东京:鳳出版刊,1975.
- [2] 河竹登志夫,比較演劇学[M].东京:南窓社,1967.
- [3] 武智鉄二,定本武智歌舞伎 武智鉄二全集 3 文楽舞踊[M].东京:三一書房,1979.
- [4] 祐田善雄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99 文楽浄瑠璃集[M].东京:岩波書店,1965.
- [5] 水原信子,古文学の流域[M].东京:新典社,1996.

On the Structure of Substitute Tragedy in "Kumagai Jinya" —Focusing on the Motiv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Substitute Tragedy

Huo Yun-li¹

¹Department of Japanes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ibin 644005, China

Abstract: The substitute is a representative tragic plot setting. "Kumagai Jinya" is a famous substitute play in Japanese classical drama.."Kumagai Jinya" is based on the story of "Atsumori's Death" in "The Tale of the Heike". 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the "jyoururi" version took place in 1751,and the following year , the Kabuki version was also staged. This play was not only popular in the Edo period ,but is still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Yotafu Kyogen. It is repeatedly staged as a classic Kabuki pla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ain substitute settings in "Kumagai Jinya"—the motiv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the substitute tragedy—to clarify the structure of the substitute tragedy in this play.

Keywords: Kumagai Jinya ; Substitute tragedy ;Tragic structur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24

中国古代诚信思想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及路径研究

王琦¹ 吴佩瑶¹

(¹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要: 诚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之一, 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学范畴的理论成果, 其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哲学, 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路和智慧。新质生产力, 作为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 其发展离不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路径的跃升, 而诚信思想对于发展高素质劳动者、加强高科技创新、形成高质量劳动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寻中国古代诚信思想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和路径, 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力量。

关键词: 诚信; 新质生产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1]2024 年 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自提出之后就引发了各界的积极关注, 形成了一批丰富的研究成果。经过对学界现有成果的梳理,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研究, 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架构; 其次是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点, 融合了新技术、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要求、新功能, 同时体现了高效率、高质量、高科技等基本特征; 还有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形成实践方面入手, 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成果, 是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实践; 最后, 还有的学者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从产业升级、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推进。

可见, 以往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集中在技术、经济、产业、政策等领域, 从中国古代哲学方面去讨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甚少。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战略任务,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激活其生命力”^[4]。诚信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其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值得我们不断探索, 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 将诚信思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 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 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诚信思想的内涵与功用

在儒家哲学的深厚底蕴中, “诚”与“信”最开始是被分开来说的。儒家的“诚”不仅是形而下的道德规范, 它还具有本体的意义。儒家“诚”哲学正是通过对“诚”作为天道本体的理论阐释和用“诚”贯通天道、人道的理

基金项目: 包头市社科规划项目职业教育专项课题“包头职业院校诚信教育体系建设研究”(2024-ZJ13) 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王琦(1990—),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吴佩瑶(1997—),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史。

论运作而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反映出中国哲学由人及天、由天及人、天人合一的思维向度。

而“信”一开始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盟誓的约定,随着孔子将“信”纳入到儒家的“仁教”之中,“子以四教:文、行、忠、义”,“信”逐渐具备了人与人交往时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代表一种真实,不欺骗的道德观念,同时,孔子将“信”作为政治治民的必要手段,“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使得“信”具备了内圣外王的双重特性。

到了东汉末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两个字互作解释,“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诚与信是相通的,以诚释信,以信释诚。孔子曾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礼记·中庸》中有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儒家以外的法家、道家、墨家等各派学也都非常重视诚信。历史上著名的“立木取信”典故,就是法家代表商鞅守信的表现。韩非认为“小信诚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管子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老子认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墨家将信作为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行者行不果”。可见除儒家外,古代其他流派的思想家也都将诚信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诚”作为加强个人内在修养的必要道德品质,而“信”则是外在的伦理约束和行为规范,达到“内诚于心,外信于行”⁴的目的,在中国古代,诚信不仅是个人提升道德修养的必要条件,《大学》中有云:“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还是人与人交往中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所谓“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中实施德政的手段,是治理好国家的前提,孔子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此外,诚信也体现在为学之道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实事求是应当是学者所具有的品质,在经济活动中也要遵守诚信准则,中国古代商人“重义轻利”的观念,以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无不体现出商业活动中诚信思想的影响。

可以看出,诚信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建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价值贯穿于个人、社会、国家层面,在新时代,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不仅是公民层面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⁵,因此,在中国古代形成的诚信观,直至今日仍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三、诚信思想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⁶

因此,从新质生产力基本内涵上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应把握好三点:一是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二是用好新型生产工具,特别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赋能发展新兴产业,三是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诚信作为贯穿个人、社会、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 诚信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必要品质

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在生产活动中,劳动者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其技能、知识、经验和创新能力等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不同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技能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差异。

“诚者,圣人之本,百行之源”,从古至今,诚信思想都是各行各业劳动者应具备的核心职业道德。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著名商帮徽商和晋商,都不约而同地以儒家文化中的诚信思想作为立身之本,晋商中广泛的关公信仰,其背后折射出了对于忠勇信义的推崇,而徽商深受朱子之学的熏陶,坚守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在商号选用人才时,更是通过“八观六验”法等严格筛选诚信仁德的人才,采用“重信义、除虚伪、敦品行、贵忠诚”等规则进行职业训练,⁷始终秉持“诚信经营,重义轻利”的经商原则。中国传统儒商中还传承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家训,如榆次常氏家训中有“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雷府家训中有“蓄积蕴养,乐道安贫,温良恭俭,礼仗诚信”等,都体现出对诚信品质的重视。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也被列为共产党精神谱系之一,其核心是强调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家精神”应当属于每一个敬业的劳动者。只有具备诚实守信的品质,才能在竞争中赢得口碑,在事业上打下基础。

因此,高素质劳动者在掌握新技能、新知识的同时,应当加强诚信职业素养的培育,在新的领域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倡导诚信理念,维护行业不断向好向上发展。

(二) 诚信是发展高科技创新的必备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要素之一是科技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质态,其“新”体现在“新业态、新技术、新要素、新范式”,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以创新引领变革,通过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生产模式的创新,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局限,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实现生产力的新的飞

跃。

“学术诚信就是即使面临逆境,仍会坚持诚实、信任、公平、尊重和责任这五项根本性的价值观”⁸随着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加强学术诚信也成了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学术诚信不仅关系到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也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在学术诚信制度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零容忍”的共识正在形成,但仍有一些问题和短板未完全解决。一方面,学术抄袭、论文造假、伪造学术身份、骗取科技补贴等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达对科学学术诚信也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强调科学研究应具备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可见诚信是科学精神的必然要求。科技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只有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科研的结果才会是真实有效的,才能对相关专家学者起到启发和借鉴的作用,共同推动行业的进步,此外,只有整个学术行业诚信守法,风清气正,才能让更多的研究者敢于分享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成果,从而促进学术的不断创新,为科技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 诚信是形成高质量生产关系的必然条件

劳动者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品生产创造过程中,形成的劳动互助、合作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想要塑造适合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营造诚信社会氛围、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坚持诚信,才能更好地促进合作交流、建立信赖关系,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我国古代的信用活动并不匮乏,相关机构的类型和数量也较多,然而却未能象中世纪欧洲那样孕育出现代金融。究其原因,“从战国中期产生的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延续,它既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也阻碍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⁹此外,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中关于诚信的思想理念,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内在信用制度”,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需要恪守的不成文的规则。因此,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西方经济活动中的现代金融信用体系,但在以儒家教义中诚信思想的保障下,信用制度依然有着较为有效的保障。到了清代,晋商商号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预付货款、延迟付款、赊销等方式行之有效,甚至与英美等国家相比,在商业活动中具有了最高等级的信誉。¹⁰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以诚信社会为共同进取的目标,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为精神支撑和理论依据,才能更好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高质量生产关系,为进一步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做好充足准备。

四、诚信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一) 加强诚信教育

1. 普及学校诚信教育

应将诚信教育纳入大中小幼思政课教学范畴,发挥思政教学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文化、马克思理论中的诚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的重要思想融入课堂教学中,并设立单独的诚信课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针对职业院校,将诚信教育融入校企合作,将诚信教育渗透到学生的实训、实习中,为学生未来走入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

对于学校教师,进行学术诚信教育,追查既往发表期刊论文、课题项目等成果,坚决整治学术不端行为,形成清朗的学术氛围。

2. 加强家庭德育助力

推进学校诚信德育与家庭诚信德育并举,诚信教育“从娃娃抓起”,家长应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诚信行为,成为孩子的榜样,传播真、善、美等价值取向。

(二) 完善诚信制度

1.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着重在经济领域出台更为完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大对商业欺诈、虚假广告等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在金融领域,完善金融监管法规,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 健全信用评价和监督体系

构建全面的信用评价体系,涵盖企业、个人等各个主体。对于企业,建立多维度的信用评价指标,包括产品质量、合同履行、纳税情况等。通过第三方信用评价机构,根据企业的财务报表、市场反馈等信息,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评级结果可以作为企业参与招投标、银行贷款等活动的重要参考。对于个人,建立个人信用档案,记录信用卡还款、贷款记录、交通违法等信息,作为个人社会经济活动的信用依据。

加强信用监督,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模式。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和处理失信行为。行业协会要制定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对会员企业的诚信情况进行

监督和管理,同时,鼓励公众和媒体参与监督,对失信行为进行曝光,形成全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

(三) 弘扬诚信文化

1. 积极开展诚信活动

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诚信活动、社区诚信活动,如诚信知识问答、诚信文化讲座、诚信亲子活动等,将诚信与信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促进个人在工作生活中将讲诚信、守信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科技助力诚信传播

采用形式多样的宣传形式,除传统媒体之外,还可以利用近年来火爆的短视频、短剧等载体宣传诚信精神,充分使用最新技术,如虚拟现实 VR 等技术,创建教育场景,可以让人身临其境体会到诚信的重要性或不守信用的不良后果,搭建数字化诚信展览馆,展示诚信精神、诚信人物、诚信案例,让人们更加直观地学习诚信精神。

结语

诚信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当今社会也依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诚信精神的弘扬和诚信社会的构建,对于新质生产力推进的力度与方向、新质生产力自身的质量与水平、新质生产力的价值与强度,乃至新质生产力最终目标的达成和持续效果的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诚信对于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加快科技创新、发展高质量生产关系也都起到了重要影响,只有大力弘扬诚信文化,才能更好地夯实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基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保障。

参考文献:

- [1]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1).
-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01
- [4] 杨华,杨玉圭.诚信观的传统思想资源及其现代阐释,决策与信息,[J],2022(3)-39.
- [5] 舒刚.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N].湖北日报,2014-05-23.
- [6]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详解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N].人民日报,2023-12-18(004).
- [7] 白明东.明清晋商商业诚信[J].经济问题,2017(3)-126.
- [8]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 [EB/OL].[2022-09-03].<https://academicintegrity.org/>.
- [9]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21.
- [10] [美]约翰·斯塔德:《1897 年的中国》,李涛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79.

Research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Pathways of Ancient Chinese Integrity Though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ang Qi¹, Wu Peiyao¹

¹ Baotou Iron and Steel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Baotou, China

Abstract: Times Integrity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serve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a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lso relies on cultural underpinnings, particularly the continuous inspiration and wisdom drawn from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hilosoph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ed by advanced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superior quality, depend on the enhancement of laborers, means of labor, objects of labor, an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tegrit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laborers, adv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ostering high-quality labor relations.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pathways of ancient Chinese integrity thinking i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strengthen the endogenous forces driving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integr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ultural found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28

数字赋能服务型制造双元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甘秀梅¹ 李立超²

(¹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摘 要: 制造业服务化悖论的本质是产品与服务创新耦合的困境, 源于企业服务价值供给与用户期望的错位。徐工集团服务化转型围绕创新价值融合, 聚焦三大路径: 一是整合内部生产与服务资源, 强化部门协同效率; 二是提升服务创新附加值和客户价值共生能力, 实现双向价值增长; 三是构建数字技术驱动的双元创新体系, 通过深度客户链接增强产品服务系统韧性。研究对实现产业链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及实践意义。

关键词: 服务型制造; 数字赋能; 双元创新; 服务化韧性

一、引 言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中提出,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 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1]。服务型制造的兴起加速了我国制造业向服务化转型升级的步伐, 更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在新一波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强调必须通过新制造、新服务与新业态来补齐制造业的短板。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在将数据作为核心要素、数字赋能作为发展主线, 以此开辟一条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新路径^[2]。数字赋能双元创新不仅契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也满足了制造业服务化和数字化深度转型的现实需求。通过数字赋能服务型制造双元创新, 企业能够避免或解决服务化过程中的悖论现象, 孕育出更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形态。作为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据深刻地参与到制造业的发展中, 推动服务型制造模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制造业价值创造是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协同耦合的价值创造过程, 两类创新轨道均服从 S 曲线的一般性规律^[3]。产品创新能力水平与服务创新战略的存在动态匹配关系^[5]。初始阶段, 企业承载既有产品向客户提供确保产品功能稳健实现的基础性服务, 服务创新扮演着辅助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角色; 发展和成熟阶段, 企业为获取和谋求更大的市场空间和价值创造, 进一步加大服务创新, 采取了以产品技术为载体的定制化个性化服务^[6]。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耦合性并非呈现线性关系^[7]。服务型制造模式也并不是都有利于企业,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这种现象称为“服务化悖论”^[4]。此现象是由于产品与服务创新在融合过程中, 产生的服务提供与制造业务不匹配引起。一方面, 既定产品技术创新可承载服务的能力边界是有限的, 一旦现有产品创新无法承载服务创新的价值实现时, 继续扩大创新服务将会打破系统的稳定性, 造成服务化悖论风险^[8]。另一方面, 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会受到企业资源和能力的约束, 当服务创新不断延伸和拓展时, 企业会增加更多的投入, 其复杂性也会相应增加, 这可能会导致活动协调不力, 阻碍向客户提供无缝产品, 并增加服务失败的风险^[9], 最终导致产品服务系统产生承接断裂的现象^[10]。因此,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引发的是服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协调发展问题^[11]。在服务型制造系统中, 服务性投入欠缺或过度都将使企业陷入“服务悖论”困境^[12]。因此, 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的动态协同匹配是克服服务化

作者简介: 甘秀梅 (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服务型制造与智能制造

李立超 (1988-),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公司治理;

通讯作者: 甘秀梅

悖论的关键之一。

数字赋能通过广泛参与、精准匹配和价值共享机制参与到产品与服务创新的过程，实现“联动赋能”^[13]；在工业 4.0 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制造业服务化注入新活力，为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创造了新价值，加速了制造业服务化进程。数字技术的赋能深刻作用于制造业服务化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对服务化创新的作用。数字技术所创造的数字化环境一方面为制造企业创新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和应用场景，加快了服务型制造超网络的资源产生速度和能力形成速度^[14]，使服务创新更为活跃，从而促进制造企业创新活动重心由产品创新向服务创新的转变。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耦合协同作用，数字化可提升两类创新的协同性，并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促进服务创新对产品创新的反哺作用^[10]。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应用也拓宽了服务广度和深度，并驱使先进服务模式成熟，对企业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5]。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和避免“服务化悖论”问题。通过数字化和相关的有形产品的非物质化，服务化和数字化的趋势正在企业的产品供应中融合。

服务化转型标志着制造业的竞争范式从产品导向转向服务导向，而如何平衡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充满挑战且持续演进的过程^[16]。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数字技术对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塑造两者的发展。然而，关于数字赋能二元创新内在机制的研究尚显不足，尤其是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如何在动态演进中实现耦合、维持产品服务系统的平衡，并克服悖论现象的产生。针对当前研究不足，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以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为研究对象，基于数字赋能和制造业服务化的二元创新理论，深入剖析徐工集团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模式。通过分析徐工集团成功服务化转型背后的深层次因素，研究旨在探讨避免“服务化悖论”现象的策略，并研究数字赋能二元创新机制的构建过程，从而揭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服务化韧性特征。研究的发现将为中国制造业后发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二元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宝贵的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探究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二元创新机制，旨在解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本质^[17]。案例研究方法能够深入挖掘案例实践背后的逻辑规律，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及其发展的复杂动态过程。通过这一方法，能够对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并补充和完善现有理论。

（二）资料收集与数据分析

徐工集团的案例资料来源广泛，包括官方信息、文献资料和媒体报道等资料搜集自官方渠道，包括集团官网发布的资讯、创始人的公开演讲以及媒体采访记录等。本文对徐工集团在数字化和服务化转型领域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作为中国重型机械行业的佼佼者，徐工集团在服务化转型方面的实践受到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因此，研究资料可以从公司官方网站、年度报告、新闻报道、人物访谈以及中国知网等权威期刊中获取，这些资料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这种多元化的资料收集方法为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和深层次的分析，有助于全面把握徐州重工服务化转型的实践进展和内在逻辑。

三、案例分析与机理阐释

（一）案例简介

徐工集团源自 1943 年成立的华兴铁工厂，于 1989 年组建成为国内同行业首家集团企业。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奠基者、开创者和引领者，徐工集团已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千亿级领军企业。近年来，徐工集团深入实施两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聚焦于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整合研发、制造、服务等资源，凭借其品质可靠、技术领先、环保高效的综合实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并助力客户实现目标，完成了从单一产品销售向提供综合服务的转型，推动了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二）机理阐释

徐工集团的转型历程深刻体现了服务型制造模式的变革。其转型机理在于利用信息化技术构建数字赋能平台，既提升了企业内部服务效率，也增强了与产品相关的外部服务质量，最终塑造出具有双重身份的制造企业。徐工集团的数字化和服务化发展路径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见图 1）：破冰期、基础建设期、高速发展期和蝶变期。这一路径不仅标志着徐工集团在服务型制造领域的深入探索，也展现了其在数字化趋势中不断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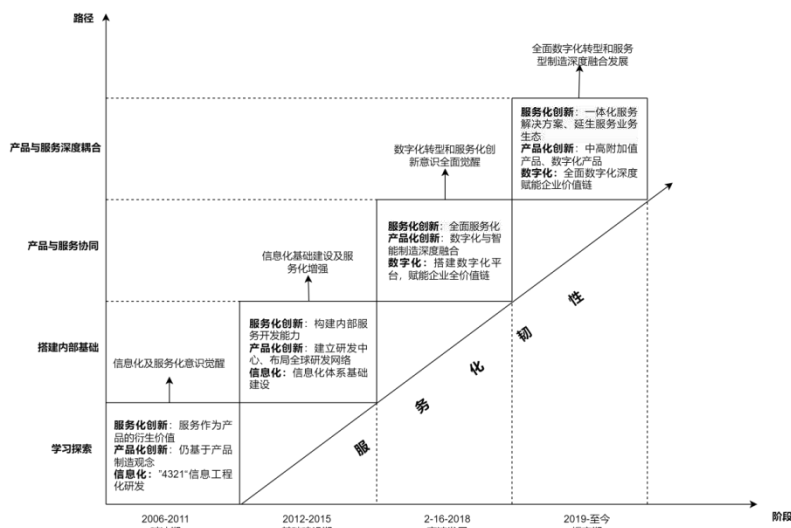


图1 徐州重工数字化与服务化发展阶段

1. 破冰期——学习探索（2006—2011年）

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为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工程机械行业的竞争核心也逐步从价格竞争转向品牌影响力、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的多维度竞争。徐工集团为了推进服务工作的前瞻性，提出了一个以主动服务和售前服务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如图2，在产品制造理念的基础上，公司围绕产品发展战略加大了开发力度，面对市场的同质化现象，依托产品创新，将资源集中在生产制造能力的提升和开发上，同时通过服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因此，在早期的基础建设阶段，徐工集团主要基于产品技术为客户提供确保产品功能稳健的基础性服务，例如安装、调试和维修等。同时，徐工集团立足企业业务流程的纵向集成和横向统一，实施了精细化管理，开展了“4321”信息化工程。这项工程从业务准备、业务蓝图、系统实现和系统上线四个维度出发，进行了131轮业务流程设计，梳理和导入了138万条工艺路线和8万条物料数据，并开展了两轮共三百多小时、一千七百多人次的培训。通过业务流程的重塑和精细化管理，徐工集团搭建了坚实的底层基础，并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全价值链信息化体系，涵盖了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和服务。在这一阶段，徐工集团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了内部管理水平，打破了产品与服务之间的隔阂，促进了产品与服务的协同和整合。在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中，内部管理者的服务化认知和自主品牌意识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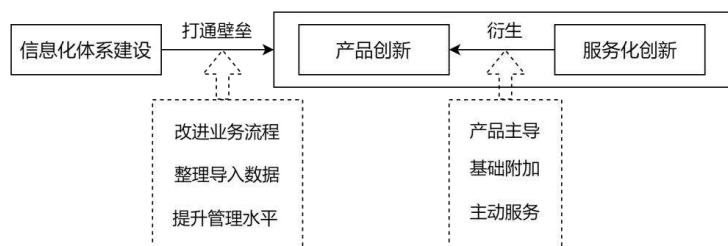


图2 学习探索服务化和信息化

2. 基础建设期——搭建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的内部基础

在多元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浪潮中，徐工集团遭遇了全线产品竞争的严峻挑战。面对从产品业务思维向服务导向思维的转变，徐工集团凭借其坚实的信息化建设基础，率先推动内部服务化转型，培育内部服务开发能力。如图3，集团优先建立了研发和技术创新中心、信息化数字化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以产业技术中心为核心，创建了国家级技术中心，并在全球布局多个研究中心，构建起全球性的研发网络，以此深化产品创新在概念开发、适应性改进、共性技术及实验技术研究阶段的发展，巩固产品创新的内部基础。

2013-2014年，徐工集团通过成立财务和信息技术公司深化转型，一是构建全价值链金融服务平台，精准支持产业链融资需求，二是推动数字化基建，实现工厂与市场互联互通，为产品与服务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加速服务化进程。徐工集团通过建立信息化、金融及租赁中心，依托信息技术优化管理流程，贯通生产与服务环节，显著提升协同研发、智能制造及服务响应能力。该体系不仅完善产品服务系统，更通过建立内部服务分配机制与独立服务能力培育，强化了服务化转型的竞争力基础，为产品与服务创新协同提供

了结构性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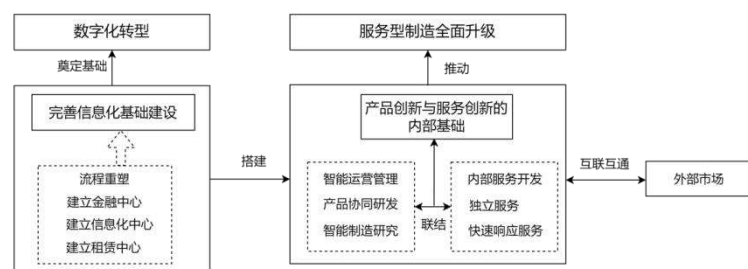


图3 产品与服务创新的内部基础

3. 高速发展期——产品与服务的协同创新

基于信息化服务化的深入探索和坚实的基础建设，徐工集团依托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核心的“大平台”，为其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注入了创新的基因。2016-2018年间重点推进数字化研发、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六大核心领域升级。通过物联网技术整合数据流，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全球设备协同管理与智能终端实时监控。2017年启动服务化转型战略，围绕机械产品眼神融资租赁、技术检测等高附加值服务，同步搭建徐工汉云、赛摩协同制造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形成覆盖研发-生产-服务的全价值链能力，推动产品创新与服务业态深度融合。为保持产品创新的持续迭代与升级，徐工集团在数字化转型趋势，全面拥抱服务化模式，实现了全流程、全要素、全周期的服务匹配。通过这种全面而深入的服务化转型，徐工集团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徐工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多重突破，一是消除产品与服务创新的信息不对称，优化供需匹配效率；二是构建生产服务快速响应体系，降低运营成本；三是居于用户行为分析与市场预判能力，实现产品服务精准定制，规避产能冗余^[19]。徐工数字化和服务化转型，通过数据驱动重构资源配置模式，系统性化解了资源约束下产品与服务创新的协同矛盾，推动企业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与价值链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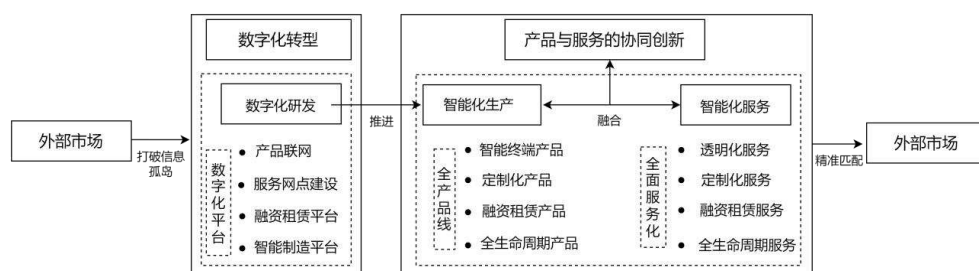


图4 数字赋能产品与服务的协同创新

4. 蝶变期——产品与服务创新深度耦合（2019—2024年）

在新信息技术的环境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被重新构建，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架构支撑体系^[19]。数字化转型推进深化了产品与服务的协同创新机制，数字赋能逐步建立起产品创新生态和服务化创新生态之间的深度耦合。这标志着产品服务供应链向产品服务创新生态链的转变，以及服务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网络的演进。徐工集团通过其数字化和服务化转型，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架构体系。如图5，这一体系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基础，支撑起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的中间方案架构，并在顶层应用场景中实现定制化设计，展现了其在服务化转型中的前瞻性和创新力。

徐州重工秉承产品观、智造观、服务观、客户观作为企业发展的四大支柱。徐工集团构建数据双核驱动的产品与服务创新体系，在产品侧，依托智能化工具与仿真技术强化研发制造协同，确保产品精度及工艺稳定性，并基于客户需求动态优化设计；在服务侧，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借助X-GSS系统提供远程运维、故障诊断等数字化服务，形成服务流程闭环优化机制。同时，搭建智能设计-研发-生产-服务全链数字基座，贯通产品服务系统与市场间的信息交互网络，实现用户全程参与的创新反馈循环。由此形成的制造服务网络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驱动产品研发、智能制造与服务创新深度耦合，构建起可追溯、自适应、可持续的共生型创新生态，持续培育企业智能化服务能力，建立起企业和客户间的共生关系，培育企业智能化产品及服务的创新能力。徐工集团所构建的服务化制造网络使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核心，数据成为驱动智能制造、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深度耦合的生命线。另外，徐工集团实施了边界模糊

化战略,超越了传统工程机械制造商的角色,拓展业务边界,采纳跨界服务的商业模式,不断延伸服务业态^[20]。集团成立的徐工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国家级的跨行业领域平台,向第三方开发者和合作伙伴敞开大门,共同开发和创新产品应用,实现资源共享和能力互补。徐工汉云将市场需求、技术、创意的供方和需方汇聚同一平台,基于平台的开放性,持续催生产品创新,开发定制化的工业应用,满足特定行业或客户的需求。该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单向研发创新模式,将用户需求和资源紧密结合,实现与用户的深度互动,让用户真正参与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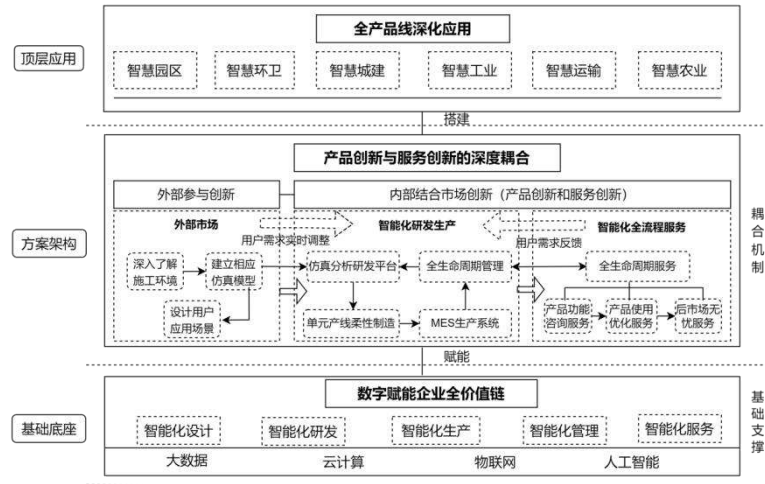


图5 数字深度赋能双元创新耦合机制

四、服务化韧性

服务化韧性特指企业在提供服务时,面对种种挑战与不确定性,确保服务的持续性、稳定性以及始终如一的质量水平的能力。在企业的服务化转型之旅中,服务化韧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帮助企业在遭遇不利事件时避免悖论现象的产生。因此,服务化韧性具备了适应性、灵活性以及持续改进的特性。徐工集团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服务化转型,关键在于两个方面:首先,集团建立了与服务化战略相匹配的组织架构,在应对产品与服务创新不断演变的挑战时,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并推动管理革新,从而构筑了服务化转型的坚实内部基础,建立起服务韧性;其次,徐工集团采取了一种全面而系统的思维方式,以前瞻性的视角和精细化的管理策略,紧密结合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的步伐,稳步构建转型的框架。通过运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集团促进了企业价值链各环节的无缝对接,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之间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协调性。此外,集团高度重视外部用户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发展战略,逐步实现用户在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建立起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这种做法确保了企业服务化价值的输出与用户的服务化价值期望保持高度一致,共同创造了价值。因此,徐工集团有效地从平衡产品与服务创新,以及协调企业价值输出与用户价值期望这两个维度出发,逐步奠定了服务化韧性的坚实基础。服务化韧性的构建依托于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之间螺旋式上升的耦合关系。这种耦合所面临的困境是一种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的矛盾现象,其中包含着相互依存但又可能引发失衡的元素。在韧性构建的过程中,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之间会展现出一种“推拉式”的互动模式^[21],它们既相互促进,也可能导致系统失衡,从而催生“服务化悖论”。因此,建立起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之间的稳健耦合关系,对于构建服务化韧性至关重要。徐工集团的产品服务系统展现了出色的耦合性能,重点体现在资源配置和创新能力上。资源配置能力关乎企业如何高效利用并拓展现有资源,以实现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之间的优化配置。创新能力的形成既源于企业固有的技术集成能力,也依赖于市场知识的积累^[22]。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即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徐工集团的发展策略正是将数据要素、市场要素与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生产条件组合及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化的赋能作用构建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连接桥梁,一方面吸收外部新知,促进创新产品的产生;另一方面消除信息不对称,确保服务化价值的输出始终与用户的服务化价值期望保持一致,并通过这一过程获得并打造企业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从而加强自身的服务化韧性。

五、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徐工集团的服务制造发展过程,针对其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利用案例研究法,系统分析了徐工集团在面向数字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二元创新机制如何避免悖论现象产生,研究发现:

深刻把握服务型制造的精髓服务型制造的本质在于以产品创新为核心,拓展服务创新后的价值链,呈现出从价值链的生产制造阶段向服务阶段的转变趋势。产品与服务的融合并非脱离制造业发展基础的空中楼阁,任何“去服务化”的现象都可能导致产品服务系统失衡^[23],乃至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失败。两者的融合发展应根植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以实现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因此,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和数字化赋能下的二元创新发展,应以三者融合创新所创造的价值为核心。评价企业是否成功实现服务化转型,不仅在于是否采用了“产品+服务”的运营模式,更在于企业能否通过这种模式提供持续、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实现与客户的深度绑定和长期合作。同时,企业是否能够利用数字化手段,在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管理等层面有效协调产品与服务的关系,实现企业内部价值的匹配和外部服务质量的提升,最终达成企业与客户价值的共生共赢关系。

阐明悖论产生的复杂因素徐工集团的实践经验揭示,产品与服务耦合的困境不仅源自内外部环境因素的交织影响,更关键地体现在企业所提供服务化价值与用户对服务化价值期望之间的不匹配。通过数字化手段的赋能,构建起企业与客户之间的沟通桥梁,这不仅加强了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之间的耦合关系,也显著提升了产品服务系统的韧性和适应性。

精心制定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清晰界定企业发展阶段的目标与关键行动从企业内部出发,借助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提高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整合研发、生产、服务等核心资源,首先实现内部价值的协同,为转型打下坚实基础。随后,着力提升与产品相关的外部服务质量,在动态发展中不断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保持系统间的平衡与协调。在转型的深入过程中,拓展服务化转型的业务范围,推动企业价值链向价值网的商业模式创新转变,从而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充分挖掘数字技术的赋能潜力作为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数字新质生产力是破解服务化悖论的关键。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以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客户体验的升级和运营效率的显著提升。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新质生产力在制造业服务化深度转型中的作用,推动产品和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促进服务型制造产业生态的构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3-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3/t20210323_1270124.html
- [2] 张彭.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当代经济研究,2024,(05):75-86.
- [3] 罗建强,戴冬焯,李丫丫.基于技术生命周期的服务创新轨道演化路径[J].科学学研究,2020,38(04):759-768.
- [4] GEBAUER H, FLEISCH E, FRIEDLI T. Overcoming the service paradox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3(1): 14-26.
- [5] 赵立龙,魏江.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战略与技术能力的匹配——华为案例研究[J].科研管理,2015,36(05):118-126.
- [6] 李玉娟,罗建强.数字化环境下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反哺产品创新扩散机理[J].系统管理学报,2023,32(05):995-1008.
- [7] VISNJIC I,JOVANOVIĆ M,NEELY A,et al.What brings the value to outcome-based contract providers?Value drivers in outcome business model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7,192: 169-181.
- [8] 罗建强,郭亚涛.既定产品技术下制造企业服务创新价值创造机理研究[J].运筹与管理,2022,31(08):225-231.
- [9] NORDIN, F., KINDSTRÖM, D., KOWALKOWSKI, C., & REHME, J. (2011). The risks of providing services.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22(3), 390-408.
- [10] 李玉娟,罗建强.数字化环境下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反哺产品创新扩散机理[J].系统管理学报,2023,32(05):995-1008.
- [11] 肖挺.制造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与产品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检验——“服务化悖论”的一种解释[J].管理评论,2019,31(07):274-285.

- [12] 王保利,杨欣.制造企业服务增强对技术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8):98-105.
- [13] 刘启雷,张媛,雷雨嫣,等.数字化赋能企业创新的过程、逻辑及机制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2,40(01):150-159.
- [14] 董华,陈蕾.大数据驱动服务型制造超网络价值共创过程[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22):193-204.
- [15] 王莉静,徐梦杰,徐莹莹,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化价值共创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合作网络视角[J].中国软科学,2024,(06):165-176.
- [16] DMITRIJEVA J, SCHROEDER A, BIGDELI A Z, et al. Paradoxes in servitization: A processual perspective[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22, 101: 141-152.
- [17] 唐权.混合案例研究法:混合研究法在质性-实证型案例研究法中的导入[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2):155-160.
- [18] LEE K, SHIM E, KIM J, et al. The Influence of Product Innovation Messages on the Intention to Purchase Incumbent Products[J].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2021, 6(3): 154-166.
- [19] 王康周,彭波,江志斌.新信息技术驱动的制造服务化价值创造过程:基于徐工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管理评论,2021,33(11):275-285.
- [20] WU Z, YIN J, DENG S, et al.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crossover services: Development and trends in China[J]. *IEEE Transactions on Services Computing*, 2015, 9(5): 664-671.
- [21] 罗建强,蒋倩雯.数字化技术作用下产品与服务创新:综述及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24):152-160.
- [22] 李靖华,姜中霜,林甲嵘,等.服务型制造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动态演化研究[J].创新科技,2024,24(09):28-44.
- [23] 余东华,张恒瑜.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数智化转型突破“服务化困境”?[J].甘肃社会科学,2022,(06):203-217.

Th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digitally empowered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Gan Xiu mei¹, Li Li Chao²

¹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The servitization paradox in manufacturing fundamentally stems from the dilemma of coupling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originating from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corporate service value propositions and customer expectations. XCMG Group's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centers on innovative value integration through three principal pathways: Firstly, consolidating internal production and service resources to enhance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efficiency and secondly, elevating service innovation value-added capabilities and fostering mutual value co-creation with customers to achieve bilateral value enhancement and thirdly, establishing a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system that strengthens the resilience of product-service systems through deepened customer connectivity. This research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realizing synergistic innovation across industrial chains and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digital empowerment;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service-oriented resilien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35

外语学习愉悦情绪研究综述——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白淳¹ 胡家英¹

(¹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要: 近年来, 愉悦情绪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在外语学习中起到重要作用, 但关于外语学习愉悦情绪的研究进展鲜有报道。本文以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 CSSCI 和 SSCI 文献资料作为数据源, 使用 CiteSpace 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 对近二十年以来的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总体发文趋势、作者合作网络关系、高被引论文的分布特征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结果显示: 自 2018 年以来, 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呈现快速发展阶段。外语愉悦情绪的国外研究较为活跃, 而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且研究有待深入。在国内外二语习得研究领域, 外语愉悦情绪仍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可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同时对于促进语言学习和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外语学习; 愉悦情绪; 文献计量学; CiteSpace; 研究热点

一、引言

积极情绪(愉悦、自豪、希望等)和消极情绪(焦虑、无聊、恐惧等)研究是二语习得领域中的重要内容^[1]。长久以来, 以焦虑为代表的消极情绪研究占据二语习得领域的主导地位^[2]。近年来, 在积极心理学的推动下, 以愉悦为代表的积极情绪在二语习得中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1-3]。在外语学习中, 愉悦等积极情绪有助于减少或消除消极情绪的影响, 提高学习者对语言输入的意识和对语言形式的感知^[4-6], 还可以减轻语言学习困难的负面影响, 增强对挫折的抵御能力^[7-8]。因此, 外语愉悦对外语学习具有积极作用, 开展对外语愉悦情绪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外语学习^[9]。然而, 对外语学习愉悦领域的研究综述成果较少, 因此对该领域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分析具有重要意义^[10]。鉴于此,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 对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外语学习愉悦情绪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 可视化分析了近二十年来外语学习愉悦情绪研究的总体研究趋势、作者合作网络关系、高被引论文以及研究热点, 旨在更加客观科学地呈现该领域的前沿和研究动态, 以期对外语学习愉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有效借鉴和指导。

二、数据检索与处理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①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整体脉络及发展态势如何? ②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现状如何? ③外语愉悦情绪的研究热点如何?

(二) 研究问题

研究数据采集截至 2024 年 7 月 21 日, 数据源自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集中 SSCI 和 CNKI 数据库中 CSSCI 文献。以“愉悦 (Enjoyment)”、“外语学习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英语 (English)”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 剔除不相关文献后, 得到有效的中文 CSSCI 文献 16 篇, 英文 SSCI 文献 211 篇(含高被引文献 17 篇)。首先, 将检索到的 CSSCI 文献以 Refworks 文本格式从 CNKI 中导出, SSCI 文献以“纯

作者简介: 白 淳(199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通讯作者: 胡家英(1966—), 女, 教授, 研究方向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及教学法。

文本”格式导出“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其次，利用 CiteSpace 6.2.R6 对导出的文本进行格式转换；最后，将转换后的数据再次导入 CiteSpace 得到关键词共现、突现词以及关键词聚类图谱等可视化数据^[11]，以此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

三、结果与讨论

(一) 年度发文趋势分析

发文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和预测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现状。考察不同年度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有助于揭示该领域发展的总体趋势^[12]。图 1 呈现了 2006-2024 年间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年度发文趋势。由图 1 可知，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缓慢发展期（2006-2017 年）和快速发展期（2018-2024 年）。基于 SSCI 论文的年度发文数量来看，从 2006 年开始到 2017 年间发文量较少，累积仅产出了 9 篇论文。从 2018 至 2020 年发文量缓慢增加，分别产出论文 5 篇、13 篇和 15 篇。由此可见，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在初期发展缓慢，但从 2020 年开始发展势头强劲呈增长趋势，由 2020 年 15 篇快速增至 2021 年 32 篇，2022 年近倍数增加到 53 篇，2023 年发文量达到了 54 篇，受检索时间的限制，2024 年的发文量仅显示截止至 7 月 21 日的变化趋势。基于 CSSCI 论文的年度发文数量来看，国内在 2006 到 2020 年间发文量更少，仅 2007 年产出 1 篇、2011 年产出 2 篇，从 2021 年开始 CSSCI 论文才开始连续产出，这表明国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要滞后于国外，也说明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在国内长期被忽视，直至近年来才受到广泛的关注。这可能是由于自 2012 年“积极心理学”被引入到二语习得领域后，该研究领域逐渐从消极情绪（比如焦虑）开始转向积极情绪（比如愉悦）的研究热潮^[10,13]。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研究需更加注重对该领域的深度挖掘和细分研究，以进一步探索外语愉悦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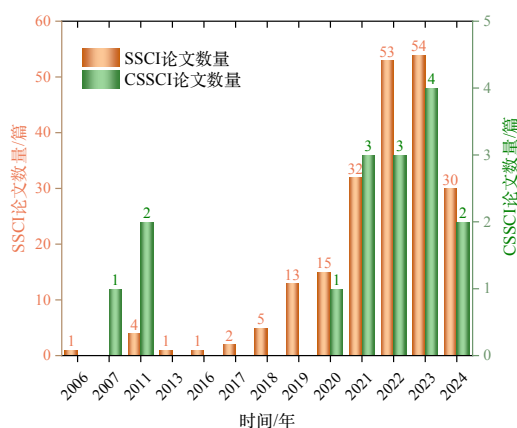


图 1 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年度发文趋势

图 2 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 SSCI 论文作者合作关系网络图谱

(二) 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现状

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作者合作网络图直观地呈现了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代表学者。通过该图可判断研究者近年来的活跃情况。节点和标签的大小，代表了作者的发文量，连线则表示作者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多，合作越频繁，联系就越紧密^[15-16]。图 2 展示了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发表的 SSCI 期刊论文作者合作关系网络。由图 2 可知，在外语愉悦研究领域产生了多位高产作者，并且已经构成了稳定的合作网络，说明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团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根据图 2 和 CiteSpace 提供的节点信息（节点 178 个、连线 154、网络密度为 0.0098），拥有较大节点的作者分别为 Dewaele Jean-Marc（13 篇）、Li Chengchen（9 篇）、Fathi Jalil（6 篇）、Lee Ju Seong（6 篇）、Zhang Lawrence Jun（4 篇）、Zhao Xian（4 篇）等。其中，Dewaele 作为该领域中最高产的学者，为该领域贡献了 14 篇高水平论文。学者 Dewaele 主要研究领域是应用语言学和多语言学，其中与中国学者李成陈合作发表了 4 篇文章，李成陈研究领域主要聚焦积极心理学、二语习得、二语写作等。发文量≥2 篇的作者统计后共有 32 位，其发文量之和为 107 篇。

图 3 为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发表的 CSSCI 论文作者合作网络图。由图 3 可知，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学者共有 23 位，其发文量之和为 31 篇，其中发文量≥2 篇的学者共有 6 位，分别为李成陈（3 篇）、董连棋（3 篇）、刘援（2 篇）、刘坚（2 篇）、李斑斑（2 篇）、马利红（2 篇），表明国内的外语愉悦情

绪研究学者也已经构成了稳定的合作网络。总体来看,国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学者数量远多于国内,这表明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在国外较为活跃,而国内的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相对滞后且研究不够深入,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加强该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和国内该领域研究特色方向的凝练,从而提高在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2. 高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被引次数能够反映文献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研究的焦点所在,通过对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的前沿热点和知识基础^[17-18]。为此,笔者对收集到的样本进行了共被引可视化分析。图4为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17篇高被引SSCI论文发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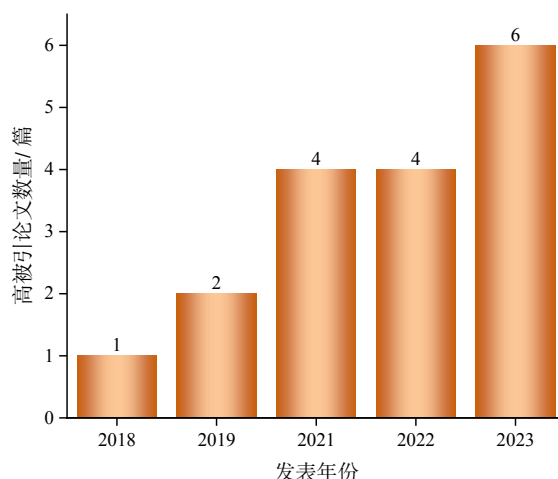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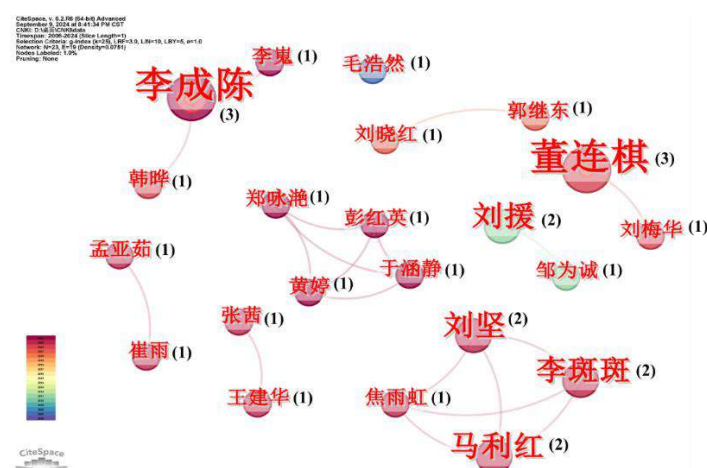


图3 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CSSCI论文作者合作关系网络图谱

图4 高被引论文发表的年度分布情况

由图4可知,该领域内的首篇高被引论文产生于2018年,这也意味着自2018年以来,外语愉悦情绪的研究领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此后高被引论文数量逐年递增,也表明外语愉悦情绪研究越来越深入。为进一步了解外语愉悦研究领域的代表文献及作者,利用CiteSpace软件按共被引文献频次对排在前十位的文献进行汇总,如表1所示。

根据表1, #1 Dewael 等研究得出自2016年以来应用语言学的逐渐认可以及积极心理学的日益普及,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5]。#2 Kazuya 等探讨了108名高中生如何根据不同的动机、情绪和经验提高二语的可理解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积极情绪下更频繁地使用二语直接影响语言习得,这反过来可能导致负面情绪的减少和提高二语的可理解性^[19]。#3 Li Chengchen 以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和假设为基础,考察了1307名中国高中生的特质情绪智力、外语愉悦和英语学习成绩之间的复杂关系^[20]。#4 Dewaele & Li 研究发现教师积极性在教育和学习者心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教师的热情在课堂上具有传染性,并对学生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5 Jin & Zhang 调查研究了外语课堂愉悦结构下的维度,并探讨了这些愉悦维度影响外语成绩的模式,研究发现教师和学生支持的愉悦对英语成绩的间接影响没有显著差异^[21]。#6 Li Chengchen 研究发现人们对外语和二语课堂上的各种情绪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自从引入积极心理学以来,并采用混合方法检验了控制-价值评价作为中国大学生英语作为外语学习无聊的前因^[22]。#7 Li Chengchen 等研究了一项关于中国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和英语教师外语学习无聊的调查,发展了外语学习无聊的多维概念,开发了外语学习无聊量表,并通过大规模样本验证了其心理测量学特性^[23]。#8 Derakhshan & Fathi 研究调查了伊朗英语学习者的外语愉悦、二语毅力、在线学习自我效能感和在线学习参与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语愉悦对在线学习参与度有积极影响,在线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在线学习参与度有积极作用^[24]。#9 Li, Chengchen 对868名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外语情绪取决于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相互作用^[25]。#10 Khajavy & Aghaei 研究了通过调查勇气与个人最佳目标、二语情绪(即愉悦和焦虑)和二语成绩的关系,来检验外语课堂中勇气及其组成部分(即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兴趣的一致性)。兴趣一致性在预测二语成绩方面的问题作用反映了教育领域的论点。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坚毅和二语成就之间关系的机制的重要发现,以及这种关系如何通过个人最佳目标来调节^[26-27]。综上,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愉悦情绪与其他情绪(厌倦、焦虑等)、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均强调了情绪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愉悦情绪对提升学习成效的积极作用。

表 1 被引频次前 10 位的作者及文献

序号	作者	发表时间	被引次数	研究主题
#1	Dewaele, Jean-Marc; Chen, Xinjie; Padilla, Amado M.; Lake, J.	2019	308	The Flowering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Acquisition Research
#2	Saito, Kazuya; Dewaele, Jean-Marc; Abe, Mariko; In'nami, Yo	2018	200	Motivation, Emotion,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Comprehensibility Development in Classroom Settings: A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Study
#3	Li, Chengchen	2020	179	A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n Chinese EFL students'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EFL learning achievement
#4	Dewaele, Jean-Marc; Li, Chengchen	2021	155	Teacher enthusiasm and students' social-behavioral learning engag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udent enjoyment and boredom in Chinese EFL classes
#5	Jin, Yinxing; Zhang, Lawrence Jun	2021	124	The dimensions of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enjoyment and their effect on foreign language achievement
#6	Li, Chengchen	2021	110	A Control-Value Theory Approach to Boredom in English Class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7	Li, Chengchen; Dewaele, Jean-Marc; Hu, Yanhong	2023	98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oredom: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8	Derakhshan, Ali; Fathi, Jalil	2024	63	Grit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s Predictors of EFL Learners' Online Engag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Online Learning Self-efficacy
#9	Li, Chengchen	2022	47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oredom and enjoyment: The effects of learner variables and teacher variables
#10	Khajavy, Gholam Hassan; Aghaei, Elham	2022	45	The contribution of grit, emotions and personal bests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三) 研究热点分析

高被引文献通常是指在特定时间内被引用次数超过某个阈值的文献，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往往代表了该领域的权威研究，能够反映学科的发展演进，有助于识别学科的前沿研究和未来发展方向，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8]。通过分析高被引文献的主题和研究内容，可以揭示特定学科或领域的研究趋势和热点。为了探究外语愉悦情绪在国内外外的研究热点，本文选取 17 篇高被引 SSCI 和 16 篇 CSSCI 文献进行分析。

1. 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高被引作者分析

中介中心性 (Centrality) 是衡量在网络中一个节点在其他节点对之间的中介作用的程度。在文献网络中，如果一个关键词在很多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那么它的中介中心性就高，表明它在知识网络中起到了桥梁作用。中介中心性高，代表作者的影响力越高。表 2 呈现了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高被引作者发文频次及中介中心性 ≥ 0.01 的情况。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国内的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学者主要由学者李成陈 (3 篇) 领衔，国外的外语愉悦情绪研究主要由 Dewaele Jean-Marc (13 篇)、Li Chengchen (9 篇)、Zhao Xian (4 篇)、Csizer Kata (3 篇)、Kruk Mariusz (3 篇)、Feng Enhao (3 篇)、Pawlak Misoslaw (3 篇)、Botes Elouise (2 篇) 等学者贡献。上述学者的发文量和文献中心性指标均较高，表明了这些学者是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也是该领域未来研究热点和方向的引领者。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注重加强与国际学者的合作，促进国内外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发展。

表2 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作者发文频次及中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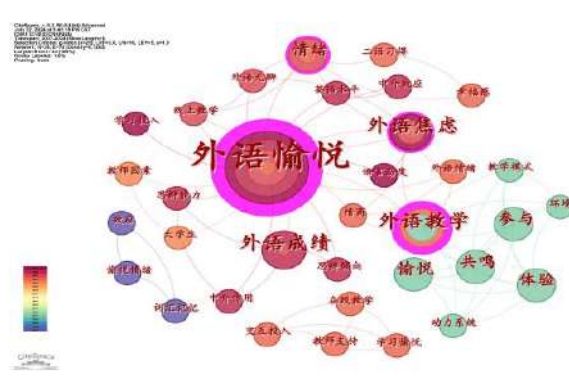
类别	序号	Count	Centrality	Year	Authors
SSCI	1	13	0.04	2018	Dewaele, Jean-Marc
	2	9	0.02	2019	Li, Chengchen
	3	4	0.01	2023	Zhao, Xian
	4	3	0.01	2022	Csizer, Kata
	5	3	0.01	2023	Kruk, Mariusz
	6	3	0.01	2022	Feng, Enhao
	7	3	0.01	2023	Pawlak, Misoslaw
	8	2	0.01	2023	Botes, Elouise
CSSCI	9	3	0.01	2021	李成陈

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概括，关键词出现频次能够有效反映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27]。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文献进行热点关键词抽取，得到关键词网络知识共现图谱（如图 5 所示），有助于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关联内容，能更直观地呈现国内外英语学习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相关研究视角。



a. 关键词共现图谱 (SSCI)



b. 关键词共现图谱 (CSSCI)

图5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5 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表明该节点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17]。高频的关键词代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解读关键词指标主要包括节点、频次和中介中心性。1) 节点的大小代表该关键词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性，由图 5a 可知，国外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关键词有 276 个节点、1400 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 0.0369，图中单独存在的节点较少，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positive psychology、enjoyment、motivation、emotions、achievement 等节点较大的关键词是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热点。表明这 6 个话题在国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话题^[29]。2) 节点的大小与频次的一致性，节点越大，频次越大，图 5a 中节点的大小与表 3 中关键词频次的高低相匹配，这些关键词反映出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关注点及研究趋势；3) 在一定程度上，中介中心性越高，表明连接关键词之间的信息越多，在网络结构中占据的位置越重要。类似地，如图 5b 所示，国内的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关键词有 34 个节点、72 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 0.1283，图中单独存在的节点也较少，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30]。其中，外语愉悦、外语成绩、外语教学、外语焦虑等节点关键词在国内的外语愉悦情绪研究中也占有较大比重，表明这 4 个话题在国内的外语愉悦情绪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话题。

结合图 5 对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的关键词频次与中心性进行统计分析。表 3 列举了国内外的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关键词频次及中心性。一般认为，某一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表明其所代表的主题热点程度越高；中心性则能反映关键词的核心程度，节点的相关性越大，中心性就越高，中心性大于 0.1，则该关键词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就较大^[29,31]。由表 3 可知，以愉悦 (Enjoyment) 为代表的积极情绪研究在外语学习中受到广泛关注且研究热点集中度较高，呈现出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

表3 关键词频次及中心性排序

类别	序号	Count	Centrality	Year	Keywords
SSCI	1	40	0.18	2016	Learners
	2	10	0.17	2016	Perceptions
	3	41	0.12	2011	English
	4	24	0.12	2017	Model
	5	66	0.11	2019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6	22	0.11	2011	Engagement
	7	10	0.10	2011	Education
CSSCI	1	10	0.81	2020	外语愉悦
	2	3	0.51	2011	外语教学
	3	2	0.18	2021	情绪
	4	3	0.12	2021	外语焦虑

3. 关键词聚类分析知识图谱

根据文献^[13]可知, 聚类分析知识图谱中的节点代表分析的对象, 被引频次越多, 节点就越大。节点内圈中的颜色及厚薄度, 表示不同时间段出现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共现关系, 其粗细表明共现的强度, 颜色则对应节点第一次共现的时间。颜色从蓝色的冷色调到红色暖色调的变化, 表示时间从早期到近期的变化。自动聚类标签视图在默认视图基础上, 通过谱聚类算法生成知识聚类, 然后通过从引用聚类的相关施引文献中通过算法提取标签词, 以此来表征对应于一定知识基础的研究前沿。经过自动抽取施引文献的关键词, CiteSpace 软件可根据文献共被引关系产生聚类 (Cluster) 标识, 用以归纳研究聚焦点^[32]。每个聚类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联系相对紧密的独立研究领域^[33]。CiteSpace 将关系紧密的关键词进行聚类, 并通过算法赋予每个关键词一个聚类值, 同一聚类中值最大的关键词为该聚类的聚类词。关键词聚类的可信度, 主要参考关键词聚类模块值 (Modularity Q, Q 值) 和聚类平均轮廓值 (Mean Silhouette, S 值), Q 值 > 0.3, 说明聚类具有显著性, S 值 > 0.5 则表示聚类结果可信度高, 具有参考价值^[18,34]。图 6 所示为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知识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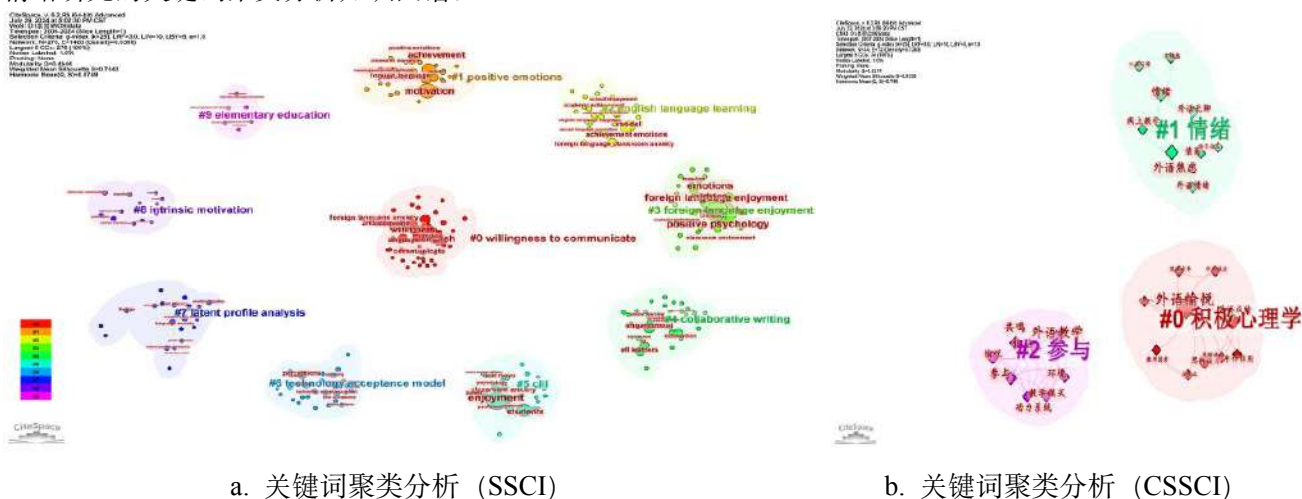


图6 关键词聚类分析

如图 6a 所示,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 国际外语愉悦研究共有 10 个共被引文献网络聚类 (0-9 聚类), 聚类模块值 Modularity Q 为 0.4644, 聚类平均轮廓值 Mean Silhouette 值为 0.7542, 说明网络结构显著, 聚类结果可信。图 6a 汇总了近十年来国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中最主要的聚类。对聚类进行整理, 剔除与愉悦情绪研究不相关的独立聚类, 如 #6、#7、#9。由此可以看出, 与国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愉悦情绪研究 (#1、#3)、交际意愿研究 (#0、#4、#8)、外语学习研究 (#2、#5)。类似地, 国内外语愉悦研究共有 3 个共被引文献网络聚类 (0-2 聚类), 聚类模块值 Modularity Q 为 0.6211, 聚类平均轮廓值 Mean Silhouette 值为 0.9338, 说明网络结构显著, 聚类结果可信。图 6b 呈现了国内外语愉

悦情绪研究领域的主要聚类,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积极心理学(0#)、情绪(#1)、参与(#2)。由此可见,与国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较窄,但也与国际外语愉悦性研究前沿热点相吻合^[10]。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重在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和研究特色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应注重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在线学习平台、移动学习应用等)在研究广度上拓展研究方向和内容,追踪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

4. 关键词时间轴知识图谱

包含文献数量较少的聚类,往往不如较大的聚类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仅对规模大于20的前10个聚类进行讨论分析。文献共被引还可以通过 CiteSpace 软件提供的时间轴线(Timeline)视图方式进行呈现^[35]。在时间轴图中,各个聚类按文献数量情况从高到低纵向排列,代表了各个聚类的重要程度,还可以看出各个聚类中被引文献的时间跨度以及某一个特定聚类研究的兴起、繁荣以及衰落过程^[36-37]。对于每个聚类,需要关注大型节点或深色年轮状节点,因为具有该特征的节点表示此文献或为高被引文献或为突现引文,关键词时间轴知识图谱,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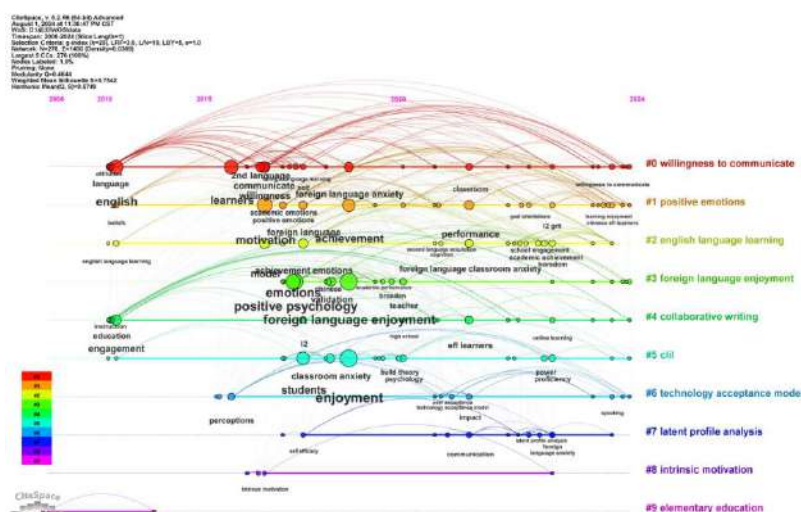


图7 关键词时间线知识图谱 (SSCI)

图7直观地展示了不同聚类随时间推移发展演进的情况。每一条实线代表一个外语愉悦情绪研究方向,右侧的数字是聚类的序号(与图6中的聚类相对应)。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生成的是以被引用文献为节点的共被引聚类图谱,图7中线条的终止并不意味着研究方向的完全消亡,只是代表该研究方向的知识基础(即高被引文献群)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显著变化^[38]。由图7可以看到,国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的10个研究方向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历程。聚类#0到聚类#5包含了大部分大型节点或深色年轮状节点,表明这6个聚类构成了2006-2024年国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前沿。总体来看,外语愉悦研究处于优势地位。图8展示了国内外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



图8 关键词时间线知识图谱 (CSSCI)

由图 8 可知,国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主要体现在积极心理学、情绪、外语愉悦三个方面。在聚类#0 积极心理学中,外语愉悦、外语成绩、大学生、教师因素等成为研究关注的热点,其中 2020 年外语愉悦情绪研究话题受到极大关注,随后研究关注的焦点由愉悦情绪与成绩的关系研究逐渐转向研究方法(如中介作用、思辨能力、中介效应等),2024 年学习投入开始受到了研究关注,表明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开始关注学习者的投入。在聚类#1 情绪方面,外语焦虑、二语习得、外语无聊、语言态度等,在情绪研究中,消极情绪(如焦虑、无聊等)一直是二语习得领域研究较多的情绪,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引入,语言态度、学习情绪也开始发生变化^[39]。在聚类#2 外语愉悦方面,在 2010 年外语教学、参与、体验受到了研究关注,随后逐渐淡出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综上,外语愉悦情绪相关的研究仍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

5. 关键词突现性分析

CiteSpace 可以探测文献或关键词的突变系数(Burstness),突变代表某个学科或领域内研究兴趣的骤增现象,是衡量文献或关键词是否具有前沿性的重要指标^[18]。为了直观表征该领域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的转移与演进态势^[40-41]。对上述关键词时间轴分析的基础上,对突现关键词进行检测,用于检测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在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掌握突现词汇在揭示研究趋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突现关键词的强度越高,表明该领域学者对该关键词的关注程度越高^[42]。如表 4 所示,通过突现词检测得到强度最高的前 20 个突现词,可反映关键词在某一时段内的递增程度,据此判断该时期的研究方向与关注度。“Keywords”为该研究中使用的突现关键词,“Year”为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Strength”表示爆发的强度,“Begin”和“End”表示出现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粗体红线表示出现的持续时间。

表 4 Top 2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06 - 2024
achievement emotions	2018	2.54	2023	2024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2021	2.37	2023	2024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experiences	2018	2.00	2018	2018	
education	2011	1.89	2011	2020	
communication	2021	1.88	2021	2022	
speaking	2023	1.79	2023	2024	
attitudes	2011	1.67	2011	2018	
broaden	2020	1.66	2022	2022	
boredom	2022	1.51	2023	2024	
willingness	2017	1.50	2021	2021	
teacher	2020	1.46	2020	2022	
emotions	2018	1.46	2021	2021	
academic performance	2020	1.38	2020	2021	
context	2018	1.36	2018	2021	
social support	2023	1.34	2023	2024	
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	2006	1.34	2006	2013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006	1.34	2006	2013	
predictors	2022	1.31	2022	2022	
environment	2022	1.31	2022	2022	

由表 4 可知,首先从“Begin”和“End”所标示的关键词成为研究热点的起止年份来看,“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和“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是较早的热点,从 2006 年一直持续到 2013 年,但该关键词之后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attitudes”从 2011-2018 年受到持续关注,而“education”从 2011-2020 年受到 10 年的持续关注,说明“attitudes”和“education”曾是研究的热点话题,但它们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当前比较受关注的热点关键词,如“achievement emotions”、“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speaking”、“boredom”、“social support”这些关键词已成为新的关注点,表明学业情绪(achievement emotions)受到最强的关注,这也表明学业情绪是近年来外语情绪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和研究热点。其次,从“Strength”所标示

的关键词突现强度来看,“achievement emotions”以指数 2.54 高居首位,这也再次表明学业情绪是外语情绪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方向。总体来看,国际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学业情绪是目前研究热点话题。

表 5 Top 2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07 - 2024
外语愉悦	2020	2.54	2022	2024	
外语成绩	2022	1.34	2022	2024	
愉悦	2011	1.03	2011	2011	
共鸣	2011	1.03	2011	2011	
参与	2011	1.03	2011	2011	
体验	2011	1.03	2011	2011	
外语教学	2011	0.84	2011	2011	
情绪	2021	0.81	2021	2022	
愉悦情绪	2007	0.66	2007	2007	
效应	2007	0.66	2007	2007	
词汇记忆	2007	0.66	2007	2007	
大学生	2020	0.66	2020	2020	
教师因素	2020	0.66	2020	2020	
外语无聊	2022	0.58	2022	2022	
线上教学	2022	0.58	2022	2022	
思辨倾向	2023	0.55	2023	2024	
英语水平	2023	0.55	2023	2024	
中介作用	2023	0.55	2023	2024	
思辨能力	2023	0.55	2023	2024	
中介效应	2023	0.55	2023	2024	

类似地,由表 5 可知,在国内的外语情绪研究中,“愉悦情绪”、“效应”、“词汇记忆”在 2006 年首次提出,但自提出之后并未受到持续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在 2011 年“愉悦”、“共鸣”、“参与”、“体验”、“外语教学”和 2020 年“大学生”和“教师因素”开始受到关注,但也未受到持续的关注;在 2021-2024 年,“外语愉悦”、“外语成绩”、“思辨倾向”、“英语水平”、“中介作用”、“思辨能力”、“中介效应”这些关键词开始受到关注,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开始转向以情绪体验研究为主,同时关注学业情绪与学业水平的关系及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从“Strength”所标示的关键词突现强度来看,“外语愉悦”以指数 2.54 高居首位,这也表明外语愉悦情绪研究是国内的外语情绪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和热点之一。综上,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在国内外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

四、总结与展望

通过运用 CiteSpace 对中文 CSSCI 文献 16 篇,英文 SSCI 文献 211 篇(含高被引文献 17 篇)进行可视化分析,梳理了外语愉悦情绪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包括外语愉悦研究的总体研究趋势、作者合作网络关系、高被引文献以及研究热点。研究得出,近年来许多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外语愉悦研究已成为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热点,并在未来继续成为该领域的关注点。愉悦、外语学习和积极心理学仍然是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课题,未来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

尽管现有研究成果已经涵盖了一定的范围,但对于外语愉悦情绪研究仍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在理论上,应加强与其他领域、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目前,跨学科已成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通过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不断丰富研究特色,深入探究外语愉悦的本质和多元化特征。2)在研究方法上,应丰富研究方法,深入探索外语学习愉悦对学习成效影响的内在机制。通过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外语愉悦研究向更系统和综合的方向发展。3)在研究对象上,应拓宽不同教育层次的研究对象。应扩大研究对象范围,探讨不同层次、类型学生的外语学习愉悦,以使研究更加全面、更具针对性。希望本文有助于外语学习领域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了解外语愉悦情绪研究进展和前沿,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而推动外语愉悦情绪研究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XIE X, GUO J. Influence of Teacher-and-Peer Support on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in EFL Learn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J].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2023,32(4):439-447.
- [2]FANG F, TANG X.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nglish Major Students' Learning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an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A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1,12:705244.
- [3]WANG Y, DERAKHSHAN A, ZHANG L J. Researching and Practicing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Past,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1,12:731721.
- [4]JIN Y, DEWAELE J-M, MACINTYRE P D. Reducing anxiety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 positive psychology approach[J].System,2021,101:102604.
- [5]DEWAELE J-M, CHEN X, PADILLA A M, et al. The Flowering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Acquisition Research[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9,10: 2128.
- [6]BOUDREAU C, MACINTYRE P D, DEWAELE J-M. Enjoyment and anxiety in seco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 idiodynamic approach[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2018,8(1):149-170.
- [7]BOTES E, DEWAELE J M, GREIFF S. By the Old Gods and the New: The Effect of the Congruence and Incongruence of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and Enjoyment on Self-Perceived Proficiency[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22,106(4):784-797.
- [8]DEWAELE J-M, ALFAWZAN M. Does the effect of enjoyment outweigh that of anxiety in foreign language performance?[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2018,8(1):21-45.
- [9]YANG S, AZARI NOUGHABI M, BOTES E, ET AL. Let's get positive: How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njoyment can create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2023,13(1):17-38.
- [10]葛奕. 外语愉悦研究综述: 回顾与展望[J]. 现代英语,2023,(22):49-51.
- [11]裴希山. 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研究的进展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21,42(3):63-75.
- [12]刘芹, 俞璐. 国内外二语语块研究: 热点、演进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0.
- [13]刘玉梅, 王晓峰. 国内多模态研究热点与趋势(2010-2020)——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外国语文,2021,37(6):66-74.
- [14]李成陈, 李崑, 江桂英. 二语学习中的情绪研究: 回顾与展望[J]. 现代外语,2024,47(1):63-75.
- [15]雷卿, 耿周. 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国内热点与趋势的可视化分析[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31(4):41-46.
- [16]王薇, 鲍彦. 国内生态学视角外语教学的特征和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 外语研究, 2020, 37(5): 52-59.
- [17]张凯, 韩姗姗. 基于 CiteSpace 的国际外语焦虑研究动态可视化分析(2003-2022)[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22-132.
- [18]魏家海, 李洁. 基于 CiteSpace 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文献计量分析(2011-2020)[J]. 山东外语教学,2022,43(1):95-106.
- [19]SAITO K, DEWAELE J M, ABE M, ET AL. Motivation, emotion,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comprehensibility development in classroom settings: A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study[J].Language Learning,2018,68(3):709-743.
- [20]LI C. A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n Chinese EFL students'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EFL learning achievement[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20,41(3):246-263.
- [21]JIN Y, ZHANG L J. The dimensions of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enjoyment and their effect on foreign language achieve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2021,24(7):948-962.
- [22]LI C. A control-value theory approach to boredom in English class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21,105(1):317-334.
- [23]LI C, DEWAELE J-M, HU Y.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oredom: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J].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2023,14(2):223-249.
- [24]DERAKHSHAN A, FATHI J. Grit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s predictors of EFL learners' online engag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online learning self-efficacy[J].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2024,33: 759-769.
- [25]LI C.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oredom and enjoyment: The effects of learner variables and teacher variables[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22,13621688221090324.

- [26]KHAJAVY G H, AGHAE E. The contribution of grit, emotions and personal bests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2024,45(6):2300-2314.
- [27]王森. 国际二语加工研究前沿与趋势可视化分析——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4):113-121.
- [28]郭高攀. 国内外文化翻译研究热点与趋势 (1991-2021) —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J].语言与翻译,2023,(2):53-62.
- [29]刘丹, 赵雪. 近十年国内外在线学习焦虑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24,38(3):293-302.
- [30]李征, 周小勇. 近 20 年国内外语教育技术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18,(6):91-96+122.
- [31]袁周敏, 徐燕燕. 基于 CSSCI 源刊的语用学知识图谱研究:分析与启示[J]. 外语电化教学,2018,(4):72-77.
- [32]李翔, 高朝阳. 国外机器翻译研究的知识图谱和发展趋势[J]. 上海翻译,2024,(2):41-47.
- [33]曹传锋, 李圃, 侯俊霞. 我国语言生活研究热点及发展脉络(1993—2022)——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J]. 语言与翻译,2023,(4):50-56.
- [34]史俊, 王建华. 国外多模态语言教学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2,(1):80-91.
- [35]俞玮奇, 周斐. 国际二语在线合作写作研究进展与前沿展望(2010—2023)——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J]. 外语界,2024,(1):65-73.
- [36]黄东晶, 毛竹君. 基于 CiteSpace 文献计量的国内体认语言学研究进展与热点可视化分析[J].外语学刊,2023,(6):107-114.
- [37]翁晓梅. 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的移动语言学习发展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28(3):70-75+102.
- [38]马晓雷, 陈颖芳, 侯俊霞, 等. 基于 CiteSpace 的二语习得研究可视化分析(1970 ~ 2014)[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9(1):121-129.
- [39]DEWAELE J M, MACINTYRE P 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The right and left feet of the language learner[J].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LA,2016,215-236.
- [40]张利红, 刘小艺. 基于 CiteSpace 的我国语言生活研究可视化分析(1998-2022)[J].外语学刊,2023,(5):44-51.
- [41]张玉玉, 赵江民. 国内近二十年构式语法研究可视化分析[J].语言与翻译,2024,(1):26-32.
- [42]夏蓉, 杨金海. 基于 CiteSpace 的语言距离跨学科研究分析与展望[J].外语界,2021,(2):90-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ositive Emo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Bai Chun¹, Hu Jiaying*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ositive emotions have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research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However, limited progress has been reported in studies concerning positive emo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is paper conduct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the overall publication trends,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research on positive emo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analysis utilizes CSSCI and SSCI literature from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employing CiteSpace knowledge mapping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research on positive emo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has entered a rapid development phase since 2018. Whi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this topic remain relatively active, domestic research in China lags behind and requires further depth. Positive emo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ontinue to be a critical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LA fields. This study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subsequent related research and provide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research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pedagogy.

Keyword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njoyment; bibliometrics; CiteSpace; research hotspot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49

乡村振兴战略下自然教育模式的创新探索 ——以“百草园”家庭共育社群的构建与实施为例

林秋玫¹ 方燕屏¹ 苏灿铎¹ 邓毓辉¹ 郭瞳杰¹ 郑少涌^{*1}

(¹ 广州软件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 随着“双减”政策的制定, 非学科类教育行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与机遇。本着“维护千万儿童成长, 进一步促进自然教育传承与开放创新”的信念, 我们原创了“百草园”品牌, 通过自然教育的理念, 探索完善人格发展的道路, 追求教育中的永恒价值。我们的项目旨在支持那些渴望从更整体的角度关注孩子发展的家庭。“百草园”致力于打造“自然幸福力, 共育促成长”中国儿童自然教育新模式, 建立更加紧密的“家庭共育社群”愿意与天下的父母一起, 促进更多的孩子健康成长, 快乐学习。尊重童年应有的美好, 获得一生的力量。

关键词: “双减”政策; 非学科类教育; 自然教育新模式; “家庭共育社群”

引言

人类从自然中走来, 却在城市中囚禁了自己。

有一个小女孩, 她看到了一只红蜻蜓, 特别喜欢, 回家吵着一定要买一只, 妈妈就告诉她“大自然的生命是没有办法买的。”那孩子就问“万能的淘宝没有嘛?”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跟孩子说明白, 生命是自然。现在大多数城里的孩子都面临严重的自然缺失,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在自然中徜徉过, 即使我们说一万个自然的故事, 孩子也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然。

“百草园”自然教育的目的就是以自然教育的理念, 探索完善人格发展的道路, 追求教育之中的永恒价值, 支持到那些渴望从更整体的角度去关注孩子发展的家庭。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幼儿和小学, 还有家长、公众以及研究的产品是否适应公众共同参与。所以建立紧密的“家庭共育群体”在不同地区下对自然教育的影响如何? 在与现有的教育方法相比, 该措施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一、研究现状

自然教育通过体验自然和亲近的方式, 去帮助人们认识、了解和欣赏大自然, 并且能够激发保护自然的意识和热情, 增强保护大自然的能力。近年来, 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以及发展。它旨在改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同时, 还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 自然教育已经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联合国曾公布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这些目标包括消除贫困、没有饥饿、健康与幸福、高质量

基金项目: 2024 年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编号: S202412618019X)

作者简介: 林秋玫(2004-),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方燕屏(2003-),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 财务管理

苏灿铎(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

邓毓辉(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 网络工程

郭瞳杰(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 财务管理

通讯作者: 郑少涌*(1997-), 男, 硕士研究生, 助教, 研究方向: 物流管理、企业管理

教育、性别平等、干净水源与公共卫生、便宜又清洁的能源等。自然教育与这些目标高度契合，通过培养人们的自然意识和环保行动，推动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在中国，自然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带孩子去户外活动，需求量大幅增加。据统计，自2022年以来，中国合法存续的自然教育机构数量接近20000家，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第三产业，以民营机构为主。这些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青年，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家庭收入在中等水平。

自然教育是让受教育者在自然体系下，独立进行生产劳动或科学实验，以生产加工工艺为主体、以科学为主导、以教学大纲为重点教学内容的自然教育模式。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全新教育模式。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人们都在追求所谓的梦想，到处为梦想打拼，而我们原始的心性也慢慢被人们所淡忘，特别从青少年阶段我们的孩子就肩背满负。当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个体对生命的重负时，那就需要自然教育来提升生命的勇敢之气，保持生命的和谐与健全。提升自然教育在当下教育体系中的高度，激发人的独立个性与自由性，释放人的本性，去建立人与大自然的联结，这就是自然教育的意义之所在。

尽管自然教育在中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但依然面临许多挑战。目前，自然教育机构的数量和规模相对较小，市场仍处于快速开拓阶段。同时，家长们参与自然教育的最大阻力包括时间不够、活动地点过远和安全性顾虑等。将来，自然教育需要进一步强化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等多元化教育资源的衔接与融合，形成教育资源的互补及互动。同时，需要提高教育内容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引入多样化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实践，提升认知自然的能力、科学思维的能力以及保护自然的意识及能力。

二、研究意义和价值

理论意义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强调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基于“十四五”规划战略和“双减”政策的视野下，乡村的振兴及治理开发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对于自然教育理念下的乡村教育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建成系统的理论基础。“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立足于乡村振兴，旨在揭示自然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实际作用。实践乡村治理理论，在适宜的乡村振兴实施点（茂名市茂南区龙坑村）进行“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的规划实践。建立自然教育模式的规划框架，框架内容包括课程策划，建立家庭共育社群，特色自然杂货开发等方面，探索并实施“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的实现路径，这不仅可以为乡村振兴与自然教育功能结合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还能为未来同类型的项目提供实践参考。

实践意义

本文以自然教育理论为导向，乡村振兴与自然教育相结合作为研究重心。构建了以自然教育驱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全新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自然教育的应用实践范围。通过实践“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促进自然教育驱动乡村振兴发展，塑造自然教育体验场景、研发自然教育课程产品，规划保护乡村景观，激发乡村活力，拓展人们对自然、对乡村的深层性认知，诱发社会对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价值。

在龙坑村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研究不仅是一项教育创新，同时也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持，这也体现了重大的社会价值。

1. 人才引进

通过引入自然幸福力“导师千人团队”，项目为龙坑村引进了多领域的专业人才，填补了当地的人才缺口。这有利于去解决乡村发展中人才短缺和知识传承的难题，以此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保障。

2. 生态资源开发与可持续经济

通过建立自然教育场地和现代化农场，项目充分挖掘了龙坑村的生态资源，创造了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将农场产物打造为特色产品，并通过线上渠道推广，为乡村振兴带来了经济效益，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3. 科学养育观念与人才培养

通过家庭共育社群，项目支持家长树立科学的养育观念，培养每个孩子根据自身天性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具有创新思维和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人才，为乡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研究基本思路

本文的研究思路聚焦于深入探索和评估“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施效果，旨在通过这一原创的自然教育模式，为当前儿童出现的与自然疏离的问题提供更多可行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响应国家教育改革的号召，促进教育行业的转型升级。

首先，本研究从分析当前社会现状入手，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孩子沉浸在网络世界，且在应试教育的强大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孩子渐渐与自然疏离，面临着“自然缺失症”的困扰。这种与自然环境的疏远不仅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还阻碍了他们的全面成长，导致创造力、探索精神和环保意识的匮乏。其次从政策背景入手，目前国家正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倡导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此背景下，“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应运而生。

“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的构建是基于自然教育的核心理念，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项目团队以孩子的年龄段为划分标准，原创了自然教育系列课程，包括“了解自然”“探索自然”“熟知自然”“自然锻炼”“自然启迪未来”五大系列。这些课程以自然探索为主题，采用实验的方式，进阶式设计课程内容，旨在帮助孩子逐步深入了解自然。在实施策略上，“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注重实践与体验的结合。项目不仅在城市周边开设了周末系列课，还建立了系统的营地课程，以及地球生命故事系列的游学路线，为孩子提供多样化的学习体验。

为了评估“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的实施效果，本研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体验“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的家长和孩子的意见和建议，以了解他们对该模式的满意度。其次，对教师及部分家长进行了访谈，深入了解他们对该模式的看法和感受。最后，我们对收集到的问卷和访谈数据进行了整合以及分析，得出了科学、客观的研究结论。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百草园”自然教育模式在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促进家庭亲子关系、推动教育行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图1 基本思路图

四、研究内容

在对现有的研究结果条件下，我们发现多数的自然教育目前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只停留在幼儿、小学，并且构建的场地和产品大多数只服务于研究对象，例如文献1。“百草园”在前期就建立紧密的“家庭共育社群”，在参考文献2中关于国内自然教育研究的述评中提到，“未来研究应加强多学科的融合，从自然教育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研究入手，探索学校科学教育与自然教育的融合以及自然教育品牌形象建设与营销策略，并积极探究自然教育的公众参与模式。”

五、研究结论

建立紧密的“家庭共育社群”，在龙坑村的乡村振兴背景下，我们汇聚了多位创新教育者和专业领域专家，涵

盖心理学、脑科学、行为学、心灵探索等领域。这个跨学科的团队，不仅致力于为家长提供支持，树立健康的养育观念，还将深入乡村社区，与家庭紧密合作，家庭共同参与进自然教育，助力每个孩子顺应自身成长需求，发展天性优势。这个措施在江门、珠海和广州地区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且公众的参与度在有效的增加。

与现有的教育方法相比，该措施的增加使得家长甚至整个家庭都参与到自然教育中，自然教育不应只有孩子个人，而是社会公众都应学习的一门课。家庭参与到自然教育中，情感纽带加强、实现个性化教育、价值观的传承和学习环境的拓展；公众参与到自然教育中，社会的凝聚力增强、知识共享与传播、资源得到整合和优化并且推动社会环保意识进步。该措施的劣势是家长家庭以及社会公众付出的时间成本增加并且要长时间的参与才会得到更有效的回报。

参考文献:

- [1] 周晨,黄逸涵,周湛曦.基于自然教育的社区花园营造——以湖南农业大学“娃娃农园”为例[J].中国园林,2019,35(12):12-16.DOI:10.19775/cla.2019.12.0012.
- [2] 王紫晔,石玲.关于国内自然教育研究述评——基于 Bibexcel 计量软件的统计分析[J].林业经济,2020,42(12):83-92.DOI:10.13843/cnki.ly.20210225.006.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J]. 人民日报, 2021 - 02 - 22 (001).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M]. 人民出版社, 2021.
- [5] 陈卫民, 等.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人才振兴的困境与突破 [J]. 农业经济, 2020 (10):58 - 60.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Hundred Herbs Garden" Natural Education Model

Lin Qiumei¹ Fang Yanping¹ Su Canduo¹ Deng Xuanhui¹ Guo Tongjie¹ Zheng Shaoyong^{1,*}

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Guangzhou, China 510900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non-academic education industry has embraced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Guided by the belief of "safeguarding the growth of millions of children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of natural education", we have created the "Hundred Herbs Garden" brand. By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natural education, we aim to explore the path to perfect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ursue the eternal value in education. Our project is dedicated to supporting families that aspire to take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to their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Hundred Herbs Garden"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new model of Chinese children's natural education, namely "Natural Happiness, Co-parenting for Growth", and establishing a closer "Family Co-parenting Community". We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par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help more children grow up healthily and learn happily, respecting the beauty that childhood deserves and enabling them to gain the strength for a lifetime.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non-academic education; new model of natural education; "Family Co-parenting Communi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50

数字经济驱动下四维协同机制构建与乡村振兴路径创新

——基于“校政企村”融合发展的多案例实证研究

赵雪姿¹刘亦纯¹张烁¹陈煜¹刘世杰¹郑少涌^{*1}

(¹广州软件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 党的二十大推动乡村建设, 校园平台在乡村振兴与数字经济发展中有大作用。本研究以广州从化上罗村为例, 结合广东“百千万工程”, 探讨数字经济下产学研融合助力乡村振兴之路。乡村振兴对现代化国家建设极为关键, 需多方面努力, 产学研融合可行且有潜力。研究采用农民与政府双重视角及分层抽样法, 全面客观且结果可靠。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 收集多类成功案例为上罗村提供借鉴。上罗村有农产品相关及法规政策了解不足等问题, 对此提出组织宣讲、优化供应链与物流、提升卫生标准、推动标准化生产与产业集群发展、借助新媒体与电商平台发展旅游与销售等建议。团队志在构建“校 + 政 + 企 + 村”新模式与相关系统助力上罗村振兴并优化用户生活体验。

关键词: 数字经济背景; 乡村振兴; 产业集群; 产学研融合; 双重视角研究; 分层抽样; 乡村振兴电商新模式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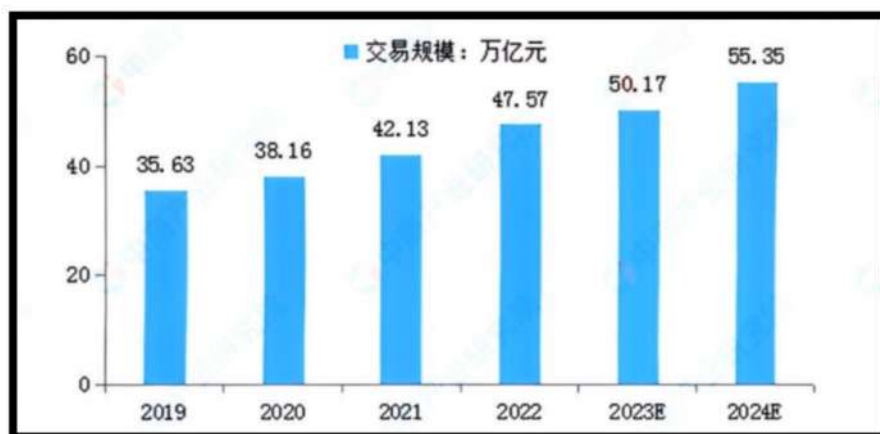


图 1-1 2019-2024 年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统计

基金项目: 2024 年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编号: S202412618021X)

作者简介: 赵雪姿 (2005-), 女, 本科生, 研究生方向: 电子商务

刘亦纯 (2004-),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张烁 (2004-),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

陈煜 (2004-),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 网络与新媒体

刘世杰 (2001-),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

通讯作者: 郑少涌 (1997-), 男, 硕士研究生, 助教, 研究方向: 物流管理、企业管理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积极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奏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的乐章。发展农村电商，是创新商业模式、建设农村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抓手，是促进农村消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力支撑。近年来，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基本建立起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物流配送体系，在助力脱贫攻坚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研究现状

上罗村作为典型的农业主导村落，其农产品种类丰富多样，除了闻名遐迩的柿子外，还种植有各类蔬菜、水果以及特色谷物等。长期以来，上罗村的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传统的种植模式与销售渠道，村民们大多遵循着祖辈传承下来的耕种经验，进行小规模、分散化的种植作业。传统农产品销售方式主导下，上罗村农产品销售范围窄、价格波动大，村民被动且利润薄。随着互联网普及，电商兴起为农业带来变革机遇，打破时空限制，上罗村部分有前瞻性农户尝试利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开设网店销售特色农产品。但在实践中，他们遭遇诸多挑战困难，在从传统销售向电商销售转型进程里，虽有趋势把握，可前行之路阻碍重重，亟待解决诸多问题以实现农产品销售的新突破与乡村经济新发展。首先，电商运营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包括网店的搭建与维护、商品信息的编辑与优化、网络营销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等，而大多数村民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只能在摸索中前行，导致网店的运营效果参差不齐。其次，农产品的物流配送环节也存在诸多问题。由于上罗村地处相对偏远地区，物流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物流成本较高，且在农产品的保鲜、包装等方面缺乏专业的技术与设备支持，这使得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较大，影响了产品的品质与客户满意度。再者，品牌建设意识淡薄也是制约上罗村电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上罗村的农产品具有独特的品质优势，但缺乏统一的品牌规划与推广，难以在竞争激烈的电商市场中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消费者对其品牌的认知度与忠诚度较低。鉴于以上种种情况，深入开展针对上罗村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通过系统地调查与分析上罗村农产品的种植现状、传统销售模式的特点与局限、电商销售的实践经验与面临的问题，以及村民对电商发展的认知与期望等多方面因素，我们旨在为上罗村探寻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农产品电商发展之路，助力其农业产业升级转型，实现农民增收致富与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二、研究意义和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发展至关重要。上罗村的乡村振兴项目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其研究意义与价值不仅局限于本村的发展，更对全国乡村振兴有着深远的启示作用。

项目重点推进农村数字化，搭建信息平台，汇聚各类资讯，推广智能设备，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生产自动化。这些举措提效农村信息化，弥合城乡数字差，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夯基，助力其于数字化进程里稳步迈向现代化。其次“校 + 企 + 政 + 村”四维一体战略模式是项目的一大亮点。高校提供技术支持、企业负责市场运作、政府给予政策扶持、村庄积极参与，四方合力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这种模式整合多元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发展格局。

此项目更是对国家“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有力响应。它是广东省乃至全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策略的积极实践，在上罗村成功打造的乡村振兴模式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宝贵借鉴经验，促进区域间资源优化配置与共享，有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国家政策的全面落实提供基层支撑与实践例证。

综上所述，该项目于上罗村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在经济发展、数字化推进、战略模式创新以及国家政策响应等多维度均展现出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为广大农村地区实现振兴发展点亮了一盏明灯，提供了可行路径与有益参考，有望引领更多乡村走向繁荣富裕的未来。

三、研究基本思路

“天罗地网”项目响应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校 + 企 + 政 + 村”四维一体展开乡村振兴探索。从大学校园出发，构建物流 + 电商 + 新媒体模式，企业借助新媒体推广上罗村特色农产品与乡村旅游，打造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校企合作将该模式引入校园为师生提供便利，还为村民提供数字化教育与培训资源。从化区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与资源协调，推动项目进展。此项目将运用现代技术与手段，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双效益。其思路与经验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在多方面提供范例参考，助力战略推进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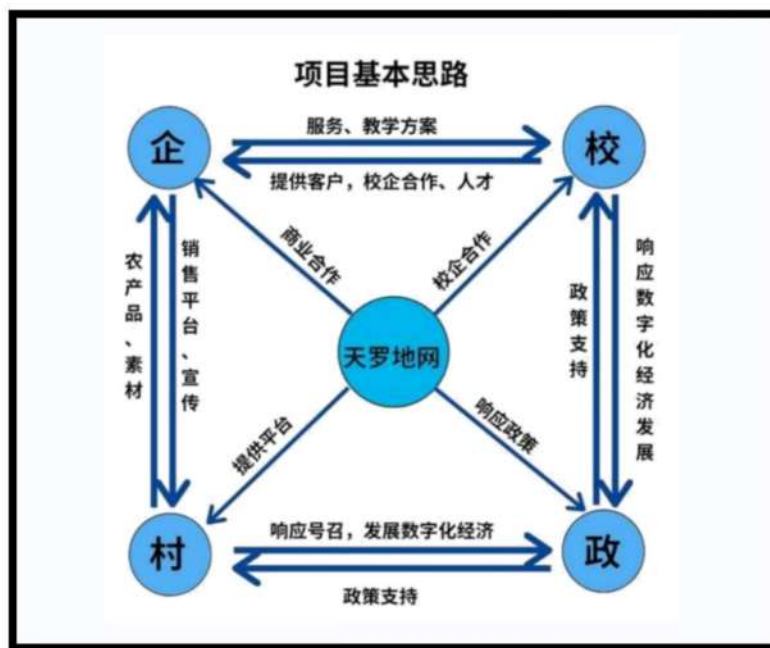


图 2-1 基本思路图

四、研究内容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打造“校+政+企+村”四维一体乡村振兴新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关乎“三农”及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经济下，电商助农推动乡村发展，为解决“人才”的问题，高校可提供人才支持，企业发挥运营和资金优势搭建电商平台、运用数字营销手段拓宽销售渠道。结合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财政扶持，助力乡村产业数字化升级。

（二）新媒体电商内容赋能乡村振兴策略研究

新媒体电商涵盖了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多种内容形式短视频直观呈现农产品种养及加工过程吸睛，直播实时互动答疑、展示产品增信任与购买欲。新媒体电商破地域与中间环节限，助农增收，且为乡村文化展示搭台，推动乡村旅游协同发展，多维度助力乡村振兴。

（三）天罗地网与“校+政+企+村”四维一体新模式的实际应用研究

天罗地网团队以校园为源，融合“校+政+企+村”构建乡村振兴新模。借网络直播与短视频展示上罗村农产与风光，促宣传增销售。并将自制周边扩市场，同时搭建广软生活平台引农产品入校。最后签结对协议，设实践岗，引导学生为乡村文化传播与产业优化注活力，多举并施，全力推动上罗村发展。

五、研究结论

在乡村振兴与数字经济背景下，以校园平台为依托，整合教育、科研与信息技术，以上罗村为试点，挖掘校园平台潜能，创新模式，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一）开拓农产品数字销售渠道，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1. 优化农产品物流链，以提升价值链。

为解决农村流通成本高，农业产业链低效，农产品销售渠道窄，各级渠道商致成本增加的问题。构建“短链”物流体系，直连“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精简供应模式。

2. 培育乡村本土数字经济文化乡村创新创业人才

通过“校+村+政+企”思维一体的合作新模式，在政府“双创”政策和企业资金帮扶的鼓励和支持下，吸引高校人才下沉至上罗村，带动一批懂电商运营、愿意扎根乡村的人才逐渐回归并从事农产品电商事业，以提高上罗村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实际经济效益。

（二）打造乡村“网红”特色，带动上罗村旅游经济发展

上罗村应秉持“两山理论”，妥善处理生态与经济关系。遵循新农村建设原则，并融合乡村文化与新媒体，借乡村旅游脱贫攻坚，转化资源为资本。依特色产业与“三农”需求，打造集休闲旅游、商贸物流、民俗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美丽乡村，推动可持续发展。

(三) 打造校政企村四维一体的经济模式

1. 从“校”出发，组建“上罗村”数字经济发展队伍

我们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挖掘上罗村的农产品优势及特色旅游资源，以推动上罗村的生产链进行数字化转型。为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将提供人才和技术，通过开展电商培训和人才培训提升村民的电商能力和人才素质。

2. 深入“村”中，实地考察“上罗村”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上罗村将提供生产基地、熟练劳动人才、优质的柿子种植技术以及其他农副产品资源。此外，上罗村还将积极收集和整理当地文化资源，为后期农产品宣传和特色旅游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 “校+企”联合，为“上罗村”融入新鲜血液

企业将为上罗村提供农产品销售平台及宣传支持，同时为学校提供服务和教学方案，共同推动上罗村的农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4. 与“政”共联，共建“上罗村”数字经济发展

借助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支持，为学校、上罗村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政策保障，共同推动上罗村的数字化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 蒋婷. 拼多多农村电商平台助农模式研究[D]. 大连海洋大学, 2023. DOI:10.27821/d.cnki.gdlhy.2023.000504.
- [2] 焦雯慧, 吴迪, 王隆. 新媒体视阈下电商直播农产品带货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分析[J]. 现代农机, 2023, (01): 30-32.
- [3] 黄璜, 等.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09): 104 - 114.
- [4] 张红宇. 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发展思考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01): 4 - 19.
- [5] 温铁军, 等. 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 基于产业生态系统的分析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 (08): 10 - 18.

Research on the "School - Government - Enterprise - Village" New Model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Zhao Xuezi¹ Liu Yichun² Zhang Shuo³ Chen Yu⁴ Liu Shijie⁵ Zheng Shaoyong*

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Guangzhou, China 510900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romoted rural construction. Campus platform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aking Shangluo Village in Conghua,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combines with Guangdong's "Hundred-Thousand-Ten-Thousand Project" to explore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o assist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cruci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ountry and requires efforts from multiple aspects.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s feasible and has great potential. This research adopts a dual-perspective approach of farmer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which is comprehensive, objective, and reliable. Emphasiz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t collects various successful cas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hangluo Village. Shangluo Village ha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related matters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suggestions include organizing publicity campaigns, optimizing the supply chain and logistics, improving hygiene standards, promoting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leveraging new media and e-commerce platforms to develop tourism and sales. The research team aims to construct a new "School+Government+Enterprise+Village" model and related systems to assist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Shangluo Village and optimize the user's life experience.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backg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cluster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ual-perspective research; Stratified sampling; New e-commerce model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1009

关于居家、社区和机构协同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究

洪文博¹ 郑梓恒¹ 冯云禧¹ 梁祖耀¹ 杨奕宸¹ 茹沛欣¹

(1.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 湛江 524000)

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3.50%), 养老服务模式创新逐渐成为破解“未富先老”难题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及机构养老三种模式的现状分析, 揭示其共性短板: 医疗资源短缺、专业人才不足、供需结构失衡及技术应用脱节。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政策导向, 提出以“协同服务”为核心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并论证其社会与经济双重价值。

关键词: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 养老服务协同模式; 银发经济

随着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不断变化, 党在第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等重点内容, 将养老这一话题推向新的高度。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4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了要从助餐服务、居家助老服务、社区便民服务、老年健康服务、养老照护服务和老年文体服务等方面发展民生事业, 解决国民养老难题^[1]。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 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总共约 19064 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3.50%^[2]。这一数据较 2016 年均增加 2.7 个百分点, 比国际上老龄化标准高出 6.5 个百分点^[3]。将这一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可发现,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规模和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 而且处于“未富先老”的不利形势。预计到 2050 年前后, 我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和抚养比将达到最高,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可持续发展和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因此, 探寻多元养老服务模式必然成为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道路, 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在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 提出了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要求, 其中特别提出积极探索“社区+物业+养老服务”的模式, 增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4]。这样的养老服务模式在政策的引导下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具有很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价值及促进物业行业转型升级等经济价值, 但也存在着社区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物业企业融入困难等现实问题^[5]。本文将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及机构养老三种基础服务模式的概念入手, 探究社区、物业、政府、商业机构等多主体协同服务的可能形式, 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1 三种基础的养老服务模式概况及现存不足

1.1 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一种较为新型的养老模式, 国外直译的“社区照护”(community care)一词在概念上和国内语境下的居家养老高度相似^[6]。“社区照护”(community care)的模式是在西方社会高福利保障模式的破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由于西方国家承受不了高福利支出的重担, 而不能继续推行如此大规模的机构养老模式, 转而开始了“去机构化”的进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区照护”(community care)就成为“去机构化”进程的产物。在我国, 居家养老模式的提出和推行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以子女或自给自足的家庭养老模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养老需求。关于居家养老服务, 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老年人在自己家中接受来自正式照护者和非

基金项目: 2021 年广东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校级项目编号: CXXL2021196)

作者简介: 洪文博(1994—), 男, 硕士研究生, 助教, 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

郑梓恒(2000—), 男, 本科生, 项目组组长,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BIM;

冯云禧(2002—),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公共资源管理;

茹沛欣(2003—),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结构设计;

梁祖耀(2001—),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人文关怀;

杨奕宸(2002—),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公共资源管理。

正式照护者的照顾,照顾者对老人的卫生保健需求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为老人提供医疗辅助、健康管理、个人照料、精神慰藉、预防等方面的照护服务^[7]。在这个定义中,正式照护者和非正式照护者就是居家养老的服务提供者,正式照护者往往来自专业化的机构或者具有专业技术认证的服务人员,而非正式的照护者可能是老人的家属,也可能是服务水平较高但非专业的社会组织。

虽然居家养老模式为主流的养老方式之一,但也存在一些显著的不足之处:首先,如果是依赖子女或家属的模式,那在现在家庭结构小型化、独生子女夫妻的养老叠加育儿压力下,对于家庭成员均会造成较大压力;其次,对于老人患有慢性生理疾病或康复需求的情况,居家养老需要配备相应专业护工或医疗设备等,而这种需求需要有足够的人员资源和经济支出;第三,需考虑老人在独处时的安全隐患以及有照护者时的责任纠纷问题,需要充足的智能检测设备来持续关注;此外还可能出现老人对外人的心理抗拒、对技术的接受程度、对子女的依赖、对社交的需求等情感和心理健康相关问题。

1.2 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的概念在国内学者的研究当中虽然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可以达成的共识是将社区养老作为一种不同于居家养老或者机构养老的独立的养老服务模式,即把社会机构当中的养老服务引入社区当中,在社区里开展的以家庭为核心同时兼顾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优点的一种养老服务模式^[8]。老人可以有选择地在社区养老机构接受半托或是全托的服务,也可以在和家人居住同一社区的情况下同时获取来自家人的精神慰藉。区别于居家养老,社区的养老服务可以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场所,也可以由专业的技能人员或非专业的志愿组织进行服务,为老人的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9]。

社区养老模式作为居家与机构养老的衔接形态,虽然在便利性与情感联结上具备一定优势,但仍存在一些发展制约。资源与设施短缺是首要问题,比如养老床位不足,城乡、区域分配失衡,老旧社区适老化改造滞后,医疗护理资源缺口等;社区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也会造成结构化矛盾,目前只有少量的社区能提供专业医疗与心理服务,从业人员持证率不足,流动性高,基础服务同质化、专业服务稀缺化并存;此外,新一代老年人对健康管理、社交娱乐等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新技术新设备的适老化断层也会造成老年人的心理焦虑或逃避;而政策执行偏差也会进一步削弱实效,财政补贴多倾斜于硬件建设,相关部门协作低效、验收标准模糊,部分设施被挪用或闲置,难以形成长效运营机制。这些问题折射出资源分配失衡、专业化缺失、政策落地粗放及技术应用脱节等矛盾制约着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10]。

1.3 机构养老

对于机构养老的定义也有很多,比如高岩和李玲提出机构养老是指政府或社会专为老年人养老所提供的综合性服务机构和设施,以及由此形成的养老社区^[11]。王德文认为机构养老是在特别设置的场所,采取专业化的方式,为老人提供医疗、护理、康复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养老照护服务^[12]。通过诸多学者对于机构养老的阐述,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通过专业的人员来为老人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模式。这些服务者往往接受过充分的教培与训练,具有较高水平的服务技能和较为充足的实践经验。

对于机构养老模式的现状有以下不足:首先是养老机构的供给侧结构有所短缺^[13],高端民营养老机构收费高昂,而公建民营机构多为多人间配置,导致大量中低收入老年人难以找到价格适中的优质服务,形成“高端住不起、低端不愿住”的困境;第二是医护能力不足与专业人才的短缺,相对于较为庞大的养老服务消费者基数,机构可能需要与外部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另外,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较高,财政补贴多集中于硬件建设而非商业服务,数字化技术、智能检测、远程医疗等也难以在银发群体中有效落地。

2 居家、社区和机构的多方协同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索价值和可实践性

2.1 探索价值

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到“引入社会组织和家政、物业等企业,兴办或运营老年供餐、社区日间照料、老年活动中心等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项目”,这是国家政策文件中首次提到了物业企业与养老服务之间的关系^[14]。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贯通协调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要求巩固居家养老基础作用,强化社区养老依托作用,优化机构养老专业支撑作用,同时促进医养结合,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并加强和改进养老服务综合监管^[15]。

前文已经阐述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模式的概念及不足,综合而言共有的短板为医疗资源和专业人员的有限短缺,结合相关政策的引导,协调三者所能带来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2.1.1 三种养老服务模式协同发展的社会价值

经过前述分析可以知道三种养老服务具有不同的专业化程度,情感需求的满足能力。因此寻找合适的协同模式可以很大程度满足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情感需求,同时也有助于构建包容性的社会网络,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居家养老满足老年人对“原居安老”的情感需求,社区养老提供社交支持与基础医疗,机构养老覆盖失能失

智群体的专业照护。三者的协同能够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经济能力和心理偏好分层应对,避免“一刀切”服务模式。家庭照护的压力可以通过社区日间托养、机构短期喘息服务得到缓解,降低“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道德风险,促进代际之间的和谐氛围。在社会关系层面,社区可以作为纽带,连接居家与机构,通过自愿互助、邻里支持等机制,重建充满人情味的邻里关系,亦可覆盖农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等群体,增强社会凝聚力,减少弱势群体边缘化。另外在践行国家政策的同时,可以通过引导资源下沉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将政府补贴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以避免养老资源被高收入群体垄断,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

2.1.2 三种养老服务模式协同发展的经济价值

养老服务模式的产业升级是我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条具体路径,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伴随着老年人寿命的提高,意味着老年消费者的数量在不断攀升,因此对三种养老服务模式协同发展的探索具有很大潜力的经济价值,包括但不限于可以优化相对短缺的资源配置、降低服务的综合成本、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激活老年人口的消费市场、发展延伸相关的产业链条、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促进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的经济增长。

通过整合居家、社区和机构的资源,减少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将医疗、餐饮、娱乐等资源集中共享,降低重复投入,合理覆盖城镇社区。同时社区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托养服务劳动岗位,吸引年轻群体进入养老护理行业,也减轻老年人家庭成员的照护压力,从而直接或间接支持家庭成员的就业,比如老年食堂助餐点可以减轻子女烹饪压力等,达到释放家庭劳动力的作用。此外,老年人对健康管理、文化娱乐等需求激增,逐渐催生新的业态,例如心理咨询、康复理疗等服务,或是对智慧养老产品、医养结合产业的需求等等。对于老龄人口较多的社区,适老化改造也将成为新的增长点,老人对于建筑空间和功能的需要能够扩充建筑行业市场。另外积极发展科学高质量的养老模式可以预见性地减少老人急性病的发病率,为国家和地方节省医疗保障费用,刺激保险业发展等。

2.2 可实践性

协调三类养老形态的社会价值在于构建包容、公平、有温度的老龄社会,经济价值则体现在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动能释放与财政可持续性。为了更好地协调三种养老模式共同发挥作用,需通过制度创新打破服务模式间的壁垒、传统技能与数字化技术融合提升效率、家庭社区机构共同管理激发产业活力,才能实现“老有所养”向“老有善养”的跃升,为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提供长效支撑。

以下是笔者提出的一些可能具备深度研究价值的实践思路:

- (1) 整合相关政策并建立统一标准。可以建立跨部门的长效协调机制,明确居家、社区、机构的功能边界与服务衔接标准,避免资源错配和责任纠纷;
- (2) 加强技术赋能和数据共享,构建专业的智慧养老平台,高效整合健康数据、服务需求与供给信息,加强适老化 UI 设计,降低老龄人口的操作门槛;
- (3) 激励市场,增强社会参与度。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或合适的商业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培育非营利组织与志愿团体,填补政府与市场的服务盲区。

3 总结与展望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居家、社区和机构三方协同的养老服务模式有望成为破解养老难题的关键路径。本文通过分析三种基础养老模式的现状与不足,结合相关的政策导向,揭示了多方协同模式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潜力。

在社会价值层面,协同模式通过分层响应老年人需求,构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居家养老满足了老年人对“原居安老”的情感归属,社区养老可以通过助餐、日间照料等服务强化社交支持,而机构养老则为失能失智群体提供专业照护,三者互补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这一模式不仅缓解了家庭照护压力,降低代际矛盾,还通过政策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缩小城乡服务差距,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经济价值的实现则体现在资源整合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效应上。通过共享医疗、护理资源,协同模式显著降低重复投入成本,社区托养服务释放的家庭劳动力间接支持社会生产率提升,同时也促进了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设备等新兴市场的发展,其中银发经济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

此外,政策创新与实践突破为协同模式奠定了基础。国务院《关于发展银发经济的意见》政策逐步细化服务标准与责任边界,嵌入式社区服务、物业协同养老等模式已初见成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也给出了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目标,以此来展望未来,协同模式仍需在制度、技术与文化三方面深化探索^[6]。政策层面需完善责任划分与补贴机制,避免“重建设轻服务”倾向,同时推动立法解决医养结合的医保报销壁垒。强化适老化创新,开发低操作门槛设备,并构建全域数据平台整合健康信息,提升慢性病管理效率。给予适当的市场激励,吸引社会资本,培育养老产业集群,推广互助养老,失能失智群体需专项补贴与保险机制支持。文化观念上,需倡导积极老龄化理念,通过代际共居社区促进老少互动,重塑老年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4年01月15日.国办发〔2024〕1号.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6088.htm
- [2]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人口年龄构成情况.国家统计局.2021年05月11日.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 [3]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7年02月28日. 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tjgb2020/201708/t20170811_1768640.html
-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18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1/24/content_5653181.htm
- [5] 陈杰,张宇,石曼卿.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短板与创新——兼论“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推广问题[J].行政管理改革,2022,(06):84-93.
- [6] 石琨.居家养老概念辨析、热点议题与研究趋势[J].社会保障研究,2018(5):56-63.
- [7] 娄方丽,尚少梅,金晓燕.居家养老与长期照护、家庭照护之概念辨析[J].护士进修杂志,2013(5):463-466.
- [8] 周瑞乐,石岩涛.我国社区养老研究综述[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3):180-182.
- [9] 陈伟涛.“和而不同”:家庭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概念比较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1,(09):144-150.
- [10] 社区养老:真风口还是伪命题?.链老. [DB/OL].2025. <https://www.linkolder.com/article/3254806>
- [11] 高岩,李玲.机构养老服务研究文献综述[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1(7):47-49.
- [12] 王德文,谢良地.社区老年人口养老照护现状与发展对策[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06.334.
- [13] 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重庆人大. https://www.cqrd.gov.cn/site/article/1217488301583257600/web/content_1217488301583257600.html
- [14]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2013年09月13日.国发〔2013〕35号.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9/13/content_7213.htm
- [15][1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5年01月07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6775.htm

Exploration on the Collaborative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Integrating

Home-based, Community,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Hong Wenbo, Zheng Ziheng, Feng Yunxi, Liang Zuyao, Yang Yichen, Ru Peixin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aging process in China (the population aged 65 and above accounting for 13.5%), innovation in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aging before afflu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ree existing models—home-based care, community care, and institutional care—revealing their common shortcomings: insufficient medical resources, lack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supply-demand imbalance, and disconnection 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Guided by policy documents such as the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su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we propose a novel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centered on "collaborative services" and demonstrate its dual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Keywords: home-based elderly car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collaborative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silver econom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789

试析紧急事态下日本的粮食安全体制

——基于《粮食农业农村政策制定新方向》的分析

张珍霓¹ 王耀振¹

(¹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摘要: 粮食安全是国计民生的重要保障, 尤其在紧急事态下更显战略意义。本文以 2023 年 6 月 2 日粮食稳定供给及农林水产基础设施强化本部发布的《粮食农业农村政策制定新方向》以及同年 8 月成立的紧急事态下粮食安全研究会的讨论成果为依据, 深入探讨了全球粮食供需变化、气候异常、疫病风险、国际地缘政治和进口竞争等多重风险对日本粮食供应带来的冲击; 同时, 针对现行政府体制、法律体系和应急措施中存在的不足, 提出了构建全域决策体制、完善法律法规和多层次保障措施的对策建议, 为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系统性政策参考。

关键词: 粮食安全; 应急时期; 供给风险; 体制完善

一、粮食安全与日本紧急应对

粮食作为维持人类生命、保证营养均衡的重要物资, 直接关系到国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确保粮食稳定供应不仅是保障基本生活的前提, 也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石。日本长期依赖进口, 在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和国内农业条件薄弱的双重影响下, 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受到高度关注。2023 年 6 月 2 日, 粮食稳定供给及农林水产基础设施强化本部发布了《粮食农业农村政策制定新方向》, 明确规定在紧急事态下要“明确紧急时期的基本应对方针, 建立包括农林水产部以外各省局的措施在内的、相关省局能够共同协作, 在平时和紧急事态之间切换, 在紧急事态下根据个案采取适当措施的政府全域决策体制”。这一政策文件从战略高度指出了在紧急情况下确保粮食供应的必要性, 并为后续相关法律和应急措施的研究提供了政策指导。同年 8 月, 由生产、流通、消费、法律、风险管理等各界专家以及相关部委代表组成的紧急事态下粮食安全研究会正式成立。该工作组集中讨论了紧急事态应对措施的基本概念、所需采取的具体措施、现行法律法规下应对可能性的可行性以及各部委的作用, 从而形成了详细讨论成果摘要。这些成果不仅涉及对粮食供需动态的判断, 也针对各种风险因素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 提出了以保证国民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应急策略。

全球粮食问题的严峻态势也为日本提出了挑战。统计数据显示, 2000 年全球人口约为 60 亿, 预计 2022 年将达到约 79 亿, 而到 2050 年可能上升到约 97 亿。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特别是新兴国家国民收入提高, 肉类和油脂的消费显著增加, 粮食需求不断攀升。同时, 全球各国纷纷推出碳中和政策, 推动对谷物和其他生物燃料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尽管全球粮食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农业生产固有的自然波动性、极端气候、以及政策和区域冲突等因素, 使得产量波动和供应短缺的风险逐渐增大。全球粮食库存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库存水平异常高, 但其他国家库存增长受到抑制), 这一现状使得全球收成欠佳时短缺和价格上涨的风险更加显著。

从历史上看, 日本的粮食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战后日本通过农业保护政策, 提高了稻米自给率, 并通过贸易政策确保其他粮食品类的供应。然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日本逐渐依赖国际市场获取粮食。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2024JXZD18);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4 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2024YJSS025)

作者简介: 张珍霓 (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日本经济。

王耀振 (1983-),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外交史、日本经济。

近年来,全球粮食价格波动、国际局势紧张、新冠疫情影响以及极端天气频发,使得粮食供应风险加剧,日本的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日本作为一个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其粮食安全自然受到国际市场供需变化的直接冲击,因此构建一套既能在平时预防又能在紧急时迅速响应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显得尤为紧迫。

二、紧急事态下粮食供给风险及不稳定因素分析

粮食供应安全问题牵涉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而在紧急事态下,粮食供应风险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性。以下从全球供需变化、气候异常、疫病风险、国际地缘政治及进口竞争五个方面,详细探讨紧急时期粮食供给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第一,全球供需变化与生产不稳定性。粮食作为保证生命和健康的重要物资,其供应稳定性直接影响到国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全球粮食市场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不断扩大的需求和波动的供应:人口由60亿增长到近80亿,并预计在未来几十年继续攀升;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升使得对肉类、油脂等高附加值食品的需求显著增加,进而带动对粮食作为饲料原料的需求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其丰收与歉收均可能引发极端市场现象。丰收时,过剩库存可能导致价格暴跌;歉收时,供应骤减则引发价格上涨与市场恐慌。各国因气候异常、政策调整及区域冲突而多次出现供需缺口,而全球粮食库存普遍处于较低水平,使得任何一个环节的波动都可能迅速传递至整个供应链。日本作为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在这种国际局势下更容易受到影响,其粮食供应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第二,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风险。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随着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加,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土壤水分逐渐减少,干旱现象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洪水和高温热浪,也会破坏农作物生长周期,导致大面积歉收。近年来,多个农业产区相继出现因干旱和高温等极端气候引发的减产现象,这使得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还会影响物流和运输,增加食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损失风险,进而对市场供给产生连锁反应。由此可见,气候变化不仅直接影响粮食生产,更通过破坏供应链的稳定性,对整个粮食安全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

第三,疫病风险及物流中断。疫病风险是当前影响粮食供应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跨境物流的增加和大规模集约化养殖的发展,牲畜传染病和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例如,非洲猪瘟从非洲蔓延至欧洲,再传至亚洲和中美洲,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疫情;高致病性禽流感则在多个大洲爆发,严重冲击了禽类生产。日本在2022年鸡季中,扑杀鸡只总量达到1,771万只(其中蛋鸡约1,654万只、肉鸡96万只),创下历史新高。疫病不仅使得相关产品产量骤降,而且往往伴随着对加工、流通环节的影响,形成供应链中断。同时,新发传染病和再发传染病(如SARS、猪流感、MERS、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的频繁出现,也给国际物流网络带来了巨大冲击。经济活动放缓、封锁和裁员使得港口、物流和运输系统面临严峻挑战,海运费大幅上涨、运输周期延长,使得粮食进口和流通过程受到严重影响。由此,疫病风险与物流中断相互作用,极大增加了紧急事态下粮食供应的脆弱性。

第四,国际地缘政治与进口竞争风险。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动荡对全球粮食供应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重大事件使得黑海地区粮食出口受阻,国际小麦和化肥原料价格迅速上涨。这种外部市场的不稳定性直接增加了粮食供应中断的风险。对于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国际主要出口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采取出口限制,导致粮食采购渠道受阻。与此同时,日本长期处于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放缓的状态,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以较快速度发展,导致日本在国际采购市场中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1998年,日本曾是全球最大的农林水产品净进口国,但近年来这一地位受到冲击,采购竞争日益激烈,使得“买不到粮食”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供应中断与竞争加剧共同构成了日本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外部风险。

第五,多重风险的综合效应。全球粮食供应风险、气候极端事件、疫病与物流中断、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以及进口竞争加剧,各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叠加。全球库存水平低、供需波动剧烈,使得任何单一风险发生时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气候变化和疫病风险的双重打击,使得局部歉收可能迅速蔓延到整个供应链;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则使得本就依赖进口的日本在采购时面临更大压力。多重风险的叠加效应最终使得紧急事态下粮食供应问题复杂而严峻,必须构建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风险管理和应急响应体系,以确保在任何突发情况下都能保障国民基本饮食和社会经济稳定。

三、现行体制及法律措施的不足与完善路径

日本政府为确保紧急事态下粮食供应,采取了由农林水产部牵头,联合消费者厅、外交部、财政部、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共同应对的举措。这种多部门协同机制在平时对粮食供需情况进行监控、调控及信息发布发挥了一定作用,例如,消费者厅在平时通过信息发布平抑市场情绪,外交部与财政部则致力于确保与主要进口国保持良好关系,推动海关手续加快、关税减免;国土交通省则负责协调物流、运输和仓储等工作。然而,目前所推行的《紧急时粮食安全指南》主要侧重于农林水产部的具体措施,并未为其他省局的协调、联合指挥和信息共享建立明确的制度安排。紧急事态一旦爆发,粮食供应若出现大幅下降,往往要求在最短时间内统一调动各部门资源、实现统一决策,而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完善、全域覆盖的决策体制,导致各部门在应急响应上存在信息传递不畅、反应滞后和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因此,有

必要在平时就明确各部门在粮食供需监控、预警及应急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并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成立以总理为首的临时特别工作组，实现跨部门的统一指挥和快速响应。

在现有法律体系方面，目前主要依托《稳定民生紧急措施法》、《防止囤积等法律》和《粮食法》来调控粮食供应，但这些法律最初并非专为粮食短缺风险设计，而是为应对物价上涨、投机囤积及石油危机等情况而制定。例如，《稳定民生紧急措施法》只适用于当物价总水平较历史趋势明显上扬或存在明显上涨风险时；《防止囤积等交易法》仅针对发生囤积、扣留现象时才启动；而《食品法》则仅局限于对大米的调控。由于我国粮食安全涵盖大米、小麦、大豆、油料作物、畜产品及糖等多个品种，还包括生产资料如肥料、饲料、种子、农药和燃料油等环节，这些法律显然无法全面覆盖紧急事态下整个粮食供应链的调控需要。

现有法律在早期预警和干预方面也存在不足。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往往会有先兆，如气候异常、作物歉收或物流延误，在供应下降达到 20% 的关键指导值之前，市场便可能因预期不稳而出现恐慌性囤积、抢购等行为。对于部分关键品种，即使供应下降仅约 10%，也会对整个产业链产生严重影响，但目前的法律启动条件及操作方式尚未能覆盖这种情况，从而使得预防性调控力度不足，未能及时遏制市场混乱。措施手段和执行保障上，现行法规仅规定企业需按生产计划申报生产、调拨库存、并在必要时接受政府的进口和生产指示，但对于如何调整各环节之间的出货量、如何实现行业间均衡分配，以及如何通过价格管控防止市场失序等问题，则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同时，对于企业在执行政府指示过程中可能遭受的经营风险，现有法律并未规定明确的激励补贴或损失补偿政策，致使部分企业因风险顾虑而不敢主动调整生产或进口计划，这在紧急事态下无疑会削弱政府措施的有效性。

为此，亟需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综合性粮食安全法律体系。新法律体系应以确保国民最低热量供应为基本目标，明确规定当粮食供应（包括国内生产与进口）与平时相比下降超过 20% 时，各项应急措施必须启动；对于部分品种，依据其行业规模、库存状况和替代性，即使下降幅度较小，也应灵活采取相应措施。特别地，将每人每日热量供应低于 1900 大卡作为紧急情况下的严重标准，为政府提供明确的操作依据。新法律应将粮食生产、进口、储备、物流调控与价格管控等各环节有机衔接，并通过法律赋予政府在紧急事态下进行统一调控和资源调配的权力。

此外，还需要完善信息监测与预警系统，利用数字化和大数据技术，建立涵盖粮食生产、库存、进口、流通等全过程的动态监控平台。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风险评估，提前识别因异常气候、疫病或国际局势动荡可能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相关部门能够迅速启动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和预警模型将有助于缩短响应时间，确保各部门在最短时间内联动协作，防止风险蔓延。在保障供应措施方面，还应从多个层次入手，确保在紧急情况下粮食能够顺利进入国内市场并公平分配。首先，在运输和销售环节，应依据《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的规定，对特定地区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问题下达临时运输指令，确保食品能够均衡分配到各地区。其次，在进口方面，应采取国营与民间贸易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调整招标条件、鼓励多渠道进口，确保必要粮食的进口总量，即使在国际供应受阻时也能保障国内市场供应。再次，在扩大生产方面，应根据实际情况向生产者发出增产要求，必要时推动生产转移，利用尚未充分开发的土地和资源，加速粮食生产，以弥补进口不足。此外，对企业实行生产和流通环节的价格调控和销售管理措施，通过标准价格制度、信息发布和金融手段调控，避免因市场恐慌导致价格剧涨和供应失衡。最后，建立激励与补贴机制同样至关重要。政府在向企业下达各项指令时，应同步出台相应的补贴和激励政策，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其主动执行指令的积极性；对于不按要求申报生产计划或拖延响应的行为，适当设立处罚措施，确保整个应急体系的严肃性和执行力。定期组织跨部门、跨地区的应急演练和模拟，检验预警系统和应急预案的实效，不断完善和修订相关制度，将有助于形成覆盖全产业链、协同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总体而言，现行体制和法律措施在面临多重风险和紧急情况时存在诸多不足，而通过构建综合性法律体系、完善全域决策体制、加强信息监测预警、落实多层次供应保障以及建立激励补贴和处罚机制，能够大幅提升应急响应和调控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在突发事件中迅速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国民基本饮食安全，也为日本在国际粮食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大的主动权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结语与启示

粮食安全问题始终贯穿于国家战略与民生保障的全局，尤其在紧急事态下，确保每一位国民获得充足食物不仅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前提，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本文基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发布的《粮食农业农村政策制定新方向》和紧急事态下粮食安全研究会的讨论成果，从全球供需变化、气候异常、疫病扩散、国际地缘政治和进口竞争等多方面，详细剖析了紧急事态下日本粮食供应面临的严峻风险。同时，对现行政府体制、法律措施和应急手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建立综合性粮食安全法律体系、构建全域决策与跨部门协调机制、完善信息预警系统和多层次保障供应措施的建议。

在全球粮食需求不断上升、生产波动频繁的背景下，日本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挑战。只有通过构建科学、系统、协调高效的应急响应体系，才能在突发事

件中及时稳定市场预期,确保国民基本饮食安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社会各界必须共同协作,从体制、法律、技术和政策等多方面入手,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实效性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为国家长远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对于同样面临粮食安全挑战的中国而言,日本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镜鉴价值。我国在保持粮食自给率优势的同时,亟需完善“平急结合”的弹性保障机制:一是构建“中央-地方-企业”三级应急联动体系,强化极端情境下的物资调配能力;二是推进粮食安全立法进程,将耕地保护、仓储管理、价格调控等核心制度法定化;三是发展智慧农业监测系统,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风险预警模型;四是深化国际粮食合作,在巩固传统进口渠道基础上拓展多元化供给网络。特别要注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实现储备粮动态管理,培育抗旱抗涝作物品种,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的长效补偿机制。

未来,日本需要在全球粮食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内部协调与预警机制,完善激励补贴和处罚措施,确保在任何突发情况下都能迅速调动各部门和资源,保障粮食供应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应把握“双循环”战略机遇,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粮食贸易新秩序。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单产水平,依托“一带一路”拓展农业合作空间,构建起兼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粮食安全保障新模式。只有如此,才能在紧急事态下实现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全方位应对,维护国家经济与社会稳定,为国民提供坚实的生活保障。

参考文献:

- [1]周旭海.日本粮食安全保障立法近期进展的审视与思考[J].中国粮食经济,2024,(10):24-28.
- [2]大賀 圭治,食料安全保障とは何か—日本と世界の食料安全保障問題—,システム農学,30 卷 (2014) 1 号.
- [3]日比 絵里子,世界の食料安全保障の現状と課題,日本作物学会講演会要旨集,第 255 回日本作物学会講演会.
- [4]農林水産省,緊急事態食料安全保障指針,令和 3 年 7 月.
- [5]川端 正久,アフリカと食糧援助,現代アフリカの政治と国際関係,1988 年 1988 卷 88 号 172-187,L15.
- [6]小倉 健一郎,食料自給率に関する農林水産省の取組み,農業農村工学会誌,77 卷 (2009) 9 号.
- [7]齋藤 勝宏,多面的価値とリンクした食料安全保障の実現に向けて,農業経済研究,2020 年 92 卷 3 号 198-209.
- [8]末松 広行,日本の食料安全保障,日本調理科学会誌,2023 年 56 卷 3 号 153-156.

An analysis of Japan's food security system under emergency situations ——Analysis based on "New Directions for Food, Agriculture and Rural Policy Formulation"

Zhenni Zhang ¹ Yaozhen Wang ¹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Abstract: Food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especially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Based on the "New Direction for Food, Agriculture and Rural Policy Formulation" issued by the Headquarters for Stable Food Supply and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Forestry and Fisheries Infrastructure on June 2, 2023, and the discussion results of the Food Security Research Group under Emergency Situations established in August of the same year,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multiple risks such as changes in global food supply and demand, abnormal climate, epidemic risks,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and import competition on Japan's food supply; at the same time, in response to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government system, legal system and emergency measur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a global decision-making system,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multi-level safeguard measures are proposed, providing a systematic policy reference for China's food security issues.

Keywords: food security; emergency period; supply risk; system improve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1018

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设计研究

——以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进行系统化设计整合为例

岳子辉¹ 吴楚君¹

(1.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00)

摘要: 传统村落是一种文化景观, 作为历史承载者、见证者。体现着经济、历史、文化等多重价值。大别山红色村落作为中国革命历史“活化石”, 生态农业景观的“桥头堡”, 承载着独特的红色基因与生态价值。生态农业景观是红色村落的表现部分, 革命文物保护依托着红色村落的呈现。对大别山红色村落进行景观设计对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生态博物馆理念下为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协同发展实现了一种四位一体的整合策略: “空间—功能—产业—治理”。使得古香村落、红色文化、绿意生态深度融合发展成为现实。

关键词: 生态博物馆; 红色村落; 景观设计; 革命文物保护

1. 生态博物馆理念

1.1 生态博物馆理念及特征

生态博物馆不是一个划定明确边界的空间保护范围, 而是一个“生长着的”村庄聚落, 具有生长的边^[1]。1981 年, 法国政府颁布了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 即“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 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 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 伴随着人们的参与, 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 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 以展现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2]。勒内·里瓦德提出的生态博物馆较于传统博物馆的特征“传统博物馆=建筑+收藏+专家+观众, 生态博物馆=地域+传统+记忆+居民传统博物馆”^[3]。此外, 生态博物馆强调横向的文化创新, 纵向的动态保护。文化遗产及大别山红色资源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进。因此, 本文以大别山为例, 引入“生态博物馆”理念为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优化提出设计建议, 使之在时代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2 生态博物馆理念与村落景观的关联性

生态博物馆的景观构成为三种因素: 变化得少而慢的固定特征景观因素、迅速且容易改变的半固定特征景观因素及场所的使用者或居民的行动动态的非固定特征因素。在空间维度上, 固定景观要素承载着红色文化记忆, 为此构建空间基底。在功能维度上, 半固定要素具有动态叙事功能, 为此激发空间活力。在产业维度上, 非固定要素具有活态传承价值, 为此延伸“生长”特质。在治理维度上, 采取跨要素协同。为此驱动自然共生。以此在保护传统村落自然生态环境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发展的现存问题, 探索一条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的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协同发展的新路径。现将大别山农村地区革命文物的分门别类。

按时间分布分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战争旧址、史迹及活动遗址为主, 文物数量最多且类型丰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以革命先驱故居与早期活动遗址为主, 虽文物数量较少但具有开创性意义。社会主义时期文物以纪念性设施为主, 承载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功能。三类文物共同构建了从革命萌芽到建设发展的完整历

作者简介: 岳子辉(2004—), 男, 学生, 环境艺术设计

吴楚君(1991—),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现代艺术创作, 文化遗产转化, 传统工艺美术保护。

通讯作者: 岳子辉

史链条。

按空间分布分类。大别山革命文物呈现“核心集聚、边缘分散”特征。核心区域集中了80%以上文物。边缘区域虽缺乏省级以上名录文物,但仍保留地方性革命遗迹,体现红色文化渗透的广泛性。这种分布格局既凸显核心区域的历史地位,也揭示红色基因在基层社会的深层延续。

按文物类型分类。不可移动文物包括纪念设施类及故居旧址类,其构成红色文化的物质空间载体;可移动文物包括实物类与档案类,保存革命活动的直接物证。二者共同强化历史真实性,且构建了“静态遗址+动态展陈”的立体叙事体系。

按保护级别与功能价值分类。从保护级别看,文物分为国家、省市级及地方性遗址,反映保护力度的梯次差异。按功能价值则分为军事活动类,则记录具体革命实践;教育宣传类,则传播红色文化知识;精神象征类。则凝聚集体记忆与信仰。构建三位一体的价值传承网络:从实践到教育再到传承。

2. 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困境

本文基于生态博物馆、红色村落生态景观设计等理论。进行查阅文献、实地走访、线上线下调研,分析得出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困境。

2.1 空间维度矛盾

一方面,红绿资源协调性欠缺。大别山红色遗产布局在鄂豫皖区域内各点较分散且区域间整体性不够紧密,与生态景观较为割裂。如驻马店市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等大的场馆,与周边的梯田、茶园等生态农业未能形成良性互动、融合构成配套景观。导致“红”肥“绿”瘦的困境。如遂平县嵯峨山风景区,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在早期开发过程中只重视自然景观的打造。却忽视了周边的红色元素。呈现“绿”肥“红”瘦的局面。

另一方面,文化风貌失序性显著。红色村落景观缺乏红色文化主题引导,从而出现新旧建筑、红绿标识、隐显场景三组矛盾。如在信阳市的郝堂村,在新旧改造中,该村落不仅注重老房子的肌理,也创造性地利用徽派建筑的韵律,但缺少自己的一些内涵与特色;在村落的宣传栏上红色标语墙与农药广告牌并存;革命旧址周边也存在缺乏较为完整的导视牌。

2.2 功能维度矛盾

红色展馆功能性单一,缺乏多种模态嵌入。如鄂豫皖苏区革命博物馆、金寨红军广场仅仅以图文展板、文物陈列柜等静态方式展示。缺少以互动装置、交互设置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示方式;红色村落复合性薄弱、景观周边缺乏连续性景观叙事、红色村落与生态农业景观尚未形成“红色教育+农事体验”的复合空间。如红安县七里坪长胜街革命遗址以水泥路将其与外围农田进行硬质隔离。从而导致垂直、边际空间的浪费;且红色景观空窗期较长。农作物景观会受四季更替的影响。当某个农作物过了最佳观赏期,季节流量将会受到一定的失衡。如云南罗平螺蛳田最著名油菜花拍摄点牛街。最佳花期在冬春季节,可过了最佳赏花期,游客人数将会大打折扣。

2.3 产业维度矛盾

红色产业连结性脱节,产业业态创新性滞后。大多红色村落中建筑采用围墙式保护,与周边生态农业区存在较大的缓冲隔离带,断裂了游客流动线,难以带动游客在周边农业区消费。其次,农产品附加值较低,未能形成红色品牌与“茶、菌、药、桑等作物的特色IP。另外,在红绿旅游路线上缺乏统一性和联动性。且“红绿”旅游资源创建品牌意识不足,包装传统,缺乏新意。此外,夜间经济载体缺失,夜游未能利用民俗、节庆等搭建沉浸式场景体验,游客难以身临其境。文化娱乐消费场景单一化,缺少“农业+”多元化的服务。

2.4 治理维度矛盾

在治理方面也存在空巢化的困境,形成老人守村,儿童留守、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村庄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乡土文化传承断层的局面。村民的文化素质和自我管理的水平较低,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还不够强。另外,村名在有些建设意见中未能与企业达成一致,导致多元的矛盾产生。此外,文化叙事体系碎片化。因各省保护等级的差异,红色村落景观标识会不一致。影响整体的营造效果。如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红军长征小道”遗址标识系统不连贯,弱化了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整体性表达。

3. 大别山红色村落建设生态博物馆的策略

3.1 整体性下空间维度融合策略

整体性在红色村落中的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相较于传统博物馆中,生态博物馆重视红色村落中与自然生态环境、革命文物文化等各个方面,将红色村落作为有机整体加以保护。

一是红绿资源空间协同发展。将各个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由点到体的进行连结,设置核心区、过渡区、拓展区。核心区利用场景复原设计以活化革命遗址集群。如以“急行军路线”为原型,利用虚拟投影技术为媒介,以设计曲折陡峭的石板路、重现历史场景。过渡区设置革命标语艺术装置以活化边界空间。拓展区将农业景观符号化进行生产性景观创新。如图一所示。如安徽金寨县红军广场形成“红绿交融”的线性空间。其以革命烈士纪念塔为

核心,整合周边红军纪念馆、洪学智将军纪念碑等红色遗址,结合梅山水库生态景观。且广场周边修复梯田茶园,设计“红军挑粮小道”体验步道,串联历史场景与茶园采摘体验。亦可将茶田修剪为五角星造型,或将废弃粮仓改造为“红色记忆瞭望塔”,顶部设置观景台兼做烽火台意象。



图一:红绿资源空间协同发展(作者自绘)

二是生态农业景观与红色文化标识建设。将红色文化资源景观建筑进行改造,外立面可植入红星镂空、革命标语浮雕等符号,如金寨县推广“红军被服厂”风格民宿,保留传统夯土工艺,室内展示纺车、木犁等非遗农具。除此,提炼革命文物语言标识结合数字技术打造全域标识系统。界点设置以“大别山红绿融合发展示范区”为主题雕塑,融入麦穗、红星元素。节点设置以“红军菜园”为内容的解说装置,并嵌入垦荒历史影像的二维码链接,实现“扫码溯源+革命故事”的沉浸式体验。

3.2 开放性下功能维度复合策略

红色村落生态农业景观空间的特征是开放性,生态博物馆是面向所有人并为其提供活态展示,利用多种功能对其进行动态的保护与更新。

一是对红色场馆多层次功能升级。打破单一化、碎片化的传统模式,提升游客多维度感官体验。深化静态展示功能,以文本+色彩+字刻+图形+符号等多种模态交融。引入动态展示功能,以元宇宙、VR、AR等技术改变单一展陈模式,依托互联网+新媒体信息平台,创设“云展厅”“红色剧场”等场景,着力提升红色旅游景观多样性水平^[4]。如鄂豫皖苏区革命博物馆复原“黄麻起义”战场,开发VR农具交互设施,游客可体验红军自制纺车、木犁等生产工具。



图二、三:“溪”“崖”的垂直空间与边缘空间(作者自绘)

二是将生态廊道进行串联,打造整体性兼具艺术性的景观廊道。构建“革命遗址-生态农田-传统村落”三位一体景观廊道。如在红安县七里坪革命遗址群与周边茶园间植入红旅绿道,采用本土韵味的石质铺装,两侧种植映山红、油茶等红色主题植物,形成生态景观与革命文化的纵向空间。亦可打造红星雨水花园。收集雨水的下沉式绿地,中心嵌入红色雕塑,生态与文化协调共生。另外,充分利用“溪”“崖”的垂直空间与边缘空间。形成本土植被矩阵。如划分“象征革命植物性的松柏记忆林”、“具有当地特色的功能性作物生产田”、“净化水系的芦苇溪边缓冲带”。在悬崖边设置红色观景台,既能保护地质结构,又提供红色历史眺望视角。如图二、三所示。

三是对景观功能方面的四季激活。打造四时景观。根据其气候条件、土壤结构,对其进行有观赏价值的轮种。打造以红军垦荒为主题的花田。以茶叶为例,“茶叶+茯苓+杜鹃花”、“茶叶+金银花”、“茶叶+油菜+向日葵”等多种模式。亦可在轮作中进行套作。如桂花、月季、荞麦、苕子、紫云英等绿肥作物。另外,依托

随季节更替种植的作物以及大地肌理,发掘不同季节独特的魅力,塑造其多维空间、多向功能。如开展二十四节气以及春夏秋冬不同主题活动^[5],突破空窗期瓶颈。如广西龙胜龙脊梯田随着季节更替,呈现出四时各异的景象^[6]。在冬季淡季,亦可利用梯田休耕期种植彩色麦冬构成红色图案,配套温室红色农耕体验馆开展“红米饭南瓜汤”等特色活动。

3.3 活态性下产业维度联动策略

活态性是指生态博物馆理念下将文化的保护场所由特定的空间环境延展到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当中,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自我生长,不断延续。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红色村落的保护与更新需要适度发展第三产业来带动村民的积极性^[7]。

一是从革命文物“事件性”属性出发,全面挖掘历史痕迹,明晰革命事件、革命人物、事件载体,探究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8]。构建红色村落地域性 IP 符号。以生态农业景观为媒介,以革命文物保护为基点。寻找红色特色旅游路线,带动生态农业景观的发展。打造“红军粮”区域品牌体系。开发红色资源,走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之路,以突出红色品牌的效应拓展绿色可再生资源产品的销路^[9]。如打造“红田米”“星火粟”“赤豆营”等子品牌,形成品牌矩阵,如图四所示。除此,对革命文物符号进行提炼与转化。如推出“将军果·初心礼盒”,外包装模仿军用挎包造型,内附银杏叶书签,刻录许世友将军故居实景浮雕等文创产品。



图四: 红军茶叶包装设计 (作者自绘)

二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其赋能。充分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相结合展示农作物的生长过程,让游客在生态农业景观与革命文物中穿梭。如利用AR在麻城杜鹃花海景区开展“红色垦荒”项目。游客通过APP扫描景区标识,触发虚拟红军战士形象指引,完成“开荒播种、保卫粮仓、丰收运输”任务链。此外,探索多种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农业+”的服务。如提供农业观光、农事体验、农产品加工体验、农业科普教育等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为农民增收创造更多的途径,形成以农业为基础,旅游业、服务业等协同发展的多元化产业格局^[10]。如“穿红军装,种革命田”农耕体验活动,或开展亲子游戏——重走长征路系列活动,实现景观的“记忆再生”。另外,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作用。如寻找红色村落的传承人在其农地上直播,讲授红色故事,售卖农产品,提升农作物产品的附加值。

三是充分激发夜间经济。打造沉浸式场景体验设计,利用梯田高差构建三层环形观演台,灯光投影至底层水面展现“血战柳林”战役,中层模拟战场硝烟,顶层激光呈现“薪火相传”主题光影秀。在观众席配备振动传感器等互动装置,当在炮火场景时座椅同步震动,增强战场代入感。另外,进行主题民宿集群IP化改造,如“红二十五军宿营地”主题民宿,客房以“军部指挥室”“战士营房”等历史场景命名,庭院种植象征胜利的八月桂与隐喻热血的红枫,或设置“星火灶台”体验区,提供柴火饭制作教学。

3.4 多元性下治理维度协同策略

多元性,主要指生态博物馆理念下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的保护理念,强调村民参与决定社区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专家对生态博物馆保护发展提供建议和技术支持、政府对相关工作的协调管理。苏东海先生认为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核心是在文化遗产的原生地保护文化遗产,并且是由文化的主人自觉主动地进行保护^[11]。

一是完善基础设施与产业造血机制,一方面构建“红绿融合”产业链,生态农业延伸链。百业兴盛,交通先行。推进交通路网的升级与通信网络的覆盖。统筹建设核心景观,完善其公共服务设施。在生态农业园、红色景区开发多样化,如VR导览员、农耕研学导师等岗位。另一方面,开展代际协作模式:组织“银发导师+青年创客”结对计划,老人传授革命故事与农耕经验,青年负责产品设计、市场推广,形成文化传承与商业转化的闭环。

二是鼓励村民积极参与革命文物的保护。在红色村落生态农业景观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引导村

民在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让村民担任某些具体的职务,在此过程中村民会有自我归属感。另一方面,建设教育中心,培育在地村民,开展乡土文化保护、旅游开发等培训,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参与能力,让村民在规划、设计、实施全过程的决策有一定的参与权。或邀请文化学者、社会组织或专业调解团队,平衡政府、企业与村民的利益诉求,推动共识形成。确保其原汁原味的表达。

三是跨区域进行统筹规划。建立省际协调机制,鄂豫皖三省联合制定其统一保护等级与标识标准。并整合文化资源,以“红军长征小道”为核心轴线,串联三省相关遗址,形成主题化、连贯的叙事网络。再设计统一视觉系统,采用标准化的标识牌、解说词和数字导览系统,强化文化整体性。并构建全域文化叙事体系,可分级保护与展示,根据遗址重要性划分核心区、延展区,明确各区域叙事重点,如军事路线、军民故事。数字化整合资源:开发线上平台(如“大别山红色文化云”),集成三省遗址数据、历史影像,提供虚拟漫游服务。最后,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鼓励企业通过“文化+旅游”模式投资,形成保护与开发的可持续循环。

4. 结语

随着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不断推进,以村落或者社区为博物馆的活态保护模式逐渐成为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大别山红色村落景观设计研究对其以革命文物保护与生态农业景观系统化设计整合至关重要。本文运用生态博物馆中的固定、半固定、非固定特征景观因素分析其大别山红色村落发展的困境,结合生态博物馆整体性、开放性、活化性、多元性的理念,探讨四个维度下“生态博物馆”理念在红色村落保护与更新设计中的可行性。以此促进乡村、文化双重振兴。担负起新时代新使命。

参考文献

- [1] 陈朔,王小如.基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村落景观规划——以泽雅传统造纸生态博物馆为例[J].规划师,2014,241-245.
- [2] 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J].中国博物馆,2011,(Z1):15-23.
- [3] 余压芳.生态博物馆理论在景观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D].东南大学,2006.
- [4] 黄细嘉,龚志强.红色旅游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的构想及其意义——以江西为例[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2007,(06):58-64.
- [5] 倪超琦,张怡倩,陈楚文.景观感知对游客重游乡村精品线意愿的影响[J].风景园林,2023,30(05):100-107.
- [6] 韦妮妮.景观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探究——以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为例[J].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2019,(03):73-78.
- [7] 刘婕.“生态博物馆”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设计[D].苏州大学,2023.DOI:10.27351/d.cnki.gszzhu.2023.
- [8] 张陆青,张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策略研究——以宁波市为例[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4,(04):48-54.
- [9] 方思迷.基于红绿资源视角的大别山乡村振兴规划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3.
- [10] 盛丽.基于农业景观的乡村旅游多元化发展模式与优化策略[J].农村科学实验,2024,(19):12-14.
- [11] 王璟.生态博物馆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镇的规划策略研究[D].重庆大学,2021.DOI:10.27670/d.cnki.gcqdu.2021.00296

Research on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red villages in Dabie Mountain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museumold)

Yue Zihui¹, Wu Chujun¹

¹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Hubei, 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 kind of cultural landscape, as historical bearers and witnesses. It embodies multiple values such as economy, history, and culture. As a "living fossil"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a "bridgehead"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he red village of Dabie Mountain carries unique red genes and ecological values.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manifestation part of the red village, and the prot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relies o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d village.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the red village in Dabie Mountain has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museum, a four-in-one integration strategy is realized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space-function-industry-governance". It makes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red culture and green ecology a reality.

Keywords: eco-museum; Red Village; landscape design; prot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1019

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的数字化视觉语言转化研究——以剪纸为例

何海海¹ 吴楚君¹

(1.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53)

摘要: 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剪纸承载深厚地域文化, 却面临传承困境。本研究聚焦其数字化转型, 综合多种研究方法剖析剪纸艺术特色, 以数字插画和动态图形设计作为技术路径, 实现从传统到现代审美视觉符号的转化, 并构建数字化传播体系。研究成果为鄂西北非遗传承发展助力, 也为传统美术类非遗数字化保护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剪纸; 数字化

引言

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像剪纸、黄杨木雕等, 凝聚着当地人民的智慧,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剪纸凭借精湛技艺和独特造型, 展现出鄂西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然而, 当下这些非遗项目传承困难, 受众减少, 传播渠道受限。现代快节奏生活和多元文化娱乐选择, 使年轻一代对传统非遗兴趣降低, 传承群体面临断层危机; 传统的线下展览和手工演示等传播方式, 其传播范围有限, 难以吸引广泛的公众关注。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媒体技术迅速发展, 非遗传播迎来新的机遇。利用数字媒介的交互性、便捷性、沉浸性等特点, 可以为非遗文化信息的表达提供更多的选择使得文化的展示方式更加多元化, 传播的内容更具吸引力。^[1] 数字化技术打破时空限制, 为非遗传播搭建广阔平台。例如, 将剪纸转化为数字插画, 重新搭配色彩、创新图形设计, 能赋予其时尚与现代感。

本文兼具了理论与实践价值。理论上, 深入探究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的数字化视觉语言转换, 有助于丰富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理论体系, 拓展视觉传达设计研究领域, 推动跨学科研究发展。实践中, 旨在为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保护传承提供可行策略。构建数字化传播体系, 有利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吸引更多人参与保护和传承工作; 同时,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符号, 有利于推动其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和可持续利用, 为地方文化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二、鄂西北剪纸的艺术特色

2.1 历史溯源

汉代造纸术发明后, 剪纸有了物质基础, 从简单装饰图案发展为独立艺术形式, 主要用于宗教祭祀和民间风俗活动, 如制作剪纸神像、门神。唐代, 剪纸在民间广泛传播, 技艺提升; 宋代, 剪纸民间特色鲜明, 内容丰富、形式优美、技艺进步; 元代, 剪纸文化持续发展, 作品图案简洁、线条流畅、色彩鲜艳, 题材广泛; 明清时期,

作者简介: 何海海(2003—), 男, 本课在读, 研究方向为非遗;

吴楚君(1991—),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现代艺术创作, 文化遗产转化, 传统工艺美术保护。

通讯作者: 何海海

剪纸艺术达到繁荣,地域特色突出,技艺精湛,《红楼梦》中的剪纸图案成为经典。鄂西北剪纸作品图案反映了人民信仰、愿望和审美趣味,具有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记录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福禄寿喜、龙凤呈祥等。

在鄂西北,谷城剪纸作为乡土风俗花样剪纸代表,群众基础深厚,历史传承悠久。从日常生活用品到装饰物品,都是乡村妇女手工技艺的表现。其图案丰富,构图新颖大气,手法多样,常用大红纸,结合折纸剪、阴刻、阳刻、彩纸剪等技艺。内容与生活习俗、民俗风情紧密相连,如《年年有鱼》《喜鹊登梅》《凤串牡丹》等吉祥喜庆图案深受喜爱,成为表达美好愿望的重要方式之一。谷城民间剪纸传播广泛,各乡镇都有知名民间剪纸艺术家,传承着这一古老艺术。

2.2 造型特点

剪纸艺术的造型技巧繁复多变,彰显了其独特的艺术韵味。其技巧的精粹之美感可用“粗犷中见细腻,朴拙中现灵动”来概括。^[2]例如,在描绘动物时,艺术家们会放大其头部和眼睛等标志性部位,以突出它们的独特特征;而在表现人物时,则通过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来强化情感的传达。这种手法不仅展现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为作品注入了浪漫主义的韵味。

对称是最常见构图手法。对称式构图使作品具有稳定庄重的美感,如描绘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等主题的作品,常将龙、凤等主要形象对称放置,配以祥云、花卉等装饰元素,营造庄重华丽氛围。均衡式构图通过巧妙安排元素的大小、位置和疏密变化,不仅保持了画面的整体平衡,而且在动态中赋予作品平衡感,展现出一种灵动而活泼的美感。以谷城剪纸《凤串牡丹》为例,凤凰造型夸张变形,身体拉长,尾巴羽毛放大卷曲,彰显灵动美丽;凤凰与牡丹布局采用对称均衡构图,凤凰居中,两侧牡丹花朵大小、形态对称,枝叶呼应,使画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稳定和谐,体现了鄂西北剪纸独特的造型美感。

三、转化的理论基础

非遗数字化采集与记录是指运用各种数字化技术与设备对非遗信息进行文字、数据、图片、音视频、动作捕捉、三维建模、虚拟重现等多种形式的收集、记录,是非遗数字化的基础性工作。^[3]对于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高清摄像、录音设备和三维扫描等技术,能精确捕捉剪纸艺人的剪刻动作、黄杨木雕艺人的雕刻手法,以及作品的细节和纹理。高清摄像可清晰记录剪纸过程,三维扫描能为木雕作品数字化建模,为研究保护提供直观生动的原始资料,弥补传统记录方式的不足。

数字化存储与管理为非遗长期保存提供了有力保障。构建专业数据库,对采集的数字化资源统一存储、分类、检索和管理,方便不同群体查阅使用。借助其云计算技术,实现远程访问和共享,提升数据安全性和访问的效率性。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相关资料存储在数据库中,人们可随时随地获取,有效的避免信息的流失。

数字化技术拓展了非遗传播渠道。借助互联网、虚拟现实(VR)等技术,非遗能以多样化方式呈现给公众,突破时空界限。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的新闻、作品展示和制作过程视频等,利用VR和AR技术让用户沉浸式体验剪纸和木雕艺术之美,参与虚拟制作过程。博物馆开发VR应用程序,让观众虚拟参观非遗展览,与虚拟艺人互动学习技艺,这无疑提升了非遗的影响力和公众认知度。

四、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的数字化视觉语言转化实践

4.1 数字插画在剪纸中的应用

数字插画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利用了计算机软件和数位绘图工具进行创作,让其拥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它表现形式多样,能模拟多种传统绘画工具笔触和质感,还能运用数字特效创造新艺术效果。简而言之,“无论是完全使用电脑制作,还是后期使用电脑进行加工处理,只要以电脑技术参与美术作品的创作都可以理解为数字插画。”^[4]在将鄂西北剪纸转化为数字插画时,既保留剪纸线条流畅性和造型夸张性,又通过色彩搭配和光影运用增强画面层次感和立体感。

以谷城剪纸为蓝本创作的数字插画作品《谷城风情》,充分体现了数字插画在鄂西北剪纸视觉语言转化中的创新应用。在元素提取上,深入挖掘谷城剪纸独特元素,融入龙凤、牡丹、莲花等图案。创作中,精心描绘龙凤图案,展现其灵动姿态和威严气势,同时创新处理牡丹和莲花图案,使其符合现代审美。

在转化与创新方面,该作品在继承传统风格的同时,也展现了大胆的创新精神。色彩运用上,突破传统剪纸以红色为主的局限,采用蓝色为主色调,搭配金色线条和图案,营造宁静祥和又华丽的氛围,既有时尚气息又保留文化底蕴。构图上,引入现代构成原理,打破对称式构图,将龙凤图案置于中心,周围环绕着牡丹和莲花的图案,通过大小和疏密的变化,形成了动态的平衡,从而增强了视觉的冲击力。表现手法上,运用数字特效和光影效果,使龙凤图案立体感更强,牡丹和莲花图案更生动美丽。《谷城风情》在网络发布后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吸引众多青年观众,推动了鄂西北剪纸艺术的传播和传承。

五、构建传播体系

5.1 数字化传播体系的构成要素

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实现“非遗”数字化传播推广目标,提升传播有效性。^[5]政府部门作为关键传播主体,制定政策、规划方向、提供资金支持。湖北省发布《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为数字化传播奠定政策基础,增加资金投入推动项目实施。

文化机构,如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等,利用丰富资源和专业团队,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制作宣传视频等方式传播非遗。博物馆数字化展览让观众跨越时空欣赏鄂西北剪纸和黄杨木雕作品。非遗传承人是传播核心力量,通过录制教学视频、网络直播演示等,将技艺和经验传授给更多对于剪纸感兴趣的人。如谷城剪纸传承人在抖音直播剪纸制作过程,吸引观众,激发人民对剪纸艺术的兴趣。

数字化非遗作品,包括剪纸的数字图像、三维模型、数字插画和动态图形等,是传播内容的关键部分,它们生动展示了非遗艺术魅力和文化深度。非遗知识,如历史根源、艺术特点、制作方法和文化价值等,通过这些媒介传递给观众,有助于观众深入理解剪纸非遗内涵。制作关于鄂西北剪纸历史和艺术特点的短视频,能让观众快速全面了解剪纸艺术。

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视频平台等,是主要传播剪纸的渠道。鄂西北各地非遗官方网站集中展示当地传统美术类非遗信息;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互动性强,在抖音发布鄂西北剪纸短视频,能吸引用户点赞、评论和分享,提升非遗知名度。数字展览利用 VR、AR 等技术,构建沉浸式展览环境,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欣赏非遗作品。

5.2 传播平台与策略

抖音、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众多,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为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传播提供广阔空间。通过短视频来传播剪纸非遗是关键途径,它的优点在于时长简短、内容凝练、形式多样,能迎合用户碎片化阅读习惯,生动展现鄂西北剪纸的制作流程、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在抖音上,众多创作者分享鄂西北剪纸短视频,展示剪纸技巧、图案设计和作品效果,部分还运用动画和特效技术增加趣味性。制作融合剪纸元素与动画的短视频,讲述故事,能吸引年轻观众。

数字博物馆借助 VR、AR、3D 建模等技术,将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作品数字化呈现,打破时空限制,让观众随时随地欣赏。观众在数字博物馆可通过手柄或手机操作,自由选择观看角度,获取作品详细介绍和文化历史背景信息。部分数字博物馆设有互动体验区,观众可参与剪纸创作过程,提升参与度和体验感。

专题网站致力于展示和传播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内容丰富,涵盖非遗项目介绍、作品展示、传承人的故事和学术研究等。通过图文结合、视频演示等形式,全面呈现非遗魅力。访问者可在网站观赏高清作品图片、观看制作过程视频,了解非遗历史背景、艺术特征和传承情况。

线下的剪纸展览和活动是展示和传播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的重要平台,能让观众直接体验非遗魅力。举办剪纸展览,安排现场制作演示环节,让观众近距离观察传承人技艺,与他们交流。组织非遗文化节和民俗活动,融入非遗项目,设置剪纸体验区等互动环节,让观众参与创作,加深对非遗的了解和兴趣。

线上传播可以为线下活动造势和推广,增强剪纸非遗活动影响力。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官方网站发布线下非遗活动信息,制作宣传视频和海报进行网络传播。活动进行中,利用直播、短视频展现现场盛况,让无法到场的观众也能体验。如鄂西北剪纸展览期间,通过抖音直播展示展览现场和艺人讲解,吸引大量网友观看互动。在展览现场布置二维码,观众扫描可获取展品更多信息;观众还可通过线上小程序、相关平台参与投票、评论等互动

环节。一些展览活动设计线上线下联动环节，如线上征集剪纸作品，在实体展览中展示评选，激发观众创作和参与热情。

六、结论

本研究在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遗数字化视觉语言转化及数字化传播体系构建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理论上，深入剖析了鄂西北剪纸的艺术特征，阐述了数字化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应用，丰富了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理论体系，提供新研究视角。实践中，成功将数字插画应用于剪纸视觉语言转化，以《谷城风情》为例展示了其优势和创新，为其传播传承开辟新途径；构建了数字化传播体系，明确关键要素，提出多种传播策略，为鄂西北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谈国新,何琪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研究现状、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J].理论刊,2021,(09):87-94.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9.010.
- [2] 张澳伟,刘潇逾.试论剪纸艺术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应用[J].造纸信息,2024,(10):56-60.
- [3] 马晓娜,图拉,徐迎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现状[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9,49(02):121-142.
- [4] 李敏,胡少杰,黄春蓉.编著.数字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M].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09.
- [5] 周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路径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8(28):179-183.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Visual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Traditional Art Category in Northwest Hubei Province —— Taking Paper-cutting as an Example

He Haihai¹, Wu Chujun¹

¹ School of Fine Arts,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City, Hube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ar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per-cutting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Hubei Province carries profound regional culture, but it is facing the dilemma of inheritan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mprehensively uses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aper-cutting art, takes digital illustration and dynamic graphic design as the technical approach,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aesthetic visual symbols, and construct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Hubei Province, and als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igital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ar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per-cutting; Digitaliz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1037

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困难的现状及其促进策略

孙思洁¹ 刘丽¹ 万洁²

(1.常州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32; 2.常州市河海幼儿园, 江苏 常州 213022)

摘 要: 就业一直是国家和个人关注的重点, 本研究从影响就业的个人因素出发, 调查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的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困难的现状, 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对 340 名师范生发放问卷, 结果显示: 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水平整体中等偏高, 职业决策困难水平处于中等偏低的状态; 专业认同在性别上存在差异, 但职业决策困难不存在男女差异; 专业认同在年级上存在差异, 其中大四的专业认同水平最高, 职业决策困难在年级上没有差异。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高校; 师范生; 专业认同; 职业决策困难

一、引言

就业一直是国家和个人的关注重点, 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 2025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为 1222 万人, 同比增加 43 万人, 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高校毕业生就业意义重大, 不仅关乎个人成长、家庭幸福, 更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应用型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 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 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应用型本科高校中, 师范专业的主要发展任务是为当地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等输送合格的教师, 对教师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教育。但从就业率来看, 本科层次毕业生中独立院校和民办高校的就业率仅有 44%, 应用型大学的就业率更是低于研究型大学。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师范专业毕业生有 40% 左右倾向于选择非教育部门就业, 跨系统就业趋势明显 (宁冬梅, 陈晗, 2020)。因此, 针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的就业显得尤为重要。

多项研究表明, 影响毕业生就业的因素除了外部环境之外, 也与学生自身的因素有关。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 专业认同、职业决策困难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素。罗之仁 (2004) 基于斯特莱克的认同理论研究大学生的社会定位时提出: 大学生的低就业率与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心理预期的落差有关。专业认同影响到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接受和认可, 是否能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去学习和研究等。除此之外, 毕业生在正式进入社会之前对于职业的决策也是影响其就业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处于职业探索期的大学生在职业选择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困难, 如准备不足、信息探索不完整、缺乏对职业生涯的规划、不合理的信念以及伴随其中的担忧、焦虑、懊悔、紧张等不适情绪也是影响其就业的因素。因此, 本研究从学生自身因素出发, 探讨本科生的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的现状, 并探讨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本科生的就业有重大意义。

回顾专业认同的相关研究, 西方多围绕 “Professional identity” 关键词展开, 其内涵与社会人士的职业认同基本无异。Henning (2001) 将专业认同定义为个体一种主观上的感受, 它是个体在现实中内心对于该专业所感受到的一致和平衡的程度。Welmond (2002) 将教师专业认同定义为教师有丰富的精力以及竞争的意识, 可以在教师这个岗位上有更好的发展, 并且能理智的调和现实与兴趣之间的冲突, 并能够承担追求学术真理所应尽的责任及义务, 对于成功和成就有不同的理解方式。纵观国内, 历经二十余载, 专业认同研究的本土化特点渐趋鲜明, 即专业认同内涵得到拓展: 除从业人员对社会实践中的专业的主观认识, 也包括学习者对所学专业的接受与认可, 并伴随积极态度与行为去探索。杨晶 (2007) 认为专业认同这一概念在对教师所从事的职业而言指的是: 高师的学生喜欢教师这一职业, 愿意将其当成终身的职业, 并对教师这一专业有着积极的情感和正面的评价。王顶明和刘永存 (2007) 认为专业认同是个体对其专业的认可, 愿意以积极、主动、正面的行为去探索学习, 表现为学生与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专长相结合, 并且将所学专业视为与自我同一的, 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与该领域的杰出人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社项目: 大学生职业决策与未来时间观的关系及对策研究(2023SJYB1297)

作者简介: 孙思洁(1993—),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儿童发展心理学、积极心理学;

刘 丽(1989—),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问题青少年教育与矫正;

万 洁(1985—), 女, 幼儿园高级教师,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教育管理。

通讯作者: 孙思洁

才以及能够在该专业领域有杰出的贡献。李媛媛针对师范生,将认同感定义为:师范生在参与一定时间的专业学习和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教师职业性质的认识、对教师职业的情感态度以及从事教师职业的意愿与价值追求,包括师范生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意志和专业行为倾向。

职业决策困难是国外职业心理学、职业辅导、职业指导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英国经济学家 Keynesian 在他的生涯理论中第一次提出生涯决策的概念,其后发展为职业决策。Gati (2001)认为,职业决策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经历的所有信息进行衡量、筛选之后,挑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并做出选择的过程。随后,Gati 等 (2001)对职业决策进行进一步细化研究,提出了职业决策困难,认为职业决策困难是个体由于技能的缺乏以及职业生涯中还不够成熟,所导致的决策出现困难,也或者是缺乏对自我、专业、职业和工作环境的信息的全面认识,因此不能够或不愿意做出职业生涯决策,或是对于职业决策时所需要的技能没有充分准备。国内学者李娜 (2009)认为职业决策困难是指处于职业探索期的大学生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主要表现为准备不足、信息探索不完整和多方面的冲突矛盾,具体体现为缺乏对职业生涯的规划、不合理的信念、犹豫不决、自我信息不足、职业信息不足、社会环境资料不足、信息获取渠道不足、内部冲突、外部冲突以及伴随其中的担忧、焦虑、懊悔、紧张等情绪不适。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江苏省常州市应用型高校师范生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使用电子问卷的形式进行,共收回电子问卷 340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290 份,回收率为 85.3%。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如下:男生 66 名,女生 224 名;大一年级 91 名、大二年级 89 名、大三年级 67 名、大四毕业生 43 名;其中学前教育专业 114 名、小学教育 112 名、音乐教育 64 名。

2. 测量工具

(1) 师范生专业认同问卷

本研究使用李媛媛 (2016) 编订的《师范生专业认同问卷》,该问卷由五个维度,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意志和专业行为倾向共计 44 个问项组成。测量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统计分数,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均在 0.8 以上,表明此问卷的内在信度较好。

(2) 职业决策困难问卷

职业决策困难主要使用的是李娜 (2009) 改编的职业决策困难量表。问卷包含三个维度,缺乏准备、冲突矛盾和信息不足,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均在 0.8 以上,表明此问卷的内在信度较好。

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21.0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分析、t 检验和 F 检验,得出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水平和职业决策的现状,分析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关系的特点。

三、研究结果

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专业认同及职业决策困难整体情况

(1)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专业认同及职业决策困难总体及各维度统计分析

为了解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困难的整体情况,通过收集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对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困难总体及各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了描述分析,结果如表 1。

表 1.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专业认同及职业决策困难总体及各维度统计分析

维度	M	SD	维度	M	SD
专业认知	4.47	.74	缺乏准备	3.34	1.35
专业情感	4.06	.94	信息不足	2.92	1.20
专业价值观	4.01	.96	矛盾冲突	2.81	1.24
专业意志	3.53	1.21	职业决策困难	3.23	1.20
专业行为倾向	3.66	1.04			
专业认同	4.05	.78			

通过表 1 可知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专业认同的总体得分为 4.05,五个维度的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专业认知 (4.47)、专业情感 (4.06)、专业价值观 (4.01)、专业行为倾向 (3.66) 与专业意志 (3.53)。由此可见,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整体中等偏高,专业认知与专业情感得分偏高,说明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对于教师的职业性质、教师角色、专业能力的认识与情感普遍是较为充分的。但是专业意志和专业行为倾向的得分相对较低,说明师范生对于从事教师职业的选择和专业学习的坚持以及将专业学习及训练中付出努力的意愿不是很强烈。

在职业决策困难方面,整体得分为 3.23,三个维度的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缺乏准备 (3.34)、信息不足 (2.92) 和矛盾冲突 (2.81)。可见,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处于中等偏低,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主要是对于就业的准备包括职业决策的动机不足、不合理信念的存在、对于职业方向的不确定等,其次就是在职业决策过程中对于求职信息把握的不充足,对于自身能力、职业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等信息获取渠道不足等。

(2)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专业认同及职业决策困难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解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困难在性别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t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在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困难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状况,结果如表2。

表2.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专业认同及职业决策困难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分析

维度	性别	M	SD	t	维度	M	SD	t
专业认知	男	3.11	1.01	2.28*	缺乏准备	3.04	1.20	-0.88
	女	3.62	1.14			3.28	1.19	
专业情感	男	3.86	1.00	2.61**	信息不足	3.11	1.21	-0.49
	女	4.48	1.09			3.24	1.19	
专业价值观	男	3.83	1.03	1.39	矛盾冲突	2.97	1.30	-1.02
	女	3.50	1.04			3.26	1.23	
专业意志	男	3.94	1.05	1.78	职业决策困难	3.05	1.22	-0.80
	女	3.50	1.08			3.26	1.19	
专业行为倾向	男	3.63	1.02	1.97				
	女	3.58	1.06					
专业认同	男	3.21	1.02	1.97*				
	女	3.58	1.06					

注: * $p<.05$, ** $p<.01$, *** $p<.001$

通过表2可知,专业认同在性别上是存在差异的($p<.05$),但职业决策困难在性别上并不存在差异性。其中,在专业认同中的专业认知和专业情感维度,男生和女生之间是存在差异性($p<.05$)的,其中女生的专业认知和专业情感要高于男生。

(3)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专业认同及职业决策困难在年级上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解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困难在年级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F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在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状况,结果如表3。

表3.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专业认同及职业决策困难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维度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F
专业认知	3.05	1.29	3.31	1.17	3.80	0.91	4.24	0.70	7.58**
专业情感	3.10	1.20	3.30	1.23	3.90	0.71	4.11	0.53	7.24**
专业价值观	3.12	1.18	3.26	1.09	3.94	0.75	4.17	0.48	9.13**
专业意志	3.12	1.21	3.29	1.14	3.94	0.78	4.23	0.57	8.92**
专业行为倾向	3.10	1.19	3.27	1.10	3.84	0.77	4.20	0.52	8.90**
专业认同	3.08	1.01	3.23	0.99	3.80	0.61	3.96	0.44	8.49**
缺乏准备	3.16	1.21	3.28	1.17	3.37	1.23	3.16	1.20	0.22
信息不足	3.14	1.22	3.17	1.24	3.39	1.19	3.22	1.14	0.28
矛盾冲突	3.08	1.25	3.16	1.28	3.46	1.19	3.17	1.24	0.56
职业决策困难	3.11	1.05	3.18	1.00	3.33	0.96	3.19	1.00	0.29

注: * $p<.05$, ** $p<.01$, *** $p<.001$

通过表3可知,专业认同在年级上是存在差异的($p<.01$),其中大四的专业认同度最高,其次是大三、大二和大一。其中,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意志和专业行为倾向五个维度在年级上都存在显著差异性,在五个维度中,大四和大三要高于大一和大二,说明高年级的师范生对于专业会更加了解,也更加愿意付出情感和努力。在职业决策困难方面,四个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性,但大三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高于其他三个年级。

四、结论与策略

1. 研究结论

第一,应用向本科高校本科毕业生的专业认同状态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这与李媛媛(2016)、韩玉亭等(2015)等人的结果一致,本研究针对的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范专业的学生,在专业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价值观三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4分,这可能与高校的定位有关。应用型本科高校不同于以科研为主的本科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更侧重于应用,并且在对象上不仅招收高中毕业生,也少量招收专科毕业生,本研究中所调查的对象就包含专升本毕业生,他们已经有了本专业的相关知识学习。并且依据学校的定位,在师范生的人才培养方案中也强调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每个学期都有2—4周的实践课程,因此在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和专业价值观方面学生的得分普遍偏高。

在性别和年级差异中,女生的专业认同程度高于男生,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现出更高的专业认同程度。女生的专业认同度高于男生,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主要调查对象是师范专业的学生,而选择本专业的女生要高于男生。在五个维度中,女生的专业认知和专业情感高于男生,女生对教师的职业的性质理解、教师专业能力的认识、对教师职业的情感等都高于男生,更愿意从事教育工作。专业认同在年级上是存在差异的,这与周春艳等(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中大四的专业认同度最高,其次是大三、大二和大一。这可能是随着学校课程的发展,师范生的专业知识不断积累,对于本专业的认知会逐步加深,并且伴随着每个学期的实践课程,会对自己未来从事的教育事业、对于自己所要面对的学生群体的感情不断加深。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自己将要从事职业的坚持会逐步坚定,并且愿意为了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不断充实自己的相关专业知识,在此过程中付出努力,坚持专业学习。

第二, 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这一结果与韩永楠 (2014) 的结果一致。同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一样, 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 在面对职业决策时存在的主要困难主要是缺乏准备包括动机不足、面对决策犹豫不决, 如一直未对自己的未来职业做规划; 担心自己掌握的信息不全面而不敢做决定; 在职业选择上偏向于走一步看一步等。其次是信息探索困难, 如不清楚哪些职业可以列入自己的职业选择范围; 不知道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获取相关的就业信息; 对自己所喜欢职业的发展空间不太了解等。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到,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范生即使每个学期都有实践课程, 但在进行未来的职业选择时, 他们也同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一样, 认为职业选择和决策是临近毕业才该考虑的问题, 这就导致他们在职业决策上过于被动, 对于就业信息也关注不够。

第三, 男生和女生并不存在决策困难差异性, 这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有关。本研究主要是针对师范生进行的调查, 样本中男生的数量远低于女生。在年级上, 大三学生的决策困难要高于其他年级, 主要是由于缺乏准备和信息不足造成其职业决策困难。可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对于职业选择与决策并不是非常关心, 对于师范生, 进入大三后出现了就业迷茫, 加上职业信息不足、缺乏准备的影响, 表现出更多的焦虑与冲突。进入大四之后, 随着专业实习时间的加长、对于就业信息的广泛接触、心态的调整等, 对于未来职业的选择与决策会变得更加明确。

2. 促进策略

第一, 虽然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但专业意志和专业行为倾向的得分相对来说较低, 即师范生自己将来所要从事的教师职业并不是特别坚持, 以及在提高专业技能的多种学习方式、方法以及途径上并不能做到积极主动。

针对此种情况, 加强职业指导教育和专业适应教育。在应用型本科高校中, 大学生所进行的专业学习很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所服务的, 而影响专业认同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本专业的就业前景。但对于刚进入大学校门的本科生来说, “就业”仍是一个非常遥远而陌生的词汇, 对于就业他们的认识是不够深刻的。针对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将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 还可以成立相关的学习兴趣小组、社团来帮助学生认识自己以及了解从事相关职业所需要的能力, 扩大专业就业面的认识以及提升专业的技能, 对自己的能力以及素质进行测评, 从而可以做到人岗的匹配度, 提升专业的认同程度。对于专业知识做到学好学精、不断提升专业能力, 挖掘自己的潜能, 提高社会实践能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提高职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 使学生合理地进行职业决策和职业生涯规划。

第二, 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师范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但大三学生的决策困难要高于其他年级, 主要是由于缺乏准备和信息不足造成其职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 学校可以针对就业信息、社会需求信息定期进行公示, 开展相关的就业信息交流大会, 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发展趋势, 了解与自己相关专业的职业信息等。

第三, 针对男女专业认同差异性, 男生的专业认同要低于女生。这可能与社会期待有关, 社会普遍认为教师这份职业虽然工资较低, 但相对来说更加稳定, 更加适合女生。而男生则背负着更大的社会压力, 男生要肩负起家庭的经济主要来源, 这就导致男生对于本专业的认同度低于女生。针对这种情况, 一方面是要减少这种刻板印象的发生。其次, 可以利用行业榜样进行示范引领。如邀请本专业优秀毕业生、行业内成功人士等榜样开展讲座、做经验分享。这些讲座、分享活动对于学生来说会更具有指引意义, 不但加强学生对本专业的职业性质、教师角色、职业情感等方面的认知, 也会降低学生对于性别的刻板认知。

第四, 除了上述策略之外, 还可以加强高中或专科学校与高校的沟通, 提前做好职业教育。通过调查发现, 许多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对于自身所报考的专业是什么, 主要的授课内容、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将来从事职业的性质等并不是非常了解, 在专业选择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随众”、“盲从”等心理, 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选择所谓的“稳定”、“低风险”的师范专业, 而不是根据自身的喜好、特点和专长进行专业选择, 从而导致对专业学习失去兴趣, 这是导致当代大学生专业认同存在问题的一大原因。

根据这种情况, 可以加强与高中的衔接教育, 在高中时期就进行相关的职业教育。目前很多高中学校在高考结束后, 就结束了高中教育的使命, 也没有太多关于填报志愿的指导或是关于未来职业的规划的教育。因此, 可以在高考后, 高中学校聘请相关的专家进行职业规划的指导, 或是与高校进行合作联系, 介绍高校的专业情况和就业趋势, 解决学生的困惑。

对于专科院校的学生, 他们在专科阶段已经进行了非常扎实的专业基本功练习, 相对于高中考生来说他们的优势是已经在专科学校进行了相关专业的实践课程。因此他们会更了解未来职业的相关信息、职业要求以及获取就业信息的相关渠道等。针对这些学生, 在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的同时, 也可以针对性地扩大他们的就业范围。如针对自己喜欢的职业去发展和提高相应的能力素养, 针对社会的发展趋势去准备相应的技能等。

第四, 改善高校专业培养机制。一些研究表明, 可以自主进行专业选择的学生对于自己专业的接受和认可程度更高。对于学生的专业选择,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专业培养制度的经验, 在招生时按照高校的学科门类进行招生, 但是不具体细分专业。可以经过一年级的适应, 对各个具体的专业进行深入了解, 再通过学生的综合成绩评定与兴趣爱好, 让学生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专业。

参考文献:

- [1]宁冬梅, 陈晗. (2020). 河北省地方本科院校师范生就业意向的调查与分析. 邢台学院学报, 35(01).
- [2]罗之仁. (2004). 从斯特莱克认同理论与特纳角色理论看大学生社会定位.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05.
- [3]Henning, Salling, Olesen. (2001). Professional identity as learning processes in life [J]. *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 13, 7-8.
- [4]Welmond. (2002). Globalization viewed from the periphery: The dynamics of teacher identity in the republic of Benin[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46(1), 37.
- [5]杨晶. 高师学生教师专业认同的内涵研究[J]. 科技信息(科学研究), 2007(34): 181.
- [6]王顶明, 刘永存.(2007).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调查.中国高教研究(08),18-22.
- [7]Gati, I, Saka, N. . & Krausz, M.(2001). "Should I use a computer-assisted career guidance system?" It depends on where your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li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29, 301-321.
- [8]Gati, I, & Saka, N. (2001). High school students' career-related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9(3), 331-340.
- [9]李娜. (2009).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问卷修编及其特点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0]李媛媛. (2016). Z 大学师范生专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1]韩玉亭, 王波, 王庭照. (2015). 特殊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研究. 现代特殊教育(高教), 5, 62-68.
- [12]周春艳, 郝梦婷, 靳少举. (2022). 西部高校特教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研究.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40), 95-102.
- [13]韩永楠. (2014). 大学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among applied undergraduate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Sijie Sun¹, Li Liu¹, Jie Wan²

¹ Normal College,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China

² Hehai Kindergarten, Changzhou, China

Abstract: Employment has always been a key focus for both the nation and individual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among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ment. Based on identified issu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he study employ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distributing questionnaires to 340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these students is moderately high, while their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level is moderately low. Gender differences exist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but no gender differences are observed in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Variation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re also found across different academic years, with fourth-year students exhibiting the highest leve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are observed across academic years.

Key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 professional identity;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1055

多元融合与创新驱动：新时代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路径研究

单海坤¹ 岳振宇² 逢浩³

(1.韩国西京大学 韩国首尔 02713, 2.烟台南山学院 烟台龙口 265700,

3.韩国汉城大学 韩国首尔 02876)

摘 要：民办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生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与实效性至关重要。本文聚焦新时代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分析其时代背景与现实使命，探讨当前存在的多维困境，解析问题根源，并提出创新发展路径。当前民办高校学生管理面临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如队伍“代际断层”、管理行为“简单化陷阱”；管理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半军事化管理效能悖论与“以罚代管”困境凸显；管理目标异化，制度设计工具理性泛滥、育人过程空心化。问题根源包括人力资源机制激励约束失灵、管理理念与技术落后、制度设计主体性缺位与价值失衡。为此，需重构管理范式：师资队伍建设构建“三阶递进”培养体系与立体化考核评价体系；管理模式创新实现科技赋能与个性化治理共振；制度体系重构建立“需求—设计—反馈”闭环机制与发展性评价体系，构建多元协同育人共同体。

关键词：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多元融合；创新驱动；教育数字化

一、引言：新时代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时代坐标与现实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部相关文件也要求高校要“将信息技术与教育管理深度融合，提升管理精准化和服务个性化水平”，在此背景下，为了全面实施“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工程，必须拆除管理育人和教育育人的“高墙”。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教育公平能否真正落实以及人才强国的方针是否得以实施。因此，民办高校如何做好学生的管理工作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对高校人才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3 年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超过 2000 万，占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近 30%；《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2023 年民办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占全国高校总学生人数的 26.34%。然而，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在师资储备、管理资源、制度积淀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1]。现如今，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标准化程度，是新时代思政育人改革要求民办高校强化学生管理的一项重点工作；学生事务管理水平关乎高校教风、管风和校风建设以及高校的社会效应；关乎高校的教育稳定与发展。希望借助于“问题诊断—成因解析—路径建构”这一理论视角架构，在结合教育管理学、组织行为学、教育技术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多学科视角投向于民办高校管理实践当中，以便发现民办高校的特色和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适合民办高校规律的学生管理的新模式展开思考，以期对同类院校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当前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多维困境

（一）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年轻化表象下的专业性危机

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相对于公立高校而言更加年轻化，这一群体虽具备较强的网络原住民属性与亲和力，但普遍存在“三重短板”：教育理论储备不足，大部分新任教师未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学、心理学培训，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团队中的大部分教师教育经历尚浅，事业刚起步，部分教师还要面对姻家庭压力，这可能导致民办高校学生

作者简介：单海坤（1996-）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文化管理。

岳振宇（1997-）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

逢浩（1997-）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容设计管理。

通讯作者：单海坤

管理团队在落实学生管理工作时流于表面,无暇顾及;管理经验积淀薄弱,某民办高校调研显示,83%的辅导员首次处理学生突发事件时感到“束手无策”,教师自身的学习能力、领悟能力、实践能力等综合素养左右了民办高校教师开展学生管理时的表现;职业认同感偏低,受薪资水平与发展瓶颈影响,民办高校辅导员离职率一直居高不下。部分学生管理教师因考事业编和进修深造等方式脱离了团队,这也将造成管理团队长期处于人员不足和经验不足的状态^[2]。

青年管理者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对学业困难学生采用刚性手段,忽视成因分析与个性化帮扶。民办高校辅导员与学生朝夕相处,但是每个辅导员要带200个学生,工作强度较大,管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这种方式难以深入学生内心,偏于形式化。辅导员指导学生学习为主,也承担了思政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等工作,但很少能放下身份走入到学生生活中,与学生有疏离感。如某学生因沉迷游戏多科挂科,辅导员直接给予警告处分,未介入家庭关系疏导与时间管理指导,最终该生退学;对所有学生实施统一管理制度,未考虑特殊需求。

(二) 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刚性约束与成长诉求的博弈

半军事化管理是非军事单位效仿军队的管理方式实行的内部管理,以促进学生养成良好习惯,提升职业素养,最终实现“校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过度标准化的管理正在产生“负外部性”:实施严格半军事化管理的院校,学生抑郁倾向检出率较非军事化管理院校高出很多;在“整齐划一”的要求下,学生自主组织活动的空间被压缩,学生个性化被抑制^[3]。

部分管理者落入“以罚代管”的坑洼,依靠一根“棍子”来维持秩序,这是科层制的一种单向度的延伸,它的规则是由单个主体的权力作出决定,并且极少有相应的意见发表来确认和修正这种规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或者至少也很难为它提供合理的解释。比如建立了一个总体上绝对化的生活管理规则,让生活管理凌驾于教学管理之上,即使是当天在正常上课,如果不满足生活管理要求,同样会遭到停止课堂,进行返寝整改。这就使得今天的教学、学识教育最终让位于生活管理要求。这对于任何一所高校都是违返根本原则的具体表现,更是因为忽视治理主体本身的程序正义以及实质正义所导致的一种“权力越位”与“治理失范”所带来的两方面矛盾结果,这对于规则本身所产生的公信力起到了弱化作用,同时也加剧了管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三) 管理目标的异化:形式主义对育人本质的遮蔽

在现代组织治理场域下,由于工具理性无限膨胀的结果,高校形成了“制度竞赛”的异化现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为完成外部评估指标或避免管理上的风险,一些高校将制度创设异化为一种“风险对冲”的工具,陷入一个不断制造增量制度的死循环当中。这些由工具理性和规范理性决定的制度设计导向也直接造成了高校制度供给与高校现实需求之间的断裂:由于制度制定者重视的是高校各项工作的标准化和可量化评价指标,因此并未顾及到该项工作是否适合具体的实际,忽略其与高校变革时代环境下的不匹配性。出于维持现有管理稳定性的需要,管理者很容易为了维持现状而对在程序上进行事后的交代以降低自身的风险承担,然而这些做法却忽视了实效的后果。制度迭代失效的本质其实是工具理性对于价值理性的消解。当制度本身成为外力作用下的符号化客体,用于消化化解外力时,则意味着该项制度已经失去了针对自身对象变化时作出相应调整和改进的可能性,也就造成制度的空转以及制度治理效能的衰减,进而陷入不断运转却又出力不多的工作浪费循环中。

民办高校在育人的过程中正遭受着深刻的空心化危机,教育教学规律被教条化地运用到学校教育教学的管理和运行之中;教育管理的行为取代了办学目的,“立德树人”的本质旨趣发生了异化。无论是学校制度层面的行为规范运行还是学生个体层面的行为秩序构筑都体现出极为严重的“技术化”特征,将行为规范化视为一切的内在要求,漠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无法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教育等思政元素的作用,致使管理场域与育人场域分离。同时,从高校育人工作层面看,仍不同程度存在着对学生深层次发展的忽视,既不符合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生涯发展理论的深层需求判断,也无法满足在学校育人实践情境中学生深层需求的解决途径探寻,一方面忽视对学生成长期学习的职业规划指导、心理的情绪调控和人际社会的情感支持等深层需求引领,另一方面仅把育人的重点定位为管理和考核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出勤纪律、宿舍内务等问题。管理导向上的失误归根结底是功利化思想对育人主体工作的蜕变,舍本逐末地把育人的过程当成了维持秩序、完成任务的过程,缺乏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情怀和关爱,也不利于学生的主体发展,产生“重管理轻育人”“重形式轻内涵”的管理育人局面,直接影响了高教人才的培养质量根基和价值导向^[4]。

三、问题根源：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困境的三维解析

（一）人力资源机制：激励约束的双重失灵

在高教资源配置场域中，民办高校的人才吸引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究其原因，是由于市场竞争机制和制度性制约共同作用而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结果。而根据教育经济学中的人才资源依赖理论可知，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能否获得相应的物质资源、发展空间和制度性保障。由于民办高校体制以及自身属性差异，使其在薪资待遇、职称评聘、科研支持等重要要素上存在整体性的欠缺，其中从专业技术人员待遇上看，因只能依靠学费等有限的收入来源而不能像公办院校那样通过多种方式拓宽进账渠道，因此难以拥有具备竞争性的薪酬待遇；其次，在职称评聘方面，没有科学完整的评审体系、缺少优秀的人才资源积累等原因造成其晋升通道极为狭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另外，从科研支持方面来看，民办高校由于缺乏实验室建设和科研项目经费投入，故而无法形成长期的学术研究氛围。上述种种原因都反映了民办高校当前在各方面的资源均处于短缺的状态，对于人员吸引来说是不够的。“马太效应”循环往复叠加的结果——学校少优质生源，招不到好老师，从而导致学校越办越差，学校越难招生；学校办学层次越低越难引才，学校越差资源越少。导致“人才流失—资源萎缩—吸引力下降”的恶性循环。同时也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内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

在组织发展与人力资本建设的理论框架下，民办高校培训体系正陷入显著的“碎片化困境”，这一现象本质上是培训目标异化、内容失序与制度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据成人学习理论中的经验学习模型，有效的培训需构建“理论输入—实践应用—反思迭代”的完整闭环，但当前民办高校的岗前培训多停留于单向度的“讲座式”知识灌输。这种培训模式过度依赖专家讲授的理论宣贯，既缺乏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系统化课程设计，又缺失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实操性训练环节，导致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场景脱节，难以实现知识向工作能力的有效转化。以新任辅导员培训为例，部分民办高校的培训体系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导向偏差与内容失衡。在“管理本位”思维主导下，培训内容侧重于强化管理权威的技巧传授，甚至将“如何让学生敬畏”作为核心教学模块，而对于辅导员核心职能所需的“学生心理辅导技巧”“生涯发展指导策略”等专业能力培养严重不足。这种内容设计不仅背离了辅导员“立德树人”的职业定位，更暴露出培训体系对教育本质认知的模糊与偏差。根据组织学习理论可知，只有实现持久地进行知识更新与能力迭代才能更好地保持组织的竞争力；目前大多数民办高校并未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者继续教育制度，其管理者很难得到符合自身发展的培训，这使他们无法承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需要的重任；不利于组织内员工知识的传授与更新，不利于激发组织成员学习的动力，无法发挥组织内部整体的优势，久而久之会形成培训内容不全面、培训主体单一、培训过程断层的情况^[5]。

在现代教育管理的绩效考核体系中，“短视化导向”已成为制约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瓶颈，科学的考核指标应兼顾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形成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指标体系。然而，当前部分高校在绩效考核实践中，过度追求指标的可量化性与即时可见性，将“学生违纪率”“学生内务情况”等易观测、易统计的短期指标作为辅导员考核的核心维度，导致考核评价体系严重偏离教育的本质目标，这种短视化导向的考核机制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其一，在指标选取上呈现“重秩序维护、轻能力培养”的倾向，过分强调对学生日常行为的规范与管控，忽视了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等面向未来发展的核心素养培育。辅导员作为学生成长的重要引路人，其工作重心被迫向维持校园秩序的事务性管理偏移，导致“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被边缘化。其二，考核指标的设计未能建立起对学生长期成长轨迹的追踪评估机制，无法有效衡量辅导员在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唯结果论”“唯数据论”的评价标准方式很难体现出辅导员的工作价值，同时会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急功近利的工作心理，把教育教学的工作变成了完成某项指标的工作，把育人工作做成了完成任务的游戏；另外，从眼前的短视的角度来看，学生创新力提高、长远发展等不能量化的因素没有被列入考核范围，导致教育者的价值创造的方向被扭曲了。

（二）管理理念与技术：传统思维与数字时代的碰撞

有些高校存在着治理逻辑的“前现代性”，这是由传统科层制的管理范式和现代治理的理念相抵触所产生的问题。按照新公共管理的观念，现代治理是追求多元共治、以服务为导向，重视公共服务；而科层制管理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强调层级控制、封闭性、权威性的单向度管理。现有的一些管理者将民办高校视为科层制下组织的垂直化管理，认为学校就是科层组织来进行管理，决策时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的方式，缺乏现实因素的判断，从而影响了高校实际的工作进展，同时降低了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公信力基础。从制度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治理逻辑上的“前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规则设计方面的“管制本位”。制度内容大多是诸如“学生不得……”“严禁……”等用严厉的条规来限制人的行为的内容，形成了严格的规则制约体系，并缺乏针对教育服务供给、学生权益保护

等服务条款的规定。这样,就容易使规则本身出现一种失衡:重规约、轻服务,即出于管理职能的需要,在规则上从科层制管理理念的“权力本位”出发,将管理者自己摆在秩序维持者的位置上,而将学生归为被动的被管理者位置,忽略了高校治理的“管理即服务”的本职要求,进一步扩大管理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治理逻辑“前现代性”,体现的是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问题。在长时期形成科层制管理思维方式之下,学校治理面临政府化风潮影响与科层制治理逻辑思维方式,难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多样化的时代需要,导致治理效能递减。

当下信息化建设中普遍存在“重软件轻硬件”的倾向。很多民办高校在信息化升级改造时都侧重于投入和更新“软件”,忽视了对于能够发挥物化物质设备作用和效能^[6],例如某民办高校推行使用“辅导猫”APP软件,软件本质上是为了减轻教职工的工作量以及提高工作效率,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掺杂了许多不必要的条件,比如包括教职工在内注册“辅导猫”APP需要办理指定营业厅的手机卡。以此造成了软件难以推行,领导层为了加快软件推行,从而向下施压,导致基层教职工夹在中间工作难以开展,学生抵触情绪日益高涨;同时数据孤岛问题也在信息化建设中出现得十分突出。缺少了数据一体化管理、以及大数据分析,导致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之间都出现了信息封锁等情况,这既造成了资源浪费的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决策正确性和工作效率^[7]。

(三) 制度设计: 主体性缺位与价值失衡

依据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模型理论,科学的制度设计需经历需求识别、数据收集、方案论证等系统化流程,通过多维度信息整合形成精准的需求画像。然而,从制度生成机制来看,民办高校制度制定多依赖“管理者会议”的单一决策模式,这种封闭性决策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其一,信息来源单一化,决策依据多源于管理者的主观经验与直觉判断,缺乏基于问卷调查、访谈、大数据分析等科学调研手段获取的实证数据支撑,导致制度与现实需求间存在认知偏差^[8];其二,参与主体同质化,决策过程多由管理层主导,缺乏教师、学生、校外专家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难以形成对需求的多维度认知,易陷入“局部认知代替整体判断”的决策误区。所谓的“盲人摸象”式的盲点洞察决定制度的片面性滞后性,比如对学生管理和教学改革等方面制度的建设无法真正洞悉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的发展诉求,所以所制定的制度都会成为仅为空洞的口号和形式,既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也会引起与管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阻挡着民办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其带来的结果便是一种“制度失效—决策失灵—治理失序”的恶性循环。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功能理论可知,合理的制度体系需同时具备约束性和引导性,运用刚性规则维持秩序,柔性激励促进发展,形成功能互补的“刚柔并济”的制度合力。但目前民办高校学生手册的制度设计却出现了功能异化现象,过于注重制度的规制惩罚功能,忽视了其价值引领、行为塑造功能。如从考勤纪律、行为规范、奖惩措施等方面搭建起健全的行为控制体系;与此相对的是,在学生的创新创业、品行塑造及心理健康等方面缺乏相关的柔性引导类条款。这些失衡的制度设计是从根源上延续了“管制型”治理逻辑,即一直把制度看作是保障学校秩序的工具,而不是一门释放学生主体性的管理和调控艺术^[9]。

四、创新发展路径: 多元融合视角下的管理范式重构

(一) 师资队伍建设: 从“单一管理”到“双师型育人”

采用“1+1+1”的培训模式,即理论集训、老带新实践,通过选取现场行为事件访谈法(BEI)编制贴近真实的管理案例,通过角色扮演、分组讨论等方式考查新任管理者问题分析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评价是否具有基本的岗位胜任力;依据社会学习理论,建立“管理导师制”双导师培养机制。为每位青年教师配备“1名校内管理专家+1名企业人力资源导师”,形成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立体化指导体系。通过定期开展案例复盘、项目合作等互动活动,构建知识共享与经验传承的平台,助力青年教师突破职业发展瓶颈,实现从执行者到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依照生涯发展理论,创建“学生管理专家”晋升通道,建立“学历提升+专业认证+实践赋能”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搭建“学生管理专家工作室”,由优秀管理者带头开展管理创新项目,开展教科研课题申报、撰写论文等,并形成“以研促管、以管带研”的良好工作局面。

根据教育评价理论的CIPP模式,构建从育人成效、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三个维度出发的三维评价指标体系:育人成效维度,突出“以生为本”,主要针对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情况,采用调研学生成长案例、收集学生满意度等方式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动态评价管理人员对学生思想引领、生涯指导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育人的实际效果;专业能力维度,重点考察管理者的专业发展水平,考查管理人员发表的专业管理论文数量及质量、信息化管理工具应用情况、管理创新项目的推进与实践,契合当前高等教育管理走向数字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职业素养维度以师德师风为主导指标,将职业道德、终身学习意识、团队合作精神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评价教育管理者的从业品质。根据组织行为学中全方位反馈理论,每学期末采取360°反馈的方式开展考评工作。通过建立多方面的评价主体组成网络,充分收集各方评价信息,最大限度地反映被考评对象的多面情况。运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将收

集到的反馈数据深入挖掘和量化分析,形成员工个人化绩效诊断报告;报告以主管在所有评价维度上的表现为主,同时利用 SWOT 分析法找到其优势及不足之处,并基于职业发展理论提出匹配的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为其职业发展提供可操作性的意见。

(二) 管理模式创新:科技赋能与个性化治理的共振

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治理现代化双轮驱动影响下的智慧学工平台“全场景渗透”,以数据为要素形成以学生的学习、生活、交往等全生命周期为对象的智能化管理服务。从数据治理的角度来说,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可以打破散布于教务管理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在线学习平台、社交互动平台等多场景数据孤岛,集中对分散在不同场景下的数据进行采集及聚合,其中学习数据主要包括课程成绩、课堂互动、作业完成等学业表现指标;生活数据主要包括消费记录、宿舍考勤、健康监测等生活行为信息;社交数据包括对学生在校园社交平台上的言论及话题、与人建立联系的社交图谱的抓取与利用。再者,利用 ETL 技术,对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全面的清洗、转换与标准化加工,最终整合成统一的数据仓库,作为后续分析的数据底座;在生成学生成长档案环节,使用学习分析技术和学生发展理论对融合后的数据,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和可视化手段,将其转译为教育资源。采用学生画像模型,在学业发展、行为习惯、心理健康、社交能力等方面呈现学生个体特征与成长轨迹,用可视化图表、知识图谱等展示方式体现学生;结合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算法对学生整体以及各维度的成长数据进行纵向上追、横向上溯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判定,随时把握学生当前情况并及时做出预防性反应,为对学生开展个性化的教育支持和实施精准化的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打破传统的静态评价模式,对学生发展过程进行长效跟踪,进而予以正确的评价,契合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对于“过程性评价”和“增值评价”的要求。

(三) 制度体系重构:从“管理本位”到“发展本位”

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线上+线下”双线并轨的常态化、立体化的需求调研机制。线上通过采用自然语言处理(NLP)、网络爬虫等手段收集并监测校内外论坛、校园网站等平台信息数据,进而借助情感分析算法动态掌握师生群体针对教学管理、校园服务等方面诉求及建议;同时从学习管理系统(LMS)和智慧校园 APP 等平台行为数据中分析和寻找用户在功能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改进建议。线下以开展定期座谈访谈、问卷调研等方式对师生群体进行面对面采集质性数据;使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并按重要程度排序,供后期制度设计作为选择性指引。通过跨学科协同创新理论,组建由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各领域专家构成的制度设计小组,构建“问题诊断—方案论证—试点优化”的科学化设计流程。通过对原型测试和用户参与设计(UCD)法的引入,针对制度的设计方案展开研讨并进行模拟操作,保证制度的设计符合管理逻辑同时也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运用制度生命周期管理理论的思想将制度从制订到废止整个过程纳入到动态的闭环管理系统中。搭建效果评估、问题反馈、迭代优化 3 个环节反馈通道,针对其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形成针对性较强的制度修订预案,对于成熟度较高的制度不断完善运行流程,对于失效的制度及时启动废除程序,使制度体系能够长期保持有效性、适应性。

通过利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将认知发展维度上原来的“知识记忆”单一方向上的评价,拓展为包括“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五个方面;以项目式学习成果评估、表现性评价等方式作为主要的评价形式,采用问题、情境等方式,考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思维水平。通过让学生用知识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并以作品展示或答辩汇报的形式对其知识的认知发展水平、阶段特点、成长轨迹的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评价,从而达到从“结果评价”到“过程性增值评价”的转变。打破校园界限,在场域内嵌入社会情境,有助于学生成为“校园人”向“社会人”转变。

五、结论

新时代民办高校学生管理需以多元融合与创新驱动为核心,突破传统管理范式,构建适应教育数字化与“三全育人”要求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当前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困境本质上是传统科层制管理逻辑与新时代教育治理需求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管理模式路径依赖与育人目标异化。其根源在于资源配置失衡、技术应用表层化与制度设计价值偏离。创新路径需从四方面展开:一是师资队伍“双师型转型”,通过“三阶递进”培养体系与 360 度考核评价,提升管理者专业化水平与育人能力;二是科技赋能管理模式,利用智慧学工平台实现全场景数据驱动,破解“数据孤岛”与管理粗放问题;三是制度体系从“管理本位”转向“发展本位”,建立需求导向的闭环机制与三维发展性评价,强化学生主体地位。未来,民办高校需持续推动治理理念革新,将教育数字化与治理现代化深度融合,在制度设计中平衡刚性约束与柔性激励,在管理实践中实现服务育人与学生全面发展的统一,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坚实保障,助力教育公平与人才强国战略落地。

参考文献:

- [1] 李嘉.民办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探究[J].就业与保障,2021,(07):165-166.
- [2] 纪怀晨.现代化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创新型机制研究[J].科技风,2022,(10):16-18.
- [3] 刘琛.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J].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2022,(10):140-142.
- [4] 岳帅廷.新时代思政教育视域下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研究[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3(01):110-112.
- [5] 仝静,李宪国,赵雅.“三全育人”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模式的创新对策[J].社会与公益,2025,(06):293-295.
- [6] 原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的问题及策略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5,28(04):206-208.
- [7] 张凯丽.信息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模式创新性研究[J].科学咨询,2025,(06):227-230.
- [8] 张昕.新媒体融合视域下的高校学生管理策略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5,24(02):227-230.
- [9] 王怡雯,江文伟.协同治理视域下高校学生管理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25,34(01):70-73+93.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tudent Management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SHAN HAIKUN¹ YUE ZHENYU² PANG HAO³

¹Seokyeong University Korea seoul 02713; ²yantai nanshan university Yantai Longkou 265700; ³HanSung University Korea seoul 02876

Abstract: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scientifi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 management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of utmost importa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student management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nalyzing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ractical mission, discuss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dilemmas it currently faces, examining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issues, and propos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s. At present, student management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front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human resources, such as the "generational gap" in the workforce and the "simplification trap" in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re is also a path dependence in management models, with prominent issues including the efficiency paradox of semi-militarized management and the dilemma of "management through punishment." Additionally, management objectives have been alienated, manifested in the excessiv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hollowing-out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include the failure of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s in human resource systems, backward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the absence of subjectivity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value imbalanc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management paradigm: building a "three-stage progressive" cultivation system and a three-dimensional assessment system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innovating management models to achieve the reson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personalized governance; and reconstruct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by establishing a "needs-design-feedback" closed-loop mechanism and a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system, while fostering a diversified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mmunity.

Keywords: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 management;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nnovation-driven; education digitiz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1067

浅析大学辅导员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岳振宇¹ 杨馨宇¹ 单海坤²

(1.烟台南山学院, 山东 龙口 265700, 2.韩国西京大学, 韩国 首尔 02713)

摘要: 随着社会环境的快速演变和教育体系的持续深化, 大学生心理健康已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 大学辅导员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关键角色, 对于理解和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独特的视角和责任。本文从辅导员的视角出发,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 明确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与创新性改进策略, 旨在为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提供科学的参考框架。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 在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 大学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和挑战。大学辅导员作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引导者, 其角色和影响力不容忽视, 通过辅导员的视角来深入研究和探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能帮辅导员准确把握学生的心理动态, 还能够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本文致力于通过系统的分析和探讨, 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域注入新的思考活力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 大学辅导员; 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1.1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得到认可

当下社会,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使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高校和社会各界对此的认识不断深化, 从教育政策的制定到具体实践的实施, 都体现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高度重视。众多高校已经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核心课程体系, 并将其视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健全人格的关键环节。专业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纷纷设立, 以及师资力量逐步加强, 进一步彰显心理健康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种重要性的凸显, 实际上是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深刻反思的必然结果, 反映社会对大学生全面发展需求的深刻理解, 以及对心理健康教育在塑造积极心态、预防心理困扰方面独特价值的深刻洞察。

1.2 心理健康教育存在不足

尽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但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课程设置的合理性问题亟待解决。目前, 部分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计方面仍显得不够科学和系统, 导致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 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制约心理健康教育实际效果。

师资力量的不足也是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尽管高校已经在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的培养和引进方面做出了努力, 但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仍然显得捉襟见肘。许多辅导员和其他非专业教师不得不兼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业性和深度造成一定影响。

长效机制与评估体系的缺乏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部分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仍缺乏长远规划和持续投入, 导致教育效果难以得到长期保障。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 无法准确衡量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成效, 也无法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针对性的改进, 给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持续发展与质量提升带来不小的困难。

作者简介: 岳振宇(1997—),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民办高校教育管理研究;

杨馨宇(1996—),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民办高校思政课堂理论研究;

单海坤(1996—),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企业文化管理。

通讯作者: 岳振宇

2 大学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2.1 辅导员在日常心理辅导中的关键作用

作为大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大学辅导员长期扎根于学生工作第一线,通过课堂考勤、宿舍走访、主题班会等多元化接触场景,构建起全天候、立体化的师生互动网络。这种浸润式的陪伴模式使辅导员能够突破传统师生关系的界限,逐步建立起以信任为基石的深度情感联结。在日常工作中,辅导员不仅通过学业预警系统跟踪学习进度,更善于从学生上课状态、社交动态、消费习惯等细微处捕捉心理变化的蛛丝马迹。例如在新生适应期,辅导员会系统观察学生作息规律、饮食状况和群体融入表现,及时识别出潜在的心理适应问题;在考试周等高压时段,则通过设置“心灵树洞”信箱、开展减压团辅活动等方式搭建情绪疏导通道。

相较于专业心理咨询的正式设置,辅导员的心理支持更具渗透性和及时性。他们能够将心理辅导融入生活化场景,运用叙事疗法中的外化技术帮助学生解构压力源,通过焦点解决短期治疗(SFBT)的“奇迹提问”引导学生发现自身资源。特别是在处理宿舍矛盾、恋爱困扰等发展性心理问题时,辅导员常采用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体验式方法,帮助学生在安全环境中演练应对策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辅导模式既维护了学生的自尊需求,又实现了心理干预的即时性。

2.2 辅导员在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中的引领作用

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辅导员在知识传播、文化营造和课程建设三维度发挥着枢纽作用。在知识传播层面,创新打造“心理+”教育矩阵,将心理健康知识与专业特色相结合;在校园文化营造方面,辅导员可以主导构建了“四季节庆式”心理育人体系:春季举办“心灵园艺”种植疗愈活动,夏季开展“情绪漂流瓶”沙滩互动,秋季组织“压力粉碎机”趣味运动会,冬季推行“温暖抱抱团”人际支持计划等有针对性的活动。

在课程建设维度,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的核心教学力量,创新开发出“三维联动”教学模式:理论模块引入积极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实践模块嵌入正念冥想、绘画分析等体验环节,拓展模块联通校企资源开设“职场心理实训”课程。某重点高校的跟踪研究表明,系统接受该课程训练的学生,其心理弹性指数较入学时提升27%,危机应对能力提升34%,充分印证了课程体系的有效性。这种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做法,不仅夯实了学生心理素质基础,更培育出具有时代特质的积极心理品质。

3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和建议

3.1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

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不可或缺,高校必须深入理解大学生的心理发展阶段与特点,同时紧密结合他们的实际需求,对现有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与提升。课程的设计应当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单纯的理论传授往往显得枯燥且难以应用,通过将理论与生动的案例分析、实用的技能训练相结合,可帮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心理学知识,利用角色扮演法让学生模拟真实生活中的情境,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探讨心理健康相关议题,都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与学习效果。课程体系的设置需要具有层次性和连贯性,从基础心理学知识入门,逐步深入到专业技能的培养,每一阶段都应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成果要求。课程内容应随社会环境与学生心理状况的变化及时更新,确保其始终具有前瞻性与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不应孤立存在,而应与其他专业课程形成有机联动,通过跨学科的教学合作,可共同促进学生的心理素质与专业能力全面发展^[1]。

3.2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高校应充分认识到辅导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角色,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辅导能力。

一方面,高校应定期组织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活动。通过邀请心理学领域的专家进行授课、组织实践操作的技能训练等方式,帮助辅导员全面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鼓励辅导员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项目,通过实践来不断磨练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也至关重要。高校可以通过设立心理健康教育成果奖项、开展优秀辅导员评选活动等方式,对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辅导员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奖励,不仅能激发辅导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还能在整个教育团队中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高校在招聘新辅导员时,应优先考虑具有心理学背景或相关专业知识的 talent,不断引入新鲜血液和优化队伍结构,进一步提升整个心理健康教育团队的专业水平与综合实力^[2]。

3.3 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机制

高校应将心理健康教育视为整体教育战略的一部分,确立其在学校教育框架中的核心地位,要求高校不仅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还要明确各教育阶段的具体目标和实施路径。通过这一规划,高校能系统推进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 确保其与学校整体教育目标的协调与统一^[3]。

构建集心理咨询、辅导和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 是确保长效机制有效运转的关键, 需要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心理需求, 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活动, 以及必要的心理治疗支持。高校应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中心, 配备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 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形式,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心理援助, 助力学生应对成长中的挑战。高校应加强与家庭、社会的沟通与协作, 共同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的多维网络, 家庭是学生心理成长的摇篮, 高校应通过家长学校、家校互动平台等方式, 引导家长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共同营造积极的成长环境。高校还需与社区、企业等外部力量合作, 共同推动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提升整个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3.4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评估与反馈

为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高校需建立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 应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教育的实际效果, 为教育策略的调整优化提供有力支撑^[4]。

评估环节, 高校应通过多种方式, 如问卷调查、心理测验和深度访谈, 深入收集并分析学生的心理健康数据, 准确把握他们的心理动态和教育成效,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评估过程, 提升评估准确性, 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与参与度^[5]。高校还应搭建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与其他教育机构和研究部门的数据互通与资源共享。通过横向对比和纵向分析, 高校能更清晰地识别自身的优势和短板, 精准发力, 持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这一平台还能高校量身定制更具针对性的教育方案提供数据支持, 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要求高校与社会各界紧密合作, 作为这一教育领域的核心力量, 大学辅导员应充分展现其专业优势, 全心投入心理健康教育事业。为深化教育工作, 辅导员需持续优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 加强师资培养, 建立稳定有效的教育机制, 做好全面评估与反馈。

参考文献:

- [1] 王俊华, 关旋. 大学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向度与实现路径研究[J]. 公关世界, 2021, No.502(11):106-107.
- [2] 周嵘, 程明霞, 马薇娜. 基于大学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研究[J]. 山西青年, 2022, No.624(11):196-198.
- [3] 赵桂英. 新时代大学辅导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探究[J].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 2022, No.211(02):38-40.
- [4] 刘文静. 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及提升对策[J]. 普洱学院学报, 2023, 39(06):125-127.
- [5] 于洪亮, 于慧丽. 辅导员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探析[J]. 山西青年, 2021, (13):173-174.

A Brief Analysis of Countermeasures for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Yue Zhenyu¹, Yang Xinyu¹, Shan Haikun²

¹ Yantai Nanshan University, Longkou, China ² Sokyung University, South Korea, Seoul, South Kore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s a key role in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counselors have unique perspectiv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selor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clearly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targeted and innovativ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iming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pilla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college student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As important guides on students' growth path,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cannot be ignored.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selors can help them accurately grasp the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students and als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injecting new thinking vitality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into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Keywords: University counselor;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540

马克思早期幸福观初探

刘阳¹

(¹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90)

摘要: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 人们对幸福本质及其实现方式的思考从未停歇。作为一生致力于人类解放的伟大思想家, 马克思在其撰写的早期文本中频繁地提及对幸福的观点和看法, 并将之潜移默化地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之中。立足思想史的角度, 对马克思早期文本中零散的幸福观进行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一生既是不断思考幸福的一生, 也是为人类幸福而不断奋斗的一生。马克思幸福观的建立有一个萌芽、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 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 也是马克思幸福观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作为致力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先驱, 马克思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于幸福研究, 为人类实现自由与幸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关键词: 马克思; 早期文本; 幸福观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 人们对幸福本质及其实现方式的思考从未停歇。对于幸福本质及其实现方式也是马克思所思考的问题。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幸福生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幸福观是一个历时性概念, 既有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历史特征, 也兼备马克思对于幸福研究的独特思索。因此, 对马克思幸福观内涵和特征的澄清不能以现代人的视角对马克思幸福观阐释, 而应回到马克思幸福观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具体分析, 看到马克思幸福观所回应的对现实的人的本质性思考。幸福观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马克思幸福观的过程中, 不仅要梳理分析马克思庞杂的论文文本, 还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其早期文本中的诗集、通信、笔记及其他文章和研究成果等, 如: 马克思写给燕妮的诗歌三部曲《爱之书(一)》、《爱之书(二)》、《歌之书》以及不同时期马克思与其父亲的通信《亨利希马克思致信卡尔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等, 通过将断裂的、零散的马克思关于幸福的观点、看法串联为相对连续、系统的整体。同时, 对于马克思早期幸福观的研究还要注重“幸福”一词在不同文献中的内涵及外延, 还要立足马克思文本中对“幸福”的相似性表述与理解。

一、神学色彩、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幸福观

社会氛围和家庭环境是影响中学时期马克思幸福观的重要因素。特利尔城的文化环境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浪漫主义情怀与自由主义倾向可溯源至该城的法国文化氛围, 而家庭教育的双重作用——既有父亲的理性引导, 又包含家庭的情感支持——则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特征与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现有可考证文本能体现马克思青年时期“幸福”观思考, 主要集中于中学时期的三篇作文。在三篇作文中, 马克思分别立足宗教、职业、历史方面阐述了其关于幸福的朴素看法。

马克思家庭对于宗教的观点和看法成为影响幸福观萌芽期的重要因素。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受到社会解放思想尤其是宗教解放思想的影响, 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成为犹太人中自由思想者的一种进步的体现, 马克思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在中学宗教主题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 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 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中, 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宗教信仰式的幸福。他认为“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 才能体会得到, 这种快乐会使生活变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 北疆文化的创生机制与传播策略研究(2023NDB163)

作者简介: 刘阳(1990—), 男,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政治教师。

得更加美好和崇高。”²马克思虽未直接阐述关于“幸福”的理解,但通过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了一种可以通过基督教信仰获得美好生活的的生活方式。可见,马克思认为幸福并非单纯的物质满足,而是与道德和精神追求密切相关。个人的幸福应建立在对真理、正义和道德的追求之上,只有通过高尚的行为和思想,才能获得持久的幸福。

在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对于“国家人民幸福”的理解。在评价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时,马克思认为“由于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的。”³马克思将民风淳朴和人民生活积极进取作为国家和人民生活幸福的一种典型。同时,他提出在建设“幸福时代”的过程中,一心投身于国家建设中的人应当受到尊敬,倡导人们应当在获得权力后积极主动投身国家建设。由此可见,将幸福归结于“风尚自由和品质”这样的感性层面既体现出少年马克思对于国家和个人发展相对感性化理想化的幸福观。

在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国家整体的发展和人类的幸福是个人职业道路选择的重要标准。“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⁴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幸福源于个人选择与人类整体福祉的结合。职业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利益,更应服务于人类的共同幸福。只有将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相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同时,马克思进一步表达了,幸福是个体自我实现的结果。人应当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追求知识和真理,从而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自我实现不仅为个人带来幸福,也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对于马克思青少年时期幸福观的梳理,离不开探究深刻思想的源头。马克思的三篇作文,阐述了对美好生活、国家幸福、职业选择中对于“幸福”的理解。总的来说,马克思中学时期的幸福观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个人幸福与人类整体福祉的统一,注重道德和精神追求,并将幸福视为自我实现与社会责任共同的结果。这些幸福观的萌芽为他后来关于人类解放和幸福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进入波恩大学后,一方面因为马克思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因为与燕妮曲折爱情的苦恼,马克思逐渐将对法律学习的热情转向诗歌写作。1836年,从波恩大学转学至柏林大学后,马克思给恋人燕妮写了三部诗歌即《爱之书(第一步)》、《爱之书(第二部)》、《歌之书》,给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写了《献给亲爱父亲的诗作》。马克思频繁地以诗歌的方式勾勒出他对幸福的看法。“对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不过或许也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追求。”⁵对社会发展的迷惘和人生琐事的纷扰让马克思更多地思索如何回归本真的生活和学术研究。“我研究了法学,但我感到我真正的兴趣在于哲学和历史,因为在这里我可以为人类做些事情。”在就读于柏林大学期间,马克思与父亲多次通信,这些书信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对个人幸福的理解,表达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哲学研究的热情,强调通过学术探索 and 思想创造来实现自我价值。可见,马克思将幸福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状态,其核心在于通过不断追求真理和实现潜能来获得满足感。他在信中也提到捉襟见肘的经济对学术研究的干扰,但马克思并未因此放弃对哲学和真理的追求。对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之间矛盾的深刻思考,这种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辩证思考加深了马克思对幸福的复杂理解。虚幻的理想主义哲学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无力使马克思转向了黑格尔哲学。受青年黑格尔派诸多学者的影响,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过程中更深刻的思索如何解决关于理想与现实的问题。“我彻底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但我并不满足,因为我看到现实与理论是如此不同。”他在信中批评当时社会的弊端,并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这种将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思想,体现了他早期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

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通过对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比较,间接表达了他对幸福问题的深刻思考。通过对德谟克利特机械决定论体系的批判性解构,马克思揭示出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蕴含的偶然性维度,实质上构成了对传统宿命论范式的哲学解构。这种理论阐释具有范式突破意义,将物理层面的运动形式上升至存在论层面,论证了自由意志的哲学合法性。在此逻辑框架下,马克思进一步将自由界定为人类实现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条件,强调唯有在主体选择可能性得到制

²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53-454.

³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61.

⁴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59.

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6-7.

度性保障的实践场域中,个体方能通过对象化活动达成自我确证,进而实现亚里士多德传统中“eudaimonia”(幸福)所指向的整全性生存状态。这种理论推演使幸福概念超越了经验主义的感官愉悦层面,升华为自由主体在历史实践中建构的辩证性存在方式。这种突破在认识论层面表现为对客观规律的辩证把握,在本体论层面则体现为主体通过对象化活动实现自我本质的创造性发展。由此,马克思将幸福问题从形而上学领域移植到历史实践的土壤中,使其成为衡量人类解放程度的辩证性尺度。

二、唯物主义幸福观的发展与成熟

物质生活是幸福的来源和根基。马克思认为,幸福并非仅仅依赖于理性或精神层面的实现,而是与物质生活条件密切相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将对社会发展及人民幸福的关注聚焦于人民的实际物质生活条件,而非仅仅停留于抽象的理性或精神层面。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不平等是阻碍人民幸福的核心因素,只有通过改变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幸福与解放。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将国家与法视为理性精神的体现,而忽视了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而个体的幸福只有在国家这一理性实体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将幸福抽象化,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虽然能够暂时缓解人民的痛苦,但却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中的不公与压迫。他倡导“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圈——的批判的胚芽”⁶。幸福并非通过思想批判或精神改造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现实的社会变革来创造,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也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⁷。这样的观点同样出现《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文中指出一些向群众的、物质的犹太人宣扬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论自由的现象,这种自由觉得自己很幸福,即使这种幸福仅仅存在于观念中。马克思指出无论是理性层面的或是宗教层面的幸福都不能带给人们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必须在物质层面实现。“重要的不是一般性的反对思想,改变思想,而是要改变产生这种思想的现实社会条件。”⁸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幸福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劳动剥夺了工人的幸福,使其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发展。要实现幸福,必须首先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现实的物质生活的矛盾给马克思带来了新的思考,在他看来人民生活的幸福必须在物质生活层面来实现,仅仅停留在理念、意志层面的批判是不能最终实现人民现实“幸福”。

幸福的现实性与主体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论述了关于“幸福”主体的观点。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⁹从这一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幸福”的主体应该是实际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把人视为感性的对象,以人本主义的观点解释人和社会历史现象,在其看来人“同其他一切有感觉的生物一样,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是对于幸福的追求。”¹⁰在这里,费尔巴哈所谓的“人”不是指处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人,而仅仅是指个人之见的交往和相互需要,这显然不能实现社会实践活动中人的真正“幸福”。在1845年至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则更详细的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具体内涵,并更进一步强调通过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文中指出,要实现的“幸福”不是抽象的想象的人的幸福,而是“现实的人”的“幸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是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这里的人既不是“类”也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从事社会实践的“人”。

立足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基础上对人的“幸福”实现的探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将其与人类幸福的实现联系起来。他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普遍受苦的阶级”,其解放不仅意味着自身的幸福,也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实现

⁶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2.

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

⁸ 张一兵.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新探——经济学研读语境中的《神圣家族》[J].学术界,1998(4):1.

⁹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¹⁰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三联出版社,1961:536.

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而这一变革将为人类的幸福创造物质基础。马克思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观点表明,幸福观的实现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群众的实践。马克思认为,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进而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出发分析“幸福”和“不幸”。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¹¹概言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人的幸福并未得到满足,反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下显得日益扭曲的不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被剥削被压抑,人丧失了作为主体的劳动积极性,在物质生活上表现为普遍的贫困,在精神生活上表现为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的恶化。为了更好的实现“幸福”,就需要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提出为了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就需要进行共产主义运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还详细阐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看法,虽未直接把“人的全面发展”等同于“幸福”,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人的“幸福”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现实的人的解放不能在私有制背景下的“虚假共同体”中实现,只能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得以成为可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消灭私有制、需要消灭旧式分工,所以马克思对旧式生产和分工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他提出“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¹²私有制背景下旧式的社会分工使人们在贫困的生活中艰难的维持生计,人无论是在体力还是在智力上都是片面畸形发展而无法谋求个人“幸福”。马克思1845年下半年撰写的述评文章《珀歌论自杀》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自杀解决最严重的困难,而刑场则解决其余部分。只有改革我们的整个工农业体系,才可望获得收入的来源和真正的财富”,由此马克思揭露出法国社会在当时体现出的道德堕落,提出只有废除私有制,摒弃旧式分工,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使人的社会性得到发展,进而才为“幸福”实现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1847年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文中,马克思着重剖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活的不幸。在剥削的生产关系中,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国家的繁荣所必要的,那么也就等同于承认工人阶级的苦难的处境就是资产阶级繁荣的必要条件。在1847年撰写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进准阐释了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人们之间关系的决定和制约机制,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这里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而生产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因素,这也为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进而实现“幸福”提出了科学理论依据。马克思强调,“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问题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系列。”¹³“理性”是蒲鲁东对解决人类幸福的回答,但马克思对此却并不满意,把“幸福”简单的理解为“理性”显然是未明确重点并把“幸福”问题简单化了,“幸福”需要“理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理性的辩证运动进而消除社会中坏的方面显然是不能实现的。

1849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无疑体现了马克思幸福观的正式确立和成熟。文中既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提出了奋斗理论和策略,同时也为人的“幸福”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纲领。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决定的。通过大量的理论和现实研究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一种剥削制度,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少数人对广大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剥削的基础上,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宣言》除了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它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以外,还全面而系统地规定了它在最近的将来所要实现的具体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必须遵循的斗争策略和方法。”¹⁴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做到消灭剥削制度,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幸

¹¹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

¹²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67.

¹³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5.

¹⁴ 孙伯鍔.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26.

福”社会。

三、马克思早期幸福观的合理边界

马克思幸福观是马克思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批判的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对人类社会以及无产阶级发展进行的长期研究中得出的关于“幸福”的观点,是马克思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回应。“马克思世界观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以及对它从理论上解决的程度,而对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回答。”¹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本人并未对“幸福”做明确定义,而其幸福观形成发展也并不是像其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思想一样具备完善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幸福观的形成发展遍布其通信、文章、著作中。通过在对马克思早期文本进行分析,将不同时期马克思对“幸福”一词的零散的描述进行概括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马克思幸福观”:主体——“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马克思关于“幸福主体”的理解既包括“现实的人”也就是认为幸福的主体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类”,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同时随着其对社会问题的不断深入研究,“幸福”的主体更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而非作为个体的单个的个别的人,我们不仅要实现“现实的人”的幸福,更是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幸福;路径——“实践”和“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要实现“幸福”不能仅仅停留于“理念”层面,所以在马克思青年时期他脱离青年黑格尔派转向研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要实现“幸福”就必须通过“实践”的物质性活动来改造世界,认识世界不是最终目的,改造世界造福人类才是最终目的,同时回到马克思幸福观所产生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来推翻旧的制度才能实现“幸福”;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和“人类的解放”,“幸福”的最终目的首先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生产力的决定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首位;同时回到马克思幸福观产生的历史时期,实现“人类的解放”是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历史使命和最终的革命目的,要通过不懈努力最终“消灭资产结合和无产阶级”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即幸福。

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在当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幸福感的同步提升,反而出现了精神空虚、社会分化等问题。马克思幸福观始终坚持为全人类谋幸福的立场,将幸福与社会现实、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其幸福观具有区为理解与实现幸福提供了科学的路径。其一,物质基础是幸福的前提,只有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才能为幸福创造可能。劳动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劳动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手段,更是人类实现幸福的重要前提与保障。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劳动被异化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资本家通过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这种剥削机制使得劳动者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尽管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试图缓解劳资矛盾,但这些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异化劳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劳动者的劳动呈现出一种自发性而非自觉性的特征,这种自发性劳动无法为个体带来真正的幸福。因此,只有彻底摆脱异化劳动的束缚,并从支配劳动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劳动者才能在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成就真正的幸福人生。这一过程不仅关乎个体的解放,更是社会整体迈向自由与幸福的必经之路。

其二,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作为人类追求的两大核心目标,二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在资本与现代社会的生成过程中,不良消费观念的盛行导致部分个体陷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的误区,从而扭曲了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这种片面追求物质满足而忽视精神提升的现象,不仅割裂了物质与精神的内在联系,也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从辩证的视角把握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物质幸福是精神幸福的基础,为精神追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精神幸福是物质幸福的升华,为物质生活赋予了意义与价值。只有在物质与精神的动态平衡中,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的最大化与可持续化。

其三,幸福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身潜能的过程。幸福并非单一维度的物质财富积累,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其核心在于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实现自身潜能与价值。物质财富固然为幸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仅靠物质积累无法满足人类对意义、归属感与自

¹⁵ 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96.

我实现的深层需求。幸福本质上是个体在社会关系中通过劳动、创造与互动，逐步实现自我发展与全面解放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物质条件的改善，还涉及精神层面的提升、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因此，幸福是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其实现依赖于社会制度的公平性、文化环境的支持性以及个体实践的主动性。只有在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幸福。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张一兵.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新探——经济学研读语境中的《神圣家族》[J].学术界.1998(4):1.
-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三联出版社，1961.
-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5.
- [13]孙伯鍠.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4] 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Marx's Early View on Happiness

Liu Yang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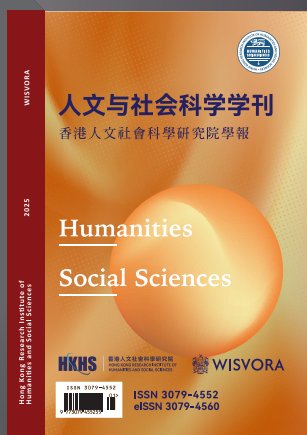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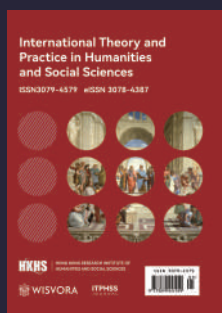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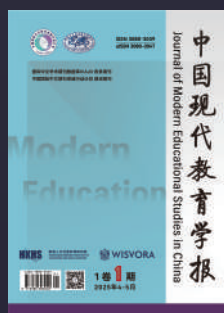
(¹Hohhot No. 2 High School,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90,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under varying social conditions, human reflections on the essence of happiness and its realization have never ceased. As a great thinker devoted to the cause of human emancipation, Karl Marx frequently discussed his views on happiness in his early writings and subtly embedded the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scattered references to happiness in Marx's early texts reveals that his entire life was not only one of deep contemplation on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but also one of persistent struggle for the happiness of humankind. Marx'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underwent a developmental process—from its initial emergence to its gradual maturity. This process parallele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theory itself. As a theoretical pioneer of human liberation, Marx applied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e study of happiness, thu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e for achieving human freedom and well-being.

Keywords: Marx; early texts; concept of happiness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Online ISSN 3079-4560
Print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